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六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六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PDG

目　　录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 ……………………………………………… (1)
——反对军阀战争和争取群众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 ………………… (10)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给山西省委的信 ………………………………… (13)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 ……………………………………… (21)
——农民运动的策略
(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
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 ………………………… (26)
——关于闽西斗争问题
(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 ……………………… (31)
——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
(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
中央通告第二十九号 ……………………………………… (39)
——关于党员军事化
(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号 ………………………………………… (43)
——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党的主要路线
(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

对于农民问题的意见 ………………………………… 瞿秋白（52）
（一九二九年）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暴动失败后工作方法的指示 …………（64）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 ………………………………………（69）
——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 ………………………………（88）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
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 …………… 周恩来（93）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 ……………（97）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瞿秋白给李立三的信 ……………………………………（105）
（一九二九年四月四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 ……………………………（116）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的信 …………………………………（125）
（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四号 ……………………………………（140）
——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方针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 …………………（154）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关于湖北问题决议案 …………………………（157）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的信 ………………………………（173）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兴国县土地法 …………………………… 毛泽东（184）
（一九二九年四月）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 ……………………………（187）
——中共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训令的决议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202）
（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221）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 …………（233）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六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纲要 ………（240）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
决议 ……………………………（259）
（一九二九年六月）
政治决议案 ……………………………（266）
——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一九二九年六月六届二中全会通过）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 …………（293）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号 ……………………………（306）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
决议与精神
（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 ……………………（320）
（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

中共中央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 ……………………（329）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二号 ………………………………………（335）
——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致莫斯科中国学生同志书 ………（341）
（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答复陈独秀的信 …………………………………（351）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
中共中央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 …………………………（356）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
中共中央给武汉特支的指示信 ……………………………（359）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 ………………………………………（363）
——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批评陈独秀对中东路
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369）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
附：撒翁（陈独秀）复中央的信 …………………………（382）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391）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诸同志的信 ………………………………………………（398）
——关于群众运动和党内概况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
决议案 ……………………………………………………（405）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六号 ………………………………… (416)
——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 ………………………………… (425)
(一九二九年八月)
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 (436)
(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
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 …………… 陈　毅 (448)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关于朱毛红军党务概况的报告 ……………………… 陈　毅 (469)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中共湘鄂西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 贺　龙 (488)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九号 ………………………………… (500)
——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 (509)
——关于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给陕西临委的指示信 ……………………………… (524)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 (529)
(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中共中央给河南各中心县市委转各级党部的信 ………… (539)
(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 ……………（550）

（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

中共中央给陕西临委的指示信 ……………………………（564）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 ……………………………（571）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八日）

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 ……………… 彭德怀（581）

（一九二九年十月）

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 周恩来（599）

（一九二九年十月）

中央通告第五十六号 ………………………………………（603）

——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的策略及工作路线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公开信 ………………（610）

——关于示威运动之工作上的批评与指示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

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公开信 ………………（620）

——关于与机会主义——反对派斗争的工作路线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 ……………………………………………（625）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 …………………………………（631）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中央军部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 ………………………（640）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央通告第五十七号 …………………………………… (652)
——关于阴历年关斗争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 …………………………………… (657)
——关于女工农妇运动的工作路线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
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 …………………………………… (662)
——为巩固与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
中央通告第六十号 ……………………………………… (667)
——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策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 (679)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红军问题给福建省委等的信 ………… (692)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军委的信 ………………………… (698)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
的决议 ……………………………………………… (705)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百色起义后右江工作给红七军
前委的指示 ………………………………………… (713)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信 …………… (721)
——抗议远东局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
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决议案 ……………………………… 毛泽东 (726)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

——反对军阀战争和争取群众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

（一）现在的政治形势

一、反动统治内部的冲突更加紧张。

五中会议以后，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积极进攻，使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不得不采取暂时让步的策略，而造成买办地主阶级占优势的南京政府。但是两派的斗争并没有妥协，反因此而更加紧张。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企图进一步排斥资产阶级而完全垄断政权，所以在五院成立以后，继续整顿军队（如鄂粤等省解散杂色军队），准备财政（鄂粤各省捐税日增，十月份并在广东发行公债九百万），实行联防（五省军事会议），整理党务，并通过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中央指派代表的决议。资产阶级派则企图从各方面渐次削弱买办地主阶级的势力来取得并巩固他的政权的领导地位。第一，在群众中极力提高改良主义的宣传（尤其是反封建势力的宣传）来骗取广大的群众，一面可以阻止革命势力的团结，另一方面又可以打击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第二，在外交上，固然与美帝国主义“心心相印”的更加密

* 本文原载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二期。

切；同时不惜继承以前卖国外交政策来与其他各国迅速订立条约，以巩固帝国主义对他的信任。第三，在政治上进行统一、裁兵、裁厘的方针，反桂系“分治合作”的主张。第四，在军事上勾结湘系（鲁涤平等）、鄂系（胡宗铎、陶钧等）以包围桂系的武汉，拉拢阎锡山，孤立白崇禧在北平的力量，唆使李燊进攻贵州，破坏桂系五省联盟政策。

二、资产阶级的力量已比较强大。

资产阶级这些企图的确得了相当的成功，尤其是欺骗群众的改良宣传，的确增加了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工农群众对他的幻想，所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通过指派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决议案以后，资产阶级更公开的实行进攻的政略。第一，资产阶级统率的各省党部提出激烈的反抗（首先便是南京市党部）。第二，蒋介石亲自出巡检阅军队，并与冯玉祥联合消灭与桂系勾结的樊钟秀部队，巩固内部的基础。第三，开五省民政会议、裁厘会议，一面使五省的联合更加巩固，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的骗取群众的幻想。第四，极力进行编遣会议，来实现他们幻想的统一（首先便是军政的统一），裁减桂系的军队。

三、买办地主阶级不得不暂时让步因此在南京政权的优势已经削弱。

桂系、西山会议派在资产阶级这样进攻之下在政治上渐次孤立，在军事上更受压迫，而不得不采取暂时让步的政策（如修改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法的决议，允许湘系增编军队，释放程潜，在南京政府中政治上的表现，买办地主阶级的影响也渐次缩小）。所以以前买办地主阶级政权上的优势，现在已经逐渐削弱，地主买办知道这种趋势于自己绝对不利，因此更准备着将来之积极的进攻，现在的形势，因此是更明显的

两派对抗相持的局面。

四、两派斗争的中心问题：统一、裁兵、裁厘。

买办地主阶级主要的是在榨取农民的血汗，所以要严厉的镇压农民的反抗，镇压农民的工具就是军队，因此裁编军队是买办地主阶级所不愿意的，军队既不能裁编，那么供给军队的财政主要来源的厘金，当然不能裁撤，同时既有拥有庞大军队的军阀存在，自然要保存分区割据的局面，所以所谓“分治合作”是真正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主张。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需要国内和平来发展工商业，渐渐走上资本主义化，所以极力要求统一与裁厘，他所认为妨害统一裁厘的原因就是军队太多，所以首先要裁兵。同时裁兵以后无力镇压农民的暴动，因此企图实行改良政策来实行缓和农民（如二五减租等），这种改良政策自然是地主阶级所极不愿接受的。所以现在资产阶级争夺的中心问题就是裁兵、裁厘与统一。在这一个争斗当中并不能说资产阶级比较好些或者“革命”些，而且资产阶级的政权更加妨害革命，就是更聪明的更利害的反革命政策。因为资产阶级并不愿意根本消灭地主阶级，实际上更要延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并不能够根本消灭帝国主义的特权，实际上更要延长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不能够彻底解放广大劳苦群众的痛苦，实际上更要延长广大劳苦群众的痛苦。不能消灭地主阶级，不能扫除帝国主义的特权，便绝对没有真正的统一，所以资产阶级是一样的反革命并且是革命更利害的敌人。

五、军阀战争的危机不可避免的要爆发起来。

两派的冲突，既然是这样根本不相容，最后当然要造成惨酷的战祸。现在二派冲突更加紧张了，如编遣会不能谋得一条妥协的方法，空前的军阀大战，要更快的爆发起来。不过就现

在的形势两派都有不能急战的原因：第一，外交尚未完全办妥（尤其是济案尚未解决），如果战争爆发，日本更要借口出兵，修约的企图将成为泡影，这是资产阶级所极不愿意的。第二，欺骗群众的工作尚未成功，二派都未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其是革命势力没有完全消灭，更是二派所引为莫大的危惧。第三，在军事上蒋系觉到没有消灭桂系的可能，在桂系更易觉到自己的难于战胜弱点，因为这些原因，或者两派在根本上不能调合当中而谋到一个暂时妥协的办法，所以战争不一定马上就会爆发。但终究是不可避免要爆发的，并且延长的时日愈久，两派的准备愈充分，将来给与广大劳苦群众的惨祸便要更加利害。

六、帝国主义间英日接近对抗美国的形势也可以促成国内战争的爆发。

资产阶级是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如果资产阶级的势力发展，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便同时在中国伸张起来。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与日本和英国的利益极相矛盾的，所以英日之间有暂时放弃内部不能调协的矛盾联合起来共同对美的可能。尤其是日本，在南京政府找不着他的工具，美国的政策对他的损失也更大，所以要急于联合英国，因此英日同盟复活的空气，在东京极为浓厚，如果英日已完全接近，便可造成桂系与张学良巩固的结合来反对蒋冯，战争的爆发必然更加迅速。可是资产阶级已经看出这一危险，在外交上极力让步，完全不争持帝国主义认为不愿放弃的利益，如是英国公使递国书了，日本床次也满意归去了，英日联盟的空气也缓和了，资产阶级这一更无耻的卖国政策，已经使英日帝国主义比较缓和对于他的压迫了，因为日本和英国主要在保持他的已得的特权，仅仅费一纸书面的承认，挽得了无数特权的保障，这何乐不为。这并不能

说英日不会帮助他的工具（桂系和奉张）来反抗蒋系了，尤其不是英日与美国之间已经妥协了，不过仅是一个暂时的妥协罢了。如果资产阶级在国内更利害的向买办地主阶级进攻的时候，英日当然要积极帮助他的工具来克服资产阶级的发展。所以军阀战争终是不可避免要爆发的。

（二）我们的任务与策略

七、我们的任务是要加紧争取群众的工作。

军阀对于战争的准备更加积极，对于民众的压榨，当然要更加利害，同时军阀的矛盾更深，他的统治便是更易为动摇。如果军阀战争爆发的时候，便是极易为动摇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团结，如果没有广大群众斗争力量，尤其是广大群众还没有推翻统治阶级的决心和勇气的时候，就是反动统治已经极易动摇，还是没有办法打倒他，还是不能有革命的爆发。所以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极力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坚决群众革命的认识和勇气。

八、目前争取群众的策略，第一就是要打破资产阶级改良宣传。

资产阶级改良的宣传，是我们争取群众最大的敌人，现在资产阶级的宣传，的确增加了群众的幻想，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在江浙各省，已经在我们工作中随处遇着了这一个敌人，在北方群众中的影响比较江浙还要利害，就是在桂系统治下，资产阶级基础比较薄弱的广东，也有很大的影响（东江一带很多农民都望张发奎回来）。如果资产阶级改良欺骗不能在群众中揭破，如果群众不能彻底认识资产阶级改良的反革命性，那

么广大群众必然很困难团聚到革命影响之下来。所以我们要极力在群众中揭破资产阶级改良的反革命性，极力宣传我们的政纲，来吸引群众。但还是异常不够的，要打破资产阶级的改良欺骗最主要的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去打破。如果斗争起来了，资产阶级便要渐次暴露他的妥协、欺骗、压迫的真面目。群众经过一次斗争便认识资产阶级一分，革命的影响也就可以随着大一分，必须在不断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影响才能肃清，革命的影响才能强大，在现在群众斗争的勇气尚未提高的时候，广大的斗争很困难发动，所以目前主要的策略是发动群众日常的小斗争。发动小斗争的口号，各级党部都已经提出来了，各种议决案都可以看见了，但是还没有看见这一工作的发展。这是由于不懂得怎样去运用这策略（在此次通告上无法详细说明这一策略的运用），最主要的还是没有深入群众中去。不深入群众中去自然不能知道群众的日常问题是些什么，不明群众的日常问题，自然无法发出日常鼓动的口号，来发动群众的斗争。在现在反动势力日益向群众进攻的时候，群众生活日益痛苦的时候，每个工厂，每个农村，每个学校，每个市区，每个兵营，每时候都有压迫群众的事实。我们如果能深入群众中去，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群众日常的痛苦，把这些群众日常的痛苦来做鼓动的口号，必然很容易发动群众的斗争，所以深入群众中去，很难苦的工作，来发动并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加紧党的政治的宣传，是每个党部每个同志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渐次打破资产阶级改良的影响，才能夺取广大的群众。

九、第二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

现在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正极力在群众中宣传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罪恶，说他们压迫群众，说他们妨害统一，说他们是

封建军阀，说他们是反革命，并提出“一切民主势力团结起来，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要骗取群众来帮助反对桂系，就是要造成将来“反桂系是革命战争”的口号。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看见资产阶级这样利害的宣传，群众将有帮助资产阶级一块来对他的危险，马上也表示“革命”起来，指摘资产阶级与各国的外交完全是卖国，并且号召南京一部分学生群众起来反对，打毁王正廷的公馆，同时在各方极力宣传反对现在的订立条约，这就是桂系对抗资产阶级的计谋，也就是要在群众中造成“反对蒋系就是为革命的利益”的口号。买办地主、资产阶级都在宣传他的将来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揭破他们这种假面具，要指出买办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蒋系和桂系是一样的反革命，一样的压榨群众的军阀，他们的战争完全是军阀战争，完全是反革命的战争；他们战争的原因，就是为抢夺压榨群众的权利，抢夺反革命的领导权。同时要很具体的极力宣传战祸的残酷，提出反对残害群众的军阀战争的口号。并且要宣传只有广大群众的团结与斗争，只有工农兵一致联合的暴动，才能消灭军阀战争，要消灭军阀战争，必须根本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这些宣传必须从现在起就在广大群众中散播起来，才能不致受豪绅资产阶级的欺骗，才能渐次团结到革命影响之下来。

十、第三反军阀的宣传要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

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如果只是一些抽象的口号很难使一般群众有明白的认识。所以必须与群众日常生活痛苦联系起来，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然后才易为使群众明白了解。如群众感受苛捐杂税的痛苦，我们一方面鼓动他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同时必须指出军阀抽收苛捐杂税，就是要筹措军费，准备战争。如在上海的电车罢工问题，一方面宣传反对国民党压迫

工人上工，同时要指出蒋系要很快的压迫罢工，就是正在准备战争恐怕后方动摇。这样广大的群众才易为认识，并且会很坚决的起来反对战争。

十一、有两种极不正确的倾向必须预防。

在反对军阀战争的宣传中很易为发生一种不正确的倾向：第一，以为军阀战争将要爆发了，我们要准备反军阀战争的实际工作，从军事技术方面去计划如何做发动游击战争，如何夺取敌人军械，如何兵变，甚至如何暴动等。这种观念很可以妨害目前党的主要任务——夺取广大群众的任务。要能号召反军阀战争的激烈的斗争和暴动，必须有广大群众的团结力量与决心。第二，以为战争一发生，则我们一切工作都可以很容易进行，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不知战争一发生，固然可以给我们许多工作的机会，但并不能减少我们工作中的困难，我们更要准备着群众的组织力量，准备着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届时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多有胜利的把握。所以我们目前中心的任务，仍是难苦的群众工作——尤其是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深入群众中去，领导日常斗争，渐渐组织，扩大起来，同时加紧反军阀战争宣传，使群众团结到革命影响之下。必须从现在难苦工作的结果，才能决定在将来军阀战争中的策略、行动如何。并且可以更肯定的说，如果军阀战争爆发得快，除开几个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主要任务，还是利用军阀战争摧残群众的机会更加紧团聚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不过就现在的形势，军阀战争不一定爆发得很快的，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应该积极难苦的深入群众中工作，树立群众的组织，发动群众的斗争，准备在将来军阀战争中革命的胜利，甚至进一步的以广大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

（注意）本通告中的主要内容：

在第一部分政治形势分析中：

一、反动统治内部的冲突更加紧张；

二、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反动联合的内部已更加强大；

三、买办地主阶级在南京政府的优势已经削弱；

四、两派斗争的中心问题；

五、资产阶级是革命更利害的敌人；

六、军阀战争不可避免的要爆发起来，但不一定马上爆发；

七、帝国主义间英日接近对抗美国的形势也可以促成军阀战争的爆发。

在第二部分我们的任务与策略中：

一、我们的任务是要加紧争取群众的工作；

二、争取群众的策略首先就要打破资产阶级改良的宣传；

三、要加紧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才易为揭破资产阶级改良的欺骗；

四、加紧反对军阀战争的宣传；

五、反军阀战争的宣传，要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

六、防止忽视群众工作的不正确的倾向。

中　央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

1. 自六次全国大会号召全党肃清小资产阶级意气之争和国民党的工作方法以来，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如闹个人问题、经济问题及以私人感情关系为出发观察一切工作等等，并还没能开始减少。不但没有减少，三四月来工作的经验，各省党部各地干部分子常因这种问题演成党内纠纷。显著的如顺直问题、浙江问题，其次则在各省党内常有多多少少类似的问题发生。因这种纠纷问题的起伏，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更加发展，于是乃反映六次大会中极不正确的意识，所谓个人派别问题成为攻击怀疑的借口，且牵连到中央最高指导机关。在先在顺直问题中曾发生这种意见，认中央改造顺直党部含有派别作用；山东省委亦因有人宣传中央及党中有派别存在而成立否认的决议案；在各省则颇有些干部分子作此种类似宣传；最近则江苏党部各级负责同志竟有人扩大此种宣传以号召省委与中央对立。

2. 这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在党内极普遍的发展，中央政治局认为决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他的历史来源是由于中国革命

* 这个决议案原载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二期。

失败的反映，党内无产阶级基础的日益削弱和党内政治生活的日益低落。因目前客观环境如白色恐怖对于党的摧残，改良主义的欺骗从宣传上和组织上向党进攻，和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主观任务提高党内政治指导、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在党内的难产，全足影响到党内干部分子阶级观念的动摇和错误。工作无出路或生活腐化，这便成为目前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

3. 中央政治局认为这种现象不仅危害党的发展，且在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成为反党的行动。中央政治局根据几月来工作的经验，认为只有坚决地号召全党在六次大会的政治组织路线之下深入群众，积极工作，领导斗争，加强政治指导与训练，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努力吸收新的分子，坚决的改造党以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反映无产阶级群众正确的意识，加强党的指导，才能在此工作与斗争的过程中一致地与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肃清正确路线中的一切障碍。

4. 关于江苏党的改造，中央的观察与所决定的路线有下列五点：

（一）江苏工作尤其是上海工作居全国领导地位，江苏工作做得好可以影响全国；

（二）江苏省工作尤其是上海工作关系于中央的指导极大，中央可以从上海得到工作上斗争上的经验和教训以指导全国；

（三）目前江苏客观环境特别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与改良主义的欺骗在工人中的宣传与组织，极需要党的领导和斗争；

（四）但江苏党的主观弱点是群众斗争领导的困难，地方党部的软弱，省委观念的错误与工作之缺少中心；

（五）为要打破这一主观的困难，改造江苏党的路线应是：强健地方党部，改组省委，以积极领导斗争和树立工作的

中心。

5. 江苏党部各级负责同志在还没有了解中央对于改造江苏党的路线之先，亦不从工作上与中央来共同讨论这个路线的正确与否，而竟有些同志在党内群众中以至在各省来中央的负责同志中散布中央兼省委的办法是别有用意，是派别问题，江苏党部将打倒某人拥护某人，将联合各省以反对中央等等。这种观念与行动的错误，很显然是非无产阶级意识与国民党的工作方法在党内的残留。分析看来便是：（一）硬依工作地域的关系臆造党中有无原则的派别；（二）将省委与中央对立，发展与党有害的地方主义；（三）根据个人关系为出发以观察党的工作。这样简直成为封建社会思想习惯的残留。

6. 中央政治局承认这种历史的残留与发展，在目前党的艰难困苦转变的时期于党有极大的危害。只有在六次全国大会的精神之下，以无产阶级最高原则铁的纪律与党的一致，才能战胜这一危害。中央政治局一致地主张，坚持中央正确的工作路线，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和倾向以及妨碍此正确路线的行动斗争到底。以江苏最近发生的问题为最严重的材料，号召江苏全党以及全国党员起来注意这一问题，消灭这一现象，主要的是以教育的方法开始在全党内做改造的工作——这是目前党内急迫而又长期的中心任务。

中　央

一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山西省委的信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山西省委：

中央听了汪[1]同志口头报告及与汪同志开会讨论后，对于山西党部目前工作，有以下之指示：

山西是阎锡山的基本地盘。自前年北伐以后，虽然阎占领了察绥及直隶广大的省区后，扩大了他的势力范围，但察绥二区地域荒凉，土匪众多，在经济上不能以维持其广大的军事统治。而直隶又因杂色军队众多，桂系的白崇禧又盘踞其间，使阎在直隶的政权不能统一起来。目前在豪绅资产阶级相持的虚伪的和平局势之下，阎虽接近于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在直隶形成暂时的合作，但是他们互相间仍有不少的利益冲突。故目前阎锡山将直隶统一起来，建立稳固的基础，还成为不可能之势。因此，阎锡山的统治基础仍然是在山西。

在目前反动政局的内部，虽在编遣会议中，买办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互相让步之下——当然资产阶级比较占优势，构成虚假的和平相持的局面，但内部的冲突与矛盾并未得着解决，新军阀战争的爆发仍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阎锡山在这种形势之下，一方面是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准备新的战争，另一方必须积极的巩固在冀晋察绥的统治地位，特别是山西的统治基础。当然更使他更严厉的来压迫工农的革命运动，残酷的来

剥削人民的血汗，这种情形在阎的统治基础的山西更要表现得利害。

在山西的统治基础，在城市是建立在商业资本，在各村中是半封建式的村庄制度上面，也就是阎锡山所代表的阶级性。山西商业资本最发展，并侵入到全国中去，主要的是剥削乡村的农民。同时因为山西大地主很少，并且纯粹地主阶级自己不耕种土地，专以土地剥削农民的也占极少数。山西农村经济统治者是中小地主与富农的混合阶级。村庄制度即是代表中小地主与富农的混合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是半封建式的政权组织，村庄制度中之村长与村副多半是中小地主与富农充当。山西商业资本自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在全国受了打击暂趋入衰落形式。因此，阎为直接剥削农民，固稳在农村的统治基础，最近有改村长制为委员制的主张。山西财政收入主要的是地亩粮税，虽然是按亩征收，其实掌握乡村政权的中小地主与富农可以将自己税捐转加到中农贫农身上去。而且一般富农在乡村中兼放高利债，以增加对于中农和贫农额外利润的剥削，甚至兼并他们的土地。这种情形特别表现贫农更受剥削，日益破产，这都表示村庄制度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因此，北方的中小地主与富农的混合物，他的阶级性是摇摆于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他是看谁与他有实际利益即倾向于谁，在政治上则反映出阎之摇摆于蒋[2]桂之间，是以谁于他有实际利益来决定他的政治行动和倾向。

因此，阎锡山在山西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工人群众，亦相当施用改良口号以缓和群众的革命情绪。特别是在目前山西经济发生恐慌之时，除了以军事统治镇压以外，亦采取改良口号来缓和群众的革命情绪发展。如对于学生用津贴费用来收买，对于工人则由政府派人办工会及俱乐部，强迫工人加入国

民党，在收取入党照相费时，工人起来反对，马上召集工人开会，宣布取消照相费，由政府担负等（兵工厂等）。国民党在山西成为阎锡山压迫群众欺骗群众的工具，但对乡村始终维持和稳固他的旧有的统治基础。

山西全省经济，自北伐战争以来，苛捐杂税不断的增加（粮银由一两四元增加到六元，其他如北伐捐、保卫捐、款征十八年钱粮），工商业已受了战争的影响，加以今年旱灾发生，使农村经济受了更大的恐慌，农民受着饥饿，发生农民向富农及豪绅强迫借粮及抢劫行动，于是更影响到城市的工商衰落。许多手工业的工厂停闭，失业工人不断的增加，或者工资降低，于是影响到阎之财政收入。兵士欠饷增多，而不断发生士兵抢劫事件，这种现象从太原到乡村皆是继续不断的发生，即是阎之唯一主要的兵工厂亦不得不减少生产，大批裁减工人，使山西经济发生极大的恐慌，开始动摇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基础。阎锡山在这种形势下，虽然将全省划为八个师卫戍区（二十四个团卫戍区）实行武装的镇压，同时对人民剥削丝毫并未减少，更增加各卫戍区就地征发粮饷，给予人民的剥削更是激起山西的工农群众的反抗和斗争。

目前山西群众的自发斗争是不断发生或扩大，虽然斗争的形式尚未走上阶级斗争正轨，但是使工农群众日趋于革命化。假如山西的党是强有组织而能领导群众的斗争，必然推动广大的工农斗争起来以创造山西工农斗争新的局势，而促进统治阶级的崩溃及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山西的党自遭白色恐怖摧残之后，党的组织非常微弱，最近党的工作又走到和平发展错误的道路（先恢复组织后发展工作及和平发展组织等），使党不能积极的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建立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

中央根据以上的情形和分析，具体的指示如下：

1. 目前山西党的任务是深入到群众中去，积极的领导工农群众的斗争，坚强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这一工作是非常艰难困苦的，因此目前的策略：（1）积极的领导群众的自发斗争，使这些斗争进为有组织的形式，加强斗争的力量；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要依据群众日常生活实际情形随时发动群众起来。争斗发动形式必须要纠正命令形式，以宣传鼓动方式提出群众最需要的而迫切的主要的要求口号，鼓动群众起来斗争；（2）反对国民党和阎锡山的改良宣传和欺骗行为，必须使这些宣传和行动要根据在群众中的具体实际事实，才能给群众以明确认识。在每一个斗争中我们都不要放松这一工作，才能揭破他的改良欺骗，而且打破群众对于他们的幻想；（3）领导和扩大反帝运动，但必须要与工人的日常斗争相联系起来，加强反帝运动的力量，建立工人阶级在反帝运动的领导地位。即如国民党所领导的反日运动，只要有群众参加，我们的党也应打入进去，在群众中提出党的主张，揭破国民党欺骗群众面具。但不是与国民党合作或夺取空洞的机关，而是到群众中夺取广大的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宣传和行动；（4）加强和扩大党在群众的政治宣传，以扩大党在工农群众中的政治影响，特别在群众斗争中，要注意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宣传，以促进工人阶级的意识发展。这种宣传不是简单的散发传单和宣言，而是要在每个政治问题和群众斗争中具体的提出党的政治和对于斗争的主张，对于一切技术工作亦要依据群众情绪和客观环境随时改善；（5）山西工作的发展以太原、榆次、阳泉、大同为中心区域，党在目前应集中力量来发展和建立这种中心工作。党和群众组织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斗争上，纠正和平发展的倾向。

2. 党的组织问题：（1）建立产业工人支部，加强党的无

产阶级的基础。在太原为兵工厂、铁路、汽邮电、市政等主要工人，大同是矿工、铁路工人，榆次是铁路纱厂、织布等工人，阳泉是铁路工人、矿工、铁厂工人，党要在这些工人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2) 建立支部生活，使支部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3) 强健地方党部的组织，特别对于中心区域的地方，党部更要集中干部人才加强组织的力量。若是地方组织软弱不能独立进行工作，其他工作的发展更没有多大的成效，谈不上中心工作的建立；(4) 加紧党内教育，按照客观条件，举行党内民主讨论，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5) 省委工作要实行集体指导，以加强省委指导力量；(6) 实行巡视员制度，省委常委经常留三人负责工作外，其余二人要分别出巡外县，特别巡视中心区域的工作，巡视员巡视各地不仅是指导和考察各地工作，而且要积极来帮助各地党部来建立和发展工作；(7) 培养新的干部人才，引进工人同志参加党的指导机关。

3. 职工运动：(1) 注意产业工人的工作发展，如铁路、矿山、兵工厂、汽车夫、纱厂、邮电、市政、织厂等工人组织，其次才是手工业店员组织；(2) 组织形式最主要的是运用工厂委员会组织。这种组织在工人原始斗争中，甚至和没有组织工会中，国民党所把持的工会斗争中，最能团结广大群众领导群众的争斗，名称不必一定限于工厂委员会的名义，如工人代表团、交涉委员会、罢工委员会、索薪团等等，其组织方法是临时按照工作部门，由群众推举代表组织之。假如在斗争胜利后，工人群众已拥护这种组织，也可转为赤色工会的组织(详细的说明和运用的方法可参看中央通告十六号)。其他可依照群众情形进行各种灰色组织，如体育会、游艺会、俱乐部等等，在这些组织中，必须要取得半公开地位，加强这些组织的工会作用。至于秘密工会和赤色工会小组，必须在不可能得到

灰色组织的地方进行。至于群众组织必须尽可能求得公开地方，才能使群众组织迅速扩大的发展起来，但绝不是采用合法向国民党立案，以求得公开地位，而是利用社会可能公开的名义，如上面所说的俱乐部、体育会等等，以求得事实上的公开活动；（3）斗争的策略注意群众日常生活情形，提出群众的迫切要求，发动日常斗争。在每次斗争中，要求条件不宜过多，只要是群众迫切所要求的，就是一二条都是好的。斗争的方法不必限于罢工一种形式，或是怠工围厂长要胁等方式都可，但是每一斗争要以胜利为原则，罢工时对于战术的运用更要力求正确，才能保证罢工的胜利。斗争的胜利是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和扩大将来斗争的必要的条件，在每次斗争中都要注意群众对于自己团结力量的认识提高。假如在幼稚的群众中阶级的观念尚十分模糊，尚对于国民党及政府存有幻想者，如向政府党部请愿等等，而不敢直接斗争，如若这是大多数群众的意识表示，党应一面指出和批评这种行动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的，同时还是参加这一行动，主要的在这种行动中来揭破统治者欺骗行为，打破群众的幻想。但党在任何群众中，不能自己提出这种主张，党唯一的对于斗争的领导是发动群众的直接斗争行动，如若有少数群众有这种意识表现，党应用说服精神来战胜这少数群众落后的思想；（4）对于国民党及阎锡山所办之工会的策略，凡是有群众的组织，都应该参加到下层群众中，扩大党的宣传，揭破反动派领袖的行动，改组工会委员会组织。党在这种工会内不必组织秘密工会组织，可在这种工会之下进行附设组织，以团结工人中激进的分子在反动工会内作积极斗争，以夺取广大的群众；（5）目前失业工人运动，党应积极去领导，以建立将来在工厂中的群众基础。其余关于策略的运用可详看中央十六号通告。

4. 农民运动：（1）农民运动的发展，应以沿正太铁路和几个中心区域四郊农民和洪洞、赵城等农民为主要的工作区域；（2）在山西农民运动中，群众基础当然是中农贫农和雇农，对富农在目前农民斗争尚未广大的发展起来的时候，对于反对加粮和苛捐杂税的运动，尚有一部分富农参加，党的策略在目前是反抗捐税斗争，应当使这一部富农来参加，不必故意提出反对富农口号，但斗争的领导权必须建立在贫农身上。对于雇工利益的斗争，党应完全站在雇工利益上来争取雇农的利益。山西农民斗争稍一发展，特别是反对村庄制度和高利贷，富农马上要反动起来，党这时的策略是积极领导中贫农斗争来反富农，同时党当时要看富农是否全体或一部分的反动来决定党对于富农的策略。党在目前应积极领导反苛捐杂税的争斗来吸引广大富农来参加。同时对于雇工工作，特别注意在农民组织中成立独立组织（雇工会）或雇工部，以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农民领导权，这种组织与城市工会要发生秘密的联系；（3）农民斗争的口号，在目前农民斗争开始的时候是反对加粮，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高利贷，反对操纵水利，反对村长剥削与村长算账，这是目前斗争的口号。这种斗争的发展必须很快的转到抗租抗税抗粮、反对半封建式村庄制度以及反对山西的统治阶级。在这种斗争形式之下，是很快的进到武装斗争；（4）目前党的策略是刻苦的来发展群众组织，领导农民的斗争，在目前的自发斗争使进到有组织的斗争。在每一斗争中要加强群众斗争的组织性和直接斗争的形式，要注意统治阶级软化的欺骗政策，随时扩大党的组织，加强党在农民中领导力量。在每一日常斗争中的口号必须联系到大的斗争上面，随时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但宣传口号（如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等）与目前实际斗争口号要分别清楚；（5）对于农民武装组

织，党在群众斗争中随时发展或扩大这种组织。对于农村中保卫团，虽是旧式武装组织，必须使中农贫农参加其中夺取其武器，以为农民武装组织的基础。至于武装斗争的发展，在山西乡村中很少新式的武器，是靠夺取敌人的武装来强大农民武装力量，并要特别注重士兵工作，使这一工作与农民斗争相联系；（6）农民组织的形式，在山西仍然是发展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以中贫农作主要群众，在一部富农尚有革命作用参加斗争时要求加入农协不应拒绝他，但是在这些组织中，要巩固贫农的领导，党的组织特别要注意雇农和贫农中的。

关于士兵工作中央另有详细指示。

中　央

二月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汪铭。

〔2〕指蒋介石。

PDG

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

——农民运动的策略

（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

六次大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关系和数年来农民宝贵经验，指出农民运动的路线其主要精神是争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农村中反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为要使各级党部更加明了及活泼的运用起见，中央有以下的指示：

一、建立农村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对富农的策略

农民的阶级层次非常复杂，但是占广大数目的中农贫农完全是被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群众，所以毫无问题的是土地革命的拥护者。但中国现在的富农，因他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农村中阶级分化不同的关系，而发生对于土地革命的各种不同的态度，因此我们对于富农的策略不能是机械的联合，而是要看客观上富农表现的态度决定各种不同的策略。

中国富农：第一，在他的经济关系上很多兼有半地主的性质。一方面自己耕种，另一方面又有些少土地出租给佃农，或

者兼营高利贷，或屯买商业的事业。而有些富农也仅仅是剥削雇农，自己同样受地主阶级的压榨。第二，在他的社会关系上有些是乡村统治的权力者，有些是受地主豪绅的统治者，因此更受地主豪绅的压榨。第三，农村斗争尚在开始，阶级分化尚未显明的时候，富农常常可以参加革命，到了阶级斗争更加深入尤其到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时候，富农便要动摇反动起来。因此富农对革命的态度，有以下三种不同：第一同情革命，第二完全与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反革命，第三摇摆于革命反革命之间。所以我们的策略，要看当时富农的态度来决定。还同情革命的富农，必须吸引到反地主阶级的战线之内。已经反革命的，必须在反地主反军阀的斗争中同时反对富农。摇摆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那就不必故意加紧对他的斗争，而使之中立。但要特别注意同时准备反富农的斗争。第一，在目前就要开始建雇农工会，或者在农协中成立雇农部，以团结农村无产阶级的力量；第二，对于雇农贫农的斗争，党必须极力领导，不能因联合富农而有所犹疑；第三，在农民各种组织中，必须极力巩固贫农在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防止富农侵犯农协的领导；第四，在各种农村武装的组织中，必须尽量增加比较觉悟的贫农雇农的成分，尤其要防止富农夺取农村武装的力量。所以一方面要吸引富农到革命战线之内来，同时又要与富农积极的斗争，表面上是矛盾的，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富农既受军阀豪绅地主的压迫，如果我们能极力扩大反地主豪绅军阀的影响，富农——至少一部分的富农是可以参加战线的。但是富农参加了战线之后，必极力企图夺取这一斗争完全在他的利益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同时又要领导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巩固贫农在这一战线中的领导，防止富农的反动，使这一反地主豪绅军阀的斗争彻底完成。这就是目前对付富农的主要的策略路

线。以后各地必须找出当地实际的情况，加以切实的讨论，而极正确的运用这一策略。

二、土地斗争的主要方式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是批评平产主义的幻想而不是反对分配土地

在过去没收一切土地的教训中，我们得到以下的经验：(1) 没收一切的土地客观上是实行土地的国有，在目前的革命阶段——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农运的策略是建立农民反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而没收一切的土地是触犯一切富农甚至中农和少块土地的贫农，使农村阶级战线凌乱，削弱了土地斗争的力量；(2) 模糊了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意识，以为土地革命的对象不但是反对独占土地的地主阶级还要反对他自己，因此怀疑到这一革命是共产党独创的革命，是共产党要这样干的，甚至怀疑到这一斗争是共产党与地主阶级的斗争!!

六次大会告诉我们，要改变这个口号而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是再正确没有了!

过去“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当然要走上平均一切土地的结果，同时现在中国很多的地方都是贫农占主要的群众，因此平分土地成为很普遍的要求，并且“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产主义幻想，在农民中也有极深的影响。以为如果土地平均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其实在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推翻，社会主义经济未有建设以前，是绝对没有经济平等的可能。只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才有这种幻想，基督教社会者才有公耕公食的新村运动的幻想。在过去我们同志的确不自觉的犯了这些幻

想，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极力加以批评，以说服群众的精神去改正群众的观念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多数贫农起来要求分配土地，这一个要求的口号是含有肃清封建残余摇动私有制度的好处，的确是革命的口号，那么我们还是要赞助农民实现这一口号，不过同时应纠正群众的观念。

三、对农民的组织问题

农民根本是要求组织喜欢组织的群众。有的说农民要求斗争、要求暴动而不要求组织，这完全是错误的观察。农村中原始的组织和农民自动的小组织不知几千百种，这是因为农村的破产和各种矛盾反映到农民的意识上，而感觉有组织的需要。过去我们在命令主义和委派制度的工作方法之下，根本使农民把农民协会看成不是自己的东西，在组织的观点上、训练的方法上都非常机械，使农民不能感觉到兴趣，在每次斗争当中不是抬出国民党（国共合作时期），便抬出共产党或抬出某一个人的“万有神力”，不能成形农民的组织力量，亦使农民不生兴趣的原因，所以几十万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倘遇着一个较为害利的白色恐怖，则立即瓦解下去。自从国民党屠杀工农以后，农民组织在客观上的确有点困难，但是不应因为困难而忽视了农民的组织。不过不必很机械的硬要用农协会的名义，如果农民群众对农协有信仰的地方当然可以用，假如农民对农协已经没有信仰，或者白色恐怖不能拿出农协名义来，那么无论用什么名义都可以，只要真能使农民团聚起来。

对于农民的各种原始的组织，只要他是有群众的，不是完全反革命性的（如红枪会、大刀会、神兵、联庄会……等），我们都应参加进去宣传土地政纲，吸引一般贫农中农到党的影

响之下，渐次削弱豪绅富农的影响，而夺取这些组织的领导权，使这些组织渐次变成革命的组织。

*　　　*　　　*

对农民运动的策略非常复杂，中央预备以几次通告来说明各方面的策略，因为如果在一次通告中说明，太复杂了，同志们一定难于了解。所以本通告只说明以上几个问题，其余的待下次通告再加说明。

中　央

一九二九，二，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

——关于闽西斗争问题

（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

福建省委：

中央前次听了海萍[1]同志关于闽西斗争的报告后，即当面指出闽西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先恢复党和群众的组织工作。固然在斗争刚失败后，这种工作是很艰苦的，但并不是绝对不能做，并且我们的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还很好，只要我们注意秘密工作，行动小心些，当不至于站不住的。可是在斗争失败后，同志中不免有些以为没有办法因而消极甚至逃走，我们当给他们指出只有从艰苦的工作中去恢复党与群众的组织，才有出路。不过同时须注意到我们不是不要斗争、单和平的发展组织，而应时刻注意发动群众的日常细小斗争，以提高群众的斗争的情绪。假如群众有斗争的要求与决心，我们的党应当负起领导的责任以取得群众，扩大党的影响。

闽西斗争到现在是失败了，但这个斗争进展到土地革命的阶段，经五六个月的英勇斗争，党的影响很大，实是一个伟大的斗争。我们从这个斗争中当可得到不少的教训，作我们今后工作的借镜，省委当引起全省的同志热烈的讨论闽西斗争中所给我们的教训。

中央看了闽西斗争经过的总报告后，觉得这报告有四缺点：一是偏重于军事的记述（也许在斗争过程中有同样的偏向)。党的工作如何、作用如何，苏维埃的工作如何，群众的活动如何，群众与苏维埃的关系如何等等，很少述及。这会使同志看后，不知不觉中仅看到军事的力量，而不知道党的作用与群众的力量。二是在太平里斗争失败中，对于智识分子同志的批评语气不妥，而且过于笼统。不错，智识分子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较易动摇。但有些智识分子的确能很正确的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们在批评中不应当笼统的将一切责任归诸智识分子，而应详细的分析他们的社会关系，指出他们所以摇动的原因，以免同志看后发生反智识分子的倾向。三是在每一次斗争中不论是胜利是失败，我们都可得到不少的教训，这些教训是极其宝贵的，我们应该特别指出来。可是在这个报告中对于这一点只有轻描淡写没有明显的写出来。四是在报告中说及杀反动派时，字里行间无意中表露我们杀人太少以为憾事，这使人看了以为我们真的是专门杀人的。事实上我们杀的只是反动派。杀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为杀人而杀人。我们应该指出，我们是为巩固政权而杀反动派，是为保障革命的胜利而须彻底肃清反动派。

此次闽西的斗争客观上是一广大群众的斗争，因为土地革命是一般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的党领导他们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运用游击战术去推广斗争，是很正确的路线。这一斗争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客观上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全国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与闽西连近的广东之大埔、饶平斗争已经失败，不能给闽西以援助，尤其没有重大城市的革命势力之领导。在反动派方面，他们的统治还没有十分摇动，张贞、郭凤

鸣、陈国辉以至驻防大埔之第五军与当地的反动势力联合起来，一致向革命区域做武装的进攻与经济的封锁。阶级力量的对比，反动派已占着优势。主观上，在斗争中我们有不少的缺点缺陷，影响到斗争不能有更大范围的开展，也没有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这些缺陷主要的是：

第一，没有城市工作，是此次闽西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城市是政治经济中心，假如城市工人不起来取得城市的政权，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我们的力量在乡村不论如何大终难到长期的胜利。闽西过去对于城市工作没有充分注意，我们在城市的力量极其薄弱，斗争一起来，城市不但不起领导作用，甚至不能响应。我们打进永定县城而不能保障与进攻龙岩县城之失败，就是因为城内的工人贫民没有起来，以致农民陷于孤立的原故。

第二，在每次斗争中，红军成了斗争的主力，不是在群众起来之后。红军去参加这一斗争使之更容易扩大，可以号召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并使群众认识自己是斗争的主力，红军只是一部武装的声援，而不养成专门依赖红军的观念或者甚至以为斗争是共产党干起来的，假如失败了，群众会转过头来埋怨我们。我们往各乡村作游击，多是事前没有派人去作很广泛的宣传，使群众自己起来，而是专靠红军去发动，或者到中途，群众看见了，才一个个来参加，并不是我们有计划去号召他们来参加，使每个斗争都成为广大的群众的斗争。

第三，在斗争中发展和巩固党及群众的组织，是保障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但是这一工作在闽西斗争过程中，客观上几乎完全忽视了，在斗争中已有“共产军兴，共产党消”的现象，斗争一失败党的组织遂形坍台。群众的组织除了赤卫队

有广大的组织外，少年先锋队没有普遍的组织，尤其妇女、童子团的工作完全忽视。闽西的农妇是很可以参加斗争而且必要的，但我们没有去组织他们，引导他们参加各种工作。教育群众的工作，如开办平民学校、设立通俗演讲所等，一点都没有做。

第四，士兵倒戈是根本摇动军阀基础的主要力量之一。在军阀的队伍中，士兵生活痛苦，待遇恶劣，他们与工农一样的需要革命。所以在工农斗争的高潮中，只要我们稍为注意士兵运动，很易使士兵群众倒戈，跑到工农方面来。此次在闽西斗争中，这一工作没有切实去进行，所以对于士兵极少影响。固然郭凤鸣、陈国辉他们的士兵，多是他们的同乡同族，或是同是当过土匪，有这样的宗法与历史的关系，然终不能蒙蔽阶级意识的。假如我们工作做得好，能够引起他们有阶级的觉悟，总有多少会受我们的影响投到革命方面来。对土匪民团的工作也同样的不切实去进行，不用种种的方式去宣传他们，使他们觉悟过来，帮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

第五，群众政权的组织与党的组织没有分开清楚，会使群众对于苏维埃的认识不正确，要以苏维埃是共产党的，不是群众自己的。

第六，此外还有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就是没收小商人财产问题。这种平分财产的做法是农民意识的表现。尤其要想没收小商人的货物来分给群众，减少经济的恐慌，是恰得其反。我们要想减少经济恐慌，更应不阻迫小商人，使他设法运输货物进来。我们在闽西感着经济恐慌，一方面固然受了反动派的封锁，另一方面就是对小商人策略错误之所致。

这些都是极宝贵的教训，省委应通告全体同志讨论这些教

训，而得到深切的了解和认识。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即王海萍。

PDG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

——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

（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

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

自六次大会新中央回国工作半年来，几次派人通信给你们，始终未能得你们回信，真不胜焦念。只是赣西特委在前两月曾来一信说你们给中央来了一个报告为他们遗失了，而中央给你们信托他们转的也同遭遗失，其原因恐系同志窃去向敌人告密，现正在严查中。但即此已是妨害了你们工作，帮助了敌人进攻的布置。

敌人这次进攻计划第一步似已失败。你们的主力现已退出井冈，依报载，似经过大庾往南雄，拟与胡凤璋部会合不遂而又转往三南[1]的。你们的别支似经过扬眉寺往信丰以牵制赣州王均部队的。报载，你们将经寻乌往闽粤边境。我们根据湘赣边境土地革命的深入、武装群众多湘赣农民尤多湖南农民以及前年南昌暴动的经验与海陆丰苏维埃的失败，判断你们未必即取入闽粤边境的计划。不过另一方面，根据敌人军事的布置，你们由大庾经汝城开往湘东的不易，以及闽南农民斗争最近的发展与闽粤边境的较为空虚，亦曾预料你们或有不得不走闽粤边境的一着。现时情况虽未大明，但你们的主力确已离井冈至赣南。中央对于你们的指示在原则上仍与先前的指示无大变

更，现在再将各项问题的要点重复指示如下：

目前的国际情形，依国际大会的分析，世界革命已走入第三期。世界资本主义因生产量的恢复与发展又发生了新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又需要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市场；生产的合理化在资本主义世界更增加了工人失业减资加时的痛苦，各国工人运动更加左倾；各帝国主义一致地向苏联进攻，更证明苏联政权的巩固与增加帝国主义的恐慌；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印度罢工的高涨与中国群众斗争的复兴。在这一期的国际任务是：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反对瓜分中国，保护中国革命。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已日益加剧，英美的冲突成为未来世界大战的中心。英在欧洲便联法以制美，在亚便联日以制美。日美冲突仍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中心问题。自济南惨案直至目前新关税协定的实施，美日的冲突更加明显。美帝国主义显然是以其财政资本企图垄断中国。中国资产阶级与蒋系军阀已显然依赖美国金元，以达其发达资本主义压服革命的企图。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是日有发展，现在南京政府正在极力进行各项借款与聘请美国顾问的卖国工作。相反的方面，便是英日两帝国主义仍极力进行其瓜分割据的企图，扶助桂奉两派军阀霸占西南、东北以及长江上游，以延长中国的封建势力。自然英日中间亦有很多矛盾，尤其是过去一年间长江流域的商业竞争显然是英日在争霸，故武汉、广州、南洋的排日多少带有当年省港罢工的回报意义。中国统治阶级中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根本不能调和。只是资产阶级目前尚需要一个虚伪的和平与形式的统一，以求得帝国主义的赞助，好恢复交通，相当的减轻租税，企图商业振兴、运输便利。买办地主阶级的武力现在虽不甘于受资产阶级的进攻，但目前也尚不利于直接

开火，故编遣会议仍然在相互的让步中成就了暂时妥协、虚伪和平的相持局面。在这一相持中，当然各自还时刻不忘准备更大的冲突。所以两派战争的直接开火终于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各派小军阀虽还各有其地方性愈易爆发其军阀混战，但混战结果也终于不可避免地要联结到两大系军阀的对峙局面之下。

统治阶级在目前稳定的可能有多大？中央的分析认为，武断地说统治阶级绝对没有稳定可能也非事实。但依照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根本的矛盾得不到地主减租和帝国主义更多的让步，各帝国主义在华彼此间的矛盾冲突完全殖民地化了中国的困难，军阀制度的存在，工农斗争的不断兴起，均是证明资产阶级稳定的可能限度极小。稳定的可能小，便是崩溃的前途多。故军阀战争也如世界大战一样成为中国革命群众的反对的主要对象。

但军阀战争——两个统治阶级的冲突虽终不可避免，然目前仍是相持局面，对革命仍是一致的压迫。且他们因为各自加增其战斗力起见，都在争夺群众做他们政争的工具。自然资产阶级的争取群众是要以改良主义的口号欺骗，封建阶级则根本在屠杀群众不要群众，但目前在策略上则因受资产阶级争取群众策略和群众斗争发展的影响，亦利用改良口号来欺骗群众收买群众领袖以为己用，或是组织劳资或佃主合组的工农会以便御用。因此，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复起，但困于我们领导力量的薄弱和工人组织力斗争力还未健全以及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以致工人斗争很难造成广大的革命发展。农民斗争在南方则因城市工作未能建立和发展得不到城市领导，致许多苏维埃区域都相继失败。现时的斗争虽还在继续着，仍总是起伏无定。北方农民运动多还停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乡村阶级分化亦

极不明显，反军阀捐税的运动多为新豪绅（中小地主与富农的化身）所领导所出卖，以换得乡村村长的地位，以延缓农民反地主的斗争。兵士的阶级觉悟在南方虽渐发展但在北方则甚落后，且其对土地革命的认识还未深切，故全中国的军队、民团仍然为军阀豪绅用以屠杀工农的工具。城市的贫民虽因苛税杂捐的繁重、生活的痛苦、教育的破产，对现政府渐致不满，但对国民党仍未能完全打破幻想，对我们亦还多未能为政治上的了解、政纲的接受，甚至还认我们为杀人放火的匪党。

党的方面，自广州暴动后城市支部更加走到削弱的地步。到现在除掉上海、香港还有支部的组织，其他重要城市产业支部的组织，有的仅具形式，有的连形式都不存在。乡村中党的组织在南方虽甚发展，但多半是群众的组织，且常随着农村暴动胜败而起落，有时一县可发展到数千数万党员，有时一个也不有。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既如是削弱，而干部分子又因两年来白色恐怖的摧残损失极巨，故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经六次大会正确路线的指导终还未健全起来。加以革命失败的反映，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落，一般干部分子的观念更易消极、悲观、动摇、错误，以致党到现在还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的先锋队。所以就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的前途，他对革命的危机一个也不能解决，而工农斗争仍继续存在的形势看来，中国革命的高潮仍是必不可免的要到来。只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发展，故革命的主观力量反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时因主观力弱，任凭客观的形势如何有利，反会延缓或阻碍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目前的革命性质仍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中。革命

的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与彻底地消灭封建阶级，革命的动力却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士及城市的贫民，所以革命的目的必然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在领导，资产阶级早已背叛革命，而革命的任务必然要走到打倒帝国主义，加以世界革命的发展与苏联的存在，故中国革命又必然地要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

六次大会指示的争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在目前更证明是极正确的需要。我们党若不能团结广大的工农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群众于党的周围，任凭客观的政治环境于我们如何有利，工农的斗争如何发展，甚至农村苏维埃区域还能继续建立，红军的组织如你们所领导的队伍在其他区域又能存在，但仍然不能促进这一革命潮流的高涨。因为目前的形势很显明：无产阶级若不在我们党的指导之下领导革命的发展，则反帝运动——尤其是反日运动便如目前的复兴也会被资产阶级领导向着反革命方向走，工人斗争可以为改良主义的口号所欺骗，暴动的农民区域可以为敌人聚集的力量在城市斗争已经被压下去之后来图谋消灭（自然不能根本消灭）。这一困难的环境，需要我们党以无产阶级极大的耐苦的努力来战胜他。故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但这并不是说土地革命我们不求深入，农民自发的暴动我们不去领导，乡村的游击战争我们不去发动，农民的武装组织我们不去工作，而是说我们这些工作必须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相适应，必须与日常生活斗争和群众组织相联系。然后这些群众斗争的发展，才能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较平衡地前进，才能促进全国的革命高潮。

因此，你们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宜在这一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前面重新下一责任的估定。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央这一指示主要的条件是根据于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所以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不过这一政策的指示或者是未达到你们的组织，或者是未为你们所接受所采取，故这次战争中你们所取的战术仍然是集团的行动。自然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你们目前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战术。只是中央的意见仍以为，你们必须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决地执行有组织地分编计划。但你们切须弄明白，中央决不是要你们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回乡，而是要你们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自然这不是太死板的数目）。这些分编的部队必须互有联络互相策应，且须尽可能地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现在你们的部队不管是仍留在赣南的三南或又退入湘东，必须采取这一决定。不然，东窜西奔，这一武装力量将日益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隔离，而成为农民群众以外的一个武装力量。自然在革命高潮来到的时候，农民的武装能愈加积聚成为红军的组织，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看来是愈于革命有利的。但目前的问题中心并不在此，而是要计算这一武装力量如何能避免敌人的消灭。有时为作战起见，许多武装力量必须联结起来，但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

击。过去海陆丰、琼崖的红军成例，因为集中的缘故（自然海陆丰的红军有不得不集中的客观条件，如兵士多外籍人，但也不是绝对不可分编的），便易于为敌人击破甚至消灭了多部分。故湘赣边特委所领导的部队必须懂得这个教训，急速地在被敌人击败之后采取保持实力散在乡村中去的分编部队计划。假使你们退避的路线是往闽粤边境，则分编计划便须更从长计议。因为部队群众多为湘赣人，分散在闽粤乡村必极难深入，故一时的集中组织或还需要，但仍应尽可能地采取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的策略，切忌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的行径。闽南近半年来农民斗争颇发展，尤其是永定暴动在乡村中支持了六个月，现在虽失败了，但并未根本消灭。且斗争的发展极广，不只永定一处，许多县都有我们党的组织。如你们领导的部队果开往闽南，必须十分注意助长闽南农民斗争的发展和扩大。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至部队的分编与两同志脱离部队的办法另由中央军部拟具详细计划附去（此计划当然不能机械地执行，要很活的运用）。

湘赣边特委组织仍暂存在，其改组办法由你们自己决定。

中　央

二九，二，七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江西省龙南、定南和虔南（今全南）。

PDG

中央通告第二十九号

——关于党员军事化

（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

（一）军事化意义之重要与我们过去忽略之错误

1. 列宁说“一切真正民众革命的先决条件，乃是拆散并破坏‘现存的’国家机器”，又说“无产阶级革命，若不以‘暴力’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以新的机器替换旧的机器是不可能的”。从此我们可以明白暴力的使用，在被压迫阶级革命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推翻现存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唯一手段。

2.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列宁），这中间无论是夺取政权、占据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和在任凭一般有利的政治环境当中都需要军事性质的组织与工作来保障胜利，而且这种组织与工作之健全程度愈大，其得的效果亦愈大，否则适相反。列宁说“只有用力量才能解决历史问题，在现代的斗争中力量的组织，便是军事的组织”，就是明白的指出军事在革命作用中的意义。

3. 军事是一切科学的结晶。不但在斗争艺术上，要靠善于应用军事争得保障胜利的前途，即日常个别工作都需要充分的军事化，使能尽敏捷迅速有系统有次序之能事，免除一切颓

靡散漫忙乱纷杂的弱点。我们知道中国产业发达的迟缓致使革命民众还未能摆脱封建社会思想习惯的遗留，故一切柔弱散漫的特性都不免要反映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只有加紧军事化的口号，可以肃清这种民族弱点的反映，可以振起高度的革命精神，可以使日常工作日益条理化。

4. 在中国雇佣军队的条件下，一切革命群众都不易得到军事教育的机会，因此党员也必然反映大多数不懂军事的弱点。这种弱点自然要从军事工作的整个部分去补救，但最主要的还是以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做整个军事工作的核心。整个军事工作能否做得有力，完全要视党员军事化的程度以为断。因为没有健全的武装党员，就没有健全的武装群众。

5. 在过去党不能在政治上夺取军队，不能创设自己阶级的武装力量，不能以宣传和组织下层兵士群众和引导工农群众加入军队以改变军队的性质种种错误之下，自然会产生视军事工作为点缀之品物或与党一切工作不能联系成为单纯军事运动的错误。这完全是党员大部分不了解军事在革命意义上的作用所产下的结果。

6. 据广东暴动的经验，不但广大群众不会使用武器，就是多数党员也同样的不会使用武器。这样一来，自然党员不能够很好的指挥暴动的军事行动，不能利用暴动一切有利的条件战胜敌人，不能使暴动充分艺术化。

7. 更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种很流行的错误观念。第一是看政治与军事为两不相关联的东西，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书生空谈。这种观念的极端，甚至要把“理论”从实际中分割出来。第二是为了要避免军事投机的错误，就仿佛要绝口不谈军事，如果一涉及军事的分析或讨论，就犯了偏重军事的嫌疑，至于军事工作的推度更只有不谈了。这种观念只有在充分的党

员军事化口号下才能肃清。

（二）怎样军事化的具体方法

8. 目前本党的军事化首先要从头脑军事化做起。因为一切对军事的忽略与错误，都只有在武装头脑条件下才能谈得到武装身躯，进而武装群众，这是军事化的第二步。

9. 一切日常工作的方式都宜力求军事化。因为军事是科学的结晶，有系统有次序，敏捷迅速沉着精致，可以避免一切萎靡散漫不落实际的毛病。而党员身体的强健也须从军事化的实行中锻炼出来。

10. 利用一切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组织，如敌人的军队、军事学校、讲武堂、学兵团、教导团或社会一般的体育会、精武会、国术馆，以及民团、红枪会、大刀会等，按照各种情况分别派定同志参加。此外在各大城市中设法施行秘密训练，训练的方法，人数宜少，时期宜短，有时可以利用各种可以公开的方式来举行训练。

11. 关于军事训练，在团的工作要与党的工作并行。团除利用上述方法外，并宜利用童子军的组织进行军事训练，乡村中少年先锋队更是团在乡村中进行军事化的基础组织。

12. 在游击战区中党宜设立军事训练班，创造一些工农军事人才。在农村中亦宜设法设立秘密训练组织。设立方法以适合秘密条件为宜。并可按照各地情况，派人参加敌人武装队伍中，不但可以学习，并且可以相机做破坏夺取的工作。

13. 要由各地党部责令富有军事知识的同志经常负训练军事的责任。其训练的方式，分个别训练或集合训练，及举办军事训练班等形式。

14. 无论在城市和乡村，都宜利用军队驻地的部队中的同志从个别生活的接近中训练同志的军事常识，尤切记于军队驻入民房时，可使同志充分利用其机会学习使用武器。

15. 各地党部应与党夺取工农群众的中心工作同时，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日常的工作计划去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

中　央

一九二九，二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三十号

——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党的主要路线

(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

(一)

在二十五号通告中，中央已经指出，目前资产阶级不愿发动战争，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尚不能直接战争，因此编遣会议不一定爆发两系的根本战争而会延长两派相持的局面。从现在编遣会议的结果看来，这一分析是非常正确的。编遣会议是在相互让步之下求得暂时的妥协与虚伪的和平。总司令取消了，改成编遣会议办事处，集合全国的军事巨头，掌握全国的实际兵权，支配全国的财政预算，再把各集团军总司令变成了编遣区办事处，仍旧是一种分治合作的局面，对于军阀制度的割据更多加一层保障。所谓军政统一财政统一完全是纸上文章表面虚名。这些，便是编遣会议的结果。自然这一结果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要求——彻底的裁兵、和平与财政统一是不相符合的，但便是这种一时的表面统一与虚伪和平也还是资产阶级所极力企求的，因为这一时的表面统一与虚伪和平，在目前可以帮助各地的交通恢复、运输便利、捐税的相当减轻（五省裁厘改征特种消费税，每年减少收入一千一百九十万元），好走向市场复兴、工商业比较畅利的前途。所以资产阶级不惜

给以很多的让步（如承认军阀割据区域的地方军队和税收，在党务上对封建势力让步，撤换平津长沙三市委、河北省委以及拒绝汪精卫回国等），以求达到这个目的。在桂系既然因准备未足处于不能急战的地位，亦乐得借此缓冲时间，准备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来欺骗群众。因此，编遣会议只是相当的拖延了战争的爆发，但是并没有解决战争的根本危机。

（二）

战争的根本的危机是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的利益的根本矛盾。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主要在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缩小，因此当然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实行关税自主等（这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两个积极条件）。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于加紧对农民的剥削，买办阶级的利益在于帝国主义商业的发展，这两者中间是根本不能调协的。如果买办地主阶级保持政治上的优势，或者进一步占有全国的统治，那就是军阀的势力完全存在，这当然无法消弭战争无法求得稳定。所以中国反动统治如果是走向稳定，必然是资产阶级势力的发展巩固了他在反革命势力中的领导权，但这一前途是极少可能的。

（三）

资产阶级要求得他在政治上的稳定，当然先要求得他的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观察现在政治是否走向稳定的前途，必先观察现在经济状况如何。一九二八年民族资本的状况，的确比

较一九二七年是进步了些。微弱的如中国三大工业，纱业的确有相当的进步，面粉业在南方有相当的发展，在北方反陷于衰败，丝业较前更坏。但是我们一定要考查做成这一进步的条件是什么，才能观察他的发展的限度。去年产业比较进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的减少、交通的恢复（消极的条件）和反日运动抵制的结果（偶然的条件）。所以帮助这一进步的只是一些消极的条件和偶然的条件，而不是积极的条件。因此，我们只能说这是市场的恢复而不是市场的扩大，故这一进步的限度是极小的。现在关税表面上虽是相当的改善了，但一查七级等差税率的协定内容，便知纱布、面粉等征收得税率都是很低，仍然无法阻止外货的输入，且仍然妨碍中国轻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商品仍然很少战胜外货的可能（加以中国工业资本缺乏，机器陈旧的原因），所以这一积极的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善。如果资产阶级要得到更大的改良，便是英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极难容许的了（日本对中国的输出占全国输出总额百分之二十，而纱布对中国的输出又占对中国输出的总额百分之四十六）。至于第二种积极条件改善农民的生活（如二五减租等），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实现的可能，并且是中国地主阶级在客观上无法接受的（因为在中国大多数是中小地主，自己因种种原因已日渐破产，当然无法对农民让步）。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发展的限度是异常微小的，如果要求到进一步的发展，必然必不可避免的要和买办地主阶级发生激烈的斗争，同时要引起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的冲突。

（四）

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深切关系，已在历次的

通告中详细指出。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要统治中国，都必须勾结中国一派势力；中国任何一派势力要保持他的统治都必须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做奥援。就现在的形势，美国企图以财政资本来统治中国，因此可以与资产阶级派相勾结，英日尤其是日本主要在发展他的商品的侵掠，所以要勾结中国的买办地主阶级，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势力的发展，便会是美国势力在中国膨涨，这必然是英日尤其是日本所不能容许的。现在中国资产阶级仅要求极小限度的改善，美国的势力也仅是极小限度的发展，所以英日美帝国主义还保持一种“三角冲突”的局面。如果资产阶级再企图进一步的发展，那就不只是更厉害的触犯日本的利益，而且要触犯英国的利益，那就不只是日本所不能容许而且是英国所不能容许，将更要促成英日的联合共同对美；那就不仅是要爆发国内战争（当然国内战争还不定等到哪时才爆发，因为现在这种两派相持的局面，无论如何是不能长久的），而且要加紧世界大战的危机。所以就帝国主义的关系看来，中国资产阶级稳定的限度亦是极小可能的。

（五）

中国资产阶级自背叛革命、妥协买办地主阶级、投降帝国主义以来，他已不能再用革命的手段消灭军阀制度，反而因妥协封建势力的关系，必然要相当的维持军阀制度。就目前现状看，军阀制度之存在是显然的事实。编遣会议不但不能采取征兵制度，根本的消灭封建军阀（这自然需要先有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广大基础足以逐渐的容留大量的农村失业的劳动后备军），便连裁兵与统一也是纸上空谈，对军阀割据制度反加了一层保障。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发展的限度既是异常

微小，帝国主义完全殖民地化了中国，奴役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又因为各帝国主义相互的矛盾冲突阻碍着极难实现，因此资产阶级以和平发展的力量来削弱封建势力、改变军阀制度都是极少可能的。军阀制度既不能改变，则其存在一日，战争便必不可避免的要附属于两大统治阶级的矛盾和冲突上而加紧准备了。所以就军阀制度的存在看来，中国资产阶级稳定的限度更是极小可能的。

（六）

现在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受到资本的残酷进攻，地主阶级更厉害的压榨，以及军阀“加工制造出来”的灾荒和苛捐杂税的剥削等，都感到走投无路，而不得不起来反抗。固然，白色恐怖的恐慌还深印在群众的脑中，资产阶级的改良欺骗又引起了新的幻想。但是广大的群众仍然从新活跃起来，从上海邮务斗争以后，全国产业区域的上海、天津、北京、唐山、香港、武汉，甚至九江、青岛，各铁路和海员等，都发生了不断的斗争，虽然这还是很零碎的时起时伏的，但的确表现广大的工人群众在历次的失败后又开始恢复他自己的力量，站起来重新向敌人反攻了。特别是反帝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的发展，如最近汉口反日运动，这不只是国民党的利用，而是一种群众革命情绪的具体表现。就是乡村的农民群众，这几月来受了更厉害的白色恐怖摧残，仍然在不断的斗争，湘鄂赣粤还有一些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如果城市的工人斗争继长增高，必然要影响到农民重新广泛的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因为现在农民完全是因白色恐怖的镇压而恐惧，并没有得到一点生活的改善，极大部分地方的农民比以前更要加倍的痛苦了。所

以这一广大工农斗争的发展，更是打击资产阶级稳定更有力的铁锤。

（七）

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阶级矛盾既不能根本解决，且一时的让步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暂时妥协，实质上并无法得到根本调和，所以两阶级的冲突仍然在各种实际问题中时时酝酿。这正是一方面要从冲突中找暂时的妥协，一方面又从相持中准备更大的冲突。现在资产阶级极力想用改良主义欺骗的政策来夺取群众到他的影响之下，一方面可以使群众不致走向革命的道路，走向共产党的周围；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此来打击买办地主阶级，威吓帝国主义，取得更大的让步，以扩大自己发展和稳定的条件。最近资产阶级各派尤其是汪陈[1]派重行活跃起来，便是很明显的例证，并且的确在广大群众中都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因此买办地主阶级亦感受了莫大的威吓，也想用改良欺骗的方法来缓和群众的攻击，并且有时还利用工农和反帝运动来打击敌人（如在天津大英烟厂斗争和铁路工会中，甚至上海法界电车罢工中，都有西山会议派和资产阶级派争夺群众作政争工具的事实）。所以改良欺骗的影响成为目前群众斗争最严重的问题。当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宣传要比买办地主阶级改良欺骗更加危险。但我们要明白，不仅是买办地主阶级只能是空口的欺骗，就是资产阶级因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无法给与更大的让步，亦很少实行改良的可能。但是只是改良主义在根本上虽极少实施的可能，然而他在欺骗的宣传和组织的进攻上仍然为我们目前夺取广大群众最严重的敌人。

（八）

虽然工人群众在历次失败以后相当恢复了疲劳，各主要城市都有新的工人斗争活跃的现象，但的确还有不少的弱点。第一，对国民党的幻想不仅是没有减少而且有日渐发展之势，如上海、北方尤其是北京有极严重的合法运动的观念。第二，因受了白色恐怖而畏怯退缩不敢斗争的意识，仍是极普遍的存在。第三，不愿自动手的直接斗争，专等待外力的帮助，不要小斗争，等候大暴动的机会主义的残余，还有很深的影响。至于组织的薄弱更是极普遍的现象。所以客观上虽只有革命的一条出路，但这些主观上的弱点的确可以阻碍革命的发展，这是要我们极艰苦极耐心的工作，才能战胜这些弱点。

（九）

无产阶级党的组织更是非常弱小，在上海、香港虽然有相当的基础，但是团聚的群众仍然异常之少，同时群众中许多不正确的意识和偏见都反映到党里来了。过去顺直的问题，广东政治上的偏向，浙江问题……尤其是最近江苏问题，都充分表现了这些弱点，根本的原因都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的关系。这更需要全党同志极难苦耐心的工作，才能纠正过来。

（十）

就以上客观的分析，很明显的反动统治极少稳定的可能，

在目前仍然是两派相持准备更大的冲突的局面。虽然因编遣会议的结果，相当的延长了这一冲突在目前的爆发，但是军阀战争终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群众斗争已开始新的活跃，改良主义极少实施的可能，所以客观上仍然是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形势。目前党的总路线争取广大的群众以准备夺取政权的暴动，是毫无疑义的正确，但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策略要特别注意下列各点：第一，要特别注意树立中心区域——重要产业和重要城市中的工作。第二，要特别注意与改良主义争斗，打破群众的幻想。第三，必须耐心艰苦的深入群众中去树立党的基础，领导日常斗争，从不断的斗争中扩大群众的组织，特别注意打破群众的合法观念。第四，要极力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特别是注意利用公开宣传的机会，就是极小的机会都不要轻易放过。第五，反帝斗争是革命的主要任务，而且比较易于发动广大群众的工作，所以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必须特别注意这一工作，一切群众的自发的反帝斗争（不管谁在领导），都必参加进去扩大我们的影响来争取群众。第六，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必须继续的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扩大起来，尤其要注意发动他们的日常斗争，领导自发的暴动。和平发展的倾向在农村中是很普遍的观念，这是极妨害革命进展的错误偏向，必须特别纠正与防止。第七，要加紧注意强固党的组织，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特别是产业工人支部，对于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反映，要从工作中斗争中加以严厉的纠正与防止。第八，过去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是使党脱离群众的主要原因，必须在工作过程中渐次肃清，找出新的工作方法。以上各项是党目前执行总的路线的主要策略。

（十一）

在编遣会议以前，党内可以发生一种不正确的估量，以为“军阀战争马上就要爆发”，更有以为战争爆发便是暴动时期而发生盲动的倾向。就现在的形势，党内又可以发生一极端相反的不正确的估量，以为“战争的危机已经解决了，反动统治已渐次稳定起来”，而使策略走上“和平发展”和“合法运动”的偏向。这两种偏向是同一来源，就是对于政治形势的非阶级的分析。只看见表面军阀个人的地盘利害的冲突，而没有认识阶级的根本的矛盾。这种非阶级的政治分析，是极有害于党的正确的策略路线的。各级党部必须加以特别的注意和纠正，然后才能依据正确的路线，执行一切工作，渐次发动并领导群众的斗争来推进革命的高潮。

（注意）本通告的详细解释，“布报”第四期、第五期《目前政治的分析与我们主要的任务》及《中国到哪里去》两篇，各级党部讨论本通告时可以参阅这两篇文章。

中　央

二月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陈公博。

对于农民问题的意见*

（一九二九年）

瞿　秋　白

关于重新审查中国共产党六次大会农民问题决议的问题（即重新审查“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这个定义），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许多文件上发现了“联合富农”的口号，所以引起来的。中国政治情形与经济状况的争论（中国的“稳定”或“复兴时期”问题），就已经连带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当时大家都已经说“联合富农”的口号是不对的。在讨论国际致中共中央政治问题的信的时候，决定这个问题（农民问题）要“另外写一封信”，在那封信里只说过这句话。米夫同志曾经与我谈过，在农民问题的信里，或者直接指出大会的定义是不对的；或者指出中央对于大会的定义，解释得不对。他并且说“最好是不损害大会的威信”。因此，我也就照着这个意思写的这篇文章。

昨日中国问题委员会上的争论，表示需要详细研究农民问题。至于要不要直接指出大会定义的不正确，不过是形式上的问题。

这个形式上的问题，使我在这篇文章的原稿里，只限于

---

* 这是瞿秋白的一篇手稿，写作时间应在一九二九年二月至六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关于政治问题和关于农民问题的两封来信之间。

对于大会决议的解释。倘若我们决定要“直接指出”是大会的错误，那么我的文章就要有下面的补充（接在第九节后面）：

虽然中国共产党六次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有一般的正确的思想，但是因为“不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的定义已经引起对于列宁的“同着全体农民”的口号的误解（在许多中共中央和地方组织的文件和材料里有“联合富农”的口号），所以为着纠正第六次大会的农民问题决议，使它更正确起见，必须把“不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的定义取消，而政治决议案中关于农民运动战术的路线的一条改成下面的说法：

在农民运动中党的基本的战术的路线，同着全体农民实行反对一切地主、军阀及帝国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础是乡村工人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同时，必需努力于乡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必需赞助并且领导他们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反对地主军阀，并且是反对乡村资产阶级的富农。乡村工人对于乡村资产阶级和中农、雇主的斗争，比起反对地主、军阀的斗争来，虽然并不是主要的斗争，可是在现时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上，已经是有了的事实。领导这个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总的斗争里，在同着全体农民反对国民党政权（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斗争里，必需要保证自己的领导权，这是没有农村工人和贫农的基础就做不到的。

与富农争农民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是特别的一种责任，是很重要的责任，不仅因为别的原因，并且是因为在中国的实际上，往往有同一个富农，在同一时候，对于贫农用封建的剥削，对于雇农用资本主义的剥削；所以他在乡村中不仅是剥削者的分子，并且是极其浮动的分子，他在反军阀和地主的一般

民权斗争中是靠不住的分子，土地革命加深的时候，尤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时候，他不可避免的跑入反革命的营垒里去的。

一

一、中国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分割成为许多势力范围，一般说来，是帝国主义列强竞争的目标，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各自都占领中国的某一区域——中国的各区域，有着半独立地方市场、地方性的商业资本、财政机关和武装势力，帝国主义就使这些区域的经济中心归入自己的经济机体里去——这就造成“军阀制度”和“军阀割据”的很好的基础。同时每一帝国主义的强国都在争取对于形式上的中央政府（南京）的影响，——这种中央政府的存在，是替帝国主义在“法律上”确定他所取得的在华势力的机关。这种情形之下，封建余孽和落后的土地关系完全的保存着，而且是中国军阀制度的根底。

“中国乡村之中最初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和封建的统治、地主的统治混合起来，而且商业资本传授地主方面对于农民的中世纪式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史太林）这个商业资本就是积累起来，主要的也并不在工业里找着自己的出路，或者在多少有些意义的农业之“资本主义化”里找着出路，却是一方面投资到半封建的土地私产里去，别方面投资到外国企业里去——这些外国企业（洋商企业）给的利息常常比较得多，并且能够给更大的政治上的保护。

二、所有这些情形就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继续存在，而且更加加深，一般的说来，也是使延绵的军阀混战继续，因

此，而有种种的结果：农民的贫穷化，城市贫民的生活恶化，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增长等等。最近美国极力的钻进中国经济财政的空隙——英日帝国主义所留下来的空隙，这还并没有改变中国主要的情形，却只是更加加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最初一期，特别加紧中国反动营垒之间的矛盾——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各派之间的矛盾。而中国主要的矛盾：工农和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就更增加起来。

二

三、这种总的状况之下，再加上延长的严重的农业危机，更是只使农民的主要群众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中国的反动派没有力量阻止这种过程，没有力量削弱农业的危机。中国豪绅地主的封建力量仍旧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决不会牺牲自己的特权和势力。中国的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和封建式的土地私有制联结着，和整个的封建式的剥削系统联结着，他在土地问题上和封建地主没有多大的分别。南京政府的豪绅资产阶级联盟，已经证明他不能够并且也不愿意解决土地问题，就是极妥协的小部分的解决，也不愿意。

四、固然，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企图实行所谓“土地改良”，装腔做势的起草新土地税法（胡汉民的地税委员会），说二五减租等等。但是，一则土地税法草案，只是表面上说国家按照所估地价收买土地，表面上说是为着“平均地权”，实质上呢，草案的目的不过是整理地税，增加些税源罢了。没有真正的中央政权，连这种整理地税的办法，也是不可能的。第二，二五减租现在对于国民党完全是欺骗民众的宣传。两湖、广东已经

屡次用正式法令取消二五减租。就是浙东几县所实行的二五减租，现在也已经省政府公令取消了（四月二十二日《新闻报》）。

现在中国的政权和北京政府时代的政权不同，但是这种不同，不但在于国民党的政权已经不是纯粹官僚买办的政权，而主要的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这种不同并且还在于国民党的政权是经过群众土地革命的袭击而勉强保持着的政权。所以这种政权的所谓“土地改良”的宣传，并不足以证明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真正愿意，或者能够，实行什么改良，去造成“整个的一个富农的阶层，使他们做国民党政权在乡村之中的基础。”事实上，国民党在各省尽在增加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加重盐税等等，实行事实上的军事封建式的徭役（拉夫、拉车）。就是北方各省，国民党设立村庄制度，恢复保甲，去掉旧时把持地方的豪绅而改用所谓“新的豪绅”——这也决不是什么依据富农的政策，而是用新的方法新的“姿势”继续旧的剥削。如果这些可以称为“土地改良”，那么，这种“改良”只是更加加重一般农民群众的束缚、死亡、饥饿——加重农业的危机。中国的反动派——豪绅资产阶级的联盟，只有最□□□的所谓改良主义的应付手段，却想用铁血，用战争，经过饥荒，百万人民的死亡、破产，来解决这个矛盾——土地问题。

五、所有这些情形，都有下列的事实证明：农民的游击斗争，陆续的仍在发生，最近蒋[1]桂战争时候朱毛[2]的农民部队发展到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的各区域去，许多原始的农民组织（大刀、小刀、红枪会等）骚动的普遍，其中的指导往往是富农，甚至于是小的豪绅。再则，因为饥荒特别重大的原故，甘肃回民在一年之中有两次巨大的暴动，其中有许多回族

的农民参加。回民暴动的指导显然还在所谓“回绅”的手里。

三

六、军阀制度和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占着统治的地位；资产阶级，甚至于极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能力；“封建豪绅的统治和商业资本混合起来，仍旧保存着封建式的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陆续不断的军阀混战，重复产生那种封建关系，并且加深农业危机；帝国主义方面一般的是维持并且巩固这种封建式的军阀统治——所有这些都规定了统治着中国乡村的现存“秩序”。这种秩序便是：农民的绝对没有的政治权利，苛刻的租田制度，任意的极其繁重的苛捐杂税（按亩加捐，田赋的正项，附加银贴等许多名目），高利贷的盘剥非常利害，农产原料的市场被“地主绅商”独占着，军事式的徭役。

七、“这种‘秩序’还统治着的那种场合和关系之中，这种秩序既然是统治着——那么，农民的全体都是这种‘秩序’的仇敌。对于农奴制度，对于农奴主和地主，对于为地主等服务的国家，——农民仍旧继续着是一个阶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而是农奴制度社会的阶级，就是‘等级性质’的阶级。”“我们乡村之中农奴制度的社会，受‘现代式的’（资产阶级式的）社会的排挤有多少，农民亦就有多少不成其为一个阶级，而分裂成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大的，中等的，小的，最小的）。农奴制度的关系还有多少保存着，‘农民’也就还有多少是一个阶级……”（《列宁文集》第2版第5卷第92、93页）。

中国亦是这样。既然有军阀统治和豪绅地主的统治存在，那么，全体的农民都是这种统治的仇敌。同时，中国资本主义

关系有多少发展，农民也就有多少分化成为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提出自己的土地革命的政纲，目的是在于推翻军阀制度和豪绅地主统治的半封建式的秩序，以便利于乡村中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因为现在的革命阶段上，中国极复杂的土地关系自然是把那一般的民权主义任务提到第一等的地位。而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领导那必然要到来的“总的民权主义反帝国主义的袭击”——我们是不能抛弃这种领导的责任的。

八、在中国的土地关系以及一般的政治经济条件之下，真正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不能得到多大发展的可能。即使农民之中有极少数的分子能够积累资本起来，他自己也就大半转移这种资本到高利贷的盘剥和出租田地的剥削方面，而极少用来扩大自己的经济，使他成为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因此，这种成分，显然已经是小地主的性质，已经是站在农民之外的分子。这种分子并不能称为富农，而是豪绅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

至于极大多数的自耕农——中农、贫农以及佃农，却是受着极严重极苛刻的剥削和压迫，是大规模的游民化的材料；固然一般农民之中有比较富裕的分子，利用雇佣劳动而勉强在维持一家生活之外有些余剩的，可是这些分子和一般农民群众都在军阀豪绅地主的压榨之下，其中极大多数是在破产的过程之中。中农、贫农的群众——在饥荒战祸的现象之下，尤其是处于日益穷困的地位。佃农之中的情形同样有中农、贫农及极小部分富足些的佃农等的分别。这些佃农除去军阀、商业资本高利贷的剥削，还加上地主的直接的剥削。

可是，就在这样贫穷破产状态之下的一般农民之中，因市场和货币关系的发展，始终是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分化的现

象——即使这种分化还是很模糊的。富裕的农民固然已经利用雇佣劳动，就是中农也常常有雇佣少数雇农的，尤其是短工。中国乡村之中有极多的半无产阶级式的雇工——自己耕田的经济不能维持生活，而必须兼做雇工的。除农场工作之外，还有一般搬运等类的苦力工作。雇工的劳动条件是恶劣到万分，工资是极低的。南方各省这种苦力雇工之中有很多的农妇和儿童，他们往往跟着父亲和丈夫去做工，并不能特别领取工资——简直是封建式的徭役一样，事实上是豪绅地主或官厅的农奴。最近饥荒之中，更有以工代赈的名目，驱使饥民做工，而不付工资，只发极少的米粮（陕西：一月发三合米）。长工的劳动条件比较的固定些，每年有一定工资，可是也是很少的。

九、中国乡村之中，一方面主要的矛盾是农民与地主豪绅的对抗，别方面“农民”自身之中的阶级分化比较薄弱，——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的现在阶段之上的第一等任务是：同着全体农民反对帝国主义所赞助的豪绅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政权——在乡村之中就是直接反对豪绅地主军阀的剥削和统治——同着全体农民实行这种斗争，以达到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目的。这种斗争一定是**反对一切地主豪绅**，没有任何的例外，就是反对一切出租田地或者用高利贷包税、包捐及垄断农产品等方法剥削农民的人。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说：“战术的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抛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这很明显的：（一）同着全体农民斗争的口号里，包含反对“富农半地主”的口号。（二）反对“纯

粹富农”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一般资产阶级（以至于乡村资产阶级）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反对所谓“富农半地主”的斗争是无论如何不应当削弱的，自然更不应当抛弃——尤其是在农民暴动胜利之后，分配土地的问题里不能因为这些所谓“富农半地主”是“很小的地主”而动摇对于贫农分地的赞助。至于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这种斗争客观上没有加紧的必要和事实，尤其是对于中农，因为雇农苦力的主要雇主不是富农和中农，而是地主绅商及军阀制度之下的官厅。如果认为这种斗争（反对富农中农雇主）是现在的中心口号，那就的确是要混乱农民和地主的主要矛盾，也就等于否认中国的封建余孽有统治地位。然而把“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的规定，解释成为“联合富农”，因而发生“阶级合作”和“阶级调和”的观念，那就是极错误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在一切场合一切环境之中都不动摇的努力去独立的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并且对他们解释：他们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互相对立着的。

四

十、现在中国继续发展着的农民运动，大半还是自发的政治上不自觉的运动，可是必然是反对现在秩序的，也是反对一般封建余孽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之一，是要赞助一切革命的反对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群众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竭力去赞助一般农民自发的斗争，并且肃清这种农民运动里的反动性质的混合物，而显明他的革命的民权主义的内容，从富农甚至于小豪绅手里，争取这种运动的领导权，发展农民的革

命觉悟，而引导他们的民权要求到底。

十一、根据农民问题里策略上的总路线和上述这些原则，我党在农民运动里的具体任务应当是：

（一）在广泛的工农民众之中宣传：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最努力的来赞助农民的一切革命运动，赞助农民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一切行动，直到农民苏维埃的创立和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官有的寺院的等等土地。

（二）揭破国民党及各派军阀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实行极广大的有系统的宣传，反对军阀的混战；提出宣传的口号：“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阶级战争，工农兵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战争”，反对第三党及左派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式的和平主义的幻想。农民之中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要扩大并且有系统的进行，要使他和土地革命的问题联结起来。赞助农民运动的一切部分要求，如反对苛捐杂税，要求减税、减租，取消高利债务，要求发给饥民米粮，要求增加这种米粮，要求发给衣服等等等等。组织各种各式的农民团体如俱乐部，体育性质、文化性质的集会或团体，来做我们农民工作的公开的掩护工具——只要这种可能有多少，就得做多少，并且使他们成为农民委员会的小组。

（三）对于农民提出组织农民委员会的必要，或者改组国民党官办的农民协会为农民自己的农民委员会的必要（只要真正有这种国民党的农民协会，多少有些群众的）。农民委员会应当是下层群众斗争的直接机关，执行反对国民党政客军阀和地主的斗争，而成为集中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真正群众的游击战争胜利的时候，农民委员会要变成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

（四）特别注意农民秘密结社之中的工作（大刀、小刀、

红枪等)，在这种武装农民之中发展党的影响，争取他们的群众和他们的反动思想实行斗争，和他们这种组织里的富农豪绅的领袖斗争，而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五）真正开始群众发动的地方，为着动摇豪绅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军阀政权起见，号召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起来实行各种政治示威，同盟抗税抗租，反对拉夫拉车，反抗政府官厅的命令，一直到组织游击战争；但是没有群众直接的革命斗争的时候，或者显然不利的环境，就不可以组织游击战争。

（六）在军阀混战的场合里，要发展苏维埃区域，特别加紧兵士运动，使他和一般农民运动联系起来。组织并尽可能扩大农军（小的工农革命红军），运用游击的战术，避开过于大的敌军而袭击小的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

（七）力求独立的组织农村无产阶级（雇农工会），吸引雇佣的农妇儿童加入，力求这种工会组织与城市无产阶级结合起来；要使雇农工会的代表参加到农民委员会里去，保证农民委员会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领导农村工人及乡村手工工人的斗争，要求改良劳动条件，增加工资等等。

（八）开始在内蒙古的农民牧民中，尤其是回族的农民之中工作；除出适合于蒙回各区特殊情形的土地要求之外，特别注意我党民族问题政纲的广大宣传。

（九）实行这些任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这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里，应当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争得无产阶级对于农民主要群众的领导权。为着亲密的使农民运动和城市工人运动联结起见，某一城市工人组织和某一农民组织发生固定的“兄弟团结”的关系（定期互派代表征集材料，报告工作，宣传等等）——这是一个可以运用的具体办法之一。农民之间工

作的主要方针是要农民运动的政治觉悟和有组织性尽可能的提高。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2〕 指朱德、毛泽东。

PDG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暴动失败后工作方法的指示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

1. 农村斗争或暴动失败后的工作比较难于着手，这是一个事实；但不是根本不能够做，而且这经过斗争或暴动失败后的区域倘工作能够重新做起来，是比未经失败的区域要好，这也是一个事实。不过有时地方党部以为失败后的区域重新进行工作的确比任何工作都困难因而无形放弃，或主观上虽然很注意但想不出办法去进行，而客观上也等于放弃，这是很不好的。

2. 失败区域的工作有以下的几个普遍的困难：

A. 农民群众情绪消沉，怕斗争，怕组织，或怕我们的同志去接近而连累了他。

B. 敌人的白色恐怖比较利害，敌人的侦探也多，甚至于敌人的组织异常严密，如保甲、村里制、民团等。

C. 群众的干部缺乏或逃走或被杀。

D. 群众带着很浓厚的依靠红军的观念，看不起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多多红军来甚么都不愿干，要干只有红军来暴动。”

E. 富农在白色恐怖之下首先退缩，或叛变而为敌人的奸细。

F. 党的组织溃散或完全消灭，党员受了群众意识的反映，亦表示消极及许多不正确的观念，不是军事投机或盲动主义便是取消主义与和平发展的不动主义。

G. 同志行动不自由，尤其是不能到城市去。

H. 同志多数离开组织个人行动，继续的烧杀绑票以维持个人生括，以致妨碍党的工作，甚至危及到中农小商民的生活。

I. 斗争时只注意于军事动作，忘记了吸收农村积极分子扩大党的组织，失败后党完全塌台。

J. 斗争时没有秘密建立党部，党员也完全公开了，以致不能立足。

3. 怎样打破以上许多困难，只有打破这些困难才能进行工作。

A. 群众的情绪消沉怕斗争

方法：利用公开的集会和组织。

（一）在白色恐怖之下，群众公开集会和组织都有可能，即如迎神、赛会、演戏、婚姻、丧事等等迷信的封建的集会，都可以利于我们的活动机会，半公开的或秘密的都可以一点一滴的扩大我们的政治宣传。

（二）进行小组织，如曲班、抚狮、拳术、防盗青苗会、做同年、结拜兄弟，只要是群众所愿意的可公开的……极灰色的组织，而渐次扩大我们的宣传，使其变为农会的组织。

（三）征取原有的原始组织，三合会、大刀会、白扇会等，逐渐的使其同化于我们，转变为秘密农会的组织。

（四）找出群众极迫切的痛苦，发动极小的斗争，取得极小的胜利，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前进。

只有这样才能够一点一滴的回复群众的情绪，提高他的斗

争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在白色恐怖底下、保甲制村里制底下，进行我们的工作。只要能够避免敌人的白色恐怖而能与群众接近的方法，都应尽量的讲求运用。

B. 怎样训练群众的干部

（一）失败后群众的干部虽然走散，但是在斗争的当时仍有许多积极分子未经党的注意者也当然是不少，党应当利用（A）项的方法在群众中调查考察这些分子，而且要特别注意这些分子而与之接近，吸收到一切的灰色团体中来，加紧的教育使其明了过去失败的原因及今后的党的政治主张，吸收到党内来，这当然不是一下儿可做到，是应该很耐苦下决心一点一滴的去干。

（二）从一切的灰色组织中、秘密农会中、小小的斗争中去训练干部下级干部的人才。

（三）调换干部分子从这一区域调到那一区域，那一区域又可调到这一区域，使其该地不能立足的分子变成灰色的分子。但是这些分子一定要与农村社会发生关系，而当雇农或小贩、小商人，或甚至当庙祝、乡村中的慈善者、小学教员、老学先生都可以，最好是能够发生亲戚的关系，如入赘等便可成为该区域之一固定之农民，这样就可以补充干部，恢复党的组织及新的发展。

C. 如何纠正群众的观念

这是完全靠我们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和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很通俗的使群众易于明了：

（一）宣传的内容须根据六次大会的精神，采取群众斗争的实际材料，使群众认识本身力量才是可靠的力量。

（二）在各种小斗争当中，绝对禁止英雄式的领导，甚至使群众以为我们党是群众以外的一个神秘的东西，使他们看不

见自己力量，天天幻想党去调动军队来替他暴动。

D. 对于富农的政策应根据六次大会的农运决议案及最近中央关于农运的通告第二十九号执行。

E. 秘密工作之重要

（一）同志在农村作用应找到农村的社会关系（职业化）才能够经常的活动，这是与秘密工作之一，但同志在乡村中因为不懂得秘密工作往往只有逃避工作甚至离开群众而入深山石洞，再则右带手枪左携电筒，一入乡村便把群众吓退，这是驱逐群众最好的办法。同志的生活——尤其是服装一定要适合于农村之环境，才不会使人注意。一点与群众日常生活不同的地方，便很容易给敌人发现和使群众讨厌。东江一位同志在乡村的厕所中以□纸揩屎（因为农民是以竹或草揩屎的），就被人发现，牺牲了性命，这是很好的教训。

（二）乡村的党部（县委当然要建立县城）应该在比较大的市场中或大的乡村中。过去同志每每以为圩市及大乡村多反动派而不敢深入，因而把下级党部建立在山乡小乡村，使党的周围失了广大的群众，让大乡村及圩市的广大群众给反动派倒来打击我们，这就因为没有讲求秘密工作而使党陷于逃避主义的倾向。凡过去不能立足的同志而在党部的负责者，应该尽量设法与别处调换，最好能调在城市不能站脚的工人同志到乡村去，使党的组织逐渐潜入重要的大乡村中。

（三）党的机关应该多设一二个，以便于敌人发觉作为候补接头处。交通处都可利用农民的家庭。交通员最好是以农村的妇女及青农为最合适，以免敌人的注意。

（四）同志在乡村做宣传工作，如贴标语只能在赤色的乡村张贴或党部的所在地，因而引起敌人的进攻，我们应该把宣传品秘密的普遍的发出，才使敌人无法查究。同志做口头宣传

的时候，说不上两句话便使人知道是 C. P.，或则简直而不敢说了，这是非常的错误。在失败后的乡村中，群众时常都有谈到 C. P. 如何好、如何不好，国民党如何坏的街议巷谈，我们为甚么不站在第三者的地位来说说共产党如何做呢？同志应该很活泼利用种种好的时机来说我们的话，尤其是在斗争中更给我们多说话的机会。

F. 绝对禁止同志盲目的烧杀行动

G. 注意青年、妇女运动

（一）在失败后的区域中，一般老大者常常马上就与敌人妥协或投降，他们的右倾思想很可以影响于一般青年和支配失败后的群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切实帮助 C. Y. 工作的发展，因为失败后的区域青年的情绪为最好，所以青年工作是恢复群众革命情绪的重要工作。

（二）白色恐怖的利害常常使最落后的乡村妇女起怨恨，乡村革命干部的活动常受妇女之阻碍，我们应注意妇女之工作。

（三）青年妇女的活动常为敌人所不注意。

上面指出的各种工作方法，各地应按照客观的实际的情形活泼的运用，各省委接到此通告，不应普遍的发而应只对曾经暴动失败后的农委作个别的指示。

中　央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

——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

一

（一）中央历次通告之总的政治路线。

关于全国的政治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中央在这近半年的时间中，已经发出了七个通告。在每次通告中，虽然各有其特殊的指明，但是总的政治与策略的路线，自六次大会以至于今，都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变更。中央历次的通告，都是一贯的政治路线，就是现在反动统治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买办地主资产阶级间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而发生着争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同时这种斗争反映着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相互的冲突，使着中国成一个酝酿军阀战争的局面。统治阶级一切的日常活动以及一切的事变，都是加紧准备战争的表现，虽然准备不充分的时候还不至于爆发，或爆发了而只限于某一地方，但是最后的破裂终不可免。这种局面使着统治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之改良主义的欺骗，在群众运动的发展中表现着十分危险，使我们争取群众的策略更正确的积极运用，以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克服改良主义的影响，促进不可避免的革命高潮。

（二）湖南事件所引起同志中间的怀疑。

中央直到现在，对于这一总的政治分析及所指出的中心任务，毫不怀疑的认为完全正确。编遣会议以后，中央认为统治阶级取得暂时妥协与虚伪的和平足以延长了战争的准备，而更加努力于加工制造，所以战争不一定马上爆发。

在三十号通告以后，发生了湖南逼走鲁涤平的事变以及其他关于军阀战争之更明显的准备。这些事在同志中间引起了不少的怀疑，以为中央三十号通告中的分析，到现在表现着与事实不相适合，因此便发生许多需要解答的问题。其实，现在全国的政治局势仍是一个准备战争制造战争的局面。湖南事变更证明了这种分析，更证明了战争之必不可免，证明了准备战争的局面将更加紧张，但这并不是说战争一定会马上爆发（关于这点后面还有解释）。并且，假使我们认清了现在的局势，认清现在的阶级关系及将来战争的性质与内容，则战争之比较迟早的爆发，对于我们总的政治分析与策略的路线，都不会有原则的变更。现在虽然也不是绝对没有马上爆发战争的可能，但是即有了这种爆发也并不能否认我们过去分析的正确，因此我们分析的中心，不在于战争爆发之时间的迟早，而在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统治阶级准备战争的策略，以决定我们无产阶级党的中心任务。

（三）现在所需要更详细解答的问题。

因此关于分析现在政治的几个原则上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具体的解答。只有全体同志明了了这些原则之后，然后才能明了现在以及最近将来所发生的事变。本来，在过去中央历次的通告中，对于这些问题都已经给了正确的回答，不过有许多地方仍然表示着不十分充分，不十分具体，因此我们认为有再加解释的必要。

我们可以将战争作为现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绕围着战争的性质、策略、前途等问题，可以说明一切中国的阶级关系，及各帝国主义在最近中国政治局势中将要表现的作用。

二

（四）现在所说的军阀战争与过去北洋军阀时代的战争不同。

首先应当认清的，就是现在所说的军阀战争与过去北洋军阀时代的军阀战争的确不同。在过去北洋军阀时代所发生的军阀战争，表示着中国封建势力内部的破裂。虽然这种战争已经反映着社会阶级的矛盾（相当接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的中小地主与封建贵族阶级的矛盾），而主要的则是军阀抢夺地盘和在各个帝国主义领导之下相互的战争。在这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并没有自己直接统治的地位。在现在的时候，封建势力在政治上虽然仍然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它已经不得不将一部分政权交给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了有力的地位，至少在最近的期间以内它成了现在一切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力之一，所以使现在战争的性质也与前不同。现在中国将要发生的战争，虽然同样表现着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发展的冲突，但是它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表现，已经不是单纯的旧时封建势力内部的斗争，单纯的军阀抢夺地盘的斗争，而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买办争取反革命领导的斗争。

（五）现在的战争与京津攻下以前的战争形式也有不同。

现在的军阀战争，不独与北洋军阀时代的战争不同，并且与京津攻下以前的国民党三次北伐时代的战争形式也有不同。

在国民党攻下京津以前，反革命的北伐军，虽然已经带着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地主买办的意义，但是当时国民党与奉系的军阀战争形式都与现在不同。当时奉系所代表的势力，是中国从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北方官僚贵族买办大地主，而且是东交民巷所承认的中央政府，当时所反对它的不只是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有隐身于假革命旗帜之下的南方地主买办，与它形成对立形式。只有在京津攻下以后，北方买办大地主的中央政府倒台，反革命的中心集合到南京的国民政府来，于是买办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个政权里边争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才逐渐的明显，所以攻下京津后，中国开始了一种新的军阀战争的形式。这种形式与以前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全国政权上已经不复存在封建阶级独霸的局面，已经排去了一部分买办大地主的力量，更加重了资产阶级争取自己前途的野心，也就使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争取反革命领导的斗争更直接，更尖锐。最近之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便是这种形式的继续发展。

（六）最近的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军阀争地盘的混战。

所以最近所说的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军阀争地盘的混战（虽然仍带有争地盘的成分，这一点以后再说），而有两个阶级相互斗争的意义。现在战争发生的原因，最主要的不是地盘问题，而是两阶级目前的根本矛盾和争取各自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地主阶级是要保持着封建的剥削关系（就是对农民的田租田赋苛捐杂税以及其他的强迫剥削），而资产阶级就是要相当的削弱封建剥削关系，减轻封建的束缚，以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扩大市场，改良工业发展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根本矛盾是土地问题。买办阶级的利益，是在保持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自己在中间的地位，从整个榨取的利润中得一部分的余润，而资产阶级则要求相当削弱帝国主义的侵掠，使

民族工业的市场扩大。所以买办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是市场问题。因此在一切政治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利益，两个阶级各有自己之全国性的政纲，并不是一个争地盘的混争。若将这种军阀战争看成简单的争地盘的混战，则便不能明了反动统治阶级中的根本矛盾，也不能明了统治阶级在战争中所必要采取的策略。

（七）但这并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战争。

但这并不是说，这个军阀战争将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战争。并不是说这个战争的两方面，一方面将是纯粹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另一方面将是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不是说一切地主买办阶级的力量，将要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战线上完全联合起来。因为最近中国的封建势力，已经走到崩溃的途中，绝对不能结成统一的联合战线。许多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在经济发展的推动前面，不能反抗这一社会的发展的动力，只有渐渐将自己蜕化为资产阶级，所以很容易受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并且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尤其在背叛革命以后也只有极力利用封建势力内部不统一，拉拢一部分摇动的封建势力，去反对另一部分的封建代表，绝对不能反对整个封建势力。所以某一个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可以成为资产阶级的一种附属力量，而表现出反对封建地主买办的作用，故阎锡山、朱培德、陈调元等等，虽是显明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当然带有一些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是它们政治的关系上可以不依附于代表封建地主的桂系，而可以依靠于代表资产阶级的蒋[1]系，这仍不妨碍它做封建势力的代表。因此在将来蒋桂战争爆发的时候，在民族资产阶级蒋系这一方面，一定要团结着不少的封建势力。这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去消灭封建势力，乃是民族资产阶级将要妥协一部分封建势力去进攻

另一部分封建势力。所以不但在历史的发展上，封建势力不能消灭资产阶级，并且即使资产阶级在这次战争中得着胜利，它也决不能消灭封建势力。就令桂系倒了，封建势力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可以找其他军阀做他们的工具，而新起与蒋系争斗的军阀，也还要拿封建势力做它的基础，因此反动政权中并不会根本消灭两阶级矛盾冲突的局面。

（八）现在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仍然是部分的建筑在军阀制度上。

不独地主买办阶级的力量是建筑在军阀制度上，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力量，仍然部分的建筑在军阀制度上。因此使着现在所准备的战争，依然带着军阀战争的性质。所以有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因为资产阶级时常需要勾结一部分的封建力量，作为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军阀的武装，并且资产阶级本身，并没有在经济上将自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阶级，而不得不利用军阀做它的统治的工具，用金钱收买的方法（自然也同时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使封建式的军阀制度同样适合于自己的需要。于是军阀制度不能根本消灭，也是使着战争不可避免的原素之一。

（九）战争发生之最主要的动力，仍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发展的矛盾。

豪绅地主买办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冲突，军阀制度的存在虽是中国军阀战争足以发生的基础，但这还不是现在中国发生军阀战争之最主要的动力，其最主要的动力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发展的矛盾。只有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所发生的相互矛盾，才能推动中国豪绅地主买办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冲突，才能利用军阀制度的存在而发动有利于自己的战争。美国想以其财政资本统治中国的企图，处处与英日帝国主义发生不可调和的

矛盾，更鼓舞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地主买办——英日帝国主义工具的勇气。各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充市场的企图，一方面发生与中国资产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发生各个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的矛盾，更不得不直接或间接的嗾使中国的军阀战争。桂系买办地主与英帝国主义的关系，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蒋系资产阶级不论形式上已否与美帝国主义发生若何的关系，但它的发展便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提。所以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发展的冲突，便是造成中国发生军阀战争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十）这样的战争是无条件的反革命的战争。

根据以上的分析，便可知道这种战争是无条件的反革命的战争。资产阶级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表示着外国帝国主义之相互的冲突，代表着美帝国主义发展的力量，并且资产阶级本身既不能彻底反对一切封建势力，反要妥协许多封建势力，自从背叛革命之后更永不能将斗争的力量建筑在工农劳苦群众上，而要依赖军阀制度的统治，所以无论资产阶级在战争中标着任何反对封建势力的口号，这些口号依然是不彻底的，依然要妥协一部分封建思想，终究是一个反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是资产阶级代表美帝国主义去争取中国反革命领导权的战争，没有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意义。

三

（十一）资产阶级对于战争之主要的准备是扩大它的政治影响。

资产阶级在总的准备战争的形势中，是处在进攻的地位。资产阶级之主要的准备战争的工作是扩大他的政治影响。从京

津攻下，经济会议，财政会议，以至编遣会议，各方面之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宣传与设施，使政治统一、军事统一、财政统一，以及其他等等的口号，变成全国政治生活中之不可违犯的天经地义，这都表现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进攻。在这种资产阶级政治影响尽力扩大的状况下，益发使封建阶级的政治势力削弱，使许多小的地方性的军阀更易于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蒋系这种政治的进攻，可以使桂系地主买办的弱点更加暴露，可以使桂系的附属势力发生动摇，这便使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战争中更易于得着胜利。

（十二）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之政治的进攻，同时可以使改良主义的欺骗作用扩大。

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政治进攻，同时可以使改良主义的欺骗作用扩大。因为资产阶级政治进攻的口号，除了能影响到封建势力的本身以外，还可以影响到小资产阶级以及一般的劳苦群众。在反对封建军阀的战争中，资产阶级的力量，除掉依靠于自己所收买的军阀制度外，它还需要群众的拥护。这种反封建的改良主义的口号（统一、裁兵、裁厘、减租），在革命失败之后，很容易在群众中扩大它的影响。无论这些口号将来是否可能实现，但是在目前群众的情绪中，至少可以助长群众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所以扩大改良主义的宣传，缓和群众真正革命的情绪，是帮助资产阶级强大的一个条件，是资产阶级准备战争中的一个主要策略。

（十三）与外国帝国主义建立固定的外交关系，同样有准备战争的作用。

资产阶级不仅在国内要扩大它的政治影响，并且它同样要企图取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承认。修约以及建立固定的外交关系，可以使资产阶级在将来与封建势力战争的时候，仍然在帝

国主义前面保持着形式上的中央政府的统一。在战争中没有中央政府形式上的破裂，保持着过去一切修约及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成绩，这是对于资产阶级非常有利的。假使某一个帝国主义向资产阶级要求更大的特权以建立外交关系，则资产阶级为要取得在帝国主义前面的地位起见，一定可以服从这一帝国主义的条件。这一点对于资产阶级特别重要。

（十四）这些条件使着资产阶级需要一种暂时的虚伪和平，来准备有把握的战争。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道资产阶级在准备战争的过程中，需要扩大它的政治影响，动摇现在桂系买办下的附属力量（地方性的军阀），加紧改良主义的宣传，缓和革命群众的斗争，与帝国主义建立固定的外交关系。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不需要武装的准备，乃是说资产阶级之最主要的是这些政治影响的准备，都需要有一个暂时的虚伪的和平。因为只有虚伪和平的局面，可以表面努力建立统一国家的形式（施行裁兵、裁厘等）来暴露封建买办的罪恶，以施行一切政治的进攻。没有虚伪和平的局面，自然不能扩大改良主义的影响，也不能与帝国主义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也只有虚伪和平的局面才使全国的经济生活不发生紊乱，而壮大资产阶级本身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自五中全会后以及于今，资产阶级虽然极力发动政治的进攻，在军事上虽然也同样的准备，但仍然努力保持着这种虚伪和平的局面。

（十五）资产阶级本身即在将来也仍不希望战争扩大到全国范围。

资产阶级本身需要一种虚伪和平的局面，来准备更有胜利把握的战争。但这并不是说它准备战争的目的，是要为全国范围内造成一个总的大爆发。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准备的目的，

乃是企图尽量将战争的范围缩小。因为普及全国的战争，无论在外交上、政治上，尤其在经济上，对于资产阶级都是不利的。在虚伪和平的局面中，资产阶级将要尽量加紧他的政治进攻，使着桂系买办地主的势力逐渐和平的削弱。到了许多小地主军阀受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或因其自身经济蜕化的关系，可以趋附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则资产阶级在将来与桂系买办地主最后决裂的时候，可以在个比较小的区域以内，很迅速的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前途。不过在封建势力方面，同样的要用各种的策略，尤其是帝国主义的帮助，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对抗资产阶级的进攻，因此很足以妨碍资产阶级这种企图的实现。

（十六）军阀地主在总的政治形势上说是处于被进攻的地位。

中国封建地主的势力，在中国社会中早已处于崩溃的过程。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以后，封建势力在经济上尤其是在政治上是处于被进攻的地位。这种状况使着封建势力的本身，不独在资产阶级的进攻前面不能统一，并且使一部分自己的力量，投降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所以现在一切封建势力的活动，在总的形势上说都是为的保持现在割据的局面，保持现在政治上所占据的地位，防卫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攻。虽然有时候用反对赤化、反对共产的口号向资产阶级反攻，可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后，这些口号不是有力的武器，因此有时为要反攻，反而不得不利用资产阶级的口号。故在总的政治形势上说乃是处于被进攻的地位。自然这里边因为有了帝国主义关系，所以资产阶级受了帝国主义的控制而致力量薄弱，不能得到有利的独立发展，封建阶级受了帝国主义的扶持，保持其剥削关系和军阀制度，以致他在总的政治形势上虽处在

被进攻地位，但绝对不能说资产阶级的进攻是易于得到胜利的。

（十七）封建地主不得不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即不得不与买办阶级共同作战，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也有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买办性。

在这种日就崩溃的形势中，封建地主为保持自己的地位起见，不得不极力巩固自己的割据局面，不得不更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力量。所以买办阶级的地位，很早便与封建地主及军阀制度结成不可分离的东西。在民族资产阶级进攻的前面，更使买办阶级与封建地主站到同一利害的地位。同时民族资产阶级要抵抗英日的势力，不得不依靠美帝国主义，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有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买办性。英日帝国主义不得不帮助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利用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是对美国势力发展的对抗。

（十八）封建地主要特别着重军事上的准备。

在资产阶级这样政治进攻的前面，已经暴露了地主买办阶级的弱点。因此封建地主阶级不得不在军事上作尽量的准备。封建阶级在政治上处于客观上很难挽救的不利的地位，使政治上往往不能不让步，因此在军事上却非尽量准备不可。事实上封建阶级除了依附于帝国主义军事力量以外，简直很难有可以抵抗资产阶级的力量。这自然不是说封建阶级在政治上完全不去过问，因为他有时仍是利用政治欺骗口号（如反对南京政府的对日外交、站在英国方面的排日等等）为难资产阶级，不过在这里终不能建筑他的主要力量。

封建买办所认为最危险的就是内部的分化破裂与一部分的逐渐向资产阶级投降。地主买办在军事上不得不尽量防止这现象，并求得帝国主义的援助。过去的贵州战争、四川战争、奉

天杨常[2]事件等，都有这样的意义，而以最近的湖南事变为最明显。

（十九）湖南事变在两方准备战争中的意义。

在这两方面的战争准备中发生了湖南事变。湖南事变的意义，就是在资产阶级这样严厉进攻的前面，在鲁涤平与资产阶级勾结已经达到成功的时候，使桂系地主买办不得不施行他的反攻。因为资产阶级这种蚕食地主办法，阶级政治势力的政策，可以使桂系的力量和平的削弱下去，这对于桂系有非常大的危险。桂系解决鲁涤平在湖南的势力，就表现着他这一反攻的暂时胜利。这一次事变不一定可以引起两方面军事的总爆发，但已给资产阶级之“和平转变”的政策以打击，更证明他们最后的战争是不可避免。事变发生之后，桂系代表之一切缓和战争的“辟谣”，更是地主买办之一贯的政治上可以让步，军事上绝不“让步”的政策。

四

（二十）决定战争前途的主要力量是外国帝国主义。

因为军阀战争发生之最主要的动力是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政治与经济的生活中都占着统治的地位，所以决定战争前途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尤其是英日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问题是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合，它利于中国有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用经济进攻的力量去统治中国。美国一定要帮助民族资产阶级，使战争可以进局部内很迅速的解决。日本帝国主义利于军阀割据的垄断，并想乘机扩大它在山东以及其他地方的特权，使它利于中国有一个普遍战争的局面。加以无论如何战争的爆发，其主要的区域将在南部及

长江流域一带，对于日本在东三省的地位，决不会有任何直接的影响，这益发使日帝国主义利于中国战争的扩大。胶东的战争及日本通信社时常关于战争紧张的造谣，都是很明显的表现。然只是一个日本却很难造成全国范围的战争。因此，战争是否扩大到全国的范围，英帝国主义于决定这个问题，便有了很大的作用。

（二十一）战争在桂系没有准备充分的时候还不会扩大到全国范围。

现在是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战争的时代。虽然他们还不愿直接冲突，但必然要极力帮助各自勾结的军阀以扩大并巩固在中国的统治，做将来大战爆发时自己的后备军。英国自然也是一样。所以它极力帮助桂系的军事准备，添置飞机，开办毒气工厂，以及其他的各种武器的帮助。不过现在这种武力的准备还没有充分，还没有战胜蒋系的可能，遽然爆发战争必然要受到严重的打击，这是于英国也有不利的。所以在桂系武力的准备比较充分，而资产阶级的发展又将更厉害的触犯英国利益的时候，便会成为空前惨酷战争爆发的时机。所以就现在的形势，战争的危机是一天一天加紧，但在最近或许还不会发生普及全国的军阀战争。

（二十二）局部的军阀战争，无论甚么时候都有爆发的可能。

在两个大阶级还没有正式破裂的时候，各地方性的小军阀必然不敢离开大军阀的影响而单独战争。但是在两派军阀统治尚未固定尚在摇摆的省份，两派军阀必然要利用该省的小军阀互相战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小军阀的战争确仍然会随时爆发，过去贵州、四川的战争便是明显的例子。这种战争不独在现在不可避免，即使在将来资产阶级掌握了全国反革命领导

权以后，也仍然不可避免。因为资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的控制，绝对不能彻底消灭封建阶级，不能消灭地方军阀，不能消灭军阀制度，尤其是不能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相互的冲突，因此绝对不能消灭军阀战争。

五

（二十三）战争是我们争取广大群众更有利的机会，更加紧了我们争取群众的任务。

军阀加紧准备战争，便更要加紧对广大群众的压榨。因为军需财政等的准备，必要加紧苛捐杂税的抽剥；因为巩固后方的需要，更要加紧钳制一切些微的自由，尤其是要压迫群众的斗争；尤其是到了战争爆发的时候，因调动军队，拉夫派差，封船拉车，种种骚扰，再加以交通断绝，金融恐慌，物价腾贵，使广大群众的痛苦特别加深，必然要激动群众的反抗，所以是更有利于我们争取广大群众的机会。我们对于这些机会决不可轻易放过，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期发展群众的组织与斗争，一定要更加紧的实现我们争取群众的任务。

（二十四）战争是统治阶级动摇极厉害的时候，但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斗争仍然不能促进革命高潮。

军阀战争本身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大爆烈的时候，它只是造成革命高潮的客观上可能条件（统治阶级的破裂与工农的痛苦加深）之一，并不就是革命运动的高潮。革命高潮是要依靠着群众的组织力量、觉悟力量与斗争的勇气，尤其是我们党在广大群众中的领导力量。没有这些便说不上革命运动的高潮。军阀战争发生之后，固然要给群众以许多发动斗争的机会，但是战争的本身，并不能使群众的力量壮大。果然群众有了组织

以及斗争的力量，即没有战争也可以促成革命的高潮。果而群众自己没有组织与斗争的力量，即使发生战争（如贵州、四川），对于革命运动仍然失却了客观上帮助的意义，反而更增加民众的痛苦与压迫。因此，军阀战争的本身并不就是革命的高潮。

（二十五）战争一方面暴露改良的欺骗，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更要加紧改良的宣传来争取群众。

军阀战争固然因加增群众的痛苦，暴露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另一方面（特别在准备战争以及开始战争的时候）并不能减少改良主义在群众运动中的危险。因为资产阶级在这个争取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一定要加紧其假革命的口号，一定要宣传这次战争是“革命的”战争。这种宣传特别在封建阶级统治的地域中，在民众对桂系军阀之普遍的怨恶中，很容易助长群众对资产阶级的幻想。这种危险可以使群众不自觉的走到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二十六）战争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政治影响比较易于扩大，另一方面还要增加我们工作的困难。

在军阀战争准备以及发生的时候，可以给与我们许多宣传鼓动以及发动斗争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政治影响较易扩大，但是并不能减少我们工作的困难。白色恐怖，军事戒严，交通阻滞，都足以使我们的工作更难进行，并且敌人对于我们的注意也要更为周密。桂系在解决鲁涤平之前，首先要破获我们在湖北的机关以及打击朱毛[3]在湖南的势力。蒋系在决定是否立刻开战的时候，必首先要估计到全国工农斗争的情势及我们党的力量。因此可以知道军阀战争之来并不能减少我们工作的困难，反而使我们要更加注意，特别在秘密工作及交通建设上。

（二十七）目前工作的总方针，就是要在群众的一切日常

斗争中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

战争是损害广大劳苦群众的恶魔。我们必须在广大群众中，极力宣传反对军阀战争，最后的目的是要领导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推翻统治阶级，根本消灭军阀战争。可是现在群众的组织薄弱，斗争尚未高涨，尤其是改良主义的欺骗很深的时候，战争的危机又日益迫促，所以我们工作的主要路线是要：利用战争加于广大群众的痛苦，更艰苦深入群众中去，耐心的工作，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扩大群众的组织，加紧工人的经济斗争、农民与城市贫民的反苛捐杂税的斗争以至抗债抗租抗捐的斗争，发动兵士的反抗官长的苛虐待遇以及索欠闹饷的斗争。在一切斗争中，都要与反军阀战争的宣传联系起来。在一切日常的宣传鼓动中，都要说明战争给与广大群众的痛苦。如果在毫无群众基础的地方，首先要极力打入群众中去，很艰苦耐心的去树立党的基础；但必须明白只有在群众的日常斗争中才易于扩大党的基础，尤其是只有日常斗争与反军阀的宣传联系起来，才更易为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二十八）反对等待主义。

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要候到军阀战争发生之后再去进行。我们乃是要在目前的日常生活中去指出统治阶级准备战争的阴谋，预先在群众面前指出军阀战争的危险，发动群众日常的斗争，锻炼群众的力量。我们不是怕群众有力量的时候，统治阶级的破裂便不会爆发，我们乃是怕群众完全没有斗争的准备，到战争爆发之后，只能受痛苦而不能反抗。我们不应等着战争来了之后再去工作，而是要从现在起加紧我们的群众工作，将来才有反对战争的力量。如果不从现在起加紧工作，而只是等待战争的到来，幻想战争才是工作的机会，那就不只是将来不能做成严重的反对战争的运动，而且要因军阀加紧的压迫工作

仍是困难，必然要走上悲观失望的道路。这是极严重的错误观念。

（二十九）反对盲动主义。

军阀战争本身并不是革命的高潮，群众运动只在很少的区域以内表现着开始复兴的形势，并且群众运动还有不少很严重的弱点。因此，无论将有地方战争或是普遍全国的军阀战争，在全国仍然没有总暴动的局面。不但没有总暴动的局面，在现在群众主观力量这样薄弱的状况下，我们若一开始便想鼓动反战争的总罢工、公开的示威游行、兵变等，都还是吓退群众而没有实效的空想。所以我们是要在军阀准备战争中，以及军阀战争中，加紧争取群众组织、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工作，以促进群众斗争的发展，以推动反对战争运动的兴起。

（三十）反对不动主义。

但是若恐惧盲动而不敢动作，空放过群众斗争的机会，这是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因军阀战争的关系，一定有戒严、派捐、拉夫、抢掠等等，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利用群众之一切大小的不满意，发动群众的斗争，团结群众的力量。尤其是在农村中，一方面因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加深，另一方面因军阀戒备暂行松懈，必然要发生许多自发的农民斗争。我们对于这些农民的斗争一定要加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扩大群众中的党的政治影响，扩大群众的斗争与组织。这就是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策略之一。如果在没有自发的武装斗争的农村中，那就要我们加紧领导农民的日常斗争，在斗争中扩大群众的组织。在兵士群众中，更要利用战争的机会，发动一切反军阀、官长的宣传，以及闹饷索欠的运动，以扩大我们在兵士群众中的影响。在苏维埃区域，应当极力扩大，但是主要的策略，是要发动群众的斗争扩大斗争的区域，而不是专用红军的攻取，尤其要极

力禁止无目的烧杀。只有这样的策略，才能在军阀战争中扩大我们的影响，扩大群众的组织，推动群众的斗争，而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三十一）目前党的主要路线还在反对右倾思想。

目前客观上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宣传的影响在群众中日益发展而反映到党里来，使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等机会主义右倾的倾向在党内亦日益扩大。同时党在组织上脱离群众的现象，下级党部对政治变动的认识不清，虽还存在一些盲动主义的情绪，如在军阀战争爆发时不估计群众的力量和我们的领导关系，不了解发动群众斗争的工作方法和程序，空想一开始便来个大动作徒然吓退群众等等，但这些盲动情绪很容易为党的基础削弱和客观的困难消灭下去。而右倾的危险如前边所指的等待观念、不动主义等等犹豫、恐惧、消极、失望、无办法的情绪，必将大大的发展影响到党的整个工作，使党的组织愈加脱离群众愈加削弱，使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愈加低落，敌人的改良主义宣传的影响愈加不易战胜，则军阀战争便是爆发便是延长，工农贫民的痛苦便更加深，我们仍然争取不到广大群众到党的周围。所以目前党的右倾的危险实大过左倾的危险，党的主要路线还在用最大的努力来反对这种右倾思想，在正确的路线上去工作。

（三十二）加紧我们政纲的宣传。

在鼓动上，我们任何微小的口号都应该提出，只要他代表着群众的要求。我们都应该为这个口号努力奋斗。但是在宣传上，我们一定要提出我们自己的政纲，扩大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在军阀战争将要爆发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在总的政治方向上揭破统治阶级的罪恶，指出群众的政治出路。没有我们总的政治宣传，则我们不能战胜改良主义的欺骗，不能表现出我们

党的政治面目。武装暴动是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在战争准备以及战争爆发的过程中都特别需要而特别易于说明。要使一切劳苦群众都知道他的出路只有武装暴动与苏维埃政权，只有推翻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才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

中　央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2〕 指杨宇霆、常荫槐。

〔3〕 指朱德、毛泽东。

PDG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

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

1. 我们（红军第四军）三月十四日攻克汀州城。郭凤鸣（福建第二旅旅长）打死，陈尸汀市三日。缴获步枪约五百支（单响、九响多，红军用不着），马枪七八支，迫击炮三尊，炮弹一百余发。郭旅残部向上杭溃退。

2. 汀州群众很好，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近城农民大大起来，连日建立农会、工会的基本组织（分秘密公开两种），日内即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目下是政治部代替政权机关。

3. 时局开展（我们看到三月三日的上海报，三月十三日的……及漳潮两报），闽西及赣南望中央将一般计划指示我们。红军应该怎样行动，尤盼飞速指示！

4. 对一般的计划，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这时候无论什么派别欺骗群众，都敌不过我们共产党的事实了。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的意见：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

* 这封信是毛泽东起草的。

创立。

5. 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6. 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部）约四百枪，战斗力颇好，现在兴国、泰和、赣州之交。独立第四团（段月泉部）约三百余枪，战斗力尚弱，现在兴国、于都之交。红军彭德怀部约三百枪（井冈山逃出来沿途失散后存余者），在于都、信丰之间。三月七日彭部袭击刘士毅残部，缴步枪百余，水旱机关枪各一，子弹七担。红军第四军大概十天内尚在闽边工作，十天外须赴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惟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7. 福建省委须立即派遣一闽西特委来汀州指导汀属八邑工作，汀属党部太弱，担负不起建设政权的责任。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扩大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建设政权机关及闽西红军（现在枪无人抬），望省委以大力注意此间。

8. 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

9. 我们自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二十日在大余与李文彬作战失利，循粤边南雄入赣南信丰、安

远、寻乌，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二月一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之罗福嶂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宁都、兴国、吉安之交，地属吉安）。二月十一日到宁都之大柏地，与追兵之先头部队刘士毅第十五旅两团战，大败之。我军士气大振，缴得步枪二百余，水旱机关枪六架，俘敌甚众。敌之残部，溃退赣州。追兵后续队伍李文彬部（三团）到来，我们则已往东固。在东固休息一星期，与江西红军二、四两团会合，并与江西赣南特委接上了头（在于都），安置了伤兵。及李文彬（赣军最精锐部）追至东固，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复入宁都、瑞金之壬田市，后卫距敌才一里，乃我们离开壬田市向汀州之原因。张[1]旅忽然折回，盖湖南战事爆发，蒋[2]系须集中部队，故将张旅调回，因此我们得安心对付郭凤鸣旅。十三、四日两次击溃郭部二、四团，而红军亦在兴国、于都一带发展。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以来，总计损失约二百余枪，六百人，最大的就是干部损失多员最为可惜。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尽了我们的精力，才应付过这个难关，而得现时之胜利。内部团结坚固（最困难时兵士开小差的极少，干部袁文才等数人脱离队伍），党的指导不错，亦为战胜困难的原因。

10．军中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敌委员会（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人）。第四军除留在湘赣边界的一部分外，出来的部队现编为三个纵队，共

三千人，枪一千五百，子弹极少。因战事太多，老的干部损失太大，战斗力不及从前。但井冈山出发以来的疲败精神，业已恢复，士气亦已振奋起来。因两次损伤的结果，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之缺乏，达于极点，亟盼中央派人来补充，至少须派军事的政治的教官各数人，来此开办训练学校。

11. 两年以来因交通隔绝，仅得中央来件二次。一是去年六月四日的长信，十一月间在井冈山接到的；一是六次大会决议案（政治，军事，土地，政权，农民，大会……结[3]六件），今年一月在永新接到的。我们寄给中央的信：去年八月毛泽东之一长信，由湖南省委转；去年十一月前委之详细报告，由湖南江西两省委转，此报告历述两年来湘赣边界斗争之经过，红军之现在计划等，不知均曾收到否？

12. 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地接受。前已油印五百余本散发井冈山以来沿途的党部，现又石印一千本，为闽西赣南扩大组织之用。惟少组织、宣传、职工三决议案，乞即补寄！

13. 闽西特委须速建立。赣南特委与江西省委非常隔绝，但与前委已发生密切关系。湘赣边界特委自去年五月成立以后，与湖南省委关系较密，与江西省委关系较少。赣南党部，于都及东固最好，兴国、信丰、宁都、安远、寻乌次之，瑞金、会昌、石城尚无组织。长汀在开始发展中，最好之永定，离我们三百余里。为应付江西事变，红军此刻不能去永定。阮山同志的红军有开来汀州之必要，必须如此，我们去江西后，汀州的政权才可以继续，才可以与我们取得密切的联络。郭凤鸣死，汀州再无人管，八邑中心工作应在长汀，望省委熟计。

14. 中央在估计力量时，不可把我们估量得太大。

前　委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 指张与仁。

〔2〕 指蒋介石。

〔3〕 原文如此。

PDG

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周　恩　来

关于山西党的组织，中央最近依据全国组织的变动，有一新的决定，特分项说明如下：

一、自“八七”会议至今一年有半，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亦由南而北渐渐遍及于全国上级党部。于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日益削弱，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党部机关尤多形成空架子，完全与群众生活相隔绝。因之自中央至支部有层层机关，而工作效能极其微弱。有时且因党的上级机关一再破坏，各地党部唯一的办法，便是要求中央派人前往恢复。中央过去确也循着这个路线，派人至各省恢复组织。结果不但工作不能推动，新的关系不能发生，甚至旧的基础也日益缩小。工作既没做起，而机关已立，于是这个架空的组织，在社会中便极易为敌人发现，屡遭破坏，在党内因有了这些不落实际的机关，反足以助长同志依赖机关、忽视下层群众工作的错误观念。因此，中央特改定，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

* 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顺直省委并汪铭的指示信。

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嗣后凡是下层组织没有工作，或是破坏之后，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党的组织必须在此种基础上才能谈到恢复和建立。如果超越了这一基础工作而谈恢复，而先立一上级机关，则必致基础没有，徒然发生一些个人的关系，牵引这些同志围绕在党的机关左右，无职业，无社会关系。这种人越多，越妨碍党的下层基础的恢复和建立，于是这一机关越隔离群众，越隔绝社会，形成一架空而不合实际需要的组织。

二、依照上项说明的组织路线运用到北方党部、山西省委便成为目前最不必要的组织。如强行组织起来，必成为一空架子机关。汪铭同志来信还主张调一批人到太原，结果必如上项所说，因为有了省委这一级空架子机关，于是又团聚了许多同志离开社会的关系而围绕在党的机关左右，这是最妨碍深入群众工作的。故中央决定，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兼管。

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如太原、阳泉、绛州、榆次、河东诸地（大同由京绥路方面建立关系）。目前第一步工作，便应先在这些地方寻找有社会关系的同志，建立党的基础。工作恢复开始，党员的线索并不求多，重在质量的选择，要有一人能得一人之用。主要的还在产业工人，即无产业工人之地，亦应注意寻找手工业工人及乡村中雇农贫民。知识分子，必求能在社会中生活活动的人，如与社会一无关系而又畏怯深入社会，不努力寻找职业，这种人从前即便是同志，现在找到也无甚利于党，这种人越多，反而越易使党停留在这些与社会隔绝的流落分子圈中，而不能建立社会基

础——党的阶级基础。

假使在太原、榆次这类地方，仅只找到几个同志，最初便须以支部的形式开始他们党的生活。主要的工作自然须依照中央前次致山西的信去做。要能在群众中注意日常生活的痛苦所在，鼓动起日常斗争的要求和情绪，以发展到行动，并在这一艰难困苦的工作中训练我们的战斗员。假使我们能在每一地方，得到几个能深藏在群众中、能领导群众斗争的同志，则便是仅仅这几个同志，便是仅仅一两个工人支部，也会使这一些组织成为山西工作发展的核心。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健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县、市委的组织。务使这一组织，能从几个有群众基础、有社会关系的支部基础上建立起来，县、市委负责同志也要多由在业同志选出担任，这样才能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在县、市委没有成立前，几个支部并存时，可指定一个较健全的支部为特支，指导其他支部的工作。中心县、市委须指导其他邻近县份。

三、根据上述的办法，目前山西实无集中一部分同志到太原的必要。便是太原的工作，也只能设法在当地找有社会职业或下决心找社会职业的同志，去开始恢复党的工作和建立党的基础。

顺直省委应根据此信所指示的办法，函知汪铭同志至天津面商；依指示的区域，速即计划如何用巡视方法去寻找各地在业的同志，开始恢复中心区域的工作。汪铭同志得此信后，亦应速至顺直省委处面商。

*　　　　*　　　　*

河东有七县范围，工作不可忽视。在目前春荒期中，主要的斗争固在扩大借粮分粮运动，但斗争的对象宜多领导着向地主方面进攻，尤其重要的是不要使农民斗争专停顿在这一运动

上，宜从抗债分粮运动发展到农民反抗地主的日常斗争。只有斗争的范围日益扩大，斗争有继续不断的小胜利，然后农民运动才会深入，土地革命的阶段才得在北方开始进行。这一点很重要的指示，望你们于指示河东工作时特别注意。

对士兵运动和土匪、民团等工作，也望依照中央的工作计划指示河东特委。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们！

蒋桂两系军阀又开火了，军阀战争的惨祸又压到我们头上来了！

中国封建军阀在五卅以后的大革命当中，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斗争，革命暴动的威力，已经动摇了他的基础，吴佩孚、孙传芳先后倒台，革命将要彻底的胜利，建立完全独立自由永久和平统一的中国。但是中国国民党，代表着居于剥削地位的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不愿意广大劳苦群众的解放，不愿意彻底驱逐帝国主义，不愿意肃清封建势力，竟实行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利用封建军阀来摧残工农势力，使帝国主义的侵略重行加强，使封建军阀的统治危而复安。中国国民党便是毁灭中国革命，葬送中国民族，造成新军阀战争的罪魁祸首！

帝国主义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都是靠剥削吮吸工农劳苦群众的血肉来生存壮大，所以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要联合一致的施以残酷的压迫，这一年来，已经是不止数百万人死在他们炮火刀枪之下。到了把工农革命压迫下去

* 本文原载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六期。

以后，这些强盗，便都想独占这一肥厚的赃物——四万万人的血汗。因为分赃不匀，自然又要开始互相抢夺的火并。

第一，很明显的这次军阀战争，是帝国主义互相抢夺中国的战争。英日帝国主义固然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印度、朝鲜，把中国人都变成他们的奴隶，所以勾结桂系、奉系军阀做他的工具来抢夺中国的统治。美帝国主义也是一样要把中国变成他宰割下的殖民地，不过他已经是世界帝国主义之王，好像是坐地分赃的强盗头子，可以用一些假仁假义的狡猾欺骗的面孔来掩饰他的强盗行为；所以他用一些承认关税自主的表面空名来贿买中国资产阶级，接受他的投资，使中国广大劳苦群众都成为他的财政资本的奴隶。这些帝国主义既然都在进行瓜分中国的政策，而世界大战危机又日益紧迫，故各个帝国主义当然要很快的扩大和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势力，当然要唆使各自的工具——中国军阀互相火并起来。

第二，这次战争很明显的又是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抢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战争。买办地主阶级固然是要极残酷的剥削中国劳苦群众，尤其是农民，但中国的资产阶级，虽在剥削的方法上有多少不同，然而他的残酷并不亚于买办地主阶级，他只有把中国工农的血肉贡献给帝国主义的能力，决不能而且不愿改良什么工人生活解放广大的农民。他们既然都要靠剥削工农劳苦民众来生存，当然要争取这一反革命统治的领导权，以便利自己的发展，遂促成军阀更快的火并起来。

第三，这次战争很明显的亦是封建军阀抢夺地盘的战争。军阀都是些贪欲无厌的强盗，都只想扩张自己的势力，独霸中国；因此互相抢夺财政，扩充军队，在广大工农兵士群众的死尸上来建筑自己的宝座。

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我们看清了这些帝国主义的阴谋，

看清了统治阶级的斗争，看清了军阀的野心，便可以知道这次战争完全是反革命的战争，是一群强盗抢夺我们血肉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只是加深我们的痛苦，还要把我们的肉体做他们互相抢夺的炮灰！两派军阀，尤其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军阀，惟恐广大劳苦群众起来反抗，却打起许多好看的旗帜来欺骗我们。

他们说："我是为求得中国独立自由而战争"，这是鬼话！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哪一天不在卖国？他们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完全是承认帝国主义的特权。桂系军阀固然明显的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一样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并且唯恐日本在这次新的大战中重行出兵，马上便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把山东以及全国的许多特权卖给日本。国民党的任何一派，都是一样的卖国贼，都只能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决不敢反对帝国主义。

他们说："我是为反对封建势力而战争"，这是鬼话！桂系固然明显的代表中国封建势力——买办地主阶级；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他的本身亦兼有封建的剥削。他必然而且已经与封建势力妥协，决不愿彻底肃清封建势力。这次战争也是勾结一部分封建势力来反对桂系封建势力。他现在这样加重苛捐杂税的剥削，这样加重对于工人农民的剥削，很明显的表现他的封建性，他自然不能肃清什么封建势力。

他们说："我是为统一、裁兵、裁厘而战争"，这是一样的鬼话！桂系军阀固然明显的反对裁兵、裁厘、统一；蒋系军阀口喊裁兵，实际加兵，口喊裁厘，实际加税，口喊和平统一，实际制造战争。我们只要想一下现在所受的层出不穷的剥削，和这些军阀互相争夺的事实，便可以知道这些反革命骗子的甜言蜜语中，都藏着了杀人的利刃！

中国共产党明白的宣言，现在任何一个军阀，统治阶级，国民党的任何一派，都是革命背叛者，都是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给帝国主义的工具，都是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压迫者，都是毫无人道的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都是中国民族解放的障碍。要求得彻底裁厘裁兵，真正的和平统一，必要首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要彻底肃清封建势力，必须完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要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必须首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要根本消灭军阀战争，更只有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一致起来，以革命斗争的力量，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自己直接管理的政权——工农民主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劳苦工农兵士贫民群众，一致起来，为实行上面指出的革命政纲，为彻底消灭军阀战争，作坚决的斗争！

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们，军阀战争的准备，已经经过很长的时间。在他们准备的期间，特别加重对于我们的剥削！他们为准备战争，筹备军饷，加紧苛捐杂税的剥削。南京政府里所发行的公债已经在二万万元以上，最近又加抽盐税、特税、营业税等。广东政府，更大开烟赌，抽收人头税，烟灶捐……等。山西、河南、陕西一带加重田赋，预征钱粮到民国二十八年等。这都是榨取我们工农劳苦群众的血汗！他们为准备战争，惟恐广大的群众起来反抗，更加紧白色恐怖的压迫，禁止一切群众运动，钳制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群众团体，都以整理、指导的名义，强迫变成他的御用机关。天津，以至全国任何一处，有许多革命的勇敢的战士，为争取这最后一点的自由，都遭了他们的血刃！北方广大的灾荒，使五千万以上的灾民求生不得；这不是因为他们准备战争，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使农民最后一粒的种子都被他们剥夺去了，使农民没有钱来讲求水利，购买肥料所制造出来的吗!？全国广大

劳苦群众，都破产失业，甚至不得不被迫而为土匪，以求苟延旦夕；这不是他们准备战争，加重对群众的抽剥，使群众无法谋生，所制造出来的吗!? 金融恐慌，物价昂贵，市场衰落，生活日益艰难，不都是军阀准备战争制造出来的吗!?

在军阀准备战争时期中，已经使我们受着这样惨酷的痛苦，军阀战争一开始爆发，又实行拉夫、拉车、封船、封马，交通断绝，运输阻隔，金融益加恐慌，物价益加昂贵，甚至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使广大工人失业，贫民苦上加苦。在农村中要遭受军队蹂躏，遭受枪炮的危险，房屋被焚烧，财物被抢劫，弄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样万恶的军阀，万恶的统治阶级，是我们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生死的敌人。不打倒这些军阀，不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决没有解放的出路!

全国工友们，空前的战争惨祸又爆发了！我们要一致的团结起来，反对军阀战争加于我们的压迫剥削，反对军阀借口战争来禁止我们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反抗资本家利用战争来加紧对我们的进攻，缩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等；反对资本家借口战争，关闭工厂，使我们受到失业的恐慌，尤其要反对一般黄色领袖，国民党走狗的欺骗。如果哪一个说在战争时候，不要斗争，他便是工贼，他便是资本家的走狗，便要驱逐他，打倒他！工友们，只有斗争，才能反抗剥削阶级的进攻，只有我们斗争的威力，才能争取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还要在斗争中积聚我们的力量，扩大我们的组织，准备最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消灭军阀战争的革命胜利的斗争!

全国劳苦的农民群众们！空前的战争惨祸又爆发了！我们要一致团结起来，反抗军阀的压迫，反抗战争给与我们的痛苦，反抗拉夫拉车，封船封马，反对加重田赋，反对苛捐杂税的剥削，反对强占民房，反对军队抢劫奸淫，反对摊派粮饷，

尤其要反对替军阀做走狗的地主豪绅。劳苦的农民群众们，畏怕逃走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团结起来，积极的反抗，不供给军队的粮食，不纳摊款的捐税，尤其要向兵士积极的宣传，告诉他们“替军阀当炮灰是不值的”，要他们与我们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推翻军阀的统治。并且我们自己要在这样积极斗争中，积聚我们的力量，准备革命暴动，推翻地主豪绅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达到最后的胜利！

全国的兵士群众们！我们以前不都是工人、农民吗？怎样受地主豪绅资本家的剥削，怎样受军阀民团的屠杀，怎样的破产失业，不得已而当兵，这些惨痛的前事，决不要忘记！进了军队以后，官长的压迫苛待，更是惨酷万分，军饷几月不发，父母妻儿都在家里挨饿，本身更是奴隶一般，稍一自由，便遭受非刑毒打。官长升官发财了，我们还是永远做奴隶，当炮灰！现在这些军阀，又因争地盘，争权利，互相打起来了，他们无论胜败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们只有送死，打伤成了残废，马上遣送回家，一点点抚恤费，都进了军阀的腰包，这是多么惨酷呵！兵士群众们，大家要找出路，要谋生活，要不受痛苦，要不做奴隶，只有积极的行动起来，带起武装，跑回农村去，与农民联合起来，打倒压迫我们的豪绅，没收地主的土地。同时还要极力的向我们弟兄宣传，大家联合一致，倒转枪杆，打死自己的官长，与工人农民联合起来，推翻政府，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然后才能得到真正永久的幸福！

全国贫苦商人、学生和一切手工业者，这些万恶的军阀，加重苛捐杂税的抽剥，钳制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现在的世界真是比孙传芳、吴佩孚时代还不如了，军阀战争的爆发，更要加倍的痛苦！希望别人来解放我们，完全是梦想，只有自己团结起来，作坚决的斗争，反抗苛捐杂税，反抗禁止

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实行罢课罢市的示威行动，最后还要准备与工农兵士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我们自己直接管理的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共和国，然后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

全国工农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们！我们自己的痛苦，只有我们自己斗争的力量才能解除，希望别人，就等于希望真命天子出世一样的空想！蒋系、桂系是一样的军阀，国民党的任何一派都是一样的屠杀群众的刽子手。我们受了蒋系的压迫，决不要幻想桂系来解除；受了桂系的压榨，更不要幻想蒋系来解除！蒋系、桂系是一样的军阀，国民党任何一派都是剥削群众的强盗，我们的幸福，只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我们的痛苦，也决不要幻想别人来替我们解除！

全国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一切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指使来争夺中国统治的，我们要反对军阀，尤其要反对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明白的告诉全国工农群众兵士贫苦民众们！如果不是我们自己起来作坚决的斗争，如果不是以我们革命斗争的力量来消灭军阀，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那么，军阀战争将继续不已。就是蒋桂战争结束了，蒋冯阎[1]奉的战争也必然不断的起来，我们将无法脱离军阀的压迫，脱离战争惨祸！全国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只有斗争，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是我们解放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提出下面的口号，号召全国工农兵士贫民为这些口号的实现，作坚决的斗争：

反对军阀战争！

反对苛捐杂税！

反对加重田赋！

反对预征钱粮！

反对关闭工厂！

要求以物价的比例增加工资！

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

反对国民党用指派训练的名义来取消我们组织的自由！

反对拉夫拉车，封船封马！

反对强占民房，摊派军饷！

反对官长的压迫苛待！

要求发清欠饷！

要求军需公开！

最后工农兵士贫苦民众们，都要一致的联合起来在斗争中扩大自己的力量，准备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消灭军阀战争，建立我们自己直接管理工农兵士贫民的代表会议的政权！

打倒军阀政府！

工农民主共和国万岁！

中 国 共 产 党
中国共产青年团 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冯玉祥、阎锡山。

PDG

瞿秋白给李立三的信

（一九二九年四月四日）

立三兄：

你给我的信到了很久，但是，我直到今天才有功夫写回信。此地的“无事忙”，是出于意料之外的。我的病是很有忧虑的。从去年九月会[1]完之后直到今年四月初，我简直是疲惫的不堪。现在，住了一个半月医院回来，觉得好些，总要尽可能的写些东西，译些东西。对于中国问题，有很多可以写的。现在，复你这封信，只能算是例外的——以代序言吧。

你的信的结论是说：我那篇《苏维埃中国万岁》是有些过分估量。所以，首先我要说明的就是——中国革命前途的总问题与每一时期政局估量的个别问题，必须分开。我重新读我那篇文章，证明我所记忆的是不错；我那时（去国际六次大会之后）是并没有写到政局估量的问题。因此，我那篇文章之中根本没有估量过分或不足的问题，而只是指出国际第六次大会的结论——向着新的革命高潮进行是总前途。

这一问题，显然也不是你信中的主要问题。你信中的主要问题，当就是军阀混战与民族改良主义的问题。

（一）

军阀混战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的中心问题。辛亥之后的十八

年，每年必战，每省皆战。这究竟是甚么一回事？陆荣廷、岑春煊与孙文之联盟而反对袁世凯之战，有没有阶级的经济的背景呢？当然是有的！现在蒋介石与桂系之战，有没有阶级的背景呢？当然是有的。至于广州北伐（一九二六年七月），武汉北伐（一九二七年六月）以及南京北伐（一九二八年二月），都是确有阶级的经济的背景，那更是不用说了。问题是这几期军阀混战的背景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封信竟是不能详细的说了，——将来研究中国的一般问题中，总有机会的。现在只说我那篇文章里的原意，那里写着："国民党之内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和各派各系豪绅军阀的地盘主义，永世是在互斗——既不能统一，也不能改约。"这是说，国民党统治代替了北京政府之后，军阀战争的背景，还是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互斗。但是必须注意的还有几点：

第一，资产阶级的倾向与豪绅地主的倾向之间的斗争，只是战争之一般的大致的主要的因素；同时，仍有各派各系豪绅地主军阀之间的小战争（如四川、云贵现在已有的战争及将来可能的其他战争）。

第二，资产阶级自身的弱，使他不能不依据封建性的军队，所以一则中国并没有纯粹资产阶级的军事力量（蒋系的势力即其一例），二则也就没有鲜明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两大营垒的分划，三则因此就不能说："如果买办阶级保有政治的优势，或进而有全国的统治，于是军阀制度完全保存，则无法消弭战争，无法求得稳定。如果资产阶级仍能战胜……则可以开稳定的道路。"

第三，军阀混战在现时仍旧含着反映各帝国主义之间的互斗的作用，仍旧含着经过各军阀而扩大各国势力范围之作用。豪绅地主性的军阀，固然必定与商业买办阶级相结合；就是民

族资产阶级现在也已起而代行买办阶级的使命——他本身已成新的买办阶级，在新的方式之中实行买办的作用（政治上是很明显的事，就是经济上例如上海面粉工厂是用美国的麦，丝业机织公会反对重征人造丝的税。再则一般大资本家，以至工业家，大都是有大批内债借给军阀和政府，他们愿意帝国主义者监督财政，以关税收入来担保内外债）。

因此，中国军阀混战的性质，一是豪绅地主性的军阀，亦就是与当地地方市场（如广州、武汉、天津……）之商业买办资本及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军阀之间互争地盘的战斗；二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有民族范围（全国范围）的工业资本、银行资本，与某部分豪绅地主性的军阀联盟，而要摧抑代表地方市场的别部分豪绅地主性的军阀之离心力的趋势之战斗；三是为英、日或美国帝国主义所利用以求巩固其势力范围，扩大其势力范围，或夺取的新的势力范围，以至增高其对华的一般影响之战斗。

资产阶级之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在这战斗之中的作用，正和帝国主义战争中社会爱国主义的作用相类似。对于他，必须各方面的极通俗的在群众中宣传反对。至于说现在的战争是两种前途的战争：一是豪绅买办的前途（加紧对农民剥削与发展帝国主义的商业），二是资产阶级的前途（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及关税自主等的排斥帝国主义势力），那就是过分重视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简直是说这种战争即使没有革命的作用，至少有进步的作用了。

问题正在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不依附于某一帝国主义（美国），不能不依靠某些部分的豪绅地主买办，去争所谓资本主义的前途。于是这种斗争的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自己成新式的买办，自己成为维持封建关系的势力。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及

其一切环境，使中国资产阶级自始即不必用所谓革命的手段（民众暴动），亦不能用和平的手段（立宪民主），而是不能不用军事的手段（战争）去与买办地主阶级争卖国权（中央政府之建立与被承认）。

所以，此次国际致中央的信里，有一句话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些同志，偏向于单方面的认定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长期延期的，是很不对的。一般而论，理论上当然不能否认直接革命形势有延期几年之可能。但是，即使如此，要有一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而不经过国内经济机体极深切的震撼（农业危机的加深，极大的饥荒，本国工业的各业恐慌），不经过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剧烈，**不经过军阀之间的武装冲突**，不经过无产阶级之巨大的阶级战斗，不经过农村中之新的农民暴动），——**亦是不可能的**。如果以为这是可能的，那就是极大极大的错误。……”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上，他的所谓资本主义前途，是不能不以战争去争取的。中国资产阶级不是要改良发展农民生活，他亦不能用美国的金元制造出土地来分给小部分农民（如俄国斯托柳宾的政策）以造成富农领导的安分的乡村，他只能以战争的冒险，以求消灭国内“多余的人”——兵匪。“不能使地多出来，那就只能使人少下去”——这是客观上资产阶级肃清中国资本主义式市场的发展前面之障碍的唯一可能的出路。

如果说资产阶级要的是“和平发展之方法”，而豪绅买办是要战争，那么，这种解释是容易引到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的。如果说，资产阶级派的军阀战胜了，就会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实行关税自主等了，那么，这次蒋桂战争之中蒋如果胜了，那就中国资产阶级的稳定和发展就开始了。——虽然

你的立论及中央三十号通告不至如此，然而简单化之后，必然如此的。

（二）

民族改良主义问题是中国革命里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五卅时就认出：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要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他只是要要求帝国主义容许他多得些剥削中国工农的利润，他的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要革帝国主义的命，而是恨着帝国主义惹起革命。对于封建势力的问题，资产阶级的态度怎样呢？我们以前机会主义的教训，正在于对这问题的没有答案！革命的失败教训我们——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要，也不能，并不曾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土地关系及豪绅之地方政权），他只是要取得“汇合集中豪绅地主的剥削所得，而加以组织，以扩大”国内市场（联结现时各自独立，至少是半独立的地方市场）；他的所谓反对封建，亦并不是要革封建的命，而恨着封建关系惹起不断的革命和骚动。（我那篇文章之中对于这点是没有发展的。）

民族改良主义对于革命的关系，重要的是在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危险，并不**仅在于他的反革命性**，而**尤其在于他的改良主义**。民族改良主义的内容，最完美的最周到的，便是孙文主义了。孙文主义的三大时期说是如何的被资产阶级所利用，从过去历史的经验直到现时的状况，已经表示的很明显了。北伐是军政时期，固然“理应打仗”，故民众“理应”牺牲，为“民族”为“革命”而牺牲，北伐终了之后，有人破坏统一，亦是理应打仗。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是“修改条约，关税自主，统一财政和政治，发展交通和工业。”民族改

良主义方法，实际上却是利用某系军阀势力征服别系军阀势力的战争。政纲与方法之间只有表面上的冲突。这点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只要将他的作用分两方面来看一看，便可以知道了！

一方面，是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是预先答应造所中国的天堂，和平秩序，以及将来的——来世的——民权主义，富国强兵，甚至于“世界大同”，人人饱暖（民生主义）。但是实际上，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既是时时要钳制群众，压迫阶级斗争，（尤其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后）又不能不依附一部分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力量，以反对其别部分，那么，真正减轻些帝国主义政治上经济上的对华压榨，真正的扩大国内工业的市场，真正实行财政交通的统一等等，都是不能实现。他的改良政策处处要遇见封建势力的强有力的抵抗（不仅是桂系或西山派等显而易见的抵抗，还有每一县、每一府、每一军队、每一小市场上的投机商与垄断原料的豪绅）。不但如此，资产阶级自身所用来达到这所谓“改良”的目的之手段，正就在随时随处复活那帝国主义所能凭借的封建势力。所以，如果讲到这种民族改良主义实行上的作用，那是非常之少的，并且是不容过分估量的。一九二八年六月到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个月间的休战状态，南京蒋介石等的裁兵、理财、统一交通、修约、增税的努力，固然显而易见的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倾向，但是同时也非常明显的是制造新的战祸，立即重新破坏其所达到的“商业之相当恢复”等等，不论蒋及南京之胜败如何，这次战争，以及以后的种种战争，必然随处增加封建势力，增加帝国主义对华的影响。

别方面，正因为资产阶级只能凭借某一军阀势力，希冀“打倒别一派军阀”，实际上是消减这部分军队而扩大些地

盘——商业周转及税捐作用的改变，可以利于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自身是要挑动战争，要利用战争的。中国一般的经济条件之中，这种“国内”战争是不能避免的。于是民族改良主义，便□为战争的名义。资产阶级利用如此的名义，来遮掩他是战祸罪魁之一的实际。他要使民众相信：民族改良主义的“天堂”实在是很好的，障碍这天堂之实现的，就是某派某派军阀，所以非打不可。著名的“等待主义”是有历史的经济的根源的。等北伐，等东征，等统一，等灭桂，等……等……工农民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在革命失败之后，受着屡次摧残之后，可以对于国民党存有幻想的缘故，正在于资产阶级传播这种“等待主义”。如要造成并巩固群众的等待主义，南京政府的土地法、劳动法，以及国民党各地党部的“在野态度”，反对桂系的扩大宣传等等，都有相当的作用的。所以讲到民族改良主义之蒙蔽工人阶级意识以及一般民众的政治觉悟之作用，那是一定不可以估量不足的。这次战争的爆发，所以一方固然证明给群众看看。国民党的统一等类之虚假和不稳定，别方仍旧会维持对国民党的幻想。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领导工人阶级，有坚决明显的对于战争的态度，能使工人阶级能为农民小资产阶级反对战争的领袖。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更不用说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内，都不是机械的分化清楚的。德国一九一八年革命之后，列宁尚且说：“德国民族分化为阶级了么？从此没有德国民族了么？——不然的，德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还很大呢。”我们的责任是排斥清除这种影响。中国革命失败原因之一，也就是中国工人阶级之中存在着很深的资产阶级的影响。“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之口号，必须各方面经常的认为一种中心口号在宣传，详细的通

俗解释，正是宣传，还不是鼓动。中国民众是在破产失业和“休息”“希望”的交换状态之中，这种交换的次数还多着呢？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他们，只有这种领导能保障他们反对豪绅资产阶级之联合统治的胜利。无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阶级意识，及其艰苦坚决的斗争是准备武装暴动的第一前提。要在这个方向之下的争取群众是总的路线。

（三）

至于“官僚买办”的问题，如果由我上面叙述之中看来，可以不用多所解释。误会大概是由术语的关系。

一、我所称为“官僚的买办阶级”是专指盛宣怀式的官僚——满清士大夫的统治阶级，及其变化的代办帝国主义所经营的铁路、矿山、邮电，外债押款等的官僚，外国文的术语，是国家性的买办。袁世凯以来的北京政府，是继续这种统治。

二、国民党的消灭北京政府——正统政府，就是豪绅资产阶级夺取这一正统。官僚的买办阶级之消灭，简直是自然崩溃的，因为他的经济基础是没有了，他自身蜕化了。张作霖时代的北京政府，已经是相当的换了性质。至于新的豪绅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当然从新要来接任——接这国家买办的任务。这两种国家买办的区别，在于盛宣怀是“由绅而商”的，宋子文却是“由商而绅”的。美国帝国主义所以特别在现在能影响南京政府，不是偶然的。

三、至于狭义的买办——上海十里洋场上的买办，汉口、广州、天津等等“经商”的陈廉伯式的买办，以前就多分趋向于霸占地方市场的，现在还是地方性质较重，所以桂系一类的

豪绅地主是与这种买办相密接联合的。

我的本意，决不是说现在就没有买办了。这是很明显的。不过中国最近五十年历史的研究，要求我们深切的了解“官僚的买办阶级”的意义，例如解释陈廉伯、冯自由以至张继等之反对北京政府是甚么理由。国民党叛变之后的仍非消灭北京政府不可的原因。

（四）

汪精卫、陈公博的问题，是很有趣的问题。你既承认北伐完成之后的南京政府——五院政府，仍是封建豪绅占着优势，既承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而参加了这一政权，他仍是受逼迫的状态，他不得不与封建豪绅冲突，那么，很容易明白：汪陈改组派是他政治上的工具。汪陈改组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上层小资产阶级）是很明白的。重要的是他们很像理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实则现实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参加着政权，已经有“自己的”力量和方法在发展生长到与帝国主义（美国式的）相适应的道路。这道路是战争、饥荒……是工农群众之大大破产、穷困、失业，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受榨取，是店东小资产阶级——“穷绅士”的大半“堕落”。汪陈与施存统之类东西，便一方表示努力替资产阶级“设法”改良其道路，为之摇旗呐喊以反封建，别方客观上代表这些“堕落者”之呼声，说甚么民权斗争，说甚么“以民众为重要”，“不要民生，也就不革命了”等等。他们这些派别的活动，一方面是表现客观上革命危机是在生长，别方面要求无产阶级之坚决努力的斗争以争取群众。

理想的民族资产阶级会“要求”改良农民生活等等……，

而实际上中国没有这样的民族资产阶级。一九二五——二七的经验是如何呢？土地革命与资产阶级在中国是这么样的两件宝贝，他俩个完全是为要当夜谋杀亲夫而结婚的！

（五）

最后，反帝斗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我是引国际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这是指着一般的革命总前途的问题。至于党的工作方面，自然反帝运动是会有单独的。但是，讲到前途问题和总的革命估量问题，便绝对不能说：不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并解放农民于异常苛刻的租税之下，而能解放中国。"反帝斗争，决不能和力争土地的斗争分开"。国际第六次大会时，美国党的右派彼彼尔（现在快要开除了）便反对这一句话。大会将他骂了一大顿。我的结论，是指出这是脱落茨基的关税革命论。同时，这也是以前联合战线应用时，错误之最大根源。这有党纲上战线上的总意义。这必须详细的解释成为一般党员及工人群众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共同认识。史太林为着这句话，曾特别写信到国际第六次大会的政治委员会里。

*　　　　*　　　　*

写着太多了，下次再详说吧。我那篇文章原意是要综合两次大会的结论与议决而加以解释，但是写出了太简单大匆忙的东西。可以不登载，不发表。这封信也是和你闲谈。党内政治上的问题是有许多许多理论上实际上需要解决的。要十分的努力和研究，要教育和宣传。我们人力是如此之少呵！

元宝如何？代我致意。华[2]现在只自力读俄文。我俩的身体都不好。尽此天年总觉时日之不足。兆征[3]之死真使人魂

堕。愿你珍重。不尽不尽。

秋　白

一九二九年四月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刊印。

注　释

〔1〕 指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

〔2〕 即杨之华，瞿秋白夫人。

〔3〕 即苏兆征。

PDG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

中央：

二月七日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攻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地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

---

* 这封信是毛泽东起草的。

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人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分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

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1]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汉，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非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概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

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2]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

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3]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会到来。在这种时局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二省中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湘省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然郭旅已被击破，陈国辉卢兴邦二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亦未打过仗，战力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二团好的，且五部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二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则差得多，其中一大半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一旅之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二，三省党的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明了外，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

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的红军独立第三团[4]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我们三月十四日到汀州，战败郭旅，打死郭凤鸣，始知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因此，我们不下杭、永，也不去龙岩，在汀工作十七日，于四月一日开到瑞金，定四月八日进占于都，到于都当召集一扩大会，与赣南特委与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同志等讨论行动计划。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单独站不住，现随军来到瑞金。政权机关开始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会、农会各组织了几个之后，即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正式革命委员会。临时与正式的革委都发布政纲。到瑞金规定四天工作计划，把部队分散到县城、壬田市、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挥机关在县

城。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可惜以前全无组织，一个同志都没有，无本地领导，组织工作仓卒，难做得好，特别是县城。到于都后大约有一星期在县城及四郊工作，以后或向宁都、广昌，或向万安、泰和，看情形决定。赣南游击一个时期，再赴闽西，那时须与郭凤鸣残部及卢兴邦、陈国辉战，福建省委须努力准备。

军中状况，四军除小部分留边界外，大部分出来的计三千六百人，一千一百枪，在大余、信丰、寻乌损失约二百支枪，六百个人（多数是作战时失联络，真正被敌人拿去的不过几十枪，一百多人）。报纸所载那些骇人的消息，都是敌人欺骗的话。宁都汀州二战之后，不但恢复原状，而且增长了些。全军现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纵队，每纵队辖二支队（等于营），每支队辖三大队（等于连），每纵队约枪五百余支，千二百余人。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集合都很便利。彭德怀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冈山者八百人、枪五百支，此次到瑞金者六百人四百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政治部已设立，军设军政治部，每纵队设纵队政治部。政治部内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分职工、农民、特务三股）、政治保卫科。支队大队两级设党代表。纵队以上废除党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赣东黎川方面（与广昌接近）有两个部队想来接头，一是金汉鼎部下反叛出来的五百多人，三百多枪，现编为第四纵队，纵队长田桂清；一是土匪军三百多人，二百多枪，到处被打无出路，现编为独立营，胡竹笙为营长。此两部约定四月十四日后开到宁都编就训练。江西红军

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络很好。湘赣边界遭一度破败之后，现必到了恢复的机会，那边除王佐部二百支枪系属红军第四军外，宁永莲遂酃茶六县赤卫队共八百枪，在军阀混战无力顾及的时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发展，彭同志率部回去，当更有办法。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邓乾元同志。湘南自去年三月暴动失败之后，党的基础在盲动主义之下完全毁灭，农军武装也被豪绅缴去，群众都被镇压下去了。去年八月红军攻郴，在资兴、汝城、桂东组织三个县委，三个农民武装的赤卫队，另组织一特委统辖之，杜修经为书记。近接报告，他们又在盲动主义之下牺牲了。醴陵去春暴动后，党的组织打破，武装消灭之后，夏季又向四军领去七十支枪，秋季全部覆灭于攸、醴交界之皇图岭，此足见少数武装单独存在之不易。

红军党的指导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来信云：关于前敌指导机关，中央视为有组织委员会之必要，委员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委员会，前委之工人同志为书记，一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军委及工委名单由前委决定。所有管辖的范围，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为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受湖南省委指导。主管的省委，接到前委的报告须立即回答，并将前委的报告及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我们对中央这种组织的指示，视为十分适当，合于斗争的需要。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湘南及湘赣边界，多次地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

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

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讨论割据问题及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湖南省委转中央，原稿已失。一个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5]，历史地叙述湘赣边界斗争的经过及割据问题政策计划等，由湘赣二省委付上，此信原稿尚存，特重写付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一个是三月二十日前委在长汀发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未知能达到否？今亦重新寄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响》第二期。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前　委

一九二九、四、五于瑞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郭凤鸣、刘士毅。

〔2〕 指叶挺、贺龙。
〔3〕 指蒋介石。
〔4〕 似应为独立第一团。
〔5〕 即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PDG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

润之同志：

杨□□□□□□□□□□□□宜□□□□□□中大概情形很为快慰。中央在不久以前，曾托湘、赣、粤、闽四个省委[1]你们收到□□。最近以来，在敌人以及在你们的形势上，都又发生□□□□□□□□□□□□□的□□□□。首先向你们叙述现在全国军阀战争的形势。

一、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三大矛盾——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买办的矛盾——中国军阀制度内部的矛盾——这次军阀战争并不是最后一次的战争——资产阶级的策略是要使战争缩小——

关于现在军阀战争的形势，中央在三十三号通告中曾有详细的指明。这次战争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军事上的冲突，乃有其社会经济的必然发生的客观原因。这次战争最主要的表示着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之三大矛盾，战争是这三大矛盾的结果。这三大矛盾不消灭，中国的军阀战争便也不会中止。第一，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主要的是英日美三帝国主义之相互的

矛盾。美国想扩张其在中国之财政资本的统治，利用中国丰富的原料与贱价的劳力来与英日的商品竞争。英日势力在美国进攻的前面虽然有了合作的可能，但到现在还没有具体的实现，现在仍然保持着英日美三帝国主义之相互的三角冲突。蒋[2]系与美国势力的勾结在现在成为很明显的事实。自然，蒋系现在不只是单纯的依靠着美帝国主义，他同时既不敢直接得罪英帝国主义，也不敢得罪日帝国主义，最近且又对日帝国主义做了很多可耻的投降。不过蒋系既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则他的发展终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前提，所以英帝国主义不得不嗾使桂系来阻碍他的发展。日帝国主义一向是阻碍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虽说他目前由中国资产阶级那里新得了许多大批的利益特别是济案的解决，故在目前还没有看见他很积极的用全力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行动，但胶东战争到现在还没有完全了结，且他终久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展的最有力的一个。这些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是现在中国军阀战争的主要动力，军阀战争之背后的嗾使者是帝国主义。

第二个矛盾是中国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买办争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这种斗争在过去南京政府之许多政治活动中都很明显的表示出来。湖南事变发生之后，蒋系所标示的旗帜是“统一”，桂系的旗帜以前是“政治分会”，现在又是什么“护党军政府”。但无论如何，蒋系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桂系是豪绅地主买办的□□□□□□无疑义的。这两派的斗争过去在裁兵、裁厘、统一外交各问题上，都很明白的表现出来。不过蒋系所□□□□持的，决不是什么彻底的推倒封建势力，乃是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使豪绅地主买办相当的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

第三个[3]是军阀争地盘的斗争□□。中国军阀制度不仅

是中国封建地主买办之政治势力[4]同样□要依靠着他。中国资产阶级不但不能根本推倒军阀制度，并且他不得不利用□□□□ □□□□□□□□□□□□□ 豪绅地主买办的□□——进攻的时候，他更不得不利用另一部分的豪绅地主，利用封建势力内部的破裂，利用军阀制度的矛盾，来扩张他的势力。所以这次战争中，仍然有许多豪绅地主的小军阀追随着蒋系资产阶级，来进行其抢夺地盘的斗争。

以上这三个矛盾是现在军阀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这三个矛盾不消除，中国军阀战争便不会消灭。这一次战争是资产阶级利用一部分军阀反对另一部分军阀的战争，所以并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战争。这次战争无论成为如何的结果，无论蒋系胜利或是桂系胜利，不但谈不上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并且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问题也不会解决。无论任何军阀胜利，都不能消灭中国的军阀制度，不能消灭中国之割据的局面。这次军阀战争更不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军阀战争，军阀战争的形势在革命没胜利之前永远的不会消灭。这一次的战争，无条件的是反革命的军阀战争。

但是资产阶级因为自己之经济利益的关系，他不愿战争的扩大与延长。资产阶级有利于虚伪的和平；在虚伪和平的局面下来逐渐的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分化中国封建地主的势力。湖南事变是桂系军阀对资产阶级的反攻，使资产阶级走到只有用兵才能挽救被攻而扩大于自己有利的局面。但资产阶级之主要的策略路线，直到现在还是尽量想使战争的范围缩小，使战争迅速解决，因为这样对于资产阶级特别有利。国民政府对桂系下讨伐令的时候，先只提到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而暂不提到黄绍竑，并派黄绍竑为广西编遣特派员，以观向背动静。对于桂系所属下的小军阀也同样是采取分化与拉拢的策

略，以使战争的范围尽量缩小可以在局部的范围内，很迅速的去解决。这就是资产阶级之一贯的策略。

二、军阀战争开始以后的形势

——蒋系分裂桂系的成绩——蒋系的军事布置——桂系的军事布置——何键的态度——冯玉祥的态度——桂系的弱点——将来战争变化的前途——

蒋桂系的军阀战争于三月二十六号正式开始，以前已经有了“非正式的”接触。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蒋系的策略便是尽量使战争的范围缩小，使桂系内部破裂，这种政策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绩。派黄绍竑为广西编遣特派员的命令，虽然对黄绍竑没有发生直接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的手腕，使陈济棠、陈铭枢、陈策联合在广东举起“服从中央”、“反对战争”的旗帜，已经给桂系在军事上一个□□的打击。广东是否能不直接参加战争的漩涡，到现在虽还不能作最后之判断，但目前桂系已将□□□□□的军队大部分调离□□集中湘、赣、桂边界而与广东先讲协助军饷的条件。□□□□□□□□□□□□□的战略因何键的不附已而退守鄂湘西南与贵州联成西南固守的局面，则□□□□□□□□□桂系或不□□□挑起广东的战争。反之，广东内部如有裂痕，如有隙可乘，则桂系□能□□□□□□□□广东便终不能逃出战争的漩涡。

现在直接参加战争的是鄂、湘、皖、赣四省。目前军事上的中心是武汉失守在湖南的战略问题，现在蒋系的军队由安徽麻城、罗田一带进攻的夏斗寅、顾祝同、朱绍良、蒋鼎文、徐源泉等师，现在夏、蒋、顾三师已到了武汉，且夏师已向汉川

跟桂军之踪前进。沿江西由长江北岸而上的有刘崎、方鼎英、曹万顺、方策等师，现刘、方两师已抵汉口，其他各师正向截断粤汉线的方向前进。这次战争中同样还用了海军的力量，首先到达武汉的蒋师便借着海军的掩护。自然海军在他的本身的利益上也只有依附蒋系，才能在虚伪的统一局面下求他的海军统一。

这两路军可称蒋系“自己”的军队，一是由朱培德指挥，另一路是由刘峙指挥。名义上还有所谓第二路的“讨逆军”，乃是冯玉祥由河南所派来夺取武汉地盘的韩复榘。韩军可惜来晚了一步，也不知是基督将军故意教他这样的不是，现在集中兵力在孝感，未放一枪，坐视局势的变化。

桂系军队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便集中于罗田、黄梅、武穴一带。在前线作战之主要的势力为夏威之十五师、陶钧之十七师及叶祺之五十二师。程汝怀之五十五师守武汉，胡宗铎之十六师守武长线，从罗田、黄梅、武穴相继败后，桂系内部大起变化。胡陶所领之部队多为刘佐龙部队，极动摇，胡陶乃辞职，夏威师李明瑞旅亦受蒋系收买，程汝怀部队本非桂之嫡系，而武汉又不能坚守，故蒋系军乃得长驱直入。现桂系军队在汉者胡陶所部被蒋改编，李明瑞及程汝怀倒戈，随桂系退去的分两路，一向鄂西，一由武长线。故目前的主要关键乃在湖南。

何键的态度在报纸上到现在还没有的确的消息。蒋与桂系都各自宣传其为自己方面的人。何氏至少已是一个态度不明想乘风转舵的人。且何氏便只表示一个中立，已经对桂系是很大的打击。不过无论蒋桂两系那方胜，何键总不能保全独霸湖南的局面。故他现时的态度，一方宣传保持和平，一方又让桂军入境，显然是两面讨好的办法。假使桂系不能将何键拉到自己方面，则蒋桂两系决胜负之战很难再在武长线上见面。何不附桂，桂必以保全实力准备再举的战略为目前的出路。但湘西南

与广西非富有，如何容得如许大兵？故其在鄂西湘南之兵未必立撤，改头换面的队伍里又未必无桂系余孽，广东的富源亦终不能忘怀。是以桂系虽有武汉之失、湘粤之变，目前还不能说他已经失败到底；至广西军队内部团结如何倒是一个关键。这正是说战争的未来还要有几多变化。

冯玉祥的态度表面上是恍恍忽忽，实质上却自有其攫取地盘的计划。冯氏开始将自己的兵力一面集中到信阳，另一方面也集中一部自陇海路之东□□。蒋系失败，则冯玉祥很快的沿津浦路取得南京。现在桂系接连失败，所以□□□□□□□□的态度□□渐明显。现在蒋先取得武汉，而冯又集中兵力于孝感，这也许是计。

□□□□□□□□□□，立刻表现其内部的弱点，最大的弱点就是态度不一致。不但其内部的小军阀不一致，就是李宗仁、李济深、胡宗铎们虽然都是反蒋，但是其所取的策略却都不一致。两广照说是桂系的根据地，然而一动则广东便几乎完全倒台。何键的态度照现在说对桂系总是不利的。这种步伐不一致的状态，又加以没有政治上的口号，所以庞大的桂系将来或者会很容易的走到失败。代替桂系而与蒋系抗衡的，或者就是将来的冯玉祥罢！

现在的战争形势大概是如此。自然，当着这封信走到你们那里的时候，这种战事的形势当然又是另外的一样。

三、军阀战争与革命高潮

——军阀战争是统治阶级的危机，但并不是他崩溃的前夜——没有军阀战争并不即是统治阶级的稳定——军阀战争本身不是革命高潮——军阀战争可以促成将来的革命高潮——革

命高潮不一定要等着军阀战争——

军阀战争表现着统治阶级内部的危机，表现着统治阶级不能巩固其政治上的统治。但这并不是说军阀战争一定就是统治阶级崩溃的前夜，也并不一定是革命高潮的开始。军阀战争客观上应当是助长革命发展的一个条件，但他本身并不是革命的高潮。军阀战争可以给与许多发展群众斗争的机会，可以增加我们党夺取群众的机会，因此，它是促进革命高潮的一个条件。因为你们那里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不正确的认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你们特别指明。

你们那里有同志以为，有军阀战争就一定表示着统治阶级将要很迅速的崩溃，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由于另一种错误推演下来的，就是以为“没有军阀战争便是统治阶级暂时的稳定”。对于这两种观点，我们都需要有比较详细的解释。

统治阶级的稳定与否，不是看他目前发生战争与否，而是要看他在政治——尤其是在经济上是否有巩固或发展的前途，看统治阶级内部所保存的矛盾是否可以逐渐的消灭或缓和。若是统治阶级在经济上不能巩固，政治上不能免除自己内部的矛盾，则即使目下没有革命的高潮，目下没有军阀战争的爆发，也仍是不能算什么政权的稳定。

我们在开始所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三个矛盾，此外再加以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我们断定在现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是绝对不能有所解决，因此，即使他不爆发军阀战争，我们仍是不能说他稳定。在蒋桂战争以前，在编遣会议以前，统治阶级保持那一种虚伪和平的局面，我们能否说他是“稳定”、“相当稳定”或“暂时稳定”呢？不能的，都不能的。因为在当时虽然没有军阀战争的爆发，但是统治阶级既没有解决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又没有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冲突。统治阶级当时的□□□既不□消灭这种冲突，又不足以使这种冲突缓和到一个比较远的时期，乃是准备□□□□□□□□矛盾的□□□□。这一种局面我们只能说他是一种走向崩溃的局面，谈不上是一种什么“稳定”。

□□□□□□□□□□□□□□是否一定就是统治阶级崩溃的前夜呢？不一定的。战争有时可以引起统治阶级的崩溃，但这并不是必然的规律。在中国现□□□□的这种军阀战争中，我们还看不见可以立刻使统治阶级崩溃的条件，目前战争还不一定会扩大到全国的范围，不一定会延长到很长久的时日，还不会立刻引起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所以我们还不能说现在就是统治阶级崩溃的前夜。但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将因此而更加紧，反动的统治在许多地方将要因此而发生危机、动摇，革命民众在军阀战争中对统治阶级将要有进一步的认识，革命民众的斗争情绪将要因此而比较壮大，这就是说这次战争是促进将来革命高潮来到的条件之一。所以即使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后，统治阶级的前途仍然是走向崩溃的局面。

战争发生之后，可以打破群众对国民党之许多幻想。军事的骚扰，战款的负担，经济的紊乱，处处可以增加群众的不满，增加群众斗争的机会，增加群众对于我们政纲的认识，所以军阀战争一定是助长革命高潮之一个条件。但军阀战争的本身并不即是革命的高潮。没有群众的高潮、组织力量斗争力量的壮大，尤其是没有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绝对谈不上革命的高潮。现在还没有革命的高潮，我们的任务乃是要利用现在的机会来扩大群众的力量，以促成革命的高潮。

若是群众的力量果然成熟了，则即使没有军阀的战争也是会有革命的高潮，不要将军阀战争看成革命高潮之唯一的条

件。过去“五卅”所引起的革命高潮，并不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中产生的。并且，军阀战争的机会以后仍然是有的，这一次并不是最后的军阀战争，我们只要能继续不断地发动群众斗争，扩大我们在群众中的领导，时时都有统治阶级的危机可乘。这一次的军阀战争虽然还不会立刻引起革命的高潮，还不是统治阶级立刻崩溃的前夜，但若是我们的工作做得适当，则他一定要成为促进将来高潮的条件之一，促动统治阶级崩溃的条件之一。

四、你们在现在军阀战争中的主要任务

——扩大游击战争的范围——发动农民的武装斗争——扩大农民群众的武装——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对我们政纲的宣传工作——宣传军阀战争的罪恶——补充实力扩大武装——

军阀战争虽然还不是革命高潮，但他的确是便利我们工作发展和政治影响扩大的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党在全国的任务，是要动员群众反对军阀战争，发展群众之一切大的与小的斗争，领导群众一切自发的武装斗争，在斗争中组织群众夺取群众，特别要注意与反战争的宣传和斗争联系起来。战争并没有改变□□□□□的幻想，提高农民之斗争的任务。现在在你们这里也是这样。

□□□□农民一切接触的时候，都□□□的前夜，还不会立刻引起革命的高潮，故我们对于红军的策略，也不能主张在[5]市发动□□省□的城市暴动。同时又因为目前统治阶级决没有□□□□□□□□□□定□□□□□□□□□□遥遥无期，故我们也不能主张将红军解散，完全散入农民群众中去，

□□□□□□□□□□暴动的时期对红军主要策略还是游击战争，自然大队伍的红军，在游击的意义上说也是□□□□□的——□□□没有时也要占领城市成立城市苏维埃，但这一占领，在主要的工业城市还没有以武装暴动领导起来之先，总不免要流于失败，故就其性质上说仍然是游击战争。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展农民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是红军目前的总任务。

在统治阶级严厉的白色恐怖下面，忽然逢着了军阀战争的爆发，在农村中特别在受你们影响的农村中，一定会爆发许多武装的斗争，我们一定要尽量利用农村中之这些斗争的机会，来发展农村中的武装斗争，扩大农民的武装。在全国范围内，我们还没有总暴动的局面，但是若遇着农村中之自发的武装暴动，则我们却无条件的应该领导这种运动，帮助他的发展。因为只有我们的领导，才可以使这种斗争带着更高的组织性与更深刻的阶级意识，才使他能走入正确的道路而尽量的取得发展的机会。我们要领导这些斗争，才能更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实现我们夺取群众的任务。在每一次的斗争中，我们一定要记着武装农民尤其是在业的贫农与雇农，只有在业农民的武装，才算造成了武装力量之真实的群众基础，不要使在业农民将武装看成他以外的力量，甚至于不能使他只看成是一个帮助他的力量，而要使他看成是自己的力量。扩大农村的武装斗争，建立农民的武装，这就是你们现在的第一个任务。

在你们所走到的每一个地方，在你们所发动的每一个斗争，你们要尽量使他发展扩大，使他走到土地革命的意义上去。你们应坚决的在农村中执行我们党之土地革命的政纲，要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推倒豪绅地主在农村中的统治，反抗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夺。不纳租、不完税、不还债，应当成为

你们鼓动农民发展斗争的主要口号。只有土地革命的深入，才能动员最广大的农村群众，才能扩大你们在一切农民群众的影响。只有彻底的土地革命，才能肃清豪绅地主在当地的统治，才能使广大的农民群众都热烈的拥护你们。不要迟疑观望，要无条件的迅速的执行我们之土地革命的政纲，这就是你们在现在之第二个主要任务。

你们不仅是一个武装的游击队，并且要成一个武装的宣传队。你们在一路所经过的地方，应该特别注意扩大我们的宣传，在宣传上增高我们的政治影响，使一切政治口号能与群众日常生活日常斗争联系起来。在现在，你们要以反对军阀战争的口号作为宣传的中心，要尽量在农村中暴露国民党的罪恶，揭破农□□□□但是他却加紧了我们斗争的勇气。我们党的十大政纲尤其是土地革命的政纲，要使着每一个农民都知道，这次战争还不是统治阶级立□□□□是你们对农民宣传的时候，你们所统率的红军，不仅要使他们都是英勇的□□□□□□□□□□□□□□□□□己的□□动员。扩大宣传工作，你们要将他认为一个主要的政治工作。

□□□□□□□□□□□□□□□□的时候，的确你们现在需要补充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武装，整顿自己的队伍，□□□□□□□□□□□□□□□□□无产阶级的观点上看，从游击战争中扩大红军的武装，是于将来城市暴动非常有利的事，故若有□□□□□敌人枪械的机会，自然你们要尽量的利用。不过在有了这种机会的时候，假使为客观环境所允许，最好也要动员农民群众共同的去夺取，而不是你们单独的自己去夺取，这既可以扩大农民的武装，又可以提高农民斗争的情绪。总之，补充实力，扩大武装，加紧政治工作，是你们现在的第四个主要任务。

我们对于你们任务所要特殊指出的就是这些。

五、现在斗争中的策略问题

——不要轻于到接近海口的地方——不要孤守一处——要准备敌人的围攻——要时时准备有组织的分散到农民中去——要使我们的武装变成农民的武装——要注意城市贫民的利益——要加紧在敌人军队中的工作——

关于你们现在斗争的策略问题，中央有以下的意见。

第一，你们现在游击的路线是在闽、赣、粤交界一带。在地理上说，这一带虽也是山路崎岖，但在交通上并不是怎样闭塞，但你们若仍以井冈山两不管（湘赣互相推诿）的观察来断定比三不管的地方更好过两不管，不一定便正确。自然，在现在军阀战争进行的时候，敌人反对我们虽然一致，而军事上总有些不能解决的矛盾，现在所谓围攻总还多少是带有许多宣传恐吓的性质。但是在这战争爆发过程中，摆在你们面前的出路约有三条：一是仍回向赣南发展，这里敌人因有战争关系有些县份要比较空虚，但农民斗争却也不甚发展；二是向闽西前进，这里农民斗争有些发展，如永定、平和，但敌人必出死力与你们争夺，因为是他的饷源所在；三是东江，在那里，徐景唐的兵力仍集中在兴宁、梅县、五华与老隆，农民运动的发展则在五华、丰顺、东来。这三条路究应向哪一方向发展，实际情形究如何，还应由你们决定。但我们要告诉你们的，便是在现在全国以至全省都还没有总暴动的局面，你们应鉴于贺叶[6]军及海陆丰红军失败的往迹，切勿轻于到接近海口的地方。切实点说，在目前也还无先取海口的必要。

第二，你们同时也不宜于困守某一个地方。据说你们有折回罗霄山的意思，不知是否确实。我们认为孤守罗霄山□□□□□□□□军事上都是不利的，不独是罗霄山，无论任何地方，将队伍集中到那里而孤守着，一方面使自己的活□□□□□□□□□□，另一方面使敌人□□□□□□□□来可以使给养□□发生很大的恐慌。无论这次军阀战争继续的时间有[7]游动以疲劳敌人，而不利于集中一处以便利敌人的包围。另[8]以扩大。

□□□□□□□□□□□□□□□□□□量时时准备有组织的分开，最好能使我们的武装变成农民自己的武装，□□□□国民党反对我们的斗争，成为直接反对农民的斗争。脱离与群众的联系，变成群众以外的力量，这是我们红军之最大的危险。我们只有当着分成小队而隐藏于群众之内的时候，才能发展农民的斗争，取得农民的拥护，进可以围攻敌人，退可以藏于农民之中。军阀战争现在还在继续，但我们要准备着他或者很快的结束，要准备敌人之真正的包围。我们所谓分散于农民群众中的策略，决不是无条件的解散，更不是取消彼此间之统一、联系，乃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将我们的队伍取得农民的掩护，与农民联成一片，变成农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使我们现在的兵士同时又为农民武装斗争中的领袖，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策略。固然这一策略，你们现在闽南的地方还不甚适用，因为红军中多是湘赣籍的农民，在闽南因言语不通很难分开组织与农民联成一片，但这一原则你们必须坚信。海陆丰过去的红军虽遭那样大的失败还能存身，便因为他们与农民联成一片而队伍又能分开组织。你们必须时时准备有组织的分开，有联系的游击。

第四，在你们一切的军事进攻中，你们要注意不妨碍城市

贫民的利益，要使我们能得着城市贫民的拥护。这不仅于所在地的店员、手工业工人、贫民有关，其影响且将及于他县的贫民而扩大我们政治的影响，不至再认红军为专门杀人放火的红军。小手工业者、小商人、苦力，这都是一切小城市中之广大的群众，要注意他们的利益。我们之一切饷粮给养的筹集，应当绝对的以豪绅地主富户为对象，绝不要违反城市贫民的利益。且从经济的观点上看，也只有不妨碍城市贫民的利益，农民对城市贸易才能继续，红军对境外的采办才有人去疏通。

第五，你们要特别注意在敌人兵士中的工作，要派人到他们军队内部组织秘密的小组，扩大在兵士中之土地革命的宣传。中国军阀制度已走到崩溃的途中，雇佣兵士的哗变时常可以发生，但没有我们的领导，他们仍然走到不正确的道路上去。我们要特别注意他们中间的工作，且须鼓动广大农民去接近敌人兵士，去鼓动宣传敌人兵士，以动摇军心，领导其倒戈哗变，走入土地革命的队伍。

第六，你们自己的队伍很多是改编过来的军队，你们必须注意在初改编时必须分散其原有编制，插入主力军内，相当的调动其军官施以训练，更对全队加紧政治工作。且须更认清在我们主力军不足以控制的时候，不要编得太多的杂色队伍。土匪队伍固然可以为农民斗争用，但亦可以妨害土地革命之深入与动摇红军的观念[9]有相机解决的决心。

□□□□□□□□□□封信上，我们[10]润之、玉阶[11]两同志出来，到现在在原则上我们仍然继续这一个意见。不□□□□□□□□□□□，你们两人若立刻出来，自然对于工作是有妨碍的。但是我们仍为在原则上你们应当努力多造□军队中的干部，注意军队中指挥人才的训练。润之、玉阶应当积极的准

备代替自己的干部，使自己□□一旦走后而工作不受影响，这希望润之、玉阶以及全体前委同志特别注意的。

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了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去工作。因为中央对于你们那里的情形也觉得有许多不完全明了，你们一定有许多需要与中央讨论的问题，你们若能派一个得力同志前来，这是中央所非常盼望的。

中　央

四月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原件此处缺十几个字。

〔2〕 指蒋介石。

〔3〕 原件此处缺十几个字。

〔4〕 原件此处缺十几个字。

〔5〕 原件此处缺二十多字。

〔6〕 指贺龙、叶挺。

〔7〕 原件此处缺二十多字。

〔8〕 原件此处缺二十多字。

〔9〕 原件此处缺二十多字。

〔10〕 原件此处缺三十多字。

〔11〕 即朱德。

PDG

中央通告第三十四号

——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方针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

一、战争的性质与动力

在三十三号通告中已经指出军阀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统治，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争夺反革命的领导权，和军阀抢夺地盘的争斗。三大矛盾的一齐爆发，而帝国主义相互的矛盾更是最主要的动力，所以这一次战争完全是反革命的战争。现在同志中对于此次战争的分析，发生两种错误的观念：

第一，以为“蒋桂系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拥护蒋介石的路线上去。这个观念错误的来源：第一，不明了战争的主要动力是帝国主义，同时还有军阀的作用。蒋介石固然代表资产阶级的倾向，但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同时他本身还是军阀，所以蒋介石决不等于资产阶级。第二，不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中国资产阶级本身还带有封建的剥削，所以他不仅不能彻底驱逐帝国主义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且不愿。他

只能在依靠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之下来求得自己的发展。固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他太厉害的时候，他们要相当的要求帝国主义的让步，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但是他只能妥协帝国主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来反对封建势力。他的政纲，只是“二五减租”，而反对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便是妥协封建势力的政纲；仅是“关税自主”（实际上只是关税协定），“修改不平等条约”，而反对“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银行企业”和“不还外债”，便是妥协帝国主义的政纲。他只是为妥协封建势力的政纲而反对封建势力，为妥协帝国主义的政纲而反对帝国主义，所以他的企图适足以延长封建势力的剥削，延长帝国主义的统治，这就是民族改良主义的特质，这就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是民主势力的代表，而是反民主势力的最好的工具；因之这次战争，并不是甚么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没有一丝一毫的革命的意义。

第二，以为此次战争主要的动力是军阀，就是军阀的作用还超过帝国主义和阶级作用之上；这样在策略上可以使我们忽视帝国主义和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这个错误的来源：第一，不明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势力之伟大，无论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上，帝国主义都占着统治的地位。任何一个军阀，任何一个反动的阶级，都没有离开帝国主义而独立生存发展的可能，都只能在一个帝国主义支配之下来企图谋自己的利益。所以各个军阀相互的冲突，资产阶级和买办地主阶级相互的冲突，主要的推动力，是由于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中国的统治。桂系没有英帝国主义的靠山，固然不能打仗；蒋介石没有美帝国主义的大刀，一样的毫无办法。所以这次战争，很明显的帝国主义是主要的动力。第二，不明了中国军阀制度基础根本

是建立在阶级关系之上。他经过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以后，已更加动摇崩溃，已有些军阀转成代表资产阶级倾向的武装工具；因此更要依附于帝国主义，同时也就更要依附于各自所代表的剥削阶级；而两个统治阶级也正极力利用军阀的冲突来加紧他们阶级的冲突。尤其是已转到代表资产阶级倾向的军阀，他更要减弱他的故有的军阀性，而接受资产阶级的意志，因为军阀的封建性与资产阶级的倾向是有很大的矛盾的，如果不减弱他的军阀性决不能做资产阶级的工具。如蒋介石他的军队的基础还是与其他军阀一样，但是的确经过资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尤其是中下级干部。如果没有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便无法团结他自己的军队；如果蒋介石的行为，完全违反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他的军队便也一样子为其他军阀军队有更易于分裂瓦解的可能。所以此次战争之主要动力是帝国主义，而阶级矛盾的作用也就要超过军阀制度本身冲突的作用。我们必须认清这次战争的动力，认识这次战争的反革命性，然后才能正确的认识和运用党的路线与策略。

二、战争的形势与前途

中央在六十五号通告上已经指出统治阶级将革命势力镇压下去以后，他们内部的矛盾——帝国主义间相互的矛盾，资产阶级和买办地主阶级矛盾，军阀争夺地盘的矛盾，又重新尖锐起来。所以济南惨案和打到北京是准备新的军阀战争的开始。以后历次的通告，都指出这些矛盾一天一天的加紧，战争惨祸不可避免的到来。从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一分析的总的原则是异常正确的。但是在三十号和三十三号通告上有两个

错误：

第一，以编遣会议，在两派互让之下得到暂时的妥协，并且资产阶级又得到了一点新的胜利，所以战争的根本的矛盾虽未解决，的确延长了战争的准备时期，而没有指出这一根本的矛盾更加紧张。其实正因为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既然又得到一点新的胜利，政治影响更加扩大，当然使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更加恐慌，而更要加紧军事的准备，因此两派的冲突要更加厉害，而战争的危机也就日益迫切。加以军阀的作用和蒋介石本身还带军阀性更易于促进战争爆发。当时仅注意了资产阶级主观的要求，而忽视了这一政治形势的变动和军阀对于战争的加紧作用，所以得出了这一不正确的结论。

第二，在三十三号通告上，曾有湖南事变使军阀战争的危机更加紧了，但不一定马上爆发总的军阀战争的结论，这是由于机械的来判断湖南事变到底爆不爆发总的军阀战争和上面指出的忽视客观政治形势变动的原因。其实战争在哪一个事变和哪一个时间爆发，我们都无从判断，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加紧的时候，而准备也在加紧的时候，任何一个事变，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条件与不可能的条件，同时还有两派军阀的主观的作用。所以我们如果想机械的来判断，结果必然要得出一个“不一定”和“或许”的动摇的结论出来。所以适当的分析方法应该“指出统治阶级的矛盾无法妥协，战争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同时指出裁兵、裁厘、编遣会议以及湖南事变，都使战争危机日益紧迫，就是湖南事变谋到了暂时的妥协，战争仍然是要很快的爆发”。即使要指出战争爆发与不爆发，也只能在主客观的条件上指出在如何条件成熟之下便可爆发战争，在如何条件未成熟之下，便可暂时延缓战争，

但因为根本矛盾更加紧张，故战争的危机仍然是在加紧准备很快的要爆发。中央当时过于机械的来判断湖南事变是否爆发战争，因此得出这一不肯定的结论。因此在三十三号通告上对于反战争工作不免缺少积极的指示。但是这并不是总的原则的错误，而是分析方法上的缺点，这一总的原则始终是正确的。

现在战争的形势，蒋介石已经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桂系在武汉的势力已经失败。蒋介石胜利的原因：第一，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影响的扩大，因此使自己部队的统治的范围扩大，使桂系的军队更加分裂。第二，就是蒋介石进攻桂系的时候，极力妥协另一部分的封建势力，妥协日本帝国主义，使桂系的力量更加孤立（这就是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妥协封建势力决不能反对封建势力，不妥协帝国主义决不能反对帝国主义）。现在桂系军队在武汉亦已失败，湘粤的形势亦极不利于桂系，假使湘粤赣情势如便利于桂系或冯玉祥的态度有变则战争仍有继续延长的可能。就使蒋介石极力运用政治的手腕，使这次战争就此结束，但第二次的新军阀战争在不久的时间内仍然要继续的爆发。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相互的矛盾并未因此解决，而只是更加紧了。所以这次战争的结果：不是中国要比较统一，而且更加分裂。因为蒋介石决不能根本消灭桂系军阀，同时他与冯玉祥及奉系与阎系的冲突都因此要更加紧张起来，军阀割据的形势必然要表现得更加利害。第二，国民党决不会比较单纯化（单纯代表资产阶级）而是要益加分裂。因为一方面蒋介石进攻桂系的时候，妥协了另一部分的买办地主阶级，就是桂系倒了买办地主阶级的势力仍然一样包含在国民党之内不过换了另一个工具罢了。另一方面桂系和汪陈[1]派都在三全会受了打击，更要组织自己的国民党，当然要使国民党益形分裂。第

三，蒋介石胜利了，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仍不能取得中国政权上的领导，其原因：一，因为桂系虽然倒了，西山会议派（胡汉民、陈济棠等）仍然是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很好的工具，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势力扩大和南京政府中的影响增加，他可勾结冯玉祥、阎锡山等（冯阎都有勾结日本的可能）做工具，来与美国争夺南京政府的领导。所以将来帝国主义相互的矛盾和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的矛盾可以推动另外两个军阀对抗的局面。就是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中的势力加强了个人占了领导地位，仍然不能说是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取得了领导。因为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政治上既未消失，而日本的势力又增加，那么蒋介石必不能完全执行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意志，而同时要服从英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意志，这样不是蒋介石更加跑向买办地主阶级方面去表现更封建性，而发生新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军阀，就必然有新起的英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工具与他对抗。总之在反革命营垒中仍然是要表现二派互相争夺领导权的形势。二，就是蒋介石占领了南京政府的领导而且执行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策，那么，英日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更加要指使各个军阀实行割据，实行动摇南京政府的统治，这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仍然是不能取得领导。第四，这次战争决不是军阀最后的战争，而是打到北京后新军阀开始的战争。既然这次战争结果，不是更加统一而是要更加分裂，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仍然不能取得政权上的领导，不只是根本的矛盾没有消灭，就是资产阶级企图解决的问题也一点没有解决，那么，军阀战争当然要继续不断的起来。第五，改良主义欺骗的影响在短期间内更有在群众中扩大的可能，因为蒋介石此次战争既然是打起了改良主义的旗帜，在战争以后，

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当然更要加紧他的改良的宣传，加紧对于三全会改良政纲的宣传，同时群众中因为蒋介石的胜利，也易于增加对改良主义的幻想，所以改良主义的危险有在短时间增加的可能。但是改良政策的实施仍然是一样的极少可能。从上面的分析充分证明统治阶级决没有稳定的可能，而只是日益走向崩溃，只是更加促进革命的危机，而且只有革命的胜利才能驱逐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扫除军阀制度，实现真正的统一。

三、军阀战争对群众斗争的影响

在三十号通告上已经指出现在群众斗争是开始复兴的形势，但是还有很多缺点，必须我们有正确的策略和耐心难苦的工作，才能推动群众斗争更向前发展。现在军阀战争虽然不能爆发群众斗争革命的高潮，但是在客观上是帮助群众斗争发展的条件，是便利我们工作扩大的机会：

第一，军阀战争要加增广大群众的痛苦。因军阀战争而金融混乱，物价昂贵；因军阀战争而市场停滞，工厂关闭，增加失业恐慌；因军阀战争更加加紧对群众的压迫，禁止一切自由，资本家更乘机进攻，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因军阀战争，而加增捐税，摊派军饷，拉夫拉车，强占民房学校；这些都是统治阶级暴露自己的罪恶，更加使群众不满，更加使群众痛苦，必然要促起群众斗争的要求。

第二，军阀战争暴露了改良主义的欺骗。资产阶级极力宣传他的改良政纲，甚么统一、裁兵、裁厘，在过去的确增加了一般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他的幻想。现在军阀战争爆发，完全证实了他的欺骗。统一吗？虚伪的面具都揭破

了。裁兵吗？正在各自增兵，什么总指挥军长都恢复了。裁厘吗？东南五省，不是正在努力加税，便等于正式恢复厘金，且超过旧有的数目。反帝国主义吗？正式出卖了山东，来妥协日本帝国主义……这些事实上的教训，一般群众都很易于了解的。

第三，军阀战争可以增加群众斗争的勇气，减轻群众失败的情绪。过去群众失败的情绪很深，以为军阀联合的一致的压迫，甚么都没有办法，军阀战争爆发，许多群众都觉得现在好了，我们的机会又到了。固然这样的观念，可以发生盲动的精神，并且很易于回复到悲观、失望，更加消极的路上去，但的确他本身是群众情绪活跃的表现。只要我们策略正确，领导得法，很易于走上正确的斗争道路，所以军阀战争，是可以推进群众的斗争，帮助我们工作的发展。固然统治阶级要加紧戒严，加紧白色恐怖，来阻止群众的斗争；同时还要加紧改良欺骗的宣传，以缓和群众的斗争，使我们工作增加困难；但是另一方面便是更加暴露自己的罪恶，暴露自己的欺骗，使群众更易于接受我们的宣传与鼓动。特别在农村中，农民群众久受白色恐怖的痛苦，军阀战争爆发，军队调动，压迫的威力减弱，同时苛捐杂税，拉夫拉车……等的剥削和痛苦又要加重，当然要引起农民群众的斗争，并且要发生许多自发的暴动。所以军阀战争在客观上是帮助群众斗争发展的条件，是便利我们的工作发展，扩大我们政治影响来争取广大群众的机会。

四、我们的工作方针

在二十五号通告三十三号通告上，指出目前我们策略的路

线，是要在群众中加紧反战争的宣传，加紧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夺取广大群众到我们政治影响之下，来促进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潮。这一策略的路线是异常正确的，现在再将这一策略怎样应用到工作上去，加以比较详细的解释。但是这一解释，仍然只能是原则的说明，各级党部——从省委直到支部，必须配合当地的实际状况，而更加具体化，规定实际的工作出来。

第一，宣传与鼓动的口号的联系。宣传的口号是要根据党的政纲和总的路线来决定的，所以在此次反军阀战争的工作当中，必须提出“反对增加群众痛苦的军阀战争”，“军阀战争是统治阶级争夺劳苦群众的血汗制造出来的”，“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必须驱逐帝国主义”，“要得到彻底的和平必须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扫除军阀制度”，“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必须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群众自己管理的政权——工农民主共和国”……等。但是这些口号决不是机械的写一些标语去张贴，或机械的写在传单上去散发，可以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的，而是要加以比较详细的解释，尤其是要与群众的实际痛苦联系起来，无论是口头宣传或文字宣传都是一样。鼓动的口号，是要以群众的实际的要求来决定的。譬如在此项战争中的鼓动口号，应该是“战争使物价增高”，“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借口战争关闭工厂”，“反对拉夫拉车”，“反对增加捐税”，“反对禁止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等，这些口号到了各级党部，一定要使他更具体实际化，特别是支部。譬如上海兵工厂支部一定要提出“反对增加工作时间”，在劳动大学支部就要提出“反对把教育经费移作战费”，我们要注意战争直接间接给与群众的痛苦，而提出具体的口号，因为在

现在只有这些口号才能使广大群众了解而起来斗争。同时要特别注意在鼓动群众斗争的时候，尤其是在斗争的过程中，一定要加紧我们宣传口号的宣传，使其能与鼓动口号联系起来。

第二，要特别加紧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我们要指出资产阶级制造了战争，可见他们宣传甚么统一和平完全是欺骗群众，他们宣传反帝国主义，他们自己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又出卖山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宣传减捐减税，现在是增税加厘……等。他使群众渐次明了这些改良口号，完全是欺骗，永不兑现的东西，然后才能渐次走到我们的政治影响之下。并且如果在战争的时候，我们不能削弱改良主义的影响，则在战争以后，必将更有扩大的可能，因之我们更要特别注意这一工作。

第三，在宣传中要特别指出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嗾使出来的，来促进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因为日本与英国的罪恶，一般群众比较易为了解，美帝国主义的奸滑政策，是可以迷惑群众的意识，尤其是经过资产阶级欺骗的宣传。所以我们要特别指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政策，好像是吸人骨髓的狐狸精一样，比日本英国还要利害百倍。同时要指出这次战争就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瓜分中国，就是他们准备世界大战，所以我们在反对战争的工作，要注意连系到反对世界大战的宣传。

第四，要利用战争给与广大群众的痛苦来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特别是工人群众中。战争必然要直接增加群众的痛苦，同时资产阶级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加紧对工人的剥削，所以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些日常生活的问题，提出鼓动的口号来发动群众的斗争，因为在这个时候，群众的情绪必然比较活跃比较

易于发动斗争。同时特别注意在斗争中加强群众的组织，在黄色工会中更要利用斗争的机会加紧反对黄色领袖的宣传，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渐次走向我们影响之下。

第五，在农民群众中，总之策略仍然是扩大宣传，加紧领导群众的斗争，来争取广大的群众。但是在此项战争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自发的农民暴动起来，因为农民久受白色恐怖的摧残和地主的剥削，同时战争起来，军队都调到前方去了，对农民的防卫力自然减轻，那么忍受不住压迫的农民必然要在这个机会暴动起来。我们对于这样自然的农民暴动，应该极力去领导，使他更有组织，更有计划，能正确的实现群众要求的政纲，能使胜利保持延长。这样便可以扩大党的政治的影响，增进群众斗争的勇气，这就是我们争取群众的总路线上必须采取的策略。

第六，兵士群众的工作，在战争的时候，更易于发展，因为战争使兵士群众的痛苦更深，工农群众更有与兵士接触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更要加紧兵士群众中的工作，扩大兵士群众中的宣传，树立军队中的组织基础。但要注意此时我们兵士运动的目的，仍然是争取广大的兵士群众，除了在苏维埃区和农民斗争激烈的区域，我们要号召兵士叛变或携带武装回到农村中去，帮助农民斗争，其余的普遍策略都是要树立兵士中的党的基础，发动兵士的斗争，扩大兵士的组织来夺取广大兵士群众准备将来的暴动。如果普遍号召兵变，便是与总的政治路线相反的兵变主义。但是如果有兵士群众自发的兵变，我们还是要去极力领导，如果是兵士群众自动的开小差，我们当然要宣传他们携带武装回农村去。且在战争时我们要鼓动士兵不到战线上去，或躲在战壕中不开枪。

第七，苏维埃区域的策略，是要极力发动附近各地的农民

斗争，来扩大苏维埃区域，这样才可以扩大在农民群众中的土地革命的影响。同时要尽可能的扩大红军的组织，红军的力量是将来革命胜利的一个条件，所以在军阀战争的机会中，更要极力设法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扩大红军的组织。但是不应取完全集中行动的策略，而是要用分开行动统一指挥的游击战术。

第八，在一般贫苦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策略，主要是扩大我们的宣传，促进他们的斗争注意揭破资产阶级的欺骗，尤其要加紧反帝运动，使他们渐次离开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团结到我们口号之下来。

第九，反对战争是目前的中心工作，但是要特别注意在经常的中心工作当中加紧反战争的工作，就是反战争的工作是一样的要注意在城市中，尤其是工人群众中发展。如果以为反战争工作，容易在农民群众中扩大，城市工作又因军阀戒严更加困难，因此而抛弃城市工作跑到农村中去，这便是莫大的错误。

现在战争的趋势或许有告一段落的形势，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的军阀战争，仍旧是要继续不已的爆发。所以就是这次战争暂时结束，我们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和工作，还是要继续加紧，反军阀战争，是我们经常的中心口号之一。

还要特别注意，如果战争告一结束，资产阶级改良欺骗的宣传，又更要在群众中扩大，所以我们必须极力与改良的宣传斗争，指出统治阶级正在制造新的军阀战争，指出甚么裁兵、裁厘、反帝国主义，仍然是一样的欺骗的鬼话，指出不是群众革命斗争的胜利，战争的痛苦永远没有避免的可能。只有这样揭破改良宣传的欺骗性，才能使广大群众渐次明白团结到我们口号的周围。

五、党内不正确的倾向

在二十五号和三十三号通告上所指出在反战争工作中的不正确的倾向，现在党内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所以要特别加紧纠正这些错误的观念。并且现在又发现许多新的错误的观念，除在上面指出估量战争性质与前途的错误观念外还有几个策略上的错误观念：

第一，以为现在党的组织并未强大，工作尚未发展，战争来了，也是一样的做群众的日常工作，所以军阀战争与我们的工作没有甚么关系。这是异常错误的，我们要争取广大群众，就是要注意群众的日常生活的痛苦与要求来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就是一个极小的问题，如工厂中罚一个工人的工资问题，也不可轻易放过，何况这次战争给与群众这样大的痛苦，正是觉醒群众发动日常斗争的机会，正是改良主义暴露自己的欺骗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易的放过吗？这种对于反战争怠工的观念，便是十足的不动主义。

第二，看见战争来了，军阀加紧戒严，城市的工作更加困难，而农村中的压迫又比较轻减，农民斗争的情绪又比较提高，于是抛弃城市跑到农村中去，这是完全不懂得争取群众的中心工作，不懂得艰苦斗争工作的意义，这是一种躲避艰苦工作的精神，这是不明了党的总路线，结果可以使城市工作的基础完全消灭，更是一种极危险的倾向。

上面指出的两种倾向，都是极严重的右倾的错误观念，必须极严重的纠正过来。并且在这次战争暂时结束以后，改良主义的影响更在群众中扩大，反映到党里面来，更要促成党内右倾危险的发展，尤其合法运动与和平发展的倾向，所以我们要

特别注意与这些右倾的观念斗争，使党的总路线，能极正确的运用到工作的策略上去，然后才能实现我们夺取群众，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总的任务。

中　央

一九二九，四，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汪精卫、陈公博。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

边界特委：

蒋桂战争初幕虽毕，再幕三幕，必将继起。蒋介石虽入武汉，湖北问题未了，湖南问题、广东问题不久即当发生。北方冯阎[1]之争，亦是当然发生的。革命潮流逐渐上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这是必然的形势。在现时客观局势之下，在主观力量的可能之下，我们的工作仍应以江西为目标。江西我们力量的现状，赣西、赣北、赣南、赣东，各个孤立，不相联属，大区域的群众尚待发动。因此前委于四月十一日召集扩大会，决定在军阀混战中我们的政策和行动。其意义就是使各地，特别是红军有一个工作的总目标，使孤立的各地互相联属起来。兹付上一份，望讨论执行。

在全国或一省的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式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如湘南，如醴陵，如平江，如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亦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

* 这封信是毛泽东起草的。

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齐毁坏完了——即此问题亦是使群众失掉而有余。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是驱逐了，权力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却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间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了群众而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的形式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部队。由二十五支枪起手的七、九两纵队现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差不多可以抵得上四军的三十一团了。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可以从新喻买得子弹（此次补充四军七千二百发）。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团，打败过三十六旅的七十二团。他们经常的是一角五分一天的士兵伙食，从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特委的关系极密切，交通极方便，敌人是完全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的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很多的地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

因为我们和东固两种不同的经验，觉得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可以仍然是苏维埃，因为苏维埃已深入人心）。茅坪、茨坪、田西等处是例外。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因此前委决定：王营和原有五军编为四军第五纵队，王佐为纵队司令官。宁、永、莲、遂、酃、茶各县赤卫队集合起来，用一、二、三报数的方法编为四军第六纵队，贺国中为纵队司令官。游击的范围包括宁冈、永新、莲花、安福、吉安、泰和、万安、遂川、桂东、酃县、茶陵，往来驰骤，专打小敌及靖卫团。每到一地，先之以广大的宣传，继之以发散大地主

财物，然后进行组织（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协）。每到一地方，多则五天，少则一天。各县靖卫团是不能联合的，我们的赤卫队能够联合，消灭靖卫团是有把握的。分散则各不能敌各县的靖卫团，没有进取的新气象，多数地点的群众无从发动、无从组织，党的基础无从建立，地方主义的弊病又非常之大，收集起来则这些弊病都免去了。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因此，五、六两纵队都应在山下，不应在山上。两纵队都要组织政治部，何长工、曹锞两同志均可充任政治主任。纵队一级可废除党代表，支队、大队仍要党代表。

五、六两纵队，边界军委指挥之，彭德怀为书记，属于前委，在前委不能指挥期间隶属边界特委。对外由彭同志用四军副军长名义指挥之。

前　委

四月十三日于于都城

根据《党的文献》二〇〇八年第二期刊印。

注　释

〔1〕指冯玉祥、阎锡山。

PDG

中共中央关于湖北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政治形势与湖北党的任务

1. 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全国必不可免的要继续着军阀战争：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包含着许多严重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根本来源是由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势力的冲突，尤其是英日与美的冲突。各个帝国主义者都勾结一部分中国内部的政治势力，勾结中国的军阀，来巩固并扩大他的统治。美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资产阶级便于输入他的财政资本、发达交通、扩大商场以图垄断中国，于是更加紧了中国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买办争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政治影响的扩大，封建军阀的崩溃，使着一部分封建军阀很容易的受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影响利用而反对另一部分的军阀。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是要利用军阀来加紧他们的斗争，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更没有自己独立的武装，故与封建地主的冲突同样要利用军阀，于是更加紧了中国军阀制度内部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绝不能彼此调和的，蒋[1]桂战争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现在蒋系虽然已经得着了第一步的胜利，但是这些矛盾却一点也没有消灭。因此，统治阶级内部的军阀战争一定还要继续不断的发生。

PDG

2. 湖北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一个中心，更容易反映帝国主义间的斗争：湖北居于全国的中部，武汉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一个主要的对象。武汉在历史上都是英帝国主义势力比较巩固的地方，在过去桂系统治的期间以内，英帝国主义更直接经过桂系买办而得着了更进一步的巩固。桂系的失败，英帝国主义的势力并没有受着有意义的打击。蒋系资产阶级对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仍然不敢有任何直接的侵犯。美帝国主义在蒋系这一胜利以后，自然要比较以前更积极的扩张他的势力。日帝国主义侵略湖北的企图，在很早以前已经与英帝国主义结成不可调和的矛盾。桂系统治下的反日运动便是帝国主义间之这种矛盾的一个表现。湖北因为经济地位的重要，这种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是不会中止或缓和的。这种矛盾更容易推动中国的军阀而演成战争。

3. 湖北很易时常卷入军阀战争的漩涡：湖北因为在全国经济、政治及军事上都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一切反动军阀都想占据湖北地盘以作为他的基础。所以任何军阀战争爆发以后，湖北很容易的直接卷入战争的漩涡中。过去蒋桂的战争，争取武汉便是双方之一个主要的目标。现在蒋系资产阶级占领武汉以后，绝不能以为蒋系在湖北的统治已经巩固，因为在全国的范围内仍然是在制造新的军阀战争。在任何一个大的军阀战争中，湖北的军阀都不能中立，蒋系现在武汉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不能巩固。不独围绕湖北还有许多军阀在怒目而视，尤其是冯玉祥，就是湖北内部也还没有统一，并且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统一。所以湖北的反动统治绝不会走向稳定而一定是走向崩溃。

4. 湖北政局的转变是资产阶级政治影响的扩大，同时改良主义的宣传一定会加紧：这一次蒋桂战争的结果，蒋系取得

了武汉，这固然不是说蒋系在武汉的势力已经巩固，也绝不是说湖北的政权已经完全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但是资产阶级在现在的政治影响确实要比以前扩大。这种政治影响的扩大，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宣传，另一方面由于现在反对桂系之第一步的胜利，必不可免的要扩大对湖北民众之改良主义的宣传。但武汉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一个中心，民族资产阶级的基础非常微弱，全省之地方的政权仍然在豪绅地主手里，使着这种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策更少实现的可能，最主要的只是欺骗与宣传的作用。

5. 湖北群众斗争的情绪必然要随着全国革命斗争的形势而开始活跃起来：因为改良主义不会解决湖北群众的问题，因为湖北群众久处于残酷的白色恐怖及极端的压迫之下，群众斗争的情绪一定要随着全国革命斗争的形势而开始活跃。现在全国革命斗争的形势，虽然进展是很缓慢的，虽然仍有许多严重的弱点，但总括的看来，的确已到了开始复兴的形势。湖北处于全国白色恐怖最严厉的地方，但湖北的群众斗争并没有因而消灭。经过统治阶级内部的危机，经过军阀战争，经过现在政局的转变，湖北群众斗争的情绪在客观上有更紧张的可能。只要我们的策略正确工作加紧，湖北群众的斗争一定比往日要多。

6. 但群众中之主观的弱点，客观上将给改良主义以暂时活跃的可能：但这种群众斗争的情绪包含着许多严重的弱点。第一，我们党在群众中的领导非常薄弱，尤其是我们在城市中的工作几至消灭。第二，群众没有自己之阶级的组织，力量不能团结。第三，革命失败的反映，在群众中遗留许多消极的悲观的和平的情绪。第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宣传对群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在群众中会造成对统治阶级的幻想。这些

弱点的发展会给湖北群众运动以很大的危险，使群众运动将会走到合法主义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资产阶级将会在湖北组织许多改良主义的群众团体，湖北群众因久无自己的组织的缘故，一定会自愿的加入这些黄色组织中去。在改良主义的指导之下，群众运动将要受阶级合作努力生产的理论的影响，而束缚于资产阶级的欺骗之中。这种改良主义的活跃固然不会有十分长久的期限，但是即在目前的这一阶段中，他是湖北革命势力发展之一个很严重的障碍。

7．这些客观的环境会使湖北党在目前有政治上之右倾的危险：这种客观的政治形势，资产阶级政治影响的扩大，改良主义的欺骗加深，不独在群众中可以造成合法主义的和平发展，并且同样影响到湖北党内而造成党内策略上之右倾的危险。右倾的危险将会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政治上以为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湖北政局的完全领导而夸大了改良主义在湖北实施的可能。或者追随着群众运动的弱点，在改良主义的指导之下去和平发展。或者束缚于统治阶级的法律之中，不敢动员群众作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工作方法上会单纯的对国民党请愿，服从仲裁，不组织赤色团体等等。这许多右倾的危险，湖北的同志将会不自觉的表现出来，湖北党应当坚决的与这种右倾的危险斗争。要在政治上认识湖北的统治阶级并不是走向稳定，湖北的改良主义并不会解决湖北群众的问题，湖北的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要到来。

8．湖北党的中心任务是要发动斗争，在斗争中反对改良主义，组织群众：所以湖北党的中心任务不是在和平状况下去发展组织，而是在斗争中去扩大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发展斗争中的群众组织。只是和平的发展、合法状况下的发展，这乃是资产阶级的发展、改良主义的发展，并不是群众革命势力的发

展。只有在斗争中发展的群众组织才是适应于阶级斗争的革命组织，改良主义将成为湖北革命运动之非常严重的敌人，只有发展群众的斗争，一切大的、小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才能揭破改良主义的假面具。要认清群众迫切的需要，提出足以动员广大群众的口号，才能锻炼群众的斗争组织，提高斗争的勇气，才能打破群众对资产阶级的幻想而扩大我们在群众中的政治领导。这就是我们在全国之夺取群众的任务，也就是湖北党在现在的中心任务。

9. 扩大总的政纲的宣传是反对改良主义的一个重要武器：因为改良主义的影响异常有力，因为群众斗争是将要逐渐发展的形势，所以对于总的政纲的宣传——我们之十大政纲的宣传——非常重要。只有我们在总的政治方面上能以说服群众，能以指出群众之最后的出路，才能彻底的战胜改良主义的欺骗。总的政纲的宣传不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与标语，最主要的是在于经常的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怎样见得这些政纲的正确。要使群众真正彻底明了这些政纲之需要的时候，才能脱离改良主义的支配而走到革命斗争的道路。

10. 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与斗争：因为现在总的政治形势是军阀战争的局面，因为湖北无论如何都是军阀战争必争的区域，所以反对军阀战争的宣传与斗争总是绝对的必要。在反对军阀战争的宣传与斗争中，可以扩大我们之政纲的宣传，可以战胜改良主义的欺骗，可以发展广大的群众运动，反对军阀战争在现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工作，并不能因为蒋桂战争的告一段落而结束。军阀战争对于人民的痛苦，我们必要利用以为宣传的材料。各地军阀战争对于群众所加的负担，更便利于发动斗争与动员广大的群众。因此反对军阀战争是现在夺取群众中之一个主要的工作。

二、群众工作的策略与方法

1. 发展职工运动与建立中心区域的中心工作：我们党的主要基础是职工运动，我们群众工作之第一个主要的对象是工人阶级，湖北又有许多大的工业中心，因此，使发展职工运动成了湖北党之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湖北的工人中心区域首先是武汉，次者为大冶，为湖北的几条铁路。此外如宜昌、沙市以及长江沿岸一带，各城市都有或多或少的工人群众。全省的工作中心是几个产业中心，各县各区的中心工作是几个主要的城市。在每个中心城市中还应当择出工作的中心，譬如某个城市应以某几个企业或某几种工人为中心。

2. 发动一切日常的斗争加紧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反抗黄色领袖组织群众是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在工人中间的工作，主要的是要深入工人群众，明了群众的迫切要求，发动一切日常斗争。工人不是不愿意斗争，不斗争则是我们的口号不合于群众的要求，或是我们没提出群众所明了的斗争形式。目前群众所了解的迫切的需要主要是经济上的或待遇上的痛苦。我们要认清这些要求，才能提高工人之斗争的情绪。斗争发动以后，或是可以逐渐的扩大，或是可以取得这一次小的胜利而更鼓励群众斗争的情绪，这都可以使群众更勇于以后的斗争而能逐渐的锻炼斗争中的组织。我们果然要发动群众中之罢工的斗争，但群众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罢工，或者只是怠工，或者只是包围写字间，或者只是一顿吵。但无论怎样小的斗争，只要群众愿意这样做，我们都要去领导。只有在许多小的斗争中，使群众已经觉悟到自己力量的时候，然后大的斗争才能卷入广大的群众。自然，这些话只是说我们应当注意日常的小的斗争，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绝不能做大的斗争。相反的，在现在的政局之下，大的政治斗争——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集会结社的自由等等以及其他之比较大的经济斗争、罢工运动，在湖北是有发展的条件，我们更要注意这些斗争，夺取其领导。只有在这些斗争中，才能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使群众运动更带着阶级的革命的意识。改良主义的黄色领袖的欺骗，只有在群众的阶级斗争中才能以反抗他，能以消灭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我们夺取群众组织群众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斗争中才能实现。

3. 运用工厂委员会来组织群众：因为我们要发展工人中的一切斗争，要使一切工人——虽然最落后的工人——都来参加，因为我们没有公开的赤色工会做他们的领导，所以我们需要工厂委员会的运用。工厂委员会是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以内的组织，他应该包括所有全厂的工人。工厂委员会不需要章程及会费，在全厂发生了某一件斗争之后便立刻可以由全体工人选举出来，不一定用工厂委员会的名义（可用某厂工人代表会、各间代表会、索薪团、某某斗争委员会、俱乐部等等）。工厂委员会经常是不过问政治问题，只注意全厂工人直接所感觉的需要，不管工厂以外的事务。在发生了某件事以后，我们便鼓动这一个工厂的全体工人，无论是否黄色工会的会员，无论他是否信仰国民党，只要他是这一个工厂的工人，都要叫他参加这一个委员会的选举。在工厂委员会中是我们与改良主义者争取群众之最适当的所在，我们要在这种团体中组织群众，用这种团体来指导群众的斗争。

4. 建立赤色工会的基础：对于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要在群众中去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但对于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必不能整个的反对他的工会，而是要深入群众内部以

反对他的领袖。对于黄色工会的领袖，一定要尽量揭破其欺骗工人的事实，指出他们与资本家的勾结，发动其群众反对领袖的斗争。我们不能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办工会，因为这样可以增加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我们要组织革命的赤色工会，赤色工会在现在事实上虽然不能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但他是我们训练工会积极分子、增高革命意识的机关。赤色工会在目前很难公开，但应当尽可能的争得公开，或是利用灰色的名义（互助会、俱乐部等）。组织赤色工会在现在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但这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一定要做。

5. 不是要创上层的工会的空洞机关而是建设工会支部，派同志进工厂：以上这一切的工作，在开始的时候都不是要组织上层的工会机关，而是要在各工厂企业中组织赤色工会的支部。各地认定了工作对象之后，如若那里没有线索，应当找同志去参加生产。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我们从外面是难以发动的，应当要找同志进工厂。找得能以吃苦耐劳的同志，使他对于职工运动的工作方法有一个相当的认识，然后帮助他到工厂中取得职业。进工厂之后，并不是立刻要发动大的斗争，不要企图立刻就有伟大的成绩，要有耐心的逐渐的取得群众的信仰，组织群众中的干部，逐渐的发动斗争。所谓长期的坚苦的工作，就应当这样的了解。

6. 尽量的利用公开的可能与反对合法主义：湖北在这一个政治转变之后，资产阶级一定要应用许多改良主义的宣传，组织一些黄色工会。群众也一定要乘这一转变的时候，来形成自己的工会。因此湖北将有许多公开的可能，为我们利用，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些机会来发展工作，但同时合法主义的危险也就在这里。尽量的利用公开的可能，这个原则在实际应用上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说，我们的赤色工会的组织若是不可

能的完全公开起来，则我们要用一些灰色的名义使他尽量的公开。事实上是赤色工会的组织，表面上可以用互助会、俱乐部、友谊会等等的名义以取得公开的机会，可以增加工作的便利，可以更容易与群众接近。另一方面，所谓尽量利用公开的可能，是对于敌人所召集的会议，敌人所组织的黄色工会，我们要尽量的去参加。我们不是号召群众去参加，而是当着群众已经参加了之后，我们要有组织的派同志工作人员找机会去参加。这种参加的目的是在利用这种公开的机会来发展我们的主张，说出群众所愿说的话，指出黄色领袖违背工人利益的事实，反对改良主义的领袖，提高斗争的情绪，并求进一步转变这一组织的性质。若我们对这种公开的会议与团体不去参加，则群众将单纯的受改良主义的宣传，而更增加对国民党的幻想这种参加只是找取夺取群众的机会。所谓尽量利用公开的可能，乃是为的秘密工作，为的不合法的工作。在尽量利用公开工作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和平发展与合法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的结论将是真做合法工作、不斗争，助长群众中对国民党的幻想。尽量应用公开的可能，这个原则在工作方法上非常重要，同时要尽量防止合法主义的危险。

7. 注意女工、青工与失业工人中的工作：在许多工厂中，尤其是在轻工业中，女工与青工几乎占着全体工会绝对的大多数，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工作应该注意。在工作方法上固然没有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在分配精力与派同志进工厂的时候，要特别留心女工、青工中间的工作。在湖北各个城市中都有失业工人，我们不能将他们看成流氓，要注意在这个中间的工作，使失业工人团结起来向社会向国民党政府作斗争。若发展了失业工人中间的工作，对于在业工人间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是不能忽略的。

8. 农村中的路线是发展斗争，组织农民：农村工作的路线是发展农村中的斗争，在斗争中组织农民。过去在许多农村中，我们只注意了农村的武装斗争，甚至于单纯的武装游击，而没有注意到农村中之经常的经济斗争、反抗豪绅地主及反抗捐税的斗争，这样也要失去我们许多发动群众的机会。农村中之一般的工作方法与在城市中是相差不远。过去在农村中很少做宣传工作，这也是一个缺点，对农民而没有宣传教育工作，则农民的意识将不能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9. 游击战争要尽力扩大农村中的武装斗争，成为农民自己的力量：湖北农村中还保存着有些游击队，有些地方很容易发生武装战争。我们对于游击队的任务，应当认清他是发动农村中的武装斗争，在斗争中组织群众。游击队要尽量保持与农民的联系，不要使他成为农民以外的力量。游击队所到的地方，对于豪绅地主固然要尽量的摧残，但要认清这是群众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土匪式的烧杀。在游击队比较固定占据的区域，在所谓苏维埃的区域，应当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纲，取得周围区域群众的拥护。要使着我们的影响普及到附近一切农村劳苦群众中，绝不要造成红色乡村与白色乡村的仇视，而是要红白乡村的农民都能站在一起以反对一切地主豪绅。对于游击队的兵士及苏维埃区境的群众，要特别施以我们党的政治教育，以加重无产阶级之思想上的领导。

10. 注意兵士的秘密工作，在兵士中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兵士工作对于革命的发展有非常之大的意义，使着我们必要注意这种工作，要想方法深入反动军队的内部，在那里组织我们的秘密工作。兵士切身利益的要求要成为我们在兵士中发展斗争的鼓动口号，使兵士逐渐因斗争而提高革命的勇气。土地革命的政纲，工农兵联合起来的口号，反对军阀战争的宣

传，要想方法在兵士群众中特别普及。在招兵的时候，应当想方法找失业的同志去参加，退伍的被裁的兵士我们要有方法与他们发生关系。

11. 小资产阶级及学生运动，我们不能放弃：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学生在现在客观上都有革命的要求。反抗苛捐杂税的运动，可以号召城市中之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可以引起一般群众斗争的勇气。在许多地方，这种小资产阶级运动对于工人运动有直接的帮助，使我们应该要去发展这一种斗争。学生运动在现在仍然有他的革命意义，我们仍要提高学生群众中之斗争的情绪，促进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12. 注意发动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在运动中反对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可以号召广大的群众，特别可以提高城市中之革命的情绪，使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斗争。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对帝国主义之妥协让步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只有我们在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才能揭破这种改良主义的假面具。在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我们要提出我们之彻底反抗帝国主义的政纲，以反对国民党之妥协的卖国的政纲，宣传国民政府之卖国的事实。湖北当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非常复杂的环境中，使中国军阀时常可以代表这一帝国主义的力量以反对别一帝国主义，而表面上却带着反帝国主义的旗帜。我们要揭破这一种假面具的反帝运动，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之单纯反日或反英的运动。对于国民党所指导的反帝国主义的团体，或召集的反帝国主义的会议，若在那里是有群众，则我们是一定要利用这种公开的机会参加进去，提出我们的口号。

13. 注意宣传与鼓动的区别及其联系：宣传是着重于总的政治的口号，这个口号是要群众认识，要群众知道必要为这个口号而斗争，宣传的口号并不要群众今天便去实行，这一类口

号便是武装暴动及十大政纲。鼓动口号则要认识群众迫切的需要，有时候是大的，而最大多数的时候是小的经济要求，是要群众接受而立刻便为这个口号来斗争的。宣传口号指示群众以总的方向，鼓动口号指示群众以今天立刻要去做的任务。若拿宣传口号去鼓励群众，则或者是使群众恐惧我们而不敢与我们接近，或者会成为盲动主义的失败。只用鼓动而没有总的宣传，则使群众不知道自己的出路而不明了最后的阶级的使命。宣传与鼓动都是工作方法中之不可少的，两个东西是互相辅助而推进群众的斗争，但是两者的作用是有区别的，应当正确的去运用。

三、党的组织任务

1. 建立中心区域的城市工作：湖北党组织上之一个最危险的现象，就是城市工作的削弱。一般的看来，湖北只有农村的工作而没有城市的工作。这固然有他所以这样的原因，城市白色恐怖的严厉，但是这种现象却是湖北党一个很大的弱点。今后湖北的工作应当特别着重几个中心区域，注意城市工作。因为城市是政治经济的中心，是产业工人的中心，是我们党的基础。在湖北这种政局转变的时候，湖北城市工作客观上有了恢复的可能，我们主观上一定要向这里努力。湖北的中心区域是武汉区、大阳区（大冶、阳新等），□□区，鄂西区（宜昌、沙市等）、鄂南区（粤汉路、蒲圻、咸宁等）、鄂北区（襄阳、枣阳等），在各区都要特别注重城市的工作□□□中之指导机关都不能离开该区的中心工作，在中心城市中建立整个党的基础。

2. 建立支部生活，特别注重产业支部：党的基础是在支

部，支部是党在群众中的核心。没有健全的支部，则一切党的上层机关都是空的，党的政治影响也不能达到群众。湖北党并没有支部基础，产业支部尤其没有，今后工作就要向这里努力。要使每个党员都有一定的支部，每一个支部都有经常的支部工作。正确的支部生活是要经常的开会，经常的讨论全党的政治问题、上级党部的通告、发动群众斗争的策略。每个党员应该经常的到会、纳费、参加讨论、读党报、散布宣传品、参加群众工作、介绍同志等等。只有每个同志都经常的参加这一切工作的时候，然后整个党的工作才真能达到群众中去。

3. 深入群众，党员职业化，有决心做坚苦忍耐的工作：一切工作都要靠我们深入群众内部才能去实行，站在群众以外是不行的，许多同志离开了社会职业，脱离群众，则必然不能起党员的作用。一切派去工作的同志，若是站在群众外面而不找着社会职业，则仍然是没有与群众接近的机会。今后湖北的党员同志，在湖北的工作同志，都应当尽可能的取得社会职业，实行党员职业化的口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组织我们的支部，我们同志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取得社会职业并不是一个客观上完全不可能的事，而是要我们同志有决心的去做坚苦忍耐的工作。找社会职业不只是——主要的并不是——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而是找接近群众的机会，造成党在群众中的基础。这一点要一切湖北的同志都有决心的去做。

4. 慎重的找旧的线索，注重质量的发展：湖北党经过了许多严厉的白色恐怖之后，党的组织受了严重的破坏，自首的叛党分子已经成为我们严重的敌人。有一些现在还没有公开叛党的，或有些已经叛党而我们还不知道，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是以后工作上之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完全放弃旧时的线

索，因为这样便放弃了我们党之历史上的基础，对于我们的损失太大。但我们在找取旧日线索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慎重。对于靠不住及没有确实考察的分子，宁可不用，不可乱用。党的发展是要依靠创造新的基础。在新的发展中间，要特别注意城市产业工人中的发展，要注意质量的发展。过去我们党之招兵式的发展，给了我们现在以很苦的教训，今后我们不要希望的数量太大，不要求之太速，我们要艰苦的深刻的注意质量的发展。

5. 暂不恢复省委，加重中心县委的责任及巡视员的指导：根据现在湖北党的组织状况，根据湖北的客观条件与工作上的需要，在湖北现在暂不恢复省委的组织。湖北省委的职权将分任于各中心县委上，中心县委负指导邻近县委的责任，对中心县委的指导由中央直接负责，中央对中心县委的指导以及中心县委对邻近县委的指导，都要用加重巡视的方法去实现。这种形式的改变，不是消极的以为湖北工作不重要，更不是因为湖北工作应当缩小，而是因为现在的客观条件之下中心工作又没起，中心区域又没有建立，还不需要一个空洞的省委，而需要各处有强健的地方党部。暂不恢复省委，不独对于湖北党之秘密条件上有很大的帮助，并且要使湖北的工作更合于实际，更深入群众。

6. 健全地方党部，培养地方的干部人才：省委取消之后，地方党部的责任更加重大，使着健全地方党部成为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地方党部直接指导支部工作，直接指导各地方的群众斗争，他要讨论实现党的策略之具体方法。湖北很少有健全的地方党部，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以后中心及中心县委对湖北工作的指导，都必要注意健全地方党部。健全地方党部的方法，不是要依靠由别处调往很多的工作人员，而主要的是在于

培养地方的干部。地方党部的基础要建筑在本地的支部上，只有由本地的同志尤其是由在业的同志□□□□□□□□□□□□□□□□□的地方党部健全。现在我们整个的党都感觉得干部人才的缺乏，湖北[2]多新兴的干部，工农以及知识分子的干部则我们党的工作将永远[3]生活选择干部人才，给以特殊的训练。

7. 加紧教育工作：□□□一般同志的政治认识，许多问题□□级党部不能解决，许多正确的策略不能在下层正确的运用，其原因都由于一般同志对于政治认识的缺乏。湖北因为长期破坏的结果，不独六次大会的精神没有传达下去，即以前八七会议的精神有些地方也还没有达到党员群众。这种现象是一切工作进行的障碍，一定要努力战胜这种现象。在地方党部以及在支部中，要时常注意政治问题及一切工作方法的讨论。在各地之每个斗争完结的时候，应当注意使一般同志学习这一次斗争的经验。一切对内对外的宣传品，应当尽量督促同志研究讨论。党内的教育工作要特别注意。

8. 建立正确的党与群众的组织关系：党与群众的组织关系应当明确的认清，工会、农会苏维埃是群众的组织，党只能在其中起党团的作用而不能混淆。工会、农会与党的混合，可以使这种组织不能成为真正群众的组织而不能扩大，同时党又不能在质量上注意发展。党与群众组织的划分，使着群众组织有更大的普及群众的可能，而党只吸收其中之先进的分子以提高党的质量。群众组织的指导机关要尽量的使非党群众参加，而党只是经过党团以成为政治上及思想上的领导。无论在大的或小的群众团体中、公开的以至秘密的群众组织中，都应该保持这个原则。

9. 注意秘密工作：湖北白色恐怖的严厉，使着秘密工作

特别重要。过去湖北的秘密工作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不足用，不能保护党的组织的安全。在最近政局变动之后，白色恐怖或者要稍为削弱，但决不要因此而忽视秘密工作。秘密工作要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的掩护，同时要准备敌人的破坏，不要与敌人的战线太接近。过去秘密工作的经验，要使每个同志尽量的学习。

10. 建立正确的党与团的组织关系：党与团的正确关系是推进工作的条件之一。党要注意团的工作，将团的发展看成自己发展的一部分。团要服从党的政治领导而保持其组织上的独立。在同一地方内，若是党与团都有组织，应当相互的参加会议，在工作上建立密切的联系。某地有团而无党的组织，则团应该帮助党的发展；有党而无团的组织，党也应当帮助团的发展。若有许多地方工作范围非常狭小，不需要党团分立的，则也要认识这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在工作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尽力使党团各有其组织上的独立。

中　央

四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2〕 原文此处缺二十余字。

〔3〕 原文此处缺二十余字。

PDG

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的信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省委通过之全省工作方针的批评

中央看了福建全省工作方针之后，并听到陈罗[1]等三同志的口头报告，发现全省工作方针中有许多缺点，兹指出主要的地方如下。省委应根据这封信的指示详细讨论，重新规定实际工作方针，切实执行！

全省工作方针对于政治的分析，有下列几个重大的缺点：

第一，忽视帝国主义在福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在全省工作方针中，对于政治的分析未说到帝国主义在福建的统治力量，这完全是忽视了帝国主义在福建的作用。在实际上，福建的经济完全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在福建本国工业尚极微弱，福建社会经济买办性质的商业资本和地主的封建剥削占统治地位，帝国主义商品的剥削使本国工业极难于发展，农村经济加速的破产，手工业工人与农民的失业日渐增多，由是乃形成了许多小军阀割据局面。统治福建的军阀因受帝国主义的经济支配，不得不仰帝国主义的鼻息，尤以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建的经济力量特别雄厚，统治福建的军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而为其工具，就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如厦门海军屡次禁止反日运动的事实。这证明了帝国主义不但在经济上统治了福建，

而且在福建的政治上亦有重大的作用。福建党假如不明了这一点，很容易轻视了反帝国主义在福建的任务之重要，在全省工作方针中就有这个倾向。

第二，机械的分析阶级关系：在全省工作方针中对于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分析，完全是很主观的将全国情况移到福建来，决定福建军阀的冲突为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的冲突的表现，认为福建军阀已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营垒，这样的分析是很机械的。其实福建军阀带的军阀性还非常浓厚，没有明显的阶级色彩，而且在福建没有强固的民族工业，虽然受全国影响，在福建统治阶级中发生有资产阶级倾向与地主买办倾向的斗争，但是在本省既没有强固的基础，当然在政治上也就不能成为最主要的矛盾。所以军阀的作用在福建还表现得很强大。所以福建各个军阀的矛盾——杨树庄、张贞、卢兴邦等主要的动力当然是全国几大矛盾的反映，在福建本身则主要互相抢夺地盘的军阀性的矛盾。

第三，夸大资产阶级的作用：在全省工作方针中屡次提及资产阶级要“摧毁封建势力”，要“摧毁封建的剥削方法”。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假使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还要摧毁封建势力，那中国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呢！我们不但不应该反对他们，而且要对他们取联合战线的策略。实际资本主义剥削的方法与封建的剥削方法固然是有冲突的，但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本身又兼了多少封建剥削的关系，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不能而且不愿意消灭封建阶级，摧毁封建的剥削方法，而求得与封建势力妥协来发展，他只希望相当的削弱封建势力，所以它只能妥协一部分封建势力去反对别一部分的封建势力。代表资产阶级的蒋派妥协胡汉民、孙科及许多桂系小军阀以反对桂系，便是明显的例证。中国资产阶级还是不能而且不愿意彻底

反对封建势力的。

第四，忽视军阀制度的作用：在全省工作方针中，很主观的勉强指出张贞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杨树庄为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而忽视了他们极浓厚的军阀性。福建经济落后，军阀的阶级性的作用比较军阀性的作用小得多，福建军阀的相互冲突主要的还是军阀性的表现，他们主要不是在政治倾向的不同而起来冲突，还是因为争地盘扩大他们本身利益而起斗争的。比如，张贞是相当的受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的，但他在福建终不能提出资产阶级的口号，如减租二五、裁兵等等；即论杨树庄、卢兴邦等采取强硬的直接的很野蛮的很凶恶的封建式的手段来对待群众，这亦正是军阀性的充分表现。福建党要知道这一点，以后对于政治的分析和估量，才会很活泼的应用许多事实决定我们正确的论断。

在政治现状的分析中，主要的缺点有上列四点。现再说到今后工作方针中的缺点：

在工作方针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工作方针的决定只是一些原则的而没有具体化、地方化，除了工作布置段内稍稍带有地方性外。这一个缺点会使工作方针成为纸面文章，对于各县工作不能有什么具体的指示。省委根据实际情形规定出更具体的更实际的更地方化的工作方针甚为必要！

关于职工运动有两个重要的缺点：第一是没有指出在黄色工会中工作的策略，第二是没有说明工厂委员会的策略在福建应如何的应用。在黄色工会中的策略，应该是争取其群众，夺取指导机关，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就是成为群众的斗争的组织。但这一工作应该自下而上的去做，我们应在下层群众中去活动，提出工会实行民主化的口号，反对国民党包办工会、指派委员等，而不是注意于马上夺取得指导机关自上而下

的去工作。工厂委员会是职工运动夺取群众的主要策略，在我们还没有力量还不能公开领导斗争的地方，便可以在群众斗争发动的时候，组织代表团、索薪委员会……等名义的组织来领导这一斗争，以取得全体工人的拥护。渐把这种组织从临时的变成永久的，从秘密的变成公开的，这就是工厂委员会的作用。

关于农民运动的策略在方针中没有提及，这是极严重的错误，农民运动亦是福建党的重要工作，不容我们丝毫忽视的。

关于兵士运动，亦只是说些空洞的很简略的原则，没有具体的计划。关于城市贫民工作在福建亦甚重要，尤其是当一般城市贫民对于国民党的幻想逐渐消减的时候，这个工作更为重要，但工作方针中也没有提及。

关于宣传工作方面，在工作方针中也包含了一些错误，就是不懂得宣传口号与鼓动口号的分别，所以才有宣传口号应适合于群众心理的错误观念。宣传口号应该遵照党的政纲而规定，我们不能去适应群众的心理而降低我们的宣传口号；鼓动口号则应该了解群众的迫切要求很具体的提出来鼓动群众的斗争。但也不是说要所有群众都要求了，我们才能提出。如果这样，那就成了群众的尾巴。这一点是要注意到的。

关于组织问题在工作方针中也没有提及，只在职工运动中附带简略的说一点，这也是重大的缺点。

关于反对改良主义，只说到反对改良主义的重要，而没有说到怎样去反改良主义的方法。这样使工作方针传到下级党部去，反改良主义仍旧成了纸上空文。

关于反帝运动，只说到参加反动派所领导的反帝团体，而没有指出我们怎样去做经常的反帝工作，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因此，这个全省工作方针的通告并不能指示各地以正确的路线，还给了一些错误的观念。省委接到此信后，应根据全省的实际情形和六次大会决议及中央历次通告所指出的总路线，加以详细的讨论，重行规定全省的工作方针。最要注意的就是要很实际的、切合客观的条件主观的力量和过去的教训来规划全省的工作。必须这样才有指导全省实际工作的意义。

二、在目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计划

现在蒋介石虽然取得了武汉，但是一方面蒋冯[2]的冲突已更加尖锐，另一方面粤桂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军阀战争并不会因此终了，而必然要继续的爆发。所以反军阀战争的工作要继续加紧。并且革命一日不胜利，军阀制度一日不会消灭，军阀战争也将要继续不已，所以反军阀战争成为我们经常的中心口号之一。

军阀更加加深群众的痛苦，更加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暴露改良主义的欺骗，所以军阀战争是我们工作发展的客观的有利的条件。在福建还有更大的便利，就是朱毛[3]的影响。单靠朱毛的力量，当然不能取得福建的政权，但是因朱毛来到福建，使我们的政治影响更易为扩大，更易为深入群众，这是我们决不可以轻易放过的机会。现在根据福建客观的条件和党的主观力量，指出目前的工作计划如下：

1. 现在福建客观情形虽很便利于革命的发展，但我们主观的力量太弱，还没有很快的推进这一发展，走向革命高潮的可能。所以我们目前的总路线，还是加强群众工作，夺取广大群众到我们政治影响之下来推进革命高潮。所以我们工作计划要特别注意于政治影响之扩大和群众工作的加紧，决不应以军

事计划的观点来规定全省工作。

2. 城市工作和职工运动是我们的基本工作。在现在军阀战争的时期，城市中的影响更易为扩大，我们更要加紧城市的工作。固然因军阀备战的原因，对农民的防制客观上要减轻，因此农民斗争易为起来，但是我们决不应抛弃城市的基本工作，完全跑到农村中去。在这个原则之下，省委对于厦门、福州、漳州三大城市的工作必须特别加紧，同时如莆田、石码等处的工作也要同样的加紧。特别是厦门、漳州，因为接近于闽西，更易受朱毛闽西斗争的影响，群众的情绪尤其是工人的情绪必然要更加活跃起来。我们必须在这些地方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鼓动群众的斗争，扩大群众的组织。如果不是这样做，可以使群众发生等待朱毛而不自己起来斗争，那么，这一时期过去以后群众的情绪又要复归于消沉。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些城市，扩大了几个支部的组织，扩大了几个工会和兵士群众的组织，便是革命胜利的有力的基础，决不要因为这些地方没有方法大干便忽视起来，如果这样，便是莫大的政治错误。

3. 闽西各县农民群众受朱毛的影响，必然要起来猛烈的斗争，所以有计划的去领导，恢复苏维埃区域，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等。因为这样更可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深入到漳、泉各属的农民群众中去，更便利于我们在各地夺取广大群众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恢复闽西苏维埃区域的目的，是在于使全省各地的群众工作因这样的影响更易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同时加紧各地的群众工作尤其是漳、泉各属。省委过去的计划（罗明同志报告）确与这样相反，把恢复闽西苏维埃区域做一个目的，使全省各地的工作都为着这目的而牺牲，如漳州要造成一个骚动局面来牵制张贞，崇安要发动游击战争来牵制卢兴邦，同时又把各地的积极分子都调集到闽西

去，这样一来使全省工作都归牺牲，就令闽西苏维埃因此得到暂时的胜利，又有什么办法使全省的工作扩大，怎样使闽西的斗争持久？所以这种计划很明显的是与正确的路线相违反的。省委必须特别注意这一原则，恢复闽西苏维埃区域的目的是在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来推动全省的工作，决不可以恢复闽西苏维埃区做目的而放弃全省的工作。因此在闽西工作计划的方针应该如下：

a. 必须极力发动各县的农民斗争，扩大农民群众的组织。以前未经过激烈斗争的区域决不应一开始就做武装斗争的军事准备，而是要极力加紧群众的工作，提出群众迫切要求的口号，鼓动群众的斗争，在斗争中扩大群众的组织（如农民协会等），到了广大群众已经起来，而且要在武装斗争的时候更进一步推翻乡村豪绅统治，建立农民代表会议政权，与已成立的苏维埃区城联合起来。

b. 在从前经过暴动的区域，如永定、上杭，受了朱毛政治的影响。当然农民群众要自动的起来实行武装斗争，我们当然要积极的领导，实行恢复苏维埃政权。但是要特别注意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政权的组织，决不可如过去一样，一切权力归于党，苏维埃仅成一个空名。

c. 要告诉各地党部特别注意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推翻豪绅统治，解除民团武装，决不要到处都依靠朱毛的武力去打。如果这样，必然养成群众依赖朱毛的心理，朱毛一去，一切斗争又成泡影，那是最不好的现象。

d. 在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区域，应即刻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纲，以使土地革命的影响很快的扩大到全省去。至于土地的解决方法，应由各区乡的农民代表会议按照农民自己的要求来解决。

e. 在苏维埃区域必须极力扩大红军和赤卫军的组织，极力扩充武装，使朱毛去后，仍能相当的保存这些区域的政权。

f. 过去大烧、大杀、大抢、绑票等类土匪的行动，必须严厉的纠正。因为这些行动只是使广大群众离开我们，对各地工作也发生极不好的影响。

g. 在苏维埃区域必须极力注意建立党的组织，并且要十分严密的建立起来。要纠正过去与农会不分的现象，尤其要注意培养群众中的活动分子，使军队去后，党仍能继续存在的活动，特别防止“党随军走”的不好现象。

h. 苏维埃区必须尽可能的派遣农民到附近各县扩大宣传，来发动附近各县的斗争，使政治影响更快的扩大起来。

i. 在苏维埃区域，必须设法办一群众的报纸，顶好半画半文字的报纸，使一般群众都能看，尤其要利用各种的办法寄到全省各县去，来扩大宣传。

j. 为使这一工作方针能相当的执行，应恢复闽西特委来集中指导，省委应派一比较政治观念清楚的同志去主持特委工作。过去把各地重要的同志都调去的办法当然是错误的，应将已调去的同志即刻调回各地工作，使各地工作更能加紧。

4. 按照上段指出的原则，在这个时期必须极力加紧各地的工作，尤其是漳、泉各县。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乘朱毛到来和军阀战争，我们的政治影响更易扩大的时候，来扩大我们的群众工作。所以省委必须对漳、泉各县有精密的计划。并要按照各县的情形定出比较具体的工作方针，同时应派得力同志去巡视各县，加紧各县的指导。在这些县份工作方针的原则，主要是扩大群众的组织，发动群众的斗争，扩大政治影响，扩大党的基础等。决不应如省委过去计划的如何造成骚动的局面，如何牵制敌人，如何响应闽西等。因为这样不只是使我们的工

作不能扩大，而且原有基础都要因此损失，这是必须特别纠正的。

5. 要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要特别加紧宣传工作。在宣传上，第一，要特别注意政治影响的扩大、政纲的宣传和揭破敌人的欺骗等。省委新印发的政治通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对朱毛的宣传只是一些军事胜利的消息，没有一点政治的宣传。这样对一般群众的影响并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对朱毛的宣传，主要是宣传他们怎样发展工农组织，领导工农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扫除苛捐杂税，保障贫苦小资产阶级利益以及一般群众对他们如何的欢迎，如何的拥护等等。第二，要使我们的宣传扩大，必须尽可能的利用公开的机会。如能办一公开的小报等固好，如不能也可以利用学生支部发起什么平民教育会等来办平民白话报等，在里面夹入我们的宣传。同时以前出版的《烈火》应继续发行，但内容须加以改正。以前内容太空洞，太理论，太没有地方性，太没有鼓动性，文字太长（如土地问题的文字等）。以后必须特别注意本身的政治问题，找出许多军阀、地主、资本家压迫工人的事实来做鼓动的材料。关于比较理论一点的分析，每期至多一篇，最好不超过五千字，还要登通信、问答等类的杂文。必须这样，才能深入群众影响群众。第三，散发传播必须极力利用各种方法使能比较普遍，特别是要告诉一般同志知道散发党的宣传物是每个同志重大的任务，然后党的刊物才能转到群众中去。总之，宣传的扩大是夺取群众最主要的条件，省委必须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去做，特别是利用公开和半公开的机会，应该去找寻这种机会，决不可放松一点。

6. 兵士运动是党的主要工作之一。如果不能夺取广大的兵士群众，革命决没有胜利的可能。特别是在现在军阀战争的

时候，各个军阀都扩充，更加多了我们兵士运动的机会。兵士运动是每一个党部每一个党员的经常工作，必须告诉每个同志，如果有接近兵士的机会便要向他做宣传的工作，每个党部都须有计划的宣传兵士，找军队中的线索，特别是城市中的党部。至于在军队中发生了组织，那就必须马上告诉所在地的高级党部（至少是县市委）直接指挥，因为军队中的组织必须极端秘密，如归下级党部指挥很易为泄露秘密（乡村中民团保卫团等是例外）。省委对于这个工作必须特别加紧，因为福建的小军阀很多，我们工作的机会亦多，决不可轻易放弃的。

7. 关于职工运动的策略，已经与昭礼同志详细谈过，并且过去已有详细的职工运动的通告。省委在厦门工作方针中所提出对于各种工会的计划，完全是空洞的、呆板的。昭礼同志到后必须详细加以讨论，定出更具体更切合实际和目前主观力量的可能范围内的详细计划。一面即刻执行，一面报告中央以便考查。这是党的中心工作，更不容有半点放松。

8. 省委所寄来的各种材料中，始终没有对于中央通告的讨论与执行的策略的报告。可见省委对于中央通告必很少讨论，这是极不好的。省委如果不注意中央通告，一切问题便没有一个正确的原则来解决。以后中央通告到了，省委必须详细的讨论：第一，在原则上是否合于福建的情形；第二，用怎样的策略去执行这个通告中的原则；第三，怎样去指导下级党部的工作；第四，省委本身在这个通告下应怎样工作。同时对于下级党部的指导决不可机械的把中央通告转录下去，也不可把中央通告的原则照抄在省委的通告上，而是要将中央通告中的原则与福建的实际情形配合起来，同时指出具体的策略与工作来（内容要比较简单化）；必须这样，然后下级党部才能知道

怎样去工作，否则各种通告不会发生一点实际的意义。

省委接到中央此信以后，必须加以详细讨论，然后决定具体的工作。并将讨论的结论寄到中央，以便审查指示。

中　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陈昭礼、罗明。

〔2〕指冯玉祥。

〔3〕指朱德、毛泽东。

PDG

兴国县土地法

（一九二九年四月）

毛　泽　东

（一）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二）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经工农兵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别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

（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

（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四）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五）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3）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六）土地税之征收：

（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乡村手工业工人，如系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八）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1]：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

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各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才改变的。这两个土地法，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注　释

〔1〕这个按语是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在延安编辑出版《农村调查》一书时加的。

PDG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

——中共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训令的决议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Ⅰ. 现在政治局势中之根本矛盾

一、国际二月八日来信，是指示中国党应针对着现时情形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于一切工作上。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指示（除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还没到外）足以成为中国党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他一方面证明中央半年来关于政治原则及斗争策略的指示和决定在根本上完全正确，另一方面更将中央对于政治上各种分析的缺点指出，这足以端正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加强党的正确领导。

二、依据国际的分析观察中国现实环境，应更加认清外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一切政治经济生活中真实的统治者。自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国民党打下北京后，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日益加强，不但英日帝国主义势力在南北有显然的发展，便连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也有突飞的进步，甚至其所号召承认的关税自主与修改条约也都是形式上公认中国某种主权，实际上则是加紧中国一层束缚，使中国更深入殖民地化的（更为帝国主义所奴隶所统治的）过程。在这殖民地化的瓜分政策

下，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正在加紧军阀战争的制造与联系到世界大战的准备，所以他们对付中国的战线绝对不能巩固，主要的是表现着美国与英日的竞争而都是一样地要在中国取得更多的利益。然不应夸大这一竞争的意义，甚至以为美帝国主义会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独立的发展，或美国会永远以和平侵略的方式来统治中国，这简直是不明了帝国主义本质的妄谈。或者更推论到美帝国主义已经取得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这更加不明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争夺必然要加紧战争的危机，决不是从和平外交上可以得到，故美帝国主义用自由主义的假面具以达到统治中国的欺骗政策在群众中实散布了一些幻想。因此，我们应对群众指出无论任何帝国主义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中国，其目的都是一样地加紧对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剥削和破坏中国的独立。

三、中国资产阶级自从背叛革命之后，再也不能而且不愿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了。虽然因着生产力的推进，表现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发展矛盾，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绝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政纲，但当着这种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只有妥协帝国主义，一步步地出卖民族独立的利益。故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便是妥协帝国主义的政纲，也就是阻碍为中国独立斗争的政纲，他实具有十足的反革命性。中国资产阶级企图在帝国主义竞争或美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取得民族资本独立发展的幻想，正是改组派的理论根据。其实关税增加只能相当地提高南京政府的收入用做战争的军费，美国借款即使实现也是要投资于交通运输事业好便利于外货商场的扩大，并不能适合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直接需要。固然客观上在将来是要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相当发展的，但他的发展前途终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与其所利用的封建势

力的束缚。并且，中国资产阶级因为与土地关系的密切联系，使他更要加紧对农民直接的或间接的剥削，故他同样不能施行农村的改良，甚至连二五减租的假面具最近也在浙江作最后一次的撕破。自然这决不是说民族资本发展的倾向与封建制度的剥削关系会没有矛盾存在，而是说在中国的农村经济与土地关系之下，不但改良主义的方法不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便连小小的改良，中国资产阶级也很难求得地主的让步。所以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在反动的联盟中进行夺取阶级领导的斗争是一显明的事实，但我们不应夸大这一事实的意义，要认清无论封建半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都是一样不能统一中国，不能使中国解放的。如认中国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封建势力的能力和愿心，更是足以助长右倾观念发展的极大错误。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部分又与各个帝国主义经济上之共同利益，同样又因其与土地关系的密切联系，故使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全脱离其买办性与地主性，使他对于帝国主义或封建阶级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

四、不过我们也应承认在现在的蒋[1]桂战争以及未来的军阀战争中，帝国主义的相互冲突固是这些战争的主要动力（不管他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军阀抢夺地盘的争斗固是这些战争的直接导火线，但确也反映着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便是过去的军阀战争也同样含有相当的阶级矛盾在内）。这三种矛盾的相互表现，使着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虚伪和平与表面统一亦不能有好长时期存在，战争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必不可避免的最高度的矛盾表现。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愈加紧，中国的工农劳苦民众的痛苦将愈加深。资本的进攻农村的剥削，捐税的繁重，战祸灾荒的流行，在中国已经不是一时的偶然的天然的现象，这与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农村经济的崩溃

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以国际的来信很明显地指出“不仅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未曾解决，而且中国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未解决，……一切所谓中国走向基码尔道路的发展，都是些无稽之谈。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日益紧张必不可免地走向新的革命恐慌的过程，而且比以前更广大更深入。”

五、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羁绊之中解放出来的任务，与土地革命及肃清一切封建半封建残余的问题有很密切的联系。只有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与工农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才能实现这些任务。六次大会后工农群众斗争的形势，尤其是大城市工人斗争自去年“五三”以来，的确是逐渐复兴的形势。这不仅上海自邮务、水电两次罢工推动了最近三月来将近二百次的工人斗争，发动了两年来所未遇见的数千人纪念“五一”的盛举，便在北方也由半年来大小数十次的工人斗争酝酿到开滦五矿的怠工，在香港最近三月我们领导的工人斗争有十六次，便在湖北工人斗争的情绪也绝不是低落，在满洲过去三月中也还有八九起可以统计的工人斗争。在乡村，农民斗争并未停息，苏维埃区域并未完全消失，朱毛[2]的红军仍然在反动的统治区域存在，投身到农民暴动区域的兵变仍时时发生。过去反日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亦确是表现广大劳苦群众反帝情绪的高涨。城市贫民对于苛捐杂税的繁重和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已渐生不满，这些都足以证明城市的工人斗争正在开始复兴，乡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也在逐渐开展，虽然这些现象不可以过分估量，但新的革命高潮的薄弱象征的确可以看见。便是党的领导，在这半年来艰难困苦的工作环境中，的确已争得了一些进步。如上海在邮务、水电罢工以来，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和领导的确较以前扩大（自然还有许多错误）。香港从和平

发展的现象转变到能发动和领导工人作小小的斗争。北方从合法运动与隔离群众两极端的现象中逐渐地争得在群众斗争中的相当影响。这虽是极少的进步，但确是我党在这几月来难苦斗争，牺牲许多同志，战胜许多困难得来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党有可能去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之不可忽视之基点。自然，在这些群众斗争中还有很大的弱点，如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存在，群众中失败情绪与合法观念并未减轻多少，黄色的群众组织仍有增加，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以及党与群众脱离的现象还没有多大改善，因此，如认革命高潮是马上或很快地就要到来，很显然地对于革命的急性病，中央政治局更坚决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能逐渐地克服这些弱点，则正在开始复兴的工人斗争必又要经挫折而延缓其进展，土地革命得不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必然要受着继续不断的挫折，党的很少进步必又要遇到新的阻碍。故就理论上说来，当然不否认这一直接革命的形势有延长几年的可能。但是因此便以为中国将有长期的“和平的”发展而没有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基本矛盾的严重危机，这却是很大的错误。党必须纠正同志中间以这一种或那一种可能极端为出发点的分析方法，必须坚决地认定，只有斗争，只要看我们争取群众的力量，才能决定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行程。

Ⅱ. 党的最近基本任务与策略问题

六、根据上述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根据半年来党的工作经验，证明六次全国大会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路线与决议无疑地是正确适用，只是在执行的程度上还没见很大成效。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党内失败情绪与涣散状态之存在，无产阶级干

部分子之缺乏，党没有充分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以及党内不正确倾向之继续发生，这都是需要党以极大努力极难苦耐心的工作精神才能战胜这些困难。故党在争取群众于党的周围之总路线下，应特别认清深入产业工人群众，发展群众斗争，巩固党，加强党的组织与威信及其在群众中的领导影响，实是目前党的最迫切的任务。

七、为实现这些任务，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一右倾的危险绝不仅是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而复活，他更有现实环境之不可轻视的基础。自从统治阶级以白色恐怖的压迫、改良主义的欺骗，从宣传上组织上极力向群众进攻以来，党内反映着一部分群众失败情绪与不正确的观念及小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右倾思想便一天天地发展。在理论分析上是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错认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取得反革命的领导权，对统治阶级内部各种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予以忽视，对工农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与党的力量存在（虽是很弱的）予以否认，甚至认统治阶级已经走向稳定或是革命高潮之来到将遥遥无期。于是表现在策略之观点上便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降低我们政治口号，接受资产阶级的欺骗政策；在组织的观点上，便是党内和平（这种观念是要停止我党对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斗争，这是最危险的观念）与放弃赤色工会中心组织的主张。同时党在组织上无产阶级基础的削弱，干部分子停顿在智识分子成分上，党员政治水平线之低，又都足以成为右倾思想发展的组织来源。固然我们在工农群众中间的工作必须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而且目前已经开始了一点成绩，但这只是在非法的环境下需要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来争着实现党的基本任务，决不是放弃我们原有的基本任务，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

去迁就客观条件以求得统治阶级所不干涉的合法存在。这后一见解根本是机会主义者的主张。这样做去，不仅要成为第三党以至改组派的尾巴，并且还要推着群众走入不可挽救的改良主义的陷坑。在最后，便要完成取消派的倾向与党内以及群众中间动摇犹豫恐惧消极的观念相结合以至取消革命、取消党，与共产主义的领导和组织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当然这还不是说中国党内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形成，已经有了一个危险的派别，但依着他有可能的发展前途来看，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的特别危险。

八、但仅仅站在党内去克服这一右倾危险是不够的，必须特别认清助长党内右倾思想发展的客观条件是改良主义的影响。统治阶级国民党除掉用屠杀政策外，还极力用一些改良欺骗的方法来扩大他在工农劳苦群众中的影响。虽然改良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很少发展可能，但资产阶级绝不会放弃一切民主的民族的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在社会上便要造成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以为国民党还真要反对封建势力，还真要为争民族自由而反对帝国主义。这种幻想经过屡次的事实证明尤其是民众痛苦的日益加深，固不会长期存在，然在目前群众斗争中还存在许多弱点，党在群众中的领导还薄弱的时期，他的影响的危险便不容忽视。最近半年来改组派的活跃（第三党的群众多跑向改组派方面），黄色工农会的增加，过去反日会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活动，都足以证明改良主义的影响在群众中并未减轻。且不仅群众，党内至今犹存在着在国民党下级党部做事，受国民党委派占领黄色工农会机关以至与改组派讲联合的等等现象，便可知改良主义影响与党内右倾思想有如何密切的关系。所以“肃清一切的幻想，揭破国民党政策的假面具，发动

群众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尤其是改组派以至第三党的欺骗政策），准备群众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实是现在时期中的第二个重要任务。

九、另一方面，党内左倾危险自六次大会后虽逐渐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在目前最严重的左倾危险是不愿意进行日常斗争，不承认部分要求斗争的必要，不愿意争取公开的活动机会，不愿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保留着些命令主义的精神，提出一些空自夸大的高调（目前实行的口号），幻想一些大的斗争来到，这都足以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仅不能加大，且将日益缩小，日益与群众隔离。故国际指出消灭党与广大劳动群众脱离的现象，取得群众尤其是工人使其革命化，实是现时党的第三个主要任务。不了解这一任务，便不能克服党内左倾危险的残余。

十、在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必不可分离地要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斗争、农民争土地的斗争密接，但这是就中国革命任务的关系言，并不是说在工作上除了工人斗争、农民斗争要一般的关联到反帝斗争外便没有了反帝的本身工作。恰恰相反，在过去各大城市的反日运动客观上证明了广大群众的反帝斗争确有发动的极大可能。只是党内存在着许多偏向，如误解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以为工人斗争不起或是没有形式上的赤色工会加入反帝运动，便不能树立起我们的影响，于是客观上便成为忽视反帝运动，放弃反帝运动中的领导。这需要党以极大努力领导群众加入并组织各种反帝运动，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国民党所影响的反帝运动变成工农劳苦群众之真正的反帝斗争，使他同时又是反国民党的运动。

十一、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已成为现时中国党的经常任务。在困难的工作环境下，极艰苦耐心地向前工作。在群众中很细心切实地提出各厂各业的部分的要求，做成目前党的经常工作的主要口号。但这些日常斗争的口号必须与党的基本口号有正确的联系，同时必须在日常斗争中解释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且不仅在宣传上便在实际斗争中，也必须注意到党的策略路线是要尽可能地准备我党以及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力量，以备实现革命高潮到来的任务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党应特别注意每个共产党员在一切群众运动中的积极参加都应当是向着这一战略的方向去做。

十二、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无疑地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处理。但根据两年来土地革命的经验，乡村阶级斗争的形势，在策略上我们必须认定贫农是斗争的中坚，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富农于中国国家封建制度残余的剥削下，在相当的斗争阶段之中，我们还有吸引他参加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可能。但当着农民与他的主要敌人地主豪绅决战的时候，富农中兼半地主或拥有多数雇农的分子必然是跑向反革命的方面，故同样地不应放松农民对他们的阶级斗争。现时全国的灾荒现象尤其是北方的灾荒仍然继续，在客观上农村斗争有极大发展的可能，只是在农民群众中，北方的和平发展观念与南方失败落后的躲避情绪都很浓厚，党必须坚决地发动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促进乡村中阶级分化，并以游击战争重新团聚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到有组织的斗争，走向建立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的道路。自然这些斗争要尽可能地得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要从斗争中加紧农民的组织，从游击战争扩大农民的武装，以准备革命的最后胜利。现时存在的苏维埃

区域与红军必须以党与工农群众为前提，必须与全国的劳动群众斗争联系起来，使他日益扩大和发展。红军的行动必须与军阀的土匪军队有根本的不同，他不应向农民派饷，不应向农民及当地劳苦民众征收捐税，必须做到使农民自愿地帮助红军并起来组织帮助红军的委员会。红军只应向豪绅地主派饷。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红军才能得到劳动群众的拥护，才能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

十三、中国军阀制度不仅在保持着半封建的关系上而存在而发展，并且帝国主义列强正维持着这一军阀制度以加紧其进行瓜分中国的阴谋，故中国工农革命如得不到广大兵士群众的参加，如军阀军队中广大兵士群众仍成为中国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压迫革命之最残酷的工具，则中国革命便是发动起来，也将不能得到并保障最后的胜利。但中国大革命的震动与工农运动的高涨不是空过去的，尤其是两年来农村经济破产的急剧，灾荒区域的扩大与土地革命的开展，均足以加紧中国军阀走向崩溃的过程。在这里，事实的表现便是对人民的剥削已到敲筋吸髓的地步，对地盘的争夺更加剧烈，战争的祸害更加扩大，军队的生活更加恶化，新军阀克扣军饷虐待士兵方法比旧军阀还要残酷。因此，军队的倒戈与士兵的哗变以及整队的士兵投转到农民斗争区域与红军方面的都时有所闻。所以反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与争取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在中国革命中实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应成为党的经常的主要任务之一。六次大会以来，各级党部对于士兵运动的工作有一般的忽视，党应用极大努力纠正这一倾向，加紧动摇军队的宣传，鼓动士兵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以联系和发展到士兵群众投身于土地革命运动，同时应在士兵群众中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以树立工作基础，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在

帝国主义驻华的海陆军中，党一向缺乏有系统的破坏工作。根据上海暴动与汉口夺回英租界时的经验，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压迫与在他们中间的士兵运动尤其是在印度、安南士兵中的运动，对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实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党应一方在群众中从事要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运动，另一方应在这些士兵中间有经常的宣传工作，以促其觉醒和自己要求撤退，尤其要督促青年团加紧这一工作。

十四、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青年与妇女亦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轻工业工人中，女工童工的激增，农村中青年农民斗争情绪之易于发动，农妇在农村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广大士兵群众中青年士兵要占大多数，青年贫苦学生在革命斗争中，尤其在反帝与争民主自由的运动中还有他相当的作用。这些都指明党在青年与妇女的运动中要有不断的努力，不仅在工会农会以及一般城市贫民运动中，党应将各种斗争关联到青年与妇女的利益，并应帮助与督促青年团在这一工作路线上争取广大的青年群众到自己组织的周围。过去青年团在青年群众中，尤其是在青工群众中工作的软弱，妇女运动尤其纺织女工运动一般的忽略，党应负相当的疏忽责任。

Ⅲ. 职工会工作

十五、国际信中说，若是党现时在产业中、在工会中、在罢工运动中，能够取得非常稳固的地位，则在将来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才会有巩固的力量。这是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的工作方针。现时各大城市的工人斗争正在开始复兴，但在这些斗争的统计中，我党能起领导作用的居最少数，甚至有些党员虽处在工人群众的领导地位，但失败恐惧的情绪与新的策略的不

了解和工作方法的缺乏，常使他们表示出比群众还落后的态度。大产业中我们影响之少，赤色工会常常是退缩秘密到党的范围以内。这些都证明党在职工运动中，还没有树起他的中心工作，还没有能针对着统治阶级经过黄色工会扩大他影响、造成他的基础的企图，给以严重的打击，去建立我党的自己工作路线。虽然在过去半年上海、香港、北方的多次斗争中，党已学得不少在工人群众中如何争取自己地位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但还须认清职工运动是党的基本工作，应注意造成普及全党尤其产业中的这一工作路线。

十六、赤色工会是我们组织工人群众的基本任务。在这非法的环境中，自然要使赤色工会的工作非常困难，但工人群众的斗争组织决不应安于秘密状态以与广大的群众隔离，故力争赤色工会公开和领导各种合法与半合法的（社会的相当容许的，并非以国民党登记的为标准）团体生长到赤色工会的组织，是我们目前工作的主要路线。不过赤色工会之公开存在与其他合法半合法团体在性质上的转变均须由斗争来争得来决定，他与公开主义合法运动没有一点联系。因畏惧这种左倾错误，便因噎废食的保持赤色工会单纯的秘密状态，不去利用各种公开机会以发展工作，这很显然的是另一极端的左倾错误。因此，党不但要注意非党的工人群众团体中的工作，并要利用任何机会不拘任何形式创造非党的工人组织，同时要尽量利用多少有点公开性和合法形式的群众组织，团结广大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以加重赤色工会的作用。但对于有封建性或半封建性的群众组织，我们只能利用加入的机会夺取群众，组织赤色工会，决不应保存或助长其组织上的封建习惯或性质。

十七、假使我们否认改良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我们

便会对黄色工会的估量有极大错误，事实上，黄色工会在现在的确已成为有群众的组织。因此，凡在黄色工会有群众有下层组织的工厂企业作坊之中，我们要有组织的加入黄色工会，进行反对国民党代理人的斗争，但不是做少数运动。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设法组织干部分子，其主要的工作应是：1. 形成强有力的工人党团；2. 综合工人的迫切要求；3. 将这些要求与揭露国民党及黄色领袖之欺骗政策联系起来；4. 要求黄色工会民主化（工会委员代表组长等由大会选举等等）。使群众赞助我们的政策，改变黄色工会，使之成为真正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工会。然当着我们在黄色工会已取得多数而仍不能推翻黄色领袖和改变整个工会性质时，即应将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多数群众组织赤色工会。同时我们要在这些黄色组织中坚决的反对国际改良主义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所施行的种种企图。

十八、在反对黄色领袖、争取工人直接利益、发展赤色工会影响的斗争中，群众的罢工确有很重大的意义。在准备罢工与选择罢工的时候，我们应估计可以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应尽可能的发动群众的直接斗争形势（即是直接选举代表，关车，关厂等等），在群众的拥护下，成立直接指挥罢工的机关以脱离黄色领袖的影响。

凡是遇到工人群众的罢工，尤其产业工人的罢工，党应动员所属地方的党员全体集中力量来参加指导和援助这一罢工，以影响其他产业与工人群众，因为这是党争得在群众中的地位的最好机会。指挥罢工的机关在罢工后应尽可能的使他成为事实上的工厂委员会。不仅在罢工中，便在经常的小斗争中，也要设法取得组织工厂委员会或定期的工人代表会议的机会；同时必须注意要尽可能的用各种方法组织工厂委员会性质的工人

组织。在工人运动中要使工农联合问题不仅得到宣传上的联系，并要与一切实际斗争密接起来。

Ⅳ. 党的组织问题与党内生活

十九、依据目前的全国组织状况，可看出党的弱点极多，主要的如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削弱，上级组织有许多架空机关，巡视工作一般的缺乏，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不正确，这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但决不能因此便忽视党的组织存在，否认在这些现象中的小小进步。假使这样只有走入取消派的倾向，丝毫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长期耐苦的工作精神。故党在组织上的正确路线，必须认定：（一）欲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要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寻求积极而斗争的分子吸收入党，以改善党员的质量。（二）支部是党的基础、群众的核心，党要以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创造支部生活并以试办工厂小报为联系党与群众关系、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武器。（三）地方党部目前在组织上应以建立中心工作，实行党内正确的民主化，造就工人干部，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分配宣传品的工作，指导党员职业化为其中心工作。（四）上级党部应多努力于政治及中心工作的指导，加紧巡视工作。（五）党与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划分，两者中间不同的性质必须弄清，相互的关系必须有正确的规定。在这里我们更应深切的认识国际的指示，建立产业支部及其工作与加强党的理论上武装，实成为目前组织上两个不可忽视的任务。

二十、六次大会后党内生活的确表现了一些新的精神（在六次大会正确路线之下工作的新精神），但因为有些同志对于决议案还不了解，致发生组织不正确的主张。有些同志主张党

内和平，有些同志主张极端民主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些同志发生组织的消极观念。现在秘密条件之下，所有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改组派以及第三党的领袖将我们包围得异常严密，而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又甚浓厚，我党不独应当注意政治路线的正确运用，还须注意党内铁的纪律的保障。各种不正确倾向对于党的生存都有莫大关系：不执行党的决议就是削弱党的战斗力与党的领导；闹党内纠纷就是妨碍党的进步；否认党的旧基础，蔑视党的组织力量，就是发展党内取消主义的倾向。对于不正确倾向，没有什么党内和平，破坏党的纪律，是布尔塞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自然中央以及各级党部每逢遇着不正确倾向发生时，在执行纪律以前，必须很注意于审查这些倾向。

政治局为新中央执行第六次大会的决议与国际训令的时间虽然很短（仅只半年多），但已经将党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下挽救出来了。在每一次领导工农运动之中，可以很显明的看出党的进步。中央只能在得到全党共同努力的时候，才能很实际的执行大会与国际的决议。也只有运用正确的政策，纠正一切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的错误与弱点，有系统的耐心的训练党的干部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发动党所有的力量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党才能执行自己的革命任务，夺取群众到革命方面来，领导他们达到胜利的暴动。

中　央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

亲爱的同志们：

看过你们的政治局底报告与新中央自六十三号至七十七号通告（按即一号至十五号——译者），以及各地党部工作报告等材料之后，我们感觉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根据中国局势之变迁，所决定的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批准过的新策略，在根本上新中央虽能运用遵行，但是全党整个的执行程度仍然非常薄弱。譬如从你们的报告与通讯中，可以看出，在党内仍在有普遍的散漫与无组织的现象，这对于党的工作发展大有妨碍。因此必须很快的使全党对于党的路线有清晰的了解，在最短期内克服这种现象，并须以伟大的贯彻精神与坚决的态度，鼓励全党党员群众，完成迫不容缓的基本任务。

现在的危险，我们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很深刻指明，就是有一部分的党员以及一部分在革命高涨时期受党指导而同情于党的工人，对于革命的前途是很怀疑的。在现在革命的工人运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下，这种危险非常严重。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发生的消沉与犹豫的心理，是过去得很慢。因为反革命进攻的结果——对于党的组织与黄色工会的打击，在许多懦弱的人们中很容易发生超过实际情形以外的悲观，甚至于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

以为革命运动已经完全失望而消灭。另一方面，在国内战争停止之后，全国一部分经济的活跃，造成了发生幻想之相当的基础，以为在中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健壮”，开辟了中国政治经济和平发展的道路，新的革命高潮将不会发生或者无论如何也要延长到遥遥所期。

这种观点，对于现在的环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知道促成革命高涨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统治阶级绝没有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观点是中国党第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所肯定的，他不仅只有理论上的根据，而且在详细的研究了最近一年内的事变之后，已经找着了许多具体的证明。

现在政治局势中之根本矛盾

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企图在民众中间造成一种幻想，以为可以由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和平的解放出来。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大家又公认中国某种的形式上的主权（例如关税自主），实际上是搪塞了“帝国主义滚出中国”的口号，而把中国束缚得更紧。特别英国在南部、日本在北部尽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由这些事实上来看，如其说以“外交方法”来乌托邦式的解放中国，不如说是在瓜分中国，以准备着与此相密切联系的前途——帝国主义战争与军阀互斗。

自然，帝国主义列强对付中国的战线绝对不是巩固的，而且也不会巩固。这里首先就表现着美国与英日的竞争。假使没有这一竞争，则日本在自己积极用兵于中国北方的时候，绝不至于半途动摇，而且英国（其他各国也是一样）也绝对不会承

认中国的关税自主与修改不平等条约。这是事实，但是不应当夸大这种事实的意义。

在中央第六十五号（第三号——译者）通告上，认为美国与英日的根本政策是完全冲突，这是不正确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与英日一样的是帝国主义的，区别只是在应用这种政策的方法。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的原则，绝不是使中国有脱离殖民地的政策，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假面具，这种假面具可以帮助遮饰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因为在现在的客观条件之下，美国需要应用比较英日不同的帝国主义的策略。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将政策的重心用在取得经济的统治权以及在财政与外交上制服中国政府，使中国政府希望他只是友谊的态度而没有地盘的及势力范围的侵略，不像英日在中国用强迫的方法来巩固他们在中国的地位。

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没有能力进行一种独立的民族政策，他企图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主要的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取得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机会，但这是一个空想。事实上除了在某一时期适合于某一大帝国主义（现在如美国）的利益以外，他不能得到任何其他新的“权利”。只就一九二九年二月一号南京政府所公布的关税细则看来，就可以知道南京政府不能够得着比这更大形式上的权利，帝国主义所承认的关税自主非常微弱。这种的关税税则仅只能相当的提高南京政府的收入，而不能适合于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软弱，在这一税则上得出了很明显的反映。在目前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绝不反对中国有相当巩固的中央政府，反而要希望一切过去的及将来的借债都有保证。每一个关于保证债务的条约，都要促成中国更深入于殖民地的束缚。

去年一年中国的一切经济活跃，一直到现在，大部分仍然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影响到中国民族轻工业（特别是丝业到现在仍在停滞之中）。同时各地方中国民族工业仍然继续着转递于外人之手（有些企业卖给日本人了）。固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之相当的发展虽然是很困难，但在最近的将来是可能的。因此，中国全国生产力向独立的民族资本的路线的发展倾向，将要反对着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施行的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倾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冲突的过程中，将要一步一步的出卖中国独立的民族利益。假使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叛变革命以后，已经买办化了，完全继续着以前的地主军阀政府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民族工业独立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绝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但是这一政纲的本身，是一种经常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实际要使民族资产阶级屈服于帝国主义之下。并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部分与各个帝国主义有经济上之共同利益，使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各部分的资产阶级与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帝国主义有相互的联系，在民众中间发生了反对与他相竞争的帝国主义的运动的时候，则资产阶级在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也要利用这种机会（例如现在汉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并且即是在这种资产阶级的运动中，只要这个运动牵动了广大的民众，资产阶级立刻就要反攻。

共产党的任务在于揭露这种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发动广大的劳苦群众与小资产阶级，进行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使这些群众脱离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同时揭破国民党政府的反革命作用，指明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之表面的反对态

度，来遮饰他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使中国走到更陷入殖民地的奴隶地位。

无论由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完全解放或是中国真正统一的实现，对于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的政府，都是不能实现，而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利益的任务。国民党的南京中央政府仅只是口头上是一个全中国的政权，事实上并未曾统一全中国，而且不能统一全中国。不仅满洲，并且许多西南各省的政权，事实上是离开南京政府而独立的。国民党的军阀独立的管理他所统治的省区，差不多与旧式的督军一样，在全国经济不统一的状态中，这种军阀不仅在保持着半封建的关系上而存在而发展，并且应当注意在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后面都隐藏着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希望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他们在将来的国内战争之中成为自己现成的工具，这样使国民党及其政府成为帝国主义掌上的玩物，而预先执行他们的计划。

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相互的矛盾，不仅是反映着中国各派军阀之历来的斗争以及帝国主义之相互的冲突，并且也反映着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参加这一统治联盟，在此联盟之中进行着争夺阶级领导的斗争，但是若是夸大了这种现象的意义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战争力，那便是错误。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之中，曾有一处表现这种夸大，那里说“资产阶级现在企图给豪绅地主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样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号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也说资产阶级（并说到商业资产阶级）预备着“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不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愿去这样做。一九二七年革命的震动及工农运动的高涨不是空过了的，确使当时阶级的矛盾，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另一方面是资产阶

级与地主的斗争，走到最紧张的时候。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变表露出资产阶级最后的转变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了，向帝国主义投降，放弃了彻底的肃清封建残余的斗争。中国统一与解放的任务，与土地革命及肃清一切封建残余的问题有很密切的联系。解决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间的三大问题，只有革命高潮与工农专政的政府能够做到。至于现在的环境，则是农业危机的逐渐紧张，农民的状况日趋贫困。许多区域（山东、直隶、山西、甘肃等）的饥荒，据报告有两千万的饥民，不能说这种灾荒是偶然的天然的现象，这与农村经济的崩溃有很密切的联系。中国农村经济需要改良灌溉耕种及整理水利等等，但是农民在地主高利贷及军阀无限制的掠夺之下，甚至于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产工具，使单纯的再生产也不能够继续。因为中国最多的是小地主经济，使减租政策也难于实行，就是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法，因为没有剩余土地的关系，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就是对富农与佃农的让步也是不可能，就是小的改良仍然没有实行。去年在革命势力逼迫之下所规定的减租，仍然被反动势力战胜了。中国资产阶级与土地关系的密切联系，使资产阶级或是由农村中直接收入许多地租，或是间接的以高利贷及商业资本剥夺农民，就是这个事实，就可以使资产阶级不能去实行农村的改良。若说这一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合组的国民党政府来实行改良，更是没有希望的事。

因此，不仅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未曾解决，而且中国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未解决，这是很显明的事实。一切所谓中国走向基码尔道路的发展，都是些无稽之谈。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日益紧张，不可免的走到新的革命恐慌的过程，而且比较以前更广大深入。

在每一时期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形与正确的分析，向党员的群众及一切革命的工人经常的解释这种过程及其前途。对此必须特别注意根据具体的观察，去说明新的革命高涨发展的速度问题。

很明显的，关于这个（发展速度）问题，中国党第六次大会已经给了答复，我们现在也只有很少的补充。六次大会说“最初的薄弱的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并且说“不可以过分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虽然在许多区域中发生了群众自发的斗争，工人群众的心理已经有了相当的转变，消沉的情绪已经开始转变到复兴的状态，但是这种估计，一直到现在仍然保持他的正确。

在一部分中国同志中间有一种倾向，以为高潮是一个“短的前途”（这可以说是革命的急性病），就是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也未会完全脱离这种心理。因此有许多地方发现着夸大了反革命内部的分离矛盾的紧张。例如在中央第六十五号通告（按即第三号通告——译者）上，我们看出了这种意思，说资产阶级“正在准备对桂系的战争，因此，反动政府更快的走向完全动摇崩溃的道路”。这种结论是表现着相当的过于性急，我们不能说国民党政府在这半年中间是“很动摇”，应当承认新的革命高涨的成熟还是走得很慢。

一部分同志以为现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是会使革命的高涨牵延到很长的时期，这是同样不正确。一般的说来，理论上自然不否认直接革命形势（可以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有延长几年的可能。但是若以为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将有长期的“和平的”发展，没有严重的经济组织的动摇（农村经济的危机，饥荒，个别民族工业的危机），没有帝国主义的激烈的

冲突，没有军阀间的武装战争，没有无产阶级更大的斗争，没有乡村的农民暴动——以为这样，便是很大的错误。在这许多的危机中，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在现在的条件之下，他们彼此正在互相斗争的派别可以暂时作更可耻的更卑鄙的结合，以延长他们的命运，但是因为他们每次的结合与妥协，都是要加重劳苦群众的负担，这自然要引起劳苦群众的反抗，这就造成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前提。

共产党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中，不应当以这一种或那一种可能的极端为出发点，而必须常常对于环境加以正确的明晰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现在是准备群众走向革命高潮的时期，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注意。中国共产党应当使党的本身以及广大的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准备着将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来建设革命的工农德谟克拉西的专政。假使共产党不预先整顿自己的队伍，不巩固自己在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影响，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在农民中的领导权，就是发生了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也不能利用这种客观的条件，来取得革命的胜利。

策略问题与党的最近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还未能很充分的使自己的革命工作适合于转变的客观条件，这一点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党很大的缺点。

中国党是革命高涨之中产生而发展的，他的斗争经验是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及公开工作条件之下取得的，他并没有准备着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的秘密工作。因此反革命的进攻

已经使他走到组织很涣散的地步，使他现在遇着非常大的困难，干部中之知识分子的过多，绝不能减轻他在工作中的困难，没有充分的布尔塞维克的经验，不能正确执行日常的革命工作，许多绝不是很坏的同志完全成了消极的状态。还有在中央的一次通告上所说的“等待”，如像许多等待军阀战争（蒋桂战争），以为战争可以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另外还有人等待着国民党实行民主，以得着公开工作的条件。过去之“左倾”与右倾的残余与现在这种情趋有很密切的联系，这都是过去的残余在新的形势上的表现。党应当很明显的认识，由此所发生的一切危险。

在现在的环境之下的特别危险的是右倾，中央在第六十九号通告之中曾指出过，是很正确的。我们在工农群众中间的工作，是应当利用一切公开工作的可能，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假使只注意到这种策略的一方面，则只是指出了这一方面利益。但是，这种观点表面上是使自己的工作适合于新的客观条件，事实上会是放弃了革命运动中之旧的根本的任务。要使我们的工作适合于转变的客观条件，绝不是放弃革命运动中之旧的根本任务，他只是说在新的条件之下，为实现旧的基本的口号与任务起见，需要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所谓尽量利用公开的可能，这一口号只应当这样去了解。但是有许多公开主义者得着相反的观点，他们为着不放过公开工作的机会，所以提议降低党的口号，以为这样不惊动政府，而避免政府对于革命运动的干涉。照这些人的意见，参加公开的群众组织的工作实际上是作改良主义者的工作，于是利用合法工作的可能，便变成了对于合法条件的屈服。拿这种公开工作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相对照起来，则这种公开工作绝不能使我们得着工作的成绩。合法主义者将要认为秘密条件下的共产党，一切原则上的批评

是在实际条件下的不可能武断办法，而且中央的通告是不合于实际工作，障碍着工作进行。因此，这种合法主义在最后就形成了取消派的倾向，这是与共产主义的指导与共产党处于相反地位的。因此在现在这个时期以内，中国党第一个基本任务是巩固秘密的共产党，加强他的组织与威信，以及他的领导的影响。合法倾向在始而不明了这种工作的重要，阻碍这种工作的进行，最后会走到与这种路线完全相反的地步。

现在中国革命中右倾的危险特别严重，因为国民党的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方法来扩大他在小资产阶级以及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因为如此，所以一面对共产党员们屠杀政策，同时继续进行公布一些社会改良的条例（部分的减少工作时间，分配红利等等），如南京政府立法院与上海社会局所公布的一些条例。资产阶级的一切民主的及民族改良主义的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幻想的空气，以为国民党的左派领袖还希望反对封建地主与军阀以及保持民族自由而反对帝国主义。

这种空想对群众的影响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因为他在口号上与实际上的区别是非常显明。但是在相当的时期之内，他可以对群众发生影响，我们不能轻视这种危险。在现在因为共产党的组织力量的薄弱，我们的工作十分困难，国民党人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工具，利用一切统治阶级的权，在一个相当的时期中，保持着一部分群众对于他们的幻想。假使在共产党员中（无论怎样少），对于国民党还有妥协的与尾巴主义的政策，那么，就可以知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劳动群众中间，自然更没有肃清对于国民党政策的幻想。

肃清一切的幻想，揭破国民党的政策之假面具，发动劳动群众去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准备群众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就是现在时期中的第二个重要任务。忽略这种任务，就是以

上所说的右倾危险，应当有反对这种现象的斗争。

我们并不是说，中国党内的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完成，并不是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派别。党员在现在是有了个别的右倾的错误与动摇，党若不用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干涉他的发展，则他将成为很大的危险。去年一年中许多党员脱离党的现象（甚至于向国民党政府自首），这就是党内右派危险的征兆。这种危险在党外职工运动中将更有力量。无论在党内或是群众中，只要那里表现着有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都要用坚决的彻底的手段来反对他。这种工作，特别要揭破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假面具，如像现在还有从左面批评国民党的第三党谭平山等他们反对共产党的斗争，事实上他们已成为国民党的工具。在中国党中央的一切通告中，我们没有看见一点关于反对他们的特殊指明，没有看见与这种反共产主义团体的斗争。

中国党六次大会坚决的号召全党起来纠正“左倾”的危险（盲动主义、军事投机、个人恐怖等）以及所谓国民党式对待群众的方法（命令主义）。因为客观条件的变更，盲动主义及军事投机的危险，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是假使以为“左倾”错误的残余已经完全肃清，这便错误的。在去年夏天中央所发的六十一号通告中，还写了许多盲动主义的计划，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区，准备着军事行动，还说首先要打倒最反动的桂系，又六十一及六十三号通告中还可以看见以许多“左倾”的话头，来代替实际的革命行动，如“杀死一切豪绅地主!”“消灭一切封建势力!”等等的口号。甚至最近一次中央所发出关于年关（十二月到一月内）期内地方党部工作的七十一号通告中，我们还看见对农村工作有这样的号召：“都到豪绅地主家里去过年!”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倘若以这种空自夸大的高调，并不能引起任何的群众运动，这样决不能

巩固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仰，适得其反的要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只是表示与群众的隔离。六次大会说左倾是“不愿意进行日常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和“不承认部分要求争斗的必要”，这种左倾的病态在党内还没有完全消灭，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出不明了工会工作伟大革命意义，不知道正确的去利用公开可能，和不了解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联系等等的现象。正因为不会照着革命的原则去运用争斗的公开形式与方法，以为在运用这些公开形式与方法中，必将发生右倾危险与公开主义的幻想而裹足不前。

对于不觉悟或者半觉悟及动摇群众的革命教育和说服工作，本来是一种极难的艺术，若不从实际工作中去求了解，就不会正确的明了这种意义与必要，因此现时中国党的第三个基本任务就是——消灭党与广大劳动群众脱离的现象，获得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并使其革命化。不了解这一任务而事实上仍沉溺于“左”的病态中，这种形式就等于怠工。中国同志在口头上是完全正确的接受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关于获得群众的决议，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党员都在认真的去执行。此中原因最主要的是“左倾”危险，党应当无条件的彻底的肃清。发展在劳动群众中工作的时候，党要特别注意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性，因此，中国党要特别注意民族的问题（特别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六次大会特别指出本党非常重大的错误，就是轻视反帝运动及放弃反帝运动中的领导。不过我们应当明确了解我们参加这种运动决不是帮助国民党之反对派式的把戏。我们的参加是要使为一部分资产阶级所影响的反帝运动，变成劳动群众之真正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他同时又是反国民党的运动。

中央在最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部分要求，他可以称为最近

党一切日常活动的主要政纲。为揭破国民党的这种假民权主义的政策，唯一的动员群众与反对国民党，这些工农群众一切政治自由（自由、集会、出版等）的要求，将比以前有更大的意义。但是每个环境中应当注意日常口号与党的基本口号正确的联系，中央通告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时常是正确的。有时候没有注意到日常斗争的口号，有时候没有注意到党的基本的口号，这都不适合于党的斗争的利益。

有时候党的主要宣传口号很机械的与日常斗争的口号摆在一起，如有时写许多直接行动的口号，而同时又写一些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口号，如没收地主土地、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等等，这只能加增群众心理中的糊涂。

在现在一切日常的斗争中我们注意策略路线的目的，是要尽可能的准备我们党以及广大劳苦群众的力量，以备实现革命高潮到来时的任务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根据这种观点，使着这类部分要求（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的武装，加紧在铁路工人及兵士中的工作等等）在现在已经有了极重要的意义。党对这些问题，要特别注意共产党员在一切群众运动中，罢工运动、农民运动、反帝的群众运动中的积极参加，应当是向着实现这一战略的方向去做，庶可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决心，结合城市与乡村广大劳苦群众都绕围着在工人阶级的周围，以保障着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因此中国同志要特别注意并认真的组织群众，准备在某一适当的环境中来实现总的革命罢工、铁路工人总罢工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方法。因为这种斗争的方式，可以征集全国革命力量于无产阶级周围，于中国革命中将有极重大的作用。

工 会 工 作

所有的党员都应当知道，若是在工人阶级的中间没有坚固的基础，在各企业及工会运动中没有广大工人组织的基础，党便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握着领导地位。要使同志知道，若是党现在产业中在工会中及罢工运动中能够取得非常稳固的地位，在将来激烈的阶级战争中，会有更巩固的力量。

在六次大会前中国党的中央曾经指出，革命工会自武汉失败以后，曾由七百三十四个减到八十一个，当时中央说黄色工会有四十个，并且还有六十四个没有群众的。从这次通告之后，革命工会的环境自然是继续的恶劣，国民党工会继续增长，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实。假使我们承认在中国的条件之下，不允许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有广大的稳固的基础，那我们对于黄色工会（如上海七大工会）的估量就有极大的错误。事实上这类黄色工会是中国工运中革命发展的有力障碍。经过这种工会，反革命统治的政党企图在工人运动中造成自己政权的巩固的基础，使他们的代理人包办工会中的领导，而有时用恐怖的手段破坏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工会。对付这种国民党式的法西斯蒂，共产党应用尽各种方法在工会外或工会内进行积极的有系统的反对他的斗争。

在现时环境之下，我们应当努力恢复并强固革命的阶级工会，在这不公开状况中，自然要使我们的工会工作非常困难。因此我们一面应当为我们秘密的工会找着公开的遮饰；一面加紧秘密工会的组织工作，使其强固而争得半公开的存在。在产业中应当进行反对压迫与限制工会组织自由的运动，每个工会巩固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各个产业上，要受着党的支部的指导。

可是我们的“党团”（甚至在赤色工会中）——在大企业中革命工会已有强固基础的地方，应当利用时机直接取得事实上的公开。最好的机会自然是当着革命分子领导罢工而得着胜利的时候。在某些条件之下许多公开的社会团体，如兄弟团、同乡会等（可组这类性质而名义不同的组织）组织，可以作为赤色工会的公开掩饰的工具。此外工厂委员会组织及定期的工人代表会议等，是发展公开及半公开的革命工会，那是非常错误的说法。不要忘记除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以外，还有有群众的公开的国民党黄色工会。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钻进国民党的群众工会中，而引导群众脱离黄色领袖的影响。共产党员以及其他的觉悟的革命工人，无疑的应即加入黄色工会而进行反对国民党代办人的斗争，必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夺取这些组织中工人的大多数，以及使他们团结于秘密的共产党支部的周围。在工人罢工及一切的斗争中，必要揭破黄色领袖一切妥协的卖阶级的面具。必要要求工会内部实现充分民主化的方法，由大多数人自由选举自己相信的代表来参加工会的指导机关。应当坚决的反对“被选举的人一定要是国民党员”的条件，这样才能根据工人自己的经验，使工人阶级明了国民党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反动势力。

只有这种方法才能破坏国民党的法西斯蒂的工会系统而可在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工会发展的基础。同时我们要宣传反对国际联盟的劳动局，反对亚姆斯丹国际，反对日本的改良主义者、苏德走狗布基等所召集的亚细亚劳动会议。

在反对工会法西斯蒂主义、争取工人直接利益及巩固革命工会运动的斗争中，在这时期中罢工有很大的意义。在准备罢工及选择罢工时间的时候，应当正确的估计到可以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直接指导罢工的罢工委员会应该完全离开黄色工会

而独立，应当是在罢工开始的时候，便由当场的工人中直接选举出来。并且在选举的时候，应当预先在那个企业的工人中进行充分的宣传，指导罢工的工作，应当与当地的或最近的党部建立很好的秘密联系，在罢工工人每一个全体大会或是代表会议的时候，共产党员应当积极的出来表示积极的态度，向这些大多数同情罢工的工人讨论他们的重要问题与提议。

共产党员在工人中积极的宣传时，应当注意破坏仲裁法庭的威信和国民党的调和，并且指出黄色领袖的作用是资本家与政府的走狗。在罢工中应常提出所以发生罢工经济的或政治的要求，这些要求应当是罢工工人自己所叫出来的，是他们自己所感觉的重要要求。在罢工的时候，应当尽力使罢工委员会及工人的代表机关，使为资产阶级政府承认是代表工人谈判劳动条件的全权代表，在这时候，假使这个企业中有国民党的工厂委员会，便应当乘机宣传改选。即是当着罢工已经完结的时候，也应当使罢工委员会不立即解散，应当尽可能的使他事实上变成工厂委员会（或者需要改选他的成分）。

关于党之组织及思想的巩固

照中央的材料来看，党之组织之状况，可以说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中央第六十九号通告说，“城市支部大部分都是散漫的，许多的工人积极分子都找不着党，因此相续不断的都脱离了我们的组织，大多数的活动分子，都没有职业，脱离了群众，依党为生活”。照政治局的报告说，全党的工人党员最高限度不过四千（其中上海占一三〇〇，香港占六〇〇，其他的大城市中更非常之少）。在大多数的城市中，甚至于在最大的工人中心如武汉、天津、广州，“什么工作也没有”。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央在六十九号组织问题的通告上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正确的指示，指出首先要注意工业中心重要城市的工作，要注意重要的产业工人，要吸收工人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号召没有职业的失业党员到工厂中去，建立产业支部及其工作方法，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健全地方党部，改良指导机关的工作等等。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将中央所提出的这些指示能够真正的去执行。在中央所指出的这许多任务中，有两点我们觉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想特别指出这两点的重要。

第一，建设生产支部和其工作。党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健全的生产支部，他是在周围的工人群众中有领导的作用。生产支部的数目已经很少，并且还逐渐减少，在大而重要的产业，简直没有支部。中央通告第六十九号说，“譬如在上海那里最多的是手工业支部、店员支部，所谓产业支部，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完全没有”。支部内部生活在现在非常之薄弱，大多数的支部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实际问题，没有集体的讨论，也没有支部内部的分工。在这种条件之下，支部一方面是脱离了群众，另一方面又不能训练自己的党员（有时候说勇敢的工人入党以后反变成怯懦的了）。因此现在的任务，要用尽一切力量，坚决的去恢复产业支部中的支部生活。没有这个党是不能前进的，不是这样，党便会腐化，因为这样可以消灭自己之生存的一切的组织基础。对于这部分工作，在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集有极丰富的经验，中国同志应当学习这些经验，并正确的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中去应用，只有建立这些积极的有能力的虽然是小的秘密的产业支部，才可以造成党可靠的基础。

第二个任务是加强全党之理论上的武装。这里首先就需要严重的去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应当知道不仅在党的指导中间，

并且在一切宣传煽动的人才中，若是没有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上的预备，则党员群众便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在将来形势转变，政治问题复杂；对于党对于革命进程都有严重意义的时候，党一定不能正确的应用适合于环境的策略。因此必须加紧党员的政治教育，必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要在党员群众革命青年中进行特殊的教育工作（办党校政治班、发行通俗的关于马克思的书籍等等）。在现在特别要使全体党员认识国际的纲领、六次国际大会的决议、中国党大会的决议。忍性的细心的原则的解释，同志关系的批评，在现在反对党内右倾左倾的斗争中，应当成为最主要的工作方法。至于政治洗刷式的开除党籍，仅止是在他实际上屡次不改正自己错误的时候才能应用。现在在中国共产党中对于这一种方法不能广大的运用。

六次大会关于实行党内民主的指示，中央以及一切党的工作人员应当尽量的去执行，只要是秘密条件下是可能的（譬如选举制便不能在所有的党部都实现），在党内民主的口号之下不应当发展派别的意气的无原则的斗争。这种现象不幸在中国共产党内依然不少，党应当用尽一切必要的方法，首先是说服的方法来肃清这种现象。全党的义务，要不动摇党的一致，党的纪律以及指导机关的威信，应当反对一切同志之破坏党之行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努力党的巩固，应当知道没有坚强的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绝对谈不上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除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

各省各地的活动分子都有机会来了解认识这一封信。

（二）关于农民问题，我们认为还有他的重要意义，这一封信上并没有说到。关于这个问题，在最近再给你们专门的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九，二，八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朱德、毛泽东。

PDG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1]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二、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

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让我在下面预说出来。

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2]，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军党组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之机。自四军成立以后，党从连上建设了普遍的基础，现在上级指导机关对于斗争策略的正确（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前委），边界各县地方党部之建立，群众斗争之发展，使得个人作用渐渐减少，党的领导渐渐加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四军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边界为第一个时期，这时期包括边界迭次战争的胜利和湘南的失败。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

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支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

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3]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支长枪一连的制度[4]，然还没有能触及短枪[5]，拨枪交与地方没有第一时期那样困难了。这时期内少数同志极力把头低下来，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来都是如此的。在这时期内有几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是在湘南失败及大余一路逃难形势之下，个人没有显出什么大领导，同时非依赖党的领导就会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时期有迭次的军事胜利，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一原因。第二，这时期内党的组织与同志们的政治程度和斗争经验比起第一时期来确实进步些，少数同志不正确的言论行动比较不容易得到一般人的拥护，因此自己要收敛一些，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与二、四团。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特别是柏路会议讨论四、五军合编问题时，彭德怀同志的愤激的表示，给了少数同志以颇大的打击。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6]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

从汀州到现在是第三时期。这一时期内党及红军的各方面

实在都比以前进步了。因一、二、三纵队的编制，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7]纵队委员会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各级党部更能无顾忌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短枪的数目也能规定。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职权也有限制了。这都是关于组织方面的。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任务能在工作上去求实现了，城市政策的执行更好了些，宣传进步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术学会了，因时局的开展红军的组织也扩大了。但因为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少数同志坚决地要军委，遂不得不攻击前委，于是涉及党的机关的本身问题，“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在辩论中论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说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这亦是由于党的管辖范围一问题生出来的，因为他们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张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以上是他们在湖雷前委会议时发表的意见，议论问题虽则分成了三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自近日争论问题发生之后，有的同志觉得四军的党到来了一个危机，如果少数同志作的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那么必至如你的来信所说有一种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会要到来。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为

现在的四军的党是比第一、二时期都有显然的进步，各纵队的基础已是不能动摇，个人自私的欲望决定会被群众所拒绝，我们只要看四十一个人会议中三十六票对五票取消那少数同志们硬要成立军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他们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了。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即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下面各项大体说来（均其分支）没有一项不是有正相反对的两种意见，我们试简单举出。

四、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因长期斗争经验和工农群众的影响，这种单纯观点的头脑，渐渐洗刷了一些，单纯的“打大仗”和“拿几十个州县”的观念比较地减少了，但没有完全消灭，遇有机缘就会发作，特别是在军事失败时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这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少数同志们不但不肯努力去消灭小团体主义，反而有助长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从前代表这种思想的人，至今还不能说是已抛弃这种思想。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我们不要忘记，湘赣边界割据问题在四军党内的一致仅仅是表面的罢了，骨子里面是有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一到危急时候，这些

同志马上[8]，参加过湘赣边界斗争的人大家明了的。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在群众的心理上，因为多数人做了、少数人做好，结果便发生不良的影响。

对时局的估量亦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对于红军行动的意见也就不同了，特别在边界时是很显著的。去年七月四军大部往湘南的一致处，同志们大多数都承认是错了的，沙田的代表会议亦是这样承认，不料近日少数同志之中的奇异见解，却说往湘南是对的，留在边界的倒反是错了。这也是见解上极端相反的证例之一。

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说话完全不顾及这话将要发生的影响，不管对不对，乱说一顿便了。“你乱说就是，横直他们只晓得那多”，这是何种非科学的态度！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的”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然而同志中显然有一部分人是有意无意中在拥护这种现象，至少对此现象没有和它奋斗的决心，遂使红军至今不能建设一规模，

比起资产阶级军队还相差得很远，这实是一种可叹的现象。

“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这是朱云卿同志形容四军军事技术太差的愤激话。凡在四军生活过的人，大概没有不承认四军军事技术到了很差的程度了，但是偏有一些同志对于训练军官的本职不愿去管，却天天作些政治上的鼓动，发生什么“土豪不能打还有什么事做”的怪话。这种现象不改变，四军的军事技术问题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五、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他们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这不是完全形式主义的说法吗？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找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我们只要查明了四军的历史，就容易明白这回争论的实际意义了。

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他们提出攻击的理由最具体的是：（一）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二）四军党内有家长制。他们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党的组织代替群众

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连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但是少数同志的形式主义又要在这里发挥了，他们说党部机关虽没代替群众机关及政权机关，但实际上纵队司令部少向军司令部打报告了，军司令部淡了。少数同志们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纵委或前委的领导加强，一切问题（凡是他们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够提出在会议席上讨论决定，然后通知政权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否则谓之自由行动（如自由支配财政、自由支配枪弹等）。这种表现是党部领导力量加强的证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每次会议，政权机关的负责同志都是到会的，而意见也参加了，而且许多问题是要这些负责同志提议才能讨论的（如作战计划、官兵训练计划等），大家都参加了问题的讨论和表决了，会后拿去执行起来，因而觉得行政机关简单了一些，自由了一些，于实际上究竟有些什么要不得呢？军长闲起了，但是党代表（与党部书记是两个东西）的闲起更甚，因为没有下级党代表向他打报告。纵队司令部少有报告打到军司令部了，但是纵队政治部打到军政治部的报告更少。不问后来的状态比从前行政自由支配、比从前报告打得多的热闹的时代——湘赣边界的初期，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至于指责到湘赣边界的行委，不问行委制度在边界斗

争中收了多少效果，只是形式上以为是党的机关代替了行政机关而认为要不得，这又是同样犯了形式论的错误。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边界的行委制度在边界的斗争上有过很大的效果，这是有眼睛的人都明白的，而且行委一面是在内的党部，一面又是公开的行政机关，有什么妨碍行政机关的系统的呢?

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于此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四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乱说必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么，我们看一看，四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一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说到各指导机关的产生，从支委到纵委、前委是中央委派的，但这不能作为四军党内家长制的证明，四军党内事实上寻不出家长制。为什么少数同志有这种借口呢?这种话有什么客观的来源呢?是的，就是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红军党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党代表与书记在职务上是两样东西，因为党代表与军官的权限历来没有弄清楚，时常发生争权问题，由是

引起了头脑不清楚的人把党代表在那里工作看做是党的书记在那里工作了。三纵队几个连上的同志叫那个连的支书做“老板”，就是这样牵挂来的。要除去此弊，只有使党代表与书记分开，这是应该一面从内部找人，一面从外面多找人来才可以解决的（从前的兼任是因人才太少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

六、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

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9]，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C的敬礼！

毛　泽　东

六月十四日于新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给毛泽东的信。

〔2〕原文在“抗分”后脱漏八九个字。

〔3〕“建设”二字，从上下文分析，疑为“批评”二字之误。

〔4〕原文在“制度”后脱漏七八个字。

〔5〕原文在“短枪”后脱漏约三十个字。

〔6〕原文如此，可能是指花名册说的。

〔7〕原文在“纵队委员会”前，有三个字不清。

〔8〕原文在“马上”后脱漏三四个字。

〔9〕原文在“奋斗”后脱漏七八个字。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Ⅰ.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问题

（一）无产阶级定义问题——这一问题在党内曾发生过，以为没有产业工人的地方无法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如山西的党以为只能发展乡村工作，城市中没有工作可做。相反的意见，又有同志以为党只要在城市中有无产阶级基础就够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并不重要。在讨论中已经说到，手工业工人及店员在城市中比较其他散漫的意识是接近无产阶级意识的，因为手工业工人虽是小资产阶级，但产业一发展首先走到产业工人中去的便是他们，我们应认他是产业工人的代理人。农村中的雇农，也是农业工人，中国除江苏及满洲一部分外，虽尚没有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法，但他们是有走向农业无产阶级的前途的。土地革命成功之后，乡村农业发展，雇农更走向无产阶级的道路。所以广义的说，无产阶级自然应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而手工业工人、店员及乡村雇农也是党发展无产阶级的对象。中国是小农家庭经济占优势，使中国没有广大的雇农。在目前革命阶段上，党要完成革命的任务，在乡村中不仅要取得雇农而且要取得广大的贫农，即在民族革命成功的阶段上，贫

农也是建设乡村社会主义的主要成分。所以党在乡村的发展同时要注意到贫农。总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而城市手工业工人店员及乡村雇农也非常重要，而且同时要注意到广大的贫农。

有些同志以为手工业工人及雇农阶级意识不清，很容易受其他阶级利益的引诱而在主观上希望变成小工厂主或小地主。但是我们要知道，阶级的意识不系于他主观的希望而决定于他客观的经济条件，农村经济日益破产失业的农民日益加多，雇农在乡村中的成分绝不会减少，雇农绝不会在农村斗争激烈的区域或不激烈的区域中消灭。同时手工业工人亦绝没有变成小工厂主的可能，这是经济条件所不允许的，我们不应观察他个别的意识而应当看到他客观的经济条件。

（二）党员质量问题——党在目前阶段上是要特别注重质量的发展，数量是次要的。一般的说是质量与数量同时并重的。问题是党在目前阶段上应当注重质量还是注重数量？农村中质量的薄弱是普遍的现象，即在城市中党员质量亦不健全，一经艰难困苦即整个的瓦解，这就是因为质量的不健全。但我们所谓注重质量，绝不是关起门来将同志加以选择，不健全的清出去，只要健全的分子。主要的是，要在斗争中注意选择勇敢积极的分子介绍入党，而同时应当教育旧的分子，不是机械的开除出党。如上海估衣支部在斗争中不注意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只固守着旧的同志，不能接受群众新的斗争意识，以至影响罢工失败，新的分子既不能吸收入党，旧的分子也离开了党的组织。

（三）富农问题——结论上说“在富农反抗苛捐杂税时应当帮助他”，这一帮助的意义不妥当，中国的苛捐杂税的压迫使富农感到剥削压迫而有所反抗，但乡村农民不过只是富农反

抗苛捐杂税的武器，结果富农必妥协此斗争而出卖农民。所以，我们在斗争中不防止富农加入而同时也不欢迎他加入，只认为在客观上他有加入的可能。但同时，我们必须防止他利用此斗争和在斗争中与他争取中农的领导权，在原则上无条件拒绝富农入党及农会。

（四）知识分子问题——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中，同志有两种不正确的意见：

A. 以为党最近注意发展知识分子同志，是党需要知识分子做工作。党固然一方面是需要他们工作，而另一方面则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客观情形决定的。中国社会不同于欧美，社会能为他们布置很好的社会生活，又有金钱权利的引诱，所以他们在求学时代即受到了这样的陶冶，而一进社会便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中国社会则因统治阶级不能稳定，对于这些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不能有很好的设备，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很多流落于社会上没有出路的，在他们当中一定有一部分是感到生活之无出路而革命的，同时也一定有一部分是能接受无产阶级影响的。所以我们决定要发展知识分子同志，是根据他客观的条件而不完全是由于党的需要。

B. 以为知识分子在党内有特殊的使命，他们有了解理论的工具，所以应对从事于理论的研究和贡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产生于无产阶级意识中，所以很多无产阶级分子经过解释之后很容易了解；而知识分子则因大半是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出身，他们的思想常常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矛盾。又有同志以为现在党的理论基础太薄弱，应当多研究理论，结果必至成为空谈的倾向，而不注意到策略与结论。另一方面则以为知识分子只能谈谈理论，到了实际斗争及指导就不行了，也是不对的。无产阶级化是整个党的问题，特别注意产业工人，是因

为他没有离开生产机关，引进产业工人到党的指导机关中来是党的正确路线。

（五）改造党的问题——有同志以为引进工农分子到指导机关会引起工农分子的骄傲。这是由于过去太机械的执行这一路线了，应当在工作中教育他们，适当的分配他们工作，而不是只形式的来执行。无产阶级分子的长处是他有坚决的意识，所以应当使他常常参加会议而发展他坚决意识的影响。他的缺点是缺乏理论及实际工作的办法，所以我们应当在各方面去教育他，在实际工作中告诉他种种办法，但决不能因此而动摇或迟缓这一原则的实现。

（六）党员与党的关系问题——在同志的讨论中有两种意见须加以说明与纠正的：

A. 在斗争战线上失掉联络的同志，与他恢复关系时应特别加以注意。因敌人的破获或同志的告密而失掉联络的同志，应设法找他们与他恢复关系。

B. 有同志以为对于找不到生活出路的同志，党应负相当的责任。这在某种情形之下是可以的，但变成为原则即是不对的。党是斗争的组织而不是救济的或政权的组织，工会对工人生活的保障，在苏维埃政权时也是有作用的，政权的组织对群众的生活也应当负责的。至于党绝不能对党员负生活的责任，只能指示他一些策略向社会斗争。所以在原则上说，党要负党员生活上的责任，必然会走上错误的道路。

（七）党内斗争问题——有同志以为，党内发生了错误的倾向或小组织问题，只有坚决的分裂才能使党进步。但这要看当时的情形，不能机械的规定，如俄国反对派及多数派与少数派，非至必不能改变其一贯的路线时，才可以分裂出去。中国反对派机会主义派还没有广大的群众组织，我们不应夸大这一

问题，只能个别的来处置个人的错误。

（八）自首叛变问题——关于自首叛变问题，中央曾经发过一次通告，但在同志的讨论中发现有许多不正确的观念。结论所指出的都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讨论这一问题，不能从他主观上来分析他的自首叛变是自愿的还是被强迫的，应当从客观上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分析到党自身的客观条件。所以中央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首先指出，第一，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不强固，党员阶级意识不坚决；第二，是党的组织不严密，客观上帮助了自首叛变的发展，忽略了对秘密工作的注意；第三，是党的政治教育不强，党员理论水平线低，对党员不能加以很好的政治教育，给他以思想上的主脑，党员对党的关系不密切，政治意识不坚强、不清楚、不实际。这三个问题是客观上造成党内自首叛变之不绝的现象的主要动力，因此党应努力于这三点的补救，以减少客观上党的本身所造成的叛首的条件。发展党的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是实现这三个任务的主要路线。自然，白色恐怖的严酷、金钱收买、非刑拷打、权力的引诱，都足以增加自首叛变的条件，但如果党的本身无产阶级基础强固、组织严密、政治意识坚强，则至少可以减少甚至消灭这一现象。所以敌人的影响尚是次要的地位。至于叛变自首的善后，我们要站在群众利益上来解决这一问题，无产阶级的党有他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意识，我们不应是报复观念。我们不是虚无党，不应用恐怖的手段，我们只应在政治上来战胜他们。但他们假如继续的反动下去，我们为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不得不以特殊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站在组织的观点上来解决，自首叛变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党自身的一些缺点，但我们决不能因此便对于自首叛变的分子加以原谅，自首叛变的分子亦决不能以此来掩饰他的罪恶。同时自首

叛变虽有许多不同的层次，这只能决定他是否尚有革命的可能，而不能证明他对阶级背叛罪恶的轻重。

Ⅱ．支部生活问题

（一）关于支部的任务，结论上有一项说“将支部的实际生活及斗争情形报告上级党部”。这是不够的，他同时应当反映群众的意识到上级机关，领导群众斗争。

（二）有同志以为太红的同志不应参加斗争。这是不对的，党不应使同志太红，但红的领袖不应不参加斗争。

（三）有同志以为，我们对群众宣传时应站在第三者地位，不要站在党的方面。这也是不对的。在群众对党还没有了解时，我们固不应就公开的以党的名义来宣传他，但站在第三者的地位说话也是不对的，我们应当站在群众的观点上来说话。

Ⅲ．少数民族问题

少数民族问题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上海的英美日等国人民，及印度、安南、朝鲜、台湾人民，满洲的朝鲜及日本人，山西、顺直的蒙古人，四川的藏人，甘肃的回民，云南的苗族等。安南只有中国华侨支部而无安南党，马来岛、菲律宾亦是如此。各地党部应特别注意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及风俗习惯，以供给党关于少数民族策略决定的材料。

Ⅳ．地方党部问题

（一）有同志以为，地方党部不能用党的名义作宣传，这

是不对的。假如在没有群众组织及斗争的群众中，一开始即用党的名义宣传或许会发生不好的影响，但绝不能绝对不用党的名义作宣传。

（二）有同志以为，在严重的压迫下，支部书记只可与小组组长发生关系，这也是不对的。在严重的压迫下，首先应严密党的组织，经过考察来选择积极分子入党，但支部干事会仍须参加小组。

（三）在结论中说“每一地方党部应有军事的布置”。假如意义是说每一地方党部应注意军事工作是对的，假如说注意军事的布置则是不对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六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纲要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Ⅰ．六次大会路线的实施

一、中央政治局一年来执行六次大会所付与的任务，实施六次大会的路线，虽然遇着了不断的严重的阻障，但是中央领导全党同志依据六次大会的精神，坚决斗争，冲破一切阻障，战胜党内许多不正确的倾向，才使全党同志对六次大会的决议得到相当的了解，才使六次大会的路线逐渐的运用到各种斗争与工作的策略上去。因此一方面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也表现着党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了新的进展。这是充分证明六次大会的精神与路线的正确，同时是证明中央政治局一年来的坚决斗争的策略是正确的运用了六次大会的路线。现在党虽然开始了新的进展，但是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特别是右倾的危险，仍然存在，并且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还有他发展的基础。尤其革命的死敌，豪绅买办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企图扑灭我党的存在，消灭群众革命运动，这是必须全党的同志继续坚决的运用六次大会的路线和中央执行六次大会决议的坚决斗争的精神，才能

战胜一切严重的敌人实现争取广大群众领导革命彻底胜利的任务。

1. 与党内各种不正确倾向的争斗

二、中央开始工作执行六次大会的路线，首先便遇着了党内各种不正确倾向的阻碍。虽然全党同志在口头上都是完全接受六次大会的决议，但是实际上许多不正确的倾向，都是与六次大会的路线绝对不相容。第一便是机会主义的右倾危险，最明显的如当时广东省委在总的路线上，主张降低党的政治口号与第三党大略相同以求得公开的活动，在反帝运动上主张以学生做前锋来掩护工人运动的发展。在顺直更发现做青天白日旗欢迎北伐军的最可耻的行动。在其他各省很普遍的发生合法运动、和平发展的倾向。这些倾向都很明显的是与六次大会的路线绝对相反。中央依据大会的指示，肃清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的路线，在理论上作坚决的斗争，解释六次大会的路线来纠正这些不正确的倾向。广东省委经过详细的讨论以后，完全接受了中央的指示，顺直改组以后的新的省委，也是明显的改变了旧的路线，接受了六次大会的精神和中央的指示，其他各省也经过不断的纠正。但是因为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内反映着落后群众的失败情绪，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又异常薄弱，特别是改良主义在群众中影响的发展，都是右倾危险发展的条件，所以直到现在，右倾还成为党内最主要的危险。

三、另一方面，盲动主义的残余和命令主义、红色恐怖等的倾向，仍然在党内存在，特别在各省的农村斗争中，烧杀政策甚至如土匪绑票的行为，还有很多的发现，使党在广大群众中的信仰堕落，使党脱离群众的现象继续发展。中央在指导各省的过程中，很严重的指出这些倾向的危险，是与党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不两立。现在这些倾向的残余，已经很快的肃清。但是又继续发生了其他的“左”倾的观念，如忽视群众的日常

斗争，不愿意争取公开的活动；缺乏耐心艰苦工作的精神与革命的急性病等，在各级党部和同志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发现。中央一方面在理论上指出这些观点的根本错误，同时在实际策略上更特别注意纠正这些倾向，现在党内这些倾向已是逐渐减少的形势。但是决不是已完全肃清，尤其不是没有继续发生的可能。所以党对左倾危险的争斗，仍然不应有丝毫的疏忽，尤其是以为在与右倾特别危险争斗的时候，应减轻对于"左"倾的攻击，更是绝对不正确的观念。

四、中央在一年工作的当中，遇着的最严重的困难，还是党内无原则的派别争斗的倾向。首先表现的便是顺直问题，在顺直党的历史上，已经酝酿着很复杂的纠纷，到了六次大会的前后更广大的爆发起来，使顺直党成为破碎零离的现象。中央经过极大的努力派人巡视召集几次顺直的会议，特别与这一错误的倾向奋斗，最后得到了顺直全党同志的拥护，才把顺直的党挽救过来。继续发生的江苏问题表现着这一倾向尤为严重，当时江苏省委同志因为个人感情意气的作用，根据一些不正确的材料，造出许多谣言，不按照组织路线来与中央讨论，并且公开的在下级党部的会议上公开的宣传反对中央，当时的形势，几乎影响到全党的动摇。中央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特别着重于教育的精神，依据六次大会的路线来解释江苏同志的错误来说明布尔塞维克的组织原则，在各种会议上都得到了同志的拥护，最后江苏省委同志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于是江苏的党才重新巩固起来，在中央正确的路线之下一致斗争，才造成现在江苏工作开始新的发展的基点。此外在各省亦不断的发生许多无原则的纠纷，经过不断的纠正，都有渐次减少的形势。这一无原则的派别争斗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发生很大的作用，

再加以失败情绪的反映与党的政治水平线太低，因此个人感情意气能在党的群众起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一倾向不彻底肃清，不只是不能执行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而且要使党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全党同志必继续的站在正确的路线与这一倾向的残余作坚决的争斗，实行彻底肃清。尤其要注意发展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提高党的政治水平线，来扫除这一倾向发生的基础。

五、上面指出的一年来在党内发生这些不正确的倾向，很明显的是实施六次大会正确路线的莫大的阻障，只有坚决的斗争冲破这些障碍，才能使六次大会的路线正确的运用到斗争和工作的策略上去。所以中央一年来艰苦的工作的确已经使六次大会的路线开始在策略上工作上树立起来，同时要特别指出的与党内不正确倾向的斗争，必须坚决的耐心的以教育的方法，来唤起全党同志正确的认识，必须坚决的相信，一个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必然可以得到全党同志的拥护，也只有在全党同志一致的拥护之下，才能克服这些不正确的倾向，而达到正确路线之实施。执行党的制裁，只是巩固党的最后的武器，如果是极大多数的同志都深切了解了这一正确的路线，而极少数的分子仍然是固执自己的主张，反抗正确的路线，这样便是破坏党的一致，破坏革命的策略，那党就应毫不犹疑的予以最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一致斗争的精神。中央一年来的经验，证明了这一路线的正确，以后应继续坚决的执行这一路线反对党内仍然存留的不正确的倾向，以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的领导革命的使命。

2. 六次大会的路线在各种斗争策略上的运用和各种工作的优点与缺点

A. 策略的路线

六、中央在第三号政治通告上便指出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

作的联系，是一切工作策略的路线。但是一方面有“左”倾的秘密主义的反对，另一方面又遇着了右倾的合法主义的误解，所以中央指出争取公开活动，是扩大党在广大群众的影响，发动广大群众斗争的最主要的策略；同时又指出争取公开活动，决不是投降到国民党的法律下面去求得公开，并且只有加强党的秘密的工作，才能使公开的活动得到有力的领导，以反对当时左倾右倾的错误。但是这一路线各省还是很少正确的了解，在上海，直到五卅示威运动的工作中，才正确的运用了这一路线而收到很多的成绩，在香港许多赤色工会因在长期秘密的状态不能有些少的发展，最近才极力争取公开的活动，相信如果真能正确的运用这一路线，必能有很多的发展。至其他各省，直到现在还没有正确的运用，可以说是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能有新的发展的策略上最主要的原因。

B.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七、中央在分析上指出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形势日益加强，在策略上指出反帝国主义的重要，指出反帝国主义之具体方法，在各种政治通告上，指导各省信上，会议上，党报上，都曾特别的注意到，这些分析与策略很明显的是异常正确的。

八、各地党部对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开始有忽视的错误，有的以为没办法，又有同志想在学生反帝的掩护之下来发展工人斗争，又有同志以为只有等待工人阶级来参加反帝运动，党才有办法。因这些许多错误的观点，再加以组织上的他种弱点，遂使党的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都做得很不充分。各地的反日团体——有群众的反日团体——我们都不能参加，也仍然是受了国民党的领导。

九、在五卅纪念中，各地党部的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才比较活动。上海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之下，这个工作因之也做得更有

成绩，举行了总的示威运动，政治上调动的群众在三万以上，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威信受着很大的打击，使党的政治影响得到很大的扩大。这一工作的经验可以供给全国工作的教训。香港、顺直也正在开始。在帝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仅只上海略有一点很小的影响。

C. 反对军阀战争

十、关于军阀战争之必然到来的形势，军阀战争所表现的中国之社会经济的矛盾，最近全国之更加紧的军阀战争的局面，中央都给了正确的显明的分析。只是，在这些分析中有些时候表现着过于机械或估量过分的弱点，但在总的路线上——尤其在策略的指示上却完全正确。反军阀战争之具体的工作，中央在历次通告、党报及在对各省之指导信上，都曾很明显的指出。

十一、反军阀战争的口号在宣传上确已有了很大的影响，但在实际工作还没有做出直接显明的成绩。固然，军阀战争的结果，各地群众痛苦的加深，使群众斗争更易于发动，但各地之直接起来以反军阀战争为旗帜的群众运动，还很少这种成绩。这种现象一方面固然因为白色恐怖的严厉，我们党组织力量的薄弱，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各地党部不能正确的运用中央所指示的策略。

D. 组织路线与组织工作

十二、中央回国之后，开始工作，以六次大会的精神来挽救当时全党的涣散状态。当时主要的组织路线是：扩大无产阶级基础，加强中心区域工作与改造旧的基础，党员职业化，强健产业支部，健全支部生活，提高党的政治水平线，加强地方党部。在这些组织路线之下经过几个月的工作，确已有了相当的成绩。固然，因为白色恐怖的严厉，因为不动主义和急性病

的各种错误，到现在还有几个产业中心（如武汉、广州等）还没有巩固自己的基础，但大部分看来，我们的组织确是在逐渐的恢复，尤其是质量上的进步。可以说，全党之涣散的状态确已经挽救了不少。自然，目下这一点成绩，就革命发展的需要说，尚欠得非常之大，还需要我们很多的努力，但我们却不应忽视这一点点进步，因为这正是促进党的进步的基点啊！

十三、最近中央对于组织问题更有显明的具体的指明，在通告在指导信以及在与各地同志谈话中，特别指出：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注重质的发展，注意支部生活的建立，地方干部的培养，加紧巡视工作，确定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并特别指出几个不正确的组织观念（极端民主化、取消主义、形式主义、党内和平等等），这些都是最近中央要在组织上所努力的方向，全会也就要在这些问题上来成立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E. 宣传工作

十四、一年来全党的宣传工作，都表现着相当进步的形势，如中央党报，地方党报的发行，特别是上海与香港的公开发行的日报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如在各种群众运动中的鼓动工作，如工人学校与工人读书班的建立，如在文化团体学校和公开书店等的工作，如宣传技术的改善，如中央训练班及各省训练班的设立，都有很明显的成效。工厂小报与工农通信员的训练，在上海亦已开始进行，马克斯列宁主义书籍的编译，也已开始出版，因此党在群众中的政治有相当的扩大。但是仍然还有很多的缺点，如在群众中宣传尚不充分（画报尚未出版），支部的宣传工作尚未建立起来，马克斯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尚很欠缺，反改良主义的理论斗争也没有广大的工作，这些都是过去工作的弱点，也就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针。

F. 职工运动

十五、中央开始工作的时候，在职工运动上就竭全力以建立工人群众的独立组织。当着赤色工会缩小到支部以内的时候，当着全党不明了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时候，这一工作是非常艰苦的。职工运动中中央首先是反对取消赤色工会的倾向，反对党支部对于赤色工会的包办。

十六、建立赤色工会是职工运动中的中心问题。中央过去对于这一点虽然有明确的指示，但对于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斗争却执行得迟缓，仅在上海表现有很少的成绩。同时在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赤色工会还有些不正确的认识，有人以为赤色工会只能秘密存在，甚至有人谓我们领导的公开的群众组织不可领导斗争，因为一斗争便要拆台，便不能公开存在。各地对于这些问题的观念都还非常模糊，以致各地的赤色工会都还没有大的发展。

十七、中央一开始便注意于反对黄色工会的工作，指出加入有群众组织的黄色工会中去以进行活动，更指出在黄色工会内部组织中心干部分子以力争转变到赤色工会的前途，这些在发展职工运动中都有重大的作用。中央虽然极力的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指出了许多工作方法，但在各省的实际工作中还是只有很少的成绩（如上海）。北方之许多黄色工会，我们完全没有打入，即使有同志，也仍然做了国民党的尾巴。上海有同志加入黄色工会之后，久之他自己也变成了黄色领袖。这里见得，对于这个问题，以后中央仍然需要切实的督促各地的工作。

十八、青工女工的工作，中央过去只给了相当的注意。各地在这些工作上都只有很少的成绩，上海有童工的群众组织，香港有少数女工的发展，上海开始有女工读书班的建立，但都

没联系到斗争之上，其他地方更非常薄弱。中央在以后的工作上，对这些都还要比以前更加注意。

G. 农民运动

十九、中央关于农民运动的工作曾发过几次的通告，在给各省的信上也特别指出。关于秋收、年关及农暴失败后的工作，中央都专门给各地以策略上的指示。但各地在工作中很少实现。自然，关于农村工作的指导，的确还表现得不十分具体，这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各地很少关于农村工作之具体的报告，同时中央农委尚未建立起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十、关于富农的策略问题，中央在总的精神上仍然根据六次大会的精神。不过中央到现在感觉到“不要故意反对富农”这句话中之“故意”两个字，的确可以引起完全相反的误会。六次大会说，需要领导雇农反对雇主的斗争，但是在富农还有革命要求的时候，还应吸引富农加入反地主豪绅军阀的战线，同时要不忘记反对富农，这就是我们在农村的战略。这一战略在一年工作的经验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仍应坚决的继续执行。至于文字上的不妥，这不是严重的问题。

H. 士兵工作

二十一、中央第一次军事组织的通告，离开了实际工作的观点，偏于形式主义之机关的建立，确是一个错误。国际东方部关于这件事曾有一指示的信，批评这一错误，中央完全接受。

二十二、关于现在士兵工作的重要，中央在给各省的指导信上都曾指出。各地对于士兵工作——尤其中心省区对中心军队中的工作，表现得非常缺乏。中央预定在最近召集一全国军事工作会议，召集各地之军事负责同志，确立全国军事运动之具体的计划。

I．苏维埃及红军

二十三、现在全国还有好几个苏维埃区域，除了红军游击的区域外，中央很少有特殊的具体的指示。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交通的隔阂与实际情形的不明了。中央对失败后区域中的工作，曾有一个专门的通告，但对于苏维埃的区域，则只是在原则上指出一些策略的原则，而缺乏更具体的积极的指明。

二十四、关于红军的斗争。中央个别的曾给了各处以专信的指示，但对于全国红军的行动，并没有规定统一的具体的有联系计划。策略问题，中央以前曾提出“分开以深入农民群众”的路线，因为客观政治形势的发展与农村斗争的激烈和红军组织的成分等的条件，以前的决定的原则的确是不适合的，所以现在改变为“集中游击以发动群众”的策略。

J. 青年团的工作

二十五、青年团中央自六次大会以来，确能站在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之下奋斗，在党正确指导之下发展青年运动。自然，它的工作尚有许多弱点以及不充分的地方。现在青年工人群众数量的增加，青工在生产中的比重加大，青工以及一般劳苦青年群众斗争积极性的加强，明白的显示了青年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因此，党以后应更积极的督促青年团中央，担负青年运动的任务：（一）青年团中央应更积极领导全团团员群众参加党的政治生活，更深入的来讨论党的一切政治问题，负责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于青年群众中；（二）党中央以后应更积极加强对于团中央的政治指导，首先就应做到经常的参加团中央局的会议，各部方面亦应建立密切的联系；（三）团中央应督促各级团部更加强建立青年群众中特别青年工人群众中工作，领导全国工作青年化，改变团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四）党中央与团中央以后应随时注意到在工作中改善并建立党与团的正

确关系。

K. 济难会的工作

二十六、济难会的工作，一年来仅在宣传有相当的成绩，如济总的英文报与香港的公开三日报是有相当的宣传效果的。群众的组织工作可以说完全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济难会仍然成为党的救济部的形势。主要的原因，固然有客观的困难，但是济总同志没有了解中央指示的策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的指示也不充分，以后党应加强对济难会工作的指导，特别是公开在群众中宣传组织的路线，才能实现帮助党扩大政治影响，吸引广大群众到革命斗争的道路的任务。

Ⅱ. 党内的重大问题及党内生活

1. 顺直问题

二十七、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发生于党在非常涣散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很快的得着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当六次全国大会的时候，顺直问题便已经非常严重，但顺直代表团没有向大会提出，以使问题愈堆积而愈复杂。新中央开始工作的时候，便知道顺直问题在整个工作的重要，力求迅速的与正确的解决。

二十八、当时顺直问题的内容，在政治上便是极端右倾的机会主义。不仅有合法主义的观点，并且对国民党有非常浓厚的幻想，甚至于有人提议制青天白日旗以欢迎国民党。组织上充满了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极端民主化的倾向，闹个人纠纷及经济问题。一切同志都离开了工作，相互的不信任。党的指导机关，不独不能起作用，不独不能解决一切问

题，反而成了制造纠纷进行纠纷的机关。

二十九、过去和森同志代表中央去巡视，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及派别成见。经过去年一月会议而改组的省委，不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更促成顺直党部的分裂；而有保南第二个省委的发现。中央当时一方面在政治上积极的指出顺直党部在工作上的任务，号召全体顺直同志在积极工作中去寻得一切纠纷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将几个重要负责同志给一适当的处分：将蔡和森同志开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将王藻文同志由中央执委中开除，留党察看半年，将王仲一同志由中央候补执委中开除，胡茂公、张昆弟两同志亦受警告处分。关于这几个同志的处分，在手续上中央政治局确有缺点，但在当时环境上不如此解决决不能挽救顺直党的危险。

三十、决议实行后，有些同志表示接受了。和森同志经过一次的动摇，以后亦表示接受。王藻文当时表面上表示接受，一方面又表示处分太重，对中央仍然不满。中央曾声明这一问题可以提到全会解决。中央又曾声明对他处分之主要原因是他在政治上对冯玉祥的幻想，极端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一直到顺直省委去年十二月改组以后，却进而团结一切被党开除及党内落后的分子，始而反对省委，继而勾结敌人以叛党，顺直省委便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

三十一、去年七月改组之后，连会、少奇、潭秋[1]等省委负责同志又犯了命令主义与取消主义的错误，使顺直全党同志在工作上都没有相互的信任，形成了上下机关的对立。京东四县党部不站在工作观点上，而站在许多个人问题上，首先反对有省委，不认省委，而成立向中央请愿的代表团，省委亦停止京东党部的一切活动，同时又停止省委自己的职权。于是又继

续过去的纠纷而发展。中央站在教育同志及推动工作观点上，发表第二次告顺直同志书，派伍豪[2]同志去巡视。恢复省委职权，改组常委及京东地方党部，使整个顺直党的生活向着发展工作的路线上前进。

三十二、大部分说来，顺直党的同志现在都走向工作上了。整个顺直党部的工作，已经逐渐的表现成绩。十二月扩大会的决议，最大多数同志都是完全接受的。只有少数分子如李德贵、杨纪录等，还在王藻文的指挥之下，进行反省委的以及公开反党的活动。但是现在的顺直党，已经较以前为进步。在我们工作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相信能以用一切适当的方法战胜一切党内党外的敌人。

2. 江苏问题

三十三、中央归国以后，首先就认识江苏工作的重要。全国的四大产业区域，江苏应占着第一位。在夺取产业工人的意义上说，上海每一区的工作都可以赶上一个次要的产业城市。上海是全国经济的及政治的中心，工作的发展自然要影响到全国。所以中央政治局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在整个过去九个月的工作中都特别注意江苏的工作。

三十四、但九个月以前的江苏党部，政治上非常薄弱，组织上非常涣散。在一般党员中失败的情绪又非常浓厚，江苏的指导机关也受了很多影响，故在中央整顿江苏工作的过程中，如扩大省委问题，如组织行动委员会以指导法电斗争的问题，江苏省委有些同志未能站在工作上去了解中央政治局的精神，常是站在工作以外说话。或是说，中央对现在江苏省委不信任，或是说中央侵犯了江苏省委的职权。

三十五、江苏问题最严重的时候，便是中央讨论兼江苏省委或改组江苏省委的时候。关于中央兼江苏省委或改组江苏省

委的问题，中央还没有以正式的决议通知江苏省委，还没有交省委讨论这一问题，江苏省委在这个时候，便将此没有正式决议通知，没有提向江苏省委讨论的问题，先对上海各级党部报告，作反对中央宣传，并加增一些无根据的非事实的谣言，如增加许多无原则的个人的纠纷口号。最后，形成了江苏省委与中央的对立，助长了党内一切消极的闹纠纷的离开工作的情绪。

三十六、江苏问题发生之后，中央之主要精神是以教育同志的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召开省委联席会议三次，又区委联席会、外县负责同志会、各区会议、外省党部来中央负责人员会议等等，尽量发展同志们的讨论。中央指出过去省委对中央工作并没有不同的意见，关于兼江苏省委的问题，中央还没有正式通知江苏省委，并还没有与江苏省委提出讨论。江苏省委关于此问题的意见，只能向中央提出讨论而不能先在下级党部报告，并且，最重要的是添造许多非事实的个人问题的谣言，捏造关于六次大会及现在中央之“派别”的消息，而作反中央的宣传，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借这些问题超组织路线来作反中央的宣传，客观上必不可免的走向反党的道路。

三十七、经过中央之坚决的一致的奋斗，经过中央之发展讨论及教育同志的方法，上海同志、各省留沪同志、中央工作同志，最后江苏省委的同志，以至外县同志，都一致的接受中央的路线。省委接受了中央之改组常委加强区委的决议及对于省委同志以严重警告的处分。江苏问题的解决，证明了全党之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在政治上在工作上可以战胜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三十八、江苏问题解决以后，江苏曾开了扩大会议，对于

江苏全省工作都成立了各种具体的决议。现在江苏党部在全国要算是较健全的党部，工作上都有相当的进步。外县工作的发展比较不十分迅速，省委注意力亦差，但上海工作却有不可忽视的成效，可以供给中央许多经验，帮助中央对全国的指导。

3. 其他各省的问题

三十九、其他各省中，过去九个月中也还有不少的问题。去年广东关于士兵运动中的错误同反帝国主义之策略问题，都有过不正确的见解。福建则有忽视城市工作，集中力量注重乡村的偏向。江西因上届省委有错误，使工作停顿得很久。四川对于暴动的观念不清，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满洲、河南、安徽、山西都有政治上的清谈的倾向，这几省的城市工作没有基础，同样农村工作也同样没有走上轨道。山东则因丁君羊同志关于六次大会报告的不正确，引起了少数同志怀疑，但省委立即便予以正确的纠正。

四十、总括起来各省关于政治问题除广东外，很少发生过策略上不同的争论。有之则是一些离开工作的学院派的研究，离开策略不与实际联系的政治清谈，或是对于中央通告之文字上的逐字逐句的吹毛求疵。在中央与各省负责人讨论问题的时候，各省同志很少提出策略及工作方法的讨论。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讲的现象，相反的，这正是因为各处负责同志还不能收集经验，不甚了解正确的策略的运用，以及全党理论水平线的低弱。

4. 党内生活

四十一、党内生活之最多的问题是纠纷问题，个人生活问题。因为革命失败在党内的反映，因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因为政治水平线的低微，因为各地工作的不甚发展，所以许多同志——虽然是过去经过许多斗争的同志，都表现着消极

的悲观的离开工作的情绪。时常因一些细小的非政治的无原则的问题，使省委或部分的工作常陷于停顿，这是非常严重的不健强的现象。

四十二、只要党的生活能建筑在工作问题上，则一切纠纷问题都自然会取得解决。最近因为全国群众斗争的开展，无原则的纠纷问题已经比以前减少，这自然不是说全党现在已经没有纠纷问题，也不是说造成纠纷问题之主客原因已经消灭，乃是说，只要一切同志都注意工作，则无原则的纠纷问题必然归于消灭。我们坚信对于党内纠纷问题的解决，主要的是要严格的巩固党内无产阶级的基础，鼓励一般党员之斗争的情绪，提高全党之理论水平，在正确路线上与一切不正确倾向作坚决斗争，然后才能肃清一切无原则的纠纷的最恶劣的倾向。

5. 反对派问题

四十三、国际上之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派，最近在中国党内已经开始有了活动。托洛茨基利用中国革命的失败，来作反对共产国际的借口。一部分理论薄弱而不了解中国实际斗争的同志，会受理论上的欺骗。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所提出的“理论”，已经经过联邦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之严厉之驳斥。托洛茨基现在在国际上已做了进攻苏联及反对共产国际之工具。中国党坚决的拥护共产国际之全世界一致的路线，在政治及在组织上都要坚决的肃清一切反对派的企图。

四十四、现在我们决不夸大反对派在党内之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作用，但应该使全党同志注意。因为全国之党内生活并不健强，因为各级党部还保留许多过去的纠纷，因为在党内还存在一些消极的悲观的不满意于党的分子，又加以一般党员之理论的低弱，使托洛茨基反对派可以利用一个虚伪的政治口号隐

藏在无原则的挑拨行动中，来团结一切反对党的分子。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的发展，一定会形成许多无原则的反对指导的集团，客观上定会走向一切反动势力的收买与指导之下作为破坏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央必需坚决的向全党指出这个前途，并坚决的与之斗争。

Ⅲ．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

四十五、国际二月八号给予中国党的训令我们于四月才收到。在政治的分析及策略的着重上，这个训令一方面证明了中央过去路线的正确，另一方面确实帮助了中国中央的不足，特别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作用，反右倾的斗争，脱离群众的危险，反对改良主义，争取群众运动的公开，这些对于现实的中国党的策略问题都非常重要。政治局接到国际训令之后曾有两次很详细的讨论，特地成立一个决议为指导全国工作的基本方针。

四十六、国际训令以及中央接受国际的训令的决议，中央都发给各级党部，尽量发展党内的讨论，到现在中央还没有接到各地讨论情形的报告，但就个别谈话及一些负责同志的表示，是一致的接受国际的训令。

Ⅳ．结　　论

四十七、中央回国工作的时候，客观的政治形势，正在统治阶级打下北京之后，得到了暂时表面的统一与虚伪的和平，同时因他们内部的矛盾加深，积极准备新的军阀战争。因此一方面继续他的白色恐怖的政策，更残酷的向我们进攻，各省组织不断的破坏，党的积极勇敢的干部，牺牲在五百人以上，同

时自首叛变的现象普遍发生，在两湖特别表现得严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宣传正在发展，广大群众，甚至工人群众都发生很多的幻想，黄色工会渐次成为群众的组织，党的政治影响，已经缩小得非常利害，再加盲动主义的发展和敌人的反宣传，遂使党成为完全与群众隔离的现象。这些情形——改良主义的发展与群众失败的情绪反映到党里面来，造成党内右倾思想发展的基础，于是合法运动、和平发展的观念很普遍的在党内发生，比较动摇的同志，更走到消极怠工悲观失望的道路。同时左倾的思想也在继续存在，特别党内无原则的纠纷层出不已，成为党的最严重的问题。当时情形的确整个党都在风雨飘摇、动摇涣散的状态。中央在这样情形之下依据六次大会的路线，坚决奋斗，一方面与敌人作残酷的争斗，另一方面又坚决的反对党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巩固党的一致，提高党的战斗力。一年来艰苦工作的过程得到了全党同志一致的拥护，一致的斗争，才把党从危亡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同时党在群众中的工作也有相当的发展，这是充分证明六次大会路线之正确，同时中央与全党同志的坚决斗争的确表现着布尔塞维克的精神，这是我们极可宝贵的教训。

四十八、现在的情形的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特别是右倾的思想，仍在继续存在，但是全党同志已经有了一个路线做一切斗争的指南针，这就在客观上相当的减少了党的危险。党的削弱涣散的现象，亦已逐渐稳定，有很少的地方（如上海、广东）已开始新的发展，一般同志的失败情绪，亦已相当的减少，党的一致与巩固，尤有莫大的进步，这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不可磨灭的基点。因此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有了相当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有相当的发展，党的政治影响亦已比较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与领导斗争的力量，

也是很明显的向前发展的形势。特别是上海从“五一”以后，经过“五卅”的总示威，的确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威信和改良主义的影响都受了很多的打击，这一进步的形势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是中央和全党同志一年来艰苦斗争的成绩。但是我们决不可以作过分的乐观，现在敌人虽然正在互相混战，但是对付我们始终是一致的，他们残酷的白色恐怖的政策并没一时的停止。改良主义的影响虽然暂时相当的缩小，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放弃这一武器，而要继续扩大他的欺骗宣传，同时群众中许多弱点的存在还有他发展的条件。党的情形，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并未肃清，特别是右倾的危险尤在发展，无产阶级的基础还是异常薄弱，政治水平线并未有很大的提高，党与群众的关系仍然还没有密切，同志中的失败情绪也没有完全扫除，而托洛次基的反对派又在开始活动，这些都是党的严重的危机，同时就是革命的严重的危机，这是必须全党的同志继续执行六次大会的路线，运用一年来斗争的经验坚决的站在中央一致的路线之下，与一切敌人作残酷的斗争，同时中央必须认识自己过去的经验，补正过去许多不足的缺点，更正确的更坚决的领导全党同志一致斗争，这才能继续战胜一切敌人，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领导革命胜利的使命。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 即韩连会、刘少奇、陈潭秋。

〔2〕 即周恩来。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

（一九二九年六月）

（一）全会听了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之后，认为中央政治局在总的工作路线上，确能依照六次大会的精神，正确的应用六次大会所规定的一切策略。在过去九个月工作中，中央政治局的确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很艰苦的很坚决的与党外的敌人压迫和反动思想斗争，与党内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斗争，致现在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才都有了进一步的巩固，表现的成绩是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扩大，领导群众斗争的力量有相当进展，党与群众的关系已在开始恢复，党的削弱趋势已渐趋稳定，党员质量有相当改进，党内错误倾向有相当克服，党内逐渐走向巩固一致的道路。这一方面证明六次大会之一切策略路线的正确，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央确能将六次大会所规定的原则在实际斗争中正确的运用。

（二）全会认为中央有时对于政治事变的反应较缓，不能及时的应付。对于政治形势的分析指出统治阶级的矛盾与全党策略的中心，原则上都完全正确。但在有些地方，许多解释仍不免有过于机械与估量过分的地方，不能给一般同志以活泼的

* 这个决议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了解，致引起党中一些不正确的政治观念。因此过去中央对于整个政治分析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对于过去所表现缺陷的地方，以后需要更慎重，更求正确。

（三）中央过去对各级党部之策略上的指示，职工运动的督促，确能帮助各地实际工作上的发展。对于如何组织群众如何动员群众为日常要求而斗争的工作，亦无疑地取得相当进步，使目前斗争乃能更加开展。党在这些斗争中已取得相当领导，尤其显著的是上海五一与五卅的示威运动。不过同时中央应认清这一领导中还存在些弱点，尤其是中央还没能将这一工作的经验实施到全国各级党部中去。对于反帝运动，党虽能把工人的罢工、农民和兵士的斗争与反帝运动联系起来，但全会仍认为中央还缺乏实际的去领导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的反帝运动。中国民众，除国民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军阀买办及一小部分富有的人外，大多数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过去往往有小商人、雇主、店员、职员、学生甚至工农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党几乎没有一次（这次上海的五卅示威与张案后援会除外）能够领导这些运动，以致完全在国民党或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走入与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对于农民运动，尤其是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因为各地报告材料非常缺乏的缘故，中央还很少在实际工作上的积极的具体的指导。中央应特别注意在广大的灾民群众中工作。各地士兵工作多表现得异常忽视，中央的注意力亦还不充分，对于红军尤其是朱毛[1]及游击队的工作，还少有具体的计划与指导，这些缺点在以后中央的工作中，都需要努力纠正，同时中央应特别注意与加紧促进各种群众工作的配合，职工运动与农民斗争、士兵运动、反帝运动、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的配合，城市工作与乡村工作的配合，主要省区与附近省区工作的配合，以预防革命发展中之不平衡

的危险。

（四）中央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所采取的路线，全会完全同意，以后中央仍需要继续的坚决的执行这一路线。党内政治斗争之主要的方向是反对右倾，反对机会主义的复活，反对合法主义、和平发展、等待主义、不动主义、取消主义等等。同时应当防止左倾之盲动主义的残余，与脱离群众的急性情绪。只有在这种坚决斗争的路线上，肃清党内一切不正确的政治倾向，党的政治主张才能在党中得到正确的了解和运用，党的政治影响才能在群众中更加扩大，党的一致才能更加巩固。

（五）全会承认我党在组织上虽还存在许多弱点，但中央九个月的工作的确已将党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中挽救出来了。主要的如对于深入产业工人群众，注重党员质量改进，建立产业支部，健全地方党部，建立中心区域与中心工作，党员职业化，建立各省巡视制度，确立党与群众组织关系等路线的坚持已收了相当成效。只是关于吸收新的分子入党，注意在重工业中党的发展，党费的缴纳，改善秘密工作，特别是建立工厂报纸等路线的指导与督促，过去中央组织工作中还表现得很不充分，需要今后予以严重注意。中央宣传工作如关于日报的创办，对全国宣传工作指导的加紧等等，全会认为满意，只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传播，与通俗小册子的编辑，以及发展党内政治讨论，供给各地训练干部的材料等，需要中央予以注意和领导，尤其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的公开机会，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在党内生活中，中央与一切不正确观念，如党内和平、极端民主化、取消主义、形式主义、经济平等等作坚决的斗争，以树立布尔塞维克的组织路线，全会认为是正确的。

（六）因为革命失败在党内的反映，因为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因为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微，所以过去各省及各级党部

很容易发生些非政治的纠纷。全会完全赞成过去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原则，是以教育方法使全党同志在发展工作与实际斗争中取得一切纠纷问题的解决。中央政治局亦曾运用组织方法解决有些省份问题，显著的如江苏、顺直问题。第一江苏问题，因旧省委犯了极严重的政治错误后，已不能再继续其工作，故需要予省委以解散的处分。第二顺直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决议开除两个中央委员，全会认为中央运用这种组织方法以处罚一些同志，是根据于特殊的条件，必须如此。但处罚手段，只是巩固党的最后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要采用教育的方法，当着中央施行某种开除纪律时，仅仅是因为他已不能再接受纠正而且无纠正的希望了。在形式上讲，中央政治局虽没有开除中央委员的权力，但是为着反对右倾、反对机会主义思想、反对超组织的行动时，全会同意中央关于这事件的非常处置，并对于从中央委员中将王藻文与王仲一同志开除出去的决议予以批准。

（七）全会指出最近托洛斯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的活动，这一点值得整个党之严重的注意。全会并不夸大反对派目前在中国之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作用，只是在党内政治水平线低微与党内历史纠纷尚有残留的条件之下，反对派在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的党员中，可以有他暂时发展的机会。中央今后需多向全体党员群众说明反对派理论上反布尔塞维克的路线，指出反对派分裂党分裂共产国际而走向反革命道路的罪状。全会同意中央的分析，肯定托洛斯基反对派在中国必然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工具，来危害中国革命，相信全党一定能战胜这些反革命倾向，而坚决的巩固全世界共产国际的统一路线。

（八）过去中央对各级党部的指导，原则上虽都是完全正确，但还需要更具体更切实，更需要用中央直接指导上海工作的经验，做指导各地的实例，并特别加紧巡视工作，直接的检

阅与指导各地工作，然后中央的正确路线，才能更快的深入各级党部。对于武汉工作的建立，必须积极的用多方面的力量。一年来 C. Y. 中央确实站在中央正确路线之下奋斗，而且工作亦有相当进步，但以后须努力扩大团的组织范围，实行青年化群众化的工作，更须要利用公开机会，扩大团的影响。党应纠正同志过去对团的取消观念，以后须在各种工作上建立党团的密切关系，与党对团的一切不正确的现象奋斗，特别要帮助团的政治教育。妇女运动——尤其是女工运动，需要中央切实的注意。农委与妇委应加强自己的经常工作。

六次大会后中央很密切的领导全总的工作，党在这一工作上收了相当成效，如全党逐渐了解党与工会的不同性质，肃清一些工运中的命令主义，全党方开始懂得在黄色工会中活动的必要，但同时全会认为这一工作还不完满，省委及各级党部对于这些工作，还没能予以极大注意，全总党团亦还没能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党团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实际的工作还弱，如全总所领导的全国赤色工会，数量既少且亦没有统计。全会付托中央政治局在最近对于全总工作应如同对于中央本身工作一样注意，因为这是党中最主要的工作，并使这两工作密切的相互联系起来。没有工会也便没有党的群众工作。各省党部对于职运缺乏积极工作，甚至许多省份尚无职委组织，中央政治局应严厉的督促各省纠正这种现象。

济难会工作做得不好。在中国，可说还没有济难会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党的救济部。除去只有几千党员与济难会有关系外，广大的中国被压迫群众，几与济难会毫无关系。大多数被压迫群众，还无从得知帝国主义在中国及中国军阀残暴的罪状，如数十万被帝国主义、中国军阀、国民党屠杀的工农群众，数万关锁苦在监狱中的工农、贫苦学生都还没得到广大群

众伟大的反抗与援救。这种情形是不能再容忍了。中央及全党必须立即开始济难会本身的工作。

（九）国民党在最近举行了几次群众运动，如抵制日货、孙中山奉安、反对苏联及反冯[2]运动等，全会以为党对于这些运动未曾充分注意。党未曾针对着国民党这些运动作一反对运动，向群众解释抵制日货与反冯运动不过是国民党欺骗群众的手段，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不过是国民党感觉自己的影响衰微，用以挽救的方法，围搜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完全是国民党受英日帝国主义的驱使而行的暴举。这一最后事实更加证明国民党政府加入反苏联的同盟，进而援助蒙古与西伯利亚的封建余孽与地主，企图夺回在革命时期被农民占有的土地。

全会决定政治局今后必须作一理论上的批评运动，去反对汪陈[3]派与第三党。虽然这些人物本身的影响很小，但他们现在一些学生与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发生了影响，则在中国革命推翻封建地主制度之时，他们依然是保障这一制度的危险障碍。

（十）过去九个月的工作中，确已建立了强健了巩固了中央对全国工作的指导，中央政治局以后需要更注意于本身之集体与分工，注意各部工作之迅速及其相互的密切联系。特别要建立军部工作。中央政治局应召集全国的各种专门工作会议。在秘密条件之下，尤须避免机关的重复，阻止官僚主义可能的发生。中央对各地的关系，需要更迅速的传达中央的指导。

（十一）全会以为我党与国际以及其他兄弟党的关系虽然改善了许多，但依然不能算十分满足，且过去对于国际问题的注意较少，党内亦缺乏关于国际政治教育工作，尤其对于反对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的工作极少注意，以后应力求补救这些缺点。国际的政治通告、决议案与出版物送到中国亦总是失掉了

时效，如关于共产国际十周纪念的通告，关于巴黎公社、国际妇女日、国际童子团纪念日以及五一节的通告都是事后才得到的。

全会决定政治局必须与国际负责机关共同策划，务使关系更加亲密，而能适时的得到国际的指导。最后全会指示中央对于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工作，必须有计划的动员全党同志，勇敢的实现此重要任务。

一九二九，六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朱德、毛泽东。
〔2〕 指冯玉祥。
〔3〕 指汪精卫、陈公博。

PDG

政治决议案

——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一九二九年六月六届二中全会通过）

Ⅰ. 国际革命危机的加深

（一）六次大会与共产国际六次大会指出世界革命已进到第三时期，即是世界革命各种的危机进到异常激烈的时期，同时并指出在这国际形势之下是能够帮助中国革命的发展。这一年来国际上各种重大事变之经过，充分证明这一估量的正确。第一，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更加紧迫，各帝国主义国家受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市场枯涸的矛盾的推动而加紧争夺市场，重行分割殖民地，互相敌视，特别英美的冲突，已是毫不掩讳的公开的加紧的准备战争。英法海军协定揭露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如火如狂的竞相增加军备。在太平洋上因瓜分中国问题英日与美的冲突也是同样的紧张。英日同盟复活的空气，曾一度传播于国际间，这都是空前惨酷的世界大战快要到临的充分的证明。现在英国资产阶级虽然换了一个新的工具，所谓工党内阁，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想借此欺骗工人阶级，以便利他更加紧他的战争的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灾祸，决不会有半点的和缓。他如日本乃至法国将要发生的内阁更迭，也是同样的把戏。第二，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巩固与发展吸引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更加认

识了社会主义前途的光明，促进了他们斗争的勇气，苏联遂成为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大本营。因此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企图更加积极了。帝国主义的反苏联的联合继续的增长，他在西方与苏联为邻的国家中加强军事的准备，指挥阿富汗的军队袭击苏联的区域，最近又指挥着中国国民党政府搜查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想借口把中东路夺在手中，实现他军事上反对苏联的目的。最近的裁减军备会议（帝国主义者在这个会议中一致的否决了苏俄底真实的裁减军备的提议），以及巴黎的赔款会议，不只明显表现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并且表现了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对于苏联的阴谋。帝国主义者把中国的反动派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加入反苏联的联合中。这些压迫中国革命的刽子手同时就是帝国主义者反苏联的工具。最近苏联领事馆之搜捕以及中国资产阶级之不停止的进攻苏联等等，都是中国的反动派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指挥之下的一贯行动。所以进攻苏联的战争，也是日益迫切。第三，各国的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巨大的罢工不断的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爆发起来（德国五金工人、英国法国与波兰的纺织工人、英国矿工、日本海员等），今年五一节全世界工人阶级壮烈的总示威，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开始了他的武装冲突，已经使全世界资产阶级发抖。帝国主义在工人群众日益左倾的威吓之下，积极企图打破工人群众革命斗争和拥护苏联的意志，是帝国主义进行世界大战、反苏联战争以及一切帝国主义行动的主要前提之一。因此，帝国主义者除掉以法西斯蒂方式压迫屠杀工人群众外，更一方面使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与政府机关更加亲密的合作，另一方面又豢养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的新工具来欺骗工人群众，企图在这样左派改良主义者联合中解决这个任务。这些帝国主义的新旧工具虽然极力用尽一切方法来

阻止群众的革命斗争，但是广大群众仍然日益趋向于革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大。殖民地的革命更有显著的发展，印度已开始了他的革命高潮，阿富汗的革命虽遭了英帝国主义武力的压迫，但仍在继续进行，拉丁美洲的革命不断的爆发，中国革命又是开始复兴的形势，全世界革命的火山都在冒火吐烟了。这样帝国主义战争危机的加紧，进攻苏联的迫切，与国际革命斗争的激剧化，很明显的是世界革命各种危机的同时加紧，这些危机的爆发，便是世界革命巨潮的来到。

（二）在帝国主义战争危机中，瓜分中国是主要的导火线之一。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当中，中国也是帝国主义进兵的重要的根据地，这样一方面固然加重了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在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中的任务；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矛盾推动着中国军阀战争特别加紧，使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益加削弱，特别是世界革命的激剧，可以增长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无限的革命的勇气。所以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可以帮助中国革命的进展。

Ⅱ. 现在中国政治局势的根本矛盾与革命形势的开展

（三）依据国际形势观察中国现实环境，应更加认清外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一切政治经济生活中真实的统治者。自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国民党打下北京后，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日益加强。英日帝国主义势力在南北有显然发展，英国在南中国的统治恢复，日本出兵山东侵占北满，显然是互相默契瓜分中国的进行，同时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也有突飞的进步，对华贸易增进的速度既经突破以前的记录，特别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买好，已经取得了许多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新的特权

（如财政顾问、航空协定，这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计划有极大的军事意义）。英日美各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然同样增进，于是在市场上在政治上在各种特权的攘夺上都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遂造成现在英日美互相敌视的三角冲突的形势。美帝国主义一贯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这是公开的攘夺英日既得特权的口号，尤其是最近一年来美帝国主义挟其庞大的财政资本的优势著著迈进，更引起英日的嫉视，所以现在太平洋上英日美帝国主义三角冲突之中已表现着英日接近与美对抗的形势。帝国主义既然这样互相竞争，遂各自操纵中国的军阀与反动的政治派别，成为他的攘夺的工具，由此造成中国不断的军阀战争，这是目前中国政治局势中第一个根本矛盾。我们要明白指出这些帝国主义强盗的互相敌视，完全是为着争夺中国的利益，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对中国都是一样的侵略的政策。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与英日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根本上没有一点不同。所谓承认关税自主与修改条约，这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的假面具，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的一贯的表演。只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才会幻想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之下来取得中国工业的独立的发展，这就是改组派的理论的基础。其实关税的相当的增加只是帮助了军阀战争的军费，更加助长军阀战争，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帮助。美国的投资也是与英日一样首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事业以便于他的商品市场的扩大，并不能适合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直接需要。并且美帝国主义这种政策因为英日的对抗和其他各种矛盾的关系，必然要遇到严重的打击而无法进行，纵令这种政策有多少的实行，在客观上纵要使中国民族工业相当的发展。但是这样发展的过程始终是在帝国主义经济控制之下而使中国更加一天一天走向殖民地化的道路。所以如果认为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可以帮

助民族资本主义独立的发展，便是坠入了资产阶级理论的泥坑，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还有第二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过分估量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以为美帝国主义已经取得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这更加不明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争夺必然要加紧战争的危机，决不是从和平外交上可以得到。这种观念是一样的帮助美帝国主义的宣传的极端错误观念。

（四）现在中国的经济上封建阶级尚有极强固的基础，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大部分都在地主阶级惨酷剥削之下。虽然因货币关系的发展，封建剥削关系受着很重大的打击，而日益崩溃，但仍然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广大失业破产的群众造成封建军阀制度的基础，使国家封建制度的残留又有一时恢复的形势；再加以帝国主义的利用与维护，于是军阀制度、封建的和半封建的上层建筑仍然是中国政治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没有根本消灭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民主革命，则不会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弱小的资产阶级，本身已还带有封建的剥削关系，尤其是他要企图统治全国，更不得不利用军阀做他的工具，因此形成现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军阀联合统治的政权。所以国际反对派以为中国已经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完全是抹煞一切中国实际的经济剥削关系的无稽之谈，所以中央全体会议坚决的指斥了这种观念以及类似这种观念的倾向是极端错误的。

（五）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状况表现有相当的活跃，一直到现在，大部分仍然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影响到中国民族轻工业（特别是丝业到现在仍是停滞之中）。同时各地方中国民族工业仍然继续着转递于外人之手（有些企业卖给日本了）。固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之相当的发展

虽然是很困难，但在最近的将来决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全国生产力向独立的民族资本的路线的发展倾向，将要反对着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施行的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倾向。所以认为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后，便完全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混合了而没有一点矛盾，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民族工业独立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绝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

同样，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倾向，也要与中国尚很强固的封建剥削关系发生矛盾，中国资产阶级也同样的要主张自己的民族的民主的改良政纲（如二五减租、减轻田赋等），以便利自己的发展。但是在中国中小地主占优势，特别是货币关系发展使这些中小地主要日益趋于破产的形势之下，就是这样的些小改良的政纲也是地主阶级所不能接受。这样，便推动着中国豪绅买办资产阶级争夺这一反革命联盟统治的领导权。同时以中国军阀制度的存在，各系军阀争夺地盘财政的冲突永远无法解决，于是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各派与各系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特别是各个帝国主义的指使，遂造成中国连绵不已的战祸，这是中国现在政治局势中第二个根本的矛盾。

（六）我们决不应夸大了这一矛盾的事实，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纲是一种经常的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的政纲，就是使中国屈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之下。并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部分与各个帝国主义有经济上之共同利益，使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各部分的资产阶级与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帝国主义有互相联系，在民众中间发生了反对与他相竞争的帝国主义的运动的时候，则资产阶级在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也要利用这种机会（例如在汉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并且即是在这种资产阶级的运动中，

只要这个运动牵动了广大的群众，资产阶级立刻就要反攻。

同样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尚未完全脱离封建的土地剥削关系，使各部分的资产阶级与各部分的封建势力在乡土的关系上还有密切的联系，这样使中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也更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故他同样不能实行农村的改良，甚至二五减租的假面具最近也在浙江作了最后一次的撕破。所以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间表现的矛盾，仅是为要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些小的让步，都不能得到容许，决不是资产阶级是有什么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并且以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在这种冲突的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必然要一步一步的出卖中国民族独立的利益，妥协封建势力。特别是资产阶级对群众斗争的恐惧，天天在设法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更加要妥协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并且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的各个阶级和各个派别间的矛盾会在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共同的矛盾之前仍然是要联合一致。谁要认为反动中的一个阶级或一派会走到或“被迫到”革命方面来时，则他自己既走到中国的反动方面去了。所以以为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后，便买办化了，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利益混合了，没有矛盾了，自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夸大了这一矛盾，以为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还有革命的作用，更是极大的错误。

（七）所以现在的以及未来的军阀战争，帝国主义的相互冲突固然是这些战争的主要动力（不管他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军阀抢夺地盘的争斗固然是这些战争的直接导火线，但同时确反映着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各部分利益相互的冲突。这三种矛盾的相互表现使着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虚伪和平与表面统一都不能有好长时期存

在，战争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必不可避免的经常的状态。就现在的事实，更是一个长期混战的局面。所以如果以为中国资产阶级可以以和平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实现他的改良的政纲，走向中国的统一与解放，这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所以驱逐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与统一中国三大任务，只有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完全胜利后，才能彻底的实现。

（八）中国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求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让步，要与帝国主义的商品竞争，所以他唯一的出路，只有更加紧对工人的剥削。这一年来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已经比以前更加低劣。中国地主阶级要维持自己的地位，也只有更厉害的剥削农民，特别是中国的军阀，对广大劳苦群众的残酷的剥削，捐税的繁重，战祸的流行，因此更使广大群众加速的破产与死亡。现在的空前的灾荒，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这是帝国主义的侵掠，军阀的剥削，地主阶级和资本的压榨所造成。这样的结果，当然要激动着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为救死求生的斗争，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侵掠加强，当然与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要求民族独立自由的愿望绝对相冲突，因此引起了中国反帝运动的复兴。从济案以后各地广大群众的反帝运动不断的爆发，一直发展到上海“五卅”纪念与援助张案的总示威。这种形势恰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相对抗。所以这样的斗争必然继续向前发展，最后更要汇合各种的斗争成为革命的巨潮，驱逐帝国主义，颠覆统治阶级，建立工农兵士贫民苏维埃的中国。任何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与改良主义的欺骗，都不能消灭这一革命胜利的前途。所以现在反动统治与群众革命斗争的冲突是中国目前政治局势中第三个根本的矛盾而且是最严重的矛盾。

这一年来的过程，中国资产阶级不只是没有解决这些根本的矛盾，而且是他自己企图解决的问题也一点没有解决。所以

很明显的中国革命的危机是在一天天加深的。

六次大会后工农群众的斗争尤其大城市工人斗争，自去年“五三”以来，的确是逐渐复兴的形势。这不仅上海自邮务水电两次罢工推动了最近数月来将近两百次的工人斗争，发动了两年来所未遇见的数千人纪念“五一”的盛举以及数万工人学生群众“五卅”政治的大示威，便在北方也由半年来大小数十次的工人斗争酝酿到开滦五矿的怠工，在香港最近三月我们领导的工人斗争有十六次，便在湖北工人斗争的情绪也绝不是低落，在满洲过去数月中也还有八九起可以统计的工人斗争。在乡村农民斗争并未停息，苏维埃区域并未完全消失，朱毛红军仍然在反动的区域存在，投身到农民暴动区域的兵变仍时时发生。过去反日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亦确是表现广大劳苦群众反帝情绪的高涨。城市贫民反对苛捐什税的斗争也是不断的兴起。并且在这样斗争的形势中已表现着几个重要的发展的现象：第一，从日常的小斗争已发展到了大的罢工运动；第二，从反抗资本进攻的经济的斗争开始进到争自由反国民党的斗争；第三，黄色领袖和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已相当的缩小，上海几个有基础的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都发生很激烈的反黄色领袖的斗争；第四，共产党与赤色工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有相当的扩大。这些都足以证明城市的工人斗争在正开始复兴，乡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也逐渐在开展，整个的革命运动都在向前发展。所以认为群众斗争只是一种暂时活跃的形势，而不会有他继续开展的可能的前途，很明显的是不正确的观点。虽然这些现象不可以过分估量，但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的确可以看见。且党的领导，在这半年来艰难困苦的工作环境中，所争得的一些进步，如上海在邮务水电罢工以来，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和领导的确较以前扩大。香港从和平发展的现象转变到能

发动和领导工人小的斗争。北方从合法运动与隔离群众两极端的现象中，逐渐的争得在群众斗争的相当影响。这虽是很小的进步，但确是我党在几月来艰苦斗争牺牲许多同志战胜许多困难得来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党有可能去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之不可忽视之基点。自然，在这些群众斗争中还有许多的弱点，如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存在，群众中失败情绪与合法观念并未减轻多少，黄色的群众组织仍有增加，特别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以及党与群众脱离的现象还没有大的改善。因此，如认革命高潮是马上或很快地就要到来，很显然地对于革命的急性病。中央全体会议坚决的指出，如果我们不能逐渐地克服这些弱点，则正在开始复兴的工人斗争必又要经挫折而延缓进展，土地革命得不到城市工人的领导也必然要受着继续不断的挫折，党的很少进步又必要遇到新的阻碍，故就理论上说来，当然不否认这一直接革命的胜利有延长几年的可能。但是因此便以为中国将有长期的“和平的”发展而没有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基本矛盾的严重危机，以及革命高潮的来到将要延长到遥遥无期的等观念，这都是莫大的错误。党必须纠正同志中间以这一种或那一种可能极端为出发点的分析方法，必须坚决地认定只有斗争，只要看我们争取群众的力量，才能决定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行程。

Ⅲ. 党的总路线与基本任务

（九）根据上述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证明六次大会与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和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的指导信所指出的，目前党的总路线是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是完全正确的。党在一年来工作的结果，党政治影响已有相当的扩

大，党与群众的关系已有相当的进展，但是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尚未完全打破，改良主义在群众中还留有很多幻想，群众组织斗争力量还很薄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还没有广大强固的基础，所以党应更坚决的继续执行这一争取群众以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

（十）根据现在革命的形势、革命主观的弱点和一年来党的斗争的经验，党要争取广大的群众，必须坚决执行下面的任务：

1. 加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反对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帝国主义的侵掠加强与国民党出卖民族独立的利益，已使广大群众极端愤慨，所以党应坚决的发动并领导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使广大群众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党应更进一步的指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抢夺其他殖民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的紧迫，指出苏联是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唯一的领导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企图，并且号召广大群众作坚决反抗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与世界革命的力量亲密的联结起来，而达到颠覆帝国主义统治的最后胜利。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理论与策略上有几个基本的观念必须严重的指出：第一、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最主要的工具是中国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残余势力，所以不能根本肃清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残余，就决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同样，如果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决不能完成土地革命。因此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与领导土地革命彻底的完成是目前革命阶段上两个不可分离的主要的任务。第二、如果因此便以为在土地革命斗争以外，便没有独立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当然是很大的错误，因为广大群众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必然要起来坚决的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经常的加紧领导反帝斗争。反帝斗争

的扩大当然可以推动工人运动、农民斗争的发展，同时必须工人运动、农民斗争有了比较大的基础，也才能推进反帝运动广大的发展。所以反帝运动与工人经济斗争、农民运动是有互相影响、互相推进的作用。如果不注意工人农民的日常斗争，而单纯幻想爆发广大的反帝运动来掩护工人农民运动的复兴，更是极严重的错误观念。第三、在过去反帝运动中没有充分注意到反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的宣传和斗争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党必须坚决的纠正这个缺点，在一切的群众斗争中特别在反帝运动，加紧注意反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的宣传和斗争，然后才能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执行他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务。

2. 坚决领导反对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发展一切群众的斗争，向着这一总的目标前进。国民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残酷的压迫剥削的罪恶，已经在广大群众中暴露出来。党只有在一切群众的斗争中，坚决的提出反国民党的口号，领导一切斗争都向着这一总的目标前进，才能将国民党留在群众中的一些残余都打破无余，才能更加坚决群众革命斗争的勇气而团结到党的周围。

3. 扩大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军阀战争直接加于广大群众以莫大的痛苦，党必须在一切城市与乡村中利用一切的机会发动并扩大反军阀战争的斗争，这一斗争必能卷入广大的群众，使在同一口号之下，一致的行动起来，这是目前特别重要的任务。反对军阀战争的总路线是要采用失败主义的原则，就是这些军阀战争只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攘夺剥削工农劳苦群众的强盗战争，没有丝毫革命或进步的意义。所以党应坚决的号召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对于任何一方面都加以坚决的攻击，而使之失败，同时要坚决的宣传只有群众的革命暴动才能消灭军阀战争的口号。但是在目前执行这一路线的行动的策略上，是

要利用一切军阀战争所给与广大群众的痛苦来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如反对摊派军饷，反对拉夫拉车，反对关闭工厂，反对增加工作时间，要求发饷，反对开差等。必须这些斗争已经掀动了广大的群众，工农兵士的斗争都已经有伟大的爆发，然后才能汇合到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的前途。所以，以为军阀战争起来不问工农斗争发展的形势如何，便无条件的在士兵中发出暴动杀自己的官长的口号，这是很明显的错误。

4．加强领导扩大并且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不但没有减轻，而且是日益加紧，资产阶级土地改良的政策一点也没有实行，所以土地革命的斗争仍然是继续的发展，各省不断的自发农民斗争都有土地革命的意义。大革命失败已经两年，而广东、江西、湖北、湖南各地还有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工农革命的红军还在继续发展，固然统治阶级不能稳定军阀战争的继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广大农民群众土地革命斗争仍在继续开展，更是基本的原因。所以土地革命彻底的完成固然要在全国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胜利以后，但是如果以为全国工农暴动没有胜利以前便没有农村的土地革命斗争，实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相反的，在现在这样客观政治条件之下，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同时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建立红军，是推进革命高潮决定全国工农最后暴动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所以党应继续坚决的发动并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斗争，特别是在苏维埃区域与游击战争中要加紧实行六次大会的土地政纲，然后才能夺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党的口号的周围，而消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

5．继续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坚决斗争。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政纲，完全是妥协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的政纲，就是延长帝国主义的统治、延长封建剥削的最好的保障，所以不肃清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决不能实现彻底驱逐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的任务。军阀战争不断的爆发，国民党继续一步一步的投降帝国主义，二五减租的公开取消，对群众的压迫剥削加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的确有相当的缩小，因此改良主义的派别如改组派第三党等都发生破裂溃散的现象。但是如果以为改良主义已经死灭，已经不是革命的严重敌人，这是不正确的。很明显的，在各处的群众斗争中都还表现着对改良主义的幻想，黄色工会农会还在继续加多，特别在北方欺骗了广大的群众，并且群众主观上还存在着许多弱点，党在群众领导力量还很薄弱，这都是改良主义还可以继续发展的条件。还有资产阶级决不会轻易放弃了这一政策，必然要继续扩大他的欺骗的方法与宣传，所以改良主义仍是目前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仍然要我们继续加紧与他作坚决的斗争。但是如果又走到另一极端，夸大了改良主义的作用，甚至以为改良主义有很大的实现的可能，这更是极大的错误。因为国民党已不能取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让步，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那就很易于使这一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在群众的面前暴露，决不会有长期影响的存在。所以只要我们能执行很正确的策略，必能克服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反改良主义的策略，最主要的是要坚决的领导群众的斗争，在斗争中来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因为要把改良主义的影响在群众中驱逐出去，单只宣传煽动是不够的，主要要靠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另一方面，对改良主义作系统的理论的攻击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过去这一工作的确是异常欠缺，这是党以后应该特别注意的。

6. 加紧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进一步的汇合各种斗争到争自由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总斗争。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仍然是目前争取群众的重要任务，因为在大部分的群众中还保留有很深的失败的情绪，斗争的勇气尚未提高，党只有提出一切的群众的日常的痛苦来发动群众的斗争，正确的运用斗争的策略取得不断的胜利，然后才能渐次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而调动广大群众团结到党的政治口号之周围。但是就现在的形势决不应拘束在日常斗争的口号之下，而应进一步的坚决的领导群众从日常的小斗争扩大到大的罢工，从经济的斗争发展到政治的斗争，并且应有计划的准备着汇合各种群众的斗争到争自由的总的斗争。因为在部分的群众中，日常斗争已经有相当的发动，斗争的勇气已经有相当的提高，特别是这些斗争都直接受到国民党的压迫，而使群众感觉到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的迫切的需要。所以党应坚决的起来领导群众的各种斗争到争自由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领导各工厂各作坊的小斗争扩大到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大的罢工。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扩大群众的阶级的政治的意识，团结更广大的群众。如果拘束在日常斗争的口号之下不敢领导群众的扩大的斗争，这就无异于阻止群众的斗争，断送群众到国民党改良主义影响之下，放弃争取群众领导群众的任务。

7. 加强工会运动与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如果党在工人阶级的中间没有巩固的基础，在各企业和工会运动中没有广大的工人组织的基础，党便不能在革命中握着领导的地位，所以加强职工运动特别是铁路、海员、矿山等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是党的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在现在黄色工会不断的生长的情形之下，如果要树立党在职工运动中的基础，只有打入黄色工会

中去，特别加强工作，揭露一般黄色领袖与国民党的欺骗，然后才能克服黄色主义的影响，夺取广大群众到党的政治口号的周围。如果以为支部工作才是党的基础，而忽视群众运动的工会工作，如果以为赤色工会才是我们的中心，而忽视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或者轻视黄色工会的影响，而不加入进去工作，这些观念都是妨害党争取群众的基本任务的最不好的倾向。党的秘密的支部工作与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工会运动必须同时并进，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真正领导群众的核心，才能组织广大的群众。必须加紧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才能帮助赤色工会影响的扩大。

在职工运动中的中心策略是要力争赤色工会的公开，反对国民党用委派整理登记的方法来禁止群众的自由。加紧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反对黄色的领袖，组织接受我们的影响的左倾的干部分子，夺其广大群众，以转到赤色工会的前途。注意发展群众的日常斗争，组织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的同盟罢工。正确的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以夺取广大的群众。同时要特别加紧在铁路海员矿山等重工业工人中的工作。这些策略在职工运动决议案上应有详细的解释与说明，各级党部都必须坚决执行这一策略的路线。

8. 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指导，更有计划的去进行工作。这一年来在客观上农民运动仍然是继续不断的进展，但的确欠缺党的有力的指导与有计划的工作。大部分的农民斗争都是一种自发的形势，所以大多数都在偏僻区域中发展，而在重要产业区域和中心城市的周围，农民运动极少发展。这样固然难于形成农民运动的中心基础，特别是在党的最后夺取政权的任务上看是莫大的缺陷。所以党以后必须特别加强对农运的指导，更有计划的去进行工作。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无疑地是没收地主

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处理。但根据两年来土地革命的经验，乡村阶级斗争的形势，在策略上我们必须认定贫农是斗争的中坚，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富农于中国国家封建制度残余的剥削下，在相当的斗争阶段之中，我们还有吸引他参加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可能。所以无条件的反富农的路线是很错误的。但当着农民与他的主要敌人地主豪绅决战的时候，富农中兼半地主或拥有多数雇农的分子必然跑向反革命的方面，故同样地不应放松雇农贫农对他们的阶级斗争[1]。同时注意发展雇农的组织并领导他们的斗争，已经是党的迫切的任务，因为不仅是雇农与贫农是土地革命的领导力量，特别是在革命的下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更只有雇农坚决的斗争与贫农结成巩固的同盟而使中农中立，才能取得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胜利。现时全国的灾荒现象尤其是北方的灾荒仍然继续，在客观上农村斗争有极大发展的可能，只是在农民群众中，北方的和平发展观念与南方失败落后的躲避情绪都很浓厚，另一方面过去盲动残余烧杀政策等仍然存在，所以党在农村工作中的路线，必须坚决的反对右倾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同时决不可以放松对于盲动残余及其他“左”倾思想的纠正。党必须坚决地发动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促进乡村中阶级分化，并以游击战争重新团聚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到有组织的斗争，走向建立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的道路。自然这些斗争要尽可能地得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要从斗争中加紧农民的组织，从游击战争中扩大农民的武装，以准备革命的最后胜利。

9. 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六次大会指出现在中国农村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条件，农民斗争很易于走到武装的冲突，所以党应坚决的领导游击战争与自发暴动，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工农革命的红军。同时指出党在苏维埃

区域的策略，是要坚决实行党的土地政纲，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要用尽一切的可能来扩大红军的组织，这是决定中国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之一。一年来农村斗争的经过，农民自发暴动在各省不断的起来，游击战争继续扩大，红军组织虽然经过军阀无数次的“围剿”，不只没有消灭，而且得到了新的发展，这都证明六次大会的指示是异常正确，党以后应继续坚决的执行这一路线。但是党应同时注意游击战争的行动更有组织，更正确的实行农民斗争的口号，而坚决纠正盲动残余的烧杀政策，和其他错误的行动，才更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至于红军行动的策略集中或分散，是要决定于一切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如军阀战争的形势，农民斗争的状况，以及红军组织的成分与地理的条件等，不应机械的一般的来指示集中或分散的策略。

10. 加强兵士运动的工作。中国军阀制度不仅在保持着半封建的关系上而存在而发展，并且帝国主义列强正维持着这一军阀制度以加紧其进行瓜分中国的阴谋，故中国工农革命如得不到广大兵士的参加，如军阀军队中广大兵士群众仍成为中国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压迫革命之最残酷的工具，则中国革命便是发动起来，也将不能得到并保障最后的胜利。但中国大革命的震动与工农运动的高涨不是空过的，尤其是两年来农村经济破产的急剧，灾荒区域的扩大与土地革命的开展，均足以加紧中国军阀走向溃崩的过程。在这里，事实的表现便是军阀对人民的剥削已到槁筋吸髓的地步，对地盘的争夺更加剧烈，战争的祸害更加扩大，军队的生活更加恶化，新军阀克扣军饷虐待兵士方法比旧军阀还要残酷；因此，军队的倒戈与士兵的哗变以及整队的士兵投转到农民斗争区域与红军方面都时有所闻。所以反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与争取士兵群众到革命方

面来，在中国革命中实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应成为党的经常的主要任务之一。六次大会以来，各级党部对于士兵运动的工作有一般的忽视，党应用极大努力纠正这一倾向，加紧动摇军队的宣传，鼓动士兵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以联系和发展到士兵群众投身于土地革命运动，同时在士兵群众中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以树立工作基础，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过去在兵士运动中有两种错误的观念：第一就是兵变主义，以为兵士运动的目的就是破坏敌人军队，所以应该以兵变为原则。而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盲目的兵变，只是消灭党在兵士中的基础，对于敌人的打击极微，这完全是与我们的任务不相容的，所以我们在原则上反对兵变主义。至于自发的兵变，或已被敌人发觉不得已而兵变，或者是在红军与苏维埃区域和农民斗争激烈的区域接近的地方，军队为着保障农民斗争的胜利而需要兵变，当然我们要坚决的领导。第二种观念以为兵士运动没有日常的经济斗争的工作，其实不然，军队一样的有日常经济斗争，并且有日常斗争，才能激起广大的兵士群众的反官长的阶级觉悟。这种观念的错误，结果是一样的要走向兵变主义方面去。在帝国主义驻华的海陆军中，党一向缺乏有系统的破坏工作。根据上海暴动与汉口夺回英租界时经验，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压迫与在他们中间的士兵运动，尤其是在安南印度士兵中的运动，对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实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党应一方面在群众中从事要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运动，另一方应在这些士兵中间有经常的宣传工作，以促其觉醒和自己要求撤退，尤其要督促青年团加紧这一工作。

11. 巩固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一年来工作的结果，克服许多的困难，已开始表现着党的进步，但是党

的组织特别是支部还没有脱离涣散的现象，党在产业无产阶级中特别是铁路海员矿山工人中的基础仍是异常薄弱，这样决不能使党成为群众斗争的强固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先锋军。所以党应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克服许多困难，巩固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这也是党在革命中的重大的任务。

12. 宣传与教育的任务。党必须坚决的勇敢的在一切群众的日常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中极力扩大党的政纲的宣传，特别是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群众解放的出路的意义。同时特别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尤为重要，过去对于这一点极少注意是一个莫大的缺点。一切日常鼓动的口号都须与党的宣传口号联系起来，才能使广大群众在不断的斗争经验中深切了解党的口号的正确，然后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期，党才能征调广大的群众来完成这一革命的任务。同时若没有对于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特别是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本理论与策略，决不能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领导革命的任务。当然这样的理论的教育，要注意与实际斗争策略、党的日常工作，发生密切的联系。离开策略，离开工作去高谈理论，这是一种清谈的倾向。这不只是使同志得不到正确的政治认识，而且是妨害党执行在目前革命当中实际任务的最恶劣倾向。

13. 扩大党在城市贫民中的影响，特别注意学生运动。城市贫民是工人阶级在城市中最好的同盟军，是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一年来城市贫民的运动，如反苛捐什税的斗争，在客观上是很发展的，罢市停业的事件到处发生。这是很明显的证明城市贫民已经开始离开国民党的影响，走向革命斗争的道路。可是党对于这一工作，在全党中都成为一般的忽视。以后党必须经常在城市贫民中加紧宣传鼓动的工作，帮助他们的组

织，特别是在他们斗争的时候，党应设法打入进去起领导的作用。同时学生的斗争，也有很激剧的发展，群众表现着一天天的左倾。如果认为学生群众经过一九二五至二七的革命高潮后，已完全失掉他的在革命中的作用，这是不正确的观念。当然工人运动的发展，是革命斗争的领导的力量，但是在现在政局根本矛盾日益加深，国民党的威信日益破产的条件之下，学生群众除掉一些反动的分子以外，仍然是要趋向于革命的，特别是反帝与争自由的运动，并且是工人阶级有力的同盟军。党必须坚决的反对这样错误的观念，更有力的加紧在学生运动中的工作，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而夺取广大的学生群众到党的政治口号之下来。但是应该严重的注意，使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观念，不要在工人群众中及党中存有影响。

14. 注意青年妇女的工作。目前政治趋势发展的过程中，特别的显示了青年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与特别的任务。一年来青工女工在生产中数量的激增与生活的恶化；广大的青年士兵与农村青年群众在不断的军阀战争中，农村经济破产的过程中，更推动他们走上斗争的阵地；青年贫苦学生群众反帝与争自由斗争的发展，这些都明显的看出了青年运动发展的趋势及斗争和组织的前途：（一）青年生活状况恶化，政治压迫的加厉；（二）青工与女工在产业中数量的增加，在生产中的比重加强；（三）因此青年的愤懑和需要组织与斗争的准备也正在尖锐化，这在过去一切斗争中，青年群众斗争积极的加强，便是例证。但是青年团在这种形势之下的工作尚不充分，特别是在青工群众中工作的薄弱，如像过去在斗争中：（一）忽视青工特殊利益；（二）忽视青工群众的组织等。这些都指明党在青年与妇女的运动中要有不断的努力，更应积极的帮助与督促青年团在这一工作路线上争取广大的青年群众到自己的旗帜

之下。因此，青年团的工作：（一）应积极的创造团的无产阶级青年的组织基础；（二）加强团员群众政治生活，经过团的组织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于青年群众中；（三）青年团应肃清前一时代非青年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创造新的青年工作方式与方法，使团的工作青年化；（四）运用青年群众组织的特殊方式与方法，夺取广大的青工群众到赤色工会方面来，在斗争中争取青年的特殊利益；（五）加强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党更应当在一切斗争关联到青年与妇女的利益，尤其要加强纺织女工运动的工作。

15. 加紧党员军事化与群众的武装训练的组织。党应不忘记广州暴动获得了很多的武器群众不会使用的教训，所以党应从现在起加紧注意党员军事化与群众武装训练组织的工作。在工人农民和青年群众中必须经常的发展有武装训练性质的组织，如纠察队、赤卫队等，特别是群众的斗争当中，更应特别注意。这一任务与最后的武装暴动的总任务有莫大关系的。如果以为只要武装群众的脑筋，不要武装群众的手足，这是孟塞维克的思想，这是布尔塞维克所坚决反对的。

Ⅳ. 策略的路线

（十一）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在现在国民党残酷压迫而群众斗争又在开始复兴的客观条件之下，党的策略的路线是要利用一切的可能来争取公开的活动，同时要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亲密的联系起来。只有利用一切机会公开的做宣传鼓动的工作，公开的组织群众，公开的号召群众的斗争，才能影响广大群众发动广大群众。同时特别注意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支部与党团的工作才能更加巩固党的

领导的力量。必须秘密工作的加强，才可以帮助公开工作的发展，公开工作的发展又可以使党的秘密工作易于扩大。所以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是一条路线，而不是两个对立的策略。只有右倾或“左”倾的观念，才把他分割起来对立起来，来比较他的相互的重要，以企图取消对立的一方面，这是绝对错误的。同时要特别注意的，是要在客观可能的条件之下以斗争来取得公开，所以公开工作的本身就包含了斗争的意义，决不是投降到国民党的法律下面去求得公开。另一方面不顾群众的情形与客观的条件，以为一开始工作便必须把党的一切根本的政治口号都摆出去，这必然要吓退群众，实际上都是取消公开工作的办法。在上海“五一”至“五卅”示威工作的过程当中，运用这一路线，的确收到了很显著的效果，证明这一路线是异常正确的。所以党以后更应坚决的来执行这一路线，才能实现夺取广大群众的任务。

（十二）为实现这些任务，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一右倾的危险绝不仅是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而复活，他更有现实环境之下不可轻视的基础。自从统治阶级以白色恐怖的压迫，改良主义的欺骗，从宣传上组织上极力的向群众进攻以来，党内反映着一部分群众失败情绪与不正确的观念及小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右倾思想便一天一天地发展。在理论与现实分析上是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错认资产阶级可以在美国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取得反革命的领导权，对统治阶级内部各种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予以忽视，对工农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与党的力量存在予以否认，甚至认统治阶级已经走向稳定或革命高潮之来到将遥遥无期，于是表现在策略之观点上便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接受资产阶级的欺骗政策，在组织的观

点上便是党内和平（这种观念是要停止我党对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斗争，这是最危险的观念）与放弃赤色工会中心组织的主张。同时党在组织上无产阶级基础的削弱，干部分子停顿在智识分子成分上，党员政治水平线之低，又都足以成为右倾思想发展的组织来源。固然我们在工农群众中间的工作必须利用一切的可能争取公开的活动，而且已经开始了一点成绩，但这只是非法的环境下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争着实现党的基本任务，决不是放弃我们原有的基本任务，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去迁就客观条件以求得统治阶级不加干涉的合法存在。这后一见解根本是机会主义者的主张。这样做去，不仅要成为第三党以至改组派的尾巴，并且还要推着群众走入不可挽救的改良主义的陷坑。在最后，便要完成取消派的倾向与党内以及群众中间动摇犹豫恐惧消极的观念相结合以至取消革命，取消党，与共产主义的领导和组织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党内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形成，已经有了一个危险的派别，但依着客观的环境与他的可能的目前发展前途来看，右倾的确是特别的危险，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党内正在发展的这一特别危险的倾向。

（十三）另一方面，党内“左”倾危险自六次大会后虽逐渐失去他发展的基础，但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在目前最严重的“左”倾危险是不愿意进行日常斗争，不承认部分要求斗争的必要，不愿意争取公开的活动，不愿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保留着些命令主义的精神，提出一些空自夸大的高调（目前实行的口号），幻想一些大的斗争来到，这都足以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仅不能加大，且将日益缩小，故要克服党与广大劳苦群众脱

离的现象，取得群众尤其是工人使其革命化，必须坚决的肃清“左”倾的危险。所以认为党在反对右倾的特别危险的时候，应放松对于“左”倾的攻击的观念显然是不正确的。

Ⅴ. 党的组织问题与党内生活

（十四）依据目前的全国组织状况，可看出党的弱点很多，主要的如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削弱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不正确，这都是令人不能满意的现象。但决不能因此便忽视党的组织存在，否认党在几个月来克服这些现象中的进步。假使这样，只有走入取消派的倾向，丝毫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长期耐苦的工作精神。故党在组织上的正确路线，必须认定：（一）欲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要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寻求积极而斗争的分子吸收入党，以改善党员的质量。（二）支部是党的基础群众的核心，党要以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创造产业支部生活，并以试办工厂小报为联系党与群众关系、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武器。（三）地方党部目前在组织上应以建立中心工作，实行党内正确的民主化，造就工人干部，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分配宣传品的工作，指导党员职业化为其重要工作。（四）上级党部应努力于政治及中心工作的指导，加紧巡视工作。（五）党与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划分，两者中间不同的性质必须弄清，相互的关系必须有正确的规定。在这里我们更应深切的认识最近国际的指示，建立产业支部及其工作与加强党的理论上武装成为目前组织上两个不可忽视的任务。

（十五）六次大会后党内生活的确表现了一些新的精神（在六次大会正确路线之下工作的新精神）。但因为有些同志对

于决议案还不了解，致发生组织上不正确的主张。有些同志主张党内和平，有些同志主张极端民主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些同志发生组织的消极观念。现在秘密条件之下，所有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改组派以及第三党的领袖，将我们包围得异常严密，而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又甚浓厚，我党不独应当注意政治路线的正确运用，还须注意党内铁的纪律的保障。各种不正确倾向对于党的存在都有莫大关系。不执行党的决议，就是削弱党的战斗力与党的领导。闹党内无原则的纠纷，就是妨碍党的进步。否认党的旧基础，蔑视党的组织力量，就是发展党内取消的倾向。对于不正确的倾向必须领导全党同志与之作决定的斗争，决没有什么党内和平。破坏党的纪律，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自然以后各级党部每逢遇着不正确倾向发生时，在执行纪律以前，必须很注意于审查这些倾向，尤其要使全党同志得到正确的了解。最近党内发现了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小组织，这一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

（十六）中央执行第六次大会的决议与国际六次大会决议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已经打破了许多障碍，克服了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将党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下挽救出来。在每一次领导工农运动之中，可以很显明的看出党的进步。中央只能在得到全党共同努力的时候，才能很实际的执行大会与国际的决议，也只有运用正确的政策，纠正一切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的错误与弱点，有系统的耐心训练党的干部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发动党所有的力量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党才能执行自己的革命

任务，夺取群众到革命方面来，领导他们达到胜利的暴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在收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后，对此决议案进行了修改，将富农问题的一段话，改为："富农在中国特殊经济条件之下兼有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所以他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便要由动摇以至反革命，所以必须坚决的反对富农，才能彻底完成土地革命。至于富农还留在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战线内的时候，党必须极力发展雇农贫农在思想上组织上斗争上的影响，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

PDG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Ⅰ．中国的土地关系

（一）土地所有关系——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即是金钱买卖关系），是资本主义形式；由天子分封，不能自由买卖的，是封建形式。中国的土地买卖不能绝对的自由，必须先找到亲族等作证人，所以还带有点封建形式，但资本主义形式占优势。

（二）土地使用关系——农民与地主关系纯粹表现于货币金钱上面，除货币关系以外，其他完全是自由的、无束缚的是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农奴制度是纯粹的封建形式。在中国，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与农奴制度在形式上少有不同，佃农以农产品交租，而是农奴制度的变象。以前农奴制度，农奴生活完全由地主供给，生产工具亦由地主拿出来，所有农产品完全归地主所有。后来地主发现农奴怠工，他为提高生产力起见，所以改变了形式，农奴生活不归地主供给，而以农产品的百分之若干分给农奴——不仅如此，现在中国农民对地主的劳役制度，及地主对农民的无上威权，甚至操有生杀之权，这都是封建制度的方式。所以中国的土地使用关系是封建形式占优势。

中国的土地关系在所有关系上是资本主义形式占优势，使用关系上是封建形式占优势，所以我们说中国土地关系是半封建形式。

Ⅱ. 土地分配状况

在说明中国土地分配状况之先，必须对“地主”、“农民”及“农民的种类”与“农民的阶级”加以说明。

（一）地主——自己有土地而不使用，利用自己的土地所有关系来剥削农民的是地主。地主的剥削方式有两种：

A. 纯粹封建制度的削削——农奴制度；

B. 资本主义式的地主经济——雇用雇农，剥削雇农的剩余劳动。

（二）农民——自己有生产工具，自己耕种田地的都是农民。雇农没有生产工具专门出卖劳动力，所以他们是农村无产阶级（农业工人）而不是农民。农民都是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有生产工具。

（三）农民的种类——农民在土地关系上（土地所有关系与使用关系）分成许多不同的种类：

A. 自耕农——自己有土地（所有关系）自己耕种的（使用关系）；

B. 佃农——租地主土地（所有关系）自己耕种的（使用关系）；

C. 半佃农——只靠自己土地不能维持生活，尚须租人土地（所有关系）耕种的（使用关系）是半佃农，亦称半自耕农。

（四）农民的阶级——农民的阶级是由农民的生产关系上

来决定的。

A. 富农——剥削、雇佣劳动者（雇农）的是富农；

B. 中农——不剥削人亦不受人剥削的是中农；

C. 贫农——半无产阶级——专靠自己耕种土地（无论是自己的是租来的）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兼作雇农的是贫农。

因为中国的农民生产关系、土地关系非常复杂，所以阶级关系也非常复杂。富农兼营商业的剥削及高利贷的剥削，中农在土地关系上常受封建势力的剥削，贫农受封建半封建势力的剥削。富农一方面以半封建的方式剥削中农、贫农，同时又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剥削雇农，而另一方面他又受封建势力的剥削。

佃农之中亦分为富农（租大量土地雇用雇农耕种）、中农（租土地自己耕种）、贫农（只靠租来的田地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兼作雇农），这要以他的生产关系来决定，不能以消费关系来看。

中国各处土地分配状况各不相同，大致可以长江为界，江南、江北恰恰相反。

（一）江南——土地大部分在地主手中，在农民手中的少，湖南、广东地主土地约占百分之七十，广西占百分之八十。但这些土地集中于大地主手里的很少，而集中于地主阶级的很多，所以南方的大地主较少；

（二）江北——平均计算大约农民土地占百分之七十，而地主土地只占百分之三十，所以自耕农较多，地主的土地则集中于地主阶级者不过百分之三十，而集中于大地主手中的占百分之七十，所以北方大地主较多。

Ⅲ. 豪　　绅

（一）什么是豪绅？——豪绅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与地主阶级不是对立的，他在乡村中掌握政治上的特权。

（二）中国豪绅在经济上常常是实际上的地主，虽然他有时没有土地，但祠产、庙产、族产等都是由他们掌管的。

（三）中国豪绅是乡村中的官僚，他可以勾结官府，武断乡里，同时一切捐税都要经过他们的手来征收。

（四）中国豪绅是乡村中的小买办、帝国主义的乡村经纪人。

（五）中国豪绅是乡村中高利贷的主人——他在乡村中间接的发展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剥削农民。

豪绅是中国特殊土地关系的产物，是万恶皆归的东西，所以乡村中的农民反对豪绅最利害。但是他们不晓得，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消灭豪绅。

Ⅳ. 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

为什么在现在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在乡村中会能如此的活跃？这是因为商品经济打破了自然经济发展出来的结果，自然经济是自己生产自己使用，所以自然经济时代城市被支配于乡村，城市只是农产品的交换所，没有乡村就没有城市。商品经济是为商品而生产的，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自然经济日益破产，手工业发生于城市，这时候农民到城市中去，不是去交换农产品而是去购买手工业生产的商品，所以农民与城市的关系已不如以前之简单，他对于城市的需要随

城市手工业之发展而益多。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商品经济更加发展，而乡村农民对于城市的需要也更加迫切，在经济上已不是乡村支配城市而是城市支配乡村了。惟其农民对于城市的商品需要日增，所以对于货币的需要日多，而发生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但我们决不能说自然经济比较商品经济好些，如俄国的国粹派、印度的甘地以及中国的章士钊，都是这一思想的代表。高利贷与商业资本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所以他的剥削还是半封建性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常混合为一。

（一）中国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大半是中心的地主或豪绅。

（二）高利贷资本与土地关系常常混合为一，如租田之押租等。

（三）由商业高利贷资本而变作地主——高利贷资本常没收欠债人的土地。

Ⅴ. 帝国主义与中国土地关系

（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首先打破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度的阶段，故价廉物美，使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如风扫落叶，使中国农村破产。所以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假如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则资本积累于中国，可以开办工厂容纳失业的农民，而现在则是积累于帝国主义手中，在中国不能有收容大量乡村失业破产农民的工厂，所以造成中国广大的失业群众、军阀军队的基础、土匪、流氓，都是这一广大群众破产

失业之结果。

（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动摇了地主的剥削关系。结果，一方面使地主加紧对农民的剥削以维持其破产的残余，而另一方面则使地主阶级发生资本主义剥削的倾向，投资于工业等。

（三）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客观上使中国一天天资本主义化。

（四）帝国主义使中国资本主义化，于他自身是非常危险的，在帝国主义的主观上是不愿这样做的。他只需要中国来销售他的货物，供给他的原料，所以他又不能不极力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A. 维持中国封建制度——维持满清的统治、军阀的统治；

B. 抓住中国海关等经济上的特权——使中国工业不能实行关税保护政策；

C. 抓住中国政治上的特权——领事裁判权、赔款等。

结果，一方面使中国自然经济日益破产，而另一方面使中国不能建设资本主义，这便是殖民地经济的特殊情形。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的结果，一方面冲破了中国的封建制度，使中国资本主义化，同时他又巩固中国的封建势力，利用之以阻碍中国之资本主义化。

封建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不能分开，帝国主义的侵略愈加紧，封建阶级越买办化。经济上的买办是代替帝国主义买卖商品，而政治上的买办则是帮助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所以封建阶级已经变成为帝国主义政治上经济上的买办。

所以中国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必须要根本推翻封建势力，要根本消灭封建势力，必须要打倒帝国主义，所以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势力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说，要完成土

地革命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只有推翻帝国主义才能彻底完成土地革命。

Ⅵ. 中国军阀制度

（一）中国军阀制度的产生——帝国主义经济侵入中国，使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破产，发生广大的破产失业群众，而成为军阀制度的基础。同时，军阀制度是建筑在封建剥削基础上面的。

中国有既广大失业群众成为军阀制度的基础，而军阀养兵需要多量的军饷，所以军阀需要扩大地盘，而扩大地盘后又更需要更多的军队，需要更大量的军饷，因此便更需要加紧他抢地盘的战争，这就是军阀自身的矛盾。同时，军阀制度是建筑在封建关系上面，他是由于封建关系产生的，军阀的剥削是封建的方式，军阀的封建地方色彩非常浓厚。所以，军阀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特殊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二）军阀制度是国家封建制度的残余——国家封建制度是封建诸侯的形式，现在中国军阀也是这一形式，军阀的剥削不仅是剥削工人、农民，而且是剥削地主、资本家。但军阀只靠军队尚不能维持其统治，所以，一方面他必须勾结帝国主义，另一方面须勾结他所统治地域内的剥削阶级。因此，中国过去的统治阶级是地主，而军阀即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现在则因地主倾向资本主义的反映，所以有一部分又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但军阀代表某一阶级而不就是某一阶级，他的本身仍是军阀。因此，军阀是某一阶级的代表而同时是帝国主义的工具。

现在军阀的剥削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在产业发展的地

方，他可以减轻对土地的剥削，而加重于其他工商业方面，而在产业不发展的地方，则只有加重土地的剥削。土地表面上是农民、地主的，实际上是军阀的。所以在工商不发展、自耕农占大多数、苛捐杂税厉害的地方，反苛捐杂税即是土地革命。但反苛捐杂税的口号须与没收土地并列起来。

Ⅶ．中国土地斗争的实质

什么叫做土地革命？即是要变更土地关系，将过去的土地关系推翻，另建设新的关系。即是以前有土地的人不使用土地，无土地的人要使用土地，所以地主可以利用土地使用关系来剥削农民。土地革命即是要将土地所有关系与使用关系合起来，要使用土地的人就要有土地。

变更土地关系的意义，就在于根本消灭封建制度，开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农民平分土地是资本主义制度，而非社会主义制度。私有财产观念是资本主义的观念。平分土地以后，农民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

农民只懂得分产主义而不懂共产主义，工人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工厂的机器是不能平分的，分开以后根本失掉了他的作用。要使农民懂得共产主义必须要农业工业化，所以列宁在俄国革命成功以后提出农业电气化的办法。

中国工业不能发展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另一方面则由于农民购买力减低。实行土地革命之后，可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打破帝国主义一切束缚，可以使中国资本主义有走上发展道路的可能。但不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在客观上是力争中国资本主义化

的前途。

Ⅷ. 中国土地关系发展的前途

土地革命是力争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前途，但资本主义化是否只有土地革命这一条道路，在理论上还有几条道路可走：

（一）富农经济的道路——富农扩大生产多雇用雇农，改良生产工具及生产方法，使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A. 帝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使中国工业不能发展。农村中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非常活跃，地主阶级更利害的剥削农民，使中国富农走上半地主半封建阶级。他们扩大雇农生产所得的，不如投资商业、放高利贷或买土地出租得利更多些，所以富农主观上不愿走上扩大雇农生产的道路。

B. 军阀战争、苛捐杂税，客观上都是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化。

（二）以地主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将地主土地用资本主义方法来生产，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

A. 中国土地分割非常零碎，要将佃农完全变成雇农是不可能的，中国土地不是大经营而是小经营，在事实上不能合拢起来。

B. 中国地主阶级没有资本来建设资本主义的生产。

C. 帝国主义的阻碍。

D. 中国不能统一，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无论政治上交通上都发生困难。

E. 中国中小地主占多数，更阻碍了地主的资本主义化。

PDG

南通的垦牧公司及营垦公司等虽是资本主义的形式，而事实上仍是划分给许多农民种耕，所以在生产上仍是封建式的，这也足以证明中国没有真正资本主义化的可能。

（三）帝国主义使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如南满一带日本地亩公司。这同样是困难的，因为：

A. 一方面须有大批的资本，而同时须根本消灭中国革命，使群众变为他的奴隶。

B. 帝国主义间相互冲突不能解决，战争不能解决，亦很困难实现。

（四）革命的道路——虽然事实上也有许多困难，但是中国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三万万人赞成革命，要求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需要土地，所以土地革命这一道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

中国资产阶级是否有能力来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用一些欺骗改良的方法如二五减租、减轻田赋等口号来欺骗群众。实际上，中国小地主日益破产，要维持他的经济，只有更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所以二五减租是不能实现的，而且事实已经证明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军阀制度不消灭，减轻田赋又是幻想，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既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又得不到封建势力的让步。他要想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以暂时的消灭中国革命，是没有丝毫可能性的。

土地革命是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他是否能转变到资本主义呢？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一）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是天生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他的领导深入到农村中去，可以影响农民而使他不转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二）土地革命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资产阶级的统治

推翻，没收帝国主义工厂（中国资产阶级工厂，假如在革命中及革命成功后怠工或破坏生产时，自然同样的没收），非集中经济力量，以政府的力量来生产不能维持。因时革命成功后为战胜敌人的进攻及一切困难起见，而至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更减少了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可能。

（三）现在整个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单就现在中国经济条件来说，本不够社会主义革命，集中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不能统治全国，小资本的力量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一定要得到西欧的帮助才能做到。组织社会主义政权是可能的，但是要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则是有许多困难。

因为有这三个条件，所以土地革命虽是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必然会转变到社会主义。所以彻底的土地革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步。

Ⅸ. 党的土地政纲

（一）推翻豪绅地主官僚的政权，解除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建立乡村中农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要完成土地革命，必须首先解决政权问题，必须要有工农自己的武装和自己的政权。

（二）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农民使用。没收土地以后，实际上不能全国同样的一致解决，只有归苏维埃代表会议处理，没收以后的土地使用权归农民，同时也可以解决土地的买卖问题，因为到了那时候，便没有人会再买土地。

（三）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公产，官荒或无主

的荒地、沙田，都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

（四）各省委中的国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苏维埃政府移民垦殖之用，分配农军的兵士供其经济上的使用。现在还只是一个政纲，并非目前苏维埃区域可以适用的。

（五）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概作无效。

（六）销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面的口头的一切在内）。

（七）取消一切由军阀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取消厘金，设立单一的农业经济累进税。

（八）国家帮助农业经济：一、办理土地工程；二、改良扩充水利；三、防御天灾；四、国家办理移民事业；五、国家办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借贷；六、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七、一切森林河道归苏维埃政府经营管理。这些都是将来苏维埃政府要作的，现在还做不到。现在的苏维埃区域不是建设的，是斗争的。

Ⅹ．需要解释的几个问题

（一）没收土地国有问题——土地国有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的时期也可以没收土地国有。现在土地国有这一口号在农民中还不能懂得，同时在目前也不应提出这一口号，但我们须在农民中宣传这一口号。

（二）平分土地问题——平分土地不是社会主义，所以站在社会主义观点上应反对平分土地，只有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才能平分土地，所以在民族革命阶段上是最革命的口号，因为他是彻底破坏封建势力的。所以我们不应反对平分土地，而且应

当领导帮助他们斗争。但同时须指出，平分土地是没有办法的，只有社会主义之共同生产，才有解决的可能。

（三）雇农利益问题——雇农不是农民，雇农在斗争中的口号是八小时工作制。如雇农需要土地时，则无疑的可以分配给他土地。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四十号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与精神

（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

各级党部，全体同志们：

六次大会后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业于日前开过了。此次全会开在六次大会一年之后，正当着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群众斗争都在开展的时候，他负有重大的历史任务，来解决目前许多严重的策略问题。全会到有过半数的中央委员及参加的同志六人，会期六天。在六次大会的路线与共产国际训令的指导之下，在全党一年来艰苦奋斗与党内一致的精神之中，全会很顺利地成就了他的重大任务。会议中通过了政治、组织、职工和对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各种决议案及各种宣言，主要的成功在获得关于政治的原则的更正确的分析和解释，政治上策略上更具体的工作方针，组织问题、职工运动更显明的任务与工作方法，特别是对于中央政治局过去一年来工作路线的满意并给予今后工作以更实际更周密的指示。

现在扼要地报告如下：

全会认中央确能正确地应用六次大会的策略，并承认党已有了进一步的巩固

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认为在总的工作路线上确能依照六次大会的精神，正确地应用六次大会所规定的策略。在过去九个多月工作中间，全会承认我党于不断的党内党外的艰苦斗争中在政治上组织上都得着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一方证明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另一方正因为中央能将大会所规定的原则，在实际斗争中正确地运用。全会指出中央过去有时对于政治事变的应付迟缓，对于政治形势的分析在原则上虽都完全正确，只在有些解释上不免有过于机械或过分估量的毛病，致引起一些同志不正确的政治观念，今后需要更求正确。全会满意中央过去对各级党部之策略上的指示与职工运动的督促，尤其是关于五一、五卅运动对于主要城市的具体指示。因此，全会特指示中央政治局对于八一运动的工作，应运用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经验，对全国要有更具体的布置。关于农民运动、苏维埃区域工作、士兵运动、红军及游击队中的工作，全会认为中央还少工作上的积极指导。反帝运动注意得还不充分。工作区域及各种运动缺乏平衡的配合，尤其是武汉、广州中心区域的工作至今犹未建立，需要中央之极大注意。全会承认中央在组织宣传工作上取得了相当进步，同时指出他一些缺点。

全会同意中央在党内政治斗争的路线

全会同意中央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所采取的主要是反对右倾

的路线，同时防止“左”倾的情绪。中央解决党内非政治纠纷的原则是教育方法，但在教育方法感觉不足时便须采取组织上的最后制裁，如中央对于江苏问题、顺直问题的解决，全会是认为正确而需要的，并批准将王藻文与王仲一同志从中委会中开除出去。全会同意中央指出最近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的活动，有他暂时的发展可能与其反革命的作用，值得全党之严重的注意。这些党内政治斗争的路线，是巩固中国党之最有力的保障！

全会指示中央之今后对各部分的工作方针

全会指出中央以后对各级党部的指导需要更具体切实。过去一年来，青年团是始终在六次大会及党的中央正确路线之下奋斗的，全会指示党中央今后更应加紧帮助青年团的工作。中央农委妇委应加强自己的工作。全总党团应更集中力量于铁路、海员、矿山等工运以及与各地赤色工会的关系和指导。济总党团应开始建立济难会本身的独立的群众组织与工作。全会更特别指出中央过去对于针对着国民党群众运动的反抗运动做得极少，需要中央今后之极严重的注意。在宣传上要注意理论上的批评运动。关于中央本身的分工与集体指导，中央各部的相互联系，中央与各地的交通，与国际以及兄弟党的密切关系，全会都指示中央今后应更求改善。这些工作之更完善的建立与发展，必能使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更加有力，使党夺取群众的范围更加扩大，而日益走向革命高潮。

世界革命危机更深，中国革命运动开展，同是加重了中国党目前争取群众的任务

一年来国际上各种重大事变之经过，充分证明我党与国际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世界革命危机加深是铁一般地正确。第一，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是更加紧迫；第二，因为苏联的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企图乃更加积极；第三，各国的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在准备世界大战前面，帝国主义乃更加紧了进行瓜分中国的阴谋与中国的军阀战争，同时世界革命的激剧，亦帮助了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在中国的政治局势，全会认为存在有三种根本矛盾：

第一，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一切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真实统治者。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日益急进，因此，更加紧了各个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根本冲突。最要的在英日美帝国主义三角冲突之中，已经表现着英日接近对美的形势。但他们对华的侵略政策根本上都没有一点不同，如果幻想美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独立的发展，或是过分估量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发展，以为他已经取得了南京政府领导权，都是极端错误的。

第二，现在的中国经济、封建阶级虽日益崩溃，但尚存在他的强固基础，加以帝国主义的利用与维护，于是军阀制度和封建半封建的上层建筑仍然是中国政治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所以国际反对派以为中国已经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同

时，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后，便完全买办化了，与封建势力没有矛盾了，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民主的改良主义政纲，也是不正确的。故现时统治营垒中，仍存在有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根本矛盾。但如果夸大了这一矛盾的事实，以为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还有革命的作用，更是极大的错误，并且他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共同矛盾之前，仍然要联合一致的。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冲突的加紧，因为统治阶级中有阶级矛盾的存在，因为军阀抢夺地盘的争斗加紧，战争仍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不可避免的经常状态，而日益加紧其走向崩溃。因此，统治阶级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剥削乃更加残酷，群众生活乃更加痛苦，群众斗争乃必然不可避免地向前开展。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压迫剥削加紧，地位加强，亦引起群众反帝运动的复兴。

故第三，现时的反动统治与群众革命斗争的冲突是中国目前政治局势中最严重的矛盾。现在工人斗争正在开始复兴，乡村的土地革命运动正在逐渐发展，有些苏维埃区域及朱毛红军仍然存在，投身到农暴区域的兵变仍时时发生，反帝运动正在复兴，这都证明整个的革命运动是向前开展的形势。在这一形势中，全会指出有几个特点：一、从小斗争发展到大的罢工；二、从反抗资本进攻开始进到争自由反国民党的运动；三、改良主义及黄色领袖的影响相当缩小；四、党及赤色工会的影响相当扩大。这虽不可以过分估量，但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的确可以看见。故以为中国革命高潮之来到将遥遥无期，或以为很快地便要到来，都是不正确的。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坚信只有斗争，只有看我们争取群众的力量，才能决定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行程。

在目前政治局势下，全会认为党须坚决执行十五项政治任务

依据目前的政治局势，益发加重了党之争取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总任务。党及国际六次大会所指出的现在的革命根本任务：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势力，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无疑地是正确的。并且党在一年来工作的结果，党的政治影响及领导群众力量已有相当进步，但是国民党改良主义在群众中影响尚未完全打破，群众斗争力量还很薄弱，党在群众中基础还不强固。所以全会认为，党要争取广大群众，必须坚决执行下述任务：

一、加强反帝斗争，联系到反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同时要认明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与土地革命之彻底完成是两个不可分离的任务，但决不是土地革命之外便没有独立的反帝运动，然又必须与工人运动、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有密切联系。

二、坚决领导反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发动一切群众的斗争，向着这一总的目标前进。

三、扩大反军阀战争的斗争，总路线是采取失败主义的原则，目前要利用战争所给与群众的一切痛苦发动日常斗争，以联系到总的政治任务。

四、加紧地领导、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土地革命的彻底完成固要在革命胜利之后，但如果以为全国工农武装暴动前便没有土地革命斗争，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

五、继续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坚决斗争，要从群众斗争中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同时，理论上的攻击也是非常必要。目前改良主义的影响的确有相当缩小，但如果以为改良主义已经不是革命的严重敌人，这是不正确的。另一方，如果夸大了改良主义，以为有很大实现可能，那更是极大错误。

六、加紧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仍是目前争取群众的主要任务，但现在的形势决不应拘束在日常斗争的口号之下，而应进一步坚决地从小的斗争扩大到大的罢工，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并应有计划地汇合各种斗争到总的争自由斗争。

七、加强工会运动与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如果党在工人阶级中特别在重要产业工人中没有坚固的基础，没有党所领导的工会，党便不能在革命中握着领导的地位。但如果以为赤色工会是我们的中心而忽视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也是错误的。在工运中目前最主要的最中心的任务是特别加强在铁路、海员、矿山等重工业工人中的工作。

八、加强对农运的指导，更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在目前农村斗争中，无条件地反对富农仍是错误的，但决不应放松雇农贫农对他的阶级斗争，同时应注意发展雇农的组织。现时全国的灾荒尤其是北方在客观上农村斗争有极大发展可能，因此党必须坚决地反对农村中和平发展、合法运动、躲避主义等等右倾危险，同时也应纠正“左”倾的残余。

九、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目前农村斗争的形势，很易于走到武装的冲突，故领导游击战争必须是有组织的成为群众斗争的行动。党在苏维埃区域是要实行土地政纲，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要尽一

切可能建立和扩大红军的组织。至红军的集中与分散，要依据主客观的条件来决定。

十、加强士兵运动。中国革命如得不到广大士兵群众参加，将得不到并保障革命的最后胜利。过去各级党部对于士兵运动有一般的忽视，以为这是军事工作人员专门的工作，其实对于士兵的鼓动和宣传是每一党员的责任。在目前兵运中，如采取兵变主义，或是不承认军阀军队中有士兵的日常斗争，都是错误的。在帝国主义驻华军队中，党也要有鼓动和宣传工作。

十一、巩固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尤其是要深入铁路、海员、矿山、金属业、兵工厂、市政、纺织工人群众中去，建立党的支部，以强固党的斗争和领导力量。

十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扩大党的政纲宣传，特别是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础理论与策略，并联系一切鼓动口号与宣传口号，以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但同时反对党内政治清谈的恶劣倾向。

十三、扩大党在城市贫民中的影响，特别注意学生运动。在反帝与争自由的运动中，城市贫民特别是学生群众是工人阶级在城市的有力同盟军。认为中国学生群众的革命作用已失掉了，是不正确的观念，但同时要严重防止在一切运动中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城市贫民反苛捐杂税运动，党也须坚决领导，向着反国民党统治的道路前进。

十四、注意青年妇女工作。青年工农生活的日益恶化，女工在轻工业中数量的激增，农妇地位的重要，青年妇女在工农斗争中作用的重大，都使党要用极大力量来注意青年妇女工作，尤其是帮助青年团的工作。

十五、加紧党员军事化与群众有武装训练的组织。党若不努力实现这一任务，党便没有决心准备武装暴动。在工农和青年群众中，党必须发展纠察队、维持队、赤卫队等组织以实施武装训练。

全会指出党之主要的策略路线

为要完成上述十五项任务而减少困难，全会指出，党必须为下列的主要的策略路线在党外党内作坚决的斗争：

第一、争取公开活动，同时应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在非法的环境中，党只有利用一切机会，公开做宣传鼓动工作，公开号召群众斗争，公开组织群众，才能影响发动和夺取广大群众到我党的周围。同时应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支部与党团的工作，才能更加巩固党的领导力量，而公开工作的发展，也可使党的秘密工作易于扩大和存在。且公开活动是在不断斗争中受到不断压迫，一直争向革命高潮，决不是降低我们口号向国民党求得公开的公开主义。

第二、目前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不仅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残余，并且反映群众中一部分失败情绪与不正确观念，故和平发展、合法运动、公开主义等右倾思想便不断发生。当然这不是说他已到了最后的形成，已有了一个危险派别，但依着主客观条件来看，实须党坚决地予以斗争，以防止他可能的发展。

第三、另一方面，假使以为一切“左”倾的危险已完全肃清，或者“左”倾并不危险，那也是非常错误的观念。目前严重的“左”倾危险，是不愿意争取公开活动，不愿意进行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不愿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盲动主

义残余与急性的情绪等等，都须党予以肃清，以打破党之脱离群众的现象。

全会指出党在组织上的进步与弱点，工作上的缺点以及正确的组织路线

依据党的组织状况，全会指出，党虽在一年来处境仍是非常困难，但经过党内党外不断的斗争，的确已取得了相当进步，已将党从涣散状态中挽救出来了。一般地说，党内的削弱已渐趋稳定，但同时还存在有组织上的弱点与工作上的缺点。这些弱点，特别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党员政治水平线低微，工人干部缺乏，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尚有残留，乃很易助长党内各种不正确政治思想尤其是右倾思想的发展。然决不应因此便忽视了组织上另一方面的进步，且应针对着这一进步，艰难耐苦地努力消灭党在组织上的弱点与缺点，以加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全会认定，党在组织上的正确路线是：（一）欲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首先要深入到重要产业工人群众中去，注意党员质量的发展，使改造党的旧基础与发展新基础要同时并进。（二）支部是党的基础、群众的核心，党要注意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创造支部生活，使每个党员都能在支部中为党工作。（三）地方党部目前在组织上应以建立中心工作，实行党内正确民主化，坚强党的纪律，建立工厂小报与地方宣传品，注重发行分配工作，加紧训练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为其主要任务。（四）上级党部应特别努力于政治及中心工作的指导，加紧巡视工作。（五）党应将帮助青年团的工作看做自

己的工作。（六）党应严重注意秘密工作，从深入群众中去消灭党员自首叛变的现象。（七）党应与群众组织必须划分，相互关系必须确定，党在群众组织中必须有党团的组织和工作。

全会坚决反对党内不正确的组织观念，并主张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活动

全会承认，六次大会后党内生活的确表现了些新精神——为党的正确路线斗争的精神。但有些同志却主张党内和平，主张极端民主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些同志发生了组织上的取消观念或形式主义的残留。现在党处在白色恐怖下，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又甚浓厚，特别是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发展，很易与国际反对派的活动结合来分裂中国党。因此，全会认为我党不仅应注意政治路线的正确运用，还须注意党内铁的纪律的保障。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必须领导全党与之作坚决斗争。不正确的组织观念，必须坚决地反对，而反对派在党内的活动，更须予以理论上的指斥、组织上的制裁，来消灭并肃清其领袖的活动的分子。

全会指出目前工人斗争在开始复兴中的特点，并规定今后工运的中心任务

全会指出，在现在反动政治局势下，工人的生活状况愈陷于奴隶牛马的地位，工人的斗争乃继续不断地发展。在工人斗争开始复兴的形势下，斗争的特点表现出更加扩大、深入与政

治意识的增进，黄色工会下的群众亦更加左倾，而他的前途必然是继续开展。反动势力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都在一致地加紧进攻工人，尤其是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的作用是最妨害工人斗争发展的武器。六次大会所规定的职工运动的策略，根据于一年来的工作经验，无疑地是正确。全党对于这一任务的执行虽表现有相当进步，但还不充分，许多右倾与“左”倾的错误还未完全改正，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还有忽视，工会工作还没能有广大群众的基础。因此，全会更规定工运今后的策略路线与中心任务是：一，积极发展重要产业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海员、矿山工人运动；二，领导工人群众与改良主义作坚决斗争；三，参加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发展群众斗争，扩大党的宣传，组织中心干部，夺取广大群众，以推翻黄色领袖，改变其工会性质；四，发动和扩大工人群众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强大工人斗争的战斗力；五，由下而上地去群众中发展和扩大阶级性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六，利用社会一切公开的可能机会，扩大赤色工会的活动；七，正确地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八，加紧青工女工的工作；九，领导失业工人的斗争；十，领导农村工人的斗争与其工会的组织；十一，加紧和扩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十二，注意工人武装的组织和训练。在这些任务前面，全会认为赤色工会的工作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应争取广大群众到自己的周围，坚决地反对劳资合作，揭破黄色领袖欺骗，不放松反帝、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的斗争，联合国际工人阶级，反对第二国际，赞助农民土地革命，努力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加紧领导群众日常斗争，注意重要产业重要地区的发展，引用非党的工人到工会机关。只有在不断地实现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全总的工作才能获得了稳固而广大的基础，党才能争取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到自己的周

围。

*　　　　*　　　　*

同志们，以上便是二中全会的决议与精神！全会的一致的决议，是我们在六次大会精神与国际指导之下制胜敌人与夺取广大群众、促进革命高潮之更进一步的成功的武器！中央政治局依据全会的指示，号召全体同志，站在六次大会的精神之下一致地努力执行这一切的决议，使全会的决议成为实现六次大会精神与中国革命使命的最完善的工具！

中　央

一九二九，七，九日

附：

各级党部、全体同志们：

全会各种决议即将随此通告发下，各级党部接到之后务必召集会议讨论，并做成决议。会议的方法：在省委，要召集省委全体会或召集中心区域的负责同志参加省常委会讨论；在地方党部如系中心区域，要有省委的巡视员在中心城市召集邻近各县联席会议讨论，普通地方党部会议要尽量做到有中心城市党部的代表参加，至在省委所在地的地方党部要多召集活动分子会议报告讨论；在支部中，要有计划地做到每一支部都讨论过全会的策略战线，首先要从支书联会上做工夫起。讨论的内容，要尽量做到与当地实际生活、工作经验、斗争策略联系起来；成立决议案亦必须地方化、工作化，而不要只在原则上大体上来回答全会的决议，且各级会议的决议不必太长，亦不必分成几个，主要地在能帮助下级党部更有头绪更切实际地讨论，一直达到支部。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

（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

湖南省委：

中央看了你们的报告及与宁[1]同志详细讨论了湖南工作之后，认为过去湖南省委的工作在总的路线上是能以相当的执行去年在上海所决定的工作路线，并在半年工作中确已有了相当的成绩。所有过去的工作都完全证明去年在上海所决定的工作路线的正确，使着现在的省委还应该继续着这一路线，加紧在这一工作路线上的努力。最近省委决定缩小不必要的上层机关，尽量使省委同志到各处巡视，这的确是一种正确的工作路线，适合于过去与中央所共同决定的精神。现在这封信上，中央更将目前湖南省委所应特别注意的地方再很具体的向省委指明，望省委注意。

关于湖南全省的中心工作

过去湖南省委固然也很努力于中心工作，但这种努力仍然还不十分充分，甚至还不坚决的认识这一中心工作的意义与重要。现在省委目前所应该十二万分加紧的，还是建设一切重要产业区的工作。铁路工人、轮船工人、汽车工人、市政工人，长沙、岳州、安源、水口山、锡矿山等等中心城市，这些应该

做成湖南省委之最重要的工作对象，在省委的日常工作中不能一时一刻的忘记。省委一定要坚决的认识，只有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有了基础之后，在各处的农民中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产业工人中的工作若不能建立，则谈不到促成革命的高潮，即使再增加一些红色乡村也不能具有领导全省的作用。省委应当坚决的相信，在任何一个重工业中就是建立三数人的支部，比我们在农村中发展百余同志割据一个乡村还要宝贵。因为虽然只有三数人的支部，但是他在一个斗争发动的时候或在一个客观条件顺利的时侯，可以利用我们党在湖南群众中之历史上的政治影响，领导着某个地方的产业工人，立刻可以扩大我们的工作。

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任何的奢望，我们绝不空想立刻便可以在这一切产业工人中建立许多支部及工会。只要我们努力，甚至于用三五个月的期间，在某个产业工人中能建设一个小组，甚至于能结识几个工人，都是很好的成绩。李同志在常德的成绩的确是非常伟大的。湖南省委若能找着像李同志这样的积极分子，能真正的吃苦，深入群众，能在安源水口山或湘鄂路上建立一点工作，甚至于还不如李同志这样快的结果，这都是很好的。工作并不求急，但需要尽量找取这样有耐心能吃苦的同志，一点一滴的在群众里面去创造，譬一切省委所能找到的同志，与省委接头的同志，以至于省委在各处巡视所遇着的同志，只看见了能耐心吃苦的同志，只要他愿意深入产业工人中艰苦的去创造工作，则无论他现在负的什么样的重要责任，都可叫他到产业工人中去。我们相信假在全省能找着十来个这样的同志，能有十来处都像常德那样建立我们的工作，则湖南全省的工作便可称谓最伟大的成绩。今后省委的工作一定要在这一方面作最大的努力。

关于平浏苏维埃区域的工作

省委已经与平浏发生了关系，在以后的省委工作中，自然要将平浏工作看成一个重要部分。中央关于平浏的现象并没有很多的具体材料，所以并不能有十分具体的指示。但是关于几个原则上的问题，在省委给平浏的指导中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平浏苏维埃的重要不仅在他的本身，并且最主要的不在其本身，并不是平浏一区可以作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乃是在全国——尤其是湖南全省农民中，可以传播我们的政治影响。平浏的农民若能真正的拥护苏维埃，则不仅平浏苏维埃因此可以巩固发展，并且全省乃至全国的农民都可以实际的认识苏维埃的利益。假使平浏苏维埃对于农民有不好的影响，这不仅是平浏的损失，而是要影响平浏以外的农民都不会热烈的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一定要这样认识平浏苏维埃的重要，然后才能在平浏有决心的执行一切正确的路线。

所以，第一应当彻底的实行土地革命，实际上真正的消灭地主阶级。要使一切贫农都有耕地，要实质上消灭豪绅对于农民的统治。分配土地一定要彻底的实行，但这并不是说，那里的工人也应该分配土地，这一点特别值得向平浏党部指明。自然，那里没有产业工人，都是作坊工人、手工业工人或农村工人，他们的农民意识非常浓厚，有时他们出来要求分配土地。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一定要公开的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说服工人中之这种农民意识。固然有时候，在实际上对于农村工人甚至兼农民的手工业工人，结果仍然要分给他土地，但在宣传上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向工人解释，工人不要土地。苏维埃

应当公布劳动法，提高工人的经济地位、文化地位，不能使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领导了工人并领导了党。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二个问题是建设真正的苏维埃，真正的农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党不能包办苏维埃，不能命令苏维埃，不能在苏维埃中起党团的作用。绝不能使党直接向人民出布告，使党权超过政权，又不能使红军的命令超过苏维埃，成了军权高出一切，一定要使苏维埃政府在那个区域中事实上是最高的政权。党是经过党团而在苏维埃中发生政治领导，红军更应无条件的接受苏维埃的命令，红军的兵士是在苏维埃中与普通农民享有一样的权利，绝不能在苏维埃中发现了"有枪阶级"的特权。另一方面要使苏维埃区域中的农民真正有直接选举、监督并撤换苏维埃委员的权力，真正在事实上执行这些权力。要使农民在代表会议上真正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决定一切问题，选举或撤销苏维埃的委员。要使广大的农民群众都实地感觉着苏维埃是他自己的政权，要使他感觉着自己是苏维埃的主人。

第三个问题便是建设红军的问题。建设红军不仅是在这一区域中的问题，乃是整个中国革命中的问题。中国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便应当坚决的建立红军，只有红军才能坚决的肃清豪绅地主的武装，进而与一般工农共同的向军阀作战。所以现在平浏的红军，应当尽可能的使他扩大，要在工人农民中间宣传，使他们尽量的加入红军。失业的群众、从前的兵士，以至于现在的土匪、溃兵，只要能证明他不是敌人的侦探，只要能接受革命的政纲，都可以使他加入，但必须坚决的执行改编他原有组织，以同化到整个的红军队伍中。

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工作，有非常之大的意义。在红军中要无条件的保持着无产阶级之思想上的领导，要

使每一个兵士都明了共产党的政纲及他们所以作战的任务。要利用一切会议谈话，向士兵解释革命的理论及我们工作的任务，解释士兵与群众与苏维埃与全国革命的关系。遇着了一切政治事变或纪念日的时候，更应该特别扩大宣传工作。对一切不识字的士兵，应该将一些刊物传单向他宣读。不仅要武装士兵的技术，并且要武装士兵的思想。要使每一个士兵不仅是革命中的战斗员，并且是群众中的宣传员以至组织员。

在组织系统上，红军的总司令部应该无条件的执行苏维埃的命令，不要使总司令部代替了政府或超过了政府。在红军内要肃清军阀军队的一切恶习及一切封建思想。要尽量的废除薪饷制，使全军上下享受物质上的平等。

关于生活问题，应由士兵委员会负责。要使一切士兵知道在这红军中绝对没有阶级的存在。只要党的宣传能取得士兵群众之思想上的领导，只要提高一般士兵的政治认识，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一定能帮助红军的巩固与统一。也正因为如此，红军中的政治教育更特别重要。

红军不能分驻各地，不能固定的居于任何一处。因为这样可以加增农民的负担，可以使农民发生反感。红军应该以游击（分途游击或集中游击）为原则，在各地尽量的去消灭豪绅的武装，帮助农民的斗争，以至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与实行。这样，一方面是进行扩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解决给养问题。红军应特别注意农民对于红军给养的态度，决不能用强迫摊派的形式。一定要使农民自愿的拥护红军，使农民自动的将给养红军看成自己的责任。

苏维埃政府对于小商人的态度应特别注意，不要断绝了商品的流通而加紧了经济的恐慌。只要这些小商人不作敌人的侦探，都应当相当的保护他的利益，使他经常的供给苏维埃的

用品。

在苏维埃区域的党，特别应当注意自己之宣传工作，扩大自己之政治影响。不能在组织上代替了或包办了群众组织，要使党的指示仅只是经过党团而取得实现。在党内应当绝对的禁止以枪毙（除了与敌人勾结有证据的以外）为处罚同志的办法。对于同志（以及群众）的错误，应当尽量的应用教育方法来解决，或公开的在群众前面指出他的错误，要尽量的说服他，使他能改正自己的错误。自然当着教育不足时，便须采用组织上的制裁方法。

一切在苏维埃区域中的行动，都有在广大农民中之宣传上的意义。要尽量增加苏维埃区域之一般群众的快感，提高他们的革命情绪，使他们可以传播于其他地的群众中。所以，在苏维埃区域中的宣传工作非常重要，要尽量扩大对内对外的宣传。对于外来的农民，欢迎他参观，告诉他一切实际□□□□其是传播苏维埃影响之重要的方法。这些都是不能忽视的。

省委对于平浏工作不仅是需要这些材料及一些非常原则的指导，而需要详细了解那里的实际情形，代他们解决一切实际问题。

关于湘西的工作

湘西各地比较起来，省委已找取了相当的线索，已经有了一点小的基础，这里便要成为省委重要工作的一部分。省委应当继续着这种一点一滴的刻苦精神，使那里的组织能以继续发展。能以发动斗争的地方便应该发动斗争，绝不要在观念上预定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成见。因为只有在斗争中的组织，才是坚强的战斗的组织，才能成为革命发展的动力。

鄂西的红军现在已经到湘西各县游击，无疑义的将是湘西工作之一个很大的推动。省委不能放弃这一个机会，不能轻视游击队的力量，要准备着乘机发动群众的工作。要预先加紧在群众中的宣传，使群众的斗争情绪与武装的游击队结合起来。

鄂西红军有一个弱点，就是本身缺乏政治工作，尤其是没有在农民中之群众工作的人才，省委应当特别注意要帮助他们，使他们建立本身的政治工作，告诉他们以群众工作的方法并帮助其进行。省委若能找得适当的人到那里去一次，能将那里的详细情形带到省委转到中央，则中央当可以更具体的指示。目前省委应当尽力找取与他们的关系，交通问题解决之后，你们首先就可以将一切原则上的问题向他们解释，同时告诉他们关于一切敌人的消息及我们在湘西的力量，使他们可以作为作战的参考。

关于 C. Y. 的工作

C. Y. 在湖南更没有基础，这一点值得党的省委的注意。党省委在各地建设工作的时候，要注意 C. Y. 的线索，要准备着在工作发展中将要有党及 C. Y. 的划分。在平浏一带有 C. Y. 组织的地方，省委应当注意 C. Y. 的工作，在那里的 C. Y. 还没有与 C. Y. 中央发生关系的时候，省委更应该多负指导的责任。省委该应注意那里之党及 C. Y. 的关系，纠正那里之不正确的倾向。另一方面，省委应帮助 C. Y. 中央建立 C. Y. 中央及平浏 C. Y. 的关系。

关于“八一”工作

关于“八一”工作，中央已有三十九号通告发出，湖南省委要根据自己的力量进行这一工作。在平浏更应该公开的作最大的号召，作最广大的宣传，使红军有武装示威。在这些地方的意义，是对于平浏的农民及红军施以国际无产阶级的教育，使他们知道自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湘西各处，应按照自己的力量进行这一工作，或是召集群众会议，或是飞行集会，或只是散些传单，贴几个标语。在每一个地方，虽然我们只有很少的影响，甚至于只有一个同志，我们总多少要尽量去做，最低限度可以贴几个标语。现在在湖南任何一个城市或乡村中，若发现几个很少的我们党的标语，也都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他都可以促进一般群众斗争的情绪。在平常的时候就应该这样注意，在“八一”的时候更应该这样。

关于省委的第四号通告

省委曾发了一个政治通告，这个通告上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以为冯玉祥代表“小资产阶级”，“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等一样，同是中国反革命的军阀，为什么还“动摇”于“革命”及“反革命”之间？难道湖南省委还不敢肯定冯玉祥是绝对的反革命吗？难道省委对冯玉祥还有些什么幻想吗？省委至少是受了敌人宣传造谣上的影响，以为冯玉祥或者与苏联及第三国际真个有什么勾结，不然，冯玉祥明明是无条件的反革命，哪里有什么“动摇”呢？冯玉祥是封建军阀，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军阀，他与其他的军阀

在反革命的意义上说没有任何的区别。

关于这一点省委应该发一个通告纠正。

中　央

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宁迪卿。

PDG

中共中央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一日）

国际东方部急转中国代表团：

一、现在莫学习的同志已经有参加生产的实习，这是很适当的办法。最好要使所有的人都去参加生产。但同时仅只参加生产是不足的，因为苏联的生产条件与中国大不相同。现在由莫归国的同志，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吃苦，这样仍不能深入群众中去。所以这些同志在莫学习的时候，除了需要学得生产技术以外，还需要生活上的锻炼、生活上的军事化，即是更规律化、更科学化而更加以日常的军事训练与武装学习。

二、在学习中的确需要造成一些专门人才，若只习了一些普通的知识，对于国内工作只有很少的帮助。所谓专门的知识，并不在于一般学术上的科目，而在于职工、农民、组织、宣传、军事以至专门的技术人才（写油印记录的人最缺）、事务人才。现在各项专门人才的干部都非常缺乏，尤其缺乏职工的人才、女工运动的人才。造成这些专门人才的方法，一方面固然要注意关于某种工作之一般的理论，但一定要多注意实际工作的讨论、工作方法的研究。所以那边学习的材料，一定要与国内实际工作发生联系。我们寄交国际的一切材料，其可以作为公开研究的，应当尽可能的与学生共同研究。

三、在每一次派遣学生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将在那里每个人学习的成绩寄来，一定要有关于每个归国同志之各方面的估计，尤其是对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我们一定要得了这样的报告，然后才易于分配他们工作。

四、派赴那里的同志，工人成分很少，这是因为许多客观上及主观上的原因，现在全国并没有很多健全的产业支部，工人同志引进于指导机关的还非常之少，有的新进的工人干部当然不能离开工作。中国工人文化程度低，在党看来，当然仍是可以派他们学习，但工人同志自己却因文化低的缘故，对赶莫学习多不发生热烈的兴趣，觉得“我已经不能读书了”。并且中国工人多病的很多，眼病、肺病、花柳病更特别普遍，使选择的时候非常困难。过去有好多很好的工人同志已经送到赤塔，又被检查身体的人扣回来了。在国内做过几年实际工作的人，加紧奋斗过的人，没有一个有健全的身体，因此也几乎都没有资格到莫斯科去，这一点要你们负责。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工人同志多半都有家庭的负担，要赡养全家父母、妻子几口人的生活，因此他没有方法可以离开中国。根据这些原因，所以派去的工人同志非常少。自然，我们并不因此而不派了。我们仍是要尽量的选派工人同志，不过无论如何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容易。

五、你们所提出的李季、代英[1]等人，以为这些人派到那里去学习。现在去的很少，他们或是不愿去，或是不能离开工作。

六、派去中的一部分同志，是在国内作过实际工作而政治认识不清的分子。在莫的环境，自然易于加强他们的政治的认识，所以适宜于赴莫学习。这些同志中有些不正确的倾向，务请你们特别注意，并转告学校加紧对他们的政治教育。

七、照我们看来，列宁学院的中国学生成分离列宁学院之所谓造成国际干部的要求，实在相差太远。中国党不能将一些没做实际工作或对党认识不清的分子送到列宁学院，假使名额不足，也不必乱找人凑数，更不必单纯的依据个人的请求便允许入列宁学院。这一点望你们注意。

八、在那里学生中间之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政治的以至个人意气的，都可以很快的带到中国来。譬如以前在莫斯科之参加反对派活动的学生，现在回国之后仍然进行着反对派的活动，并且有组织的吸收一切党内的动摇分子，而将形成中国党内的反对派。其他不正确的倾向，一样反映到中国党内来。中国代表团一定要很郑重的注意中国学生中的状况，要切实的帮助那里的学校解决中国学生中的问题，这对于整个中国党的组织上有很重要的关系。并且关于批评反对派的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问题以及揭露反对派罪状的一切材料，要尽量的弄来中国，以加强中共中央与反对派斗争的力量。

九、最近将有五十同志由海陆丰斗争而出来的下级干部，将要来莫学习，这些人需要先学习一个时期的政治，然后学习军事，这是与此间国际代表商定的事。

十、去年年底的人都回来了，与绍禹等回来的十五人，到现在只到了二人（绍禹与国庶[2]）。每次回来的人，你们一定要预先电报通知，譬如炮兵学习的一批，便没有通知而回来了，使我们没有一点准备。以后无论如何，送人之先一定要电报通知。

十一、送回来的学生，学校一定要发足他回到本省的经费，过去中大没有照这样办理，学校只发给他们到上海的经费，他们到上海不能继续走动，便不得不找中央，中央过去曾垫了一笔很大的款子，到现在这笔款子还没有着落（我们已从

送学生去莫的经费中挪用了七八千元），中央实没有力量担负。若学校不负责付足学生回到本省的经费，中国党将经过代表团向学生公开的宣布，使学生不收足学费则不能离莫，并声明中国党永不负回到本省之路费的责任。

十二、今年暑后归国的学生，应当要有决心进工厂，并要有决心到各省中去。过去由莫归国的学生不独没有决心进工厂，并都只愿停留在上海。这一点要代表团及学校特别向学生解释。

十三、国际与中国党的交通太不好了，这要东方部及中国代表团切实负责。不独一切定期的刊物我们不能收到，并且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的材料到现在我们才由西欧国际通信上得着正式发表的一部分（不是全体）。Mockbnh 离莫时所收集的一些材料，到现在一些也没有来到。我们将三个稳妥的通信处已经寄去了两次，但总没有回音。这一次国际反右倾的材料、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材料，我们一点没有。中国代表团要切实的负责，收集一切中国党所需要的材料，尤其是“共产国际”、“职工国际”、“布尔塞维克”、“国际生活”等定期刊物，要经常的给中国党寄回，这不仅关于中国党的整个宣传工作，并且也关于整个中国党的国际政治路线。过去这些材料所以没有寄来的原因，大概以为交通处简单的将这看成一个技术工作，没有认识国际材料刊物对于中国党的重要。东方部及中国代表团却要切实负责，这封信后附上我们接收书报的公开地址（书报材料都要经过德法寄来）。

十四、海参崴一带华侨中间（工人以及小商人）的工作，不独有其一般的意义，并且他们因为与中国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关系，对于传播苏联的影响上却有很大的作用。中国代表团应当注意这一件工作，应当与联共中央共同讨论彼处的工作计

划，并经过联共党部督促在彼处作工的中国同志。

十五、中东路的工作，对于整个满洲的工作以及在全国范围内之传播苏联政治影响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关系，直到现在这一工作总还没有做好。最近搜查领事馆事件发生之后，愈见得中东路工作的重要。现在一方面中国代表团应请联共特别注意中东路的工作，另一方面应请共产国际特别注意关于哈尔滨事件的宣传，最好在“八一”纪念中作为国际上之一个主要的宣传材料。国际上关于这件事的宣传，苏联关于此事之应付的策略，我们中国党没有得着一个字的材料，望你们注意。

十六、军事工作人员现在非常之缺乏，因为游击队及红军发展的缘故，高级军事人员也非常需要。代表团须要选派很多能在乡村中吃苦耐劳而担任军事工作的，使他们赶快回来。如刘伯承、刘云等同志一定要他们很快的动身。

十七、同时，中国党还急迫的需要理论人才。过去中大所允许的得力同志只回来二三人，如李岩、陈绍禹等。我们现仍坚决的提出要求派沈泽民等人回来，至少要有像沈泽民、潘文育的理论人才四五个。

十八、还有一更严重的干部恐慌，便是职工运动人才的缺乏。自然这种人才根本上须从实际工作、实际斗争中不断的训练出来，但在莫有职工运动经验的同志，党亦急切需要他们回来，因为这些过去的经验是帮助加强党的工运的一个力量。现在我们要代表团速调邓中夏、蒋之青等速行回国，如这样的人至少要十人以上。

十九、最后，中共中央依据党的六次大会的决议，特指定在莫的同志负责起草中共党纲。这个党纲起草委员会中共中央指定秋白、国焘、茂怀、定一、若飞、和森[3]（中夏要调回国，故不参加）六同志，以秋白为书记。时间限三月完成，六

月内运送中国，委员会的人得由代表团与东方部决定就地增加，俄同志的加入亦然。

此外，我们要一份国际七次（一九二六冬）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因为此间找不到原稿了。

接收书报的地址：[4]

中　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恽代英。
〔2〕即张国庶。
〔3〕即瞿秋白、张国焘、余茂怀、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
〔4〕原文如此。

PDG

中央通告第四十二号

——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中国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做进攻苏联的先锋队，中东路事件便是对苏联开始武装攻击的第一炮。现在形势益加紧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到了长春，国民党的军队已经集中苏联边境，尤其是白俄的将军们，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雇用之下异常活动，已经在满洲开始组织白卫军，这些事实充分证明战争危机的紧迫。现在美帝国主义发起英美日法四国调停会议，不过是借此解决帝国主义自己内部的冲突，求得进一步的协调，好更有组织的实行对俄的总攻击，同时预先协议赃物分配的方法。这个会议的完成，不只是苏联要受到武装的袭击，不只是中东路将在帝国主义共管之下，而且整个中国将要受着宰割瓜分的惨祸。现在四国银行团的活跃，极力宣传中东路的国际共管，便是明显的例证。固然现在帝国主义还有许多困难：第一就是全世界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发动了对苏联的大战，必不可避免的将使全世界革命势力集中在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口号之下一致行动起来，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是帝国主义最大的恐惧。第二，帝国主义相互争夺市场的异常尖锐，根本无可调和，就是战胜了苏联之后，怎样来分割这一块肥厚

的赃物也还未完全协商一致，再加以苏联已经有了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得到了全国以至全世界劳苦群众的拥护，已经不是帝国主义所易战胜的。因为这些条件或许威吓着帝国主义不敢轻于发难，造成戕杀自己的弥天大祸而暂时和缓。但是问题一定要认识，惟其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日益尖锐，必然要更积极企图先消灭这一共同的敌人，然后才放心大胆的互相战争。惟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益加巩固，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帝国主义必然要更急迫的对苏联进攻，以扑灭这一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所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决对不可避免，而且是随时都可以爆发的了。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不管中东路的解决如何，始终要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做进攻苏联的先锋。所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

二、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是帝国主义生死的敌人。帝国主义穿着一双无情的铁鞋，一只踏住西方的工人阶级，一只踩着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所以西方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应该站在与帝国主义肉搏的共同战线，苏联便是这一战线的领导者。所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同时就是镇压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战争。现在叛变革命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在受着帝国主义的指使进攻苏联的时候，却无耻的打起“民族利益”的旗子来欺骗广大劳苦群众。我们应该坚决的起来揭破这些无耻的欺骗，直接的告诉广大劳苦群众，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拥护者，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工具才是中国民族解放的敌人，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同时就是为中国解放的斗争。中国广大劳苦群众如果要在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在豪绅资产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必须对帝国主义与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作坚决革命的斗争。反对帝

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准备着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战争以答复进攻苏联的战争，准备着武装起来保护苏联，是我们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

三、如果帝国主义、国民党实行对苏联的武装攻击的时候，我们便应毫不犹疑的号召广大工农群众的直接革命行动，号召兵士叛变与红军联合起来，实行国内战争，使帝国主义国民党失败，使苏联红军得到完全胜利，一直到推翻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共和国。因为这时候策略的决定，应以全世界革命的总的路线为原则，在全世界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短兵相接、残酷肉搏的时候，便应竭尽所有的力量以与反革命势力搏战，以达到革命的最后胜利。所以，那时候就是中国革命还没有走到革命的高潮，我们亦应在共产国际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实行号召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行动，以破坏国民党的统治，以减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以达到革命的胜利。假如这时候有人拘束于一国革命的形势，而怀疑这一直接行动，便无异于帮助帝国主义的胜利。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的更有利的条件，而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的更快的到来。这一策略的路线应该教育全党同志向工农劳苦群众作广大的宣传，并且从现在起就应该积极的准备起来。

四、目前动员群众的策略，一方面要把中东路事件真实的意义作广大的宣传煽动，同时仍然是要特别注意发动、领导并扩大群众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在斗争中来加紧这些宣传，每一件工厂中极小的事，每件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压迫群众的事，我们都必须利用来发动群众的争斗。因为只有群众日

常斗争发展极普遍然后，群众革命斗争的勇气才更易提高，我们的宣传鼓动才更易于深入。这是应该特别注意的！

五、在各省的城市中、农村中、苏维埃区域，在“八一”的时候，固然要尽可能的号召广大群众的示威运动。“八一”过去以后，仍然要继续用各种的方法，飞行集会、厂中会议、示威罢工、游行宣传等，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同时向统治阶级示威。各级党部必须深切了解这一准备工作，最主要的是发动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从国民党的虚伪的民族利益欺骗之下解放出来，站到拥护苏联、反对进攻苏联的战线上来。如果不能取得广大群众，发动广大的群众，我们将不能执行一点革命的任务。所以这一工作决不是以“八一”为终止，而是要继续不断的进行。

六、我们准备工作首先要注意着铁路、海员、兵工厂三种重要的产业，因为这是与军事有密切关系的产业。我们必须特别加紧工作，加紧在这些工人中的宣传鼓动，加紧在这些工厂中的支部工作，加紧群众的组织。如果在这些产业中还没有基础，必须用尽一切的方法打入进去。各省省委为加紧这一工作，除掉精密计划切实指导外，还应特别派人去巡视这些支部。

七、中心城市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我们要特别加紧一切工作。固然首先要注意市政工人以及其他工厂工人，但是在学生中以及其他贫苦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中也不应该放松，特别是宣传鼓动的工作。

八、农民运动首先要注意着中心城市的市郊以及交通的附近。在策略上，一方面要注意加紧日常的反豪绅地主的斗争的领导与深入土地革命的宣传，同时注意领导反对军阀苛捐杂税、摊派军饷与拉夫拉车等，因为这些斗争可以号召广大群众

直接反军阀的行动。加紧游击战争的准备成为目前很严重的任务，各级党部必须特别注意这一工作的指导与准备。

九、兵士运动的工作，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党应动员一切同志以至赤色工会会员与农民都去进行对兵士的宣传鼓动的工作。要用尽所有的方法去打入兵士群众中去，建立组织的基础。提出日常的口号去发动兵士的斗争，同时极力扩大反军阀战争、反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的宣传，尤其是要注意揭破统治阶级虚伪的民族观念的欺骗。

十、反对进攻苏联战争的工作，青年团负有极大的任务，因为青年群众更易于接受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在工人、农民中，青年表现着最勇敢的一部分，特别是兵士中青年占主要的成分，所以青年团更应积极参加兵士运动的工作。中国学生群众仍然有他的革命的作用，决不应该忽视这一工作。

十一、在苏维埃区域中，第一个任务是扩大红军以及各种群众的武装组织赤卫队、游击队等。要在群众中作普遍的加入红军去反对进攻苏联、武装起来保护苏联的宣传与示威。并且要积极准备着在战争发动的时候，能马上动员广大群众向军阀进攻，并扩大苏维埃区域等。

十二、红军的任务，第一是要使每一个战斗员了解拥护苏联的意义，第二是积极扩大武装与组织，第三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便应与广大工农群众的行动联系起来，向国民党军阀实行有力的攻击。只要有可能的时候便应该变更游击的方式，与工农群众的暴动汇合起来夺取最重要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继续扩大与发展。

十三、应特别注意党员军事化与群众的武装训练与组织。党应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加紧对党员的教育，使每一个党员都能使用武装与巷战战术等。对于赤色群众的组织，必须用纠察

队、维持队等的名义进行军事性的组织，并施行秘密的武装训练。

各级党部接到这一通告以后，必须加以详细的讨论，决定具体的、实际的、可能的工作计划与这一计划的执行方法，马上进行工作，同时要对中央作详细的报告。

中　央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致莫斯科中国学生同志书

（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

亲爱的同志们！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们！

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日渐紧迫了！帝国主义分割殖民地的大战危机，各国内部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阴谋，这些都逐渐的日趋显明，表现着世界革命的形势逐渐紧张，使着全世界革命战士的任务都更加严重。

中国的革命斗争同样的日趋紧迫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很明显的爆发着许多不可调和的冲突。英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扶持军阀买办的政策，正在企图巩固并扩大其在中国的特权。日本在全国——尤其在满洲与山东——之积极的进攻政策，逐步的更加紧张。美国利用中国的买办与资产阶级，正在扩大其在中国之财政资本的侵略。一方面表示整个帝国主义都一律的对中国采取进攻的方式，对于投降他的一切反动势力都没有任何的让步；另一方面在各帝国主义的共同进攻中，表示许多非常激烈的矛盾，一切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中国之一部分的反动势力来更巩固与扩大他的侵略，同时又企图争取在南京政府中的领导。

正因为这种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所以造成了中国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内部的破裂。从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以后，反动统治内

部便继续着严厉的明争暗斗。豪绅买办与资产阶级争取反革命领导权的矛盾，中国军阀抢夺地盘的斗争，统治阶级虽然尽量企图以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终于造成了全国军阀战争的局面。过去一年中，四川的战争、贵州的战争、蒋[1]桂的战争、两广的战争、蒋冯[2]的战争以及现在仍然酝酿着的许多新的战争，表现着统治阶级的内部不仅只是些一般利益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仅只能在依靠武装战争以取得“解决”。中国豪绅资产阶级过去曾宣传了一切欺骗民众的政纲，宣布全国的“和平”、“统一”，宣布“革命成功”、“训政开始”。现在全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已经无条件的证明其一切欺骗的破产。

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为普及全国的军阀战争，使全国的经济生活更不能有任何的进步，普及全国的农业危机，饥民达六千万。交通的破坏，市场的不稳定，财政的紊乱，一方面更加紧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统治，另一方面使全国劳苦群众在目下所忍受的直接痛苦更加深切。资本的进攻，工资的减少，劳动条件的恶劣，生活程度的昂贵，使一般工人群众的物质条件绝对的日趋困苦。地主的进攻，二五减租不仅事实上没有实行，并且在形式上也完全取消，农民生活无条件的更加恶劣。军事的压迫、苛捐杂税的剥夺，使一般群众都不能安于自己的地位。在这种状况之下，一般群众不得不起来为自己的生活条件而斗争，不得不争取改善自己的地位。反动统治之政治与经济的动摇，直使残酷的白色恐怖也无法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

群众革命斗争复兴的形势日益显明的继续发展。北方工人的经济斗争继续不断的爆发，最近两三个月以来，几乎没有一业不发生斗争。上海工人的经济斗争没有一天停止，在今天“五一”及“五卅”纪念中，一部分群众公开的在共产党号召

之下举行罢工游行。在上海这一个工业中心中，即改良派别的势力在工人中都无条件的日趋衰落，我们党的政治影响逐渐加强。农村中看见了红军游击队的进展，反动军队之历次的“围剿”都归于失败，红军的势力、红军在农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都逐渐增高。几个苏维埃乡村的土地革命更给了广大农民以实际的影响，使农民群众实地看见了苏维埃政权的例证。另一方面，许多农民自发的武装斗争表现着农村阶级斗争的紧张，几乎在每日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出。各地反帝国主义运动、反苛捐杂税的运动、争取自由的运动，都是显明的复兴的形势。

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展，这就是现在全国的政治形势。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更加紧张。现在我们还不能夸大这种形势，还不能说已经到了革命高潮的前夜，这正因为党的领导还非常薄弱，尤其组织上在城市中的领导，还远不能满足革命发展的需要。但是自六次大会以后，中国党在全国政治上及组织上，在全国极端白色恐怖的压迫之下，仍然得着很大的发展。在全国的群众斗争中，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是逐渐扩大的，一切敌人污辱共产党的宣传与造谣已经显明的不能阻止共产党的发展。在组织上党已经克服了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首先是战胜了一切革命失败的反映，战胜了盲动的残余，战胜了一切悲观的消极的右倾思想与党内无原则争斗的倾向。中国党六次大会后之一个伟大的成绩，便是将全党的同志都从工作中恢复了他的斗争情绪，在斗争中建立了全党之一致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党的组织已经不是以前之分崩离析的状态，已经在白色恐怖的极端压迫之中，逐渐的建立了整个的党的组织。这些工作上的进步，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全党同志在斗争中的努力，一方面充分的证明了六次大会决议案的正确。

自然，中国党之现在这样的进步，还远不能满足革命发展的需要。许多地方的群众斗争仍然得不到党的领导。国民党及改组派在一部分群众中的影响仍然成为革命发展之一个主要的障碍。在有些重要省区中，党在群众中虽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组织上仍然过于削弱。另一方面，党内仍有不正确倾向的残余，特别是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汇合，成为全党工作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因此，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前面摆着许多很紧急的任务。一方面，要加强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推动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党的组织，继续克服党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使着党能执行自己在革命中的使命。在全体党员尤其是一般干部前面，正摆着非常浩大非常紧张的工作。

也就在这一种工作的需要上，建筑了在莫斯科学习同志的任务。中国党有一千余党员在莫斯科学习，正是为的培养国内工作的干部，供给国内革命发展的需要。每一个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都应当明了自己之学习的责任，既不等于在一切欧美资产阶级国家之“留学生”，又不因为“国内没有出路，到莫斯科解决生活问题”。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都是为的学习革命的艺术，研究在革命斗争中的理论与实际。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在这里特别适合于学习一切革命艺术的条件，苏联无产阶级牺牲其一部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精力，来供给一千余中国学生同志的学习，都是为的培养世界革命的战士。同时，每一个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都是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或是少年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都是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战士。最大多数的同志都曾参加了国内的实际斗争的生活，都曾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

决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决不会忘记国内革命发展的需要，决不会忘记国内工农劳苦群众对于你们的愿望。中央向你们特别指出这一点，正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的紧张、需要干部人才的迫切，使你们的责任更加重大。

你们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有一切的可能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研究一切革命实际斗争中的策略，在现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是非常宝贵的武装。每一个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每一个准备归国参加实际斗争的同志，他都应该非常努力的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要使自己能以正确的应用革命斗争中策略，这就是在莫斯科学习同志之总的任务。

就过去的历史看来，在莫斯科学习同志对于这一总的任务是不能充分执行的。就已经归国的同志看，大部分的同志都不能正确的执行他所担负的任务，甚至于一部分的同志反而归国进行反对派的活动。就以莫斯科各学校的生活而论，你们还不能正确的应用你们所难得的宝贵环境，还不能将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仍然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国民党的残余、个人主义、意气纠纷以及一切革命失败的反映，这些东西仍然支配了你们日常的生活，侵夺了你们学习的时间。你们若不彻底的肃清这种现象，彻底的消灭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彻底的在日常生活中锻炼无产阶级的精神——若不彻底的这样去做，则你们一定要空费宝贵的时间，空费苏联无产阶级的精力，也同时就是放弃了共产党员的责任。中央很诚恳的号召全体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应当坚决的努力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及习惯，应使全体同志的生活建筑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上来共同学习。必要有这一个决心，然后一切学习计划、一切工作才能以真正的进行。没有这一点，则一切计划都是空谈。中央

特别着重这一点，所以在还没有具体的向你们指出学习任务的时候，便首先在这里唤醒你们的注意。

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将全体同志的生活建筑在学习上，然后才能实地里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才算是真正的在执行你们所担负的任务。

理论是要在斗争中应用的，一切策略都是跟着实际环境而转变的。所以一切理论的学习，都应与实际斗争的环境发生密切的联系。莫斯科因为地理上与中国距离很远，所以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很容易忘记国内的实际生活。过去许多由莫斯科归国的同志，大部分说来都不能认清国内实际工作的环境，不知道实际策略的应用。譬如过去莫斯科一部分的同志，曾参加了反对派的活动，这些到归国以后仍然在进行反对派的工作，他们所持的理论完全离开了国内实际斗争的环境。现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如若不很切实注意中国环境的研究、中国每日的事变、中国劳动群众的英勇斗争、在中国之策略应用的方法——则虽然学得一些原则上的理论，其结果都会走入歧途。

我们提议，你们必定要规定具体的方法，使全体同志都能很切实的注意中国问题，注意中国实际斗争的环境。

因此，在学习上你们必须要更专门化，你们不仅是需要学习一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要更实际的研究革命中的具体工作。你们需要搜集俄国革命以及整个共产国际的经验，特别参照中国的实际环境，具体的研究革命工作中之某一种专门的问题，甚至每一人只能专门努力于某一种的问题。譬如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妇女工作、军事工作、秘密工作等等，以至于关于交通、发行等等更具体的问题，都需要你们在那里分类的专门研究。国内革命工作的发展需要这样的专门人才，你们归后一定会要担任着党内之某一

种的专门工作。

你们已经开始了进工厂去学习技能，这一点值得全体同志尽最大的努力。中国党现在之夺取群众的工作，不是站在群众外面可以取得成效的，一定需要参加生产，以深入群众的内部。全国各地的白色恐怖使一切没有职业的同志都非常难以立足，一定要打入工厂去，才能取得群众的掩护。中央号召你们全体同志都尽量的进工厂去，希望你们战胜一切障碍，拿出无产阶级的忍苦耐劳的精神，坚决的勇敢的去学习这一工作，战胜生活上之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假借各种不同的名义以推诿进工厂工作，不经过三天便半途而废放弃工作的同志，这些都绝不能担任国内实际斗争中的工作，决不能执行现在中国共产党员的重大责任。

不但如此，在实际生活中，你们需更要锻炼自己之坚忍刻苦的精神，注意日常生活之军事化、纪律化，战胜生活上之一切小资产阶级的习气。过去许多由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因为习于莫斯科之优裕的环境，所以几乎完全缺乏坚忍刻苦的精神。物质条件上不能吃苦，工作地域上不愿离开上海，不愿到各省各地去，工作过程中性急求速，不能忍耐等等，这些完全不能应付国内的实际工作，尤其不能适合于国内之秘密工作的环境。所以当同志们还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需要注意于生活上的锻炼，要准备着在国内实际工作中过很艰难困苦的生活，要有决心的到各省去，要准备着自己可以适合于全国各地的各种工作的条件。

以上几点，便是在莫斯科学习同志所必要注意的中心，要在这些中心问题上建筑你们的日常工作。学习正确的理论，研究中国实际的环境，求得专门的工作能力，取得一种生产技术，锻炼自己的生活，这些应当是每个同志朝夕所注意的问

题。一切个人的纠纷，有意气的成见，派别小组织的倾向，反对派国民党的残余，应当绝对的无条件的肃清。攻击个人及不关工作的言论，无根据不负责任的清谈，离开政治问题、工作问题的牢骚，这些都是革命失败的反映，取消派的倾向，破坏党阻碍工作的行动，全党以及全体在莫斯科的同志，应当坚决的与这种现象奋斗。果而全体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放弃了在那里学习之主要的任务，放弃了政治问题、工作问题的讨论，果而只去注意一些个人问题的成见，只去谈论一些无根据的离开工作的谣言，这就完全没有认识自己对于整个党及整个革命所应负的责任，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在现在革命斗争紧张的时候，党内绝不允许仍然继续着革命失败的反映，绝不允许一切无原则的斗争和小组织派别的存在。

青年团的同志们除了一样的要坚决的执行上面指出的任务外，还必须特别注意研究青年运动的理论策略与工作方法。过去回国的同志没有注意这一点，的确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最近派赴莫斯科学习的同志，有少数在国内工作中表现了不正确的观点，没有明了现在工作路线。正因为这部分同志在国内工作历史比较长久的缘故，所以党决定派到莫斯科取得一个学习的机会，以使他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一部分同志尤其需要虚心的学习一切正确的理论。若不能虚心，反而保留着自己之错误的成见，甚至于继续进行一切有意的及无意的反对指导机关的煽动、谣言，则这些同志便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不去利用学习的可能，自愿的进行破坏党的工作。对于这种不愿受教育的同志，自甘继续扩大自己之错误的同志，在布尔什维克党之铁的纪律之下是不能允许的。

在莫斯科学习的有许多女同志，对于整个党及中国革命都负有特殊的责任。照过去归国女同志的经验看来，这一点使我

们不得不特别的指出，就是女同志自己还没有重视自己的责任。过去许多归国的女同志，在学习上没有取得一般理论之比较深刻的认识，在生活上充分的保守着一般小资产阶级的习气，对于全国广大的劳动妇女运动很少表示积极的帮助。指导工作没有能力担负，群众工作不能吃苦耐劳，技术工作不愿意去做，这本是一般由莫斯科归国同志的共同表现，而在归国的女同志中尤其明显。在中国无产阶级中有广大的妇女，农村妇女同样有很多积极的革命战士，而我们党的妇女运动的人才非常缺乏。在莫斯科学习女同志一定要认识自己之特殊的任务，很坚决的切实的准备自己归国的工作，中国的劳动妇女，都在那里希望着你们。

因为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使中央对于全体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更抱着很深切的希望。中央以及在中国战线上奋斗的同志，希望你们切实的学习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术，肃清一切不正确小资产阶级的意识，锻炼自己成为英勇的有能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中央希望全体同志站在中央路线之上战胜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中央相信全体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一定能实地的接受中央这一种号召，中央相信莫斯科这一世界革命的火炉一定可以为中国革命锻炼出许多坚强的战士。中国革命愈是发展，你们的任务愈是迫切，中央以及全党的同志都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来欢迎由莫斯科归国的武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勇战士！

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2〕 指冯玉祥。

PDG

中共中央答复陈独秀的信*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

撒翁同志：

读了你二十八日关于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以后，觉得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

一、中东路问题很明显的是反映着现在世界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全世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的斗争，帝国主义有计划的进攻苏联的表现。如果认为这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或者是“国际纠纷问题”，这就离开了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

中东路问题既然是由于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所以这一事变发生的前途，将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爆发；固然帝国主义间因争夺中东路引起了相互的矛盾，障碍着他们马上对苏联的武装攻击，但是他们在对付苏联的一致的目标之下，仍然要企图以共管中东路以及其他的方法来暂时调协这一矛盾。所以中东路问题最危险的前途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如果解释中东路事件而把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的两个前途平列起来，不只是迷乱了群众对于

* 本文原载一九二九年八月七日出版的《红旗》第三十七期。

主要危险的认识，而且这一分析的根本上就是离开了阶级观点得出来的结论。

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虽然都是反革命的性质，但是他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反革命势力内部的战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我们须公开的明白的把这一分别告诉广大群众，然后群众才能知道对付这样两种不同的战争的不同的策略。如果只是说“不管哪一种，中国人都要受着直接的蹂躏”，那么，群众将要走向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影响之下，盲目的反对战争，就会说“国民党和苏联都要不得，造出战争来蹂躏我们，双方都要打倒”。国民党马上来一个欺骗宣传，造一个假电报说“苏俄先开炮，战争的灾祸应该是苏俄负责”，马上可以把群众转移到仇视苏联。所以这样的分析就可以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础。结果便是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

二、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是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我们目前的任务与广大群众的要求，都是为着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民族解放与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不是对立的，矛盾的，而是不可分离的。事实上一方面是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广大群众很容易认识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敌人。而且可以进一步的认识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投降到帝国主义的方面，决不是为了中国民族的解放，而只是为着自己剥削劳苦群众的利益，牺牲民族的利益。国民党虽然极力宣传他的虚伪的民族主义，拿出“拥护中国”与我们“拥护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以企图欺骗广大的群众，但是，只要我们能坚决的指出

这个口号的真实的意义和利益，广大的群众很快的可以答复他：“拥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

你以为这种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的口号，广大群众不只是听到了共产党的宣传，而且在过去革命时期（当然有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者除外）都在自己实际斗争的经验中了解了这一事实。中国大革命决不是空过了的，的确训练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认识，只要我们的宣传能够深入，是不难揭破国民党的欺骗的。现在广大群众还没有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口号之下积极行动起来的原因，固然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是有相当的影响，但是主要的还是白色恐怖的镇压与我们的宣传还没有十分深入。

就是中国群众真正如你所想象的这样落后，我们亦不应掩讳正确的观点，降低我们的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尤其不应该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因为这样不只是不能取得群众领导群众，而且要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宣传的扩大。所以我们应该勇敢的公开的揭出真理，耐心的向群众解释，广大的群众必然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证明，而一天一天的团结到我们口号的周围。结果避免“拥护苏联”的宣传，首先我们自己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更无法使广大群众来了解这一真理！所以中央在宣言上这样的指出是毫无疑义的正确的。

你所提议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意义就是说“你们收回中东路的政策定要

引起世界大战，要使中国受到更大的损害”。在朝党蒋介石会马上答复说：“不会的，我们有世界列强的援助，苏联决不敢开战，列强因为苏联赤色帝国主义的敌视，他们也不敢自己打起来，我们便可以操纵其间，取得中东路的实际的利益”。这样便使广大群众对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实际利益的观点完全模糊了。就是单纯的提出“反对卖国”的口号也还是使群众模糊，国民党还可以用诡辩狡诈的方法来欺骗群众，一定要明显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利益，才能使国民党无法狡赖，使广大群众的认识不致模糊。

三、中央四十二号通告中指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的爆发……”，这是“必然”的，而不是“也许”。我们必须把这一前途明显的告诉群众，才更能使群众了解苏联的势力是建筑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基础上，在反苏联战争的时候，一定要坚决的起来与反革命势力决斗，才更能坚定群众以国内战争来答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决心。所以中央这一次的指出，也是毫无疑问的正确。

四、总观来信的内容，似乎只是策略的讨论，实际上是有极大的原则上不同，因为原则的错误所以发生策略上的不同。

中央热诚的希望这一解答的信到达以后，很快的得到你取消这些观点的申明。

中央始终是希望同志公开的发表对于政治对于党的意见，并且始终是极诚意的来讨论同志们的意见，从没有什么误会与揣测，尤其是每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同志都不应恐怕他人的误会与揣测，而隐藏自己的意见。中央以布尔塞维克的热诚，准备

接受你以后对于重要问题的意见。

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　央

八月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

鄂东北特委：

你们六月十五号写来的信，我们于八月初才收到。七月底我们已派了巡视员，并带了一封很详细的信，在这封信上对于你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具体的指示。现在我们在你们这封信中间，仅只感觉着有一个问题必须补充的说明，这就是关于你们所报告的苏维埃区域的失败以及这些农村区域之失败后的工作。

苏维埃区域的失败，自然是鄂东北一个很大的损失。不过我们绝不要过于夸大了这种损失，决不要以为没有苏维埃区域便没有了我们的主要工作对象。我们在上一次信上很坚决的指出，你们的工作还应当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重要城市，应当由单纯的军事行动转变到发动群众斗争。你们无论如何都必要坚决的建立城市工作。

苏维埃区域是我们影响最大的地方，在失败以后，我们决不能弃之不顾。我们要将过去在苏维埃时代的状况在一般农民中作广大的宣传，与现在军阀时代相比较，使农民实际知道苏维埃与国民党的不同。

来信说有许多失败后的民众是愿意随着我们红军奔走的，不过我们红军的实力不大，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种现象证

明我们党确是在群众中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我们要利用这种政治影响教育群众，更加提高他的阶级认识与斗争勇气。但我们不能使这些很多的徒手群众与红军混着一齐，因为这样在行动上给养上都不方便。我们仍然主张这一些群众尽量不离开生产。若在其本区中不能停留，则应当到外乡去找取地位，能到城市中最好。我们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或者可以吸收其一部分最积极勇敢的分子来加入红军或游击队，但最大多数的群众必须要走到生产中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我们鼓励这些群众尽量在各处找取职业的时候，不是要用消极的分散的观念，而是要用积极的鼓动，使这些群众抱着斗争的观念尽量在其周围发动更多的群众。

自然，同时也有另一方面的群众，他看见反动高涨来到的时候是非常畏缩、恐惧甚至于走到反动势力的统治之下而向我们进攻。对于这一类的人，若是些富户，若是很久以前我们便知道他是动摇的，则在此时自然成为我们的敌人。但对于中农、贫农，则我们的态度应该非常之慎重。贫农、中农的反动，是他们受了统治阶级的欺骗，绝不是他们本身的罪恶。我们要说服他们，利用他们目前所受于反动势力的骚扰，捐税的增加，豪绅地主的报复、烧杀等，利用这些事实向他们解释，使他们能回转头来而重新发生革命的要求。

在失败以后的区域，小的日常斗争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并且这种小斗争要非常之谨慎的细心的去发动。只有经过这些小的斗争然后才能逐渐的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才使群众认识目下政权与过去的不同。一切任何微细的斗争，在失败区域都有特别不同的政治意义。

在失败区域中我们时常是难得接近群众的。这一点需要我们很有耐心的去找取机会。能在当地找职业，做雇工、佃农、

小商人、小学教员，各种匠人等等算是最好的，必要很艰苦的去找取这样的线索。

在失败区域中，士兵或团防中的工作有很大的意义。当反动军阀驱使他们压迫群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方法进行在士兵中的宣传，使他们同情于农民，拒绝压迫农民。利用士兵生活的不满，指出压迫士兵及压迫农民是反动势力之一贯的政策。

苏维埃区域失败以后，红军的责任更应该加重游击。用所有的红军力量选择敌人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尽量扩大游击。在游击战争中，处处要着重发动群众，尽量实行彻底土地革命，开群众会议，建立群众的组织。游击在某处驻一天半天，都不能忽视在当地的群众工作。对敌人的策略，要避免与他直接的对战，用跑圈子的办法，乘敌人不备的地方去行动。这些我们在前一次信上已经说过。

我们因为不知道鄂东北苏维埃区域存在以及失败后的具体事实，所以我们所提出的仅限于这一些。你们必须要更详细的研究。譬如现在当苏维埃区域失败以后，群众以及同志中有些□□□□确的现象，这是否起源于过去之不正确的工作方法等。又如，现在我们的党是否□□□□□□□□□□□知过去完全将一切党员公开的错误在那里。这些问题都需要切实的研究，并□□□□□□□□□同志都明了这里的工作经验。

其他的问题，你们可以与巡视员当面讨论。

中　央

八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给武汉特支的指示信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武汉特支：

没有接到你们的报告，只得根据团的报告，中央有下列的指示给你们：

（一）武汉是全国四大中心区域之一，二中全会指出武汉工作没有基础是全国党最严重的一大弱点。武汉经过不断的破坏之后，党在政治的影响上虽然存在，但在组织上的基础确完全瓦解。忠实积极的分子多半牺牲或者系狱，逃亡未归或埋藏在工厂中者亦有之。党在历史上虽有长期斗争的基础，但在革命失败近两年内，这种旧的基础早已损失过半，现在所谓旧的基础多半是最近两年来的关系的遗留，斗争的经验不甚深厚坚强，且经过长期的白色恐怖，经过两年来组织时存时失，旧的基础的恢复在目前已没有多大可能。特支应认清目前的工作是艰苦的创造的工作，主要的是从新的深入主要的产业部门，由下而上的去创造党的基础。要有决心的忍耐的创造精神，坚决的执行这一路线，然后才能在产业部门中树立起党的基础，旧的关系也只有在这种过程中，在斗争中逐渐的寻找，逐渐的发生，绝不能再蹈过去的覆辙，贪便利图轻巧，专门找旧同志或向生产无出路的游民中间去发展。武汉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粤汉京汉两铁路和兵工厂、海员、市政工人和纱厂工人，要有决

心有计划的打入到这些人中去发展组织，首先选派同志去参加生产或设法和这些工人群众接近，了解群众的实际生活，在工厂中特别在斗争中发展支部的组织，创造产业支部，由下而上的从群众中生长党的组织，这是目前武汉最迫切最基本的工作。这一工作没有执行，是全国党一大弱点，武汉的党将不能负担他伟大的使命。

（二）恢复旧同志，必须先经过一个时期朋友的关系，考察他是否忠实，是否有革命的决心，是否积极的参加革命斗争，必须是忠实的积极的有决心的分子才能恢复组织。失业的分子最好是找到职业之后再编入组织。不应该不信任同志，但绝不能轻易在严厉的白色恐怖环境中采用招回的办法。目前在武汉恢复旧组织不是主要的工作，但是不应该一概拒绝旧同志回党。

（三）新的基础的创造，绝不是先宣传而后组织，有组织然后斗争，这是机会主义的最高方式，在武汉的工作中要严重的防止。只有在党的政治口号之下才能团聚群众，才能发展组织。只有在党的正确策略之下坚决的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斗争才能取得群众的信心，才能吸收新的分子入党，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武汉经过长期的白色恐怖，群众在国共合作时代所得到的条件完全失去，群众斗争消沉太久，群众的痛苦日益加深，目前自发的斗争不断的爆发，客观上迫切的需要我们去领导。坚决勇敢的发动群众斗争，在斗争中创造新的基础，恢复旧的组织，这是目前武汉唯一的工作路线。在斗争中训练同志，打破同志中消极、怀疑、畏缩以及回避斗争的不正确的倾向。

（四）特支本身的组织应即速形成集体的分工，有三人成立特支干事会，每周经常□□□会，相当的分工，在特支之下应努

力成立各厂的支部组织，在一个区域□□□□□□□□□□□□□有三人以上即可成立支部。只要有两个工厂支部以上的存在，特支便应改用临时市委的名义指导一切。特支对于各个支部应有密切的联系，具体工作方法之指示，经常的检查与督促，每个同志都应该在党的分工之下活动起来，积极的为党工作。特支要经常的有计划的推动所有的同志毫不懈怠的发展武汉的工作。必须如此，武汉工作才能渐渐的恢复。特支干事，在武汉现有的同志中找出积极的分子，由特支向中央提出名单。

（五）秘密工作的执行在武汉不能有一分钟一刻钟的疏忽，没有工作上的必要，同志不必互相以组织关系认识。日常生活与工作方式必须社会化与群众化，尤其是党内教育训练，应该特别加紧，党的组织深入群众是秘密工作唯一的出路。武汉目前党的基础尚没有建立起来，一切同志尤其要下决心打入到群众中去，取得群众的掩护。同时要防止秘密主义、躲避观念的发生。

（六）武汉党团各自独立的组织系统去发展，在工作上发生密切的联系，党应该认识团是自己的工作之一部分，在政治上领导团、在组织上互相帮助的发展，是很必要的。但是党不应该专门去分化团的同志来作为组织上的出路，应该取得团的帮助来建立党的组织。在有团的组织而无党的组织的地方，党应该委托团向成年工人中发展，介绍给党的特支，在党有组织而无团组织的地方，党亦应该如此。

（七）在武汉已有的同志，中央知道有三部分，一部分是从团方面分化出来的，一部分是杨克敏（或称开明）同志在武汉找到的，这两部分应即统一在特支的指导之下。至湖南同志在汉发展的一部分亦应在特支成立之后划归特支。但每一部分的关系，都应经过慎重的考察，尤其要有工作的考察。

（八）特支应经常每两星期向中央作一次书面报告，在报告中至少应列入下列几项：

1. 武汉政治经济状况；
2. 群众生活与斗争及党的策略；
3. 组织状况；
4. 宣传教育工作；
5. 特支本身的工作状况；
6. 工作中的进步与弱点，缺点和困难。

中　央

八月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

——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

（一）

托洛斯基反对派在国际上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国际六次大会断然地排斥这一组织是在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反革命的工具，特号召各国党一致地肃清反对派所散布的非列宁主义的思想，消灭他在党内的任何活动。最近，托洛斯基更明显地成为资产阶级最好的朋友，各国帝国主义甚至中国国民党都在利用这一最好的工具，来做反世界革命、反苏联以至反中国革命的宣传。

（二）

过去曾经走入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歧途中去的，只要不愿为反革命的，现在多已觉悟认错而回到列宁主义党的旗帜之下来一致奋斗了。在这时，中国党内忽然开始了他的活动，这并不是无因而至的事，很值得整个党之严重的注意。固然我们不必夸大反对派在中国党内之政治上组织上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反对派思想经过一小部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的传播与宣

传，经过中国机会主义思想予他以关于中国革命之共同见解的赞助，加以现时党内理论水平线低微与党内历史纠纷尚有残留，于是反对派在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的党员中，便有他暂时活动与发展的机会。据现时中央所发现的，他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的（对党的而不是对敌人的《新生命》月刊，久已连篇累牍地登了托洛斯基的文章）出版物。他也同各国反对派一样地或更加甚地摭拾一些关于个人的非事实的无原则的谣言，来攻击党的指导机关尤其是中央，企图借此团聚一切在某些问题上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分子到他的旗帜之下——反党的旗帜之下。这一现象的发展，实不容许党丝毫忽视。

（三）

中国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与在各国一样地是与党站在两条路线上，站在对立的路线上来进行分裂党之反革命的工作的。他们在口头上在文字上确也用着列宁的名义来眩惑群众，但中国革命的群众与站在正确路线上的一般党员都会知道他们的活动必然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工具，来危害中国革命。现时托洛斯基反对派之乱用列宁名义，与考茨基之乱用马克思名义以掩饰其反革命罪恶的并没有两样。

（四）

我们与托洛斯基反对派斗争的，主要的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托洛斯基主义无论对于世界革命问题，对于苏联问题，对于中国革命问题，都处处与列宁主义站在完全相反的地位。

托洛斯基主义最主要的危险便是：不承认一国范围之内如苏联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不承认赞助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策略之一，不明白革命性质与动力的关系，于是乃形成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无论在任何时地，他都主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要从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开始。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党内反对派所特别重视的，也是从“五卅”到现在，他们一贯主张中国无产阶级不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有一时的合作，不应加入国民党，不承认国民党当时是革命各阶级的联盟，武汉时期应当建立苏维埃政权来与国民党对抗，在现在则更不承认有地主阶级与土地革命的存在，不承认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尚未完成，认为现时中国革命已经死灭，故主张现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应只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应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工厂，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非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在反对派方面说来，确是一贯而自成系统的，故我们必须指出他的基本谬误，排斥他的整个纲领，然后才能肃清反对派的一切危害于革命的思想；如有人以为托洛斯基主义对于欧洲问题、苏联问题虽然不对，但对中国革命问题还有某些部分的见解是对的，这种观察完全是肢解了托洛斯基主义，并且可给中国党内的反对派借此为负隅之抗，混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而有害于中国党的正确路线之进行。

（五）

托洛斯基反对派不仅在思想上形成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在组织上已纯全做了反革命的工具。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险的企

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从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六）

各级党部及全党同志必须站在国际六次大会及中央的正确路线之下，严重地注意这一问题。如果发现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党除掉对于其思想给以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对于参加这一组织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其自觉地向党声明退出这一组织并承认其错误，如被劝告而无效，则党必须予以严重的制裁以至开除出党。如有同志在其理论之某一部分与托洛斯基主义相似，则党必须与之作坚决的理论斗争，且这些同志必须公开承认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整个纲领与活动是错误的，是做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同时在行动上必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绝对不容许以自己错误的见解来代替或动摇党的路线。

（七）

各级党部对于中国党内反对派的活动及与其思想上的斗争，须开会讨论，并须有决议的回答，公开地采取断然的排斥以绝其分裂党的企图。每一同志如发觉有人在党内散布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或从事小组织的活动，必须立即向所属党部报告，不应怀着好奇的心理代为隐藏甚至在同志中间反互相传说；这

样，必将不自觉地做了反对派的宣传和活动的工具，而有害于党的巩固和一致。

（八）

党更须在一切思想斗争上，在一切革命策略上，严防托洛斯基主义思想之侵入，如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斗争，必须从半殖民地的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互相联系上来认识苏联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好友，苏联是全世界工人的国家，而主张保护苏联，不应如中国反对派只空喊为世界革命而保护苏联的口号，而不联系到现实的中国革命阶段中为民族解放利益必须联合苏联的主要内容相联系；如我们在不混淆乡村中反地主的土地斗争之主要矛盾的路线上，号召雇农加紧对于富农的阶级斗争，决不同于反对派从社会主义革命观点上认为与富农的斗争是目前中国乡村斗争的主要内容。这一切的尝试，都足以妨碍目前中国革命阶段中的策略之正确的运用，都足以阻碍党的一致前进而帮助敌人。故中国党不仅在理论基础上组织上，肃清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思想与活动，并且要更加严重地注意在一切日常斗争与革命运动上，反对派的非列宁主义的策略从各方面侵入的尝试。

（九）

在与反对派的思想斗争中，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必须与党内反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联系起来。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借着托洛斯基主义的理论，与他一无二样地来反对现时党的正确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

错误。故在现时中国党内斗争的路线，一方面是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一方面必须努力于肃清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且机会主义复活的企图在中国党内更有他的历史残留的根据，中国党内的托洛斯基反对派又必然要利用这一斗争，以便掩藏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扩大他自己的活动范围。因此我党在无产阶级最高原则之下，必须坚决地反对党内任何小组织的活动，反对机会主义残留的复活，以肃清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以消灭反对派所能利用的党内基础。党只有在根本肃清这些危害于革命的企图和尝试以外，中国革命才能在党的领导之下更顺利地进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才更能得到巩固与一致。

中　央

一九二九，八，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批评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

看了撒翁同志解释他的观点的第二封信以后，觉得他只是对于自己错误观点的文饰，并没有接受中央正确的批评而改正他自己的错误。虽然他声明与中央没有原则上的不同，中央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在原则上是对的；虽然把他在第一次信中提出的认为“更能使群众亲切了解”的“误国政策”的口号，很巧妙的、狡猾的、敷衍过去了，实际上完全是辩护他原有的错误观点。中央认为这一错误观点是极有害于革命的斗争，有害于党对于中东路问题的整个的路线，必须给以严厉的批评，使全党同志得到正确的了解。

一、中央分析中东路问题，从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各种根本矛盾与帝国主义企图首先消灭苏联与镇压殖民地的革命的观点出发，指出中东路是帝国主义有计划的进攻苏联，镇压中国革命与瓜分中国的表现，当然他们内部还包含了互相争夺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进攻苏联的战争仍然是目前中东路问题的主要的危险。撒翁同志分析中东路问题，认为“不只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且是国际纠纷问题的导火线”，因此在前途上有两种可能的形势：“一是帝国主义在援助中国名义之

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一是苏联若取退让的政策，帝国主义必然互相争夺中东路而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央认为中东路问题的前途，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是主要的危险，而撒翁同志看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与帝国主义间相互的战争是两种可能的平列的前途，这是原则上的第一个不同。中央认识了现在世界总的形势进攻苏联战争与帝国主义间的战争都同样紧张起来，但是在中东路问题上是有帝国主义主观上进攻苏联的作用，所以指出中东路问题主要的危险是进攻苏联的战争，这正是马克思的辩证的唯物论的分析方法。而撒翁同志只认识了客观的总的形势，而忽视了帝国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的作用，所以把两种战争的危险平列起来，这不只是十八世纪的机械的唯物论者的观点，而且根本上离开了阶级的立场。譬如他说“日本觉着中东路落到美国手里，比暂时留在苏联手里对于它更是不利”这一句话意义的解释，日本竟可以与苏联联合起来对抗美国了，这里面有一丝的阶级观点没有？

中央根据正确的分析得出来的主要的危险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战争，因此站在世界无产阶级与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的观点上，而提出“反对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的口号。撒翁同志根据他的观点得出来的主要危险是“战争”，所谓“无论那一种战争，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于是站在他的“拥护中国”的观点上而提出“反对国民党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这是第二个原则上的不同点。

他说“在原则上……不但不反对拥护苏联的口号，而且以前我们宣传这一口号太不充分，不过在含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便要小心些，单只这一口号便不够了”，似乎中央指摘他反对“拥护苏联”的口号的错误，是造谣冤枉他一

样。试看他第一信上的说话，到底是不是冤枉他？

“帝国主义间的第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战场，或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进攻苏俄所加于中国民族的灾难，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稍有常识的人，一经指出，都能懂得，即不倾向革命的中立分子，也能了解；而且只有这样的宣传，才能够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得粉碎，然后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这个名词更能使群众亲切的了解），然后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

在这一段话上面，最后的一个“然后”，还没有“拥护苏联”的口号，很明显的不要“拥护苏联”的口号；就令他还有一个“然后”（然后提出拥护苏联）没有说出来，也是只有到了将来第三个“然后”的时候才能提出“拥护苏联”，现在是不应该提“拥护苏联”，很明显的，现在是要把他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这就充分证明，他用“只是”两字来掩盖他自己的原则上的错误观点只是一种狡辩，完全不是布尔塞维克公开的承认错误、自己批评自己的精神。

二、“拥护苏联”，在原则上既然是正确的了，那么，我们在策略上是不是要明显的提出这样的口号？撒翁同志的意见以为，“有时因为时空性上有需要经过曲线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竟可采用和原则形势不同的策略”，因此他主张对中东路问题的策略“首先指出……然后……然后……”，然后提出“拥护苏联”（第一信的原文上是没有的，依据他的第二信的解释，替他补充上去）。这样的“曲线”论，真是与列宁批评少数派学得以前经济派策略过程的“阶段论”毫无二致。

“临时大会派（即少数派）现在观察革命问题，与以前经济派观察八小时工作制问题所持的态度，毫无二致，（一）十

小时工作时间制，（二）九小时工作时间制，（三）八小时工作时间制，从这种策略的过程，后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这里用不着细说。现在的临时大会派，却也向我们提议，把今后的革命，好好地分成阶段，（一）沙皇召集代表机关，（二）这个代表机关在民众威迫之下决定组织立宪大会，（三）……关于第三阶段孟塞维克也许还未商量妥当”。（列宁：两个策略）

现在我们撒翁同志对于中东路问题也向我们提议：（一）指出战争的危险；（二）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四）……关于第四阶段是不是“拥护苏联”，我们的撒翁同志或许也还未考虑妥当。这是与先宣传，后组织，然后斗争，暴动，一个模型制造出来的机械的阶段论，或者“曲线论”的少数派的观念。

“凡一个政党的策略，即是这一个政党的政治行为，或其政治动作的性质，趋向及方法。决定一个策略，即所以确定党的政治行为，严格的规定整个党对于新发生的职任，或新的政治状况的态度”（列宁：两个策略）

所以党对于某一问题的策略，必须与党对于这一问题的职任和态度相适合，固然列宁主义的策略应当是能适应环境、伸缩自由的，可是这种伸缩自由的性质，决不可以与党对于本问题的职任和态度相违反或“不同”，这是决定策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列宁主义的每一个策略都是为着取得广大群众（本阶级的和客观上的同盟者）的拥护，动员广大群众向统治阶级进攻。可是无论甚么时候、甚么形式里，这一策略的提出都要能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提高一般群众的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水平线。决不能为着取得广大群众，而降低无产阶级的口号到一般落后群众的水平线。如果这样便不是取得群众，更不是领

导群众，而是跟着落后群众的意识跑，做群众的尾巴，这是决定策略的第二个基本条件。如果不注意这些条件，那么就会丧失策略上的革命性和阶级性；因此一方面会发生左倾的幼稚病，别方面会发生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妥协主义，以至于背叛革命。

现在党内对中东路问题的两个极端的偏向，首先自然都是原则上的错误，同时也都是不了解这些决定策略的条件。托洛斯基主义者不认识这些条件，走到极左的方面，只提出“为世界革命而拥护苏联”的口号，不要“为中国民族解放而拥护苏联”的口号。我们的撒翁同志因为不了解这些条件，走到极右的机会主义方面，主张不要或者暂时不要“拥护苏联”的口号，而提出他的资产阶级左派的“反对误国政策”的口号。

撒翁同志不了解策略上的妥协与降低无产阶级的政治口号是绝对不同的：为着革命的阶级策略的利益而暂时取某种的让步，这是合于列宁主义的原则，但是降低无产阶级政治的口号，这是列宁不止一次的毫不容情的指斥少数派这样的机会主义。撒翁同志因为不了解这一点，所以拿列宁对布勒斯特和约的让步来证实他的机会主义的策略的“曲线论”。为甚么撒翁同志不仔细去了解当时列宁虽然暂时对德帝国主义让步，但是一点也没有降低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而且相反的，列宁正是为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而暂时让步。撒翁同志拿列宁对布勒斯特和约的暂时的让步，来掩释他的降低无产阶级的政治口号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充分证明他对于列宁主义的误解。

三、“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与“拥护帮助民族解放的苏联”，表面上都是站在民族观点上的口号，实际上一个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一个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口号。现在的

“国”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国”，而不是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国”。无产阶级认为必须推翻现在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建立大多数民众（工农劳苦群众）的“国”，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所以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主张，驱逐帝国主义必须与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联系起来。资产阶级左派的利益是要拥护现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国”但是不满意现在统治的派别，所以常常攻击现在的统治者“误国”，或者是“遗误党国”（第三党常常骂蒋介石误国，而改组派常常骂蒋介石遗误党国，这是因为改组派是国民党的一派，而第三党却自以为是国民党党外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坚决的反对统治阶级为着阶级的利益出卖整个民族利益（卖国），但是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走到承认现在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观点，而骂他们“误国”并且“卖国”是有必须绝对的反对的意义，而“误国”只是相对的攻击的意义（就是还有改良的余地）。所以“误国”只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名词，而“卖国”却是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站在拥护民族利益的观点时候也可以应用。不过没有说明的单纯的提出“反对卖国”，还是可以使群众模糊。所以“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不止是形式上的不同，而且是根本政治意义的不同。

中央只指出“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并没有说“卖国”也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名词，撒翁同志的第二次信上故意把“误国”与“卖国”联做一块来说。在撒翁同志的第一信上对于他的“得意之作”的“误国政策”，特别注明“更能使群众亲切了解”，可见他特别重视这一口号，而在第二信上却不把“误国”特别解释，而只与卖国联做一块囫囵吞枣的敷衍过去，这只是一种狡辩的把戏，而不是讨论策略的正确的态度。

"'拥护苏联'的口号，不止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来信上的话），中央特别注意现在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阶段，广大群众的强烈的民族观念正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的动力，所以中央无论在宣言上、通告上、机关报的言论上，都特别看重解释"拥护苏联"的口号在民族方面的意义。不过仅只这样是不够的，一定要同时解释这一口号在阶级利益上的意义，然后才能使广大群众了解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利益与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不只是不相冲突而且是不可分离的。撒翁同志既然了解了"拥护苏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又读过了中央的宣言、通告和各种刊物文件，却又攻击中央只是站在阶级利益上的宣传，对于群众的民族观念"缺少戒心和注意"，难道中央特别着重"拥护苏联"口号在民族方面的解释是没有"戒心和注意"，一定要堕落到资产阶级观点的泥坑，提出"误国政策"的口号，才算是有"戒心和注意"吗？难道要取得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不是要把这些群众的观念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线，而是要跟着落后的群众的意识跑吗？撒翁同志的中心错误就在这里，他只知道要"注意"一般群众的民族观念，而不知道要使广大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欺骗的民族观念提高到无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思想的水平线。这只是对于群众的民族观念的惧怕，因而使自己堕落到资产阶级的行列，而不是领导群众的民族观念去接近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思想。惧怕群众的落后的观念因而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使自己堕落到资产阶级的泥坑，这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病根。

"拥护苏联"，无论在阶级观点上、民族观点上都是必须的口号，所以中央并没有不注意群众的民族观念。撒翁同志却想取消"拥护苏联"的口号，拿"反对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他，正是撒翁同志抛弃了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主义不要站在

民族观点上的宣传，撒翁同志不要站在阶级观点上的宣传，在策略的意义上说，这正是机会主义的两方面。

四、“群众对于政治的了解，主要是靠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单只我们的宣传煽动是不够的”（见列宁左派幼稚病）。苏联首先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苏联在中国大革命中用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革命，帮助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开始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屠杀工农的时候，便实行与苏联绝交，这难道不是群众的政治经验，而是“主观的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的表现”吗？现在上海的工人群众以至广东、福建的农民群众说“苏联是打抱不平的”，这不是偶然的，正是群众在自己过去斗争的经验得来的认识。所谓“苏联是打抱不平的”，正是“苏联是中国革命的好朋友”的意义。至于“误国政策”，只就字面上已经不是一般工农群众所能了解，而只是一般听惯了“遗误党国”的资产阶级的人们懂得，至于他的含义上要经过“曲线”的解释才到本题，更使一般工农劳苦群众莫名其妙。一个是工农劳苦群众易为懂得的口号，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人们易为懂得的口号；一个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口号，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改良的口号，我们到底应该采用哪一个？或者是不是两个可以同时并用？固然国民党正在极力扩大他的欺骗的民族宣传，想来模糊群众明确的认识。固然“现在广大的群众还有民族的偏见，国民党的宣传有很大的影响”，这正是需要我们加倍的努力去扩大这一口号的宣传，使群众在过去斗争中有了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更加明白起来。固然这一口号只能动员“革命的群众”，这正是需要我们自己并动员革命群众向落后群众去解释，吸引他们到革命的战线上来，决不应当采取落后群众的口号，而使革命群众堕落到落后群众的水平线。我们决定策略、提出口号，应当首先注意“革命的群众”，而不应当首先

注意落后的群众，尤不应当只看见落后的群众而不看见革命的群众。中央注意了革命的群众，同时注意了落后的群众，所以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同时特别着重这一口号在民族方面的解释。撒翁同志只看见落后的群众，而忘记了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的群众，所以主张取消“拥护苏联”的口号，而用他的资产阶级的左派的口号“误国政策”来代替，这就是中央与撒翁同志的不同。

撒翁同志在第二次信上不止一次的申明，“‘拥护苏联’的口号原则上是对的”，“我并不反对这一口号”，只是觉得这一口号不够，同时要提出“误国政策”的口号，才能使群众亲切了解。（同时又没有承认他在第一次信中不要“拥护苏联”口号的错误，并且没有承认拥护苏联应该是中心口号，可见他是故意的模糊同志的观点）。固然党对某一问题的策略，为着要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起见，除了根据党对这一问题的职任与态度提出中心口号，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外，同时还要提出许多群众切身利害的附属口号，来帮助这一中心口号更能深入群众。但是这些附属的口号，必须在政治意义上不与中心口号相矛盾、或者是降低中心口号的意义。譬如号召五卅示威运动，“驱逐帝国主义”是我们中心口号之一，因此我们的附属口号提出“反对屠杀张学良”、“驱逐外国海陆军”等，因为这些口号与中心口号一点矛盾也没有，而且可以帮助中心口号更能深入群众。可是决不能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来做附属的口号，因为“修改不平等条约”是降低了“驱逐帝国主义”中心口号的政治意义。所以对中东路问题，中央提出“拥护苏联”的中心口号之外，同时提出“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东路，反对资本家利用白俄压迫自来水工人……”等（参阅中央通告），这些口号不但不与“拥护苏联”相矛盾，而

且可以帮助“拥护苏联”口号的深入。假如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来做附属口号，便是很明显的降低了中心口号“拥护苏联”的政治意义。所以把“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同时并用，也是一样的错误。

撒翁同志看见上海两次的示威参加的群众还不广大，以为就证明了中央的“夸大”，就是中央策略错误的结果。然则采用了“反对误国政策”的口号，就能动员群众吗？果然这样，为甚么改组派第三党老早采用了这样的口号（请撒翁同志去读一读中华革命党对中东路问题的宣言和改组派的机关报民主），并没有看见广大的群众在他们口号之下行动起来呢？不是的，决不是的，群众了解了这一口号，还要加上群众主观上斗争的勇气和客观上统治阶级镇压力量的削弱，然后广大群众才更能在这一口号之下积极的行动起来。现在广大群众其所以没有更能积极的为这一口号而斗争，就是因为现在群众斗争的勇气还没有高涨，和统治阶级白色恐怖惨酷的镇压，再加上我们的宣传还没有十分深入的原因。譬如“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撒翁同志总不会否认是广大群众所不能了解的吧？为甚么广大群众还没有为这一口号而斗争起来呢？是不是看见广大群众还没有为这一口号来积极斗争，便怀疑是这一口号的错误，而主张拿出小资产阶级更能懂得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来代表他呢？恐怕只有机会主义者才是这样想吧！假如有人说明，这不是策略的不对，而是客观的白色恐怖的压迫，群众斗争的勇气尚未高涨，和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十分深入的原因，便骂他是“机会主义者把自己主观上的错误，推倒客观上的老法子”，恐怕只有真正的机会主义者企图攻击党的正确路线的时候，才会这样的无的放矢吧！并且二十六与八一的两次示威，都有千数以上和几千群众的参加，这难道不是建筑在群众的自觉上，

而是党的命令主义命令来的吗？难道不建筑在群众的自觉上，由党的命令可以使群众赤手空拳的去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枪炮拼命吗？只有机会主义者才是这样的侮辱群众，不相信群众。至于说用我们的口舌去宣传群众，用群众的行动去影响群众，这就是“命令主义”，组织群众的斗争与示威游行就是“盲动主义”，无异乎说现在是研究的时候，“让群众起来了再干吧？”这是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五、撒翁同志两次来信上，非阶级观点的分析方法与他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的主要点在上面已经有充分的说明，至于他的来信上故意造谣断章取义的对中央的攻击（如说中央“只要站在阶级利益的宣传”，“只是为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苏联而反对”），用不着详举事实来做反证，只要细阅中央一切的文件便可知道。尤其是一些字句上的荒谬，更用不着逐字逐句的批评。但是他在来信上的最后归纳为八个问题，现在也把上面的意思归纳起来作一答复：

一、每个原则，是否可以机械的应用，不许有策略上的变化？

每一个策略必须与党从原则上决定的职任与态度相适合，虽然应该有伸缩的自由，但决不能与原则相违反或“不同”。与原则违反或“不同”的策略，尤其是与少数派的策略过程阶段论一样的“曲线论”的策略，便是机会主义的观念。

二、中国此时是否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有。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口号才能使他们在这些“偏见”和“欺骗”之下解放出来，如果拿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只能助长这些“偏见”和“欺骗”。并

且这就是惧怕群众的民族观念，而使自己堕落到资产阶级的泥坑，正是机会主义的病根。

三、在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上（关于中东路问题的）除了它勾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外，是否还要说到它这样的反革命（或许是误国的误写罢）的政策，对于中国有怎样的结果？

一定要有详细的说明，但是主要要指出进攻苏联同时就是镇压中国的革命，说明“战争”的危害还是次要点。尤其是把进攻苏联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是中东路问题两个平列的可能前途，同时又不说明两个战争的不同的意义，只是笼统的说“战争灾祸来了”，这不只是迷乱了群众对于主要危险的认识，而且可以做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的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被资产阶级利用去反对苏联。（参阅第三十七期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

四、中国广大群众是否都已经认识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凡参加过中国大革命斗争的群众，的确在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中，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但这并不是说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所能动摇，而不需要我们揭露资产阶级欺骗的努力了。

五、对于中东路问题的本身，是否需要正确的详细的非我们主观的而是群众所能亲切了解的解释？

非常之需要，所以我们要着重在“拥护苏联”口号的民族革命方面的意义的解释，群众有了过去的政治经验，很有可能亲切了解这样的意义，这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至于“误国政策”的口号，只有听惯了“遗误党国”的资产阶级的人们所能了解，决不是工农劳苦群众所能

了解。

六、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是否都能够无条件的接受我们阶级的口号？

“拥护苏联”不只是阶级的利益而且是民族的利益，所以不只是无产阶级能接受，而且是一般群众所能接受。

七、对于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我们应否一概不要？

我们是要拿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口号去争取他，如果是去跟着他们的落后意识跑，便是变成了群众的尾巴，而不是领导群众。

八、除开阶级口号之外，是否还应该用其他广泛的、最利害切身的口号，能够唤起广大群众参加反对进攻苏联的斗争？

当然，除了中心口号之外，还要有许多使群众更感着切身利害的附属口号去发动群众。但是这些附属的口号决不能在政治的意义上与中心口号相矛盾，或者是降低中心口号的政治意义。“误国政策”便是降低了“拥护苏联”口号的政治意义。

总括上面的说明，很明显的有两个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中央站在阶级的观点上，分析中东路问题主要的危险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战争，因此中央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争取广大的群众到无产阶级民族革命思想的水平线；撒翁同志分析中东路问题，认为进攻苏联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平列的前途，又不明白向群众指出两个战争的不同的意义而空喊“战争灾祸”，同时惧怕群众的民族观念，因此提出“误国政策”的口号，使无产阶级政党堕落到资产阶级的泥坑。很明显的一个是列宁主义的路线，一个是机会主义的路线。撒翁同志站在他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因此觉得中央的

正确的路线是盲动主义。凡属怀疑或不愿意接受列宁主义的路线的，毫无疑问的，不走入极左的幼稚病，便要走入更深的机会主义，这就是撒翁同志直到现在还不能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中脱离出来的原因，希望撒翁同志对于这一点要有深刻的自觉。

附：撒翁（陈独秀）复中央的信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中央常委同志们：

读了你们八月四日对于我论中东路问题宣传方法那封信的回答，我感觉得你们对于我的意见根本不会了解，因为是关系党的宣传策略之重要问题，不得不再向你们剀切的重复说明一下，这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我们要懂得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复杂的错综的全部理论与政策，首先要懂得辩证法的时间与空间之变化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不懂得这个，所以往往拿他们自己的形式逻辑之“不容间位律”来攻击马克思和列宁，说他们是诡辩派。有些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因为不懂得这个，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并且还不是替党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宣传大纲，也不是讨论中央对于这一问题的宣传原则，而是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此外你们已有的话，当然不用再重复加上一些赘词了。你们对于我的前信不了解，有许多是由于这一点。

原则是一定不变的，此所以谓之原则。至于策略战略，则因有复杂的时空性之不同，便不能时时事事都必须照着原则机械的死板的应用不能有一点变化性，有时因为在时空性上有需要经过曲线才能达到革命之目的，竟可采用和原则形式不同的策略。我们若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责备列宁布勒斯特和约的政策是“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是“因为原则的错误，所以发生策略上的不同”。因为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在形式上显然违背了“不和资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原则。像这一类的“矛盾”政策，充满了列宁一生革命的全活动，此所以列宁被称为“政策上的辩证论者”，此所以列宁骂反对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的同志“不如一个鸡尚能跳出人画的白粉圈”。我们若只是拿几个原则甚至几个名词，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就未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看得太浅薄了，我们便不需要精深的研究了。你们的来信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之错误。你们的原则是原则和策略不分，以为策略必须是原则的印象，所以在一切宣传上工作上，都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不同的活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在原则上，“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对这一口号的宣传，反之，我却以为我们以前宣传这一口号太不充分。至于在策略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并不是说对群众解释因收回中东路而必然发生的危险和国民党的卖国

政策之后，而不归结到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拥护苏联，而是说必须对中东路问题本身有了正确的详细的解释，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后我们的口号才能发生比较大的效力。所以我在前信上说："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只是'拿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则"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这是因为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迷惑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或者你们以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对于中东路问题，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向群众宣传，对于其中夹杂的民族问题，不需要我们有什么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群众的观念模糊了。并且你们很肯定的说："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广大群众……都在自己实际斗争的经验中了解了这一事实"。这是你们完全忘记了列宁曾说过："落后国家的小农经济，族长制度，爱乡的观念，根深蒂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即民族自我主义和民族的排外心，必然热烈的存在着。这种偏见，必须先进国之资本主义根绝了，后进国之经济生活的全基础都根本改变以后，方能消灭，消灭这种偏见，决非短期所能。因此，各国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对于长期间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里面所存在的民族偏见，应与以特别的戒心和注意。"（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的提案）这是你们还没有真能深切的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自己阶级以外的群众，最革命的以至比较落后的广大群众之拥护，才能够成功。你们说"不应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这是对的。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在我们领

导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照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战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够争取群众，而是脱离了群众。一个布尔塞维克党若是脱离了群众，便成为只是口头上纸面上的布尔塞维克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实际是个幻想；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也实际是假面具；用收回中东路的名义而开始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或弄起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以及战争中加于中国民众的灾难，也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怎见得这是“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呢？又怎见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呢？前一个是反革命势力对革命势力的战争，后一个双方都是反革命者牺牲下层群众为上层阶级争权利的战争，我们能不反对哪一个？只有反对一切战争（不论是革命或反革命）才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若虑同时反对两种战争，群众对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一战争，会把苏联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当做两个交战团体平等看待，“双方都要打倒”；则当然应该如你们所说，“帝国主义战争是反革命的势力内部战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我们须公开的明白的把这一分别告诉广大群众，然后群众才能知道对付这样两种不同的战争之不同的策略”；如此，群众还何至误会？并且，我还要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这一口号，其涵义是些什么？为什么不说“反对俄日战争”或“反对俄美俄英战争”，而说“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俄”，这是否已经明白表示对两方的敌与友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俄的战争”和“反对英美战争或日美战争”，已有显然不同的意义，何况还有在这些口号之下不同的详细宣传，何至使群众误会？

单就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向无产阶级的苏联进攻这一点

说，不但在本质上，即在字面上，也已很明显的是阶级冲突，这是任何同志都无需解释而能够懂得的；并且不需要把中央已在通告上解释的话再向中央解释一遍。所以我前信上的说话，目的是在说明由中东路问题将引起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而不是说明其性质。我所以要说明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是因为我对于中东路问题的发生原因及发展前途之客观的观察，都不像你们主观上的那样简单。美国对于北满的野心有他的经济基础和长远的历史，近来正在企图以共管名义攫取中东路。日本一刻也不忘中东路，自然感觉着中东路落到美国手里比暂时留在苏联手里对于它更是不利，所以除了把中东路仍旧回复中俄共管的原状，这两个帝国主义对于此路的竞争必日益加剧，虽然它们对付苏联之目标是一致的。并且，在总的国际局势上，帝国主义间尤其是英美两个领袖的帝国主义之间，由它们经济上之生死存亡而难以久延的战争和它们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是同样的严重。这两种战争哪一种先行实现，谁也不能机械的肯定像你们肯定蒋桂战争不会即来那样。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两种战争发展的前途，都同样有深切的注意之必要。

即以中东路问题的时空性而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固然应该告诉群众，同时帝国主义之间因互夺中东路面临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不告诉群众。这是因为：第一，若是我们隐瞒了这一可能的事实，一旦局势转变，群众所眼见的战争不是向苏联进攻而是帝国主义互斗，他们不是感觉到我们的指导不正确或欺骗了他们，便是以为帝国主义的互斗于中国人没有什么危险；第二，指出帝国主义会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不但没有迷乱群众对于进攻苏联危险的认识，而这样正是暴露了帝国主义所以要进攻苏联之秘密（当然，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

还不在此，这里可不必说），也正是暴露了国民党仰承帝国主义意旨收回中东路进攻苏联之真实的卖国罪证。

你们以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那么，七月十二日党的宣言也攻击国民党“卖国外交”及“卖国勾当”，难道这也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吗？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总的政策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决不能单拿这一方面的话来指摘党离开了阶级的观点。所谓资产阶级的左派如汪精卫等，也会拿这样的话攻击南京政府。可是我们要问：他们总的政策是些什么？他们用这样的话是否为了要打碎他们的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之假面具，而达到动员群众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之目的？如有这样的目的，他们已经离开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了，因为全世界都找不着这样左的资产阶级。我们不能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意见，以为现在的无产阶级字典上已经不应有“国际”、“国家”这类的字，有用这类字的人“就是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大声攻击沙皇及克伦斯基政府因战争“把国家及资本主义弄到未曾有的荒废”。如果我们不懂得列宁这句话有战略上复杂的时空性（即是除了深入阶级利益的口号外，还需要这类广泛的宣传，才能动员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来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也会曲解诬蔑他是降低了口号，是国家主义的观点，并且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或者你们以为这种资产阶级的口号，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时，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时，我们便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其实如果我们认定某一口号应该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完全是为他们阶级的利益的，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也不能用。至于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中，也不能说“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一口

号不是在原则上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在策略上够不够的问题。“只是”这一口号实际应用起来到底够不够，最近几次我们号召的示威运动已经明白的回答了我们，不能再用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了。你们如果仍不觉悟，老是拿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同志们不接受欺骗发生反感，则大失中央的威信。同志们接受了欺骗，以为我们已经有如何如何的力量，则去刻苦工作争取群众的精神日远，这也不是个小小的问题。至于你们把群众没有在你们提出的口号之下起来的原因归到白色恐怖，这乃是机会主义者把自己主观上错误的责任推到客观原因的老法子。

只是因为这一战争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苏联而反对，同时不提及这一战争也如何加害于中国人民，不能使一般群众都真实感觉到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联系，只是为无产阶级而拥护无产阶级，为苏联而拥护苏联，则“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只能动员苏联及各国（中国也在内）的无产阶级，而不能动员中国的广大群众。“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也只能动员中国没有小资产阶级偏见的革命分子，而不能动员多数比较意识落后的革命群众。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方法之缺点正在此，我前信主要的意思亦正在此。你们所提出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可是在策略上即宣传方法上，便大大的成为问题。问题就是“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则只能动员无产阶级的最觉悟分子，同时对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又未曾有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尤其是比较落后的群众明白自己的幻想与国民党卖国误国的罪恶，而接受我们的动员口号。你们这样大成问题的战略，乃是建设在“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一前提上面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帝国主义战争会引起革命，这是对革命发展前途的估量。

正在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同时“告诉群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中国革命有利的条件”，终非时空性所许。

前信所谓“因我的发言引起大家的误会与揣测”，乃是恐怕增加党的纠纷，并不是由个人出发而隐藏自己的意见。

以上的说话似乎稍复杂了，为使同志们明了我主要的意思起见，再简单的重说几句，做一个总结。我这封信和前一封信，都不是陈述关于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之全部内容，也不是讨论此次宣传的原则问题，而是觉得中央对于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

（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释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两点，因为我们的党应该是实际斗争的党，不能忽视下列的各实际问题：

一、每个原则是否都可以机械的应用，不许有策略上的变化？

二、中国此时是否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三、在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上（关于中东路问题的），除了它勾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外，是否还要说到它这样反革命的政策对于中国有怎样的结果？

四、中国的广大群众是否都已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五、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是否需要正确的详细的非我们主观的而是群众所能亲切了解的解释？

六、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是否都能够无条件的接受我们阶级的口号？

七、对于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我们应否一概不要？

八、除阶级的口号之外，是否还应该用其他广泛的最利害切身的口号能够唤起广大群众，参加反对进攻苏联的斗争？

我希望这封信和前几天论党内各种问题的那封长信，都能早日在红旗上登出。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撒　翁

八月十一日

根据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旗》第三十九期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前委诸同志：

七月中寄来各种报告及决议案与表册均由闽省委前后转到。最后一信你们说已派陈毅同志前来，因此，关于红军中许多斗争策略问题及党内争论问题，我们均将等陈毅同志到后，与他作更详细的讨论，再给你们以更正确的指示与批评。现在只就你们所急盼回答与急应使你们知道与遵守的问题先述如下：

一、目前政治局势关于军阀战争部分，恰如你们来信所分析"中国反动政局继续往混乱中走"，但在你们来信后所发生的政治变化却是中东路问题。关于这一帝国主义、国民党联合进攻苏联的事变，中央已有各种文件发出。目前问题的中心是，不论帝国主义强盗在瓜分中东路上还有其各自的利益不同的方案，但在进攻苏联这一点，却总是一致的。无论南京政府秉承帝国主义意旨用何种方式处理中东路，或是奉系军阀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单独处理中东路，总是与苏联以不利，而中东路必成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之有力的军事根据地。故在中东路问题上即使不爆发战火或延迟几个月以至一直延迟下去不解决，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布置总必着着进步。现时奉系军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阀之一切军事上的布置已经予日本以大利，南京政府亦正在利用这一问题，加紧对于全国的剥削，并调兵北上，准备时时可为帝国主义尽力。自然在中东路问题上不仅不能丝毫减少帝国主义强盗间的彼此冲突，反因此而更加紧其冲突。即是国内军阀冲突也决不会因此减少，且东北、西北各系军阀正好借此向南京政府要饷索款而真实地准备他们自己间之未来的新冲突。但我们站在阶级的革命的利益上，必须认定帝国主义、国民党武装进攻苏联是这次中东路问题的主要内容，我们必须动员全党、动员群众准备武装保护苏联，以回答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之反革命的战争。在这一任务前面，中央已正在加紧对于全国工作的布置。你们的任务便首先是：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务。

二、目前“三省会剿”的实施，使我们战斗的任务更加严重。但正因其严重，你们必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这一战斗，来冲破这一狭小的局面向各方面游击。群众只要发动起来，农民武装只要逐渐增加，尤其是土地革命只要逐渐深入——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与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要日益扩大，则红军便是游击他地，也不会使闽西工作受到若何大的损失，且可以使这一土地革命浪潮波及他处，使敌人军队疲于奔命。依你们来信所说及报纸所传，似你们正在向东北游击。当然这一路敌人力量是比较空虚的，但你们所应切记的便是群众的发动与武装农民。凡你们经过之区，必须使红军不仅尽其作战的努力，还须成为广大的宣传队以发动群众彻底地收缴民团散军的枪械以武装农民，使群众能广大地在土地革命任务之下行动起来。只有如此，你们的游击任务才算达到，才不致空空走过群众的乡村。敌人这次围攻你们是较有决心的，自然他们中间还有许多弱点，但我们应付他们应更加慎谨周详，万不可轻

敌。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得多，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因此，你们在战略的决定上不应轻于求试，不应死守一地，使敌人得集全力来消灭你们。

三、你们在目前游击区域的宣传，必须与全国的政治宣传联系起来。因此，关于中东路问题之一切宣传，你们必须尽量传播，必须联系到反对世界大战，反对瓜分中国与保护苏联上面，必须使农民群众对于土地革命的认识能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建立密切的联系，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战争所加于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祸害，要使其如对军阀战争所加于人民的祸害一样地了解，并要使其了解能站在同情于苏联一方面，引起他们与统治阶级斗争以保护苏联的决心。

四、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之下，你们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是在解决党内纠纷而没有针对着目前围攻形势，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这不能不说是代表大会中的缺点。固然，你们一切决议案是极力向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做的，但对群众的影响，却很有可能使他们转移视线着重于党内的斗争而放松或看轻与敌人的当前斗争。即从你们的文件语句中间，也可看出你们整个的精神是正用在对内。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润之、玉阶[1]同志亦特别重视个人的争论。尤其重要的是各方面都主张扩大军事中的党内民主化，玉阶主张固然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便是润之的答复也还不能对于军队中之党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转战千里之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确的答复。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地回答它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而同时又没将“党管一切”之不妥当的涵义与解释，给以恰当的批评。这些都证明你们在一切组织路线上还欠

缺正确的认识与了解。当然，这不是说，你们便不应为正确路线而斗争了，而是说你们在目前敌人四面包围中，主要的任务是在向敌人奋斗。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应从积极方面联系到与敌人斗争的任务上，使全体同志热烈的精神不仅用在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上，且更移此精神集中力量向着敌人。你们代表会的决议案无一语引导全体同志向着敌人争斗。固然你们会是解决党内纠纷，但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号召全体同志消灭一切纠纷，一致地拥护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在这种危急时候，谁固执着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成见，谁便是破坏这艰难困苦转战千里的革命组织，客观上帮助了敌人。谁企图将一些个人纠纷扩大成派别之争而忽略了或放松了与敌人的战斗，谁便是放弃了当前的革命任务。代表会议决案的内容与润之、玉阶诸同志信固然有许多是正确的话，但缺乏这一重视与敌人争斗的精神，便使一切问题的解决得不到更正确的斗争出路。这需要前委同志号召全体同志在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之下，整饬自己的队伍，正确自己的路线，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向着敌人作艰苦的战斗！

五、现在中央还不是要答复你们来信的全部，因为这将待与陈毅同志面谈后较易得到更详细更正确的了解，在这封信中，我们只将几个较易解决的原则问题告诉你们：

（一）“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你们这一意见非常正确。并且在游击时期，你们必须彻底消灭民团防军警察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在闽西这种可能更多过赣东南。固然，红军的扩充是必要的，但红军扩充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地方武装上。有了武装农民的事实，广大的农民才更易投身到红军里来。故武装农民实是扩大红军的前提，你们必须坚决地执行这

一路线，应视与发动群众斗争一样的重要，不容许有丝毫动摇。

（二）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故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如工作不好、组织不得法，那是另一问题，然决不能因此便摇动了根本路线。否则我们的红军，为着何来？红军对全国的政治影响又建立在哪种基础上去？

（三）“党管一切”的口号，在文字的涵义上，在群众的了解上，都不正确。不仅可以引起不正确的解释，且必然要引起不正确的认识。因为此口号如用在党内，则不明其意何指。如系指党员一切行动须受党的支配和监督，则又不需此口号；如系指党团须在群众组织中起领导作用，则又不甚切合。反之，如将此口号放在群众中、群众组织中宣传，则必与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的精神无异，必阻碍了群众自己建立政权的决心，而认党尤其是红军，是天外飞来的“救苦观音”。这万万要不得。

（四）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与军委实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但这并不是说前委之下便不可组织军委了，而是说几县割据的政权并没成立，前委仅仅执行它游击的任务，故前委与军委应合在一起。假使几县苏维埃政权成立，他们之上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权，则党的组织“前委”便须用更大的力量指导这几县的工作与力图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实质上便是前委变成这一区域的特委，或与原有的特委合并。另外便须组

织军委，公开的属于革命委员会，在党的组织上便受前委指挥，专门处理军事工作，红军便归军委调遣。但现在闽还没有此种情势，故前委的作用仍限于军中，与闽西特委只取横的关系，自然用不着再组织军委了。

（五）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但这并不是说如此便没有党内民主化了，如此便不执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了，如此便可恢复家长制。不是的，绝对的不是。在比较集权制之下，绝不会妨碍党内民主化，许多政治问题斗争策略还是要提到支部中去讨论，不过讨论时要更有集中的指导、敏捷的结论，使其不妨碍于战斗的行动，而一切组织的事务处理，要更集中于指导机关，以统军权。至“一切工作归支部”的涵义，是要使每个党员都能在支部中得到工作的分配而为党工作，纠正过去党的指导机关常有包办一切代替支部工作或直接指挥党员工作的现象，绝对不是说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民主集中制的党既绝不容许，尤其在红军中，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更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之生长。所谓集权制当然是指在集体指导组织中的集权，绝不是个人的集权。自然在一个委员会中，既有一个书记，他在会议席上、在处理日常事务上，必然要比别人多负点责任。尤其在军队中，在作战的军队中，党的书记当然更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我们只要问一问为什么红军中的指挥不采取委员制，便可懂得军中党的书记职权也必然要集中些了。

（六）润之同志信中有一点说到军中党员的成分，他认定

全军一千三百二十四名党员中，工人党员占三百一十一名，故党内遂发生了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思想。这种观察一方面是对的，但不加解释则必致失之机械。第一，我们必须认清目前红军是广大的农民群众所组成，我们能从中吸收了三百一十一名工人同志，其数并不算少，问题是在如何训练这些工人同志，使其成为军中党中的干部，加强指导机关之无产阶级领导。第二，军中党员农民占多数，这并不是危险现象，问题是在农民的成分上，要多找雇农贫农，要多使之受到无产阶级的教育，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以趋于党的一致。

六、在目前的环境与工作的需要上，润之、玉阶两同志应遵守代表会的决定，一致地努力工作。安恭同志应依照中央前信的通知调来中央。至赴莫学习事，现已中断，自不必前来。且就你们的名单看来，大多是负重要工作的同志，似你们于决定时并没有估计到目前环境的困难、工作的重要而带有取消倾向，这不能不说是受着整个代表大会侧重于党内争论的影响，望你们迅速予以纠正！

专此，共产主义的敬礼，并祝你们在群众拥护之下战斗胜利！

中　央

八月二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即毛泽东、朱德。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诸同志的信

——关于群众运动和党内概况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共代表团诸同志：

自从国际交通断了以后，你们便无法收到此间的文件了。所幸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秋白[1]同志的来信，都还能在中东路问题发生之前数日到来，使我们对于农民问题——尤其是富农问题的讨论能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东路问题发生后，中央曾得到国际一个短电的指示，告我们要加紧中小心城市工作特别是哈尔滨工作及拥护苏联的宣传。我们在这个指示下，并得到国际代表团的帮助，已经集全力向着这路线工作。关于“八一”示威，更曾用很大力量动员全党去发动群众，结果在上海、香港是有较好的成绩，在其他城市，政治的宣传与其影响是有的，尤以满洲为能冲破党内两年来和平发展的空气，但动员群众的工作却极其微弱。农村的情形，凡有斗争及我们影响的区域而又得到“八一”工作之指示者，大都有相当工作。这次“八一”示威，恰当中东路问题发生之后，自然武装保护苏联的宣传乃成为这一示威的主要内容，且这一动员，不过从“八一”开始，自此以后的工作，从

政治任务上说，从争取群众与全国的工作布置上说，都在日益加重，党正在以中东路问题为中心，从各方面加紧工作。

现时全国工农斗争的形势，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斗争，是日益向前开展。我们主观的力量在上海、香港都有很多的进步，尤其是与群众的关系这一点，上海已有了一个包含二十多个公开的工会之赤色工人联合会，拥有近万群众，香港有一二十多个工会加入的赤色工人代表会，有群众四五千人。在北方，一年来要算有很多的进步，只是秘密工作极坏，自首叛变的事又复开始，故机关的破获、干部的损失极大，现在有工作的区域为哈尔滨、奉天、抚顺、天津、唐山、北京、山海关、青岛、郑州、太原、信阳等地。长江流域有工作的为杭州、南京、无锡、安庆、九江、南昌、沙市、宜昌及四川几个重要城市；南方则除香港外，有福州、厦门、汕头、梧州、云南等处。在这些地方最大的缺点，便是群众工作的缺乏，许多工作还依然束缚在狭隘的支部范围以内。仅仅是顺直井陉的矿山、江西景德镇的磁窑，我们有广大的工人群众的组织——这不是说在其他各地客观上我们没有发动群众可能，而是我党在主观上还没十分懂得如何去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如何去争取广大工人群众。最大的缺点便是经半年乃至一年的努力，全国中心城市的武汉、广州，至今犹未能将工作恢复，现今所有的仍只是很小的党的组织，长沙、济南连这些很小关系都还没有。全国的重要产业海员、铁路、矿山、兵工厂中的工作还不见多大进步。海员的关系并不少，只是陷入一种和平发展与无甚群众工作之不死不生的状态；党在铁路中的组织，按支部说，全国不下二十个，但群众的关系，则除掉唐山大厂外，我们仍没有多大领导力量；矿山以开滦五矿及井陉为较有工作，其他如抚顺、淄川则仅具线索，安源、大冶则尚未恢复；兵工厂的线索

全国五大兵工厂都有，工作则还未做起。农村工作一般地说是有相当发展的，但北方则陷入和平发展的状态，因之有许多可能去发展的机会都失去了，甚至旧有的基础都不能保存，特别是灾荒的区域，我们很少工作。南方的游击区域仍是发展的，现在最大的区域要算是闽西，赣西东江平浏，湘西鄂西，鄂东北豫东南，及赣东北，最近又有四川的发动。兵运有相当进步，但仍不能抓着中心的有力部队。反帝运动在今年“五卅”以来，在几个重要城市要算有很大的进步，群众已逐渐能走到街上为有组织的示威，并且在我们领导之下行动起来。

党的现状经过不断的努力要算是大有进步。二中全会开在六月底至七月初，大家在一致的精神之下，同意于中央一年来的工作路线，决定了许多重要策略及实际工作方针。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央工作给了一个满意而更求进步的具体指示，对于目前政治形势有更明晰的分析，对于党的任务与策略有更具体的规定，以利全党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之总路线上前进。对于组织问题集合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完成了六次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对于职工运动在斗争的策略上有更切实的具体的决议产生。这些会议中的成绩实成为加强中央指导之最有力的基础。党员数量在工人成分上较半年前并无若何增加，但党员质量却有很大的进步，许多产业支部现多能开会工作，过去许多挂名的城市党员现已渐能参加党的工作。只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干部，现在仍有一小部分不能随着党的正确路线前进。有些人专门愿意停留在上海，发表些离开实际工作实际策略的政治清谈——这还是上焉者；有些人更专门摭拾一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无原则的个人的材料，来攻击指导机关，攻击中央。这些人在数量上说并不多，且中央更不是不以教育的方法去说服他们的。但有些同志的确还保留着党内纠纷残余

的成见，且在政治见解上更日益走向与六次大会完全相反的道路。现在党内有两件较为严重的事实应该使你们知道：第一是托洛斯基派反对派的活动；第二是独秀同志之不同的政治意见的发表。

反对派的开始活动是由莫斯科学生带回来的，有些是已经被党开除，或回国后便脱离了党的，有的是尚存留在党内的。他们也如欧洲各党的反对派一样，有他们的党内组织，命名为“中国列宁主义者布尔塞维克反对派”，有他们的出版物《我们的话》，在党内秘密宣传。他们更着重了中国党内一般落后消极的离开工作的党员与机会主义思想的残余，他想利用这些分子，掀起反对指导机关反对党的正确路线的活动，以便他们得掩藏在党的组织之内，以扩大他们的活动基础。他们的政治口号除掉一般的宣传托洛斯基主义以外，还特别着重于中国问题的宣传。他们口头上确还嚷着革命，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不仅混淆了目前中国革命阶段的主要内容，而且仅仅是口头上的欺骗，实际上正如其他各国一样，早已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用以来反对中国党的领导，企图从党内分裂做到中国革命的消灭。中国党内的反对派的活动现在正向着这一目标前进。他们常利用目前的实际问题，不向着敌人进攻，而专门反对中国党的指导机关。中央现时对反对派的斗争路线，主要的还是反托洛斯基主义的思想上斗争——尤其是关于目前中国革命策略之正确路线的斗争，以树立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在组织上，党自然毫不犹豫的要肃清党内这一分裂党的组织。如发现其活动的领袖必毫无留恋地将其开除出去；对于参加这一组织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其自觉的承认其错误退出其组织，如被劝告无效，党必予以严重制裁以至开除出党。如有同志在其理论之某一部分与托洛斯基主义相似，则党

必与之作坚决的理论斗争，且要这些同志公开承认反对派的整个纲领与活动是错误的，是做成反革命的工具，同时在行动上要他们必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绝不容许以自己错误的见解来代替或动摇党的路线。因为目前的确有些同志以为反对派在欧洲革命问题上的见解虽是错了，但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某些见解或许还是对的，这种观察完全是肢解了托洛斯基主义且给中国党内反对派一个负隅自抗的机会，故我们也正在注意于这类思想的肃清。

但尤其重要的还是中国机会主义思想予他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已共同见解的赞助。陈独秀同志最近有数信给中央，其中有一封较长的关于目前中国革命策略及政治形势之分析的讨论信。他指出目前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是资产阶级政权，中国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特别在资产阶级胜利以后受着最后的打击，现在只是残余的残余。目前的农民土地革命，是要以贫农为柱石，中农是动摇分子，富农要当他是乡村中资产阶级来反抗（即是说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不承认目前中国有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到来的象征，而只承认有革命高潮之反面——这些见解已证明他由机会主义走到了取消主义——显然与托洛斯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观念无二致，借此来反对党现时的正确路线，来掩盖他过去他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在另两封信中，他关于中东路问题之宣传策略的讨论，也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他认为这种宣传是“曲线式的策略”，实则与列宁所讥笑少数派的策略过程的阶段论的内容毫无两样。他对于中东路问题，是将帝国主义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平列着看，并将战争灾祸统笼的反对，说无论哪种战争在中国发生都将中国当作塞尔维亚，这显然没

有一点阶级观念，并给群众以极不正确的暗示，而成为资产阶级左派和平主义的宣传。独秀同志这些意见的发表，决不是偶然的，他一向是认定中央是一贯的盲动主义者，殊不知他却永远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来观察中央的正确路线，这犹之社会民主党将布尔塞维克准备暴动永远认为是布朗克主义一样。独秀同志自新中央回国后，几次邀他赴莫直至上月犹作一度邀请，他亦曾几次允许，但总是迟迟不行，上月他又答应将日文的列宁马克思主义书籍看阅研究一遍，于年后再赴赤都，他同时却写来这三封信，很值得中央注意，因为怀着这种观念的并不只独秀同志一人，我们常零零碎碎从直接间接方面得到同志中间一些这种类似的意见。我们决定将他的来信发表，公开的与之作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指明他与中央与全党确站在两个不同路线之上。这一斗争开始，一方面固引起党内某些不正确倾向的同志，借题发挥故意来推波助澜形成与整个党正确路线相对峙的活动，但中央坚决相信目前党内无产阶级正确的意识已渐渐的发展，群众的斗争生活已渐能强固地反映到党内，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经过一年来的工作已为党员群众所日益了解——这些条件的总和将成为党内战胜一切不正确倾向与思想之最强固的基础——中央并将很细心地很坚决地善用这些进步的条件，引导全党向着更正确的道路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要使这一不正确路线的倾向与思想一齐肃清消灭，以求得党的巩固与一致。至于党内如有反对派以外的任何小组织的倾向与尝试，党必要坚决地予以反对予以制裁，尤其在目前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阶段中，更需要党的坚强与一致，故任何分裂党的小组织的活动与倾向，都是中国党所应极端排斥的！

这两种活动，我们相信也要反映到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

望你们特别注意，并要在中央正确的路线之下，为党的一致而坚决斗争。

目前国内各种工作均在发展，许多客观上的条件，均需要主观力量去推动，许多省份均缺乏工作人才，特别是地方党部的干部甚为缺乏，就是中央本身人亦太少，全总工作至今尚未健全起来，因为人力分配不过来的关系，实在失去了一些工作的机会，因此中央曾函催中夏[2]同志及其他中大同志回国工作，现交通虽断，但仍有由欧洲回国路线，务望代表团了解目前国内革命之需要速与东方部商决一批得力同志于最近两月来中国至要。

再，国内现在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和与党外思想的斗争均极严重，万分需要材料的参考，中央除在国内努力翻译工作外，务望代表团注意经常给国内材料之供给，已翻译之材料务须由代表团自己设法马上由欧洲寄回国内，希望国际交通局寄是比较困难，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央没有收到莫方一本东西，可是有些同志由个人的关系倒反得到了一些，这是要请代表团注意的。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央政治局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即瞿秋白。
〔2〕即邓中夏。

中共中央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中央听了逸群[1]同志关于鄂西工作报告之后，在全国党一般的任务前面，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中央有以下的决议：

（一）建立赤色区域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在江陵、监利、石首、沔阳几县斗争，已经发展到横亘几百里成为赤色区域，广大的成千成万的群众已经成为有组织的伟大的力量，一切封建剥削关系在赤色区域已经渐次扫除，土地已经归诸农民，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势力在赤色区域已经绝迹，从群众当中生长出来的赤色武装，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之下已经形成红军一部分的基础，渐渐随群众斗争发展而扩大，这些区域的政权事实上已经在农民协会管理之下。因此，党在目前的任务是要使这一政权真正群众化，领导广大群众来管理政权，具体的办法是乡村政权除了由群众直接选举的委员会执行日常工作外，同时要有代表会议的组织成为决定乡村一切政治问题的最有权力的机关。同样，在区、在县，都应有群众代表会议的组织，并有经常会议决定一切重要问题，政府委员会必须由代表会议产生，必须这样，才是真正群众的苏维埃政权，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认识是自己的政权，而极力拥护这一政权。应

该严重防止的而是以党来包办或代替政府。同时建立几县联合的工农政府，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也是鄂西党目前最紧要的任务。这一政权必须由各县代表大会产生代表，组织几县的工农代表大会为政权的最高机关，绝对禁止由党指派的非群众的无权力的空招牌机关。在成立之前，在广大群众当中作普遍的宣传，使群众了解政权的意义。成立之日，第一件事便是依据群众斗争的口号与党的政纲颁布各种法令，如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废除一切政府军阀及地方捐税，改良工人（包括手工业者、划夫、店员、雇农、车夫等）生活，废除一切田契债约等，实行统一累进税，改良兵士生活；号召广大群众，热烈的拥护这一政权，同时要用各种的方式向赤色区域以外的群众作广大的宣传，使这一政权的影响更扩大推广，要使全国群众都知道有这一政权的存在。各级工农士兵农民所组成的代表大会，须经常有定期的开会，讨论各种重要问题，使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此才能训练群众，学习管理政权，才能认识政权是自己的，以生死存亡的决心来拥护这一政权。在各级代表会议及政权机关，党员只能占一部分的成分，组织党团，在其中起核心作用，党团受相当党部指挥（如几县联合代表会及工农政府党团受特委指挥，各县代表大会党团受县委指挥，各乡代表大会党团受区委指挥），防止党来命令政府（国民党式的以党治国）或与政府对立的形式，要吸收群众中有威信的积极分子参加政权，最好内中有工人士兵及城市贫民的成分。在政府执行委员会中，应有适合于工作需要的分工（如军事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反革命裁判委员会），经常的会议，有计划的工作，积极的为群众解决当前的问题，同时要防止单纯的作消极破坏的工作或专门保守这一区域的危险。

（二）坚决的领导雇农对富农的斗争：现在在赤色区域，发现富农对雇农取抵抗的形势，富农怠工，宁肯让土地荒芜，不再雇人耕种等事实，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要组织雇农，领导雇农向富农斗争，这一斗争必须保障雇农的胜利，丝毫不能动摇与让步。斗争的方式有两种：A. 工农政府站在雇农利益上颁布雇农条例，强制富农执行；如果这一办法富农仍不接受，B. 应该毫不迟疑的由政府将富农一部分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耕种，发给土地使用证。

（三）开始土地国有的宣传，打破私产制度观念：在赤色区域立即开始向群众宣传土地不能买卖，土地是大家公共的，土地不能出租，打破农民私有观念及平均地权的观念，要使这一宣传深入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自觉的认识私产制度是贫富产生的原因。向赤色区域以外的宣传应该根据客观条件来决定，在地主很少的地方，我们的宣传应该是反苛捐杂税、土地革命同时并重，反苛捐杂税就是反封建剥削土地革命之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下层群众。在实际行动上也应该如此，如果是富农反对，我们要毫无疑义的领导雇农贫农反对富农。

（四）赤色乡村经济政策是反对商人对农民过剩剥削，同时不应压迫小商人：政府应该颁布赤色区域内各种物品一致价格，价格的规定应该根据群众不受商人过剩的剥削的原则，同时对小商人的贸易采取放任的态度，不压迫小商人，使赤色区域交易能够流通自如，坚决的防止自己封锁自己的危险。

（五）有计划的发展群众武装，扩大红军组织：政府应该有计划的发展群众武装，扩大红军组织，吸收群众中积极分子，经常在群众中作加入红军的宣传，加紧经常的农民武装的训练，渐渐采用征调办法，不时有计划的将甲县常备军调往乙

县试习，经过群众自己决议从十八岁到三十岁的农民，每天须有定时的武装操演。扩大教导队办法，训练红军干部分散到各乡村作训练群众武装的工作。红军的扩大是发展赤色区域保障胜利的武器。

（六）扩大赤色区域，发动非赤色区域群众斗争：赤色区域非扩大不能保存。扩大的办法先要发动非赤色区域群众斗争，譬如反苛捐杂税、抗租抗债，在秋收斗争时期更容易发动。党应该从赤色区域内征调大批干部到非赤色区域，抓住群众当前迫切的要求，提出适当的口号，尽可能的发动群众斗争，使这些斗争与赤色区域的工作发生密切的联系，但是要打破群众依赖赤色区域的心理。现在鄂西一般同志甚至负责同志还存在迷信武力的观念，不注意从斗争中去锻炼群众、武装群众，只希望特委由赤色区域调武装同志去帮助他们打倒团防，或希望贺龙早到，这些不相信群众力量的错误观念必然是使群众存一依赖红军的观念不相信自己伟大的力量，应严厉的纠正。扩大赤色区域的中心口号是土地与政权两个口号，使广大群众团聚在这两个口号的周围，防止单纯反对苛捐杂税，不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危险。

（七）反对毁灭城市及无目的烧杀政策：毁灭城市及无目的烧杀政策是农民意识的表现，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仅是在经济上是自己封锁了自己，而且必然失去城市工人贫民群众的信仰，这一错误在鄂西虽然已纠正了许多，但在一部同志中仍然保存着，应继续纠正这一错误。

（八）建立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特委宣传部首先要健全，经常的宣传党的政纲、目前斗争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如六次大会的十大政纲、反对进攻苏联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组织等。每周规定宣传要点，审查下级党部宣传工作，供给下级党

部宣传材料。将乡村中所有教书先生组织在农民协会之下，经常的召集他们开会，改变他们教学的内容与精神，在蒙童馆中加入社会常识，经常派人到各蒙童馆中讲演，或开游艺会、同乐会，工农政府中教育委员会应经常有计划的做这一工作。特委本身至少须出版两种机关报，一是向一般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众宣传，一是一般群众看的画报，用特委名义公开宣传党的主张，号召广大群众围绕在党的口号的周围。这一刊物应该同时经过党的组织路线，发行到鄂西非赤色区域一切群众中去，成为广大群众经常的读物。这一刊物的内容应该多带鼓动性（绝不是造谣欺骗），登载群众中的实际斗争材料，批评豪绅资产阶级政权，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党的政纲，记载工农政府的消息等，文字要求通俗化、地方化，短简明了，深刻刺骨。

（九）以艰苦的精神、十分的决心建立城市工作：城市工作不起来，赤色区域绝不能持久，城市是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的中心，反革命的力量集中在城市，时时可以向赤色乡村进攻，打击革命的力量。赤色乡村必须得到城市工人贫民的领导才能持久，这是目前鄂西最严重的问题。鄂西党必须有计划的以十分的决心征调大批得力的同志，到城市去工作，这一工作必然是比乡村要艰苦万分，必然是比较长期的艰苦过程，但是必须认识在城市中发展一个同志比乡村中十百个同志作用还要大。鄂西党要坚决的执行这工作，首先便应该从宜昌沙市的职工运动入手，选派积极分子，打入到洋船上民船上，码头工人、黄包车夫、打包厂、电灯、挑水夫、店员工人群众中去，求得职业为工作的基础，了解群众实际生活，发动群众日常斗争，在斗争中扩大党和群众组织。在城市中的第二工作是士兵运动，鄂西党要找出各种接近士兵群众的方法，抓住任何机会，设法

打入到驻军及团警当中去，发动士兵群众斗争，发展党的组织，这是每个党员的任务，绝不仅是军委的工作，一切的支部都要作这一工作。到敌人部队向红军作战时，党在反革命军队中的组织毫不迟疑的号召兵变，倒转枪来杀反动的长官，同时要防止一切不到时期的兵变。党在城市中的第三工作是领导城市贫民争自由，反苛捐杂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的斗争，特别是学生群众在目前仍有革命的作用，党绝不能忽视这些工作。改组派、蒋[2]系在鄂西群众中开始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在落后的群众当中很容易暂时受他们的欺骗，我们必须在群众当中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尤其是在群众实际要求中发动群众斗争，更能使群众认识改良主义的欺骗作用。

（十）号召群众反帝斗争，准备武装拥护苏联，反对瓜分中国：在目前国际形势之下，帝国主义大战危险日益迫切，反帝国主义大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一任务是全党的任务，鄂西党必须将这一任务经常的坚决的使之成为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不仅是宣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的阴谋，不仅是揭破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出卖中国的各种事实，并且要抓住一点一滴的群众所知道的材料，联系到群众日常斗争，号召群众的各种行动，飞行讲演、游行示威、在赤色区域召集群众大会，经常不断的举行，这一工作在过去没有执行，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在这一工作当中，必须要揭破国民党虚伪的民族主义、社会爱国主义、和平主义的欺骗，我们要站在群众当中勇敢的喊出反对帝国主义抢夺中东路向苏联进攻，反对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中国，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的口号。

（十一）红军的生活有机化，纪律教育化：红军中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必须经常开会，讨论本身生活问题，在每次作战之

后，必须召集批评会，批评作战时各种弱点和缺点，多举行各种游艺会、娱乐会、讲演会，提高士兵政治认识，充实红军的生活。纪律的颁布必须向士兵群众解释，经过士兵委员会通过，纪律的执行在可能时（战时在外）可以经过士兵群众自己的决议，使士兵自觉的遵守纪律，使纪律的执行带有充分的教育意义，肉刑必须立即废除，代之以士兵自我的批评或罚岗等。士兵巡查队的办法，是引导士兵自动执行纪律的一个方式，仍有继续进行的必要。在红军中纪律的裁制绝不能动摇，必须带教育性的，严格的执行。

（十二）召集代表大会，重成立鄂西特委：鄂西工作在最近有很大的发展，需要各县共同统一的指导机关。从斗争中产生了一些新的干部分子，几县联合政权的成立，军事的发展，在工作上有成立特委之必要。特委的产生，必须召集鄂西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席上检查鄂西过去的工作，讨论今后工作，产生今后工作决议案。这些决议案必须依照六次大会二中全会正确路线，具体的针对着鄂西实际情形规定鄂西今后工作，绝对防止形式主义的空泛虚浮、不切实的官样文章。在代表大会席上，到过中央的同志必须将中央所决定的一切工作路线详细的报告，引起同志热烈的讨论。

（十三）改造党的基础，转移党的基础到交通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的成分上：鄂西党必须坚决的改造党的基础，城市党应该建立在海员、划夫、码头工人、车夫、店员的基础上，农村党应该将党的基础从自耕农作中心转移到雇农、手工业工人，在原则上拒绝富农入党，将动摇消极的分子从工作中开除出党，特别侧重在质量的发展，新的分子的吸收必须在斗争中工作中表现积极勇敢，每个同志必须能够为党工作，要使党逐渐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这一工作是坚决的经常

的工作，鄂西党必须有计划的从日常工作中斗争中不断的执行，在执行时要防止机械的形式主义与国民党清党式的削弱党的组织的错误发生。

（十四）打破同志中地域的观念：鄂西党员的成分大部分是农民，所以地域观念特别浓厚，地方主义的观念可以影响党的工作之发展，可以使党的组织破裂，你们要严厉的指出这一观念之危险，在同志中消灭这种非布尔什维克的封建观念。

（十五）支部生活要建立在工作上斗争上：支部生活最低限度要办到经常自动的开会缴费，了解群众生活，领导群众斗争，讨论党的策略，散发党的宣传品，发展党的组织，发展自我批评，执行党的纪律等，支部必须自动的工作，有经常的工作计划与工作的检查，在开始建立支部生活的时候，地方党部要帮助支部，首先便应该帮助几个中心支部建立模范的支部生活。支部中应该经常的从工作中训练同志，支部委员会应该是支部同志选举支部中最积极最明了的分子负责，有适当的分工（如宣传、组织）与经常的会议；农村支部必须有中心分子的训练，活动分子会议、组长联席会议、个别谈话要能经常不断的举行。农村支部的组织要保存秘密，与群众组织分开，要严格的遵守这一原则。介绍同志必须经过支部审查，由支部派人谈话，经过支部会议通过，依其社会出身及觉悟的程度决定候补期之长短，经过上级党部批准，才能通知到支部会议，要防止滥收与感情结合的危险。中心支部要开始创办工厂小报、乡村小报，经常的有自己的宣传工作。

（十六）健全地方党部，建立几个中心县委：地方党部是最接近群众的指导机关，没有健全的地方党部，不能领导当地群众斗争，不能建立支部生活。鄂西党要集中干部分子健全地方党部，第一步便应该是健全宜昌、石首、荆门、监利、沔

阳、鹤峰几个中心地方党部，特委将管江陵县委工作，使这些党部能够自动的有计划的工作，并且能够帮助邻县的工作。地方党部主要的任务在于能够集中一切党员的努力到目前的几个革命斗争的主要问题上，抓住当地一切的群众斗争，经常不断的在工作中斗争中改造党的基础，帮助支部建立支部生活，联系到实际工作的教训，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教育，经常在工作过程中纠正同志不正确的倾向，引进积极的分子参加党的指导机关，在集中指导之下发展党内的讨论与自我批评，带教育性的执行铁的纪律。地方党部委员会要有分工，同时要有定期的会议与经常的接头，重要的问题应该提出会议，经过会议决定执行。在赤色区域，地方党部要有计划的经过党团指挥当地政权机关。

（十七）特委要建立巡视工作，有计划的指导政权及红军的工作：特委经常有三个负责同志工作兼江陵县委，其余的同志应分散出去，轮流指挥各县及红军中的工作。有定期的巡视，每次巡视回来特委应召集巡视会议，讨论各县工作；在施鹤及宜昌应各设一巡视员，经常巡视这两区的工作。巡视员每到一地，必须参加各级会议，找各级负责同志谈话，一直到支部；有一时期住在当地，实际帮助当地的工作。在红军中应组织前敌委员会受特委的指挥，前委到各县与各县党部开联席会议共同决定当地的工作。在几县联合工农政府中，党应组织党团，党团与特委有密切的关系，党团一切工作必须受特委指挥。特委应该有计划的指挥政权及红军的工作。

（十八）群众组织尽量扩大，建立中心领导力量：农民协会、雇农工会、济难会等的组织应尽量扩大，在农民协会中应巩固雇农与贫农的领导，防止富农夺取领导权。党在这些群众组织中，只能起党团作用，绝不能以党代替群众组织或与群众

组织对立，雇农工会的分子仍然要个别的加入农协的组织，在农协中起领导作用。

（十九）党要认识青年团是自己工作之一部分，与团建立正确关系：青年团是党在青年工农群众中的组织，是自己工作之一部分，是党的最主要的一个助力。党与团应该在组织上工作上发生密切的关系，党应该在政治上领导团，帮助团培养干部，帮助团的青年化，党团在工作上要互相帮助的发展，互相作工作报告与派代表参加会议。坚决的纠正鄂西过去互相对立与互相取消的现象，这些现象的纠正，鄂西党团共同召集联席会议，讨论具体的办法，联名发出通告，督促各级党部与团部切实执行。

（二十）自首是政治的叛变，应坚决的用各种方法解决自首问题：沔阳全县党员大多数自首，这一现象的发生，姑无论在主观上有若干可以原谅的成分，在客观上是表现沔阳党员根本观念的绝对错误，对党是政治上的叛变。这一现象的发展，有根本消灭党的可能。在党的纪律上绝不容许一个自首的党员无条件的回党，这是党的政治生命的所在，绝不是简单的某一部分工作的问题。沔阳发生这一现象是全党在历史上莫大的耻辱。鄂西党解决这一问题，丝毫没有了解这一意义，中央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中央决定将这一问题提到鄂西各级党部讨论，使全鄂西同志了解。中央对已恢复组织的自首党员决定一律留党察看半年，在半年中不能分配党的重要工作。在察看期间工作上表示有决心于革命、积极勇敢忠实的分子，可以恢复组织；过去负责党员领导自首，影响更坏，应暂时开除出党，使他们在群众斗争中去表现，真有决心的分子，仍可以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党应该公开的召集他们开会，提出这一问题来批评，要他们自觉的接受这一决议。现在县委中负责自

首过的党员应立即退出县委，特委另派人接替。

（二十一）各级党部经费要有经常的预算决算：鄂西自特委至各县委每月应有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报告上级党部及中央；政府及农协均应有自己的预算和决算，每月向群众公布，经群众的审查。党费与会费的征收必须严格的执行，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使党员认识党，群众认识农民协会和工会，在鄂西是很可能的。经费支配上务求尽量撙节，工作人员尽量吸收有职业的分子，经费的开支完全要用在工作上，严厉的防止腐化与堕落的倾向，这是赤色区域最易发生的危险，特委必须特别注意。

（二十二）特委的名单：目前仍适用由中央指定的方式，中央指定下列九人为特委委员。[3]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即周逸群。

〔2〕指蒋介石。

〔3〕根据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八十一次会议记录，这次会议提出的特委委员名单是：周逸群（书记）、万涛（副书记）、屈阳春、钱定生、徐固元、段德昌、杨锦棠、郑炽昌及由当地找一工人（最好是产业工人）。

中央通告第四十六号

——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日益紧张的农民危机

在国际帝国主义积极进行使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国民党强盗为求帝国主义的谅解和援助，以冀保持其残酷反动的政权，甘心情愿受帝国主义者驱使，将中国民族利益全部出卖给帝国主义。自然，首先被牺牲的便是几万万工农群众的利益。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强盗这样剥夺之下，在军阀地主豪绅高利贷者无限制压榨宰割之下，已迫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整个农村经济已陷于崩溃与破产到不可收拾的绝境了。最近因为：

一、帝国主义对中国固有农产品之破坏；

二、田租、捐税等高利贷的野蛮封建剥削；

三、灌溉事业与水利绝对没有；

四、不断的军阀内战，广大的群众直接供炮火牺牲，间接受军事影响；

五、强迫种烟，勒派公债，预征钱粮，清乡办团，抽丁筑路及一切苛政。

这些条件都逐渐使农村经济的生产力完全消失，农村的危

机日益紧张，造成普及全国的水旱灾荒与失业。结果便是：

（一）有七千万以上的农民濒于饿死，整县整区的人口灭绝；

（二）生产停顿，粮食要靠国外供给（只就天津一埠而言，上半年面粉输入已占三百万担，米价约值四百万两，其他各地亦复如是）。主要的农产品如丝、茶、棉花亦一蹶不振（如上海在上半年输入棉花已一百二十万担）。结果不但粮食飞涨，影响及于城市工人贫民生活，而且使根底很弱的轻工业也蒙了莫大的损害。

这个农村经济的危机，不单独无限制增加了农村基本群众的痛苦，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被压迫民族的存亡。

二、农民的自觉斗争

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第一个便是使农村生产力之复苏。然而这个任务不能倚赖现在的统治力量，他们正是制做农村危机的祸魁，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受着封建残余的宰割，而国民党强盗的统治又就是一切封建残余的主人；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受着帝国主义经济的脔切，而国民党强盗的统治又就是帝国主义所选择好了的工具。国民党强盗正代表了封建和半封建残余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极残酷的向着广大农民群众进攻。扫除妨害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救济普及全国的天灾，仅只有肃清农村中的一切封建残余，赶走了帝国主义才有可能。这样，推翻了国民党强盗的统治就成为先决的条件。这样组织广大群众自身的革命力量，准备以武装暴动来廓清所有反动势力，是目前每一个革命者的目标。谁不耐心去组织群众，谁不时刻计划准备武装斗争，谁就是革命的敌人。

农民群众自身因为经济生活及政治地位日趋恶化，经济危机日趋扩大，必然使群众自觉的起来实行斗争，这就是农民运动新高潮的前提，这就是激动和唤起广大群众为救死求生的斗争。这种农民运动发展的前途，已经在各省不断的斗争中表现出来了。

各处积极活动的红枪会、大刀会，以及其他一切宗教的秘密团体、土匪，都蜂起云涌般起来。虽然这些农民自发斗争每每沦于无组织与迷信的原始状况中，甚至为反动分子所领导，但这决不会减轻其客观上革命的意义。同时，红军组织、各地的游击队伍虽然经过军阀无数次的围攻，然事实上不仅没有消减，而且得了新的发展。这固然证明党的领导正确，同时也证明农民群众对这部分革命势力的极诚拥护。

三、秋收斗争的意义

以上所举的事实，都表现出农民运动发展的前途客观上是很顺利的。党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利用这些环境，以宣传自己的土地政纲，以恢复农民之革命的组织，以动员广大群众，以准备广大的革命高潮，以反对帝国主义及中国国民党的强盗统治，以揭破国民党的欺骗，指出国民党代表着地主的利益，而使广大农民群众都饥饿、贫困、破产，以领导他们向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国民党作坚决斗争。

执行这些任务，一定要以群众为柱石，使群众团聚于党的周围，这就需要很具体的去了解群众的迫切需求，抓住群众的愿望，不放过一切细小的时机，加紧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

秋收是农民群众需求最迫要的时候，是农民群众与地主及一切剥削者的冲突密切接触的时候，是群众最感觉困难和愤恨

的时候，也就是发展日常斗争的机会最多的时候，同时，就是我们进行工作最顺利的条件的时候。现在许多省份都是“有秋无收”的，然而一切剥削者却在这时候加紧向农民进攻，一切完粮纳税、收租催债都堆在一起，阶级的矛盾格外厉害，斗争也必然紧张起来。

然而秋收斗争又并不是武装暴动，暴动不能指定一个固定的时期的，他须要看革命的形势是否有暴动的条件，尤其是要先看城市的革命情势。没有城市领导的农民暴动，结果是要失败的。现在城市的工人运动虽然渐渐发展，但是决不能说已经到了革命高涨的时候。若是这样估量，是与实际不符。所以今年的秋收斗争，不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时期，而是促进革命高潮的时期。

因此，秋收工作的总路线是在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以推动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不是号召秋收的暴动。各地的党部必须用尽他的力量，根据中央正确的策略，有计划有准备的去领导这次斗争。如果对秋收工作稍加忽略，那便犯了严重的错误。

四、秋收斗争的任务

农民群众的斗争是与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另一方面，我们党在农村中的策略，是要与我们党在日常斗争中以夺取城市无产阶级的策略相适应相配合。并不是一开始农民运动便直接号召施行土地革命，发动游击战争，武装暴动。

现在国内的客观环境，使党必然着重指导一切部分的小斗争，扩大农民群众日常的要求与斗争，反对一切剥夺农民的阶

层，使这种斗争的政治意义更加提高。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对新军阀战争，反对高利贷资本，反对抽丁筑路，反对民团抽捐，反对预征钱粮，改善雇农劳动条件，特别是抗租或减租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们斗争中的准绳，党只有经过这些斗争才能动员广大的几百万、几千万的群众再前进发展为土地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党的政治影响而走到新的农民运动的高潮。

在秋收斗争中，对于我们土地政纲的宣传也是异常重要。中心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处理"，"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两个中心口号又必须与目前"拥护苏联"及"工农联合"的口号联贯起来。必须随时作广大的宣传，使群众深切认识，只有完全没收地主土地，才能彻底免除地主的压迫与剥削。只有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才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中国革命在苏联帮助之下，才更快的有成功可能，苏联是中国一切劳苦群众与民族解放唯一的好友，我们的敌人就是苏联的敌人。国民党为要更残酷压榨工农群众，所以要向苏联进攻。同时，中国革命只有工人与农民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够制胜。然这些中心的口号在群众中宣传，只有在斗争发展时才能深切了解，才能在这些口号之下团结起来。

要使农民群众围绕着党的周围，围绕着党之一切中心的及部分的口号，则必要加强农民的组织。一切斗争的领导都应当集中在农民群众的组织之下。在过去农民协会有信仰的地方，必须在斗争中恢复和强固起来。如农民协会不适用的地方，可组织其他各种名义的团体，然其性质应与农民协会相同。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农村斗争时，同样要促

进城市工人运动的工作，以巩固工人阶级对农民思想上的领导。

五、对各阶级的态度

在秋收反抗地主军阀的斗争中，富农（因为中国富农带有半地主性）必然是摇摆不定，甚至站在反对方面，我们当然毫不顾虑的以对付地主的手段一样的对付富农。

在减租抗租抗捐抗税的斗争中，同样不能放松了雇农的阶级斗争，我们在行动中不能对富农有任何的让步。在策略上，我们必须认定贫农是斗争的中坚，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

目前中国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反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的斗争，就是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冲突。但是中国富农兼有半封建半地主的性质，所以党在农民运动中的总路线是建立反封建势力的民主战线，从雇农起至中农止，反对半地主半封建性的富农。至于富农还参加反军阀反地主的地方，党必须坚决的发展雇农贫农在思想上组织上斗争上的影响，与富农力争对农民群众的领导，决不要使富农有了利用群众以扩大自己利益的可能。所以党对于雇农贫农反富农剥削雇佣劳动的斗争，必须同时坚决的领导。不过党要告诉雇农，现在农村中，主要矛盾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所以他们决不能离开一般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要领导他们成为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的积极的战士，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雇农在一般农民反封建的领导权。

六、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

农村危机的日益紧张，国民党强盗也看见农民革命斗争之不可避免，为缓和斗争计，遂颁布或口头答应些改良政策（如浙江减租办法、土地法等）。这种改良政策在客观上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中国最多的是小地主经济，就是最低限减租政策也难于实行。中国资产阶级与土地关系有甚深的渊源，他或是由农村中直接收得许多地租，或是间接的以高利贷及商业资本剥夺农民，单是这个事实就使他不能去实行农村改良。若说这一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合伙的国民党强盗政府能够实行改良，更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对于一切稍有实际意义的土地改良，在南京强盗政府是绝不肯干的。一切国民党（连改组派也在内）的农村政策，其结果都是对于这些绝无保障的农民，再加一层经济的压迫。事实上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胜利，对于农民就是加增了一切苛捐杂税，以及一切新的负担（地主豪绅用以扩大武装）、军事骚扰、清乡等。国民党强盗实施这些政策，无论如何说不上有缓和农村经济危机的可能，在资产阶级地主掌握政权的条件之下，只是加紧向农民的压榨。但是他的口头政策（尤其是改组派的），在宣传的作用上仍有欺骗落后的群众可能。为要肃清群众对他有任何幻想，只有领导群众去进行日常斗争，那么，一切欺骗的宣传在斗争中自然马上冰消瓦解了。

七、反对几个错误倾向

（一）秋收斗争不应该以暴动为总目标，这是指夺取全国或全省的政权而言，是对的。这可不是说，要避免武装斗争，

而幻想和平的运动。在现在中国农村阶级矛盾这样尖锐的时候，农民斗争起来以后，很快的就要发展到武装冲突。所以我们不可有和平斗争的幻想，只要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而且自动手干起来的时候，便应当坚决的领导这种斗争，一直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二）或者因为易于走上武装斗争的原故，遂以为一开始便须作武装斗争，以为没有日常工作可言，要就不干，一干就是武装的。这也是很不正确的观念。我们如果不去发展群众日常斗争，是一定失却了群众的基础的，流弊所至，或者因为没有武装，犹豫不敢发动，走到不动主义方面；或者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武装就干，于是又跑入了盲动主义的另一极端了。

（三）盲动主义的残烬余灰，现在有些地方还存有这种倾向。脱离群众，和无目的的烧杀主义、盒子炮主义，甚至有些土匪行径，反映游民无产阶级的倾向，都是对于党很有危险的，应该竭力与这种倾向奋斗。

正确的路线，必须坚决的反对右倾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同时决不可放松对于盲动残余及其他左倾思想的纠正。党必须坚决的发动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促进乡村中阶级分化，并以游击战争重新团聚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到有组织的斗争，走向建立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的道路。正因为农民斗争很易于走到武装的冲突，所以党应坚决的领导游击战争与自发暴动，在游击战争中尽可能的建立工农革命的红军。

在苏维埃区域的策略，是要坚决实行党的土地政纲，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要用尽一切的可能来扩大红军的组织。

自然这些斗争要尽可能的得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要从

斗争中加紧农民的组织，从游击战争中扩大农民的武装，以准备革命的胜利。

八、工作计划

各省区党部接到此通告，必须开会详细讨论，针对当地客观的情形，提出当地合宜的斗争口号，拟出具体的切实计划。特别要注重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以及同时促进工人运动的计划。

各省工作计划确定以后，必须将内容详细报告中央，以便分别详细指导。

中　央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

（一九二九年八月）

中央接到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以后，经过详细的讨论，认为国际指示之总的路线，完全是正确的。因此过去一切决议案上通告上以及对各地的指导上所发生的语句上的策略上的错误，必须加以切实的纠正，特通过下面的决议：

（一）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特点

1.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

2. 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渐次打破中国农村的半自然经济，同时使广大农民群众急剧的破产。因此，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极大多数的农民沉沦到极贫苦的地位，同时也发生了极少的富有的分子（富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维持着中国的封建势力的剥削，来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使中国农村经济停留在半封建关系之下，极困难的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

3. 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农村中发生广大的破产失业的群众，遂造成中国军阀军队的基础。帝国主义又利用军阀来统治中国，加以极力的维护，使国家封建制度残余形式的军阀又恢复起来。于是军阀对于农村之各种各色的残酷的剥削，更加甚了农村的穷困与荒废，因此军阀的剥削是中国广大农民群众最不能忍受的。

4. 中国土地的分配，各省的情形虽有不同，但是就全国讲，大部分的土地仍是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同时大地主很少，中小地主占优势。这些中小地主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日渐穷困，因此更残酷的加紧对于农民群众的剥削，并且地主愈小，剥削也愈加厉害。这样就使广大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对立更加尖锐，而积极的为土地革命而斗争。所以中国的土地关系，在土地所有关系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森严（即是说富有的农民很易变为地主），但在土地使用关系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立却非常尖锐。

5. 中国的乡村政权完全掌握在豪绅手里，极力镇压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反抗，可以自由屠杀农民、抽收捐税等各种的特权，并且有他们专为镇压农民的武装（民团、保卫团……等），所以豪绅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同时豪绅又为帝国主义在乡村中的买办、军阀的爪牙，常常还兼是高利贷者，所以中国农民反对豪绅的斗争更特别的厉害。

6. 中国乡村中的自然经济日益打破，货币关系日益发展，广大农民群众需要金钱日多，于是发生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并且这种剥削常常是极残酷的。在农村中，高利贷与商业资本虽然与帝国主义、城市资产阶级有密切关系，但是直接经营者还是豪绅地主与富农，绝少专营高利贷与商业资本的人。所以农民群众反高利贷的斗争，常常与反地主阶级的

斗争联系在一块。

7. 因为帝国主义的侵掠，阻碍着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使地主对佃农的剥削日益残酷，高利贷的利息日益提高，于是使中国农民中的富有阶级觉到剥削雇佣劳动的利益还不如出租土地，放高利贷所得的利益多。所以富农有了资本便买土地出佃和投在高利债上去，而不愿扩大自己的农业经营；这样，就造成中国富农之兼具半地主半封建性。

8. 经过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把农村中最贫苦的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主要在南方各省；这样，一方面使土地革命的斗争益加激烈，同时也就促进了农民中的阶级矛盾（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

9. 在中国北方各省（如河南、山东、顺直、山西等）土地关系与农村经济还有他的不同特点：第一，土地分配上，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比较少，而农民占有的土地比较多，所以自耕农比较多，佃农比较少。第二，这些省份工商业不如南方这样发展，因此军阀的剥削大部分都是出自土地，于是军阀是经济上的大地主的意义更加明显，所以北方反军阀苛捐杂税的斗争，是土地革命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第三，因此，农民群众与军阀大地主对抗的形势异常尖锐，而农民中阶级斗争的形势没有南方这样激烈，所以现在北方的农民斗争，虽在全国土地革命的波浪之中，但还停留在土地革命的初期。

10. 满洲的农村经济在全国中具有稍异的形式。满洲除掉与北方农村中具有同样的自耕农较多的条件外，富农经济已渐发展，而“地主经济”或地主租田制度亦渐渐向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中进行，于是少数较大的资本主义式的农场、农业公司已渐渐出现。但这种农业经济，大半还是过渡式的半资本主

义居多（即仍旧采用出租制度），且还遇着中国特殊条件的阻碍，如东三省的大小军阀多兼营地主经济，他们剥削而来的金钱大多用在扩充军队，以备争夺关内地盘上头，很少有余资投在农业的改良和技术的增高上头，且因其城市剥削的不足，必然要增加苛捐杂税及于乡村的自耕农，而军阀的地主经济亦遂多用租田制度以剥削佃农。因此，满洲农业的资本的发展仍然是非常之慢。南满一部分小农的破产与关内破产失业的农民不断的移到满洲去当佃农雇农之生活的痛苦，都成为满洲农村斗争的主要动力。故满洲的反军阀的苛捐杂税、反地主的封建剥削及乡村中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有相互关联而成为同等重要的斗争。还有一点，南满一带有日本资本投在农业上，组成很多的农业公司，如南满铁路会社、满洲棉业会社、关东厅等经营的烟草、棉花等农场，以及其他方式的经营，而中国的富农经济亦多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的，所以满洲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亦必然要紧靠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从上面这些农村关系的特点，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1. 目前中国农村中一般的主要矛盾，是反军阀地主豪绅之土地革命的斗争，就是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并且这一矛盾经过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点也没有减轻，而且还是日益尖锐的形势。

2. 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一般的说不是纯粹的乡村资产阶级，而是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

3. 农民中的阶级分化已经日益显明，尤其是经过激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的地方，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已经日益激烈起来。

4. 托洛斯基主义与中国的机会主义者认为，“中国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已经不是农村中主要的形

式，所以现在农村中主要的矛盾，已经不是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而是反各种各色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从上面分析的现在农村中经济关系的特点看来，充分证明是一种无稽之谈，这就是他们走上了取消主义的根本原因。

（二）现在中国农村斗争的情形

1.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广大的农民群众虽然受到军阀豪绅地主残酷的白色恐怖的镇压，但土地革命的斗争不只是没有消灭，而且是继续发展。农民的自发暴动、游击战争从未停止，北方反军阀的群众斗争与南方各地红军活动的扩大，充分证明农村中土地革命斗争尖锐的形势。

2. 国民党曾企图以各种改良的方法（如二五减租、减轻田赋等）来缓和这一矛盾，但是这一企图完全失败了（如各省正式宣布取消二五减租，百分之一的田赋政策一点没有实行）。这是由于中国军阀制度的存在，同时中小地主占优势，只有加紧榨取农民，以更残酷的方法来镇压农民的反抗，才能维持自己的崩溃，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这种改良的办法。因此，国民党这种改良的办法始终是一种企图，决不能解决农村中的矛盾与经济危机。这样就使国民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始终是建立在地主豪绅上，同时正因为他的阶级基础是地主豪绅，更不能实行任何改良的办法。

3. 在农村斗争初起的时候，富农还参加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但是他极力想夺取这一斗争的领导权。到了土地革命深入的时候，尤其在斗争失败的时候，便很快的走到反革命方面去；如鄂西富农实行对雇农的抵制，闽西暴动危急的时候，富农是首先主张调和者，平浏赣西富农首先“反水”，都充分

证明富农的动摇与反革命性。

4. 雇农要求改良劳动条件之反富农的斗争，在各省都已渐次发展起来。

5. 北方农民斗争还停留在一种原始的形式之中，广大农民的组织还多半是一种半封建的红枪会、大刀会等。斗争的主要内容反对军阀苛捐杂税等一切残酷剥削，斗争的领导还攥在中小地主与富农的手里。农民的阶级斗争还不激烈，因此，斗争的形势便更易为中小地主与富农的领导，而走入与军阀大地主妥协的道路，出卖广大农民。同时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各派便看中了这一必然妥协的力量，常常勾结他们与另一派军阀冲突，以争取反革命的领导，使农民解放的运动归于失败。又一年来西北的大灾荒，更加推动农民斗争激烈起来，因此遂发生陕甘等回民的大暴动。

（三）党在目前农村斗争中主要的任务与策略

1. 目前党在农村中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以彻底完成土地革命，以消灭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以摧毁了乡村中之封建基础。

2. 完成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是两个不可分离的任务，因为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中国农民的工具，所以帝国主义极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势力。因此要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必须彻底的完成土地革命；要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必须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3. 中国资产阶级早已叛变革命与封建势力妥协，他对农村中改良的企图只是延长封建势力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之反革命的作用，所以要完成土地革命，必须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与

他对农民的改良欺骗。因此对于现在资产阶级任何一派（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党必须毫不放松的在农民群众中攻击他们的欺骗。

4. 因此，党在农民斗争中的总的路线，是建立广大农民群众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战线。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因此，这一革命战线的内容，应当从雇农起至中农止。

5. 中国富农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就是动摇妥协以至反革命。所以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农。

6. 在农村斗争初起的时候，富农虽还参加反军阀地主的斗争，但党必须看清富农反革命的不可免，坚决的领导雇农贫农的斗争，扩大雇农贫农在思想上组织上斗争上的影响，极力巩固与中农的同盟，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

7. 党应极力发展雇农独立的组织，领导雇农为改良自己生活的斗争，提高雇农的阶级觉悟，同时要领导他们成为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之最积极的战士，要告诉他们，不应该离开一般农民反对封建势力争取土地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雇农在一般农民斗争中的领导。且在实际上，农民力争土地的运动必然要发展到反对富农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又多因富农兼有半地主的剥削，以至发展到没收他的土地，或者因其拒绝雇农要请增加工资而封锁农场，则结果不是由党引导雇农走上共耕的道路，便是由雇农自动手的没收其土地——这是在土地革命深入的阶段必然的现象。

8. 现在北方各省农村阶级斗争虽还不激烈，大多数富农虽还留在反军阀战线之内，但党必须毫不犹疑的执行上面

指出的路线，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以严防富农之必然妥协以至反革命，以斩断国民党利用农民的前途。当然整个斗争之主要口号，仍然是反对军阀一切残酷的剥削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9. 在满洲的路线应该是：反对军阀一切残酷的剥削，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反对乡村中资本主义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应当平列着互相关联着成为满洲农村斗争的主要内容。因此，雇农与贫农之基本力量的树立、中农的吸收，仍成为乡村中巩固的革命战线，而富农则毫无疑义要走向反革命方面。

10. 因此在组织上也是一样，农民协会必须以雇农贫农做基础，而吸收广大的中农加入，原则上拒绝富农加入农协；如果富农现在还留在农协之内，必须坚决的加强雇农贫农在组织上的力量，与富农争夺对中农的领导，以至肃清富农于农协之外。同时加坚雇农独立的组织已是目前迫切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放松。雇农一面要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同时加入农协形成雇农小组，以便在农协中起核心领导的作用。在苏维埃区域，如农协还有群众所信赖而未取消，我们不应采取机械的取消办法，而应先加强苏维埃在群众中的领导与组织作用，以减少农协作用，以逐渐达到取消农协目的。雇农工会则应独立的永远的存在其组织。

11. 党在农村中的发展基础是雇农与贫农，但同时要巩固党在乡村中无产阶级的核心作用与领导力量。党必须坚决的拒绝富农入党。

12. 党在目前农民斗争的策略，是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领导他们的斗争，以走向新的革命的高潮。这就是说，现在不是组织暴动而是准备暴动的时候。自然在现在农村

中矛盾这样尖锐的时候，农民的自发暴动与游击战争不可避免的要不断的爆发。党对于这些自发的暴动与游击战争，应当坚决的领导与扩大，以深入土地革命，而扩大党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党必须使城市工作与农村农民斗争有适当的配合与发动，以促进革命高潮之到来。

13. 党要实现动员广大群众的任务，必须坚决的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出群众一切迫切要求的口号，反对捐税、反对民团、反对高利贷，减租、抗租、借粮、分粮、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等，来发动一切被剥削压迫的群众的斗争。如果认为在农村中只有武装暴动，没有日常斗争，这完全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左倾思想。不过同时要认清现在农村阶级矛盾这样尖锐的时候，地主常常用残酷的武装压迫，所以农村斗争很易于走到武装的冲突，因此，在斗争发动和深入的时候，党必须坚决的有计划的去领导这种武装斗争。

14. 现在农村经济日益破产，广大农民群众日益穷困失业，军阀地主豪绅为着消灭农民的土地斗争，实行把农民向他处移殖（如山东顺直的移殖满洲，广东福建的移殖南洋）。党必须在农民中揭破他们这种破坏农民土地革命的阴谋，告诉农民移殖他处还要更加痛苦，领导他们向本地的军阀地主豪绅作坚决的斗争，以争得土地与生活的改善，以深入土地革命。至于农民自动的移殖，党必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力争移殖的便利的条件（如提出地方公款津贴农民，轮船火车免费等），这样也就可以把他们消极的移殖，转到积极的向军阀地主豪绅进攻。

（四）过去的错误与现在党内不正确的倾向

在过去策略上发生错误的问题，就是富农问题。

1. 机械的把富农分成资产阶级性的与半封建性的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在现在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上，每一个富农兼有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剥削，尤其是在他发展的前途上，资本主义的与半地主的两个前途互相纠缠着。并且因为整个经济条件的规定，尤其是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控制，使他更易于走向半封建半地主的前途。这样就使富农更接近于地主阶级。过去这样机械的分划，的确是策略错误主要的来源。

2. 把富农的资本主义的与半封建的两个性质机械的分划，于是得出了反对他的半封建性而不反对他的资本主义性之奇怪的结论。其实同一富农，既然在他的半封建性上决定了他必然走向反革命，决没有又因为他的资产阶级性而参加革命。同一富农可以兼有资产阶级的与半封建的两种不同的剥削，但是不能同时兼具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行动。既然因为他的半封建性走到反革命方面去，那么，我们当然要同时领导雇农贫农坚决的向他斗争。

3. 即使乡村中有很少的富农非兼有任何封建剥削，而只是拥有雇农，但他与地主阶级并没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土地又分划的极小，大地主极少，使富农看着剥削雇农与兼营商业资本高利贷，堆积金钱，以购买土地，而将自己也变成地主去剥削佃农，要比参加农民为土地的斗争轻易得多、实惠得多。加以过去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深入的教训，使他更轻易了解妥协要比革命还更有利于他自己，所以过分的估量他与封建势力的冲突，以为他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便不会妥协，以为他

会因希望没收地主土地，而会放弃高利贷的封建剥削，实在是错误的。

4. 因此，党对富农的策略发生极大的动摇，或认为“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或认为“无条件的反对富农是不对的”（二中全会的总结通告），或使党的策略路线受富农态度的支配（六次大会农民决议案），甚至提出联合富农的口号（如中央对朱毛[1]的指导信），尤其错误的是因联合富农而牺牲雇农的利益（如江苏淮阳恐怕富农反革命而要雇农减低要求）。这些错误，尤其是联合富农的错误，可以妨害党领导农民斗争、完成土地革命之急迫的任务，而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

5. 现在党内托洛斯基主义与机会主义，他们对于农民的策略上也是提出反对富农的口号，但是他的观点与党的路线是绝对不同的。他们从他们抽象的认为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观点出发，因此不管事实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占优势，所以要反对富农。这是照国际来信指出现在中国农村主要的矛盾是反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的斗争，反对富农主要是因为富农是具有半封建性的观点是绝对不同的。因此他们对中农的策略就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认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因此，他们的策略是使“中农中立”。很明显的，在现在农村中，中农是一样的受军阀地主豪绅之残酷剥削与压迫的群众，他们为土地而斗争的要求是异常迫切而坚决的，所以党必须坚决的巩固与中农联合。如果采取使“中农中立”的政策，客观上就是削弱土地革命的力量，使雇农贫农陷于孤立而失败，这是极严重的错误的策略。党必须坚决的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然后才能执行正确的策略。

这一决议案必须发到下级党部，特别是农村党部去讨

论。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异常之复杂的，各级党部按照本地实际的情形，依据这一决议的总的路线决定具体的明确的策略。并须将当地的实际情形与讨论的经过及决议详细报告中央，然后中央才更能了解全国实际的情形，对各地作更具体的指导。

中　央

一九二九，八月

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2]

（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在上一次谈政治问题的信上，我们并没有说到农民问题，曾说关于农民问题需要写一封专门的信。经过一个时间，虽然我们已经有可能，经过相当的同志在口头上传达我们的意见，但我们依然觉得口头的传达是不足的，对于这种非常重要的问题，除了口头传达之外，实在还需要书面的形式。

还有一个原因使我们必要写一封专门的信，就是到现在还有某几个负指导责任的同志，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还犯有严重的错误。如像由我们最近所得关于中央工作的材料中（农民问题的通告，中央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和森与立三[3]在《布尔塞维克》上的争论等等），我们可以看见，现在党中仍然有许多同志，不能明了在现在环境中党对农民问题所应取的策略，不能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农村中之各种社会成分的农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但这些都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非常严重

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若没有正确的解决，都可以引起非常不好的结果。因此我们盼望你们很严重的再来讨论一次农民问题，同时注意到我们以下的意见。

在上一次的信上，我们分析到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便已指出了中国农村经济之正在增长的危机。帝国主义于中国之固有农产品（丝、茶等）的破坏，地主、军阀、高利贷对于农民之野蛮的剥夺，灌溉建设之绝对的没有，这些条件都逐渐的使农村经济的生产力完全破坏，以造成非常广大的饥荒。农村经济之日趋严重的危机一定要不断的更增加农村基本群众的痛苦，使他们不断的贫民化。中国的反动势力没有能力阻止这种过程，也没有能力削弱现在农村经济中的危机。很显明的，现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布满了一切封建关系的残余，这些东西阻碍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仅只有在彻底肃清各种封建残余的条件之下，才说得上农村生产力之真正的发展。同样更显明的，中国反动势力在这一方向上是不会有任何成效的。这个理由我们都很懂得。最大多数的中国资产阶级都与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及一切封建式的剥夺制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南京政府已经表示了他不能也不愿意甚至于半途的部分的去解决土地问题。

固然，南京政府现在也在预备一些农村的改良。以胡汉民为主席的委员会正在进行这一件事。但无疑义的，这些改良将要使农村基本群众的生活更为恶化。很容易的可以预想到，正在起草的新的土地税则将要使一切税务的重担都放到农村贫民（佃农及半佃农）上。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出，由政府估定价格以收买土地的提议将会成为统治阶级剥夺小自耕农之一种新的武器。无论如何，国民党土地改良的草案在帮助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上说，还不会有俄国斯托雷平之土地改良的作用，他

无论如何不会削弱农村经济的危机。假使他真的实现了，在改正土地税则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出，他只是一种使农民群众更加破产更加奴隶的工具。

对于一切稍有实际意义的土地改良，在南京政府的计划中是不能的与不愿意的。因此，他的一切改良只是在淆乱中国农村中的矛盾，但这些矛盾终是不能在现存制度之下得着解决的。一切国民党的农村政策其结果，都是对于这些绝无政治保障的农民再加一层经济上的压迫。事实上现在中国反动统治的胜利，对于农民就是加增了一切苛捐杂税以及一切新的负担（地主豪绅用以扩大武装）、军事骚扰、残酷的压迫、“清乡”等等。国民党这些实际的政策无论如何是说不上缓和经济危机的可能，在资产阶级地主掌握政权的条件之下，说不上可以缓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

农民群众之经济生活及政治地位的恶化，日趋扩大的农村经济的危机，必不可免的要加紧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一定要使农村基本群众及其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更加深刻尖锐，这就是农民运动之新的高潮的前提，这就要鼓动农民组织的发展可以很快的使广大的农民群众都革命化。这种农民运动发展的前途，已经在现在中国各省之不断的农民斗争中表现出来了。

甘肃回族的农民运动，就他所波及的范围来看，却已经表现有很大的意义。各处积极活动的有“红枪会”、“大刀会”以及其他一切宗教的秘密的团体。朱毛的游击队，虽然各方面的反动势力都尽量的向他压迫，但是他不独仍然保持着他的实力，并且最近在福建还得了相当的胜利。农民的武装斗争在其他各地也可以看见。甚至于离上海不远的地方，也看见了农民的暴动。虽然有很多的农民武装斗争是为反动分子所领导，但

这决不应当因此而减少党对于他的积极注意。相反的，对于这种争土地反地主军阀的斗争，对于这种客观上有革命意义的运动，党应当坚决的为争取其领导而斗争。

我们指出以上的这些事实，并不是说现在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了，也不是说中国农民运动特别高涨。不是的，若这样说，是不与实际情形相合的。我们指出这些事实，只是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前面仍然有非常顺利的前途，以进行广大被压迫农民群众中的工作。党应当利用这些客观的环境，以宣传自己的土地政纲，以恢复农民之革命的组织，以准备广大的革命高潮，以动员群众去反对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以揭破国民党的欺骗，指出国民党代表着地主的利益而使广大农民群众饥饿、贫困、破产。

但是假使党对于农村中之各种社会成分的农民没有建立正确的关系，则党对于夺取农民群众的工作是不会有成绩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就要提出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犯了实际的错误。对富农的策略对于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讨论过。第六次大会分析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规定无产阶级策略是联合所有的农民群众而富农不在内，因为富农在农民运动中时常表现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的作用。因此，六次大会决定无产阶级农村中之巩固的基础是贫农，中农是可靠的同盟者。在这里为什么要将富农与一般农民群众分开呢？许多中国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是仍然不能了解，仍然有人机械的去应用列宁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对农民的策略，而将富农看成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事实上列宁所规定之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的策略，对于中国也仍然是适用的。但是列宁从来没有说过联合富农。无论在

什么条件之下，联合富农是不对的。从列宁所规定的策略中，也不能做出“联合富农”的结论，在中国党的文件中都写得有联合富农。假使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条件、中国富农与俄国富农之不同的社会实质，则尤其不能做出联合富农的结论。俄国富农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前，代表着农村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与地主阶级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地主的经济势力完全建筑在封建剥夺上。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中国富农之这种社会实质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在这里，外国资本的统治自然有不少的作用。很明显的，在中国这种殖民地国家中，外国资本扶助与利用这种落后的半封建的关系使这种东西服从他的统治。外国资本阻碍着农村经济之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阻碍作用使农村中因商品货币经济而发生的阶级分化，表现着各种奇怪的形式就是由于保存着农村经济之半封建式的关系。在这里再加中国土地关系特点，使中国富农应用雇佣劳动所得利益反不如对农民群众用半封建式的剥夺。中国的富农将土地出租兼放高利贷资本，在经营自己经济的时候，不愿将资本用在改良土壤及整顿水利上，他要使自己免除军阀战争及一切破坏的责任不受饥荒的痛苦，将这些条件所造成的重担一并放在佃农群众的肩背上。农村中之过剩的人口，大多数农民没有充分的土地，使富农以及一切地主可以利用其资本与私有的土地，以施行野蛮的佃租与高利贷的掠夺。因此，进行自己的经济租取土地，努力生产而应用雇佣劳动的富农，在中国确实非常薄弱。中国富农之另一种形式便是半地主。一部分中国同志对于列宁之联合整个农民的策略，加以机会主义的解释，没有认识中国富农的特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可以使党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农民问题采取不正确

的路线。这种错误尤其在现在有更大的意义，因为现在当革命失败以后，农村中的富农分子时常公开的站在反动势力方面向反对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

无疑义的，六次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语句上并不十分明了与彻底，也给了这种不正确观点以相当的基础。在政治决议上曾说，当着这种斗争是淆乱农村中之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之基本矛盾的时候，不要加紧反对富农。这种断定之基本的意思是完全正确的，他是说在中国农村中之中心的剥夺者以及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地主与军阀，我们党的政策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原则，要握住在这一阶段中之农村的主要冲突——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冲突。正因为如此，所以六次大会在最近阶段中所提出的要求不是平分一切土地，而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但是，在政治决议上之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语句，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将其真正的意义表现出来，而反离开了原来的意义而变成了独立的口号，做成不正确的政治结论的基础。同时，可以使人在解释六次大会之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时候，以为这是因为不要摇动富农的财产，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上还有更不彻底的语句，在那里说到反对反动势力的时候说是要使富农中立，甚至于说到对于还没有消失革命可能性的富农，要吸收他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这些语句，都可以使人以机会主义的精神去了解六次大会决议以为必要联合富农。

不仅只是几个同志有这样的观点，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及文件中也可以看见，以为党应该采取联合富农的政策。例如中央给毛泽东的信上，我们看见这样的话：

“在总的策略上——反对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应当联合富农，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

在另一个地方又说：

“但是党绝不能因为在总的策略上要联合富农，便抛弃贫农对富农的阶级斗争。……”（以上两段皆见中央一九二八年十月底致湘鄂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信，《中央通讯》第三期第二集——译者注）

党的总路线明明是以贫农为基础而联合中农，在这里便以机会主义的“联合富农”来代替了他。因此使一切关于农民问题的争论（如和森及立三同志）都走到不正确的道路上。同志们不但没有改正六次大会决议上之语句上的不明了，反而在扩大这种错误，反而企图将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富农的论调给以理论上的充实（如引用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时期）。

这种错误特别在现在中国革命运动的条件之下，有非常严重的危险。在施行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农民运动正在发展的时候，在许多农民为反帝国主义一切反动势力而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在游击战争非常发展的时候，在还存在许多苏维埃区域及红军的时候，我们应当顾计，对于一般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富足的一部分，不能去促成更多的困难，应当承认在反帝国主义及反地主阶级的前面，使我们将与富农的冲突不得不放到次要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之下，“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口号是有相当的理由，因为我们一切革命的力量首先应该集中起来以打击中国革命之最严重的根本的敌人。但是，即是说这个时候，若是富农已经出来与反动势力站在一起，则所谓“不要加紧反对富农”的说法，便会做成错误策略的来源。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设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要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

民，若不对于一切剥夺与压迫的形式都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则这些任务是不能实现的。不是坚决的阶级的口号，而想扩大我们在农村贫民的政治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要我们指导广大的农村无产阶级及农村贫民之反对地主与富农之一切剥夺与压迫的斗争。

对于富农之不正确的策略，同时也就表示对贫农及雇农的策略不正确。很显明的，策略之总的路线是联合富农，则党决不能坚决的去组织农村工人，绝不能加紧他们的斗争，绝不能使这一部分无产阶级中之最落后群众能提高他的阶级认识，但这部分群众正是我们在农村中的基础。相反的，党只有坚决的防止一切关于富农问题之机会主义动摇，才能使农村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能进行争取改善自己之经济的权利的地位，才能有胜利的斗争。假使保持着联合富农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策略路线，则党必不能领导农村贫民的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缓和农村贫民群众的积极而有利于农村中的富农。

目前在全党之当前的任务，是要发展农村无产阶级运动与联合农村贫民群众。这个任务的解决，必要“不顾虑”富农，不要畏惧“他离开革命”。在现在的环境之下，当着不少的富农已经被国民党利用以压迫农民运动的时候，这种畏惧是完全不正确的。

农民群众的斗争是与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另一方面我们党在农村中的策略，是要与我们在日常经济斗争中以夺取城市无产阶级的策略相适应、相配合。绝不是一开始农民运动便直接号召施行土地革命，发动游击战争、暴动等。相反的，现在中国客观环境使党必然着重指导一切部分的小的斗争，扩大农民群众之日常的要求与斗争，反对一切的剥夺形

式，使这种斗争的政治意义更加提高。为改良雇农的劳动条件的斗争，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对新军阀战争，反对高利贷资本，特别是抗租或减租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们斗争中的环练，党只有经过这种环练才能动员最大的数百万数十万的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而走到新的农民运动的高潮。

我们所向你们介绍这种策略路线，不仅是应用于半地主式的富农，就是对于在中国比较少的这种自己进行生产的富农也是要一样的应用。对于他们，党同样不能放松了雇农的阶级斗争，无论如何不能使自己的活动受富农态度的支配，我们在行动中不能对于富农有任何的让步。即或富农还在参加反苛捐杂税及反军阀战争的运动，党对于这种富农仍然不能改变自己之一般的路线。党应当与他力争对农民群众的领导，决不要使富农有了利用群众以扩大自己利益的可能。

农村无产阶级之组织以及农村贫苦人民的联合，这是无产阶级民权革命中争取领导作用之必要条件。在雇农中间的工作，同样是要领导他们成为反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中的积极战士。雇农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不能也不应该离开了一般农民之争土地与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这里不应当忘记，虽然农村资产阶级、富农、半地主时常是中国反动势力结成同盟以压迫农民运动，但无论如何，国民党以及中国反动势力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依然是地主豪绅，这些是农村中的统治力量。因此，一方面要绝不掩饰农村无产阶级及富农之阶级之对立，不要模糊了他们这种觉悟；另一方面在雇农以及在所有农民前面，要指明农村中之最中心之剥夺者，是地主、豪绅、军阀以及站在他们上面的帝国主义，必要领导农民之部分的要求与斗争，使逐渐的觉悟到党的基本口号，同时必要解释国民党政策之反革命

的实质。

无产阶级争取实现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领导，必须要坚决的为争取中农而斗争，使中农离开资产阶级及富农的影响，要在群众前面揭破各种各色（自蒋介石的以至谭平山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反动，指出他们是违反农村大多数基本群众之实际的利益。党应当找取一切的方法以巩固与中农的联合，吸收中农到积极的反军阀及反地主的斗争中。同时党应当加强雇农中间的工作，要注意有很多的中农群众有一个时期是出卖自己劳动力（所谓季候工人）而与雇农一样。

要使农民群众绕围着党的周围，绕围着党之一切基本的及部分的口号，则必要加强农民的组织，实际上解决农民群众组织问题的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农村无产阶级之独立的组织，同时要组织革命的农民委员会以成为农民群众——首先是贫农——之革命斗争的下层机关，以反对地主、高利贷、豪绅、富农等。农民委员会不是什么上层的组织，他应当在日常的斗争中与农村的基本群众及农村无产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争取农民群众之最近的利益，要实际上成为农村中之最有力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上要集中一切农民群众之革命的精力。在这种斗争中，农民委员会引导所有的农民群众以加入革命的农民协会而巩固他们的群众基础，同时农民委员会要成为夺取在反动组织中之农民的重要工具。

我们再说到比较实际的问题我们必要指出，正确的在农村中工作的方向，需要很仔细的研究所有农村中的事实、所发生的一切过程，这些东西还有许多为党的指导所不知道，不能在理论上去研究。这种现象不能使党的指导机关更具体去指导各地机关，也不能检阅自己的决议。

另一方面，党应当用很大的注意力以培养农民运动之专门

的工作干部。照现在只是将城市中之一切没有工作的人员、智识分子送到乡村中，这是不能完成在农村中之巨大的任务的。在最近几个月内，要加紧的准备农村工作的积极分子，这是发展农民运动的实际步骤。

在最近短时间以内，党要派选能负责工作的同志去到回民暴动的区域。正在发展的回民暴动，党一点也没有注意，更说不上什么指导。在争取这些暴动的回族农民的斗争中，党首先应当认识这种运动之民族的性质。我们党对于这种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应当提出自己的政纲以及适当的斗争口号。在一切游击战争的区域，中央应当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根据六次大会的决议加强对于他们的指导。

在发展农村工作中，党的最大的任务是要组织坚强的农村支部，以及在一切农民群众组织中之坚强的党团。最后，党应当特别注意农村手工业者，使他们尽量参加农村中之一般的革命斗争。在这一切工作中，都要注意到农村妇女家庭手工业中的妇女。

在最后我们还想指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富农的意见，可能为一部分同志所曲解而做出不正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社会主义的阶段。中国党六次大会关于农村中之各个社会成分及我们对他的关系的决定，以及我们现在之反对机会主义的“联合富农”的口号，决不动摇我们对于中国之目前这个阶段的认识，决不动摇我们承认现在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矛盾（肃清农村中的封建地主，推翻外国资本的统治，推翻军阀及统一全国）还没有解决，则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性质在中国革命将来高潮之第一个时期中一定仍然存在。但同时我们必要指出，在民权阶段中之无产阶级与农村贫民的联合，及无产阶

级对整个农民之巩固的领导以及与其他条件的汇合必不可免的要促进革命转变的速度，使民权阶段可以很快的转入社会主义的阶段。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关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任务，就是我们在这封信上想特别指出的。我们不怀疑的，中央一定能注意到我们的意见，改正党在农民问题中的路线，防止在这个问题中之机会主义的动摇，加紧在农村中的实际工作，利用现在农村中之一切顺利的工作条件，而保证着在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之下，促进全国广大的农民运动的高潮。

共产主义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部

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毛泽东。

〔2〕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个文件，原载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十期。

〔3〕即蔡和森、李立三。

PDG

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陈　　毅

（一）四军的历史

1. 四军未成立以前的来源：四军由三种力量组成，一为由朱德率领之叶贺[1]残部，一为由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团（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军。叶贺军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在潮汕一带失败，三河坝一战，二十五师及九军失利，向闽赣边界撤退，由朱德率领转入广东北江。曾与范石生有一时期的合作，得范之补充不少。一九二八年一月脱离范石生到湘南，连战击溃许克祥、周澜、白崇禧所部，实力增加了两倍。是年四月湘南暴动失败，不战而安全撤退至江西宁冈与毛部会合，同行有湘南郴州、耒阳、永兴、宜章、资兴五县农军，计宜章第三师，郴州第七师，耒阳第四师，永资两县各有一独立团。毛部基础为卢德铭团。卢在八一暴动之后二日由武昌率队去九江，见张发奎业已反革命，乃中途起举，初拟沿赣边去广东与叶贺会合，继因道途梗阻乃留在湘东赣北一带，复与平浏农军会合，并由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秋收暴动失败后，毛部被迫向南移

动至宁冈，复得当时绿林（洪会）首领袁文才、王佐之帮助，乃留在井冈山附近各县游击，这是一九二七年底至次年三月间的事。到了四月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军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指挥训练的必要，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以朱为军长，毛任党代表，改编为三师，卒以枪械及人数不足乃改编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六团，取消师部由军部直接指挥。全军约万余人，枪仅二千余。

2. 四军成立以后的经过：四军成立后与反革命斗争经过极艰难的历史，可分作五段叙述。

(1) 第一时期，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七月。

这一个时期四军初初成立，内部成分复杂，训练的程度各异，加以湘赣边界贫瘠，致此庞大红军的给养非常困难，同时边界各县的群众斗争没有发动，单独军事行动无法避免，只是在茶陵、酃县、桂东、遂川、永新、莲花、宁冈七县向皆属崇山峻岭，尤以井冈山为最险要，周围约有五百余里，四军得此地势却可以休息整顿。当时决定在宁冈建立军事根据地，分兵到各县游击发动群众斗争，这一个政策非常正确。但当时湘南农军皆有归思，不十分注意执行，卒于五月底因给养困难，三十团、三十三团转回湘南，结果分散到农村中，有一部分受了损失。留在边界之四团，非常努力于对外游击及内部整顿的工作，赣军三次进攻皆被击溃，敌军团长阵亡，师长杨如轩、杨池生受伤，尤以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一战敌以两倍于我之兵力被我击溃为最有名，当时边界群众有两句联语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破江西两只羊”最能表示群众的欢迎。在赣军几次失败后，乃联合湘军举行大规模的“会剿”，吴尚八军全部于七月初入驻宁冈，我军适在永新回师应敌。湘军在宁冈一星期，

不敢驻民房屋，通通露宿，日夜被农民群众之包围袭击，恐慌万状，不得引退，我军回师，彼已连夜逃去。在此时期红军迭获胜利，边界党及群众组织皆大大发展，宁冈、永新及莲花之一部皆按人口平均分配了田地，各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边界临时苏维埃政府业已成立为当时最高指挥机关。群众武装各县成立了赤卫队，由六十名至二百名，红军武装大大扩充，有一倍以上的增加，同时在井冈山上成立了红军医院，成立了红军学校训练工农干部。按此时期为边界斗争的全盛时期。

（2）第二个时期，从七月中旬到九月。

在七月初吴尚部进攻宁冈，我军由间道回师应敌，吴逃入永新，我军恐其与赣军联合，乃以二十八、二十九两团进攻酃县、茶陵入据吴之后方，以三十一团应付赣军，三十二团守后方。攻酃茶之二十八、二十九两团迭获胜利，使吴尚不得不连夜赶回老巢。二十九团全部为湘南宜章县之农民，到酃县全体要求回湘南，二十八团则主张去遂川牵制江西敌军，两团行山道两日，非常疲劳，卒转道而入湘南。计由七月十五日由酃县、宁冈交界之十都出发，二十二日占领资兴，二十七日进攻郴州，击溃范石生部两团。是日黄昏时范部反攻，我军不及应付，黄夜撤退，二十九团大部去宜章散入农村，有一营在乐昌受了损失，二十八团及二十九团之小部取道资兴、桂东到汝城游击。中间发生第二营长袁崇全之叛变，袁率所部四连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作前卫，袁逆假传命令，日夜急行意在脱离大队往江西作土匪，或降投反军，卒因各连官兵不受欺骗胁迫，忠实于革命，自动脱离袁之羁绊，归回大队，袁只胁迫了第五连、迫击炮连逃窜，至江西崇义界。其后十日大队取道崇义回井冈山复与袁遇，第五连及迫击炮连均全部回来，袁逆只身逃去。不幸二十八团长王尔琢同志于是役不慎，惨遭毒手，为红

军干部极大损失。计袁逆叛变至各部回来，前后经过两周之转折，卒得恢复旧观，此皆官兵忠实革命出于自动，此点实一般雇佣军队所绝不能有的。

在军部率领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去湘南之后，赣敌杨池生残部八团及第六军一师联合向宁冈进攻，三十一团以一团兵力在广大群众合力之下与敌鏖战一月之久渐次引退，复于八月初湘赣联合以五团兵进攻宁冈、黄洋界，三十一团以两连兵力利用要隘鏖战一日，敌知不可犯慌忙引退。毛在失败后率兵一营至桂东与军部取得联络于九月间返至宁冈。计至由七月至九月，出发湘南部队及留边界部队均同遭失败，边界群众组织遭了不少的摧残，割据区域逐渐缩小直至井冈山下。是为四军第二时期之八月失败。

(3) 第三个时期，从十月至一月。

四军回至宁冈，二十八、三十一团损失虽不见大，但数量质量均不如前，不过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军队有相当休养，各种组织有极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亦有进步，边界群众组织亦逐渐恢复，同时又三次击溃周浑元旅，三次击溃刘士毅旅，宁冈及永新、遂川、莲花之群众赤色割据，又重新发展起来。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2]桂战争在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成为湘赣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

敌人这次进攻从十一月至一月，准备了两个多月。四军亦从十一月起积极整顿，同时彭德怀部红军第五军于十一月初由平江游击至宁冈附近与四军会合，红军声势更加浩大。红军对

于敌人“三省会剿”，决定以四军出发赣南游击向吉安一带推进，以彭德怀及袁王部留守边界，应付湘赣进攻部队，在四军至吉安附近，赣敌后方动摇必然撤退，彭、袁、王应付湘军仅有余力，此为我方之计划。再者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浓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领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时期中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二月没有一文零用钱，物质条件如此困难，官兵奋斗精神并不低减，四军的基础确于是时建立，在事实上有了考验与证明。此时期为红军四军复兴与整顿时期。

（4）第四个时期，从一月至三月。

一、出发赣南游击部队之经过：一月十四日，四军军部率二十八、三十一两团及一特务营出发赣南游击，企图击破湘赣“会剿”。一月二十八日与赣军三团战于大庾，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累积重迭于一线致失利。我军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闽粤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样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三十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但仍能一致团结奋勇直前无怨言，从未发生叛变逃跑等事，是此以足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纪录。至二月中旬（正阴历正月初一日）复与刘士毅师全部鏖战于江西宁都、瑞金交界之大柏地，从是日下午三时起相持至次日正午，始将刘部完全击溃，其团长萧致平经桓被活捉，因不认识被逃去，得械八百余支，俘虏数略

同。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此后红军由宁都至兴国、吉安、永丰交界处，得江西红军二团、四团之掩护，有一周以上之休息整顿。是时知井冈山业已失败，乃决定到闽粤交界处游击。

二、彭德怀、王佐部留守宁冈根据地，于一月二十八日敌分三路兵力各三团左右，向井冈山进迫，彭王部仅只千余枪左右，与敌相持五日夜自动引退，彭部取道赣南与朱毛会合，王部则埋伏在井冈山附近。所谓“三省会剿”，实际只是到井冈山游了一次，除红军因战略引退而外，所谓三省大兵对成千整万之赤色群众，只有一个“莫可如何”，所以不到一个礼拜即行撤退。边界区域仍然在赤色群众之掌握中，彭部至赣南于四月初与四军会合于江西雩都。在此大的斗争之后四军共存有二千余人，彭部只存有八百余人，两部共枪约二千支。

（5）第五时期，从蒋桂战争爆发到现在。

二月二十一日桂系袭长沙，酿成湖南事变，湘、粤、赣三省敌人为自己要打架，不能再向红军进攻。红军是时入闽西击溃郭凤鸣旅，郭于是役阵亡，于三月中旬入汀州，工作了两个礼拜，红军大大补充，衣履焕然一新，人员增加，款饷亦得有五万元。决定蒋桂混战中放手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以闽西赣南为游击区域，相机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群众割据。红军于三月底由闽西入赣南，游击区域及于兴国、宁都、瑞金、雩都、广昌五县。五月初蒋桂在武汉混战告一段落，赣军又向我进攻，红军乃于五月中旬第二次入闽西，正值张贞入粤讨桂，红军决定汀州、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六县游击计划，至七月初复扩大至漳平、宁洋一带直

至现在。计二次入闽，两次击溃陈国辉部，陈部实力丧三分之二，两次击溃卢新铭部，得械约两营左右。

彭德怀部在退出井冈于四月初与朱毛会合于雩都，受了使命回边界恢复群众割据，游击区域，经过北江、赣南、湘南一带，最近在赣北、湘东游击。在城口得商团械二百余，在南雄得商团械三百左右，在遂川得赣军六十八团一营械，在安福击溃赣军一次，该部实力已增加四倍左右。

（二）四军的组织及训练

1. 军队的编制

（1）军队的编制在原则上要注意武器与地势两个条件，尤其红军在游击战争时期，因为他是流动性质的，他的编制应该与普通军队不同。红军的战术原则不外“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争取群众”，但要军队的编制能恰如其分做到分散集中两面都好。红军四军此刻还没有这个经验，四军此时成了庞然大物，一切都是吃大锅饭的集体行动，分散为比较困难的问题，同时四军此时的武器以步兵为主要，游击的地区时时要不脱离边界山林区域，在流动自如的意义上，红军要通常比敌军行动快才不易受敌人包围或很快退出敌人“会剿”的范围。四军中经过几许讨论仍然一仍黄埔式军队的编制，虽然有人曾在红军教导队试验俄国红军的编制法，结果大家看了一回希奇，在实际工作上仍然只有照抄老的办法。因为上了五个单位不好指挥，每一个连单位超出了百五十人，于宿营给养就大不方便；若一连单位只五六十人，则作战、警戒就疲劳得要死，因此四军此时编制仍然为国民革命军的办法，每排三班，每班十人，每连三排，每营三连至四连，每团二营至三营，加上机炮连或

特务队。不过时常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红军需要多的徒手兵。一面红军不轻易作战，每战必有把握，因此在胜利后若没有徒手兵，缴得枪械就没有人抬；同时在经常行军，红军病兵多，一个病了若无一个徒手兵，他的枪弹就无人抬了，所以红军的兵要多于枪为好。第二，红军的非战斗兵如伕子及政治工作人才非要多不可。因为红军的任务不仅是打仗的问题，伕子多于搬运物品器械有极大的方便，政治工作人才多于发动群众训练兵士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每每红军一团人数有二千枪还不及千支，就是这个原故。但这是一般旧军官所不懂得的玄妙。

（2）四军的经济组织，可分为执行、计划、监督三部。计划筹款与全军预算及分配支取问题，原则由党的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则由各级士兵委员会负责。每月由军部军需处公布一月收入支取情形，由士委代表会审查，军需处长出席报告负答复解释之责，如有毛病则处罚负责人。执行部则军部有军需处，团部有辎重队，营连有经委会，因此四军此时的经济脱离军官的影响，做到彻底公开，于经济上最能表现红军的平等精神，红军有一副联语道“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再则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顶顶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火伕头，同时到现在“火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3）在军医方面，各团有卫生队，军部亦有一个直属卫生队，另外赣南、闽西游击边界皆特别成立红军休养所，来容纳病伤兵。不过医药与医官很感困难去解决，在十分无法时雇佣本地中医内外科也相当有功效。同时此休养所唯一的条件要四

面有群众组织及武装的拥护。在伤兵好了以后不必一定要回红军，即可由当地农协及革委分配到赤卫队工作。

（4）在军事机关人员分配方面，军部有军长、党代表两人直接处理全军日常事务，参谋长一人辅助之，外有参谋处长一人指挥参谋处工作，副官长一处理交际庶务等事，军需长一负责管理经济及计划等。军成立政治部设主任一人，秘书长一，秘书若干名，外有宣传、组织、总务等科，对内担任军队政治训练，指导士兵委员会，对外作群众运动。在一个区域群众政权机关未建立前，政治部得代行其任务，又政治部职权与军部平衡不相隶属。军部与政治部以上的权力，在此未建立最高苏维埃政权机关时，集中于党的最高委员会。在团营连设党代表，团又设政治部主任由党代表兼，因此各级党代表担任政治工作受政治部指挥。

（5）四军士兵的组织，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委会员。全连士兵大会选举五人至七人或九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一人；以全营人数按每五人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推举十一人至十三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一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十人举代表一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十七人至十九人组织团士执委，推举一人任主席；全军按每三十人或五十人举一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选举十九人至二十一人或二十三人组织军士执委，选一人为主席。军士执委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是下：一、参加军队管理。二、维持红军纪律。三、监督军队的经济。四、作群众运动。五、作士兵政治教育。此外士委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士委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置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或处理，

士委开会须由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

2. 四军的训练

一、军事训练可大别为四种方式。第一种日常操课，由参谋长或军官制定日常操课表，按日实施之，所有科目课程均一仍国民革命军之旧，没有什么改更，只是把那些摆架子的于作战无大关系的繁冗虚文去掉。大概注意传令、侦探、警戒、瞄准及野外实习，关于可以振作精神之制式教练亦相当注意。第二种于作战之后或一月之后一种结束的讲评，由军官负责报告工作经过并指出缺点与优点。第三种为实地的训练，于放哨时由官长说明放哨守则，于守卫时说明卫兵守则，一面使士兵于讲了之后照着去做，一面免掉说教式的训练的干燥无味。第四种由各级负责军官召集各级官长开军官会议，讨论训练方法或对于某种专问题的报告。

二、四军的政治训练

（一）讲演，由官长召集全体讲话，或作政治报告，或作生活批评，或作工农运动概况报告等。

（二）讲课，在军队有三日的休息，作每日必有一小时政治课，由党代表担任去讲。这个讲演比较有计划的，或定于一月讲演许多题目，这些题目是可以连贯的使士兵得到一些有系统的政治智识。

（三）早晚点名讲话与呼口号，则例每日士兵生活批评或对于明日行动之煽动宣传等。

（四）在一次游击工作，一次战斗，一次行动，经过以后的批评，要详细向士兵讲出来。

（五）军队里举行识字行动，简易的办法就是要士兵认红

军的标语，认得一个标语即将此标语包含的意义策略告诉他。

（六）参加群众大会，举行各种纪念会、追悼会、俱乐会，亦为政治教育之另一种。

（七）在士兵委会内，将士兵编成若干小组，小组会上有各种报告及工作批评，亦为训练的方法之一。

3. 四军士兵之生活状况

（一）被服方面，在今年三月以前非常吃苦，浓冬尚穿单衣，在到汀州以后每人缝了两套新衣，鞋袜草鞋军帽均已解决，所以近来军队表面非常整齐。

（二）驻军方面，士委有卫生部管理宿营的卫生事宜、饮食清洁、便所扫除，卧处整理等。

（三）给养方面，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一角五分，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或有农会赠的时候常常有剩余，可以分得伙食尾子，若没有帮助的时候，则尝感觉太清淡了。红军废除了发饷制度，经济公开余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四元至五元零用费，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竟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

（四）士委内有娱乐科，仅于纪念日，或每月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红军纪念会，有演说，有新剧，有京广团，有双簧，有女同志跳舞，有魔术，这些多能引起士兵的快乐。

4. 四军的军纪

四军军纪可以分为下列数项：

（一）战时纪律：临阵退却，畏缩不前，违抗命令等，可由军官就地枪决。

（二）一般纪律：通敌，叛反，拐枪潜逃，开小差，强奸，乱烧乱杀，敲诈人民财物，均处死刑。赌博则没收其所有金钱

并决定一月内不发零用费，嫖妓则处以夜不归营之罪，因嫖妓而滋事者量其大小或处死刑或罚勤务或打屁股或手心，其余比较细小之错误则按其轻重处罚之。

（三）红军三大纪律，各种纪律宣布之后多而复杂，士兵每每弄不清楚，又特别归纳为三大纪律：

A. 不准乱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

B. 打土豪要归公。

C. 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这三条纪律是一个原则，但包括了一切，所以现在红军士兵每每都要抬出这三条来批评他不愿的人。他自己犯了处罚他也就没有话说。

（三）四军的游击工作

四军出发达到某一定地点，即估量敌人并斟酌地方革命群众需要，决定五日至七日或十日以至于一月的游击计划，计划定了以后即分兵四面出动。在数县范围内经常以每一个纵队（团）为单位，在一县范围内则以一支队（营）或一连为单位出发游击，指挥地点通常在县城或出发部队之中心。在一期游击工作完毕以后，则开始第二期游击工作，或向前推进，或向四方延伸，均由指挥机关斟酌情形定之。如任何方面发现敌人，游击队一日夜即可集中，在部队未集中前，各游击部队不得轻易与敌人冲突。至各游击部队之工作通常为下列各种：

1. 调查工作：游击部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因为红军行动如行云流水一般，所到之地，皆不明情形，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必不能切合当地群众需要。

比如红军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这样写的时候很少，因为太空洞而不具体，我们必需先调查当地某几个人是群众最恨的，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就要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等，这个口号无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识。关于调查的内容，由政治部制订一个极详细的调查表，内分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情况、当地经济生活工价物价等，当地土地分配情形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比较，及土地百分比之分配，以及当地特殊产品等，其次对当地情形观察，交通河流之测量，此关于军事上极需要，这大概是调查工作之内容。这个工作是一个极有趣味的工作，一般同志做起来感觉麻烦。红军经过一时期表册便堆积起来，政治部工作人员缺乏，无人整理，每致散失，却是一个遗憾。但是他的好处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

2. 宣传工作：红军在成立初期对宣传工作仍沿国民革命军旧习，把宣传工作认为是某一部分人的事，尤其感觉军队是打仗的，宣传是卖假膏药，是讨厌的，这自然是表示士兵对于国民党的不兑现之口号的一种强烈的反抗。红军在经过许多斗争，觉得宣传工作太差，每每红军经过某地只是少少的几张标语，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许多把红军当着土匪打。红军为解决这困难，宣传才逐渐进了步。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部、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此五人分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凡红军所到过的地方，行军时经过的乡村酒店茶店，或大市镇均须手持红旗，及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到了城市更须全体出发在大街小巷或商店作个别宣传，或按户宣传，半日的时间必须召集一个群众大会，群众为了懂得红军这

个怪物及朱毛的仪容，常常是普遍的跑来参加大会的。其外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写字要正楷，以愈大愈好，要用梯子写得高，使反动派不能随便涂抹。达到一个城市，各连的宣传员由政治部或党代表分配宣传区域，并派人巡视，以观勤惰。各连写的标语有暗记，不怕冒功或混淆，写错了亦易查出予以处罚。因此红军达到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同时宣传员还负责破坏反动宣传品如国民党标语、总理遗嘱等。许多地方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

3. 组织工作：红军达到比较工农发展地方则助其组织发展，或参加他们的会议，为他们纠正过去错误及目前工作计划，在未有组织地方，则从宣传工作中物色群众中进步分子，大概注意下列对象：

(1) 与土豪有仇恨的。

(2) 极贫苦的。

(3) 在叶贺军队当兵的。

(4) 由外地农协失败来此避难的。

(5) 以前参加革命斗争的。

(6) 与邻县工农会有关系的。

把上列的人请到政治部用茶酒招待，作一详尽之宣传，征求他们同意，如愿意组织则成立临时革委或工农会筹备处，举出人负责。一面派人为红军作侦探，一面要他们报告土劣姓名，或引路去打，红军得帮助十元以内之办公费。红军去后要他们继续有报告来，如果报告能来，则此种组织是可靠的，该地即有组织的初步了，同时要把一些负责人的姓名住址形象记下来，送到邻近有组织的区域，叫他们派人来接受，这个方法

可于半日内收效，有许多白色地方用这个速成法收了效验。许多同志反对这个办法，以为不可靠，或者工作上特别慎重选择，其实这个意见是不对，我们把他当着一个特别的宣传工作，日后有效无效可以不必去顾虑的。

4. 筹款工作：红军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出在豪绅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叨光敌人输送一部分来。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

（1）城市筹款：红军在城市在扶助工商业发展之条件下不举行经济的没收，只是召集商人代表（拒绝与商会接头）参加当地革命同志或机关的意见，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需依照累进的办法，对于千元以下商店不筹款，如发现包办或强迫或不公平等事，得由被损害人用书面及当面告发，再去查明处罚。这个办法十分得着商人拥护，商人每每出很少而红军的购买力超过了许多，于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同时红军买卖公平是任何军队及不上的，所以商人十分欢迎。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

（2）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数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解决。

（3）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

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尝尝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

（4）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一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的百分比例奖励他们，他们很踊跃来帮助红军。

（5）欢送俘虏：在与敌人作战得许多俘虏兵，则公开征求同意，如他们愿在红军则马上补名字，如不愿在红军则开欢送会每人发一二元旅费，由士兵代表致欢送词，希望他们觉悟归田去打土豪，不用再当兵，不要再来打工农和红军。敌人的伤兵则上好药发了钱派人宣传，又请他带了大批传单，雇农友抬到敌人区域附近去。敌人得着大批俘虏伤兵回去，只有气得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蒙红军不杀之恩，深深觉得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他自己的军队，跑了回去必然要交头接耳谈红军如何如何好，反动军官诬蔑红军共产党的宣传不攻自破，这是一个兵运的好方式之一。此外对于土豪的走狗，如许多农民为了拥护家族，出头来反对分谷，分财物，一经捉获又不能枪毙，又不好释放，因枪毙了他的罪不致死而且引起不好影响，若释放则他分明是一个反革命的行动如何能放他，不得已才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召集一个群众大会，由他请几个保人，红军代表宣布他的不是处，但说明他是没有阶级觉悟受了土劣欺骗可以不杀他，望他改悔，再由保人及本人向群众说明他是犯了错误，愿以后改过，如此当群众释放可以得一个很大的宣传。

（6）红军的游击战术问题：四军的战术从斗争中有许多进步，但只限于大规模的军事游击行动，对于小部队游击的经验比较要少。兹分述如下：

一、关于行军的，在前卫之前四五里或前卫之后四五里，均须派遣便衣短枪侦探，以防敌之意外袭击或无益之冲突。

二、关于驻军的，每日对敌人方面必派遣一连或一排以上之武装游击队，作三十里左右之侦探及宣传工作，若发现敌人，该队一面抵抗，一面飞报，使我军能准备应付或撤退，不致打不必要打的仗。

三、红军不攻坚。若土豪跑到炮楼里去了，或敌人闭城固守，或据险抵抗，红军绝不去攻击他，因为：（一）攻坚费时日；（二）攻坚我之损失必数倍于敌；（三）在游击中我军炮兵是不能健全的；（四）若轻易攻坚，一个时期急切难下，四面的敌人很易从四面包围拢来。关于此点指挥官务要有决心，不要轻易凭气愤去乱干一下。

四、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大敌前来，我不能与之作战，则利用打圈子的办法向没有敌人的地方跑，我军须要走得路使敌人赶不上，同时经过地方要有群众及党的组织，才有人担负前后侦探工作，不致受敌人前后夹击。

五、在没有党及群众组织的地方，不轻易作战。有党有群众的地方，我军有极大扶助，如运输救护扰敌侦探等，敌人处于孤立地位，与之作战比较有胜利的把握，即不幸失败亦有法收容。

六、不明敌情绝不作战。红军驻在某处忽然发现敌人，不知敌人多少，或从何处来，则绝不应战，千万撤退数十里，十分接近只好派掩护队，因为敌人敢向我进攻，他是有计划的，我们不要轻易去如他所愿而上当。如果敌大我退自然我占便宜，如果敌小我退不过有点疲劳，再去打不迟。

七、单纯军队的袭击。探知敌距我有百里以外，我军轻装尽一夜功夫跑到，出敌不意而歼灭之。

八、用群众封锁的袭击。在敌人接近我时，我方有群众的组织四面断绝敌人交通，使敌人不知道我军已在其附近，然后

利用拂晓将其击溃。

九、用群众扰乱。红军以主力解决敌人，在作战时，分一部红军，以一排为单位，每一排领导三四百工农勇敢分子，多打红旗占领四面山头，利用工农的武器土炮、刀矛、喇叭，利用满山遍野群众打吆喝去扰乱敌人，然后红军以全力出其不意，从侧面击溃之。或用赤卫队日夜打冷枪，或埋伏在山林中瞄准打大旗左右的指挥官，先使敌人恐慌疲倦，然后用生力军袭击之。

十、在后有追兵、前有阻挡部队的时候，或追兵过于强硬的时候，为了脱离敌人，可以一部队伍距敌四五里引其走大道，大队则取间道脱离敌人，或猛出敌后而袭击之。或用农民在另一路上划路标，贴标语，以引诱敌人去穷追，我军从小道冲出。

十一、不打硬仗，不能十分有把握的仗就不打。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这是一句好话，尤其红军干部补充困难，子弹不易，打了胜仗不能得械枪，在红军战术上均是失败。

十二、敌人若进攻我的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劫其后方，此为围魏救赵之老办法，红军尝用有效。

十三、我要攻击某处，不直接前去，偏偏走傍一个方向，到了中途忽然打转，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击溃敌人。

十四、敌人急急追来，择一个好地形，埋伏得好好的，俟敌一来一网打尽。

上面十四条，有的为旧式战术所无，有的为旧式战术所本有，但均为四军的法宝，故一并录出。

（四）四军的近状

1. 目前的游击区域：本年五月二十日左右红军击溃陈国辉部两营，占领龙岩，五月底进占永定，陈国辉全部由粤撤回，红军往连城游击，复于六月十九进攻龙岩，陈部五营三营完全缴械，陈仅以身免，其余两营因未在龙岩幸而得免。红军因此即决定闽西——龙岩、永定、连城、上杭、汀州、武平六县游击计划。龙岩城由六月起迄在红军手中，至近日始放弃，永定自本年四月起直至现在始放弃，上杭全县均有群众暴动，汀州武平有一部分有公开斗争，连城南部全为赤色区域，宁洋漳平红军派部队前往游击。在目前之闽西游击计划，积极准备反动派“三省会剿”之到来。如三省合兵进攻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转入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入闽省腹地到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上面三个方式视敌人逼进之情况大明时才作决定。

2. 四军的实力：四军现分一二三纵队，此项为基干部队，每纵队分两个支队外加直属机炮连及一特务队。一纵队可当反军一团战斗力过之，人数在一千六百人左右，枪八百至九百，手枪排长以上军官均有一支，手机关每纵队有两挺，每纵队有机关枪两挺、迫击炮两挺合组机炮连，四军子弹不甚充足，因经常没有接济。另属于四军所指挥之彭德怀部，江西红军二四团当另有报告说明之。

3. 四军官兵夫的成分：

（1）历史的：叶贺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分子，现在还在当士兵者为所极少，以官兵夫合计，此项人数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湘南农军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四，历次俘虏敌方士

兵所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左右，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约占十分之二。

(2) 籍贯的：湘南人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五，闽赣人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其余十分之三则为其他各省人。

(3) 年龄的：少年（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六，壮年的（二十五至四十岁左右）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三，老幼（十六岁以下，四十岁以上）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一。

(4) 战斗兵与非战斗兵之比例：战斗兵约为全军人数十分之六，余为官佐夫役等。

（五）结　论

把四军一般状况详述之后，还有把它的优点和缺点指出作为一个结论，以补足上面的不足处。

1. 优点：

红军与普通军队大概从四方面去区分：(1) 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为自己本阶级利益而战，没有雇佣性质；(2) 红军是工农阶级的学校，官长尽是提高士兵各种文化智识，不像旁的军队以严刑峻法，把士兵造成一个好管理的奴隶；(3) 红军各部分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是弟兄一般关系，非常欢爱，不会像反动军队之不能团结，发生互相厮杀等事；(4) 红军是由工农斗争中产出，不能脱离工农群众。在上面四点红军四军渐做到了。如雇佣性：四军在过去困难当中能继续奋斗，实由于士兵自知当兵是为的自己及工农大众，不是为的饷银而当兵，尤其伤兵同志在困苦万分，没有抱怨或恃功骄傲等事。如红军的学校化：此刻因在流动时期及教练人才缺乏没有做得十分好，但较之反动军队，士兵的政治认识文化程度都要高些，在

四军各团营士兵内是非常团结彼此相依为命的，尤其是恶劣的政治环境及斗争历史更坚决了他们的团结。其次如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四军在过去经验上使每个士兵都知道本地工农的帮助的重要，达到某一地方每个士兵能自动向群众宣传与之发生亲密的关系，压迫工农是红军最重的犯罪。

2. 缺点：

（1）造成党军的错误倾向。

（2）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时常发生职权上的纠纷。

（3）士兵委员会的运用不好，有时超出士委职权的范围，有时又不发生作用，等于空头机关。

（4）因经常在行动期中伤病兵安插非常困难，安置在农民群众中医药仍然没有妥善办法，相当影响战斗力。

（5）集团军队的力量虽能驱逐较大的敌人，但养成了群众依赖红军的心理，忽视本身的力量。

（6）经常受敌人封锁，对政治消息及各地革命实况隔离，以致红军中人常常有囿于一隅的观察，进步比较困难。

（7）经常与敌人冲突，干部感觉着补充的困难。

（8）红军士兵来源多半出于招募及改编敌兵，因此军队只能集团行动，竖极大目标引起敌人围攻，而不能做到化整个为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2〕指蒋介石。

PDG

关于朱毛红军党务概况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陈　　毅

Ⅰ.党的历史

1. 四军未成立前，毛[1]部由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指挥，湖南特委令其改组一师二委，朱[2]部为一师委，湘南农军为各县委。是时各部队连上成立支部，营无营委只设直属小组，在营单独时颇感不便。同时军队受特委指挥，每每为地方主义所囿，不得不打硬仗，受不必须的损失。这时党在军队中不能起领导作用，军权高于党权。同时士兵同志没有提拔起参加指导机关。

2. 在四军成立以后，军一级设军委，受边界特委指挥，有一时期四军军委即为边界特军委。团设团委，营设营委，连设支部，排班设小组，军部设特支。队伍出发游击，组织行动委员会，参加地方党部负责人组成之，同时公开可以命令指挥当地群众机关，行委成了一又是党又是群众机关的一种权力组织。

3. 在去年十一月，中央六月来信，要在军队中成立前委，指定朱毛及地方党部书记并工农分子各一成立前委。四军执行这个命令，由边界特委及军中同志共三十余人开特委扩大会

（因是时四军受特委指挥）成立前委，选了九个人成立前委会，同时四军成立前军委。因此前委在当时指挥三个机关：一，前军委；二，边界特委；三，工农运动委员会。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了毛病，就是机关太多，人员分配不过，颇影响各级党部之活动。

4. 四军出发赣南，前委在事实上随军走，所以只能管军队，至多达到某地作一点巡视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军队每日行动均须决定，因此觉得军委、前委发生重复，遂将军委停止职权，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颇觉便利敏捷，同时前委权力超过特委，军队行动脱离了地方主义的束缚。这个状况一直继续到现在。

这一段党的历史经过觉得有几点特别重要：

1. 军队党的负责机关人数宜多。因为军队是集中的，开会容易，同时军队党的决定可以影响军队的生活如休息给养等，负责机关人数过少，便不能很快的明白每日士兵的情绪。因此军各级党部执委均在十几个人以上，有时扩大到二十余人。

2. 营委问题，以前没有营委，不但在单独一营行动感觉困难，平时的训练给养之管理也感着困难，所以成立了营委，至现在已成为不能废除的了。

3. 在没有较大的苏维埃割据足以容纳四军时，四军不经常如行云流水般活动，不能解决他的许多问题，如避免与敌人冲突及自身给养等。则在此无苏维埃政府的指挥时期，红军的指挥，只能直接受命于党，纵然成立一个革委会，实际仍然是党的直接指挥，因为军队行动于开会后即要行动，有时连开会也来不及，多设机关，命令要经过周折是不利于游击行动，只交给军官指挥，则一个人的处置常常要错的，因此四军在经过

许多讨论后，仍然觉得现在的指导方式是很方便于斗争的。在最近到了闽西，决定成立军部党团，意在把一些行政事务交给处理，以减少前委对日常事务的应付，这个办法行起没有什么成效，……总之党在四军指导的方式是如此，当然会有党公开指挥军队，造成党军、党的政府等毛病，但此问题在前委没有好方法来更正。

4. 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前委为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特考查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可以有四个方式：一个，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平等（结发夫妻式），结果天天要吵嘴。二，把政治工作人员权力只限于政治训练，这样军官权力过大，政治人员会变成姨太太。三，照江西红军二四团的办法，军官须听命于政治工作人员，这样成了父子式了。四，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但这要许多人才了。

5. 党的训练，在四军成着困难，须是材料收集与训练负责人员之缺乏，同时军队的习惯是一个命令服从，所以一般党员群众特别呆板而不活泼，党内生活之机械化是常犯的毛病。

6. 连上成立支部的作用非常大，因每一连可以担任一方面的任务，一个支部恰可以应付这个任务。连支部的精神，在“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上，四军党的基础在连支部上面，军队力量也寄托在上面。

Ⅱ. 党的近况

1. 数量：四军一二三纵队为四军基干，常常不分离的，计一纵队一千六百人，二纵队一千五百人，三纵队一千五百

人，军部、政治部、特务营、军需处约共九百人左右，全军计五千四百人左右，党员有一千四百人（据六月底统计）。

2. 成分：官长同志约占十分之三，兵夫约十分之七，手工业工人占十分之二，学商占十分之一，军队中产业工人成分极其低微。

3. 组织系统

a. 前委——纵委——营委——支部——小组。

b. 党的机关，纵委前委均分设宣传、组织、青年三科，士委会各级设有党团。

4. 干部机关人员成分的分配，通常士兵同志皆须参加干部指导机关，其比例为三分之一，譬如前委现有十三个委员，士兵分子占了五个，前委常委五人，士兵分子占了两个，皆有相当用。士兵分子参加指导机关，在前委尚在初期的扶助中，并不能十分尽领导作用。不过士兵在各种会议上常有两种表现，一是随时提士兵利益，一是对付敌人随时是主战论者，不主张退让避免的。

5. 各级党部之书记，通常由上级委派，下级大会选举亦可，但须得上级党部的批准。在以前各级书记均由党代表兼，现在业已渐渐改变，书记可由军官士兵兼。

6. 现在四军党的一般表现：

(1) 右倾的危险。

这种右倾的危险的产生由于下列的原因：a. 干部指导机关尚在知识分子手中，四军党的士兵基础薄弱。b. 党员政治水平不高，怀疑反动政局是一个崩溃的前途。c. 改良主义的宣传相当的影响到四军内。d. 在四军本身因长期斗争的疲劳，每日生活刻板式的，是一些行军宿营作战等，在工作上感着无味，使他们别寻消遣，有享乐主义的倾向。e. 敌人的“围剿”

在宣传上闹得慌，在行动上使四军感着应付的困难，自然要使一部分人动摇。f. 许多同志无法脱离军队，自己又因受伤毁坏了身体某一部之健全，日趋消极悲观，常常长吁短叹，影响到他左近的工作的人。

（2）极端民主化。

四军是由国民革命军改造而来，在初期一般官兵同志，皆十足的盲目服从上级，渐渐由党的在下层的发动，一般官兵同志渐渐能够讲话发表意见，到最近又犯了极端民主化的毛病，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军事机关的命令也常有托故不执行的毛病。

（3）小团体主义。

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南昌出发（朱部）的资格在军队中是有相当的尊重的，尤其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益，如枪弹人员之类则主张自己要多，如担任勤务则主张自己要少一点。尤其各连还有同乡关系，广东人、湖南人、北方老乡，他们总是情投意合，分外不同，遇有病痛，以这一类人为最能帮忙自己的。

（4）取消或缩小红军的观念。

因政治的分析错误，认定反动政局是稳定的，当然会怀疑红军是否能够存在的，又见大的部队斗争日趋激烈，则主张缩小红军，以为缩小了就可以和缓敌的进攻。这些观念其骨子里面是无坚决斗争的勇气，四军党中有一部分具有这一类的思想。

Ⅲ．党的前后政策

1．以江西宁冈为中心向南向北的游击问题

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四军各部会合于江西宁冈，成立了四军，并有军委，但党内不统一，军队各自为政。袁王[3]为保存自己的老巢，很不愿朱部及湘南农军这样多人在宁冈，使他目标大惹下大祸，主张四军到赣南去。毛部颇有自了之心，看见朱部及农军那样混乱，不愿意合伙，主张他们自己到平浏（回北游击），朱部及农军（向南游击）到赣南，军委则随朱部出发。朱部及农军尚一致主张到赣南，因为宁冈没有饭吃，实在不满意袁王及毛部的态度。军委明知这分家政策是不对，因为四军在此时初初成立，应该整顿，到平浏及赣南皆属单独的军事行动，尤其军队未整顿到处要引起许多坏的影响，更应该顾虑，若说经济问题困难，事实上四军在宁冈一年多亦终有办法。当时的分南分北的政策大部建筑在各部的私利上，尤以袁王的自私、毛部的自了不管，引起朱部及农军不满。这个政策决定后并未实行，因为一二日后朱部二十八团即击溃江西敌人两团，占领了永新，经济问题得了解决，大家又合伙起来。

2．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

为了整顿红军，须要一个根据地；为了执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游击战争，红军须要帮助地方斗争。在江西宁冈为湘赣交界区域，距两省会皆远，在交通上及政治派别上，湘赣敌人对我“会剿”不易实现，红军在井冈附近八县工作是可以应付敌人。同时边界各县党至少有一些影响，许多地方过去有过农民斗争，主张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建立一个群众政权，训练庞大红军，发展各县群众斗争，向四周推进。这个政策在当

时（四月至七月）在党内没有反对，虽然有一二人主张下去要打南昌，这个投机的办法，毫无问题被党内拒绝了。

3. 五月初送湘南农军三十团、三十二团四千人左右回湘南

这个问题是军委常委会决定的。湘南各县委要求要回去，军委乐得送他们走，以减省他们在宁冈的各种困难（如给养问题、纪律问题）。军委常委是嫌红军人数太多没有办法整理，看见他们要走便让他们走，以致他们回去大部受了损失，红军日后没有人补充。这个举动引起党内极严重之批评。

4. 七月出发湘南问题

在五月至七月边界割据日益扩大，敌人进攻日益剧烈，红军的精英至少有了三分之一的损失，这个时候党内有两种主张是对立的。

第一派主张继续在边界斗争，边界的割据是可以扩大的，红军只有在这割据里可以保存，离开边界就有消灭的危险。尤其在七月间谷子黄的时候，红军为使农民割禾不能他去。

第二派主张，敌人进攻是没有止境的，红军屡次作战杀人三千自损八百，此时边界割据用红军去打出来，结果红军必为边界而趋于消灭。红军消灭了，边界亦同归于尽，所以红军应该脱离边界，到别处去游击。

第一派在军事行动上主张推进不脱离根据地。第二派在军事行动上是主张不要根据地，流动的办法。

第一派主张红军应该为边界割据奋斗。第二派主张红军应该是游击的，不能为某一地域死守。

这两个主张还没有达到大的争辩，省委命四军到湘南的指示到来，结果四军二十八、二十九两团终于去湘南，弄得边

界、湘南方面都大大失败，红军损失了一团基本势力。边界各县的农民不能割禾，让土豪弄了去。这显然是到湘南的政策从事实上证明是不对的。

从这件历史事件里面包含了几个重要问题：

一、红军与其根据地问题。

二、红军与群众割据问题。

就现在四军经验看来，在有一团力量以上的红军，实在是须要一个根据地，来作收容伤病兵，修理枪械，有储辎重，短期休养地，办理各方面交通等事。若没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许多实际问题实在不能解决。不过这个根据地的条件，不一定像井冈山那样天生险峻，主要的是有党及群众的组织，肃反的工作有了成效，兼有相当的地势就可以了。红军对于这个根据地不一定要死守，他的保存应该交给地方的群众，红军已不在此死守竖立大的目标，自然可以转移敌人的视线，则这个根据地是可以作为永久的。

红军与群众割据。群众割据应该出于群众的需要，千万不能凭红军的力量，用打天下的本领打出一个割据来。红军的割据与群众的割据不同，红军的割据单独用军事力量去占领一个地盘，在红军割据下的群众震于红军的声威，成了红军的老百姓，这个割据非常不可靠。群众的割据出于群众自身的要求，群众武装起来驱逐他的敌人，自行管理区域的大小事件，这样的割据，敌人是不能消灭的。边界的割据在初期的发展（四月起）至后期失败（十二月彭德怀即退出井冈山）大半都是红军的割据，以实力造成，红军大半用的是染红的政策，而不是用说服宣传的态度，使他们自己红起来的，因此在边界赤白斗争中农民反水常常见到的。当时主张红军驻边界的一派，实含有硬打到底的意见。主张脱离宁冈的一派，实在是站在保存红军

实力不顾地方需要的偏见，所以造成去湘南的错误。当时应该在边界斗争，使边界群众割了谷子，使他们真正得了分土地的利益，就是把土地革命深入，使他们得了谷子，然后分兵到湘东去游击。一面不脱离宁冈，红军是向前发展的形势，一面可避免在宁冈一带的硬打；一面红军到湘东游击，平浏群众起来对南昌长沙都是威胁，边界的割据自然可以保存，同时在萍乡平江工农有数千人可以到红军来。

5. 一月出发赣南问题

湘赣粤三省企图联合向红军进攻，国民政府以二三月的准备，调大兵二十四团限三月内肃清井冈山，这样大的声势，红军的应付有下列的意见：

第一派以守为攻说：积极准备边界八县群众的力量，凭借井冈天险，引敌人到山下来攻，俟其疲敝，然后由红军及群众夹击消灭敌人。

第二派死守主义：在军事观点上断定井冈天险敌人不能攻破。在政治分析上，决定在三全大会敌人破裂可期（蒋桂战争），因此主张红军死守井冈，准备两月时期即可得最后胜算。

第三派抛弃边界说：红军应打圈子，到别处另图发展，不要在边界死守，红军一去敌人也要退去，如此才能保存边界党及群众组织。

前委最后决定，以为第一派的意见所谓夹击，实在把群众的力量太估量得大了，结果是夹攻不成，红军陷在重围中无出路。第二红军在此奋斗，即在保存群众革命以后所得的各种利益，并不是一定要这座井冈荒山，若让敌人深入边界各腹地把群众的利益一切打毁，甚至迫群众反水，则不待敌人打井冈而我们已大大失败。所以第一派的主张是一个红军死守根据地的主义，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在战术上又空想群众能夹击二十四

团的大敌，是不对的。

第二派死守主义之不对在战略上是讲不通的。战略上只有死守待援，若无援可待而主张守，只是守死而不是死守。因为有外援，守者预定一月、二月、三月、四月，援兵一到即可成功，有一个希望才能坚固死守决心。在井冈死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怎能坚固军心。期望蒋桂战争爆发，来解井冈之围，这当然是一个毫无把握的事。

第三派抛弃边界说，是忽略了红军与群众不可分离的关系，红军脱离群众走到白色地方受敌人包围更易消灭。群众在敌人进攻看着红军逃脱，一定失望要怨恨红军，结果于红军群众都有损失，所以第三派是红军自了、脱离群众的意见。

前委以为死守主义、硬拼主义、自了主义都是不对的，乃决定：

一、我们对敌人要取积极的进攻态度，一切保守、死守、脱逃、悲观、最后一拼的办法都不对，都足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失败的地位。在政治上经济上我们断定敌人的崩溃，反动政局的混乱，加上红军内部团结及群众拥护，边界地形险要，我们可以对付敌人，至少敌人不消灭我们。

二、我们的战略是要打破敌人的“会剿”，敌人二十四团，不能每一团都到边界来，计算他除了担任其他任务外，实际只能以十二团兵力到前线来，这个数目与六月湘赣合兵进攻是一样大的，并不是什么了不得。同时在敌人方面虽然“会剿”却包含了许多冲突，剿共的主力仍然是江西不是湖南。

三、决定以三分之一兵力加上边界群众总动员应付边界四周敌人的进攻力量，以三分之二（我军的主力）的兵力出间道以迅速手段占领江西敌人后方，乘虚而入，使江西军队回兵救

援，则此次敌人之“会剿”计划可以打破了。

这个政策的决定，前后各级党部讨论约经过一月的时间。

6. 四军的分兵问题

在出发赣南以后（本年一月至三月），四军四战皆北，强大敌人穷追不息，同时在所到各地闽赣粤边界一带群众组织非常薄弱，红军感觉异常困难，尤其大的军队（三千人左右）行动颇不方便，给养大感困难，四军党内起了争论。

第一种主张，此时四军应分为两部分，以团为单位，各路自行去图生存，以避免敌的追击。一面行动快，敌人追不上我们，一面人少给养容易，可以恢复红军纪律，一面减少了目标。

第二种主张，此时四军应该集中。一面是政治局面要开展，敌人的进攻不会再有时间延长。一面集中起来可以最后一战，分散要各个击破。一面分散以后联络困难，士兵胆子更小，更动摇。

这两种主张，第一步是分了兵，把四军改成两部分（二月间事），第二步是朱部在前面走，毛部跟着来依依不舍，所终没有分开。

7. 决定一年内夺取江西问题

在本年四月，蒋桂战争爆发，四军是期由闽西推进至赣南兴国、宁都、赣县、信丰等县，群众斗争大大的发展，同时赣南、宁冈井冈山一带四县有群众割据及红军组织，赣北德安一带亦有红军活动，赣东有方志敏部，赣南则有红军二四团。前委根据江西省红军分布状况，决定一年内将这些红军努力联系起来，将赤色努力扩大起来，如果军阀混战延长，则一年内有夺取江西的可能。这个决定是前委对江西工作的一个意见，主要的是要把江西四个赤色势力联系起来，向夺取江西的目标去

进行。这个决定写成决议案没有什么人反对。当时是一前委扩大会，赣南特委及某几个县委有代表参加。虽然有同志觉得这个决定太乐观太空洞，太不估量主观客观情势是否可能，但觉得江西党天然是一个夺取江西的任务，则这个决定也是可以的。

8. 蒋桂战争的爆发前委的政策

红军三月间到了汀州，知道蒋桂冲突必然要演成混战，此时有两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四军马上布置于南昌、吉安之间，接近战区，以便夺取敌军辎重，并且使蒋派失败，好改编他的队伍，不如此错过了机会，在他们混战中我们得不了什么是很可惜。

第二种主张，则以为蒋桂战争是中国反动政局崩溃的第一幕，这一个崩溃，在客观上可以帮助革命势力的恢复与发展，但不能估量太过，认他为是一个全国工农夺取政权的时期。在此时期工作，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发动群众斗争，揭穿国民党的黑幕，号召群众起来，以组织的力量争本身利益，并反对军阀混战。红军应在这个目的下进行工作。所谓接近战区，是一个单纯军事阴谋，至多不过得些枪械。在敌人大的集团军事行动，不见得我们的部队就会有左右他们战局的能力，尤其在两个军阀混战的当儿，我们不能有帮助一个敌人来打倒一个敌人的昏想，这个思想是机会主义的遗留，最足混乱我们阶级的政治立场。

前委通过了第二种主张，决定以闽西、赣南、湘赣边界三地为游击区域，放手分兵游击，争取广大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号召群众的反军阀混战，组织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9. 闽西七县游击问题

五月四军到闽西，张贞、陈国辉大部入粤讨桂，此时四军有三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此时利用两广战争入东江消灭张贞，造成东江割据，趁蒋桂决斗而渐扩大割据于全粤境。

第二种主张，打漳州使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

第三种主张，此时入粤消灭张贞是不十分有把握的事，长途行军之后恐怕政局一变，红军会感着进退两难，因为我们对于东江的情形完全不明了，于东江的党没有交通。打漳州是一个军事冒险，因漳州敌有一旅人，攻城一项，红军无健全炮兵是无把握，就攻下漳州，三天以后必要退出，敌人由广东回军，我必陷于绝境。

前委主张红军在闽西七县游击，一面整顿红军，一面帮助闽西党之改造，一面发动七县群众斗争，定两个月工作计划，无论蒋桂两方胜利如何，我们有了七县广大群众可以应付。在红军从一月至五月皆在长途奔波中，应该有相当休息。

以上是前委关于应付政治军事局面的决定。关于其他各方面的办法择主要者叙述如下：

A. 武装地方的与武装工农问题

红军在胜敌以后得着许多枪械，对于此项分配也有两方面的意见：

第一种主张，这些枪械来扩充红军，红军壮大才能应敌。交给地方，农民又不能打仗，存在困难。

第二种主张，以红军此时不再需要成立一团、一营，应该交给地方赤卫队，赤卫队加多即是红军的壮大。

前委决定，第一种是单纯的军事观点，第二种是把赤卫队与红军的性质分不清，而且有取消红军的倾向。前委以为红军

与赤卫队之武装应该同等重视，在群众有觉悟毫无武装的时候，红军应设法多发枪械给他们；在有几县以上的赤卫队、群众武器多的地方应该成立红军一营至一团，打破群众自私自利的地域界限，创造强有力的超地方性的红军。但不是朱毛改编赤卫队，把他们带着走。

B. 经济政策

一、在农村中没收豪绅财物分给贫苦工农，勒款以供给红军给养。

二、保护城市乡镇中小商人，对之筹款，公买公卖。

三、对城市大商店举行累进法的筹款，不没收他们的东西。

四、实行免除苛捐杂税。

五、对城市的商店（反革命的）亦不主张没收，根据下列理由：

（1）没收他们的，城市中小商人不愿意，一面是扰乱了市面，一面是他们与之有经济的往来。

（2）没收了他们的，得不着实际利益并不能打击他们，得来的东西零碎不成整，不好分配，分配给城市贫民亦不十分需要。

（3）没收一家商店，其余恐慌，红军筹款发生问题。

（4）没收商店风声传出去，邻近城市一概动摇，红军去了逃跑一空。

因此对反动商店主张特别罚款。

C. 红军补充问题

一、招募新兵。

二、改编俘虏。

三、由农会工会送来。

PDG

上面三者均填新兵入伍志愿表，说明红军苦乐及纪律，绝对禁止用欺骗方法，说什么红军每月关饷二十元。自愿者则听其入伍，不愿者听其自去，红军士兵愿退伍请假者亦斟酌情形准其退伍。总之，对士兵入伍退伍采取志愿主义，不用胁迫的办法。

D. 对由兵变而来的部队及投诚土匪问题

均欢迎其加入红军。红军是一个大炉子，可以把他们熔化。常常是首领不干，群众自愿干，结果首领为他的群众所推翻。前委不主张硬性的消灭首领的办法，夺取了群众，首领自然成了废物。

E. 对地方武装的政策

一、在有如县以上的赤色区域，经过斗争的赤卫队业已有普遍的组织，在不妨害赤卫队条件之下，应建立红军，以扩大赤色区域，扫武装不集中，不能被令作战的毛病。

二、各区乡政府及县政府均须成立赤卫队，县以百名至二百名为足额，区可以由三十至五十名，乡可以四五名至二十名，县区乡赤卫队队员除作战放哨外，应担任当侦探，任交通的任务。

三、为使农村的群众武装充分利用，大家都来学习战斗，敌人来攻作总动员的防御。成立暴动队之组织，以村为单位举出一个队长，除老幼妇女外，其余壮丁均须参加，有警，由队长鸣锣，各队员齐集登山应付敌人。

四、凡上列红军、赤卫队兵士皆举行按期退伍制，并可择其觉悟分子送一批到红军第四军来。

F. 对地方政权的主张

分为三种形式：

一、凡在白色区域中只能成立秘密农协，区则由各乡农协

派代表举出区农协，或由红军政治部任命，皆绝对秘密。

二、在群众斗争比较有历史的地方，则农协可分为公开和秘密两种。

三、许多赤色区域地则召集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

四、在区县两级苏维埃未正式成立前，通常成立革委会为苏维埃筹备机关，机关执委工会代表占多数，主席通常选举工人担任。

五、农协与革委机关内分文化、宣传、组织、经济、赤卫、土地，各部负责进行各种工作。

六、在农协内曾主张成立雇农部，专门注意组织雇农为农村领导，但这个在事实上没有什么人去努力做。

以上六项为前委对各地群众政权的主张。差不多红军经过区域，他们大概都照这方法去办了。

G. 前委对土地问题的主张

一、达到某区域由政治部会同（或单独）地方政权机关，公布没收地主的土地。

二、召集农民大会讨论解决土地问题，按人口平分，或只分地主的，均由群众表决。

三、限期焚烧田契、粮册、税簿。

四、关于债务只主张不还土豪的债，农民相互的债是要还的。

五、若田不够分配，可将山林连同分配之。

六、若田多的地方，山林则归政府所有。

七、政府机关职员及红军士兵没有饷发，但得分配土地，由政府雇人耕种，以维持其生活。

八、手工业工人加工钱，不分田地。

九、僧尼道姑，强迫其工作，可以分田地给他。

十、老幼不能劳动，只能以能劳动的所为标准分一半。

上面是前委决定的土地法的大纲。

H. 前委对工人问题

一、照一般工会组织法召集工人大会成立工会及总工会。区设办事处，乡设各业工会，村设小组。城市除总工会外，设各业分工会，直属工总指挥。

二、发枪给工总成立赤卫队，在城市内作肃反工作。

三、召集店东开会宣布加工价，以物价为标准。

四、严防店东入据工会机关。

五、在县革委或苏维埃的执委工人要占三分之二，或当选为主席。

以上是前委决定之工会组织法的一般内容。

I. 前委对于妇女问题

一、农协下设妇女部管理妇女工作。

二、妇女与男子一样得分田地及当选为执委等。

三、对婚姻问题主张离婚结婚绝对自由，但不公开提倡，遇某一个纠纷，采取单独解决或调和，不用法令公布。

J. 前委对青年问题

一、组织方面：

十六岁以上至二十一岁可成立少先队。

十六岁以下至七岁成立儿童团。

二、利益方面：

青工作同样工作须与成年工人同样工钱。青工在学习期须得相当工资，不要拜师钱。青工不为师娘招呼小孩倒马桶，不为店东服苦役及贱务。青工须有读书的机会。

三、对于一般学生智识分子：

（1）说明智识分子要帮助工农革命才有出路。

（2）欢迎学生及教职员加入红军作政治工作。

K. 红军达到某一区域发动群众的办法（在安民告示里面表示出来）

一、平谷价。

二、废除债务，不纳捐税。

三、分土豪的财物及其田地。

因为这几个办法，红军行军常常有大批群众跟着后面，要求一同去打土豪。红军一到某地，群众的活动马上就可以起来。

红军内 C. Y. 的工作

团在红军的历史：

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前，团与党一样在红军中成立了各种组织，但感觉几种困难：（1）是红军中士兵大半是青年（二十三岁以下），由按年龄来划分，党就要发生根本的问题。（2）在红军中，诸色人等要求与生活皆是一样，青年绝不能提特殊问题，亦不会受特殊的损害。（3）红军干部缺乏。（4）红军讨论问题为应付敌人要异常敏捷，每每党讨论了即执行，党先讨论传达要快些，团的讨论天然要前后，每每使团员感着不能了解军队行动的痛苦，所以团员都不愿在团里，愿到党内来。（5）党团纠纷在各级发生，影响到实际工作。

因为上列的原因，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以后，便取消了团的组织。但从此以后红军对青年工作完全忽略，甚至标语都没有了。到一个地方 C. Y. 来接头，拿不出一个圆满的办法给他们，尤其各地 C. Y. 组织非常薄弱，而青年的革命表现又特别好，乃决定在前委纵委两级成立青年部，营委设青年干事，连设青年小组，专门负责作青年工作，前委青年科长得出席

C. Y. 县委，代表前委发表意见。这是本年三月间的事，红军对青年工作之忽视便纠正一些了。

陈 毅

九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毛泽东。
〔2〕指朱德。
〔3〕指袁文才、王佐。

PDG

中共湘鄂西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日）

贺　龙

董朗同志于阴八月初到桑植，接到中央六月十六日的来信，敬悉一切。此间在八一纪念后曾送上万言的报告，系由向宜恒同志送交宜昌县委转上的，不知中央已收到否？兹将月余以来工作报告于下：

一　游击战争的经过和影响

自此报告发出后，湘西军事形势紧张，吴尚部开来常德，对我红军有一大布置，即饬令湘西队伍和陈渠珍所部向桑植苏维埃区域取包围的态势。不过吴尚部开来湘西，其任务不仅是要打击红军，对湘西队伍也要予以剿灭或收编。我们看到这点遂决定率红军向庸、慈发展，以动摇敌人的战线，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湘西劳苦群众于党的周围，这一游击战争的经过和影响，是颇值得报告的。

（一）西教乡的战争——大庸熊相匪等共有枪三百支，是西教乡最大的土酋，握全乡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其本人是个最大的地主，与陈逆策勋和徐小桐等都有勾结，我们要向下游发

* 这是贺龙以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给中央的报告。

展，若不将他们扑灭，可为桑植苏维埃之患。因此，我们游击战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扑灭熊族团防，以除后患。

除五团留桑城外，大部红军均随云卿出发去前方，阴历七月初二由桑开动，初三与熊部接触，围攻敌寨子七日，经大小十余战，始将敌人击退，此次战争的经过有如下述：

1. 敌人的布置——熊部在桥头飞塔坡、教子垭、坛子山、鸡爪岩、白马山等处，均筑有很坚固的寨子，尤以教子垭石寨为最难攻。这些寨子，敌人均驻有团兵把守，以为抵御。敌人的兵力虽不很多，战斗力虽不很强，但“强兵难打弱寨”，如没有飞机大炮，无论多么英勇的将士，也不容易把这样的寨子攻破的。

2. 进击的情形——我军西路一面由云卿亲率大队由桥头向教子垭攻击前进；一由王炳南同志率二团由中湖飞塔坡前进，以作佯攻。初三上午攻下桥头，同日围攻教子垭石寨。初四拂晓，占领飞塔坡，即以全力攻取敌之主寨（教子垭），卒因石寨太坚，防守太严，未能攻下。

3. 双方之酣战——我们初因不知西教乡有这样多的寨子，而且这样难攻，双方接触后，又不便中途停战而损军威，遂下最大之决心，誓将敌寨攻下。我军因为占领了教子垭寨子对面的狮子岭，在地形上颇占优势，故用兵自如，既可以围敌寨，又可以拒援兵，进战退守莫不顺利，同时得吴玉霖团（与云卿有旧好，且系云卿旧部）之声援，使敌人更加胆寒。在围寨时，我军爬寨三次，均被石块枪弹击下不得入，敌之援队如熊海清、陈策勋等亦死力救援数次，均被我军击溃。战争之烈，确系红军成立以来所未有者。

4. 敌人之逃走——围寨五日，敌人粮尽援绝，恐慌异常，表示投降改编，但不愿缴枪，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并饬各部严

防敌人逃走，但事出意外，在初八日晚上，忽下大雨，举目不能见人，而我士兵因连日攻寨，十分疲倦，疏于防范，致使敌人乘机潜逃，及至深夜攻寨时，寨内已无敌人踪迹，真是可惜。

5. 战争之影响——是役，我军虽牺牲官兵十八名，伤二十名，消耗子弹四千发，且未得敌人的枪弹，但在军事上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西教乡的寨子，从来没有人攻下过一次，而我红军不过是一个刚满十二个月的婴儿，竟能克敌制胜，当然可使湘西一般队伍胆寒。

敌人的主寨既经攻破，其他小寨莫不迎刃而解，于是熊族各部遂被我军攻散。为了补充子弹，消除士兵疲劳，我们在西教乡休息了约一个星期，同时敌人又渐渐地集中起来，然而我们正希望他们集中，这样才好一鼓击破，因为以我们的力量可以解决陈策勋、熊抱琴等部。

（二）慈利的游击——要使敌人大大的恐怖，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要激起湘西劳苦群众的革命情绪，只在大庸西教乡骚动一下是不够的，还要在九澧的重要区域慈利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才能完成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我们红军休息的时候，陈、熊各部均退据慈、庸、桑交界之处（康三谷、汉池峪、芳花界一带），与慈利江垭团防徐小桐部均取联络（徐小桐和邢聋子两部只有枪八十余支，均驻江垭），我们若不先发制人，他们必为吴尚之前卫来攻击我们。因此，我们即于阴历七月十九日分兵猛进，敌人望风披靡，沿途均无战事，仅在江垭小有接触，徐、熊、邢、陈诸逆即纷纷退却，而占重要位置的江垭商埠，遂于阴历七月二十一日被红军占领。

但我们不是来割据江垭的，而是来骚动以骇退敌人的，当

然我们不能久驻江垭，坐待敌人的包围，故红军只在江垭休息一天，于二十三日即进驻杉木桥。在这个时期中，一方面写信给周笃方（神兵），一方面写信给田少卿表示合作，共同奋斗，他们都有比较圆满的答复，惟不愿在这风浪紧急的时候高树红旗致受敌人打击。虽然周、田两部都是对于土地革命毫无认识，但他们俱为伪湖南省政府所不容，无论如何不致与红军为敌，如田少卿回信说，“若红军入石门愿让出防地”，即可证明。但当时退却的徐、邢部尚未肃清，张晋武部盘踞慈利县城，态度暧昧，距杉木桥仅五十里，吴尚部已抵桃源之盘塘桥，距慈利仅九十里。此外，还有澧县李抱冰、石门之罗孝之，对我们的防堵均十分严密。在这种情况之下，若红军深入敌境，势必遭敌人的袭击（鄂西西万池游击的失败，就是忽略了这一重要的战术）。因此，我们决定把红军开回桑植，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用兵的奥妙，而我们也可乘此时机加紧军事政治训练。总之，此间游击的加强，云卿以二十年带兵的经验，随机应变，今后绝不致上敌人的大当。

（三）游击期间的留守工作——现在桑植县已有广大的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已有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之可能。所以，我们对于留守桑植的工作十分重视。我们决定，组织一留守委员会，由县委之李良耀、政府之汪毅夫、红军之胡海云三人负责。因胡海云部与农民协会时有冲突，又调二团文南浦回防桑城，把胡海云部之五团调到前方来，参加慈利的游击战争。从此桑植方面得以无阻碍地惩治豪绅，进行没收地主的新谷等工作。虽然后方仅有长枪八九十支，而革命的政权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仍是稳固的。

在红军到达慈境之后，桑植团防队伍乘机骚动，尤以内四乡为最凶横。当时后方兵力薄弱，保护外四乡尚不够，自然无

法顾及内四乡。长此下去，这一股团防队伍，势必逼近桑城，危害革命政权。故巩固桑植的政权，保卫已得的胜利，也是红军回桑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游击战争中，我们动摇了敌人的战线，使敌人暂时不敢打击我们，扩大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吸收了一些农民分子加入红军，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在游击战争期内的宣传工作，无不尽力去做。文字的有各种标语，各种布告及告湘西工农群众书，告湘西军人书等；口头的有各部的宣传队沿途演讲——尤其是士兵委员会的宣传队较有成绩。惟在这次游击战争中，因军事发展太快，纪律不够严，在西教乡及江垭两处竟发生骚扰平民的事情。这是很大的缺陷，我们要加紧士兵教育训练，并从中吸取教训。

二　红军回桑后之党务及群众运动

关于桑植的党务和群众运动等，桑植临时县委已有很详细的报告，特为转上，恕不赘。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已达千余，农民有近四万，这是很可乐观的。但在群众运动的急速发展中，有不少的错误应忠实地报告中央。

这些错误是什么呢？第一，党的组织没有很大的发展。虽说有个小小的组织，然而质量上还差得很，以致党在群众中不能起核心作用，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一般工农群众，只在军事势力影响之下，起来粉饰革命，全没有阶级的觉悟，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第二，过去做农运和工运的同志，过于幼稚和浪漫，没有工作经验，把农协和工会弄成了个空洞的团防式的机关，并用以掩护豪绅的家属。各特派员与执行委

员均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与下层群众脱离了密切关系，甚至出卖了广大群众，违反了本党目前争取群众的重大任务，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第三，一般同志不注意党的活动，仅仅机械地做党外的工作，不留意党组织上的发展，大家都好像有事不关己的样子。在当前这样好的环境之下，不去加紧党的活动，这是很大的缺陷。第四，各处的农协和工会，都没有使群众认识清楚自己组织的性质，简直把农协和工会都当成党部，对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混淆不清。因之各处农协和工会的错误，多半影响了群众对党的认识，使广大的群众不但对于农协或工会没有正确的认识，使他们的革命情绪低落下去，并且对于本党也增加了许多疑惑心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第五，是对暴动的误解。以为捉了人家一只鸡，烧了一所房子，或没收了豪绅的财产，都是暴动。因为不了解暴动的真义，故在工作的策略上发生了极大的错误。如第三区农协执委视富农为土豪，专去寻私报仇，任意抓人。各区没收地主的财产只是几个执委和卫兵去做，没有号召广大群众参加，而所得的财产亦没有给予农民。又如第二区农协执委事事敷衍，毫不彻底，都是不明白暴动意义所致。第六，工会中执委绝大部分不是同志，他们的错误尤多，如只顾捉拿土豪、以谋罚款等事，应该加强工会组织。

关于以上错误，幸经前委一一考察出来，并由桑植县委拟定了新的工作计划，下发了紧急的通告，要求此间同志一致努力完成三大任务，纠正过去的一切错误，急速地发展党的组织，搞好群众运动。

我们为了完成三大任务，首先，用铁的纪律处分了违反党的纪律的同志（如开除×区农协特派员李后初、田益生等的党籍），用教育的方式训练新的同志。其次，分派县委委员及党

的特派员下乡活动，在农村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并限期成立各区区委或支部（如二区已有新同志二十人）。第三，决定陈叶平为农运特派员，计划一切。并加派较有经验之彭纬、郭天民、刘须吾、郭藩诸同志下乡工作，领导各区农运之发展。这样去做，我们自信错误一定要少些，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一定较有成绩，这是在近期内已经观察得到的。

关于前委本身和红军中的党务：

前委本身最大的缺点是组织不健全，对全盘工作没有很好的计划。尤其红军中党的组织非常涣散，党在士兵群众中不能起核心作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关于此间党的组织，我们和董朗同志、鄂西派来的罗正品同志曾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有的主张成立军党部，另设特派员管理地方党务；有的主张，如设了军党部，须另设暴动委员会，指挥暴动区域党的工作。这些意见，我们认为都是对的，但因工作人员的缺乏，如只建立几个机关，而没有人去指导，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此，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的组织，我们决定暂不取消，军党部暂不建立，而只设团委和特支，直属前委指挥。

前委原只有云卿（书记）、良耀（组织）、一鸣（宣传）、叶平（秘书）、毅夫、统一[1]六人负责，因各人都负有党外工作，以致前委的组织十分散漫，失了指导的作用，对于开会训练及整理纪律等工作都没有经常的注意，这确是一个大缺点。但目前此间对于前委本身的组织，已有一个新的决议，除云卿等六人外，决定董朗同志参加前委，以切实地加强党的工作。我们的分工是：

（1）前委书记云卿。

（2）组织兼秘书良耀（因经济委员会已取消，他得以专力

作党的工作）。

（3）宣传科叶平（因还有些党外工作要做，无暇担任前委的秘书）。

（4）兵士科一鸣（因他系指挥部党代表，与士兵接近的机会多）。

（5）毅夫因在苏维埃区域工作，统一负有军务，董朗亦办军事训练班，故均不能兼顾党务。

红军党的组织，现仅一团团委（廖卓然负责），四团团委（谭甦负责）及特别支部（不属于团委之各部同志均编入特别支部，由叶平负责），经前委彻底洗刷之后，组织上较以前要坚强多了。

关于党的情况，我们同罗正品同志谈得十分详细，最好中央巡视员到宜昌时找罗同志谈一次，即能得到此间一切情形。同时，我们十二万分的希望中央多多给我们正确的指示。

三　红军的实力及其出路

自入桑后，红军的实力增加数倍，因我们尚在游击的时期中，其部队的编制当然带有拖队性，故名目繁多，难成建制。兹将各部的组织分述于下：

A. 军部名义仍未公开，仅在军部之下成立一特务营，以贺佩卿同志为营长，王湘泉、刘书田为该营一、二连连长，连军部的马弁并共有长枪一百十余支。

B. 第一路指挥部：

（一）第一团团长贺桂如。该团第一营营长罗统一，第一、二连长涂耀南、田子为；第二营营长廖卓然，第五、六连连长田名贵、唐彬卿；第三营营长向北辰，第九、十连连长周嘉

鹏、陈嘉柳，该营连长均系同志。经此次改编后，组织比较坚强，共有长短枪三百七八十支。

（二）第二团团长文南浦，党代表吴协中。该团第一、三营营长李家灼、刘子清，共有长枪九十余支。

（三）第四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谭甦。该团第一营营长陈栋川，第二营营长彭庆元，特务连连长范松之，先锋队队长沈祝三。该团军事工作人员亦均系同志，因尚欠军事训练，故颇为涣散，有长短枪八十余支，其士兵群众多系神兵。

（四）第五团团长伍琴普，党代表汪毅夫。第一、二、三营营长为谷清轩、唐茂林、王连城。该团第一营系胡海云之基本部队，战斗力颇强，其二、三营系入桑后收编的，组织十分复杂。加上特务连，共有长短枪二百六十支。

（五）补充团团长胡海云，有枪三十余支，胡本人对云卿信仰很好，亦能作战。

（六）补充营营长王慎吾，系王东海之旧部，近与王炳南同志关系亦深，共有枪三十支。

（七）独立营营长刘岸翘，原系大庸康老乡之团防，共有长枪五十余支。红军向（大）庸、慈（利）游击时，他曾参加战斗，所以现在他虽未与红军汇合，他的帽子已经红了。

（八）此外，尚有很多别动队组织，如谷梅吾、吴辅臣、姚怡斋等，均有一部分群众。谷梅吾部有长枪二十支。

C. 第二路指挥部

该部指挥覃奏章（即辅臣）与云卿关系最深，近来对本党的信仰亦尚深切，他可以号召一部分队伍，现有枪一百支，在继续发展中。

D. 工农赤卫队

该队系由农民警卫队和工人赤卫队合编而成，共有群众约

二百人，长枪二三十支，因近来军事形势日趋严重，故将各区的武装集中起来。

合计以上各部共有武装群众（除长短枪外，每兵均有梭镖）达四千人，声势之大，确能使湘西敌人发抖。

惟红军存有以下的缺点：

（一）政治的、军事的训练均未抓紧。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作人员的缺乏，一方面是游击战争的影响，因红军军人缺乏政治、军事教育，故纪律不严，敌友不分，有些行动不能完全照党的策略去做。

（二）军事工作的同志不懂得客观的环境，往往发生无谓的冲突，致影响其工作不能深入群众，甚至离开了兵士群众。

（三）军队中下级同志与上级同志关系不密切，有时还发生许多隔阂，因而消极犹豫，甚至还要开小差，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四）军队中没有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很多新同志还不知道党究竟是什么。

（五）官兵成分非常复杂，游民无产者很多，拖队的习气十分浓厚，因此做政治工作十分困难。

以上这些缺点，前委久已察觉，为克服这些缺点，前委将作以下努力：

（一）在农工会执行委员及红军军人中，挑选学生一百二十名，开办军事政治训练班，定期三月毕业。适董朗同志来桑，训练班有了专人负责，故成绩尚好，现开学已有两星期。

（二）改造红军中党的组织，并加紧党内教育工作（已如上述）。

（三）设兵士科，正确地指导士兵委员会工作（已如上述）。

（四）设法加强党代表办公室的组织，提高党的威信。

（五）在军事局势有相当稳定后，对军队组织进行一次大的整顿。此间已同罗同志详谈，亦不赘述。

红军此次回桑，对于党的组织、群众运动及同志错误之纠正，均有重大意义，从此努力下去，或不致有负中央之重托吧！

现在说到红军的出路：

目前的环境是很险恶的。湘西杂色队伍及吴尚部，从慈（利）、大（庸）、永（顺）、鹤（峰）各路来包围我们，大有立即接触之势，因我们的声威很大，虽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而不敢贸然攻城。同时，他们的内部裂痕很大，彼此多心，指挥极不统一，进击红军亦多非他所愿（其士兵有此表示），在这种情况之下，虽大敌当前，我们是不会害怕的。

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2]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我们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斟酌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请中央勿念！

正报告间，又得各方侦探报称：

慈利境内马河口之空壳树、东旺坪，大庸之沿线坡，均发现大股敌人前锋，系湘西之杂色部队（徐小桐、邢聋子、陈策勋、朱发生等），跟进者为吴尚所部。同时，永顺亦有陈斗南、顾家齐两团向桑方增兵，以作佯攻。我们为避开敌锋起见，决即抛弃桑城，藏兵于洪家关一带之高山，待探明敌部确实情形时，即择敌之一股而痛击之，如此虽不得全胜，亦不致受敌人的打击。

红军目前的出路，须待这次战争结束之后始能决定，不过军事的原则是：胜利则巩固桑植政权，并向慈、庸发展；不胜利则在内半县，或向鄂西方面游击。这是一定的。

董朗同志的介绍信，此地无法认出来，究竟中央对于董朗同志的工作分配曾有决定否?

中央所指示我们的一切，此间自当遵照执行。同时，还希望中央急派工作同志来帮助我们，实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即贺龙、李良耀、张一鸣、陈协平、汪毅夫、罗统一。

〔2〕指朱德、毛泽东。

PDG

中央通告第四十九号

——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

一

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向苏联的挑战，现在仍然是日益紧张的形势。虽然帝国主义间因为分割中东路，分割苏联与中国，包含了极严重的矛盾，而未能马上一致的对苏联开战，但是他们都在极力企图谋得暂时的妥协，在每一分钟都在加紧进攻苏联的准备。杨格计划的实现，便是他们把德国拉入反苏联战线的进一步的成功。虽然，中国军阀内部各派军阀争夺政权与地盘的正在加紧，也就阻碍他们对苏联的攻击，但是蒋介石利用反对苏联的旗帜来抑制与他对抗的军阀的企图，还在积极的进行。因此进攻苏联的危机，仍然是异常严重；满洲里与柏林的谈判，一方面是苏联和平政策所促成，另一方面不过是国民党掩耳盗铃的把戏。就使中东路问题因苏联的和平政策而得到暂时的解决，但是进攻苏联的危机根本上并未有一点减轻，而且中国国民党始终会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先锋队。

二

军阀战争的酝酿，又在日趋严重的形势。蒋桂、蒋冯[1]战争以后，造成军阀战争的根本矛盾——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资产阶级、买办地主阶级争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军阀争夺地盘的冲突，一点也没有减轻，而且在许多政治问题上表现着日益紧张的形势。蒋系军阀企图得到暂时缓冲的机会，以准备在将来战争中之更有利的条件。因此，爆发中东路问题，利用反对苏联的旗帜来抑制与他对抗的军阀——中东路问题主要的是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对苏联进攻，但同时也包含了蒋系军阀这样的企图。所以中东路问题爆发以后，马上召集编遣实施会议想借此来裁减异己的军队。可是这一会议的结果，除增加广大群众七千万裁兵库券的负担外，没有一点别的效果，而且因此使各派军阀与蒋系的对抗更加尖锐。现在各派军阀反蒋的酝酿正在日益加紧，蒋系内部也发生了新的破裂，尤其是各派军阀都特别加紧对革命势力进攻，如"围剿"朱毛[2]与湘东、湘西苏维埃区域及极力设法破坏各地共产党的组织等，这都是他们积极准备战争与战争快要爆发的表现。总之，现在造成军阀战争的根本矛盾正在日益加紧，而且国民党永远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矛盾，所以军阀战争随时随地都有爆发的危险。实际上蒋桂战争以后，军阀战争并没有一时停止过，如云贵战争、四川战争等，不过现在又酝酿着更厉害的将要牵动全国的大的军阀战争罢了。

三

从上面的分析，看出在现在政治局势中酝酿着两个严重的危机，第一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战争，第二是比以前更残酷的军阀战争。所以，我党在目前领导群众斗争的两个中心任务，就是反对进攻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

四

反对进攻苏联的路线与策略，中央已有几次详细的指示，可是各级党部在执行上仍然有许多缺点和错误：

第一，在宣传上只偏重在阶级观点上的宣传，而忽略站在民族革命上的宣传，如广东、顺直，都只注意到“拥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口号，而没有注意到“拥护帮助中国民族解放的苏联”的口号，这样很难揭破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欺骗，很难推动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的群众。

第二，各地在行动上动员群众的工作仍然非常不够，不能很正确的运用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到拥护苏联的行动，甚至没有注意提出群众日常经济政治要求，来发动群众斗争的策略。

第三，对付国民党反苏联的策略不正确，如顺直、福建都有“变反俄大会为拥护苏联大会”的口号，这是异常错误的。因为反苏联的大会是以反革命的口号号召的，我们应该实行“抵制”或“对抗”的策略，就是号召群众不去参加，或者号召一个拥护苏联大会来和他们对抗，决不应该领导群众去参加。只有国民党假借有革命意义的招牌（如“九七”纪念大会

等）召集群众会议来欺骗群众的时候，才应采用参加进去揭破他们欺骗的策略。

各地在工作上仍然有这些错误，所以我们的政治影响还没有十分深入群众，还不能发动广大群众的行动。现在进攻苏联的危险，正在日益紧张的形势，我们必须很迅速的纠正这些缺点，加十倍的努力深入群众中去，扩大我们的宣传，号召群众的反抗行动，同时要更积极的准备武装拥护苏联的一切工作。

五

现在军阀对抗的两方面——蒋系与冯阎[3]、改组派等，都是一样的帝国主义的工具，都是代表反革命的阶级，都是一样的军阀，所以军阀战争毫无疑义的是反革命的战争，是反革命阶级内部的抢夺对工农劳苦群众剥削的利益、抢夺地盘、抢夺中国的统治的战争。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反革命的战争，是要采用失败主义的路线，就是要使战争的两方通通失败，革命势力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是我们中心的宣传口号。必须使这一口号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使广大群众了解。只有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然后才能永远消灭军阀战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反军阀战争的一切部分的斗争——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反对运兵，反对增加工作时间等的斗争，渐次汇合成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之总的斗争。

六

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

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所以“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只是宣传的口号。发动群众的行动，必须提出许多部分的口号——如在交通工人中“反对运兵”，兵工厂中“反对增加工作时间”，在一般工人中“要求增加工资”、“要求集会罢工的绝对自由”，在农民与城市贫民中“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摊派军饷”、“反对强占学校民房……”、“反对巩固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地方自治”等来发动群众的斗争。只有这些群众迫切要求的口号才能发动群众。各地地方党部必须到每个支部中去，讨论出本支部的中心的斗争的口号、发动斗争的策略，同时在斗争中宣传我们中心口号的方法，然后坚决的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使这些斗争深入扩大与各种群众的斗争，渐次联系起来。尤其要特别注意在这样的时机中扩大群众的组织与武装的训练。

七

在上次反蒋桂、蒋冯战争时，各地党部只做了一些宣传的工作，没有坚决的去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斗争甚至群众自发的斗争，如顺直几千农民反对拉夫的斗争等，我们坐视不管，实在是莫大的错误！各级党部必须使全体同志明白的认识，军阀战争与群众以莫大的痛苦，只要我们有正确的口号，能深入群众中去，必然可以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这正是我们夺取广大群众、领导广大群众走向革命斗争之最利便的机会，决不可以有丝毫忽视的观念！在各种群众的斗争相当的发动起来以后，必要在主要城市与农村中组织群众反军阀战争的示威运动，使广大群众在这样的示威运动当中，更加提高他们的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各级党部必须有计划的去准备这一工作。

八

在工人运动中的策略：第一，必须特别注意铁路、海员、兵工厂的工作，各级党部这时候更应加倍的努力去扩大在铁路、海员、兵工厂的组织，提出各种部分的口号去发动他们的斗争，扩大他们的组织。第二，要极力扩大反黄色领袖的宣传与斗争，尤其是群众斗争起来以后，更应特别加紧这一工作。同时坚决采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来渐次推翻黄色领袖，把黄色工会转变成为赤色工会。第三，在各种的斗争中，都要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领导他们渐次发展到反军阀战争的总罢工、游行示威等的反抗运动。各级党部必须坚决的认识，只有工人斗争开展起来，然后才能领导群众反军阀战争的伟大的运动。

九

在农民中要特别注意提出部分的口号，去发动他们起来用各种的方式坚决的去向豪绅地主军阀斗争，但必须认识，现在农村中在这样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日常斗争很易于走向武装的冲突，所以在斗争发动起来的时候，必须准备着武装冲突，领导着走向扩大、深入，实行游击战争，以至创立苏维埃区域。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更应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军阀战争，极力去发动附近各县的农民斗争，加紧建立并扩大红军，加紧武装农民，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来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来扩大苏维埃区域。在朱毛贺彭[4]等红军的策略：第一，积极扩大现在占有的苏维埃区域；第二，更积极的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军阀战争；第三，尽可能的扩大红军的组织与武

装农民；第四，到群众基础比较强大与军阀战争附近的区域去实行游击；第五，坚决肃清地主阶级的民团、保卫团以及小军阀的武装组织。总括说来就是，在军阀战争的当中，原则上要采取坚决进攻的战略，要肃清一切保守的观念，尤其是取消的观念，在兵士群众中，一方面要提出许多群众迫切要求的口号——如发清欠饷、发开差费、军需公开、反对官长压迫、增加月饷等的口号，发动兵士群众的斗争，同时要积极宣传"不替军阀当炮灰"、"不打红军"、"与工农联合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口号，来领导他们的斗争，向着这样的根本口号前进。如果在兵士运动已有基础的地方，必须有计划的去准备发动兵变，如果能号召广大兵士群众实行反军阀战争的兵变，这是在促进革命斗争中有很大的意义与影响的。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如何去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联系起来。

十

在目前的形势，显然没有革命的高潮，但是现在一切革命的根本的矛盾，不只没有解决，而且一天一天加深起来，必然要推动群众斗争走向革命的高潮。所以我们在今天就必须明白的认识这一可能的前途，而坚决的运用正确的策略，领导各种群众斗争向这一前途进展。所以"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在现在是宣传的口号，到了群众革命斗争高涨的时候，便应该转变成为直接行动的口号。我们现在必须坚决的执行上面指出的策略，发动群众的斗争，扩大群众的组织，向着这一前途前进，而且一定要认识这是可能的前途。这一前途到来的快慢主要决定于我们争取群众的力量，也就是关系我党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与工作上。

十一

在现在整个政治局势中，反军阀战争的宣传与工作必须特别注意。下面是：第一，必须与拥护苏联的斗争联系起来，在群众中指出要推翻军阀统治，消灭军阀战争，取得革命胜利，必须联合苏联。第二，必须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世界大战联系起来，指出军阀战争主要的动力就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统治。第三，必须与秋收斗争联系起来，指出豪绅地主阶级完全要依靠军阀来镇压农民，农民群众要得到解放，必须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的政权。

十二

快要爆发的军阀战争，反蒋方面政治上的领导者必然是改组派，他们必然要提出许多改良的口号来欺骗广大的群众。所以在反对军阀战争中，特别要着重反改良主义的工作，必须用各种的事实揭露改组派的欺骗，指出他们是与蒋介石一样的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剥削广大群众的反革命派。必须坚决的不断的作这样的宣传与煽动，然后才能渐次打破他们在群众中的欺骗作用。各地必须认识他们在群众中还有相当的影响，还有他们的作用，决不容丝毫加以忽视。必须特别的注意，坚决的领导群众各种斗争，才能渐次在斗争中去肃清他们的影响。第三党也是毫无疑问的与改组派一样的反革命，所以我们要如反对改组派一样的去反对他们。

十三

进攻苏联特别是军阀战争的形势，已经异常的紧张起来了，各级党部必须动员全体同志，加紧在群众中的宣传，依据中央的路线有计划的去进行一切工作。现在党内反对派与机会主义者好像与统治阶级站在一条战线一样，极力来动摇党的正确路线，破坏党的组织，各级党部必须坚决的在全体同志中肃清他们的思想。如果发现了他们小组织的行动、反党的宣传，这便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疑予以组织上的制裁。铁的纪律是巩固党的组织、领导革命胜利之最重要的保障。

十四

各级党部依据这一通告决定工作计划时，必须同时参阅二十五号、三十四号、四十一号、四十二号各通告。

中　央

一九二九，九，十八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冯玉祥。

〔2〕指朱德、毛泽东。

〔3〕指阎锡山。

〔4〕指贺龙、彭德怀。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关于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四军前委并转全体同志：

陈毅同志来，详谈一切。中央于其口头及书面报告后，决定给前委以下列之指示：

一、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

中国政局自蒋[1]桂、蒋冯[2]战争后，表面上蒋系的南京政府得了胜利，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加大了些，但实际上一切引起战争的矛盾并未解决，且日益加深的向前发展，因此反蒋的军阀混战又由酝酿至于爆发。美帝国主义与中国定了航空合同，英帝国主义定了中英海军协定，日本帝国主义满蒙计划的急进，各帝国主义都努力在华的军事布置，这都表示帝国主义间互相冲突的尖锐化。中东路问题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

---

* 这个指示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

露骨表现，亦还是各帝国主义在要开始战争前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帝国主义冲突的激烈成了军阀混战的主要动因。再则蒋桂、蒋冯战争后，并没能在这些战争中获得了什么实际利益，固然一方面削弱了封建势力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的封建势力却又抬起头来，这乃资产阶级本身力量微弱必须拉拢封建势力以自固的必然命运。资产阶级利用封建势力去打击封建势力的这种企图，不但不能解决两个阶级的矛盾，而且成为军阀混战的又一动因。又中国军阀因数个帝国主义的唆使，中国经济破产的加速，庞大军队需要财源维持，因此为各自争夺地盘与饷源又推动着军阀混战的危机。上面这三种矛盾是军阀混战的动因，亦是军阀混战所不能解决的。每一次混战只有使这三种矛盾加深。目前反蒋的军阀战争就是上次蒋桂冯混战的继续，这次混战爆发后，也当然要继续发展下去，除非工农兵暴动的力量而外，绝没有第二种方法可以解决这种引起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这是我们应该坚决认定的。

目前蒋系政府把持南京反革命政权，对外得了帝国主义承认，想独揽出卖民族利益的特权，对内把持长江下游财权及重要军械制造所，自然要成为众矢之的，造成全国其他军阀各派的反蒋联合。蒋系除浙江比较统一外，其余各省都处着反蒋的势力。蒋的嫡系军队号称九师，此九师有些还系改编别人的部队，同时有改组派从中活动，所以亦包含有反蒋的分子。这些是蒋本身的弱点。在反蒋方面以汪陈[3]派的改良主义的理论为旗帜，但没有一个中心势力。南方各省散布着不少的反蒋力量，在表面上可以为改组派利用，但实际上还各怀鬼胎，如张发奎、俞作柏都想攻下广东，而彼此则不相下。冯唐[4]朱诸系军阀则想攻下南京武汉，而本身的利害又各冲突。北方阎[5]、张两派则自知无力统治南京，故始终有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的

企图，对于拥护改组派便不十分积极。同时各派部下都有被蒋收买之事，阎部下另成系统与蒋不无关系。奉张内部有新旧之争，新派自杨、常[6]死后势力大衰，张学良对于旧派已不能如意支配，旧派则忠顺于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入关的企图十分积极。中东路问题发生后，显然与蒋有冲突。这都是军阀间不能协调互相排挤的实况。张发奎事件发生后，显然是改组派反蒋运动开始爆发的第一声，武汉战争、两广战争都有扩大为全国混战的可能。如蒋得一时胜利，混战局面并不能因之消灭，且必然要继续发生；如改组派胜利，则小军阀割据局面更要加多。军阀战争的目的只有争夺反革命政权以便于出卖民族独立利益，夺取地盘以加紧剥削工农，反蒋与护蒋两方皆是如此的。党在军阀混战中，应该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发动广大群众，反对军阀混战。这一工作须与群众日常斗争相联系，这是走向以工农兵暴动的力量消灭军阀战争的正确道路。

在军阀混战中，我们不可过分去估量，专空想一些大的斗争到来，而忽略许多切实的群众日常斗争工作，尤其在红军中更要注意到敌人的“会剿”。应付敌人“会剿”是红军经常应注意的问题，不可因为军阀混战爆发，便松懈起来疏忽起来，尤不可因军阀混战暂时休止，便恐慌起来。我们应认清军阀“会剿”红军，有他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常常使“会剿”不能完局反而便利于我们的发展，但并不因此便使我们不注意“会剿”，不下决心去与敌人作艰苦斗争了。前委过去尝根据红军近邻军阀的行动来判断整个统治局面的稳定与动摇，这样的分析是不对的。前委要十分注意纠正军事同志以红军为革命本位的狭隘观念，根据红军部分的环境去观察整个革命形势，这是万分不够的，而且一定要陷于错误。军阀对红军曾三次的“围剿”，每次都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面固然是在共同进攻革命

势力，一面却又是军阀为了准备自己战争，必须先求解决红军以固后防，过去湘、赣、粤“三省会剿”以及最近闽、赣、粤“三省会剿”皆是如此。最近蒋派刘和鼎入闽，固然为的进攻朱毛[7]，但还有一个解决张贞的任务，因此闽军每一部分都互相戒备，对于进攻红军反互相推诿起来。粤军在二陈[8]冲突、两广冲突的形势下面，虽然有入闽部队，现亦急急撤退。金汉鼎部自朱培德失掉江西地盘、王均调蚌埠后，独处赣南，此次又参加改组派运动，对红军几月来皆采取防御性质。这就是“三省会剿”的实际。红军应该采取坚决斗争的前进精神，认识整个的敌人的形势，团结广大群众来打破敌人的“会剿”，不要存丝毫退却苟全的犹豫念头。红军存在于反动政局走向崩溃及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地势辽阔也是一个条件，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的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在目前反动政局走向崩溃过程中，在全国革命高潮未来时，红军此时主要的采取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的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四个区域的赤色势力联系起来。红军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的得以解决。

二、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

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

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红军第四军两年来对于上述任务克尽了一部分，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这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证明了革命势力的存在与发展。红军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红军四军的同志务要明了自己的任务的重大。

至红军是否应该固守一个地区的割据，这个问题你们在行动中常常碰见。要知在统治阶级政权未崩溃以及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过去罗霄山脉政权的经验告诉了我们。在一省或几省以上的政权就不然，因为他有一个比较足以维持的经济基础，自然有可能作为一个发展或保持的根据。总之，农村的政权或游击队应该是一个斗争的单位，实行游击四向发展的策略，保守必然要失败。反之，预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三、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

红军发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若经常停滞在边境，在缺乏斗争的某些边境，将减少了红军的政治意义。对于敌人军事力量空虚地带或乡村中白色势力范围，应实行游击，以驱逐反动势力，发动群众斗争。对于较小于我的敌人，应该坚决

地去歼灭他，非如此不能扩大本身及群众武装，绝不可有保存实力观望时局的等待倾向。固然亦决不应以较小兵力硬与较强之敌人作殊死战，致非牺牲偌大兵力，不能有胜利把握，而敌人又可从容退去，丝毫不能扩大红军武装，这种打硬仗的办法是无益于游击战争的，但这决不能动摇围缴敌人武装以扩大自己的必要信念。红军不从斗争中锻炼自己绝不能发展。我们有了避免战斗的观念，必然要错过许多可以使自己发展的良机。这是关于红军发展的主要几点，是最值得注意的。

关于红军战争中之分兵与集中问题，过去四军各级党部曾有讨论，中间有分散红军，分兵后不必要有联络，集中怕目标太大等不正确观念。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皆原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红军会被要消灭，才发生减小目标各个自了自己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红军四军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去实行游击以求本身的扩大，如何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分兵时应密切联络互相策应，应防敌人各个击破。红军四军两年来集中奋斗，渡过各种难关，此种艰苦的经验不应为全体同志忽视。至于全军如集中行动，当然有一些困难，如行军、宿营、给养等之不轻便，但这大部分是一些属于技术上的困难，绝不能因此而取消集中指挥的必要条件与忽视了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伟大作用。

关于一般战术问题，如前委来信所提出之波浪式推进，兜

圈子以及十六字诀等办法，应就实际情况去运用，不能定为一个原则。前委在两年奋斗中已有不少经验可以运用，中央在此不作机械的指示。

四、红军与群众

前委在过去忽略了所到地区之群众的日常斗争。红军本身是一种阶级的集聚力量，所到地区豪绅等多已闻风逃窜，群众在军事力量掩护下勇气倍增，一切行动自然是政治的或军事的，但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全国有苏维埃区域的党均忽视了这个问题。红军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才不是少数个人英勇的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这对于地方党部工作之帮助，特别要指示这一点。

红军到一地区不要只是找地方党部，应该与地方的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开联席会，发生密切关系。在政治上，在宣传上，在斗争上都要与工农会协议共同去做，红军不要单独去干或者只是发命令，然后才可以扩大红军在工农中的政治影响，提高群众对于自己组织的信仰与效能。如群众尚未组成工农会，则更应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

红军对于苏维埃政权应帮助群众去建立并扶助其工作之发展，从一切斗争中帮助群众建立自己政权的基础。要提高农会的信仰，一切问题都拿到农会去解决，做成转变为苏维埃的基础，例如一切政治布告等要与农会共同联名发出，增加群众组

织的威信，使群众相信自己政权的力量。

红军群众工作，四军过去有相当努力，兹特别指出重要几点：第一，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过去有许多调查成绩，因没人统计以致放弃，甚属可惜。前委应指定专人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第二，关于宣传工作务求其扩大，不要只限于红军游击区域以内，可用寄信方法及于大都会的群众，则影响更大。第三，关于组织工作，如反帝组织、拥护苏联组织、雇农工会及其他的平常有助于革命的临时组织都很重要，要用各种方法去建立。第四，关于肃清反革命工作要经过群众组织来执行，才有群众的意义，而且这一工作要特别加深。第五，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此时固然做不到由群众组织来担负红军给养，但在筹款时要用群众组织去执行才有意义。党与红军有时可斟酌情形在群众中募捐，尤其红军的给养，更应在群众中举行盛大的募集以扩大红军影响。关于经费支配亦要顾及群众组织，与其共同支配，一切经费的开支应多用在群众工作之支付上，绝不要大半作为党费开支，养成党之腐化。第六，对于武装工农问题，四军同志中尚保存有许多不正确的观念，以致工作没有做好。好枪不发给地方，坏枪尽数送给农民，把群众与红军分做两个东西，有根本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危险。须知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成的而不是相消的，固然有些地区群众斗争尚未起来，先发给以武装不能有多大作用，或者红军枪不够分配时，是可以暂不发给的，但需要发给时，一定要纠正过去的不好倾向，同时，派人去担任农军的训练，亦甚重要。

五、红军的组织与训练

（1）红军扩大问题。红军扩大与红军生存问题有莫大关系。扩大红军，在红军中在群众中应该是一个普遍而深入的口号。扩大的路线，应该从广大群众斗争中去取得帮助。红军所到区域，应举行扩大红军的宣传大会，鼓动工农群众自动参加红军，同时，如能有机会收缴敌人枪械时不要轻易错过。

（2）红军的成分与来源。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此种农民固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倾向的。

（3）组织统系与编制。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目前是可以的，但到了各苏维埃区域扩大时，则必须召集各地苏维埃代表会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免除党军的毛病，更可以使群众认识红军是自己的阶级军队。这一个办法目前不必马上执行，徒为一个空心机关，至少应在闽西、赣南、东江三地区域工作扩大能开联席会时，再设法执行。关于红军编制，最要紧的是使之能适合于游击动作，指挥单位不要过多，军事组织及名称不必拘于一个固定形式。

（4）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可不兼任政治部主任。

（5）兵委的组织。四军中兵委过去有成绩，其组织路线也很正确。其职权规定为监督军队经济，参加军队管理，厉行士

兵政治教育，做群众工作，与军事机关的关系用报告建议而不能直接管涉。发生特别事件，政治委员有解散兵委之权；兵委开会政治委员列席为顾问等。这些规定虽然较之俄国红军兵委权力扩大得很多，但在目前红军游击时期是可以适用的，不过要注意军队中民主化要有限度，否则于斗争是有害的。

（6）政治工作。军与纵队设政治部，营连只设政治委员这是可以的。其任务为对内管理政治教育，对外作政治宣传以至管理地方政务，发动群众斗争，扶助群众组织等。

（7）军事训练。红军的军事技术要特别注意，决不应附和不爱严格训练与组织的农民意识，红军有好的军事技术，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

（8）军队中民主化问题。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固然，红军的兵士应该以政治教育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但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

（9）妇女参加红军的问题。对于革命妇女可引导她们参加农村斗争，不必加入红军，四军过去对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对于农村的妇女运动，红军应扶助之。

（10）红军的纪律与处罚。应做到使士兵自动守纪律，以群众的力量与影响来裁制违犯纪律的人，坚决地废除肉刑。至于军事上所规定之一般纪律，可以斟酌实施。

六、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

（1）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

经过群众路线，在最短促时间中也要注意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

（2）筹款标准，主要的是不要侵犯工农及小有产者的一般利益，这一点，四军执行得很好，可应用到其他游击队伍中去。

（3）募捐亦是红军筹款的一个办法，四军要应用这个办法，可以在群众中组织募捐委员会，特别要向富农及中小商人募捐。

（4）对中小商人及富农态度。我们为实现党的政纲所规定及为工农经济流通与贫民利益，在城市不举行经济没收，这是对的。城市的政治没收应该执行。对富农及中小商人要向其募捐，并要防止其反动。

（5）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红军中废除军饷，只发零用钱与吃饭钱，这是对的。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红军自己办固然好，但同时要能由群众供给与募集才能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关系。

（6）经济组织。对红军的给养费用可由兵委审查，其他特别开支不必要由兵委审查，将来应由群众政权组织决定和审查。

七、红军中党的工作

（1）党的组织统系可保存现在状态，前委委员不要过九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在军队中采取秘密形式，党的机关设在政治部内，党的机关的人员不要过多，要尽量利用群众组织中的人做事。一般的营委可以不必设立，营部可成立直属小组，一营单独行动时，可委托营的支部来指挥，但此点

前委可斟酌采用。

（2）党的工作路线。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以后成立上层政权，则组织党团，经过党团指挥之。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

（3）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

（4）团的小组。团应该成立小组，现在指定成年人做青年工作即以之为团的小组，这个办法是不好的。红军中团员与党员应有划分，连支部中设 C. Y. 小组属于连委管理，纵委前委中设青年工作科，表面归政治部，计划并指导 C. Y. 小组如何在群众中做青年工作。前委更须帮助所到地区的 C. Y. 工作。

（5）组织上的争论问题。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有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6）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

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原于同志理论水平低落，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7）成立边界特委问题。在几省边界工作可以联系，能够指挥时，是可以成立特委。目前则尚不需要。如今后工作发展，前委即可负责特委的责任，届时再报告中央指定名单，或开边界各县代表会议选定。

（8）前委在红军经过区域应与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络，一切地方政治问题应与地方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如所经地区无党的组织时，前委应尽可能从发动群众斗争中帮助建立地方党部组织。

八、朱毛问题

（1）代表会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

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2）朱毛两同志工作方法的错误。第一，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第二，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

（3）今后的出路。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九、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

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界游击，以发动群众斗争。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如两广军阀混战成相持局面而且蔓延及于全国，红军即可向潮汕方面游击，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向惠属方面逼近。如蒋系军队失败，红军应位置于粤、赣大道左右或其败退所经之路围缴其枪械。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

击，以发动群众。

凡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前委对赣南、闽西的游击工作亦要同时注意，要与该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系，然后才能使其与红军四军及东江斗争相策应。

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

专此。

革命的敬礼！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冯玉祥。
〔3〕指汪精卫、陈公博。
〔4〕指唐生智。
〔5〕指阎锡山。
〔6〕指杨宇霆、常荫槐。
〔7〕指朱德、毛泽东。
〔8〕指陈铭枢、陈济棠。

PDG

中共中央给陕西临委的指示信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

陕西临委：

你们的报告均收到。中央对于陕西的工作在政治上有以下的指示：

冯[1]系军阀自退到陕西之后，内部分裂日渐尖锐，尤其是在贫瘠的陕西经过空前的荒灾，不能给养数十万的大兵，必然更加使号称统一的冯系军阀内部与其他军阀内部分裂，一样的为伸张地盘维持武力互相冲突起来，这是军阀制度中一种公例。不过在目前冯系各军阀还因为困在穷苦的环境内，大家均无出路，企图向外发展，使内部的分裂还没有达到更剧烈的程度。

冯系军阀前次退出河南，不过是因为时机不宜暂时退让等待机会爆发战争而已，至于对于战争的准备并未减轻，只有更加积极的来进行。而且冯系各军阀只有在将来爆发战争中才能求得出路，因此，数十万大兵必然要维持下去，这样的结果只有更残苛的掠夺陕西人民，使将垂死的陕西民众更要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冯系军阀的冲突不仅是历史上的根源，而且是军阀制度中必然的现象，这是军阀制度中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不过在军阀关系上，有时在某一时期因为各个利害关系而暂时合作，最

近冯阎[2]的关系即是在反蒋各自利害之下形成反蒋的暂时合作。但是冯阎的冲突并未减轻，一俟与各个共同利害关系稍有转变，这种冲突要剧烈的爆发起来。

目前全国战争酝酿又到日趋严重的爆发形势，在湖北、广西已开始军事行动，这一战争爆发起来必然更要扩大到全国形成混战的局势。这一次战争的形势是蒋系军阀与反蒋的各个军阀的大混战，冯系军阀在这一战争中必然是一个主要的脚色。最近孙良诚军队借口就食将军队向豫西移动，以及孙良诚到开封与韩复渠的接洽，这都表示战争要将爆发的形势。

于右任此次借考察灾情到西安一次，当然与军阀战争有关系的，很显然的是替蒋介石来拉拢冯系各军队缓和反蒋运动，刘郁芬等此次到南京去是有关系的，不过蒋之各种拉拢缓和的手段都不能消灭反蒋战争的爆发。至于冯系军阀数十万大兵屯聚在甘陕更无法解决，只能在战争中才能求得出路，战争的危机日益紧张不可避免的要爆发起来。不过冯系军阀对于战争是正在选择有利的条件之下来爆发，如对于改组派的关系以及冯阎与安福系的活动等等。

陕西的人民在过去灾荒中已到垂死的地步，更被冯系军阀搜刮粮食、掠夺银钱而陷于空前未有惨状。在目前军阀战争形势之下，将来所受的灾祸更要加厉，因此，军阀战争与陕西人民的痛苦更表现直接形式。

反军阀战争是陕西党目前在政治上最主要的任务，他不仅是在一般的反军阀战争的任务的，主要而且是在陕西一切政治的群众的斗争发展上更有极重要的直接关系。陕西的党必须认识这一重要的任务是关系于陕西革命斗争的发展的。党只有认清这一任务，坚决的去执行，才能发动陕西广大的工农斗争，促进陕西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党在这一任务之下要坚决的发动群众的斗争，特别是目前群众自发的斗争要积极的去领导。目前群众的斗争与反军阀战争的工作是密切不可分离的，只有以群众的斗争才能充实反军阀战争的内容，提高群众对于政治斗争的认识，只有将群众斗争与反军阀战争的工作联系起来，才能更推进群众斗争更加有力的向前发展。陕西的灾荒决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正是历年军阀战争与封建剥削必然结果。目前虽然有些地方的秋收有望，可是军阀残苛的掠夺与地主的剥削，仍然使广大的农民群众同样的要发生惨酷灾荒，甚至将明年的再生产力恢复都陷于不可能的地步，使广大的灾荒更加扩大下去。因此，我们对于灾民问题不能以普遍灾荒问题看待，正是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走上反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最主要一个革命争斗问题，党不应忽视而要坚决来发动广大灾民的斗争，这是目前党最主要工作之一。至于反抗军阀挨户搜粮、勒收捐税等等，直接发动反军阀战争的斗争，党应抓这些实际反军阀战争的问题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斗争，虽然是一件小的问题或是普通的日常斗争都不应放松和忽视。只有在这些斗争的领导中，才能推动广大的斗争发展。对于城市一般贫民和小商人反抗勒派捐款等等争斗，党都要积极去领导，以扩大反军阀战争的实际斗争。

陕西党的组织自经过前次破获后大部分瓦解，目前虽在恢复中，不过党的组织恢复与发展都应在群众斗争中建立起来。如若只是一种恢复组织的形式，这是非常不够的，不仅是不易于将党内失败情绪与取消观念这一类的右倾思想消灭，并且不能加强党的战斗力。因此，党的组织建立与工作的发展，都要以斗争为中心。

陕西自经过严重的灾荒以后，农村经济更加破产，广大农民陷于贫困地位，土地集中于小数人之手，促进农村中阶级分

化，都是必然的结果，因此农村斗争更增加土地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灾荒问题与反地主豪绅争斗更要密切的联系起来，反抗军阀的掠夺剥削与反豪绅地主更是不可分离，才能使这一斗争更深入土地革命的发展阶段。在陕西的富农更是多带半封建地主的性质，在灾荒中必然更利用半封建的剥削关系来攫取贫农土地而升为地主。因此，反富农斗争党应遵照“中央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决议案”执行。

在目前军阀战争以及冯系军阀内部分裂过程，已使广大的士兵群众要发生动摇日趋于革命化，党对于士兵工作应特别加紧，尤其是冯军主要部队中要建立党的组织发动士兵的日常斗争。但不是不问客观情形与需要，如稍有基础即发动兵变，这样必然使党在士兵群众中的基础动摇，易被敌人消灭。我们的士兵运动应当与工农斗争发展有密切联系，要以帮助工农革命发展为主要前提。对于这种兵变主义要有严厉的纠正，同样的对于抛弃发动群众的工作，只企图恐怖或暴动的倾向和行动，也要予以严厉的纠正。

土匪问题在目前陕西灾荒状况之下更成为普遍的发展现象，党对于这一工作当然不能忽视。不过党对于土匪运动主要的是扩大党的政治和土地革命政纲宣传，使这一般失产破产而流于土匪的农民群众引导到土地革命的正轨上，不是单纯的去夺取土匪群众武装和力量来反抗军阀统治，否则，将来要变成单纯的土匪运动。因此，党对于这一运动必须建立在帮助土地革命的发展与农村争斗的关系上，才能可以免于单纯土匪运动而忽视了主要农村群众工作的危险。

党在目前工作中更要集中力量来建立重要城市的中心工作，在反军阀战争中要特别以城市做中心。对于城市工人运动的建立是非常重要，这一工作与斗争的发展才能树立工人对于

农民的领导。

在反军阀战争中，对于拥护苏联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工作要特别加紧而互相联系起来。在陕西，因为客观上的原因容易将拥护苏联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忽视，这是特别要引起你们注意的。对于中央四十九号政治通告中所指出的任务尤其是拥护苏联与反帝国主义的工作，要坚决的在工作中执行。

新党实际情形我们现在知道不大清楚，不过统一组织与改组派、第三党有相当的关系，这是可看得出来的，同样是反革命欺骗群众的工具，是革命中的敌人。党应坚决的在群众中揭破其欺骗面具，特别是“他们是共产党右派”的妄说。因此，你们对于新党的策略是以反改良主义的工农会策略来运用到对新党方面，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新党是一个党的组织，不是群众的工农会组织，假如这样认识，一定使党又陷到机会主义的道路。党只有坚决的在群众中来揭破其欺骗的面具，在群众斗争领导中来夺取其群众，望立即改正。

关于组织问题另有专函指示。

中　央

十月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冯玉祥。

〔2〕指阎锡山。

PDG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在现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异常严重、国内的革命斗争日益紧张的时期，党内的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都乘时活动起来，积极的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好像与敌人联盟一样的来向党进攻，这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全党同志必须明确的认识，只有坚决的肃清党的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错误思想和小组织行动，才能顺利执行党在目前紧张形势中之“拥护苏联”与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同时必须坚决的执行“拥护苏联”与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推进革命的发展，才能根本肃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思想。

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都走入了取消主义的观点，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

（一）他们认为过去机会主义发生的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的错误的观察”，因此他根本否认共产国际列宁

主义对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和加入国民党的路线，这就是托洛斯基当时攻击共产国际的观点，已经共产国际批评得体无完肤。在中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是由于中国党当时的指导机关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不反对资产阶级，而极力向资产阶级让步，甚至无耻的投降，把共产国际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论，变成了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决不是当时暂时联合资产阶级和加入各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的根本路线错误。独秀同志不去正确的认识历史的教训，只图避免责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斯基主义的旗帜之下而诬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为机会主义！于是他遂与托洛斯基主义同样的走入了更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派的观点。

（二）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这就是取消派的根本观点。照这样说，资产阶级克服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也对他让步了，那么，在经济上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束缚都没有了，可以坐享资本主义发展的幸福了，在政治上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矛盾都没有了，自然统治阶级只有稳定，绝“没有动摇”了。这样很简单的取消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取消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自然根本把整个的革命都取消了。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失败，不只是无产阶级失败，而且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得胜利。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是胜利了，但是对帝国主义是屈服了，因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强，对封建势力妥协了。因之，封建势力又得到一时的恢复，所以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的任务一点也没有完成，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一点也没有解除，故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为现在的这

些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并且日益加紧，故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到来。

（三）他认为“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帝国主义，都胜利了”，自然结论到“现在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权，国民党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历史证明这样的观点完全错误的。资产阶级是背叛革命，投降了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势力，而得到部分的政权，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而建立他自己一个阶级的政权，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就是这一联盟的具体形式。所以他们内部才包含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正在互相抢夺中国的统治，买办地主资产阶级正在互争这一反革命的领导权，各派军阀正在互争地盘，遂造成不断的军阀战争，一天一天的走向崩溃的道路。

（四）他们不了解这样的观点，因此得出极奇怪的结论，以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一点矛盾也没有了，而军阀战争却是由于资产阶级各派（重工业资本与轻工业资本等）的冲突所造成。这是毫无经济常识之谈。在一国内的资产阶级内部因各种经济原因而发生利害的冲突，发生政治的派别，可是决不能发生国内战争，因为在经济上他们互相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大于他们的冲突。在落后的农业国家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每个国内战争都必然要反映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如解放黑奴的美国南北战争，扫除封建藩属制度的日本西南战争，都是一样。独秀同志把这些战争都认作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战争，这真是空前未有的奇闻！至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军阀战争，主要是帝国主义相互冲突的结果，同时也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如目前的反蒋[1]战争，双方都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其所以赞助这一战

争，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利用这一工具来扩大他的利益范围，任何一方面的封建势力也是为着自己的阶级的利益，为着利用这一军阀来保持他的封建剥削关系。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都是要妥协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都只有反革命的作用，都没有丝毫革命的意义，所以这样的战争是毫无疑问的反革命的战争。

（五）他从这样抽象的观点出发，因此对于经济的分析，不顾事实的而肯定“封建势力经过商业资本的侵蚀，帝国主义商品经济伸入农村，尤其大革命的经过，已经受到最后的打击，已经是残余的残余，”已经不再保持他的封建的剥削而“努力资本主义化”，而结论到“封建势力已经完全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只有共同点而一点矛盾没有了”，这只是脑子里面的幻想。实际上中国的土地关系，虽然经过长期的变迁（主要是商业资本的侵蚀与农民暴动），虽然在土地所有关系上资本主义的形式占优势，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则封建的形式仍然占极大的优势。帝国主义商品经济如狂风暴雨般侵入农村，使半自然经济更加崩溃，封建地主更加动摇。可是，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却更加残酷。大革命的经过的确给这样的剥削以莫大打击，可是，在革命失败以后，这样的封建剥削关系又得到一时的恢复，地主阶级的势力又得到暂时回光返照的机会。同时现在全国的情形，支配全国的经济生活的：第一，是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第二，是封建的剥削关系；第三，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剥削。资产阶级虽然企图发展资本主义，封建地主也想蜕化为资产阶级，可是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无法实现这样的企图，因此资产阶级便不能放弃他的改良政纲的斗争（但这一斗争因为畏怕工农民众起来的原因，又必然是要勾结帝国主义，妥协封

建势力），而封建势力更加要保持并且要更加紧他的封建剥削，以利其存在，这是明显的客观的事实。任何人只要能抛弃脑子里的幻想与成见，细心的去研究中国经济关系，都能了解这一正确的观点。

（六）因此他所承认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到来的可能"与六次大会和中央所指出的"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到来"的意义完全不同。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意义是指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仍然在极野蛮的统治中国，封建阶级仍然是在加紧他的残酷的剥削。资产阶级因为得不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让步，只有更厉害的向工人进攻，那么，广大劳苦群众找不到第二条出路，因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反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到来。所以现在各地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突起，工人斗争的发展，农民暴动之不断的爆发，决不是什么"革命失败的余波"、"革命高潮的反面"，而是明显的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他们否认这样的前提，他们认为帝国主义让步了，而且帮助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了，（那么所谓帝国主义宰制中国便成了一句空话！）封建剥削更没有了，那么，没有什么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了，有的只是工人对资本家的革命了。所以他们否认现在广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农民不断的暴动是革命高潮的象征，而且否认一切的革命象征。六次大会与中央指出这些根本矛盾没有解决，所以统治阶级是走向崩溃，而革命形势是走向高潮，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开始复兴。他们只承认工人与资本的矛盾一点，同时又认为现在工人的斗争"只是革命高潮的反面"，那么所谓"革命高潮必然有再来的可能"只是与"我们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共产主义必然得到最后的成功"一样的毫无现在实际策略意义的话。他们以为"说革命高潮将永远

不会到来是取消派的见解”，其实说革命高潮永远不会到来，何只是取消派的见解，而且是疯子，或者是资产阶级的空想。所谓取消派的观点正是如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承认须经过统治阶级的稳定，然后才有革命的高潮的意见。

（七）依据他们的观点，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那么不是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到来，而是统治阶级稳定不可避免到来，根据这样的观点出发来决定策略的路线，自然要在原则上采取合法运动，而“国民会议”应该是中心的口号，苏维埃的旗帜只好取消。独秀同志却是很怯懦的不敢如托洛斯基一样的公开主张合法运动与国民会议，只是消极的攻击中央的路线，攻击中央号召“五卅”、“八一”……的示威运动是盲动，是玩弄，不敢公开的提出积极主张。实则在他们的观点上只有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力求合法，才不是玩弄，才不是盲动了。所以借着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合法手段”的一句话，透露他自己的观点。如果他的主张真果是如当时列宁的主张一样，那么，决不会觉得中央是盲动。因为中央的路线只是反对合法主义（带血热性的合法），并没有抛弃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手段，而且积极指出要利用公开与合法的可能来发动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同时，既然统治阶级是在走向崩溃，群众斗争是开始复兴，那么光只利用合法的可能来组织群众，光只注意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是不够的。必然同时要领导群众的斗争走向政治的示威行动，以扩大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如果说这是盲动，这只是从他的取消观点出发的取消办法，根本上与第三党的口号毫无二样。

（八）从他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分析，认为农村经济关系主要是资本主义剥削，于是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雇农、贫农对富农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斗争，地主的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

残余，次要又次要的了。所以他们认为“富农是反革命的，中农是中间动摇的分子，只有雇农、贫农是革命的柱石”，所以他们的策略路线是“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这又是对于土地革命对于农村斗争策略的取消观念！事实上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主要是地主军阀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封建剥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只是与地主阶级利用土地使用关系对农民的剥削相互勾结着，并且多半是豪绅地主兼营。至于富农对雇农的剥削在整个的农村经济关系中，还是次要的地位。所以，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抗。但是中国富农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他不能坚决参加反封建的斗争，所以现在农村中从雇农至中农都是遭受封建剥削的革命的群众，富农是动摇以至反革命的分子，所以我们农村斗争主要的口号是土地革命，斗争的策略以雇农为主要基础，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如果现在不以反军阀地主封建剥削为中心口号，决不能发动广大的群众；如果不与中农结成巩固的同盟，便要削弱革命的力量，决不能推翻统治阶级。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取消革命的最好办法。

（九）党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据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来决定的。如果客观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帮助俄皇宪兵”（列宁这样说过）的办法；如果主观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而要想扩大党的民主化，只是放任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倾向在党内发展。现在中国党的情状，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既弱，尤其是客观上白色恐怖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残酷，加以革命斗争又异常紧张，国内军阀战争、国际的反苏联战争都摆在党的前面，他们却在这个时候要求公开讨论一切不同路线的意见，要求把反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意见都公开在党报上发表，要求从支部到中央都实行民主

的选举，这无异于要求党放弃目前实际的革命斗争的任务，来实行党内清谈。要求松懈党的极端秘密的组织好让警察巡捕得以大施破坏。至于因为中央要求全党同志服从党的决议，在党的策略上一致行动，便说“这是命令主义”、“这是一贯的命令主义”。这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列宁党的服从多数、服从上级党部的一切决议和指示的根本原则，绝不能容许这样无政府的思想来破坏的。至于主张党内和平，不过是要求党放弃对于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指斥，放任这些倾向在党内发展。诬蔑中央用“警察政策”，这更是学习托洛斯基攻击俄国党的最卑污的挑拨离间的手段。可惜太不聪明了，因为把这些话用到中国党来，只有得到全党同志的嘲笑与愤慨的回答！

依据上面的分析，他们的观点与路线都是一贯的取消主义，他们分析革命失败的根由是反对共产国际整个的路线；分析中国经济政治的状况，取消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斗争，取消了土地革命；分析革命形势，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这样根本把革命都取消了。因此在策略上自然要主张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罢工与示威，都成为玩弄与盲动了。在组织上自然要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不要纪律，不要服从上级党的决议与指示，主张党内和平，一切不正确思想都有权利在党内自由宣传。这便是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整个的路线。这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中央认为这样的思想在党内发展，不止是破坏党执行目前迫切的革命任务，而且可以使党分崩离析以至灭亡。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坚决站在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与中央决议之上反对这样取消主义的思想，把它彻底肃清。

现在党内还有一种严重的调和派的倾向，如说“托洛斯基

主义是有理论的系统，我们不好简单的批评他。”“他们固然错误了，中央也不完全是对的”等，这样调和的观点，只是模糊同志的观念，松懈党对于取消派的攻击，掩护取消派的思想在党内发展，想拿一些技术的、非政治的问题，来动摇党为正确原则的争斗，为列宁主义路线的争斗。他们与取消派的不同，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原则上是一样的动摇党的路线的。并且不肃清调和派的倾向，决不能执行反取消派的斗争，所以反对调和思想的斗争与反对取消派一样的重要。

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在未开新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党同志都必须绝对服从最后一次大会的决议，违反大会决议的观点，绝对不能容许在党内自由讨论，并且现在革命斗争异常紧张的时候，煽起党内原则不同的讨论，毫无疑问的是阻碍革命斗争，破坏党，客观上便是帮助敌人。所以中央认为这样的思想，必须迅速的把他肃清，尤其不应该因为这样的讨论而松懈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

现在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党的讨论而且实行了他们的小组织的行动。反对派已经有他们的秘密刊物在党内传播，独秀同志也在未经中央决定以前，把他写给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间宣传，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因此中央在组织上有下面的决定：

（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与以组织上的制裁。

（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

（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中央认为在目前革命斗争紧张的形势之下，上面的决定是

巩固党，使党能坚决执行领导革命斗争任务的必须的方法。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中央的决议，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织。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PDG

中共中央给河南各中心县市委转各级党部的信

（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

河南各中心县市委转各级党部：

在目前全国政治局势中两大中心问题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与军阀战争。国民党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一面积极的向苏联进攻，同时内部各派军阀互相进行军阀战争的准备。目前国民党军阀对于苏联的进攻仍然是积极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蒋介石企图扩大反苏联的武装进攻以缓和反蒋运动。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尖锐，使军阀战争在各方面要开始爆发了。这一军阀战争的范围要包括全国，将在全国造成更混乱更分裂的军阀割据局面，在客观的发展上必然更加重革命的危机，促进革命高潮到来。不过在目前军阀战争爆发中，进攻苏联的危机并未减少。

河南虽自冯玉祥和平退出之后，在形式上没有把战争爆发起来，其实暂时缓和是更加准备更激烈的战争爆发，所以在各个军阀对于战争的准备并未改变，反更加尽量的扩充军队，收编土匪民团，敲骨吸髓的剥削人民充实军款。韩复榘与唐生智互相竞争扩充军队，孙良诚军队借口就食移军豫西，真是盘马弯弓待发的形势。在这一军阀战争中，河南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战争区域，这是不待言的，必然使河南更陷于战争混乱的地

位，使河南全省的工农群众罹受比目前更残酷的灾祸无穷的痛苦，而要掀起广大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中央屡次对于河南党的指示中，特别指出这一前途与党的任务和工作。在目前军阀战争形势之下，为使河南的党在军阀战争中完成党的一切任务而有进一步的指示。

Ⅰ．反对军阀战争是河南党的中心任务

历年军阀战争已将河南全省经济摧毁到不堪的地步。它破坏了全省农村经济，日益崩溃，使全省广大农民日陷于贫困地位，破坏了全省交通，无数的工厂和矿山倒闭、减工，商业日益没落，上千万的灾民，十余万的产业工人失业，盈千累万的农民化为土匪，这都是累年战争的结果。反对军阀战争是河南党最主要的中心任务。中央过去屡次对河南党部的指示上都指出这一任务的重要意义，而河南党部对这一任务至今尚未有相当的了解，反军阀战争的工作做得极不充分，也因此不能推动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使党的工作有大的开展。在目前新的军阀战争的形势下面，如果党仍放弃了这一任务，就不仅在群众斗争上失掉了政治领导地位，并且征之过去群众自发反抗军阀战争的事实上，必然使这一伟大的群众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有被豪绅地主所利用而攫取领导权，这是于革命斗争发展上是不利的。党必须认清这一形势，发动群众，坚决的执行反军阀战争的任务，一切的群众工作和党的发展都应联系在这一中心任务之下。执行这一任务的路线如下：

1. 以发动群众本身的斗争来扩大反军阀战争的斗争，这就是反军阀战争的主要策略。如果离开了群众实际斗争，则所谓反军阀战争必化为空洞的宣传的口号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和内

容，不能够领导广大群众实际的来反对军阀战争，我们只有坐看军阀战争的发展而一筹莫展。目前河南，在工人群众中，广大失业工人的斗争，铁路兵工厂及其他一切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群众发清欠饷、按月发薪和反对加重工作的斗争，一般工厂的加薪、改良待遇和日常斗争，反黄色工会官僚的斗争，在农民中的灾民斗争，秋荒问题，反对征粮，反对派捐派饷，反对拉夫拉车，反对地主豪绅代军阀苛索捐税，这一切工农群众的大小斗争，构成目前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内容。这些斗争都与军阀战争有密切关系的，不仅在这些斗争中扩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使群众易于认识反军阀战争的意义，并且这些斗争的发展，必然要发动工人群众反军阀战争的实际行动。党必须坚决的在这一策略之下来实现党反军阀战争的任务，推进河南工农群众革命的发展。

2. 加紧中心工作。中心工作的建立是河南党经常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在最近几月来，虽然在铁路、兵工厂、纱厂以及郑州、开封等地有了小小的发展，但是这些发展在整个工作不仅是非常微弱，而且在这些重要产业工人中，党的基础还没有在组织上建立起来。在目前军阀战争形势之下，更要加紧中心工作的建立。只有中心工作的发展才能树立河南党在工农群众中强固的领导基础，才能领导广大群众来实现党在反军阀战争中一切任务。因此对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铁路、兵工厂、矿山等产业工人的工作，是目前最主要的中心工作。首先要加紧这些工人中党的支部，建立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的领导，才能树立反军阀战争的中心领导力量。在开封、郑州、洛阳、新乡、信阳、彰德等重要城市，不仅是来恢复党的组织，而且是在反军阀战争的工作中来发展一切工作。党不仅领导一切工人群众的斗争，而且对于一切贫民的反抗运动都要积极领导，以

扩大反军阀战争运动，其他各县党部应以建立和恢复城市工作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

3. 发展沿铁路线和中心城市近郊的农村工作。河南的党自遭破获后，对于农村工作无形放弃，这在河南整个革命发展上很大的缺点。因此对于过去有基础现在塌台的区域，如豫西之洛阳各县，豫东之杞县各地，豫北的彰德、卫辉等地，要立刻恢复。在各有组织基础的河南南部及磁州等农运区域，要加紧工作。灾荒是农村中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是与军阀战争有极密切关系的，绝不是一个简单天灾的问题，正是军阀战争与残酷的封建剥削的必然结果。今年秋收中，虽然有些地方小有收成，但是广大区域灾荒情形并未减少，就是稍有收成地方经过豪绅地主的剥削特别是河南各军阀的勒征苛税与战争中掠夺，必然使河南广大的农民更陷于饥荒的困境。因此河南的党对于这一问题不应轻视而放弃灾民斗争的领导，应当有计划的去发动灾民的斗争，如分粮、吃大户等等。特别指出灾荒的重要原因是军阀和地主豪绅封建的剥削的结果，联系到反军阀战争与反地主豪绅斗争，引导农民由灾荒问题发展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在有收成的地方要与秋收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在这些实际斗争发展中，才能推进河南广大土地革命斗争发展。党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规定发动群众斗争的行动口号，如反对捐、饷、租、税……，反对高利贷……，反对拉车拉夫，派粮，反对豪绅地主转嫁军阀的剥削于贫苦农民等等，去发动斗争。特别是豫东南和西南已有武装的区域，必须纠正依赖军事力量及沉溺于土匪行动等不正确的倾向，发动广大的群众来扩大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农民自发的斗争，必须参加进去，反对豪绅地主，夺取其领导。对富农在原则上无疑义的是采取斗争的策略，因为河南农村中富农的政治

经济地位已和地主混合不清。在土匪、红枪会、民团的工作，应和在反动军队中采取同样的策略，勾结领袖是徒有牺牲而无效果的，只有打进其下层，扩大党的影响与土地革命宣传，反对领袖，夺取其群众，破坏其组织，引导到革命的组织和斗争的道路上来。对于过去各地的农民团体如光蛋会、硬吃会等已存在的，应利用各种大小斗争问题来组织农民代表会议或农民委员会。党的发展要以质量为原则，吸收雇农、贫农的积极分子建立农村支部，并健全支部生活，绝对拒绝富农加入党。

4. 反动军队中的工作已经不容忽视。现在河南的反动军队大多受有很深的革命影响，事实上兵士群众自发的斗争时有发生。党应设法建立组织的关系，提出兵士的要求，领导兵士群众日常斗争，宣传工农兵联合与党的土地革命政纲。在军阀战争爆发的时候，准备有计划的领导兵变，配合工农兵群众的斗争。

5. 建立产业工人的支部组织，这是党的组织上最中心的问题。目前党的组织在中北部还是停滞在恢复旧有组织状态，这在党的组织发展上是非常不够的。党应在恢复组织中，最主要的是利用旧有的关系去吸收群众中新的积极分子入党，扩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力量。党的组织发展应在斗争中，特别是在目前反军阀战争、工人斗争、农村斗争中来吸收新的革命分子加入党，不应力求数量增加，注意质量发展，使每个支部和党员都能成群众核心来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使支部生活与群众斗争有极密切联系。对于旧有同志必须经过详细考察，不应该随便加入组织，以防敌人侦探乘机跑进党内，增加党的危险，特别在旧有的同志对于过去经济观念及一切不正确倾向要加紧纠正，因此对于一般党员政治教育要特别加紧。

6. 加紧对 C. Y. 的工作。党必须帮助 C. Y. 在最近期间

恢复中心城市和中心产业的工作，在铁路、兵工厂、矿山、纱厂等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青年兵士群众中，党要特别帮助C. Y. 发展组织和群众工作，要加强党对团的政治指导。学生群众中的工作，目前尤须注意C. Y. 支部生活的充实，发展新的分子，扩大工农革命思想的宣传和领导学生群众的斗争。

7. 发展济难会的群众工作。济难会的发展，不但目前在河南具有最有利的条件，也是党发展群众工作的恰好的路线。各级党部必须运用这一路线，推动支部同志发展济难会的群众工作。但是济难会的工作决不是和平发展或机械的组织所能建立起来的，必须抓住社会上群众中各种统治阶级压迫的问题，扩大宣传，反对白色恐怖，反对军事戒严，鼓动群众的互济和对革命的同情心，才能建立济难会的群众工作。

8. 扩大反对军阀战争的宣传。联系到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和拥护苏联，改变过去宣传上的偶然现象，建立有系统的经常的宣传工作。目前各中心县市委和铁路都须出版一种定期刊，兵工厂、矿山的工厂小报如有可能亦须建立，特别加紧反改良主义的宣传，要针对着改良主义一切欺骗宣传。

9. 在群众斗争的发展中建立群众的武装组织。当然“用阶级战争消灭军阀战争”的口号在目前还只有宣传的意义，但我们必须发动群众斗争，利用军阀战争的有利的局面，争取革命高潮到来的前途上。所以决不能以为河南党主观上力量的软弱便放弃武装群众的任务，尤其是农村中已有武装组织的区域，更该加紧和扩大群众的武装组织和训练。

10. 争取公开的斗争路线，组织反军阀战争的群众示威。在群众条件具备的时候，尽可能的发动铁路、兵工厂等群众的罢工。在军阀战争爆发的时候，更应依照这一路线发动广大的群众。

11. 目前有几个可能发生的错误观点，足以妨碍反对军阀战争这一任务的执行。第一是以为反军阀战争只是宣传口号，是机会主义对反动战争的态度。这种认识的结果，便是不去发动群众，不在实际上准备“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战争爆发后束手无策，客观上就是帮助军阀战争。第二以为军阀战争的爆发有利于我们工作发展，不去积极的发动群众等待军阀战争到来，或是因为军阀战争白色恐怖加厉不敢行动起来（如磁县对于“八一”连宣传品都不敢发等），这都是右倾的危险断送党的生命。第三在反军阀战争中忽视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危险，这与现在河南某部分极少同志中对“拥护苏联”的口号动摇的观念结合起来，便会完全放弃了拥护苏联的任务。现在国际的国内的情势，即或军阀战争已经爆发，也并没有减轻反苏联的危险，拥护苏联和反军阀战争是目前党的两大中心任务。第四便是以为反军阀战争和反帝国主义、反对世界大战无关。我们要向一切群众指出，军阀战争便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工农要想免除军阀战争的痛苦，必须同时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同志们！军阀战争将要开始了，我们决不容在这一反军阀战争的中心任务之前犹豫，发动群众的斗争，准备群众的反军阀战争的行动，并使这一工作与党的基本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与当前的中心任务反军阀战争、拥护苏联联系起来。

Ⅱ. 铁路工作和反黄色领袖的斗争

铁路工作占河南全省工作之中心，在军阀战争的危机日益加紧的现在，更加显见其意义的重大。现在铁路群众的斗争已

有开始发展的趋势，党须集中力量推动这一工作。

铁路的中心问题是反黄色工会领袖斗争问题。现在群众对黄色领袖虽都表示不满，并已起来与之斗争，但在群众斗争没有大的开展，黄色领袖利用其政治势力，仍然保有统治工会的地位，群众对他们还不能最后的采取决绝的态度。现在各路都因为旧的黄色工会已经完全不能在群众中起作用，顺水推舟进行改组，用新的黄色领袖代替旧的，举行黄色工会的改造，更使反黄色领袖的斗争成为铁路的中心问题。在军阀战争中，对于黄色领袖更要替军阀来扩大改良主义的宣传。反黄色领袖斗争不仅与群众的经济斗争有很好的联系，并且与反军阀战争要密切的联系起来。群众中存在的帮口斗争，是路工工作中大的困难之一，党过去的工作没有将这一现象消灭。如在京汉以南方人为党的基础，在群众领导上形成南方与北方的现象，陇海则是北方与南方的冲突。还有与帮口相类似的困难是开车升火和机器厂工人的对立现象，如过去交通来以开车升火为基础和机器厂工人在行动上组织上分裂，破坏工人阶级的一致。党在工作中，必须注意群众中这些困难，用阶级斗争消灭这类的封建的原始的分裂现象。目前在铁路工作的策略和路线如下：

1. 在群众一切斗争中都要扩大反黄色领袖斗争。目前须在总的反对新旧黄色领袖之形势之下发动广大群众的经济斗争，发清欠饷，按月发薪，加薪，失业恢复工作等。在京汉须要长辛店代表会议通过的六条立即实现，揭破其欺骗面具。经济斗争的发展，更能发动广大群众，扩大反黄色领袖的斗争。

2. 发展黄色工会内部的日常斗争。尽量利用清理账目，反对揩油贿赂要求工会绝对的民主等日常问题，发展黄色工会

内部的斗争，提高群众的斗争力量，肃清黄色领袖在群众中残余的幻想，发展到反对一切新旧的黄色领袖，群众自动的改组工会。在现在正在改组的工会中，必须号召群众反对国民党派人包办改组，拒绝国民党的指导，工会由工人自己办。

3. 利用黄色工会的组织系统领导群众。组长会议是黄色工会的中坚，党须吸收积极的组长入党，扩大党在一般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党对群众的领导。即使是黄色工会系统下的附属组织，都要注意当地群众中实际情形来运用，不可机械的组织，避免黄色领袖的打击和群众分裂的现象。

4. 扩大赤色工会的影响，在目前是有效果的。必须由全总选择熟习路工运动的得力同志来往京汉和陇海的各站，与过去在革命工会领导下的群众和积极分子发生工会关系建立赤色工会的群众基础。

5. 加强党的组织。如果党的组织不能有健全深入群众的铁路支部，即使群众斗争受党的影响发动起来，也不能获得党的领导。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必须发展新的同志，使失业同志恢复工作。党的发展不可只偏于北方或南方的任何一帮，同时要注意开车升火和机器厂的普遍发展。

Ⅲ. 失业工人运动

河南全省的产业工人不过十余万，而现在矿工、兵工厂、纱厂、花厂、蛋厂及其他小工厂的失业工人就将近十万。失业的原因是受战争的影响工厂停工，不是因为农村来的产业后备军劳动力过剩的原故。虽然有许多失业过久，已经转为车夫小贩，但大部分并未脱离工厂的关系。这一问题是河南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工作，如果能够发展起来，更增加反军阀战争有力的

PDG

发展，便能建立河南职工运动的基础。对失业工人运动的策略如下：

1. 斗争的中心口号是开厂开工和失业救济。在运动开始的时候，群众要去请愿，我们仍应参加领导，要使合法的请愿运动转变为群众示威。

2. 建立失业工人的组织，组织失业工人联合会等。铁路、兵工厂、矿山、矿厂的失业工人及其他尚有部分开工的工厂，失业工人应与在业工人联合起来，失业工人的组织更应在工会组织之下。

3. 反对改良主义的欺骗，反对黄色领袖。铁路和纱厂等便应利用失业工人的斗争来威迫黄色领袖，揭破黄色领袖欺骗群众的面具，更加促成在业工友反黄色工会斗争。

4. 扩大宣传鼓动工作，指出失业总的原因是军阀战争，以发动反军阀战争的群众示威行动。

5. 抓住中心部分的失业工作，特别是兵工厂、铁路、纱厂和矿山。现在大部分失业工人已分散，只有先团聚这些中心产业的失业工人，影响其余的花厂、蛋厂等产业。

Ⅳ．恢复省委组织

河南自取消省委暂时直属中央之后，在工作上是有了相当的恢复，如郑州、开封铁路等工作，洛阳、新乡、焦作、彰德都有了党的线索和组织。在目前军阀战争中以及全省工作指导上与互相关系上，在目前都有恢复省委之必要，尤其在军阀战争爆发后，若是在河南没有一个集中指导机关，在工作指导上要发生许多困难，并且要妨碍全省工作发展。因此中央决定开始准备恢复省委组织，须以五人组织临时省委。将来这一省委

主要的工作，仍是注意指导几个中心县委的工作和帮助全省工作发展。□□五人经常只有一人在省委办理一切经常工作，其余委员仍然按期巡视各地，规定一定的时期开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

（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

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

目前两广军阀战争已紧张到了极度，我党在两广的工作，中央除于毅宇[1]同志来此面谈之外，更有以下的书面指示：

Ⅰ. 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路线与其危险前途

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联成为目前政治形势中我党的两大任务，以及实现此两大任务的主要策略，中央在四十九号通告中已均有详细说明，可作为两广党部讨论施行的根据。惟关于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在两广有一工作路线的根本问题值得中央于此加以反复的说明。中央通告中指出："我们对于这样反革命的战争，是要采用失败主义的路线，就是要使战争的两方通通失败，革命的势力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是我们中心的宣传口号，必然使这一口号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使广大群众了解，只有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然后才能永远消灭军阀战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反军阀战争的一切部分的斗争——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反对运

兵，反对增加工作时间等的斗争，渐次汇合成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之总的斗争”。这是反军阀战争中一贯的工作路线！在两广不仅完全适用，且因双方战争已起，更应加紧的执行这一工作路线，使我党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总路线能于这次两广军阀战争中得到更大的收获。但在这里，却有一严重问题横梗在两广尤其是广西的工作形势中，稍有不慎，便将使党的全部工作路线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因为在目前两广尤其在广西的工作形势中，一方党的群众基础还不宽广，另一方广西党部却多多少少对于广西军阀政府的设施已存有幻想。很显明的，现时广西军阀政府的一切设施最多亦只是个急进的改良主义者，实际上他并不能脱离全国统治阶级的经济背景，甚至他更不能脱离广西本省的封建基础乃至帝国主义的控制，来真正实施何等改良主义！故一般的说还只是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惟其是欺骗宣传，我们更应及早揭破群众对他的幻想，领导群众毫不犹疑的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不管现时广西军阀口头说得如何漂亮，对群众表示得如何好，只要群众的革命斗争一起，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一起，凶恶的军阀原形将必要毕露。即使到那时，还有所谓革命的军官同情于群众斗争而走到群众一方面来，也只有在群众的革命斗争起来后才能看出，才能证明（老实说，便是我们同志的军官，也须如此才能证明）。否则，在群众的革命斗争还没起来的时候，军阀的利益还没直接受着损害的时候，谁能保证军阀军官中革命的语调与表示是真实而可靠的呢？广州暴动前，记得在张发奎军队中有许多表示忠诚于革命的人，暴动一起，顿时起了分化。只有群众斗争才是革命真假的试金石！尤其是军阀军队中的军官，不管他直接压迫群众与否，在他的地位上，他已处在被革命的地位。况且既做军官，他必然要依靠一般军队的惯例，来束缚士兵群众的政治自

由。即使他在生活上能给士兵以稍好的待遇，但在政治上无论如何脱离不了统治阶级一般的关系。否则，他只有革命而投身到工农群众方面来。正确的说，即使这一军阀军队中的军官是党派遣同志混入去做的，他的作用亦只在破坏敌人队伍，绝对不是争取群众的公开路线。故在现在统治阶级队伍中做事的人，不论其言谈如何，一二件事情的设施如何，至多只能将他看做是改良主义者，当做改组派第三党一样的反对。在目前统治阶级日益走向崩溃、群众革命斗争日益开展的形势中，革命与反革命的壁垒只有愈加紧严，才能愈利于革命的进行。反革命的统治阶级利用各种各色的欺骗引诱以混淆革命的战线，以缓和革命的发展；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利在愈坚决自己的革命领导，才能愈获得广大的群众一致的为革命斗争。所以现时我党在两广的反军阀战争工作，尤其是广西的反俞李杨吕[2]等军阀的工作，不应与上述的路线有丝毫歧异。这不仅在口头上接受，要在实际行动中真有反抗的斗争表现。依现时两广尤其是广西的工作情形看，我们感觉下列五种危险的条件已有多少的存在，这在工作前途上实成为极严重的问题：

第一，在两广军阀战争发生的区域，我党领导群众的力量极其薄弱。在广西，群众运动可以公开号召，三四月来，未闻我党有一件领导群众斗争的显著事实。是群众不起来吗？不是，在俞作柏初回去时，有许多群众对他存有幻想，因之发生有农民代表找他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广西的党如立即注意于此，则三四月来，我党必早已将跃跃欲试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形成广西党的基本力量、反军阀战争的群众基础了。因为事实的相反，不容我们不恐惧到广西党部的注意力将必在彼而不在此，不要说将群众工作放在次等的地位，便是将群众工作与军事阴谋等量齐观，或是忽视了群众斗争的发动与

领导，广西党必已踏入了机会主义之门，将使广西党全部工作与党的争取群众的总路线立在分歧的道路上去了。在广东除去北江几县外，其他的战争区域如广州及中西路各县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假使省委对于他们的指示和督促稍一不足，他们很容易发生与广西党部现时同样的毛病，或是一动也不动，或者一无群众工作可言。群众基础的薄弱，群众斗争之未能领导，这是使党趋于右倾之最危险的条件。

第二，现时两广的军事运动尤其是广西，士兵中的工作极其薄弱。广西直至毅宇同志巡视后，才开始向士兵群众中求发展，但发展的数量与部队都还极其窄狭。以前则尽做的是军官运动。便是广东省委对于怎样发展士兵工作的全部计划也还很少注意，引导工农群众投身到敌人队伍中去争取群众的工作，总不如介绍同志去当军官的那样多分注意。没有士兵群众的基础，如何能实现军事阴谋的企图？没有士兵群众的兴起，又如何能实现反军阀战争中的失败主义？即使有三数军官是坚决革命的，能执行失败主义的策略，如一没有工农群众斗争的基础，二没有军队内部士兵群众的工作，亦终将归于失败。故不重视士兵工作而多分注意于军官运动，必致重蹈国共合作时代机会主义的覆辙，而且要更加厉害。

第三，在俞李及改组派统治的广西，一切政治的设施显然是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的——不管其实质上能否实现其改良主义的企图，但政治上欺骗的影响确已侵入到工农劳苦群众中去了。因此，这一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不仅可以诱惑群众，增加其对于统治阶级的幻想，延缓其革命斗争的发展，甚至已经反映到我们党内，同样发生对广西政府存有幻想的动摇同志。广西群众改良主义的幻想，同志中竟发生有猎官做的可耻行为。这都是广西工作中存在的很大危险！

第四，目前广西的统治阶级好像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自由是相当承认似的，其实正因为广西的工农群众斗争还没急剧的发展起来，所以这种欺骗的面孔还能保持。一旦群众激烈起来，有动摇统治阶级存在的危险的时候，或是统治阶级受着帝国主义的威吓及其内部严重压迫时（如军阀战争或豪绅资产阶级向政府严重抗议），群众现时所被赏给的一点点自由必要被剥夺净尽，反之还要受比一般还严重还残酷的压迫。愈因群众（甚至党内）对统治阶级存有幻想而和缓其争自由的直接斗争，则压迫之来将愈加显其严重，愈加使群众措手不及反抗，这是目前潜在的危险。假使党的指导机关不了解这一危险，甚至党内还反映群众中的幻想而同样一无准备，则统治阶级之必然反动，必将成为广西党部意料之外的“突变”。那么，危险之来，更将影响及于党内。

第五，目前两广党部的指导机关，除了广东省委大体上了解中央所指示的策略并相当懂得如何应付当前的事变外，我们对于广西特委以及许多地方党部，终觉着他们有可以发生机会主义领导危险的事实根据，来令我们相信。如上边所说的群众斗争之忽视，士兵工作之薄弱，偏于军官运动，对统治阶级的某些分子存在有幻想，这不能不说是广西党的指导机关中已作下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

以上的五种危险条件的存在，极值得两广党部予以最严重之注意。并且不仅注意，更要从实际工作中对于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予以无情的打击，要毫不犹疑的对于坚持机会主义以至军事投机路线的分子给以组织上严重的制裁。至于离开阶级立场而自由猎官做的分子，更要立即开除出去以严整党的组织。

Ⅱ. 目前最紧要而迫切的任务

在两广反军阀战争的工作过程中既作下了上述的危险，党便须更加紧对于正确的工作路线之执行。中央认为现时两广工作之最紧急者约有下列几项：

第一，要毫不犹豫的发动群众日常斗争与领导群众直接行动。目前两广群众斗争的形势，客观上是极利便于斗争之发展，尤其是军阀战争开火后，斗争的机会必要较平时为多。群众主观上虽在广西还对统治阶级有幻想，但战争到来客观上将要打破这一幻想。在广东则群众斗争久已跃跃欲试，故群众斗争的中心关键，是在党与群众的关系以及党在群众斗争中的领导。只要党坚决的向着群众，在群众中寻找线索建立关系，毫不迟疑的领导群众走上斗争之路，则群众必然会发动起来。军阀战争已经开火了，工作的形势已经开展在我党的面前，现在所最怕的就是党的犹豫不前，党的机会主义的等待。广西党过去的失策已经是过去了，现时应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治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不管梧州是落在任何派的军阀手中，不管统治阶级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是压迫是和缓，我们的工运方针与群众工作的路线总没有变更，总须发动群众从日常斗争做起，领导群众直接行动，领导群众为自由斗争，领导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打破其对于任何一派的统治阶级的任何幻想。战火开后，广西群众工作在我党主观之人力分配上与客观之交通隔断上必有一层困难，但必须告诉广西特委要战胜这一困难，要以最得力的工作同志分配于上述的工作区域去发动群众，须绝对避免集会中于军事运动或在军运失败后便全部躲避起来的倾向。在广州在中西路的重要城市，也须依照省委原有的计划陆

续派遣同志去开始工运，开始群众工作，决不应稍存等待的观念。愈因为我们能在敌人严重压迫时树立起群众工作的基础，才愈能在战争形势转变时（万一改组派有胜利可能），战胜敌人之改良主义的欺骗。如果严重压迫的环境继续下去而没有任何改变，则我们工作也只有这样艰苦耐心做下去，才能逐渐树立起党在群众中的基础，才能不致使这次军阀混战的机会空空过去。否则，省委稍一犹豫，下级党部及同志必会使等待的右倾观念发展起来。在工运中，铁路海员的工作是广东工作的主要对象。我们现时决不要以仅有的线索为满足，预料其工作前途没有多大困难。过去事实教训我们的是铁路工作稍一不慎，便会造成铁路工人中的分裂。海员工作便在内河，我们也还没能抓住船上的中心斗争来发动群众，这都须广东党部很细心很坚决的指导工作，决不应有丝毫粗心与大意。对于机器工会属下的工人运动，广东党亦极欠注意现时机器工会的活动范围。在下层产业与工厂中，已渐变成整个产业的组织，如兵工厂、电灯厂等工会都包含有全产业的工人，故我们在这种工会中的工作必然要采取对黄色工会的同样策略，不反对这一厂一业的机器工会分会，而只反对其黄色领袖与要求在业工人自己的武装组织，反对为资本家工贼走狗的雇佣式的体育队的组织。广州市郊中西路及广西梧邕柳浔一带的农运，省委必须有计划的开始工作。现时在这些区域农运的主要策略还是发动日常斗争以走向武装游击，而工作的计划与人才的适当分配是目前省委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各个城市乃至乡村中的反帝斗争，也不应因反军阀战争工作之加紧而不与他联系起来。要知这次两广军阀战争中各派之胜败存亡的关键，完全操在香港帝国主义手里。陈济棠、吕焕炎的合作，一方反对张□□粤，一方严防蒋[3]系军队，这显然是在大英帝国主义

操纵之下的组织不与老西山会议派的重新结合！故各地反帝运动必须加紧。

第二，要迅速的有计划的深入士兵群众中的工作。在目前客观的兵运利便条件已不如过去的两三月，但这是执其一端而言，若就军阀战争已经开火来看，则目前更是发动士兵斗争，组织士兵于党的领导之下的最好机会。过去士兵工作之缺乏，不仅广西，广东亦复如此。现时的中心问题，首先应从宣传鼓动上着手。在广西的军队中，早就应利用机会，公开我党在士兵群众中的宣传与鼓动。我们不能因为俞李杨在其军队中发了士兵欠饷，相当的允许士兵过问他们自己的给养，便以为这些军队中的士兵已无日常斗争可言。事实决不如此简单，士兵的痛苦是与军阀军队并存的。军阀制度存在一天，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决无法得到根本的解放。军阀为要维持他的统治割据，他必然要克扣士兵的军饷，苛刻士兵的待遇，以扩大他的军队，加增他的实力。俞李等的小恩小惠也不过在巩固他们实力的意义上，采取如此积极的态度以便取得军心。一旦军事行动紧张起来，军阀战争亦已开火，则他们对于士兵的态度必然不可免的要与其他军队一样。即使俞李本人主观上是愿以士兵群众为其投身革命之基础，但当其军阀制度未被推翻以前，士兵群众还未发动起来投身于革命斗争以前，俞李个人又何从表现其革命行动？反之，他们一切所为，在没有投身于革命斗争以前，还都是些改良的欺骗，客观上正有利于改组派的宣传。假使我们工作不好，转而会缓和了士兵群众的直接斗争，蒙蔽了士兵群众迫切的革命要求。所以现在的中心问题决不是俞李个人是否真心投身于革命斗争，而是我们在其军队中究做了几许的士兵工作。我党在广西的各地组织如不能在其与士兵的日常接触中，向之作革命的宣传，鼓动其发动军队中的日常斗争，组织

起党的秘密支部，则广大的士兵群众不仅不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行动起来，便是俞李个人在其军事失败的时候，真心愿意投身于革命斗争，将其军队硬以命令式的发动去实行游击战争，广大的士兵群众亦难免不为其他投机与反动的军官所欺骗，而实行反对俞李，仍然回到国民党军阀的指挥之下，来屠杀自己的工农弟兄。故任何方式的军事行动，如果不能从士兵群众的基础上，与工农斗争的联系上着手，结果必陷于军事投机的失败覆辙。现时广西党乃至广东党如不努力于士兵群众工作的发展，急起直追的来发动士兵，组织士兵，则在这次反战争的工作中，我党又将无多大的收获。倘使广西军队中的军官，的确有些真倾向于革命的，不管他们战争的前途为失败为胜利，我们工作的总路线必须在失败主义的原则下，鼓动起士兵群众中的日常斗争，组织起士兵群众斗争的力量，以准备军队中的革命基础。能如此，我们的群众基础立定，则不管军官的向背如何，皆不能动摇我党的路线丝毫。否则，我们在主观上虽也知党的路线绝对不能动摇、绝对不能迁就丝毫，但实际上必因我们无群众基础，不自觉的将以军官的赞否意见为我们决定工作的根据，至少会影响到我们议事的根据。事实上，广西党的生活中已有了这些现象，急需省委特委予以严厉的纠正！目前士兵运动最具体的办法是：省委特委应找到得力工作人员专门做士兵工作（中央已派去两人），督促各地方党部加紧士兵群众中宣传组织工作，有计划的介绍工农群众投入军队，建立在士兵群众中党的宣传工作（如发传单、发行士兵报纸，发布党的政纲等），扩大军队民主化的要求，强健各地兵委的组织，严密军队中的士兵支部，特别注意中心部队中心部门的发展。至于兵运的一般具体方法与宣传鼓动的口号有过去中央的指示，可作参考。

第三，要坚决作反改良主义斗争。目前广西的统治局面显然是改组派的政纲在统治着。不管其改良政纲能否施行，改组派是否握得实权，但改良主义的欺骗确已影响于群众，确已缓和了一些群众的直接斗争，使群众对现政府生了相当幻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广东党尤其是广西党应毫不犹豫的予改组派以政治上组织上公开的打击。要尽量的驳斥改组派的改良理论，对于广西政府的改良主张都须加以无情的反对。对现已开火的军阀战争要加双方以攻击，号召群众直接起来反抗。对广西政府或俞李等人的反蒋宣言如系站在政府地位、站在改组派立场、站在改良主张上说话，更必须勇敢的站在工农劳苦群众方面予以正确的批答。总之，凡现政府的一举一动，改组派的一言一行，我们必须公开党的面目与之对抗，公开党的政纲的宣传以争取和发动广大群众。只有公开的号召群众直接斗争，不断的举行反抗的示威演习，才能动员起广大群众，才能树立起革命的斗争力量，才能影响到广大士兵群众与存有革命倾向的军官，最后才能克服改良主义的一切引诱以促进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潮之总的汇合。在这里，最具体的办法，除掉上述的群众工作外，必须将香港的小日报尽量的宣传我们的主张，以批评两广政局，以反对军阀战争，在广西亦须尽速度的建立日报公开我们的主张以争取群众。一方面香港的日报要想尽方法传达到内地，另一方面要使广西的报纸便在被压迫的时候也要能在群众中公开的或秘密的散布。群众的组织，我们必须毫不放松的将他们在斗争中组织起来，并且力争公开。如有些群众组织已为改组派所领导，则更应毫不犹疑与之争夺群众的领导，并以群众之力将其驱逐出去。公开一切群众组织以号召斗争，是目前广西局势中最急迫的任务之一。广东在有群众斗争与能够发动群众的地方，也要照着这一路线做去。我们反改良主义

派的斗争是极艰苦而长期的工作，决不是打倒了赶走了几个改组派或黄色的领袖便可认为满足。不但在改组派，机器工会的活动中要不断的产生改良主义的黄色领袖，便是我们同志也同样会受改良主义欺骗宣传的影响，甚至做了群众的领袖，还会因其动摇妥协将自己也变成了黄色领袖，这种事实在与改良派斗争激烈的上海已是层见叠出。所以反改良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两广局势中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望省委与特委予以严重的注意！

第四，依照目前的局势看来，不管广西军阀胜与败，极端反动的压迫终将不可避免的来到。因为广西军阀如要战胜广东二陈[4]及蒋系军队，必须具备下列的四个条件：一须与香港帝国主义妥协；二须得到广西内部的统一，至少限度要对杨腾辉乃至吕焕炎让步；三须得到张发奎的军事援助；四须以改组派拥汪的旗帜做号召。在这样条件之下，即使两陈及蒋系军队真失败了，两广仍将继续大英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成为张发奎吕杨称霸乃至以汪精卫改组派为号召的天下——这便是广暴前后的局面的再现！反之，如两陈及蒋系军队胜了，两广将以蒋系为领袖，而广西复入于旧桂系之手。这两种局面，都不可避免的要走入极端反动的压迫。故问题的解决，决不系于俞李等军阀之真正倾向如何，乃系于我们对于更反动的局面到来之准备如何。准备的主要关键，在严整我们的堡垒，公开我党的主张，以发动广大群众，由斗争、罢工、示威的反抗一直联系到准备武装暴动之总的回答。在这种工作过程中，特别对于广西的局势，我们必须坚守下列几个具体办法及原则：

一、对于现在统治阶级中的某个分子，不管其倾向与表示如何，当其在位一天，至多只能以急进的改良主义者看待。

二、对这些当权分子，我们在政治上总是与之对立的，他总处在一个被革命地位。

三、即使这些当权分子中有倾向于我党的人，但当其在位一天，我们总不能与之发生正式的组织关系。

四、军官运动不能被认为党的军事运动之基本工作。

五、在阶级立场与政治责任上，我们同志不应为现时政府中任何官吏，同志中自由猎官做的人尤应绝对禁止。

六、无论在任何国民党军阀军队中的工作路线，总是破坏他的，绝对不是巩固他的——夺取其士兵群众以投入红军或是整个转变为红军，亦仍要破坏他固有的军阀制度，而改变为我们的赤色军队。

七、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是时时准备能与敌人决裂的（但不是无条件的兵变主义），故应注意到工农群众斗争的经常联系。

这些都是组织上严整我们壁垒的办法。依此路线与群众斗争及士兵工作联系起来，便是极端反动的压迫到来，我们亦决不至因毫无准备而溃散，反转会有极积极的反抗表示和行动。

第五，要严防党内右倾的发展与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的发生。广东省委对于这一问题要严重予以注意。省委要加强自己的政治指导，特别对于广西的指导。对于军阀战争前途的观察，不要离开帝国主义是战争中主要动力以及阶级的根据，而只从军事立场上推测双方的胜负——这便是机会主义的出发点！对于地方党部的工作要在其主要部分严格的予以检查。同志间已经犯有了右倾的错误，要用教育的方法予以纠正，但同时要检查其是否已为系统的错误或自觉的过失。如是，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如指导机关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省委更须严厉的予以纠正与指斥，必要时还须予以组织上的改组。对右倾

与机会主义的斗争，不仅应用在政治指导上与事后检查上，便是在经常的工作注意与布置上亦须严防机会主义倾向的发生。如广西特委的军事运动过去偏重军官运动而忽视士兵运动，这在实际上确已作下了机会主义的种子。因此，两广党部在反军阀战争工作的布置中，必须反对任何等待主义倾向，必须在争取群众运动公开与保持党的组织秘密的路线上，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以准备群众实现“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的总的任务。

第六，要深入土地革命斗争，扩大游击区域，建立红军乃至发动可能的游击战争。在反军阀战争的紧要关头，土地革命的斗争在广东更须立求深入。在东江军队空虚的区域，农民暴动的发展，只要我们能有计划的发动与坚决的领导，则游击区域必可扩大，红军必可建立起来。省委于此应决定一详细行动计划指示东江特委及海陆丰地方党部，并要与朱毛红军的游击及惠属的工作联系起来。北江、清远、花县乃至南雄、始兴的游击战争均有可能发动起来。如果北江的战争趋于小北江及西北一带，我们更宜有计划的发动军队后方的农民的武装斗争。广西的军队如果有被吕杨或两陈解决的危险，则我们所能领导乃至所能解决的部队均应预为之计的将他们发动到农民群众中去，实行游击战争发展土地革命。这一计划，我们决不应以这些部队之高级军官的倾向意志为转移，而应纯全建立在我们所能领导与所能解决的实在群众力量上。假使高级军官亦有同情于此种举动的人，我们只宜将他看做是一种助力，决不应依之为发动的主力，以遗贻误大事！这一点是目前广西军事工作之最后命脉所系，省委特委要有很详细很具体的办法处置此事。

以上所指均为目前两广反军阀战争中最迫切的工作，省委

特委必须于接此信后立即予以讨论并见诸实行。其他问题，要待他信再及。

中　央

十月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贺昌。

〔2〕指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吕焕炎。

〔3〕指蒋介石。

〔4〕指陈铭枢、陈济棠。

PDG

中共中央给陕西临委的指示信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

陕西临委：

根据你们九月二号的工作报告，中央对于陕西工作有以下的指示：

你们对于陕西群众革命情绪的估量以及今后工作的主要方向，大体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政治分析以及工作路线上仍不免有许多错误和欠周到的地方，兹特指出，希望你们接到这封信之后，能够参照中央最近的各种文件，更具体的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1. 陕西的政治状况与党的任务

A. 陕西境内的军阀暗斗与全国的政治形势：在你们的政治分析中最主要的缺点便是分析陕西政治只着眼在陕西，而未能与全国的政治形势相联系。在目前灾荒奇重的陕西境内，驻有那样大量的军队，自然无法给养，因而必然更要推进大小军阀争夺地盘的暗斗；在整个西北军得不到出路以前，此种暗斗将会继续增长（即有出路亦不会根本消灭）。孙良臣部队之夺得较为富庶的渭南、华县自然要惹起宋哲元的不满，然而所谓富庶的渭南、华县仍然不是孙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当然我们绝不否认，西北军处此内无给养和外部诱胁之下，而将有“走

入分崩离析”以及整个西北军系统解体之可能。然而整顿兵力向外发展，这不仅是宋哲元的企图，依然是既得“富庶之区”的孙良臣和心怀二意的庞炳勋的唯一出路。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西北军内部争夺地盘的相互冲突和蒋介石乘机收买，唐生智亦谋分化攫取的企图；但是，另方面却亦有协力合作向外去找出路的活动与可能。冯[1]、阎的形影相随，阎锡山自别有居心。而与南方的倒蒋联合以及最近北方军阀大团结的喧嚷绝非无中生有，西北军在这一反蒋的联合之下，才足以实现他们共同意想中的出路。当然这并不是说因为这一联合成功便可消灭他们相互间的冲突，而是说在分析陕西政治时，应该估量到全国的政治形势及其趋势。就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看来，绝非如你们所说西北军只有一条分崩离析的道路。在你们这种分析固然是在说明陕西军阀统治的日就崩溃瓦解，而将要造成一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途，然而你们却忽略了全国统治阶级内部反蒋势力的结合、酝酿。另方面便是过分估量了蒋派势力在全国的统治，而轻视了全国军阀战争的准备，只看到蒋派“政治影响在陕西扩大”，而轻视了在反蒋的联合下的共同出路和酝酿的事实。表面上似乎是一种“左”的估量，实际上却会落到一个右的结论。

西北军内部的暗斗或大规模的倒蒋运动，都是军阀战争的准备，这些战争都必须要搜刮民众，加重对于民众的剥削。因此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即号召广大的民众，作反对军阀战争的运动，在陕西特别要注意打破群众对于蒋介石、阎锡山的种种幻想。更要指出帝国主义是主持中国军阀战争的祸首，帝国主义想永久的牵制中国、剥削中国民众，不仅帮助中国反动的军阀镇压民众的革命运动，并且最近指示国民党军阀强占中东路，向世界革命大本营的苏联实行武力进攻，在东方造成

一个反对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的联合战线，企图消灭中国革命、瓜分中国，这一问题已经成了目前极其严重的问题。因此在反对军阀战争口号下，应该联系到反帝国主义、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等口号。应该借着一切派粮搜粮、苛捐重征的问题，发动群众的示威运动。自然目前没有群众组织、党的基础薄弱的时候，比较难于号召，然而党应利用各种公开号召群众的方式去动员广大群众，去组织广大群众的示威运动，党的政治影响才能扩大，群众组织更能广大的组织起来。同时必须与群众的实际要求有很好的联系，才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参加。

B. 农村饥荒问题与领导斗争：目前的饥荒问题可说是陕西的主要问题，因而此种工作亦是陕西的主要工作之一。以“贫民救济会”的名义，自是博得群众同情，接近群众的方法之一，然而最主要的方法应是领导无食的贫民直接起来斗争，如在陕北的米脂、绥德的“饥民自救团”，横山、神木等处的“要吃会”、“发赈请愿团”等组织。在没有党的领导的地方，党应设法去参加领导，在已有党的领导的，宜加强其领导，使此类组织不仅是种消极的请愿作用，而应有积极的分粮等行动，在行动中力避走入合法运动。在目前播麦的时期，应作分放麦种的运动，反对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麦种、重利盘剥。来信提及因为军队党部的摊派收粮，即富农亦难于度日，怀怨在心。就全国的情形讲，富农在乡村中的多是兼小地主及半封建剥削的形式，是乡村中的高利贷主，贫民、雇农之重利盘剥者，就陕西说也不能例外。虽然目前富农自亦不满目前的军阀统治，而在我们的工作原则上，应以贫农雇农为中心，绝不能放弃贫农、雇农对于富农的斗争。最主要的是取消以前的借贷契约等，因为单就目前的境域讲，富农似和贫农雇农处于同等地位，然而一旦灾荒过后，仍需向富农还债。所以目前乡村中

的斗争及灾荒运动中有富农参加，党应领导雇农贫农争夺领导权。

来信谓“以农村自治会的名义为中心口号”，这一口号是改良主义的口号，是企图在目前的统治之下得到些微的民主，其结果必然要变成乡村中富豪的御用机关，反而混乱了群众的革命意识。所以在北方的山西等省，统治阶级曾用乡村自治、村长制度等作为巩固他乡村中政权的工具。我们不仅不用这种口号，并且在统治阶级提出这种口号时，应揭破其中的阴谋。我们应该向群众宣传宣维的口号，用饥民自救团、贫农会、农民协会等名义组织群众，引导群众的直接斗争。当然乡村中的斗争，特别是在目前的陕西，很容易走到与军队的武装冲突，因而对于士兵工作应特别注意使其与乡村的农民运动相联系。只有这样，游击战争的工作才有保障。

C. 国民党内部的派别斗争与我们的策略：陕西民众因为冯系军队的重征盘剥，而对于蒋阎发生幻想。同样国民党内派别复杂，以其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对于群众运动的态度亦便不一，致引起群众的幻想。在我们的工作尚没有基础的现在，自是必然有的现象。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斗争中，才能破除群众中的一切幻想。来信中说以前认新党即改组派的施存统派，其实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不知你们对于托派的理论背景作何认识，实际上新党与托派的理论正是一而二二而一，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他们这种似是似非的理论，的确足以混淆一般群众的听闻。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省委应特别对于这些改良主义的宣传作思想上的斗争，不仅要在实际斗争中去揭破他们的欺骗作用，而且在理论上应注意给以打击。关于这一工作，除了建立发行工作，尽力推销中央刊物外，如有必要时在省委指导之下可以出一油印的

小报。你们来信中谓已指派同志参加新党以夺取其下层群众，这一工作路线完全是错误的。新党是目前统治阶级的一个反对派别，他们在群众中的作用是和缓斗争，消灭革命。在目前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时期，我们的同志绝不应隐藏起自己的政治面目去到敌人的队伍中作分派活动，反而使着群众认为除了C.P.之外，新党中还有一部分真实革命的分子（群众已经有作如是想者），将更加使群众徘徊歧路。因此省委应该命令参加新党的同志即刻退出。退出的方法，是要提出群众的要求，并宣布改良主义企图和缓斗争，消灭革命的种种阴谋。

以上仅就来信中的缺点和错误而言，关于目前的政治分析和工作路线，中央最近的通告中已言之甚详，无须多述。

2. 目前陕西组织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A. 整顿旧的组织与建立新的基础：过去几个月来的工作多偏于旧有组织的整顿、旧的关系的恢复，这一工作自然重要，特别是组织涣散的陕西，但同时应注意到新的发展，要从一些斗争中吸收一些勇敢努力的分子，所谓整顿党的组织绝不是拘泥于旧的基础，只有在斗争中间吸收进来的分子，才能够勇敢的为党工作。同时旧的基础亦绝不应忽视，但对于脱离组织太久的同志，恢复组织时应特别加以考察。根据交通员的谈话，曾有过去脱离关系很久的同志因为生活问题现在国民党内作事，此时感觉没有出路要求恢复党籍，省委巡视员即允其所请，并给以党的工作使命。这种办法实甚错误，对于已有其他政治关系的人，绝不应如此大意，过去既能因为生活而在国民党内作事，将来是否能不再因生活问题而去参加反动工作。关于这类的人，应是他先有了工作表现，才能与之发生组织关

系，此点望加注意。

B. 党内斗争要与党外斗争相联系：党内右倾和左倾的思想都足以妨碍党的政策的实现，即如来信所述，省委应该用教育的方法，制止党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发展。主要的是要使这一工作与党外的斗争相联系，要从一切党外的斗争中去教育同志，要使所有同志从一切党外斗争的经验中去认识正确的路线。不然关起门来作党内斗争或教育同志，不仅无济于事，反将走于清谈，妨碍一切对外的斗争。

C. 中心城市的工作应赶快建立：就目前陕西党的主观力量讲，全省工作绝不能顾及周全，此时应该集中力量将几个中心城市的工作赶快建立起来，而且也只有这些中心城市的工作有了相当基础之后，才能以影响一些次要县的工作，丝毫不能有“避难就易”的毛病。如在关中的西安，工作自然比较困难，但省委应该想出种种方法去克服那些困难，特别是电话、邮政、修铁厂等一时虽不能建立支部，即能找到一些关系，多结识几个厂内的朋友，对于将来斗争的领导、工作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同样对于农村中的工作，亦应特别注意城市附近的农村。

D. 应该利用一切群众的组织争取广大的群众：关于在农村中的群众组织已在前面谈过，在城市的工人中亦应用各种灰色的组织去团结群众，在学生群众中一切读书会、研究会等组织，都是争取群众的方法。

E. 干部分子的训练：陕西文化落后反映到党里来，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线当比较他省更为低下，省委应该特别注意到党内外教育工作，省委所拟办的政治通讯是必要的。不过内容不应仅限于政治通告的性质，对于党的策略、工作方法和经验以及各种工作方法的讨论，应该多于谈及，使其成为训练党内

干部的刊物，顶好能够每星期一次，如果时间来不及，便十天或半月一次。此外对于干部分子的训练更为迫切，根据陕北任同志的报告，短期训练班的办法是可以用的。但同时应该注意在一切斗争中去训练干部特别是工农同志。

F. 关于陕北的工作：整个陕西的工作，或者以陕北较好，但过去一直到现在和省委的关系不十分密切，所以陕北过去都是经过顺直省委得到一些间接的指导。省委应该与陕北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将党的一切政策很快的传达下去，同时应帮他建立起健全的中心城市的指导机关并规定一具体的工作计划。任同志的意见认为陕北与西安的交通极为不便，反不如将陕北划归顺直管辖或直接隶属中央。中央认为仍旧隶属陕西省委为宜，惟须设法建立起彼此间的关系，你们的意见如何仍可来信说明。

G. 省委加设秘书一人，经管一切技术工作，中央认为可以，即可照办。

最后，你们的来信中间有两页看不清楚，或者其中有什么应该谈的问题，也无从谈起。同时你们的报告还不甚具体，更少有工作中的困难问题提出。以后的报告，应有这样的几个步骤：1. 工作计划；2. 工作过程；3. 工作结果；4. 现状（组织状况）；5. 今后计划。这样比较清楚。

中　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冯玉祥。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八日）

湖南省委：

中央曾于八月四日发一信，指示湖南工作上几个重要问题；九月七日又发一信，专门指示平浏工作上许多目前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这封信的内容，指示了许多很具体的方法。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些指示如何讨论，如何督促下级党部去执行，执行的程度与所获得的成绩以及新近的困难情形，中央不曾得到你们的报告，无从知道实际情形，便无从进一步更具体的指示你们。中央收到你们最近寄来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这一决议是在你们省常委会通过的，这决议中有些可作根据的材料，除此在你们的报告中找不出湖南有系统的实际的材料，所以这一封信只能偏在原则上指示你们。

Ⅰ．全国的军阀大混战，在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统治、瓜分中国、加紧进攻苏联、准备世界大战，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的冲突，军阀互相争夺地盘的三大矛盾之下，爆发了比以前更残酷的战祸。这一战争已经由两湖发展到两广，由西南扩大到西北，将牵动全国各派的大小军阀，在拥蒋与反蒋的两大旗帜之下形成空前的混乱割据的局面。这一战争的前途主要的决定于帝国主义。这一战争的结果，必然使帝国主义更进一步的取得中国实际的统治，更深入骨髓的侵掠中国，使中国经济上更急剧的破产，加重劳苦群众的灾难，政治上更分裂紊乱将

无法收拾。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合组的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集团——国民党将被继续不断的军阀战争敲碎成无数的小块，在群众中威信扫地，变成一切反革命的幌子。全国革命的斗争必然更加向前开展，新的革命高潮必然渐渐抬头，军阀战争在客观上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来到，使敌人在革命的威逼之下不能不有所顾计，随时有暂时协合共同进攻革命势力的可能。因此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压迫中国革命，绝不因军阀战争而放松一步；恰恰相反，敌人内部的冲突愈剧烈，对苏联的进攻以及中国革命势力的压迫更加凶猛，这不仅理论是如此，历史的事实无一件不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绝不能因军阀战争爆发放松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的任务。

就目前战争形势观察，蒋介石的统治是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不过是时间上迟早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次战争无疑义的是更加延长的局势，反蒋势力同样的没有一致的可能，就帝国主义的关系、阶级的关系、各个军阀间的关系，反蒋的势力绝不能共同一致的行动建立统一的政权。将来反蒋各派胜利必要形成更零碎的更分歧的局势，军阀的混战绝不因反蒋的成败而停止，只有从此更加纷乱的前途。这样一个政治混乱的局势，革命的危机加深，虽然现在很明显的是没有革命的高潮，但这一个局势的发展，客观上有推动革命高潮到来可能的前途，这是必须认识的。

最近战争形势的发展，两湖是此次混战的中心区域。湖南何键极力企图独树一帜，目前与蒋作有条件之周旋，在反蒋得势时，何键亦必然树起反蒋的旗帜，以保存在湘之地盘。在军阀战争中各个小军阀的态度都决定于总的形势，不能机械的如你们在决议案中的分析“何键会更让步的与蒋妥协”，这样的断语必须在蒋介石胜利的条件之下才可能。各小军阀虽然不能

逃出战争总的形势，而彼此间为争夺地盘暗斗明争，是任何时期都不可免的。就在同一军阀之下，各个部队在权利地位上的冲突仍然不能调协。这正是封建的残余，军阀制度的特性。

军阀混战的延长，一方面使统治力量更加分散、更加削弱，另一方面加重劳苦群众的苦痛，促进群众激烈的斗争，革命形势发展的前途，更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一前途，决定于党的主观力量的发展和党的策略的正确运用。

湖南自马日事变后，长期的严厉的白色恐怖，野蛮的屠杀与压迫，无限制的苛捐杂税之增加，统治阶级尽量的榨取与剥削，在政治上经济上群众都没有出路，在客观上群众对于革命的要求万分的迫切。尤其在目前军阀大混战的时期，群众必然自动起来斗争，自动反对统治阶级，反对军阀战争。这一革命的客观形势加重了湖南党的政治任务，要求湖南党更加紧群众工作，在正确的路线下领导群众斗争向前发展，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Ⅱ. 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湖南党的政治任务和策略路线必须是：

一、发动广大群众，扩大反军阀战争，拥护苏联。湖南党必须立即动员所有的同志，向着广大的群众作反军阀战争的鼓动与宣传，发动群众各种斗争，领导一切斗争走到反军阀战争的口号之下，使群众斗争的目标集中到反军阀战争。我们必须向群众指出，军阀战争给予群众莫大的苦痛：派捐派饷，拉夫拉车，封船以及军事戒严，交通断绝，白色恐怖的加重，兵马枪弹加于群众的蹂躏。号召群众起来斗争，以群众斗争的力量回答军阀战争，使军阀战争的双方都处于失败的地位。在反军阀战争的宣传上行动上，我们必须要联系到拥护苏联，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制造中国

内战，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必须要联系到纪念十月革命，在群众中作广泛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指出苏联与中国的群众在政治经济生活上所享受的实际差别，引导群众认识苏联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好友、中国革命的助手；必须联系到纪念广州暴动，指出只有继续广州暴动的精神，以工农武装暴动的胜利，才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达到中国民族革命彻底胜利，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的前途。这一工作的开始，就要冲破狭隘的秘密工作的路线，从党内动员一直扩大到湖南几千百万的劳苦群众。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绝不能扩大这一斗争的范围，绝不能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一切束缚在党的支部或工农会的组织当中的工作方式，都是狭隘的方式，都是党的损失。我们必须要勇敢的深入到广大群众当中，极力扩大反军阀战争的范围，利用所有的机会发动群众反军阀战争的斗争。谁放松这一工作，就是谁对反军阀战争怠工。

二、坚决的恢复与创造中心区域和重要城市的工作。湖南党在这一工作进行中，切不要忘记湖南党经过白色恐怖的摧残，中心区域和重要城市的工作尚没有恢复，尤其是长沙、安源、水口山、锡矿山、粤汉路这些广大工人群众当中，党没有基础，这是湖南党在主观上最严重的弱点。这些区域的工作不起来，湖南的一切斗争失去中心的领导，无疑义的要推延湖南革命胜利的前途。革命斗争愈发展，这一弱点的表露愈明显。湖南党必须用尽一切的力量坚决的恢复中心区域和重要城市的工作，首先就是发动这些区域群众的日常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党的组织，吸收积极的分子入党；同时利用群众所要求的各种组织形式，建立群众组织，反对黄色领袖及工贼走狗，在斗争中夺取其群众，转变黄色组织为赤色组织。中心区域和重要城

市斗争的复兴以及组织的创立，是湖南革命发展胜利的一个主要条件。

三、深入土地革命并扩大苏维埃区域。今年各地灾荒，湖南同样的有七十几县报灾。在今年秋收的时候，农村的斗争必须要剧烈的发展起来，党要坚决的有计划的领导这一争斗，扩大反军阀战争以至深入土地革命斗争。在湘鄂赣边境苏维埃区域，目前应该坚决的打破一切保守与取消的观念，号召广大群众向敌人进攻，深入土地革命，扩大苏维埃的区域。主要的路线是号召广大群众的示威游行，动员群众到邻近区域发动斗争，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及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使苏维埃的区域日益扩大。平浏方面的红军应向着西南的茶陵、醴陵、攸县主要的是向着赣西南方面发展，与赣西南取得联络，互相呼应。已经有苏维埃的区域，要坚决的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巩固苏维埃的群众基础，经常召集各级苏维埃的代表会议，从群众的意见解决苏维埃一切问题，扩大苏维埃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湘西、湘南、湘北没有苏维埃的组织的农村，应该提出群众部分的口号，发动群众反捐税、反拉夫等联系到反军阀战争的斗争。在斗争一开始便准备武装冲突，由日常斗争转变到游击战争，消灭豪绅地主军阀的力量以至创立苏维埃区域，这一前途在湘西湘南有很大的可能。湖南党要防止束缚在浏平一隅而忽视全省其他区域的危险。

四、扩大游击区域发展红军组织。平浏的红军目前应该到群众基础比较强大或是战争附近的区域去实行游击，收缴敌人的枪械，发动群众的斗争，发展红军组织以及武装农民，建立广泛的赤卫队以及少年先锋队的组织。红军的一切行动必须与群众斗争联系起来，在群众中作拥护红军的宣传，有计划的在群众中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干部人才，加紧红军中的政治

教育，在目前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

五、发动士兵群众斗争，有计划的准备兵变。在反革命的军队中，应该扩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提出“不替军阀打仗”、“不替军阀当炮灰”、“要求发欠饷”、“罢操，反对开差”、“不打工农，不打红军”、“加入红军”等口号，发动士兵群众反军阀战争的实际斗争。在双方作战时，进攻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作战时，以及我们在军队的组织被敌人发现有被解体的危险时，我们必须坚决的号召兵变，用鲜明的红旗夺取兵士群众，投向农村去实行游击战争，消灭一切反动武装的组织，收缴其枪械以武装农民，发动群众斗争，肃清豪坤地主及一切反动势力，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兵变要防止政治口号，模糊脱离群众的危险。在何键、周烂、吴尚等主要部队中，能够做到动摇敌人的队伍以至帮助土地革命发展的兵变，尤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湖南若有革命的兵变发生，必须向湘东南进展，与粤赣及平浏斗争取得联络。敌人部队在湖南招兵补充时，我们必须选派同志打入士兵群众中，建立士兵运动的基础，准备破坏敌人的军事组织。这一工作非常重要，湖南各级党部均须特别注意。

以上的任务，是目前客观的革命形势，要求湖南党加倍的努力，一切经常工作都须联系到上列的任务，以这些任务为中心。

Ⅲ．湘鄂赣边境的工作，在总的路线上毫无疑义的应该扩大苏维埃区域，积极的发动群众反军阀战争，尽量扩大工农武装组织，坚决肃清豪绅地主阶级的武装，加紧民团、保卫团中的工作。切不要忘记边境区域的两个中心问题：

一、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城市的工人以及乡村的雇农、贫农还没有取得苏维埃主要的领导，在思想上成分上

都没有占着重要的地位，苏维埃还不是真正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自己的政权。这些政权甚至于是建立在共产党的委派与包办之下国民党式的党政府，群众不认识这一政权与自己有什么密切的痛痒关系，倾全力来拥护这一政权，以生死存亡的决心来保护这一政权的存在。

二、便是在苏维埃的区域，亦没有充分的发动群众，形成群众组织成为斗争的主要力量。苏维埃的建立与维护，还不免过分倚赖红军，苏维埃还不能调动广大的群众为保存和扩大自己的政权而斗争。

这两大中心问题，为湘委八月三日对边境工作决议案上所不曾抓住的，在原决议案上失去了问题的中心，因此不免凌乱和混杂，在运用上将不免无从着手的困难。目前边境工作必须针对着这两大缺点，执行下列的工作：

（1）扩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经常召集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中作各种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号召群众的游行演讲，普遍的散发传单、写贴标语，每日出版农村小报，举行化装讲演，欢迎反革命军队中倒戈的士兵等。这些宣传主要的是在邻近非苏维埃的区域举行，更可以影响邻近区域的群众，提高他们斗争的情绪。在这些宣传中绝不要忘记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制造世界第二次大战。

（2）多召集苏维埃各级代表大会，讨论扩大苏维埃区域。通过反军阀战争的宣言及一切反军阀战争的具体办法，动员苏维埃的群众，建立苏维埃在群众中的威信，扩大苏维埃的政治影响。

（3）经过苏维埃调动红军向邻近区域游击，发动邻近区域群众起来斗争，乘虚袭击敌人，尽量收缴民团、保卫团及一切反动武装，消灭豪绅地主的势力。同时在一切群众中扩大红军

的宣传，宣传加入红军，尽量扩大红军的组织及工农群众的武装。

（4）改造平浏各县党的组织。1．建立支部生活。支部经常的开会、缴费，讨论党的问题，发动群众斗争，动员每个党员向群众去宣传。巩固铁的纪律，纠正松懈无政府的现象。吸收积极勇敢的分子入党，在工作中自然淘汰一部分腐化落后的党员到群众组织中去（如不到会、不缴费、不做工作等，经过支部会议通过上级党部批准宣布开除），绝对纠正无条件的或机械的国民党式的清党。2．坚决的从工作中斗争中引进积极的干部分子参加党的工作，尤其是工人干部；3．健全地方党部，形成集体的分工，肃清英雄式的工作方式及应付的工作方法，有计划的执行党的策略，领导群众斗争，加强党的政治理论的教育，纠正一切意气之争、个人主义、地方观念、杀的纪律等不正确的倾向。4．加强对苏维埃党团的指导，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的工作，经常召集党团会议，讨论苏维埃的问题。5．建立城市党的组织，选派同志到城市中去工作，首先便是建立党的支部。

（5）坚决的反对富农。领导雇农对富农的斗争，加紧雇农工会的组织。在苏维埃区域的富农是动摇反动的主力，我们不应该幻想“吸引富农到革命的四围。”组织雇农工会，领导雇农向富农斗争，若是富农怠工，则应坚决的没收其土地，分配给要求土地的雇农或士兵以及土地不足的贫农。对富农的策略动摇，使苏维埃发生莫大的危险。

（6）苏维埃目前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准许中小商人向苏维埃区域的贸易，制定最高限度的价格，限制商人对农民过剩的剥削，制定最低的税则，同时借扩大苏维埃区域的机会，使物品输运流通，绝不要过分的恐惧，怀疑一切商人都是敌人的侦

探，而陷于经济自绝。一切失业的群众，应该组织他们向白色区域积极的发动斗争，在斗争中恢复职业，绝不应滥为安插，使苏维埃变成官僚的组织，同时不应简单的裁撤而消极不管。

（7）在苏维埃工作方法上要力求有计划有系统，尤其是与党的关系要划分清楚，要以群众化、民主化为原则，绝对要肃清命令主义、委派制度（工作决议案中各级工会暂由各级党部工委书记代，都是不对的），包办等等不正确的工作方式，要尽量将各种比较重要的群众的问题提到各级苏维埃代表会议去讨论，交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去执行。苏维埃应该经常的将自己工作向群众报告，受群众的监督与审查。

（8）济难会是党争取群众最好的一个方式。济难会的工作应该是建立在反对白色恐怖、拥护人道、群众互济的任务上，吸收广大的革命以及同情革命的群众在济难会的组织之下。绝不是如原决议中所指“保管收发经费，调查被难者，组织革命群众，作报告”这些事。这些事多半是技术的，是工作方法的问题。至于组织革命群众是工会、农会的事，济难会单组织革命群众必然代替工农会，所以原决议案内容没有指明济难会的任务。边境党应该运用济难会的组织，建立白色区域的工作，团结白色区域的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党的助力。

Ⅳ. 省委本身的工作，在目前紧张的工作环境之下，必须要采取下列的工作方式：

一、加强巡视工作。选调得力同志，不断的到各区巡视，尤其是斗争发展的区域。每次巡视员出发前以及回到省委后，必须召集巡视会议，讨论巡视工作。加紧对巡视员的指导，密切省委与巡视员的关系。

二、省常委至少要经常有两人在省委所在地，计划讨论全

省工作，每日接头。特别要抓住中心区域的工作、中心的斗争，加强在政治上的指导。

三、严格的执行秘密工作，防止拼命冒险的行动，保存全省的干部，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要防止发生秘密主义离开群众的危险。

四、坚决的引进干部。积极勇敢观念正确的干部，必须使之参加指导机关工作以至参加省委工作。

五、坚决的督促各级党部在斗争中发展组织，尤其是中心区域和重要城市的组织。建立支部生活，改造党的基础，健全地方党部，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特别是机会主义与托罗斯基反对派。

省委接到这一指示后，即须根据所指示的原则针对湖南目前实际情形规定具体的工作计划，随时将执行的结果报告中央。

中　央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

（一九二九年十月）

彭 德 怀

红军五军自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于平江暴动，已经有一年之久的历史。但以交通不便，以致未得过上级的一次指示，在这种硬干的当中，必有不少的错误，这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只于本年十月十四日，始接湘省委九月十日的来信，知道蒋冯[1]战争快要爆发，对湘赣政局的分析甚为详细，惟何键部向铜鼓、修水、万载进攻殊非事实。目前湘鄂赣环境较前似为严重，实际并不十分厉害。鲁涤平虽派队已到铜、修、万各县，这也不过是他们上台把戏，此虽不为乐观，的确较旧军要好得多了。省委对五军的工作指示，此间完全认为正确并决意遵照执行。×同志回省委，特将平江暴动前后经过一切情形和斗争中所得的教训以及现在五军工作概况逐条列后：

一、暴动前的情况：现在红五军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之一团。在一九二八年三月间因南县共产党机关破坏，即被反动政府捉去青年学生、工农同志三十七名，同时豪绅组织清乡委员会，此即杀了两个学生同志（周某年十四岁，王某二十四

* 这是彭德怀给中共湖南省委报告的节选。

岁），该两同志非常努力工作，被捕在监狱者悉在屠杀之列。一团斯时驻防该县，目睹此况，异常愤极，即以大无畏的精神，张贴“枪决组织清乡杀人机关的土豪劣绅”等标语；于是南县豪绅大起恐慌，因此停止屠杀被捕同志。南、安、华、沅特委即派人前来与我们接头，要我们以保人为条件，同时有介绍入党等语。我们久恨国民党之恶劣，乃即允诺，并介绍士兵数名成立支部。鼓吹逆师长周磐创办随营学校，派优秀分子和有觉悟的士兵入校（党内秘密派送），同时找了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等同志充当该校队长队副等职，学校亦成立有支部。无如该地特委不守秘密，今日来向军队要枪弹，明日要油印机等物，领去后在乡间大烧大杀，因此把军队和党闹成了半公开，幸未穿泡。及开往平江，至七月十九日，据友人来信，谓南县共产党机关被破获，搜出黄公略给共产党员的通行证，并有说×××等是共产党员等语；同时接到湘委通知云：南县的机关被破获，并有同志已自首，嘱其严防。斯时彭德怀巡视平南，即奔回平城，未至团部先抵电局。未几，长沙拍来密电，枪决黄公略等，知事机泄漏，危险迫眉。恰湘委派滕代远同志才到两天，遂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领导士兵借闹饷之名，实行暴动，根据湘委的指示，造成湘鄂赣三省边境的割据区域。

二、平江暴动之经过及缺点：平江暴动是少数长官领导士兵闹饷，而非士兵有觉悟的行动。自七月二十二日第一营将平城挨户团枪支围缴殆尽，反动机关人员一律捕获，刻下贴出了官兵待遇平等、打倒克扣军饷的军阀、改良士兵生活、每月发饷一十二元等标语，赶逐了一些反动军官。暴动的第二天，每人发给四元，士兵很高兴，即挂起红带子。至第三天正式宣布是红军，定名为“红军五军十三师”。各县有组织的群众与平

江的党一律抵城，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产生平江县苏维埃政府，群众高兴异常。第四日，黄公略同志率兵两连前来平城，但他距城五里处命部队停止，只身进城，该队遂被反动长官诱骗叛走。第七日，与敌在平垣激战一日，因众寡悬殊，以致撤退到平北。在平江暴动最大缺点是：（1）事先没与党发生关系，无群众参加，形成单纯军事暴动；（2）军队内党的组织不健全，同志数量又少又幼稚；（3）过于夸大革命势力，不知游击战争，以致硬战，损失太大，不知夺取群众，形成孤军少援；（4）各处没有响应，又值国民党形成统一的中国，所以反动派能用极大武力镇压。

三、退出平江后之概况：由平北至平东，据地方党部报称，长寿街只有敌军二三百人，遂决定进剿该敌。不料张辉瓒已到有三团之众，接触始明，是役又受很大损失，才知平江的党犯了极大的地方主义错误，才明白对革命势力之过高估量是不正确的。同时，晓得平江到逆军六团以上，故将部队向修水进展。到修水城截获同志数名，组织了党和苏维埃（质量不高），修城较大商家逃避一空，没收反动商店数家，分给工农（离城八九十里的工农都踊跃前来），并组织了少数工会农会。在七天后，赣军进攻，遂撤至铜鼓。敌尾追铜鼓，复退守平江之黄金洞。该区委强奸式的会议，瞒少敌人，坚决再攻长寿，激战一日未克，始知陈光中部有三团人驻守也。是役伤亡官兵甚多，子弹消耗几尽，乃退到黄金洞休息。不两日敌军进行“围剿”，地方负责人硬战死守，猛战三四小时，自力难支，乃退出斯洞。军队中因伤亡过多，负责人缺乏，党的领导力量异常薄弱，又值统治阶级暂时稳定，对革命势力的压迫不遗余力，军队因之动摇而叛变者不少。俟后接湘委来信，要五军与四军切取联系，至万载又受鲁涤平部两团人的打击，这时枪支

不满千数，士气多不振作，只得掩护退却，幸未受大损失（仍经铜城回至铜平边界，因环境险恶，内部连长李玉华、团长雷振辉、参谋长陈鹏飞皆乘机叛变。雷振辉被枪决了，陈鹏飞逃走了，李玉华率领一连人叛变），这是九月间五军之最危险的关键！直到十月间才有十余天的安全休息，乘间召集浏阳、平江、铜鼓、修水四县代表大会，产生湘鄂赣边境特委，检阅过去工作，知道盲动主义的错误，并决定与盲动主义斗争。边界盲动主义以平江为尤甚，如破坏乡村的市场，反对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不顾到客观力量，并有死守硬战等口号。五军部队与各县赤卫队的混编，尚未完全办就（有一部分已编好）。湘赣“会剿”日益厉害，经过相当的奋斗，才冲出包围。这时经济困难万分，天气寒冷异常，官兵着单衣者很多。特委目此情况，甚为凄怜，故决一部在浏、万分散，一部向外游击，觅经济出路。这时部队因环境之关系退赴赣西与四军联络。四军这时的困难，言之痛心，念之酸鼻！经济的困难，物质的缺乏（每日三分钱的伙食尚难接济，军衣无全套），有刻不容缓的须向外游击，但以赣西十数县之经济破产，都不愿意留守宁冈一带工作。后经前委多次讨论，乃决定第五军留守宁冈工作为宜，第四军即脱离宁冈向赣南进展。这是五军自七月退出平江城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经过的第一期。

四军离宁冈两天，湘赣会剿军就将井冈山铁桶式的包围好了，五军与之激战四天，实因寡难敌众（我军仅有步枪六百支，敌约十八个团），致被攻破。在当时环境，惟有向上犹、崇义移动，出路较为安全。全军沿山越岭的长期行进，并有三日难得一食之苦，官兵夫的疲劳实难尽述。自退出后，在思顺、林潭、新城、九渡水等处皆与何键部及粤军接触，诸役伤亡官兵、消耗子弹为数甚大（每支枪平均不过五发）。又有周

文山、胡凤璋等土匪盘踞上犹、崇义、大余这三县最多，该土匪异常熟悉，时与敌军共来袭击。在上犹、崇义等县既难立足，遂转到赣南的边界，与赣南特委发生关系。到兴国休息三天，逆军刘士毅派五营人来进攻，我军未与抵抗，夜间摸出包围。后得赣南特委信，知于都城还有刘士毅之一营，斯时我军驻地离于都城一百五十里，以一天一晚之劳，竟将该敌全部缴械（此时我军原有步枪四百多支，人三百余）。此次我军伤亡官兵三十余人，敌伤亡百数人，缴获机关枪三架，步枪四百余支，子弹颇多，经济获得一个相当解决。将这些所得的枪，五军留机关枪两架、步枪一百余支，其余皆交当地党部武装工农。未数日赣南特委指示，由于都向安远推进，发动群众。在安远、瑞金也获得少许枪弹，筹款万余元，从此一切困难都得有相当解决。斯时蒋桂冲突重演于武汉，朱毛[2]攻下汀州，阵毙郭凤鸣（旅长）。四、五军即时集合于瑞金，继至于都，经前委决议（扩大会）五军仍即回赣西，恢复湘赣边界工作，一面收集五军旧部，一面进至湘南工作。自到赣西（四月间），所收集的部队都是面如菜色，身似秋枝，无衣蔽体，无米充饥，除将物质予以补充外，并加紧抚慰与训练。将满一月，金逆汉鼎又派来部队进攻。五军为保持原有势力，根据前委指示起见，遂向湘南游击恢复工作。无如湘南党的组织又被党的盲动主义断送，党和群众组织一扫如洗，即民众虽好，多抱悲观，这是短期间难得恢复的最大原因。五军在桂东、桂阳组织秘密工农会十余个，但因胡凤璋、门炳岳两贼的压迫，故工作未得深入。乃到粤边之城口，我得物质的补充和子弹数万发，至仁化、南施亦得了些枪弹，并将中央六次大会决议案翻印分发于各地的党（仁化、南雄未接决议以前仍是盲动），与之详细讨论（各处党皆承认过去的错误，并颁力遵决议执行）。复

由南雄经过大余等县回到宁冈，休息数天后，决向安福进展，于发动群众解决经济问题之举。不料在距安福城三十里之外，即碰到敌之工兵营与少数靖卫队，与之激战三四小时，敌人败退，五军尾追抵城，该敌死守不退，致未攻下。翌晨全部开往宁冈，在途中复遇敌之七十团，是役凶猛尤甚，计伤亡官兵一百六七十之众（阵亡参谋长刘之志，纵队司令官贺国中亡于前一战），敌共伤亡三百余人，缴得敌人步枪八十三支，俘虏数十人即放。候十余日，金汉鼎部之六十九团、七十团和工兵营齐来进攻。我军为避免硬战，又加湘鄂赣边特委派来之交通员某同志云，要五军前来会商要事，尤以建立两个边特的交通机关计，故于七月七日由宁开动，八月十四日抵万载，始与湘赣边特发生关系，并得其指示向万、修、铜等县发动群众进行组织，纠正盲动主义的残余。五军自井冈山冲出敌人所谓“会剿”的包围与赣南特委发生关系后，是为五军奔走逃命之时期。攻下于都获得较大军事胜利，统治阶级开始动摇，是五军恢复工作产生新的气象时期。五军前在修水、铜鼓、通山、武宁、崇阳各县虽然发动了和组织了一些群众，都是水上浮萍，未曾深入；惟修水西乡、铜北乡（平江）颇较深入。但形成公开的割据后，经“湘赣会剿”，将赤色区域内的房屋烧成千里皆焦，革命民众被迫逃到外地，致使修水组织大部被其击溃，所余留的寥寥无几！平江工作前较深入，全县工作已解决三分之一，党员已普遍全县，但最大缺点与错误是犯了革命急进病和盲动主义（没收一切土地，烧毁几个城镇等），因此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反对。这时，五军的党亦甚幼稚，既不知道革命正确路线，又不懂得党的新的策略，所以变为盲子骑瞎马的硬干。自接中央六次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后，始将该错误纠正大部分了。

四、军队组织：军部为五军的最高指导机关，统辖五个纵队以及军特务大队、军医院、红军随营学校（中央特令办的，现有学生五十名，三月为一期）、政治部（因组织不甚明了，以致组织非常简单，务望指示）等。其纵队部的组织相等于营，直辖三个大队及政治部、军医处等，大队的编制等于连。军部、纵队部、大队部皆成立有士兵委员会。

五、党的组织：（1）组织系统：军委统辖五个纵队委，四个直辖党部（军特务大队、随营学校、军医院各一个，军司令部与军政治部共一个）；纵委直辖五个支部，各大队成立支部各一个，纵队部与纵队政治部共成立支部一个，军医院处成立支部一个。支部成立支干会，支部以下分小组，中队成立小组。（2）党部执委：军委因部队分散游击，短期间难于集中，现军委由边特委指示（同志九人成立临时军委）九人组织之，内分书记、组织科、宣传科、青年科、兵运委员会（各科设科长一人，兵委会设书记一人），其余四人为委员。纵委七人组织之，另候补二人，内分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青年委员、兵运委员。支部干事会五人组织之，内分书记、组织干事、宣传干事、青年干事、兵运干事。小组只设组长一人。（3）党员数量与成分：全军人数约三千，党员约六百，但在医院休息者和伤兵数十人。党员中的农民同志百分之八十，知识分子约百分之十六，其他是工人与小贩和贫民等。（4）党员的质量与教育：五军现在的成分农民占大多数，又加之是文化落后、穷乡僻壤区域的农民，所以党的政治水平线异常低落，且迭遭反动派的摧残，阵亡牺牲者实在不少！故训练新的人才与牺牲有经验的负责同志，往往相差甚远。现在全党活动分子不过百分之十五，因此五军下级干部不仅不能领导士兵群众，个个担任着组织宣传工作，即在本身方面亦有许多缺点，干部人

才之缺乏，为五军目前最难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于教育方面，除将上级所发到的各种文件、六全大会决议、中央告同志书等已经分发所属党部详加讨论外，并时常办有短期训练班，但以同志程度之差异，则对六全大会决议多有不能完全溶化和彻底适当的运用，致使盲动的残余以及不正确的观念难免不有少数的遗毒存在。

六、五军目前的困难：五军目前的困难，即是物质与人才成了五军涉水燃眉似的吃紧问题。因为湘鄂赣边界十数县的经济已完全破产，如修水、铜鼓、万载、浏阳、平江、莲花、宁冈、遂川、永新、上犹、崇义、安福等县，所以五军的经济毫无出路。现在五军官长兵夫，每月每人计发伙食三元，零用洋二元，共需一万五六千元；他如中西药费，宣传品费，办公费等每月需洋四五十元。至于湘鄂赣边界与赣西边两个特委党的津贴费，每月总在五六千元，总计起来无论如何的节省，每月需洋二万五六千元。五军现在所能游击到的地方，都是上面指出经济破产的县份，尤难到政治经济中心地点。然而五军须臾不可少的巨款，实在无法预防经济的恐慌。故当此天气寒冷之际，官长兵夫多着单衣者，而棉衣现无办法解决！又加反动派对革命区域内的封锁，真是不遗余力，所有西医、报纸等物很不容易办到。五军自暴动起一直到现在，在一年多的艰苦斗争中，牺牲生命的为数八百名之谱。牺牲中最重要分子如贺国中（团长）、黄纯一（团长）、刘之志（参谋长）、张荣生、罗立、向国安、刘福生、罗柱生、余光耀、余福生、郭英等数十同志，都是大、中队长，这些同志的确是党的新进健将，是五军干部的精粹，他们对革命人生观的确定，对艰苦斗争中的精神，可说百折不回，无意气，无条件的努力，为同志所钦敬。其余所牺牲的干部同志总在一百四五十人，都是勇敢积进分

子。所以，现在的五军不独不能扩大其组织，并且有难维持现状的模样。刻下虽用很大的力量正在积极训练、加紧培养当中，总有远水难救近火之虞！又加万恶的反动派时常逞其余威，对红军大肆压迫，对革命势力任意摧残，因客观环境的险恶，难有继续不断经常训练的可能，殊为恨极！所以欲想挽救五军目前的危机，惟有请省委与中央速派大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前来不可。

七、红军游击战术：在各地革命势力发展未平衡、离全国范围总暴动期间尚远的时候，红军唯一的良好战术即是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对于地主武装，应尽可能的不定期的予以极大的摧残并要消灭之。因为地主武装阻碍革命势力，屠杀革命同志，破坏革命区域，较诸逆军凶恶尤甚。在环境较好的时候，宜迅速集中部队，进占政治经济中心地点。应有经常性的扩大红军的宣传，加紧民众组织，增进革命势力与政治影响。如遇敌人进攻和“会剿”时，则用有计划的适当的分散，但部队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小。过大则行动不敏捷，难免不遭意外的硬战；过小则类穿山甲，倘遇挨户团、靖卫队都难抵御，并只在赤区内做到打埋伏的工作，难进到白区域内发动群众。红军经常驻扎一处，更容易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实施封锁和压迫。在湘鄂赣边与湘赣边区域的红军共二三百支枪，以三四十人一般为适宜，其势可战胜各处挨户团，可抵御逆军一两连。在敌人“进剿”时，可乘间逃窜至敌人之背后击其虚处，使敌有顾此失彼，鞭长莫及之虞！敌军如分散追击时，可作盘旋式的打圈子。如到万分险恶敌人追击不已时，须准备向导多人，分置前卫后卫，利用秘密式的夜间行营，稍至数十里远的地方或至普遍有组织的区域作短期间的休息，并力将消息封锁，勿使泄漏，使敌军失掉目标，遗

忘去向。假若敌人驻扎时，夜间宜派纯粹战斗兵一小部队去扰乱他们，使敌人多增加疲劳，揣测不定。敌军退走时，便可乘机尾追袭击之，或可夺取枪弹和军用品，但这种工作，消息须特别灵通方能办到。如有特殊的任务，亦可以有时间性作小的分散工作。如肃反、打土豪等，适宜于一二十支枪为一股，方能使行动灵敏迅速。总之，红军在现时的游击战术，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较为妥善，不宜呆板采用何种方式。进而言之，部队如分散过小，则不能达到有时间性的目的，容易失掉良好机会；同时，下级负责人如不健全，不但难于达到游击的任务，反使部队散漫腐化起来，甚至有走向流氓土匪式的危机。又为解决物质问题，以力量之所限，难到更大的区域内去，不免有点失实的乱干，所以有些地方小资产阶级中有“真红军好，假红军歹”的笑话。

八、五军失败中所得所见的最大教训：第一，是公开割据保守观念，其事实如井冈山（隘口作好了坚固工事，行路只能走单行）和平江、醴陵（恃险地筑工事死守）、仁化（沿城筑寨）等县的失败都是铁证。以井冈山地势的天险，平、醴、仁等县群众的勇敢，尚难保持长期割据的胜利，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敌人军事势力与我们武装力量众寡悬殊。如敌人进攻井冈山而言，敌人作战时可以换班，消耗子弹有接济，伤亡官兵有补充，有西医诊治，而我们往往都成反比例，很难持久抵御，以致保守归于失败。第二，是地方主义，足令红军有瓦解的危险，同时有断送民众的毅力。如五军在平江时，第一次地方党部请求进攻长寿街（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令赤卫队瞒没敌人之数量，说敌只有二三百人，待接触时已有朱耀华三团之众，这次被打得落花流水，几难收拾！而平东的党不但不将散兵收集，反将散兵的枪支缴了，反令赤卫队将士兵暗杀，希图

扩大赤卫队的武装组织。同时地方同志有在红军里拖枪一杆回县者，党部即赏洋一元，因此使红军里的士兵对工农怀疑和怨恨！第二次进攻长寿街（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受黄金洞（平江东部）党部请求，说敌不过一营，待接触后乃知有陈光中之一师，是役损失几使全军覆没到尽。第三次进攻长寿街（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地方党部肯定的报告只有挨户团数百，再催乘机进攻，已经接触，又有逆军一团（团长姓李）与挨匪，是役损失亦不少。至后询问真相，党部负责人坚决否认有逆军，直到大公报登载阅了以后，他们才遁辞横辩。五军守井冈山时，如早一天退出，还可少受许多损失，但地方负责同志力争死守，直到敌人冲开关口路了，才无条件的分散五方。这些事实都是证明，当时地方党部并没有把帮助红军行动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工作。这以后一定要特别严厉纠正过来，不然，不仅有害于红军，同时有害于党。

九、红军的政治工作：红军在目前的任务还是争夺群众组织、扩大宣传的时期，要使千百万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和党内来，所以在红军里的同志，不单是武装斗争员，有时要担负着宣传组织的责任。红军凡到达某一处，必先予以广大宣传，继则散发豪绅财物。如遇有很大势力的土豪，民众不敢接受，恐怕红军开走后遭土豪的屠杀，如在这种情形下，须多派宣传员作各别的宣传，将工农的痛苦、红军的主张、民众的力量详细说明，要他们晚间去担谷子和搬运什物，引起他们经济斗争的兴趣。还有胆小的赤贫民众，可派遣士兵将豪绅的财物分途送给。同时尽量召集群众大会，从中找些接近我们宣传的贫苦工农（个别找得的也好）作更详细的谈话，由这里面派些勇敢先进分子进行秘密组织，三五个工农就可以组织工农会。其必言者，就是发展的方法和秘密的技术。这些组织虽不十分可靠，

下次重复兹土，他们报告消息较为确实。再说到宣传工作，红军无论到什么地方，除将沿途和驻扎地的墙壁上用石灰或颜料写标语外，再以口头问答式的宣传。如红军初到的地方，民众受反动派的蛊惑，逃避殆尽，那时我们的办法：一面找些老弱的妇女格外和气的对她谈话，并给之以饭或其它一些东西，令其回家，嘱她将家属喊回。如小商人或小资产阶级未在家，我们必须将他们的物件拿了以后，即按物价给现金置之原地，并写明重量、价值和拿的原因以及勿再逃避等语。一面派赴附近山林中捉喊，对捉获的民众无论好歹（挨户团、靖卫团丁等）都不加责惩，只予以详细宣传，令其回家。在作战时所俘虏的敌方士兵亦同样的待遇。这种事实的宣传，对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对揭破敌人的欺骗（见人就杀），获益甚大！

十、各地革命民众的情绪：五军游击所经过的区域颇大，湘东、湘南、鄂南、赣南、赣西、赣北、粤北等三十余县。鄂南在马日事变以前，农村组织和斗争有相当的成绩。在南昌暴动时，鄂南民众进攻咸宁、通山、鄂城等县，很奋勇的自起响应，尤以通山孤战数月，至万载危，难守时，他们还积极地集中九宫山作最后艰苦斗争，延至四十三天之久始被敌破，致使负责人被害者甚多，所余剩的革命民众形成群龙失首的模样，以致瓦解。一九二八年十月，五军到达通山，一般农民与工人对共产党与红军仍有深刻的认识，如报告消息、当侦探、送信等等，都非常踊跃，毋稍迟怠。多数农民尤说，现在是豪绅反动派的世界，但我们总有还礼的一天。不过，少部分感觉无出路，对革命抱悲观。五军在通山、通城、崇阳数县只工作九天，即被逆军压迫而脱离。湘东：平、浏工农斗争有深长的历史，虽受挫折与失败，但他们对革命的要求甚为迫切。五军在平江暴动后，他们更兴高采烈，如雨后春笋似的发展，不到三

四个月，组织就普遍全县；但因党犯了革命的急进病和盲动的错误，至今春失败，几乎完全消灭。然农民大多数虽被反动派压迫成立守望队、难民团等，对革命认识还是很好。五军（一九二九年十月）第三次进攻长寿街时，沿途对红军都有很勤恳热烈欢迎的表现，亦有少数表示消极；同时一般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人亦具有革命情绪，因受豪绅地主特殊残酷征发所致。全县地主武装已购有步枪一千六七百之多，每月需款甚巨，加之平江是个经济破产的县份，豪绅地主为保持这些武装力量计，除向工农剥削外，并对小资产阶级极端压榨，如购枪费、养枪费、门牌费、麻丁捐、良民证费、放行证费等，故平江民众在豪绅地主割宰之下，自觉非革命无出路，现在已恢复了一些秘密组织。赣北的修水、铜鼓、万载、萍乡、袁州、宜丰等民众要求革命非常迫切。目下除铜、修、万有组织外，萍、袁各县尚乏人领导，宜丰正在萌芽中，然则萍、袁文化较高，地主收租亦特别厉害，且有许多矿产（石、煤）。自安源失败后，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与压迫较前更甚，该处交通便利，红军不易去发展，江西的党少力顾及。这个地方是赣北、赣西的咽喉，在工作取直线联系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安源工人无人去领导，真是可惜。以上诸县都是湘鄂赣边特委指示之下的区域，这几个县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下：铜、修、万文化非常落后，认识字者不过百分之五六，装饰古朴，姓氏观念、土客籍界限非常浓厚。平、浏较好。通山、宜丰、浏西等处，洪家组织甚大，成分除流氓外，有贫苦工农杂其间，有一部分已在我们领导之下，有一部分现在观察中。浏、铜、宜产纸甚大，工人力资每日不过四五百钱，工作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且这几县是丛山峻岭，田少山多，有百分之六七十是地主的，普遍收租利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因之工农生活非

常简单，并极贫困，而革命情绪随之增高。湘赣边如宁冈、永新、莲花数县，为红军第四军新发展的，其组织有相当的普遍，遂川、茶陵、酃县亦有零星的组织。但湘赣边社会经济情形复杂异常。如宁冈民众特别懒惰，嗜好鸦片者占百分之五十，洪家组织甚大，王佐、袁文才等为首领，土客界限、姓氏观念甚浓厚。产物颇丰富，生活较易，宁冈全县约六万人，每年可收谷八九十万担，而自耕农、富农占多数，故该邑民众对革命观念甚为薄弱。莲、永农民生活较苦，地主收租亦过半数，其革命情绪较宁冈有过之无不及，且群众常发起自动斗争，莲花尤甚。酃、茶两县民众为盲动主义者所断送，酃县县委被铁桶似的包围，力难冲突以至反水。赤卫队全县叛变，革命民众随波逐流的减少，现在不到二百人，党员不过二三十人。茶邑叛变甚少，然被敌人极端压榨，亦无形中几将消灭。据现所有组织的区域亦不过十五分之一了。湘南自朱、毛（一九二八年三月）退出后，所有组织根本塌台。今年五月间五军游击桂阳、桂东时，所见民众对革命者皆有抱悲观的态度。但因生活的痛苦、豪绅的压迫、土匪（胡凤璋）的横征暴敛……他们对这些事，不但不愿接受，并且有怨言与反抗的表示，倘有人去领导，还有恢复组织的可能。粤北之仁化、南雄皆有小块的组织，但与上级的关系不密切。今年五月间五军到南雄，民众多逃走，经过相当的宣传，始认识红军非土匪，同时发生革命思想。这时，当地党部未与上级通音讯已有六个月了，致使大烧大杀的口号不独未变动，并且仍在努力进行中。五军因驻日不久，社会情形因之少深切的察考。赣南各县民众性质特别刚强，最喜斗争，好吸鸦片，识字者很少，装饰奇异古朴，男女多劳动，生活困苦，豪绅剥削特别严重，洪家亦有力量，并有半公开的贫苦团、三鼎会、救贫会等组织，这些组织内农

民占多数。惟恨豪绅如用姓氏族长名义及其他毒辣手腕，把这些有组织的农民利用为他们自卫的工具，如五军三月在安远县被民团围数次。他们每一次来的人数总以万计，且执大龙红旗。最后一次，他们中了我们埋伏之计，捉获农民许多，诘之来源，始知他们生活痛苦，难找出路，为赚豪绅三百元而来的。斯时，我们不仅未予惩罚，并且作最详细的谈话，又宰猪筵之以酒饭，给以银钱，令其回家。到斯日午后，这些民团不期的解散了，并有倒戈绅豪之举。其他各县如赣县、兴国、宁都、信丰等十余县，群众非常勇敢，如信丰在一九二七年有数万群众围城，欲夺地主武装二百多支步枪来武装自己，经半个月之久而败。然五军经过该土，一般农民还是成千成万的爬山越岭来看红军，喊云“这是自家的队伍”。

十一、湘鄂赣和粤北党的缺点：这几个区域的党，其组织非常疏松散漫，有些地方的党与群众的组织混合不清，党来包办苏维埃，或者党来命令政权机关，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已成了牢不可破的口头禅，而党在群众中只起核心和领导作用的方法完全置之九霄云外。有些地方党的指导机关系知识分子包办，以致争领导权，闹意气种种弊端特奇异闻。有些地方党的机关指导虽参加有工农同志，但近形式主义，不能起领导作用，且少实际训练。有些地方党的组织忽视秘密，负责人不参加生产（连同志也有不参加生产者），服装好华美，好像“鹤立鸡群”，令群众一见则知，并且自觉荣耀。有些地方党的地方观念特别浓厚，如甲区有钱剩，乙区无饭吃，倘向借措，甲必借词推诿，甚至上级机关提拔之，亦同样应付，尤有“以金钱买党籍”，引起下级间的派别纠纷。总括起来，以上弊端的结果致使党不明了群众意见，无异脱离群众，增加党内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便找目标，促使组织

的危险和负责人经不起白色势力的镇压，增进同志的怀疑和发生不好的观念。这些弊病而整齐者，莫若宁冈。该地党员负责人多有赌钱吸鸦片的恶习，以赤卫队为抢劫的工具，时常不管自耕农、小商人甚至佃农，都不分皂白的捉来，罚一二石米谷或数十元后释解，以致弄成有所谓米土豪、谷土豪之讥笑，对豪绅的真相异常模糊。还有更好笑的什么“牵牛政策”，即是某乡的农民被豪绅利用而不革命的，他们令其赤卫队率领赤色区域内的农民将那胖猪、耕牛、白羊以及鸡、鹅、鸭、兔等物一概拿个干净，打成大包给牛驮回，甚至有人捉来，“有钱见父母，无钱见阎王”，使一般工农群众多说是土匪，而不认为是赤卫队和红军。这种“抢产主义”的来源，就是王佐、袁文才二人所赐，也是他二人造成井冈山土匪化和个人信仰唯一的良策。因他两在井冈山当大王已年深日久了，现在各个有经常老婆四五个，生活非常舒服。袁文才为红四军三十二团团长，四军离井冈山时，他任参谋长，到赣最危机时，他就私行回家，现任宁冈县县委书记，包办一切。王佐先为三十二团二营营长，五军离井冈山后，已把他的枪支编了带到外面游击，欲分散他们的势力，然后图之。不料袁王二人老奸巨猾，守山成性，受不过劳苦，打不破恶习，为私人利益的结好，消除旧意见，结成新团体。至五军来湘鄂赣边时，他更利用湘鄂赣边地方主义，造谣五军回平，不得来了，反被袁王的老部下拖回枪支近百数（内有一大队党代表乘打仗时拖去六十多支枪），他仍旧独立行动，党无法制裁和指挥，反形成土匪的尾巴！

十二、建议和请求：中国革命，在地势上、文化上，就现在的革命情绪上，都已形成向南渐北的趋势。我们为响应这个趋势，必须先准备力量夺取粤闽为根据地，便于直接得到苏联的援助，才能很快的促成中国革命。同时我们为保障和巩固割

据的胜利起见，务必先将割据地的周围的工作做好才行，因此有下列几点建议：

1. 赣委应注意发展萍乡、袁州的组织，尤其是萍、袁之间的宣风、卢溪（宣、卢已有小的组织）一带，因该地为赣北、赣西交通之要津，亦为赣北、赣西党所联系的咽喉，赣南之上犹、崇义（已有县委共六支部）、大余亦注意发展。该数县与粤北之仁化、南雄的党为取联络必经之路，只要把这个区域内的工作发展了，就可从鄂南之通山、通城，赣北之铜、修、万，以及赣西之莲、永、宁与赣南之信丰、兴国、崇义等数十县，都可取得直接的亲密联系，进一步与赣东的党和红军取得联络，形成对南昌的大包围。另一方面，与粤北之仁化、南雄以及闽之长汀等县都可能发生关系。

2. 湘委应迅速派人恢复湘南工作，与韶关、仁化取联络。因这区域是湘鄂赣闽革命前途上占非常重要地位，亦是保障所拟先期夺取粤闽胜利的塞口。

3. 在白赤对垒之下，而不能脱离敌人包围的红军，欲想应敌自如，以及战胜敌人，扩大组织，必须统一指挥；若受地方主义和保守观念的限制，不独难期以发展，反易失掉当时红军的任务，甚至易受无限危机。如四军二次回湘南，送掉了二十九、三十两团之众；五军屡次攻长寿街和死守井冈山的严重失败，皆是地方主义反映的结晶。尤其是现在的湘鄂赣与湘赣边界所有的武装，宜即实行统一指挥，打破地方主义和死守观念。

4. 红军的组织，赣南的红军，独立二、三两团，根据赣南的情形，可移至安远、龙南、虞南、定南、寻乌等去发展组织。该两团的官兵多是赣南人，语言使地方民众听则了然，若将三南等县的工作做好了，有下面几处优点：（1）可保障和扩

大红军的组织。因该处地势是丛山峻岭，绵亘数百里。（2）该地民众生活极苦，性质刚勇异常，且富服从性，民众有枪者甚多，常自截缴溃兵枪支，倘一组织起来，必会成为无产阶级中的英勇战斗员。（3）这个区域与闽西之长汀、武平、上杭，粤之南雄都毗连县份，可取直接联络。第四军暂时应在闽赣边工作为宜，以便与东江党和红军取联络。同时与赣南的红军联系起来，并相机游击闽粤腹地。

5. 五军拟留一个纵队和赤卫队集中在湘鄂赣边作盘旋式的游击，其余各纵队至湖南之桂东、桂阳、资兴、永兴与赣南之上犹、崇义、大余一带发展组织，并与广东之仁化、南雄、韶关取联络，进一步与四军相呼应。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冯玉祥。
〔2〕指朱德、毛泽东。

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一九二九年十月）

周 恩 来

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上说：固然我们不必夸大反对派在中国党内之政治上组织上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活动情形与反党现象的发展，实不容许党丝毫忽视。

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有人说，反对派在中国的发生是因为有了“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这是错误的，他们只是起了反对派的介绍作用。现在，我们指出反对派发生的几种主要的客观的原因。

第一，南京政府在初成立时，很注意如何引俄国反对派到中国来，以分裂中国共产党。托洛茨基反对派这个“宝贝”不但为欧洲的资产阶级所利用，即中国的统治阶级也一样地看上了。在联共的反对派坚决地固执他们的路线时，欧洲资产阶级即非常之注意，想利用他们分裂联共的组织，破坏联共的正确路线。在中国，胡汉民、戴季陶、周佛海，都企图借着宣传反

* 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的报告。

对派以分裂中国党。中国的统治阶级恨不得抓住中国党内的这一工具，以达到消灭中国革命领导者的目的。中国的政治环境的确容许反对派在中国活动。这是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第一个客观原因。

第二，在革命失败之后，必然有许多失败的情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俄国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德国在革命失败后，都有过这样的情形。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亦是如此。中国党自“八七”会议以后，对于机会主义的纠正，在组织上有相当成功、但在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未完成，直到六次大会，才有相当成功；然党内种种不良的倾向，以及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不同的政治倾向，尤其是机会主义的倾向，还都是待机而动。这是中国发生反对派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所以形成中国党内机会主义——反对派结合之思想上组织上的根本原因。

第三，中国党的党内生活，到现在还不能说是完全健全。虽然在组织上肃清机会主义，引进工人分子入党，但尚未把支部生活坚固地建立起来。因此，党的生活上，常发生动摇的现象。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在上海，有些中心的产业支部并不巩固，有些产业支部非常缺乏政治生活，因此，斗争胜利了，支部就活跃；斗争失败了，支部就消沉，甚至有瓦解的。这表明政治路线还没有得到组织上的完全巩固，不但反对派可以借此活动，即机会主义者亦容易去活动。这是第三个客观原因。

第四，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

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这是第四个客观原因。

尽管过去没有发生过反对派的活动，然而有了这四个原因，就必不可免地使中国有反对派暂时活动的可能。自然直接的原因，还是回国的学生与机会主义的复活。

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的策略路线，我们可以看出有下列四点：

第一，必然不可免地要与统治阶级勾结。《新生命》已经登过关于反对派的文章。将来反对派更要利用统治阶级的宣传机关，以进行其帮助统治阶级反党的活动。如果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了，他们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这是必不可免的前途。

第二，在一切当前实际问题上表现他们的反党路线的宣传与活动。他们在“五卅”纪念时，宣言号召同志向党斗争，要比反帝国主义斗争更重要，客观上毫无疑义地是帮助敌人。“八一”示威，他们又认为是盲动主义，反映出许多失败的情绪。在论调上表现出极右的悲观的取消主义。

第三，利用某些不健全的支部生活，以实行其停留在支部内活动的策略。他们借着停留在支部内，以动摇下层群众，并专门找斗争失败的支部，专利用失败的事实，以攻击党的路线。当斗争困难时，反对派在宣传上可以说出极左的口号，如“没收工厂”，以使工人阶级孤立，并引导工人群众幻想未来的天国而忽略了目前斗争的实际意义；反之，在实际问题上却又提出极右的策略，使工人支部走到无出路的消沉状态。

第四，与中国的机会主义者结合。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因为固执自己的路线，现在既不能深入群众，又不能不找一新的政纲，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样，反对派的政纲，正好在掩饰自

己过去的错误上，在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与策略上，恰恰脾胃相合，于是就被他们利用了。而反对派的策略，也正是要利用这些分子帮助他们进行反党的活动。机会主义者与反对派在“惺惺惜惺惺”的情形之下，便结合起来了。

此外，托洛茨基反对派抛开原则，专门利用些小的问题小的纠纷，进行非事实的毁谤与有意的造谣诬蔑，企图用这些卑劣无耻的手段以破坏同志对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这除了帮助敌人破坏革命的指导者以外，简直没有任何意义。

在上海、香港、北方，都发现有反对派的活动。他们在组织上对党是秘密的。惟其如此，就更应该将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反对派有些并不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有些我们已知道他们有反对派的倾向，有些尚不知道。因此，这一问题必须提到支部中，运用这一机会教育同志，树立党的正确路线的基础。务使每个同志认识以正确的路线同不正确的路线斗争之必要，使党的正确路线得到组织上的巩固。所以，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中央通告第五十六号*

——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的策略及工作路线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一、现时中国的统治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希望来稳定他的统治前途，也没有任何可能来改良工农生活，以延缓群众革命斗争之发展，故他唯一压迫革命之有效的方法只有依靠武力，特别是军阀的军队。因此，革命斗争的发展，必须逐渐破坏这一武力，准备夺取这一武力，然后才能得到革命的最后胜利，并保障这一胜利。因此，破坏军阀制度，特别是夺取军阀军队中的士兵群众，是目前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中国的士兵大多是乡村中破产的农民。因为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加强，军阀战争的继续，以致灾荒与战祸成为经常的现象，于是农村更加破产，农民失业的日多，大量的投入军队，结果不死于家乡的冻饿，便丧身在战场。土地革命是摧毁军阀基础的致命伤，因此争取士兵群众来参加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更是摧毁军阀基础的根本工作。

三、因为帝国主义势力加强，国民党军阀政府的剥削加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的《红旗》第五十三期。

紧、战祸加增，以致灾荒普遍、物价腾贵，目前的士兵生活乃更加恶化，而新军阀对待士兵的手段亦更加残酷。兵饷既微，又不能发足。伙食既坏，且常被揩油。军衣破烂，住处污浊。三操两讲，毫无自由。官长虐待士兵，稍不如意，拳打脚踢，禁闭枪决，视为常事。士兵入伍，便同入监，休想回家。等到伤病老弱，遂被弃如路人，流落为乞丐。因是国民党军队，更花样翻新，有所谓党义教育，教以媚帝国主义，替军阀当炮灰，杀工农弟兄，有所谓一律入党以行其收党捐的剥削。现时全国兵额约一百五十万，每月开支在五千四百万元以上，实际用在士兵身上的不及三分之一。工农的血汗、士兵的生命，都供少数国民党军阀的挥霍与浪费！在这样生活基础上，广大的士兵群众除掉投身革命外，实别无生路，且亦是中国党争取士兵群众到自己方面来之最有利的环境。因此中国军队内部的阶级斗争乃必然的要更加尖锐起来。

四、目前进攻苏联的军事行动与军阀战争，又在继续爆发。一年来的战祸已经使士兵群众死伤相继，痛苦加深，他们回想过去大革命时代给予他们的实际经验与现在已纯全两样。便是最落后的士兵，他们也懂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与联合苏联、联合工农的口号，现在是完全“翻了一过”，他们更懂得照这样下去，生活改善与解放是更无望了。加以现时的土地革命的发展，苏维埃游击区域的存在，红军尤其是朱毛红军的壮大，更足以影响他们的觉悟。因此，目前军队倒戈，士兵哗变，以及整队士兵跑到游击区域与红军方面来的加多，决不是偶然的事。现在许多事变虽不都含有革命意义，但多数动摇士兵已接受革命影响，确毫无疑义。故生活痛苦、战祸相寻、历史教训与革命发展，是促成目前士兵日益革命化之主要条件，而党的士兵运动在目前乃更有严重

意义。

五、且再就党的目前两大任务——反对进攻苏联与军阀战争来看，党之需要加紧争取士兵群众，破坏军阀军队，以准备武装保护苏联，武装反对军阀战争更有他迫切的意义。因此党在争取士兵群众工作上，在发动士兵日常斗争上，在发展党的士兵支部组织，在士兵进行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反军阀战争的宣传上，都必须与工农运动看作同等的重要。特别是准备破坏敌人武装的工作，更要建立中心在士兵群众身上，以树立基本力量，这些都是目前中心任务。

六、但在目前各级党部对于兵运还有许多错误观念：第一，往往以为兵运只是各级军委兵委少数人的工作，而不看他是一般党员工作；第二，往往把中国军队组织看得太严密，误认武装的士兵弟兄为可怕，轻易不敢和他们接谈；第三，以为士兵运动的目的既在破坏敌人军队，便随时都主张兵变，而以兵变主义为一切工作原则；第四，以为军队中没有日常斗争可能，一发动便要走到兵变，否则便等待不动；第五，还有些地方保留机会主义余毒，企图倚赖军官以发展士兵运动；第六，有些地方还只注意学兵及军官学生的运动，而忽略了根本的士兵运动；第七，有的将兵运只看作单纯的秘密组织工作，而不知进行广大的鼓动宣传工作更为重要；第八，有的只就易于打入的杂色军队去做工作，忽略了中心军队的工作；第九，青年团对于这一工作还异常忽视，党也少有给以正确的指导。这些，各级党部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纠正，以开辟出兵运的一条正确道路。

七、党在军队中首先应进行有系统的鼓动宣传工作，在战争时尤有他利便的条件。第一，每个党员都应尽量利用各种可能机会去找士兵谈话。第二，与士兵接触谈话，要从他们本身

痛苦联系到本身斗争，以归结到革命的出路与工农斗争的联系；但不是一次便要谈完，要能继续的吸引他来。第三，有些地方可邀请士兵到工农群众的家庭或工农会里开茶会、联欢会，使工农兵得到密切的来往。第四，每个党员都可写信给军队中认识的士兵宣传他们，并可代士兵的家族写信给士兵，或讲解士兵给他家族的来信。第五，每个党员都应尽可能的向士兵群众散发党或工农会的宣传品，或递送，或张贴，或放在士兵经过的地方。第六，在宣传上，目前必须着重士兵痛苦与武装进攻苏联及军阀战争的联系，并联接到反帝、反国民党、反军阀与拥护苏联联合红军的一般宣传。第七，在目前更须指明土地革命与红军是士兵斗争之唯一出路。第八，各级党部更须有系统的编辑给士兵看的刊物、画报。

八、目前在敌人军队中进行士兵日常斗争的鼓动与指导，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提高士兵群众反抗官长的情绪与决心，锻炼士兵群众的组织力量，使士兵群众逐渐认识，只有自己的团结可以威吓乃至战胜压迫自己的长官，而决不是企图真能实现什么改良士兵生活。每一斗争的发动与指导，必须着重在这一军队中的弱点与士兵生活中的最痛苦所在。当着军队中工作环境还没具备可以发动兵变的成熟条件时，士兵斗争的发动要在求得小的胜利，以增高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组织力量，不宜只求扩大与继续，以致一发而不可收，使斗争失败会影响到组织的塌台，甚至因异常严重的压迫会影响到群众斗争情绪一时的消沉。因此发动士兵斗争，必须顾及主客观的条件，平时应尽量的求得小的胜利，条件成熟时便应尽可能的扩大以造成兵变而投身于革命的局面。

九、在目前军阀混战中，我们主要的路线是采取两败俱伤的失败主义。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的战争中，是要

使军阀军队失败，中国兵士与苏联红军携手起来。因此，“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是我党目前中心的宣传口号。在一些作战与准备作战的军阀部队中的工作，都要使之向着实现兵变的方向进行，但仍不是无条件的实行兵变主义。当着军阀战争我们的力量不能从中实现兵变时，而我们所在的军队又为对方战败，我们应不拒绝为俘虏，以继续夺取敌人士兵的工作；但这种“投降”策略却不是中心策略，却不能混淆党之组织兵变的路线。实行兵变的可能条件有以下几种：（一）我们在敌人的战场军队中的工作与士兵组织有了相当力量，便可组织兵变；（二）当着敌人军队进攻苏联红军或“围剿”红军或驻扎在农民斗争发展的区域，便是我们在其中组织力弱或简直没有，也要尽可能以政治影响与活动，促成这一军队的兵变；（三）当着军队中的我们组织为敌人发觉，或是群众自发的斗争均到了非兵变不能挽救生命危险时，也只有尽力的组织这一兵变。兵变的前途，除了在进攻苏联时应与红军携手外，必须投入农民斗争区域，实行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没有斗争的便须发动斗争，开始游击。又在目前，还有些军阀内部倒戈的军队，其趋向不定，军纪涣散必然要影响到士兵的动摇，我们要从中加紧工作，在条件成熟时可实行有组织的兵变。一切兵变的基础要建立在士兵本身的斗争上，才有坚固的力量可以发动而保障成功。

十、一切兵运中的宣传鼓动口号除掉中央历次通告者外，在目前更要注重运用下列的口号：在宣传方面，有“分配土地工作与士兵”、“反对军阀战争”、“拥护苏联”、“拥护中国红军”、“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中国共产党是拥护士兵利益的”、“官长由士兵自己选

举”、“官兵待遇平等”、“打倒阶级服从”、“要求政治信仰自由”、“杀反动官长，投入红军去”等主要口号；在鼓动方面，有“要求军需公开”、“每月清饷不折不扣”、“兵士参加军需管理”、“反对体罚肉刑”、“发给伤兵病兵给养零用费”、“兵士有出入自由”、“兵士有阅报自由”、“反对强迫入国民党”、“反对收党捐”、“不替军阀当炮灰”、“不上前敌去”、“不打自己的工农弟兄”、“不打红军的弟兄”、“不打苏联的工农弟兄”等口号。

十一、兵运中的组织问题应以发展党的秘密支部为基本工作，以革命士兵委员会为公开的号召名义，有时可用朱毛红军名义号召士兵投身红军。士兵支部须绝对秘密，各级横的关系非必要时不得发生。革命士兵委员会要在有半公开可能时，才可进行组织以领导群众斗争，以免与秘密的士兵支部相混。

十二、为达到破坏与瓦解敌人军队的目的，党在敌人军队中应不放过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只是唯一而根本的工作还是夺取士兵群众，其他一切附带工作（如下级军官，侦探工作等）都是为了建立和巩固这一根本工作而产生的。没有或离开根本工作，一切附带工作都将消失其意义，都将与党的军运的根本路线相反。因此，一切附带工作都不应与党的兵运相混，尤不应与党的士兵支部组织相混。

十三、在目前战争状态中，党更要注意在伤病兵中在被解散的士兵中的工作与组织。我们要有计划的进行鼓动宣传，发动斗争，并形成士兵斗争的组织，如伤兵代表团、退伍士兵委员会等去领导斗争。斗争的方式要采取直接包围长官的办法。在进攻苏联的中国军队的伤病兵中，我们更应加紧工作，特别要注意向他们解释苏联是中国如何的好朋友，

他们牺牲是完全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的利益，以促起他们的觉醒。

中　央

十一月七日

注：各级党部讨论此通告时，可参阅中央为解释此通告而作的小册子。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公开信*

——关于示威运动之工作上的批评与指示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

各级党部，全体同志：

一、群众的示威是群众斗争发展到了高度的一种最热烈的表示。即使这一示威只限于一厂一业或一村一校的群众，但他对于压迫阶级之积恨的情绪总已增长到了高度，才会行动起来。一般的说到示威运动，总是指着各厂各业的工人群众乃至一般的劳苦群众汇合而走到街上来的行动，他表示对于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反抗，他检阅了自己的团聚力量，故这种行动实含有庄严的意义。便在敌人，对于群众的示威，也看得是扰乱乃至动摇他的社会秩序之一个最有力的表现，故每届群众示威，敌人总是恐慌和戒备得十分厉害（自然在另一意义上，他还有借此以威吓和压迫群众的作用）。因此，我党对于群众示威的领导，必须很郑重的对于示威运动本身有一明确的认识，决不应将他看成如日常斗争一般，轻率从事，而不注意于准备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以实现广大群众的反抗

* 本文原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三日出版的《红旗》第五十五、五十六期。

行动。

二、决定群众示威运动的条件有两种：一种是有国际的或历史的革命意义的示威纪念日，一种是目前政治上有大的变动或大的压迫所引起群众的反抗回答。但能否实现这一示威，或实现得成效如何，首先要决定于群众斗争发展的程度与我党在群众中领导作用如何。前一种的示威在中国如“五一”、“五卅”、“九一”、“九七”、十月革命节等示威，因在群众中有了较长的历史印象，有时发动起来便较为容易，但有时正因为是历史的纪念与群众当前的问题缺乏直接的联系，而发动比较困难的。后一种的示威是完全根据于当前事变，如拥护苏联、反军阀战争、援助东京被捕学生及追悼彭杨四烈士等等示威，必须看群众对于这些事变当时的感觉与党之发动群众的力量如何，才能决定这一示威发动群众的宽广限度。在这点，客观的政治形势特别与有关系。假使是革命高潮时代，便是再小的事变也常常可以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假使是革命消沉或暂时死亡了，便是事变之来有如何严重，党的主观用多大力量，也常不一定发动得很多的群众起来。中国在这时，恰恰是处在革命斗争开始复兴而又不是已经到了高潮时期，故示威实现的可能是很多的，但不是每一事变与压迫都必可发动起广大群众举行示威反抗的。此中主要的关键，便在决定示威能否实现的一切主客观条件，而并非示威运动的根本路线可以怀疑，更非如机会主义——反对派的取消观念，认为自“五卅”以来的上海一切示威都是盲动主义，根本取消了党在目前的一切政治估量，否认了党的政治影响之扩大。

三、机会主义——反对派根本不认识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不承认群众的革命斗争已是开始复兴，故对于群众运动有实现示威的很多可能常常熟视无睹。实际上，青岛纱厂火柴工

人之包围公安局，北平人力车夫的骚动，与沪西农民反对政府圈地的示威，不都是最近几月工农群众几件有声有色的自发的示威举动么？谁说目前中国群众斗争不会走上示威道路？有时机会主义者也承认这些自发的示威是事实，但他们却主张我党只要注意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等待"水到渠成"，群众自然的会走到街上去示威，而反对我党领导群众，发动群众去组织示威。这种等待而不领导的观念，真是十足的取消派、经济派之机会主义观点！

四、一年来我党领导的示威运动的总路线毫无疑义是正确的，他每次给予群众的政治影响与给予敌人的恐慌畏惧都显然是很大的。但每次示威运动，我党的领导与发动群众力量是不是已十分充足？许多自发的群众示威是不是都能争取到我党领导之下？没有，我们肯定的回答没有充分，没有完全。上海的示威运动自"五卅"以来都表现得发动群众不充分，尤其是最近几次示威与各区的飞行集会更表现出许多弱点。香港自沙基惨案后的示威，天津、厦门、奉天为拥护苏联运动所号召的示威，群众的发动都不宽广。许多农村自动的群众行动，甚至包围县城、威迫官吏，我们也常常不能领导。这种种弱点，不仅不能证明群众示威不可能，反而证明客观形势的发展常常超过主观的力量。机会主义——反对派不懂得这种弱点，须从主观上努力来补救，反主张改变我们的政治路线取消示威，以助长主观上的弱点。有些"左"倾的同志忽视了这种弱点，以为现时一切客观条件都具备了，只要我党一号召，便可以掀起广大的群众示威；不管任何事变任何压迫，只要我党一领导，群众的示威便可随之而起。这种观念的发展，必然要形成盲动乱干以至脱离群众的现象。中央通过的上海"八一"示威后的工作路线大纲，对于"在上海在外县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政治的经

济的）发动群众不断的举行政治的示威运动，一切飞行集会、群众会、罢工、巡行、集队演讲，都应成为今后的经常任务，但必须联系到群众的日常斗争”一语，缺乏明确的解释，这是很大的缺点。因之，顺直、福建等省委对于示威运动的认识便模糊起来，以为可超越一切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举行不断的示威。这值得引起全党同志注意，要很郑重的估量群众斗争中一切主客观条件去发动群众，组织示威。

五、什么是决定群众斗争走上示威的客观条件呢？首先要决定于群众斗争的情绪与对于统治阶级的认识。现在全国的群众斗争已是开始复兴，已不复束缚在小的日常斗争之中，大的罢工与抗租抗粮无分南北都在继续发展，统治阶级对于斗争的压迫，对于工农群众的屠杀与拘捕，也无分南北是一样的。只是群众对于统治阶级的认识常常是因环境而异的，一般的便是对于改组派的幻想，常足以缓和群众对于统治阶级全部的仇恨。次之，群众斗争情绪还有一部分表现畏惧，黄色工会的数量还在增加，黄色领袖的作用还是层出不穷，尤其是敌人压迫革命的力量还大过革命的力量，无限制的军事戒严随时可以宣布，这些都足以证明客观上虽很多可能发动群众斗争走上示威运动，但不是没有困难阻碍的，不是每一事变、每一压迫都可以发动起来的。什么是能够发动群众组织示威的主观条件呢？党与群众的关系，赤色工农会的组织，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尤其是党之发动群众的实际策略，都是决定这一示威能否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最要关键。许多客观上明明可以发动起来的群众示威，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力弱或工作不得法便致流产……一般的示威不论上海、香港、天津、厦门、南昌，以至奉天，都因党还不会很好的使用群众工作路线，调动广大群众而常常束缚在支部范围以内，甚至秘密的与少数人接洽，或仅仅发动我们所

领导的赤色工会群众与少数学生群众，因之，客观上可能发动的群众便不能都被我们征调起来，组织起来（这种情形在上海较为好些）。故每一次示威结果，我们与群众的关系常不能有很多的进步，赤色工会的发展、党员数量的增加，也常是很缓慢的。许多群众自发的示威更因为我们与群众关系的薄弱，我党领导策略的不当，以至广大群众的英勇斗争，常不能得到党的正确领导而形成革命的发展。这种种主观上的弱点，我们每一个群众斗争的领导者，每一个群众运动的组织者，我党的各级党部，都应当很谨慎的很细心的去体会、去观察，在每一次示威的经过中，求得教训，学习教训，然后才能使这些弱点逐渐减少，广大的群众示威才能在党的领导之下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惟其如此，机会主义——反对派之根本怀疑示威路线的观点，乃适足以动摇对于示威运动的学习，障碍主观力量的加强，更需要我们予以坚决的反对与指斥。

六、关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走上示威行动的实际策略，在上海的“五卅”、“八一”、“九一”至“九七”的历次示威中，我们有很多成功有很多优点可以值得学习，显著的如开始了争取群众运动公开的路线，建立起一些群众斗争的组织，党与群众关系渐渐改善，支部生活相当建立，党员在群众中的工作方法已比从前为进步等，这些都已见中央历次通告。现在所要批评的乃是各级党部执行这一工作路线时，还有许多不正确的观念和方法。第一，他们常常为举行示威而发动示威，不能与群众日常斗争有很好联系。这一工作的结果必然是单凭政治的号召，由机关中走到马路上，却忘掉发动群众的根本对象在工厂、在作坊、在学校、在兵营。党必须懂得党的领导必定经过工厂、学校才能走到街上。没有群众本身的斗争做基础，在目前主客观条件还是很多弱点时，更不易引起广大群众热烈的走

到街上来的。各级党部有时也知道注重群众的日常斗争，也知道发动群众示威，但两者之中的联系又常常不易建立。上海的“八一”示威不能与当时的自来水罢工与电气斗争有很好联系，以致不能使这两部的群众成为示威中的主力。我们可以肯定说，在现时的政治示威，如果不能将正在发生的群众斗争联系到示威的队伍里来，将成为这一示威中的最大损失。结果且要因为忙于示威，必然要忽略日常斗争，必然要障碍群众本身的工作。第二，党所领导的示威常不能有很好的政治发动。群众假使对于这一政治示威不能有充分的认识，如何能热烈的走到街上？天津的“八一”与八月二十的示威号召，党只简单的站在阶级观点上宣传拥护苏联，这在政治观念比较模糊的天津工人中如何能发动得广大群众起来？便是上海，对于历次示威之政治意义的解释，在许多工厂群众中也常不能有浅显而动人的说明。地方党部常以简单的语句甚至口号号召支部，支部同志以此号召群众，并以此号召赤色工会，这很难得发动广大群众。进一步，政治解释如果不与群众本身问题联系起来，也同样不能发动群众。第三，在准备群众、组织群众上，也常是束缚在狭隘的支部范围内，至多只能及于赤色工农会的群众。许多黄色工会下的群众尤其是无党无组织的群众，都未能算在示威的发动之中。这样，自然示威的群众范围会日益狭窄，示威的政治影响乃不能动摇黄色工会的基础，不能侵入广大无组织的群众中间以建立我们的领导。因为示威群众的组织与领导常常是倚赖着支部的秘密路线去准备，故群众即使已为我们发动到街上来了，但他们因得不到群众组织公开的领导，很易使多数的群众立在马路两旁形成观望，而仅仅是我们支部同志去行动，以致与敌人斗争起来得不到群众的掩护，群众便是参加斗争亦不能形成广大有组织的行动。第四，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

题，便是不顾群众的情绪，不注意一切准备的工作，任意的决定示威、号召示威、举行示威，这也极有损于群众之斗争力量的。上海“八一”前后小的示威（分区的）行动便表现得稍多，十月二十七至十月革命节的短距离中，还有人主张再举行一次全上海学生的示威，这都是偏重主观的错误意见，实行起来反转会使群众的斗争力量感觉疲倦，反易使敌人采取各自击破的策略而减低示威的反抗意义。这种种工作上的缺点，需要全党予以极严重的注意。必须在实际行动中体会这些缺点，改正这些缺点，群众斗争的复兴才会为我党领导走上与敌人决战的道路。根本怀疑于示威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或企图对于示威行动怠工和恐惧的人，是不能借口于这些工作上的缺点而成立其取消示威之路线的。在这里，这两条路线没有丝毫的共通点，各级党部、每个党员必须求得明确的了解。

七、除了上述的工作缺点，除了中央历次通告所指示的关于示威运动之具体布置外，中央更唤起各级党部对于示威运动的下列几个实施问题予以特别注意：

第一，示威运动的号召必须是公开的，愈公开才能愈加深入群众，愈加引起群众的注意。过去上海“八一”的示威，因预定示威地点向群众公布，引起同志中怀疑这是否便利于敌人的防备。实际上敌人的防备并不因我们不宣布地点而懈弛；敌人的武装集合几分钟内可以驰至，也不因我们不宣布地点便减少了他的压迫。在我们方面却愈因秘密愈不能使群众广泛知道，愈不能引动广大的群众走到街上。阴谋秘密的举行，总是少数人的事，决不是群众的行动，更不是群众的革命示威行动。不仅关于号召上，一切示威的准备发动与组织都必须建立在力争公开的路线上，这才能形成广大群众的行动。因此，一个示威运动从号召准备之日起，党便应深入群众中去工作。每

个党员变成群众斗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每个支部变成群众组织的核心，在群众中说群众的话，提出群众所要解决斗争的问题，以联系到示威问题的本身，然后使这一示威成为群众自己的要求（本来就是群众自己的要求，不过不经工作的联系，便不知道，便不会要求），成为群众自己的呼声。有了群众自己的要求与呼声，便可形成为准备这一示威的组织（在工厂作坊中便是工厂委员会形式的组织）以发动群众。一厂如此，一业如此，一校如此，自然可汇合成分区或全市的联合组织，以树立示威之总的领导机关。在这种公开斗争与组织的基础上，同样的进行公开的宣传与鼓动工作，公开派遣代表到其他未形成示威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去劝说他们，引之同情于示威的行动与组织。尤其是黄色工会与无组织的工人群众中，更要加紧这一公开活动。在这一准备过程中，各厂代表会的催开，工厂中飞行集会的号召，宣传品的编印与散发，以至示威地点巡行路线的决定，都应公开的在群众代表会中讨论。更重要的是各厂各校示威群众的指挥人与总的指挥机关必须由群众会中选出，且必须是群众中斗争的领袖，而且是大多数公认的领袖。只有在这样公开的路线中准备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大的群众才会为我们领导到街上，才会在领袖的公开指挥之下热烈而勇敢的行动起来。有了这样公开的基础与一致的行动，群众的情绪必然要高涨，口号的呼喊也不会像过去断断续续的不能继续很长的时间。假使纠察队、宣传队的组织再能形成，则成队的游行、革命的歌曲，均将从群众热烈有组织的行动中表演出来，歌唱起来。这时便是敌人的警察、巡捕、兵士来干涉拘捕，必然会引起群众勇敢的拒抗、愤慨的抢夺，再进一步便会形成肉搏，演成巷战。这一切一切的表演，必是在群众中公开的发动，且在不断的压迫中争得不断的公开，然后群众的基础

才能宽广，才能有力。党的支部工作便是在这一切公开的路线上，树立他的秘密基础，而形成党团领导的活动。

第二，示威运动是武装暴动与巷战的预习。这一演习的基础在群众，故群众的发动、群众的组织、群众的武装训练是这一问题中的基本工作。为着群众发动得宽广，必须在示威前尽可能的在各厂、各业、各校中做准备工作。一切离开群众基础的号召，都不如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故示威前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演讲、飞行集会，与其集聚少数人的到街上来行动，莫如在厂门口更好是在厂内，方能更为有效，才更易影响群众，而且使一切工作能掩护深入在群众中间。关于群众的组织，除掉上述者外，纠察队的组织是工人武装的基本队伍。这一组织，我们应在群众中公开宣传与号召，尤其是在工人斗争发展的过程中更应迅速的成立纠察队。纠察队因其有武装组织的意义，必然要成为示威中的中心力量。武装训练要经过宣传与解释（这在上海、广东、武汉工人中几乎一经道出便会接受），要在工人的热望中予以严密的武装与军事训练，特别是巷战术与使用器械。当然我们要向群众解释明白，目前群众示威不会是武装暴动，但当着群众斗争到了较高度的时候，示威也会演成巷战。这一前途，在对于群众宣传武装暴动与示威运动时必须要明白指出。

第三，每一群众示威过后，他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党不应丝毫放过。党应利用这一影响去继续发动群众进行本身的斗争，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加紧对统治阶级反抗的宣传，不断的与黄色领袖斗争，加紧党与群众的关系，努力吸收新的党员，继续建立支部的健全生活——这一切工作都应针对着示威后的新气象而加紧去做。过去有许多地方，在举行一次示威运动后，党及群众工作反懈怠起来，甚至会退步下去，这真是不

应容许的工作精神。

现在十月革命节过去了，各地党部关于这一次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都应向中央做详细报告。主要的内容，要关于策略的运用及工作方法有详细的描写。

中央更号召全，党在准备与进行纪念广暴、举行反军阀战争运动周中，要彻底了解群众示威的严重意义与党之示威路线是建立在如何的基础上来准备群众，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要坚决的执行中央所指示的一切工作路线与肃清工作中一切缺点，以实现全国动员的伟大的示威运动！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　央

一九二九，一一，八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公开信

——关于与机会主义——反对派斗争的工作路线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各级党部，全体同志：

关于机会主义——反对派的问题，中央已发出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在这一斗争中应如何进行思想上与组织上的解决办法。但到现在，所接得关于此项工作之地方党部和支部讨论和执行的经过情形的报告（除上海、香港外）简直没有，这是证明各级党部对此问题还未列入中心工作的日程。在上海虽然早开始了在支部的讨论，但是讨论而有结果的还是很少，工作上还是很迟缓。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日益加重了保护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的二大任务，群众的斗争无疑的是向前发展，党的工作只有一天一天的繁重。但同时机会主义——反对派在这时更明显地来阻挠党向敌人的斗争，站在完全与共产国际和党的六次大会以及中央现在所执行的正确路线相反地位，积极的进行破坏党的一致和分裂党的活动，以公开的攻击现在的党是卖阶级的无耻语句以献媚敌人，以极端民主化来鼓动同志反对上级指导机关之指导讨论党的政策，提出与六次大会完全相反的路

线，以“不了解”、“怀疑”的掩饰来攻击党之六次大会的路线，以捣乱式来反对讨论问题的范围与每一问题的结束，而使每个会议都没有结果，绝不接受任何会议的决议，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在组织内公开宣传和活动，坐在家里不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以空谈来攻击党现在的策略与行动（如对上海九一示威攻击是盲动主义）。

这些事实的表现在上海尤其明显。这完全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与党的纪律的行动。对于这些行动的同志公开警告，他还不接受与改悔，党应坚决地予以组织上之最高原则的裁制，以巩固党的一致，决不能有半点动摇。当然与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斗争，主要的是在党的政治路线上和理论上来肃清整个相反的纲领，但同时在组织路线上应无条件地坚决地开除这些领袖与积极分子出党。这两个路线绝不能分离的。假如只在组织上解决，开除这些领袖与积极分子（如福建及广东梅县）是不够的。这决不能根本肃清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思想在党内的残留与活动，同样只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和理论上斗争，而不给以组织的制裁（如上海有些同志便动摇这一路线）也是错误的。这在客观上或主观上都表现是帮助他分裂党的一致之调和派的倾向。尤其是在目前工作严重的时候，更不应容许的。所以中央对于各级党部讨论机会主义——反对派问题之工作路线上有几个原则上的说明：

一、六次代表大会是全国党员最高的代表会议。大会一切的决议案是经过全体代表热烈地讨论而一致通过的，并且是经过国际六次大会批准的，这是全党自大会后之一切工作的总路线。这一年来一切政治形势的变更，无疑义地证明六次大会决议案的正确，中央以及各级指导机关在这一总路线下来工作不仅是应该，而且只有如此才不负上次大会之委托。所以为要使

每个同志都充分了解大会一切决议案，必须每个支部都充分讨论，来提高同志的政治水平和懂得如何运用党的一切策略与路线，才能合乎当地的实际工作并与当地实际工作联系起来。现在党所执行的策略路线与二中会议的一切决议，完全是根据六次大会的精神及总的路线而决定的，所以党内的一切讨论，是要如何更具体的运用与更充实六次大会和现在党所执行的路线的内容及联系到实际的工作上，绝不是提出另一个路线与六次大会的路线对立起来，并在党内活动。这样不是讨论了，而是攻击及违背六次大会的决议案了。如要提出与党的大会和中央的相反路线来讨论，只有在三个条件之下是可以的：

A. 遇着大革命的失败（德国革命失败及中国八七会议时）或有大的政策上的变动（如苏联新经济政策之实施），当然党必定有许多路线不正确，或许多路线党内群众还不了解，所以这时必要讨论失败的教训或政治经济上的大困难，以便从新确定或认定今后革命的任务和斗争的路线。那么，每个同志都可以提出自己不同路线在党内公开讨论，以求一个总结。

B. 下一次代表大会将近开的时候，在最高指导机关所规定讨论大纲发下的时候，每个同志都可以发表他一切意见，来作贡献大会的材料。但在行动上还须执行六次大会的决议。

C. 发现了最高指导违背了上一次大会决议的路线，经过下级党部或党内同志之抗议或国际之纠正而依旧不改时（如武汉时的中央），当然要号召全党党员起来推翻他和改变他的路线。现在既完全没有这样条件，而机会主义——反对派竟提出与六次大会和现在中央的相反路线来活动，这样不是求党的路线和策略之更加一致，而是相反的与党对立起来以形成党的分裂。这种分裂党的行动在客观上是帮助敌人，减少党向敌人斗争的力量，这是违背全党的决议，在组织原则上应当予以坚决

的制裁。各级党部在指导支部讨论六次大会和现在党的路线时，必须认识这一原则。

假如发现了某一个同志背违了这一原则，应即公开通知他（无论会议或谈话）停止这种活动并说明这种行动的错误，如不接受或口头接受而实际不改变，应执行党的纪律上的制裁。

二、每个支部对机会主义——反对派的讨论，上级指导机关（省委、县委、区委）应尽可能的实现党内民主化，使同志得到充分机会讨论。但是必须有计划的指导支部讨论，决不是无计划的使支部无范围的去讨论，这样会是得不到结果的。同时支部决不能“一切问题只由支部自己的意见去决定”，否认和反对接受上级指导机关所给予的讨论问题之指导和范围（如上海的报馆支部及过去的香港船厂支部），甚至指导机关的决议都要经过每一支部讨论过才可执行（如报馆支部反对区委限一星期要马玉夫写意见书的决议）。这种表现完全是极端民主化的表现，指导机关应该矫正这种错误。这种处置与党内民主化路线的实行绝对没有半点矛盾。机会主义——反对派正是鼓动同志以极端民主化的行动来分裂党的组织，否认指导机关的存在。以反对命令主义来掩饰他否认一切决议，在组织上是决不容许的。

三、每个支部以及地方党部会议，对机会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都要做成决议案，同时应该在很快的期间求得一个结束。在这里，机会主义——反对派他必定鼓动同志说“讨论党的策略不能限定时间的，这样是命令主义是封建制度”。他们将讨论机会主义——反对派的问题与讨论执行六次大会和中央的一切路线混为一谈，来掩饰他们反对指导机关的企图。当然党的策略路线的讨论是不断的，同时对机会主义——反对派的问题也不是说有了一次结束就不再发生问题，就不再讨论

了。相反的，与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斗争在目前决不是一下子就可解决，思想上的斗争、组织上的克服，都不是一时就可肃清的，只是在现在的讨论期间应当有一个结束，尤其是在有机会主义——反对派表现的支部，不应无限制的长期的讨论下去而没有结束。因为目前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的加重，每次会议都对此问题占了大部分时间甚至整个会议时间，这完全是妨碍党与敌人斗争，因为机会主义——反对派认为党现在正是研究的时候，现在没有走向革命高潮的可能，所以他们向同志鼓动我们对于党的策略不能完全了解怎样做工作。这种不看事实的观察，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各级党部接此信后应从速将对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斗争工作及讨论经过报告中央，每个会议的决议案亦须尽可能的交来。忽视这一工作是非常错误的，中央特提起你们严重的注意！

中　央

十一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共党的六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综合全党同志的意见，依据历年来斗争的教训与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决定了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一年来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的变迁，群众革命斗争的开展，以及中央根据此路线而执行的一切工作，都在实际上证明了六次大会路线之正确，并得到全党同志的拥护。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中央回国之初，即表现对六次大会决议的怀疑、对大会结果的不满。中央当时曾对陈独秀有过详细的解释与批评。

不仅在六次大会之后，更远在“八七”会议时，当时的中央曾根据国际的决定，屡次要陈独秀前往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独秀当时不仅不服从国际决定，且于同志间谈话，表露其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彭述之彼时在顺直省委工作，亦曾有不满意“八七”会议的宣传。嗣六次大会召集，国际及中央要

* 这个决议案原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红旗》第五十七期。

独秀前往参加，且曾几次催促，但都遭拒绝。六次大会中及大会后，国际又曾数电促独秀赴莫。新中央继续向独秀解释他赴莫之必要，但他初则应允，继则取消，终则推延到明年开春。其实这都是他表面上的应付，他中心意见在他最后致中央的两封信中，已完全表示他反国际、反党、反中央的一贯路线出来了。他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他根本便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地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堕入到更深的机会主义。

这次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联合进攻苏联，中央在此紧迫时期依据国际与中国党的六次大会决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的口号，动员全党同志，号召全国无产阶级、农民与广大劳苦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陈独秀等不特不在中央的决定之下一致工作，并且离开中央的路线，提议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他在分析中东路问题之前途中，更认定“一是帝国主义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一是苏联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必然互相争夺中东路而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见解的结论除掉落后的群众会主张苏联退让外，便只会得出如独秀致中央信中所说“无论那一种战争，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于是我们只要反对战争的祸害好了，不必去问战争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进攻苏联还是帝国主义自己互打，所以“误国政策”的根本观点即是产生于此。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精神，与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观点和阶级观点绝对不相容的，必然要在群众中间散布起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幻想，必然要落入资产阶级左派的泥坑。他这种见解，完全表现他仍然固执自己

过去的机会主义路线，一点也没有接受六次大会的决议与精神。中央对于他的两次来信，曾在理论与实际的各方面指出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之危险，并告诉他在这样革命斗争紧张的时期必须放弃这种错误思想，回到党的路线之下来一致行动。

陈独秀对于中央这样的指示完全拒绝，且更进一步提出与国际及中国党的六次大会根本不同的路线，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他认为过去大革命时代的机会主义错误，乃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的错误的观察和加入国民党”，乃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而不是当时他所领导的机会主义中央不执行国际正确策略的错误。他认为现在中国革命失败了，“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封建残余……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由此便得出“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之取消主义的结论。于是他完全站在反对六次大会的观点上，认定“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不仅对于将来的革命性质仍旧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也估量不正确”，因之他同彭述之便认定“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而没有实际意义，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在策略上更攻击中央所领导的“五卅”与“八一”在上海的示威是玩弄，是盲动，而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这表示他已经从机会主义深入到取消主义，已经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堕落到资产阶级左派的立场去歌颂豪绅买办资产阶级之“稳定”的统治。这与托洛斯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思想完全是一致的。这样极端右倾的思想，

这样反国际反党的路线，如果在党内存在，毫无疑问地是破坏党、破坏革命，以至背叛阶级帮助敌人。

并且他在行动上，更于中央未决定与答复以前，便将他写给中央的信作公开宣传，经过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极力煽动同志起来反党，并破坏支部与党宣告脱离。这很显然是反党的小组织行动，并且是第二党的萌芽！中央在开始是坚决地与他作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并于十月五日通过了《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可是陈独秀完全不接受中央的警告，并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地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斯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布尔塞维克党决不能容留这样永不真实地承认自己错误与接受国际和中央决议、公开的与国际开除的反对派一致的分子在党内，决不能容留他们在党内散布叛变无产阶级、叛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尤其不能容许有这样反国际反党的小组织在党内存在，因此中央特决议：

一、开除陈独秀党籍。

二、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固执与陈独秀一样的错误意见，经过支部、区委、省委与之作详细的讨论和批评后，一点也不改变他们的错误思想，并且积极作小组织的活动，煽动同志反党，破坏支部开会。因此，中央批准江苏省委关于开除他们四人的决议。

三、各级党部须严重注意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如果发现了这样小组织的存在，须根据党的最高原则立即予以解

散。对于这种小组织的领袖分子须坚决地开除出党。参加活动或接受这样错误思想的同志，须有详细的解释和批评，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经过多次教育以后还固执他的错误思想与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去。

布尔塞维克党能够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完成历史的使命，就是因为有他的宝贵的武器——一致的精神与铁的纪律。服从大会决议，服从指导机关的指导，是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中制的最高原则。如果破坏这样的原则，如果个人或少数人不同意大会的决议，不同意国际和中央的指导，便可以自由宣传、自由行动，这便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这便是破坏党、破坏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对这样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制裁，才能巩固党的组织、发展党的斗争的力量。

“谁愿意稍稍削弱无产阶级党的纪律，谁就是事实上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列宁——左派幼稚病）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党的铁的纪律来巩固无产阶级的阵线。现在党内各种各色的调和派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阻碍党对于取消主义的斗争，帮助机会主义——反对派在党内发展，松懈党内铁的纪律。且这种调和倾向根本便伏有右倾成分，如不彻底肃清，则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与机会主义走同一的道路。因此，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斗争中，同时要坚决反对各种各色的调和派的倾向。

党的巩固是建筑在党的统一的意志的基础上。“肃清党内机会主义的分子，不只是不会削弱了党，而且是加强了党，加强了工人运动与革命。”（列宁——虚伪的自由论）尤其在现在革命斗争紧张的时期，党的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捣乱毫无疑问的是帮助了敌人，如果不肃清这样取消主义的思想，不开除这些机会主义——反对派的领袖分子，决不能坚强党领导革命

斗争的任务。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起来为党的统一的意志而奋斗，为共产国际与六次大会的路线而奋斗，肃清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的取消派的思想与小组织，肃清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肃清一切调和派的倾向，拥护中央的决议，拥护党的铁的纪律！

中　央

一九二九，一一，一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满洲省委：

据潭秋[1]同志巡视报告及省委历次报告，中央对满洲工作有下述的指示：

（一）满洲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绝对相反的经济系统的接触点。帝国主义为防止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影响在满洲的发展与扩大，都竭力向满洲侵略，将满洲变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又复利用他们在中国政治上的主人翁的优越地位，指挥南京以及满洲的反动统治阶级国民党军阀以暴力收回中东路，实行武装进攻苏联，直接的意义便是打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在满洲的影响（自然这还不是中东路问题的全部意义）。同时在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市场的冲突到了最高度的尖实的现阶段，他们加紧向满洲进攻，他们指挥国民党军阀以暴力收回中东路，在一致进攻苏联的主要意义之下，同时也加强了帝国主义彼此间的矛盾。因此，满洲固然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重要根据地，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互相争逐的场所。如果只看到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矛盾，忽视了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的主要危机，自然是绝大的错误。若只看到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的危机，而认为帝国主义彼此间的矛盾可以因此减轻或缓和，也是不正确的观察。但我们站在无产阶级观点上，站在革

命立场上，决不应在中东路问题上将“进攻苏联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看作两个平列的前途（如你们过去的分析，以及撒翁的意见一样），而是说在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的总的形势之下，帝国主义彼此间的矛盾仍旧继续存在，而且日益加紧。不过目前最严重最危迫的形势，当然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种形势最近更加紧迫，在英日美开来大批军队战舰，南京也已实行动员开兵北上（最近已运去军队至营口）。因此我们目前在政治上主要的中心任务是保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

（二）近年来帝国主义对于满洲的侵略异常猛烈，南满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早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局面。两港两线政策的实施，修筑五路的企图（事实上已在开始实现），土地自由买卖权的攫取，以及各方面的巨大投资、操纵金融、贱价购买原料，南满一切经济命脉完全握在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政治的压迫更是横行无忌，如任意屠杀中国人民，拘捕中国警察，收缴枪械，设置警岗，种种暴行与侵略不一而足。实际上南满早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完全殖民地（并且日本早已将满蒙鲜列入自己的版图，视满洲已如朝鲜一样）。尤其是中东路问题发生后，日本在满洲的势力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南满运输的激增（运费每月较前增收三百万元以上），经济垄断的势力益加扩大，出兵满洲在四万人以上，近更沿南满路建筑炮台、设置兵营，这一方面固然是进攻苏联的积极的军事布置，另一方面即是实行以武装占领满洲。其他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更因国际上各种矛盾的加紧，都集中视线于满洲，并且日本的独占使他们眼红，一方面企图向南满进攻，打破日本的独占，同时极力向北满发展（如美国向各方的投资，商业调查团之赴满，英国之煤油市场，法国攫取吉林全省的电话网等），

以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更指使南京政府在中东路问题上进行攫取自己的利益，如主张归国际调解与由银行团共管等。因此满洲必然更快的一步步的走上殖民地的道路。我们在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上，除在积极方面拥护苏联、反对□□□进攻苏联的宣传外，在反帝运动中不应只着重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忽略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满洲反帝运动，最容易发动而能吸引广大群众的固然是反日，但我们必须在反□□□指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的阴谋，尤须抓住各种实际问题（如英美最近派大批军舰来华，原□江外舰均向长江上游开动，日本在满大增兵，包围奉天、长春，武装操演战术，以及筑炮台设营房等事，美国取得航空权，英国取得海军教练权，法国取得吉林全省电话权等），证明一切帝国主义都是中国工农群众的生死敌人，只有自动放弃在华一切特权的苏联，才是中国工农的好友。因此，我们在反日运动中，必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必须揭破美帝国主义在满洲的阴谋，尤须拥护中国工农的好友、世界反帝国主义大本营的苏联。

（三）满洲经济发展确实非常迅速，但主要的形势，仍逃不出殖民地经济的范围。在帝国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之下，民族资本虽然也附带着呈一时活动的现象（如官僚买办向轻工业及农村的投资），然这只是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控制之下，求得一时的相当的发展，但依然是很困难的，很易受到帝国主义打击而复呈衰落的现象，如北满之油房、火磨事业等，更绝对不能认作他有独立发展的前途。因为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经济势力，比较关内更强大得多，他们决不能允许民族资本在满洲有独立发展，以满洲民族资本力量的微弱，更没有避开帝国主义自图发展的可能。他们至多只能有

两种可能，一是依赖美或英的力量与日本竞争，换句话说，即是企图减轻日本的经济束缚而投到美或英的经济锁链中；一是相当的向农村投资，只能增加帝国主义的原料生产。这两种可能都不是民族经济的独立发展，而是更快的走上殖民地经济的道路。

（四）满洲农村经济虽然表现得非常复杂，但有一个总的趋势，就是资本主义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可是封建势力在农村中仍有极深厚的基础，如地主封建的剥削仍然存在，各县豪绅地主都有强大的武装，这一点是丝毫不可忽视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在策略上很容易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放松了土地革命和铲除封建势力的任务，走到机会主义托洛斯基反对派的错误道路。不过满洲雇农成分之多，农村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之发展亦是显明的事实，然而这并不能说农村封建势力已经没有，土地革命已不需要，恰恰相反，常常有许多富农亦仍是兼有半封建的剥削。因此满洲党对农村革命的策略，应是发展土地革命的斗争，同时亦加紧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以彻底铲除农村的封建统治。党为实行上述的农村革命任务，必须发展农民的农会组织，更必须扩大的发展雇农工会的组织，以树立反对地主及富农的力量。

（五）据潭秋同志报告，你们所拟的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对于满洲民族资本前进的估量未免过高。同时对于整个政治经济的分析，只着重于他的前进，而相当忽略了他现实的形态，即是只着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可能，而忽略了封建势力的深厚基础。虽然你们在主观上不会发生放弃反封建势力的毛病，但客观上可以给一般同志以不好的暗示。这一点，潭秋同志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承认是一大缺点，望你们在省委全会讨论中改正过来。

（六）现在军阀战争较前更普遍的爆发，在中国统治阶级自身当然是互争反革命领导权、抢夺地盘的作用，但帝国主义的作用仍是军阀战争的主要动力。帝国主义在加紧武装进攻苏联的行动中，更积极指挥中国军阀战争进行瓜分中国。在帝国主义这样双刀政策之下，不但国内民众要饱受战祸的痛苦与瓜分的惨祸，满洲民众一样的不能逃避这样的厄运。虽然满洲统治阶级在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局面之下，其内部冲突不易爆发军阀战争，但满洲统治阶级在日本帝国指挥之下，必然要积极参加国内的混战是毫无疑义的。且目前进攻苏联的军事行动已使满洲民众感受到军阀勒索与祸害。满洲党应严重指出进攻苏联与军阀战争的反革命作用及其给与民众的痛苦，鼓动广大群众的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联，尤须将军阀战争与北满军事行动密切的联系到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双刀政策上去，使群众在反军阀战争中更深切的了解保护苏联的必要。反军阀战争的路线必须是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由群众日常的实际生活联系到军阀战争上去。

（七）满洲统治阶级虽然有由地主买办蜕化为资产阶级的企图，虽然在言论上表现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但他始终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不能不执行帝国主义的命令。尤其在现在帝国主义加紧武装进攻苏联、瓜分中国、指挥军阀混战的时候，满洲统治阶级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做进攻苏联的先锋，一方面积极准备参加内战，使得满洲统治阶级自身亦成为全国统治阶级的一环，只有一天一天更走向动摇崩溃的道路。帝国主义的束缚与压迫更加深重，群众生活更加痛苦，必然要逐渐走上革命发展的道路。

（八）满洲民众在帝国主义军阀长期压迫与剥削之下，近年来已自发的爆发了不少的斗争，加之最近对外对内的军事骚

扰、捐税繁苛、钱法屯荒种种条件之下，必然更促起群众斗争的开展。虽然群众自身有不少的缺点与弱点（如组织基础的缺乏，斗争经验之缺少，党的领导力量之微弱等），但客观条件始终不会消灭，只有推动群众斗争更向前开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国民党改组派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在南方群众中虽然在逐渐缩小，但在满洲落后的群众中仍能发生很大的影响，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特别是中东路问题发生后，国民党改组派以至国家主义派都极力用狭义的爱国主义的观点欺骗群众，事实上满洲群众已受了不少的蒙蔽与麻醉，如国民外交协会的积极活动、学生义勇军之组织，都证明改良爱国主义在满洲群众中的影响扩大，成为满洲群众革命最严重的敌人。我们必须在群众斗争中对改良爱国主义施以无情的打击，揭破改良爱国主义的假面具，经常指出国民党卖国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屠杀工农、压迫群众一切革命运动的事实，指出国民党受帝国主义的指使做进攻苏联的先锋，以及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做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工具。同时要指出国民党以至国家主义派反革命的面貌，肃清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一切影响。

（九）满洲党的基础非常薄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极少，对群众斗争，党不能发生丝毫领导作用。这个严重的现象，党必须予以极大的注意。一方面固然是党的主观力量太微弱，同时，因为自限于主观力量的微弱，而不知从政治上去争取群众，去领导群众的斗争，也是极重要的原因。在目前满洲群众斗争继续向前开展的形势之下，党必须抓住每个群众斗争的机会，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虽然在组织上不能领导，但政治领导决不能放弃。政治领导的力量，常时有出乎我们意料以外的伟大效能，这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八一”、“九七”所以不能发动广大群众，正是因为党的政治影响没有深入群众，尤其是没

有将群众的实际生活与斗争很好的联系到这些政治问题上来。所以群众认为这些政治问题，只是共产党的问题，与群众自身不大相干。

（十）群众工作过去在满洲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党必须坚决的采用公开活动的策略路线，进行群众工作，建立群众的组织系统。但我们必须注意公开路线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不然，很容易走上公开主义的合法运动的错误道路。奉天兵工厂与平奉路工作，虽经过多时的努力，但始终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其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作对象只限于几个旧的同志，只机械的做一点支部工作，始终没有打入到群众中去求新的广大群众的发展，尤其是没有注意群众日常斗争的发动与领导。

（十一）党的右倾倾向与和平合法观念，是满洲党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些错误倾向与观念的存在是党的进步的极大障碍，结果只有使党变成群众的尾巴，永久不能领导群众。党必须与这些倾向与观念作坚决的斗争尤其要在群众斗争中去纠正这些错误。机会主义托洛斯基反对派在满洲虽然看不见他们大的组织上活动，但满洲党内还存在有许多右倾倾向，党应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路线上指出他们的错误。确定一般党员的观念，尤应将党的六次大会及二中全会的决议案以及最近党内关于反对派的决议案与论文使一般党员深刻了解，党的正确路线不至为反对派所动摇。

（十二）满洲有许多重要城市，为南方非产业区域省份所少有，但以目前满洲党的力量，势难普遍的注意到。因此，建立最重要区域的中心工作，如奉天的兵工厂、京奉铁路、安奉铁路、哈尔滨的中东路、抚顺的矿工、大连的南满路、造船厂、电气厂等，对于这些中心工作，必须很坚决的毫不动摇的去进行，如过去因为纱厂斗争发生以致放弃兵工厂的工作，是

非常错误的。注意中心工作的原则，正如你们指示哈尔滨的信中所说的，“宁可为中心工作而放松一点其他部分工作，决不可为其他部分工作而放松中心工作”。省委对中心工作除更加紧对于奉天、哈尔滨的工作注意与指导外，必须很快的建立大连、抚顺两地工作。这两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之下，工作的建立与发展自然更加倍的困难，但我们必须设法克服这种困难，注意两地工作人员的选择与工作方法的改善，派遣工作经验较多、方法较多的同志前去建立工作。这两地的工作路线不一定在要迅速发展党，而要能打入群众中去，发展群众的组织与斗争，在群众工作的发展中建立党的坚固的基础。对于长春、辽阳、安东、吉林各地工作亦须尽力建立起来。这些中心地方的工作，必须派得力的省委委员时常去巡视指导，其他已有组织的各地亦须尽可能的派人去巡视，建立经常的密切关系。

省委关于韩国党问题的指示，纠正他们政治上的错误是对的，不过在组织上工作上还嫌不够。关于此点中央上次信中已提及。1. 在组织上，他们满洲总部的组织应当取消，韩国同志个人经过一定的手续加入中国党，完全在中国党指挥之下工作。2. 在满洲的韩国同志不应仅仅注意韩国农民群众的工作，而是应注意满洲各方面的工作；在另一方面中共满洲党部应注意满洲全部工作，不应放弃韩国农民群众工作，不应将韩国农民群众的工作，只看作是韩国同志的工作。自然如情形熟悉工作便利，可以派韩国同志到韩国农民群众中去工作，不过这只是工作人才的分配，而不是工作界限的划分。

省委给哈市一般工作的指示，中央认为是对的，省委应注意督促他们执行，并考查他们执行的结果，随时加以指示。

因为你们政治任务决议案未送来，最近又没有详细工作报

告来中央，故中央不能有更具体的实际的指导。望将上述指示各点，除在日常工作中执行外，并须提出全体省委会中详加讨论。

省委名单及工作分配可照你们的意见批准。不过你们主张君羊[2]同志留奉天的理由在找山东送来的线索以及便于指挥山东同志，这种观念是极不正确的。你们应当用组织的力量推动工作、指挥同志。像你们所举出的理由，是将推动工作与指挥同志建立在个人身上而不是建立在组织上的，望你们改正这种观念。

中　央

十一月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陈潭秋。

〔2〕即丁君羊。

PDG

中央军部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正在一致武力进攻苏联的当儿，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正在为争取进攻苏联和压迫工农革命的领导权而至于继续不断的火并的时候，工农兵的革命斗争形势已逐渐显露出平衡发展趋向，日益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各地城市的罢工运动（如上海工人的日益开展的罢工斗争与示威运动，景德镇的近二十万工人罢工，武汉罢工工人包围公安局以及青岛纱厂工人数月来的苦战，北平数万人力车夫的骚动与巷战等）一天天的发展，我们可以看见农村中农民反豪绅地主的土地斗争一天天的深入，我们可以看见红军游击战争一天天的加强、苏维埃区域一天天的扩大以及兵士群众的兵变一天天的普遍到了全国，这些都是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因此扩大红军与有计划的组织兵变成为我们目前在军事工作上的两大任务，我们必定要加强主观上组织的作用去实现这两大任务，以执行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以汇合各种武装斗争推向直接革命的形势。根据这一总的任务，特订立以下的扩大红军计划大纲。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九年《中央军事通讯》第一期。

（一）扩大红军的策略

1. 扩大红军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认识红军是他们自己的武力，是土地革命的保卫者，而自愿参加红军。特别要以红军的革命行动来扩大红军宣传，使群众更易于认识红军。

2. 扩大农民群众各种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游击战争，汇合各种武装斗争的广大群众生长为红军。

3. 集中一切武装农民群众（赤卫队，游击队一部，少年先锋队等）编为红军。

4. 发动士兵斗争，有计划的组织兵变到红军中来。

5. 发动广大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实行地方暴动以加强并扩大红军的群众基础。

6. 有计划有组织的征调军事政治人员到红军中去。

7. 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特别是支部中的工作与红军中最高级党部的政治指导。

8. 健全红军的质量与扩大红军数量应同时并进——吸收广大的失业工人与在业农民特别是贫农与雇农到红军中来，红军的成分应以失业工人、贫农、雇农为基础，应防止富农取得红军的领导。

9. 加强一切军事工作特别是加强游击区域及其周围的群众工作，与红军发展配合起来，以推动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

10. 要特别注意红军中取消倾向，坚决的反取消主义的斗争，以及一切不正确倾向，尤其是右倾危险。

（二）发展方向

1. 交通要道——水路，铁路沿线与城市。

2. 游击区域的周围，尤其是反革命影响大的地方，即所谓“白色区域”。

3. 敌人统治动摇的地方。

4. 群众斗争发展的地方。

（三）发展的路线与策略

1. 应坚决的执行进攻的策略。

2. 发动广大群众斗争，推向目的地前进（忌脱离群众之东打西征或专门退避的方法）。

3. 应在下列条件成熟时攻击敌人的要害或中坚以扩大政治影响：

A. 估计敌情准确，敌力必为我们击破者；

B. 有广大群众斗争的掩护；

C. 敌人统治动摇或薄弱者；

D. 自己力量集中，战斗精神高涨时。

4. 应与各方游击队与群众斗争取密切联络行动。

5. 应集中部队力量统一指挥。

（四）联络方法

1. 应与地方党部联络，发动群众起来建立赤色群众组织，以帮助并推进此之联络工作。

2. 应与所在省份之党部及其邻近各省省委与各地方党部建立起经常的联系，并与之发生政治上的指导或共同行动的关系。

3. 中央在某些红军部队中设特派联络员，其职权在传达中央之指示与决议，与红军党部及所经过与所在的地方党部共同讨论执行的方法，并汇报红军中执行的程度与发展的情形于中央及所在的省委。

（五）六大红色区域的布置

1. 朱毛[1]红军（闽粤赣）

（1）扩大策略

A. 闽粤赣省委与边界地方党部及红军本身都要扩大红军的宣传，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自愿参加红军，特别是红军要以自己的行动（土地革命）来发动群众宣传群众。

B. 汇合东江、闽西、赣南的各种斗争，发展到广泛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实行地方暴动使之生长红军出来。

C. 集中东江、闽西、赣南的武装农民群众编成红军。

D. 闽粤赣省委及各地方党部加紧士兵工作，发展士兵组织，动摇敌人部队，有计划的组织兵变。红军更须有计划派人到敌人军中去工作，造成兵变潮流，转变到红军中来。

E. 闽粤赣省委特别是中央必须立即调集大批下级军政干部人才送入红军中去，以资补充，并调动一些干部士兵出来以加强其他各地红军。

F. 加强红军中高级党部的指导工作（现时红军中党的政治指导力量尚弱）。

G. 找失业工人及在业农民投入红军，特别要吸收广大贫

农与雇农来充实红军的质量，更要注意改编与收容过来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及分编这些部队到红军各部分中去。

H. 单独指示闽粤赣三省以军事工作的配合，并特别注意游击区内外的群众工作之平衡发展，以推进革命的浪潮。

I. 要特别反对军中对于红军之取消观念、失败倾向、分散政策、地方观念、小组织倾向等等并采取坚决的斗争路线，以强健党之正确的领导。

（2）发展的路线与策略

A. 主要的在韩江上游游击推向东江发展。

B. 与闽西、赣南各游击队及群众工作取联络与声援。

C. 集中三省边界的武装农民编成红军以统一指挥。

D. 有以下的条件可深入东江（兴宁、五华与韩江下游）并向着潮汕推进：

1. 两广战争紧张到高度时；

2. 东江地方暴动普遍的发展；

3. 韩江下游防军薄弱；

4. 自己力量集中；

5. 敌情明确。

E. 万一在闽西游击得手，而一时难以转向东江，亦可深入闽西土地革命，向着闽南发展。如在条件成熟时（条件如上述），可攻下闽南中心城市如漳州等，以扩大政治影响。

（3）联络法

A. 闽西——总交通处设厦门，交通分处设漳州、龙岩、上杭、永定、长汀、武平，以联络赣南与东江。

B. 赣南——总交通处设吉安，交通分处设赣州、雩都、信丰、瑞金、寻乌等县，以联络闽西与东江。

C. 粤东——总交通处设潮汕，交通分处设丰顺、梅县、

大埔、兴宁等县，以联络闽西与赣南。

D. 中央设特派联络员于赣闽粤三省，经三省的交通网而与三省省委及中央发生密切联系（职权见上述）。

E. 交通网之建立法

1. 利用有职业之同志为交通员，以县或乡为段落，用递步方法进行转送（如闽西可利用卖纸或条丝的同志，余类推）。

2. 要特别规定各种携带装置及药水写与洗的方法。

3. 交通处要预备有临时可以更换之地。

4. 交通人最好要用经商小贩及邮差或其他有社会保护色的同志，并须有经常准备的口供。

5. 交通网不能与其他的交通混合，交通者不能知道地方党部，而要成为单独的系统。

2. 湘西、鄂西的红军（湘西贺龙部，鄂西红军）

（一）扩大策略

A. 扩大红军宣传，坚决执行红军任务——土地革命，以号召广大农民群众亦起来认识红军，自动的起来参加红军。

B. 汇合湘西、鄂西各种斗争发展到广泛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执行地方暴动，生长红军出来，特别要注意领导鄂西新一师的变兵、郭汝栋部的兵变以及湘西吴尚部的变兵，转变到红军中来。

C. 集中鄂西、湘西一切武装农民群众编成红军。

D. 加强鄂西、湘西的兵士运动，有计划的派人到敌人军队中工作，发动士兵斗争，加紧士兵组织，动摇敌人部队，发展成为兵变潮流转入到红军来。对于鄂西、湘西土匪神兵更要加强其下层群众工作，使这些武装农民都能转变过来。湘西对周朝武、周文卿等部，更要坚决改变与上层联络的路线而向下层工作。

E. 湘委与鄂委特别是中央要经常的供给他们大批的军事政治的干部人才，红军自己更要有计划的训练干部，如办学校及教导团等。

F. 要特别加强红军党的工作。

G. 找失业的工人与在业的农民，以充实红军的质量。湘要红军更要十二万分注意改编与收容过来的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及分编其部队到红军中各部去。

H. 单独指示湘委及鄂西特委注意一切军事工作的配合及工农群众运动，在游击区域周围求普遍平衡的发展。

I. 要坚决反对躲避政策、失败倾向、取消主义（如鄂西发动群众后不愿成立苏维埃）等右倾错误，同时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残余（在贺龙红军中特重）。

（二）发展的路线与策略

A. 湘西红军应该发动群众斗争向常澧推进，鄂西红军应该发动群众斗争向长江下游推进，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

B. 湘西红军与鄂西红军应该经常的取严密的联系，相互声援以谋发展。对湘西、鄂西一切群众斗争如兵变等，更要密切联系起来。

C. 集中湘西、鄂西一切武装农民群众或变兵群众编成红军。

D. 在条件成熟时，湘西红军可发动群众斗争，攻下常澧以扩大政治影响。

1. 军阀混战反映到湖南更剧烈时；
2. 湘西——常澧一带群众起来；
3. 常澧统治动摇到高度时；
4. 自己力量集中时；
5. 敌情明确可以一鼓而下时。

E. 湘西红军如果在鄂西更便利发展，或武汉更混乱时，可与鄂西红军会同公安、石首等处，向长江下游推进，向汉川、汉阳发展。

（三）联络方法

A. 鄂西与湘西两部红军经过鄂西特委建立经常的交通网，并以之与湖北省和中央发生紧密的关系。

B. 湘西红军要立即与湘委建立经常的交通网，并以之与湘委及中央发生紧密联系。

C. 中央设特别联络员于鄂西与湘西两部红军之间，执行联络员应尽的义务（见上述）。

D. 交通网之设立法同前（见四项与朱毛栏）。

3. 赣西南红军

（一）扩大策略

A. 扩大红军宣传，坚决执行红军任务，号召广大农民群众投入红军中来。

B. 集中赣南、赣西红军武装农民群众（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及半农半匪的武装等）编成红军。

C. 集中原来二三四团红军以一指挥而使发展。

D. 与朱毛红军、彭黄[2]红军分途取联络。

E. 加强政治指导，以健全红军中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

F. 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作用与健全红军中党的组织系统。

G. 要多吸收在业贫农、雇农投入红军中来，对于收编部队必须坚决改编其组织、更换其官长，即革命的军官亦须改派到其他部队以加紧其训练。

H. 须与赣西南党的工作及农民运动相配合。

I. 要特别注意红军中以军代党，以党代群众组织（工农

会）的倾向及盲动的残余予，以坚决反对，同时也要防止取消主义的倾向发展。

（二）发展的路线与策略

A. 向吉安与赣江下游发展。

B. 与朱毛红军及群众斗争取联络行动，相互声援，相互发展。

C. 扩大群众斗争推向目前的前进。

D. 在条件成熟时可攻吉安（条件见上述各节）。

（三）联络方法

A. 交通网——与朱毛红军、彭黄红军、江西省委分别建立起来。

D. 江西省委派一特派联络员负与朱毛联络责，派一特派联络员负与彭黄红军联络责。

C. 方法如上述。

4. 彭黄红军

（一）扩大策略

A. 坚决执行红军任务——土地革命，并扩大红军宣传，号召广大农民加入红军。

B. 扩大工农群众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游击战争以生长红军。

C. 集中边界一切武装农民编成红军。

D. 加派党的干部人员。

E. 加强党的指导，两个边界特委尤须加强。

F. 与赣西、赣北红军游击队联络行动。

G. 江西省委、湖南省委要有一般的群众工作、党的工作之配合。

H. 要调集平浏及边界贫农加入红军，特别注意改编过来

的队伍的政治工作，对其领袖更要加强政治训练，并分配以适当的工作。

I. 湘鄂赣特委要与湘鄂边特委有密切联络，在军事上要有一致的布置。

J. 要坚决反对单纯的军事行动、不武装农民、不扩大红军之取消倾向，同时要反对以军代党的倾向。

（二）发展的路线与策略

A. 向武长株萍铁路沿线发展。

B. 条件成熟时，可集中红军攻下萍乡，与该地工人斗争相汇合。

C. 有可能必要时，可与赣西南红军会同攻吉安。

D. 在平浏向武长铁路发展，条件成熟时可攻击平浏等之主要城市及截断铁路路线。

（三）联络方法

A. 交通网——一设江西之永新与江西红军联络，一设江西宜春或铜鼓、修水与江西联络，一设平浏与湘委联络。

B. 中央派特派联络员二人分负平浏与永新之责任。

C. 方法上述。

5. 赣东北红军

（一）扩大策略

A. 扩大红军宣传，坚决执行红军任务，号召广大农民加入红军。

B. 集合鄱阳一带武装农民编成红军。

C. 靖卫队、敌人军队中的工作之加强，有计划的组织兵变到红军中来。

D. 须加强军事干部人才发去工作。

E. 与赣东北全部工作配合起来。

F. 要坚决继续反对过去的退缩政策（即红军、苏维埃区域均不发展的倾向）及地方主义倾向。

（二）发展的方向与策略

A. 向景德镇湖口及鄱阳湖沿岸发展。

B. 扩大赣东北的红军区域，并坚决执行进攻政策，打破过去保守的错误观念。

C. 与赣北游击队取联络行动。

（三）联络方法

A. 交通网（与江西省委商决）在景德镇、弋、横各设一处。

B. 方法同上。

6. 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红军

（一）扩大策略

A. 同前。

B. 三十一、三十二师、六安游击队及三省边界武装农民集中组织，统一指挥。

C. 鄂东北与皖西的军、政、党的工作人员均须加派。

D. 军队中党的工作须特别加强。

E. 加强三省边界敌人军队中的工作，有计划的发动兵变转入到红军中来。

F. 要加紧调集在业贫农与失业工人投入红军。

G. 三省边界党的工作亦须特别加强。

H. 要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烧杀政策、以军治党、以党管群众特别是躲避主义等等不正确的倾向与行动。

（二）联络方法

A. 交通网（豫——信阳、光山、商城；鄂——麻城、黄陂、孝感；皖——六安、英山等）。

B. 湖北省委应与派特派联络员驻黄安或其他要地。

C. 方法同上述。

（六）各大红色区域的红军指挥系统

1. 坚决纠正过去以党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路线，要以群众的革命组织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来指挥红军，党只是从党的组织上去指挥红军中的党，以党团作用来领导红军。

2. 朱毛红军——应发动群众斗争，帮助其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并准备联合各地工农团体代表及兵士代表会议，成立三省边界工农革命委员会，以为各地苏维埃政权及红军公开的指挥机关。

3. 湘西、鄂西红军——前委应准备成立工农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权，以为红军公开的指挥机关。

4. 赣西南红军——同上。

5. 赣东北——扩大现在的苏维埃政权。

6. 鄂豫皖三省边界党的边界特委发动各地群众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成立革命委员会为公开的指挥机关。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毛泽东。

〔2〕指彭德怀、黄公略。

PDG

中央通告第五十七号

——关于阴历年关斗争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甲、今年年关的客观形势

一、目前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利用中东路进攻苏联的形势日益加紧，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体系的矛盾看来，这种挑衅的进攻更必然日益剧烈，同时就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过程的表演日见显著。

二、军阀战争现在已经大规模的爆发起来，而且战争的形势只有日加混乱，统治阶级愈加走向崩溃的途程，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必然愈形恶化。

三、两年来普遍的灾荒现在不但未曾丝毫减轻，而且今年的秋收就连富庶的江苏年景也非常之坏。特别由于军阀混战的关系，使广大农民群众破产失业，因此米珠薪桂，更影响城市劳动群众无以为生。

四、在这样情形之下，群众必然在斗争中寻找出路，而且现时群众斗争的复兴，不但城市工人斗争日见发展，农村斗争日见扩大，而且士兵群众亦时常整团整旅的哗变，小商人、手工业者之罢市反抗捐税者亦时有闻。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为进攻苏联与进行军阀战争而维持后防之故，对群众更加以残酷的

压迫，解散群众的革命组织，屠杀群众的革命领袖，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均拼命的向群众进攻。

五、这一切形势在今年年关的时候必然更加发展。因此，针对着客观形势，准备党在年关斗争中的工作，是各级党部马上必须开始的任务。

六、年关是中国一般劳苦群众的难关，特别在今年年关统治阶级的重重压迫与剥削之下，广大的劳苦群众更将很难的渡过。在这时群众要求斗争将比任何时候都迫切，群众对资本家、店东、地主之仇恨将比任何时候都剧烈，群众对统治阶级之反抗将比任何时候都要有力量。党在这时亦最容易动员更广大的群众，最便于在群众中树立党的领导。所以发动与领导年关的斗争，必然使党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是党争取广大群众于自己影响之下的一个绝好机会。

七、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在平时的活动，比较容易欺骗一部分落后群众，但在过年的关头，一方面雇主、店东的凶残面孔暴露无遗，一方面群众的要求特别迫切，在这个中间，改良主义在客观上很容易显露了它自己的狐狸尾巴。所以，发动与领导年关的斗争是打破改良主义的重要利器。

八、年关更是党加紧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汇合成为总的斗争，促进革命高潮之重要阶梯。党自“五卅”、“八一”、“九一”，以至十月革命的纪念运动，的确能够动员群众的斗争或示威，年关的斗争便应继续这些斗争向前发展。更因为群众在这时要求的迫切，所以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亦必更加普遍，群众斗争的情绪亦必更加热烈。特别由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以及军阀混战的关系，所以在年关斗争的过程中，亦最容易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因此，加紧准备发动与领导年关的斗争，是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重要关键。

乙、发动年关斗争的策略路线

九、在年关斗争中，必须更正确更灵活的运用公开活动向着群众的策略。年关是广大劳苦群众最怕过一个难关，它所牵连的群众比任何时节都要普遍。必须提出一般的鼓动口号，如：年关不还债、取消高利贷、抑平物价、无利赎当等等外，在各部分群众中必须提出个别的口号。如在工人中，可提出：年关发双薪、年关休息两星期工资照发、年关不得开除任何工人、明年正月起增加工资几成、缩短学徒年限、改良学徒待遇……在农民中，可提出：抗债、反对高利贷、雇农年关发双薪、拿地主豪绅的粮分给农民、大家到豪绅地主家过年等等。在士兵群众中，可提出：年关发双饷、年关休息两星期、改良伙食、改良营房等等。各地党部必须根据当地实际环境而提出更具体化的鼓动口号，在某一口号已经掀动了群众，必须即刻运用工厂委员会与农民委员会的策略与组织方式，以团聚广大群众，以发动斗争，以扩大赤色工会农会的组织。同时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各种斗争到争自由、反国民党的总的斗争。

十、在宣传上，特别在斗争中，必须加紧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一切土地归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口号的联系。

十一、在工人中，党必须利用上面指出的鼓动口号，有计划的有准备的去组织同一产业与同一职业的同盟罢工，以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与决心，以争得斗争的胜利。

十二、在农村中，斗争发动必须立即组织农民赤卫队、游击队等以反抗武装征收捐税、强迫收租收债，并进一步的实行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以扩大到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区域。

十三、在苏维埃区域，必须在年关斗争中，极力帮助四周农民的斗争，并且要在这一时机，号召农民武装起来加入红军，以扩大红军的组织，消灭地主豪绅的武装，扩大苏维埃区域。

丙、年关斗争的准备工作

十四、年关斗争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加紧事先的宣传与鼓动的工作。必须根据群众在年关所感受的痛苦而做种种宣传与鼓动，使群众认识痛苦的由来与出路。要利用各种方式，最好是召集群众会议，以加紧这一工作，只靠文字宣传是极其不够的。

十五、除加紧群众的组织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外，必须更进行特殊的群众组织，如灾民、失业工人等，使他们在年关中发展有组织的行动。学生同志必须尽可能在年假前组织革命的学生到城市或农村群众中参加年关斗争。

十六、各级党部在这一工作的准备中，必须同时严厉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斗争。党内反对派机会主义调和的倾向以及右倾的危险等，只有在加紧日常工作与群众斗争中，只有在党的正确路线得到组织上的巩固时，才能彻底肃清。

十七、年关斗争又与春荒斗争有密切的联系。今年灾荒之加剧，秋收之歉收，军阀混战之继续，使农民在明春耕种时必感到异常迫切的需要。各级党部必须注意领导与发动这一斗争。

十八、各省委接到此通告后，须立即讨论执行的策略与方法，并早日发到下级党部，尤其要注意提出支部讨论大纲，到支部中去讨论，定出适合本支部的鼓动宣传口号和发动斗争的

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到支部去讨论，决没有办法发动群众的斗争。

中　央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

——关于女工农妇运动的工作路线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

党六次大会已经很坚决的指出妇女运动的重要，二中全会更特别指出目前女工农妇运动之迫切，但因过去全党对此项工作之忽视，所以许多地方很少开始工作，有之亦极不充分，不能适应客观之发展与需要。

在轻工业中（纱厂、丝厂、烟厂），因资本严重的进攻，以及生产合理化的结果，大批男工被开除而代之以女工。女工的数量在轻工业全体工人中已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女工的工作也异常加重。这样，女工在职工运动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女工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恶化。因此，在目前工人运动复兴的形势之下，女工的斗争也更加尖锐起来，实际上女工已成为工人斗争的一支主力军。

农妇的工作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中也异常重要。目前农村因军阀混战和苛捐杂税与地主豪绅剥削加重的影响，农村斗争日见扩大而深入，占农村人口半数的农妇工作于是更加重要而迫切。在过去农村斗争中，很显明的表现了农妇的革命作用。而我们更须切实明了，要使农民斗争的情绪坚决，斗争能更扩大，决不可丝毫忽视农妇群众的工作！

目前中国革命已是复兴，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进攻苏联的

工作亦随着加紧。党在加紧争取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总任务下，更加重了“武装保护苏联”、“反对世界大战”、“反对军阀战争”的任务。因此，争取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更为目前迫切的工作，也正是执行这些任务前提之一。中央特严重的唤起全党同志和各级党部对于劳动妇女运动之注意，不坚决的进行争取劳动妇女群众工作，即是表示对于执行党的任务的动摇。

目前对于女工运动的路线和策略，主要的是：

1. 各级党部对职工运动必须以女工工作为中心工作之一。

2. 加强全国各产业区的工作，尤其是上海、天津、武汉、香港、青岛、南通、顺德各地的女工工作。

3. 坚决的有计划的配合女工的特殊迫切的要求，领导女工的日常斗争，而使之形成女工各业各厂的总斗争（如上海目前丝厂女工受关厂和生活加重的痛苦，确有爆发总的斗争的前途，目前上海闸北丝厂女工斗争如很好的领导起来，定可推动全上海丝厂的斗争）。

4. 在斗争中建立党关于女工运动之健全的领导，在女工中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吸引积极的女工当选为赤色工会的委员。

5. 在赤色工会组织之下建立女工部，执行工会对女工的工作、教育、训练，团集女工群众及讨论女工工作方法。

6. 目前女工一般的要求口号是：“反对加重工作”，“反对打骂女工”，“反对关厂吓人”，“反对出进搜身”，“要求男女工资平等”，“男女年关红利平等”，“产前产后休息工资照给”，“女工在厂谈话，梳头，大小便自由”，“月经期内告假自由”，“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这些口号必须与党的政治宣传和工作八小时等要求相连系，以扩大宣传，深入党在女

工群众中的影响。

7. 不断的在日常问题中、一切斗争中，了解女工的弱点，揭破改良主义欺骗的假面具，使落后和动摇的女工群众也朝着斗争坚决前进。尤其在黄色工会中，我们要运用对黄色工会的策略进行女工的工作，成立女工的组织。

8. 女工各种的斗争必须尽可能与男工童工的斗争相连系，不致使女工孤立，而更推动整个斗争。反之，男工童工的斗争起来，亦必须连系到女工斗争的发展，才更加得到胜利的保障，而免敌人分裂政策的成功。在目前尤其要与年关斗争相联系。

9. 在没有我们工会组织的地方，可尽量运用女工夜校、女工读书班、女工俱乐部、女工游艺会、姊妹团等名义，组织团结女工群众。

10. 对于手工业女工工作（如棉织织袜等），我们也要同时注意进行，尤要使其与产业女工工作相联系。

11. 对女工群众自发的斗争，我们要尽可能的用各种方法找路线，建立群众的组织，而加强党的领导，只发生个人关系是十分不够的。

目前对于农妇运动的路线和策略主要的是：

1. 必须在农民斗争中建立农妇的工作，在农民各种的组织之下设立农妇运动委员会，以团聚、教育、训练农妇群众。

2. 农民斗争的要求中，在不与整个农民的利益冲突时，要特别注意提出农妇的特殊要求，而发动农妇参加一切斗争。

3. 在农村中，要分配农妇的工作，引进勇敢积极的农妇参加农民的组织，参加斗争的领导。

4. 在游击战争和苏维埃区域中，要注意组织农妇群众参加农村中一切的工作，在政治上农妇应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军事上农妇可单独组织运输队、卫生队、交通队等。总之，要利用一切的可能发展农妇的能力，提高她们的政治认识，而使之成为斗争的坚决的执行者和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

5. 在必要时，可为农妇特殊利益的要求发动斗争，但必须得着一般农民的同情和赞助，而不与整个农民利益相违背。

6. 农村中的妇女工作必须与手工业妇女的工作相联系，尤要得着城市女工工作的领导。在可能时，可引导城市女工至乡村与农妇来往，以鼓动其斗争情绪与实际上进行女工农妇的联合。

7. 我们在农村中，要特别注意领导农妇参加反基督教、反对虐待妇女、反对虐待童养媳等运动，以逐渐进至破除迷信的运动，以渐渐打破农村中宗法封建的束缚，并应向农民宣传，使农民认识农妇的解放工作是帮助农民斗争、加强斗争力量的工作。

在妇女运动中一个最不正确的观念，即是机械地分工。妇女运动要由女同志担任。这一观念客观上是放弃妇女工作，因为现时妇女干部非常缺乏，若等到大批女干部培养成熟再做妇女运动，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事实上，妇女干部必须由妇女运动中特别由斗争中才能创造出来。党必须利用一切机会与可能去发动妇女运动工作，吸引积极分子入党。在工作过程中，特别注意女干部之引进与培养，有可能时可开办妇女运动训练班。

各地省委接到此通告，必须讨论如何进行劳动妇女的工作。在江苏、直隶、广东、湖北等省委必须成立妇委，指定专

人负责（不限定是女同志）。在有广大劳动妇女群众的地方，亦须建立地方党部的妇委。各地必须注意搜集劳动妇女运动的材料向中央作工作报告，以便划定全国的工作。

中　央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

——为巩固与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

各级党部：

（一）目前的政治形势，日益加重了党之执行“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两大任务，同时群众的斗争日在发展与激烈化，因此，党必需加紧领导与推进群众的各种斗争向前发展，并联系到党的两大任务之具体行动。因此，党在这一形势下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于是加强党的战斗力量遂成为目前非常迫切而又严重的任务。

（二）自二中全会以来，党在组织上是有进步的：上海、津、唐、武汉、广州、哈尔滨、厦门等城市在产业工人中党的组织都有新的发展；产业支部新的建立与发展亦有相当增加，各地产业支部生活有相当的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亦比前进步得多，许多斗争已有党的关系；群众组织亦较前发展，赤色工会会员可统计的有四万余；在游击战争和苏维埃区域，党与群众的组织与关系都渐有进步。这些现象在战斗力上说，当然还是不够的，且同时还有许多弱点存在，特别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还不宽广，支部生活还不健全，赤色工会的组织还不发展，故目前党的主观力量常赶不上客观环境的发展。因此，党在组织上巩固无产阶级基础，向着产业群众中（尤其是重要工业如

铁路、海员、兵工厂、矿山、市政、纺织）扩大党的组织是目前组织上非常中心的任务。

（三）为具体的执行这一任务，中央特决定在广暴纪念周起各地党部都要努力征求党员，尤其在广暴纪念周的前后要加倍努力，务于十二月内全国工人党员要增加三千的数目。在几个产业的区域如上海、天津、唐山、香港、武汉、哈尔滨、奉天、广州、青岛、九江、厦门、郑州、无锡、南通、杭州等城市，地方党部更应有精密的计划来执行这一任务，并应有数量的估计（当然不是机械的只凭主观的理想）。这一发展，更要着重于重要产业工人的群众中的吸收。

农村的党应认定雇农是党在乡村中的无产阶级基础，党的发展应向着雇农、贫农，要特别着重于雇农及手工业工人。富农必须坚决的排斥出党。尤其是在游击区域和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如闽西、广东东江、赣西、赣东北、湘鄂赣边、湘赣边、鄂西、豫南、鄂东北等地，为巩固党在游击区域的领导，扩大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和保证游击战争的正确路线，只有坚决的执行这一任务。

（四）扩大党的组织之主要的路线是要在斗争中发展。只有积极领导群众的各种斗争，才能保证入党的分子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是说，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更易认识谁是积极勇敢分子，谁是有阶级觉悟者，而且也更容易引进到党的队伍里来。但不是说没有斗争就不扩大党的组织了，主要的问题是在防止和平发展的倾向。且在斗争过程中，不只是发展党员，而且要培养群众的领袖人才以加强群众斗争的领导力量。各级党部应勇敢的向产业工人开门，尽量吸收产业工人群众入党。只要是积极勇敢有阶级觉悟的分子，便应该介绍入党，这就是选择质量的主要目标。现在党的组织是要在质的基础上求数的发

展，所以要防止以为革命群众便是党员之拉夫式的办法。但同时亦反对选择党员的条件太苛，在斗争中不注意介绍党员或以为要在斗争结束后再说，或恐惧因发展而增加党的危险性等等懦弱动摇害怕的观念，都是不对的，都必然要停顿在旧的基础上而走入取消党的道路。

（五）为要具体的实现这一巨大任务，必需动员全党群众来努力执行这一工作，首先就要有计划的集中力量推动支部工作。所以，地方党部的计划应提到支部中并联系到当地实际情形去具体讨论，规定支部周围群众的对象和工厂的重要部门中去发展（在农村中便是白色区域和大的乡村与镇市），必需分配每个同志以具体的工作（如谈话、介绍等）。新介绍的同志必须填表经支部通过，并给以入党的训练如谈话会、训练班等。这样才能推动支部工作，才能使每个党员深刻认识扩大党的力量——介绍同志是自己的主要日常工作之一。

（六）扩大党的组织与发展和建立赤色工会和雇农工会，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赤色工会的基础仍然非常薄弱，而雇农工会更少，所以党应利用各种方式去组织群众，特别是建立赤色工会。如能将斗争的群众团结在他的阶级组织周围，经过这一路线必更容易选择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分子。所以，扩大党的组织必需加紧发展产业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这一工作必要同时并进。

（七）党在过去的确乏缺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宣传与介绍，同时党的政纲中之土地革命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的宣传亦非常的不充分。现在应立刻矫正这一缺点，中央特别唤起各级党的严重注意。首先，中央宣传部应有计划开始编印各种专门通俗简

单明了的小册子（同时各地自己一样的要编印）供给各地宣传材料。全国各种刊物由党内以至党所领导与影响的必须每期都有这样的稿件。在支部会议上亦应常有关于理论上之简短的报告和讨论。各级党部宣传部更应有切实的计划开始工作。在群众各种组织中要利用一切的可能扩大这一宣传，在工农会、学生会中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班等等，以发动群众提出讨论，以引起群众对于主义的认识，我们所领导与影响的学校应首先执行。这些工作在目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八）在扩大了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过程中，应更加紧党内有系统的教育训练工作，特别是造就工人的干部。同时，要使新的入党同志经过训练增加其对党的了解。现在工人成分的干部（特别是职工运动工作人才）的乏缺，这对于训练干部的需要更有莫大意义。所以，各级党部（尤其是上海、香港、顺直、满洲、福建、江西等地）应有计划的开办训练班，尤其在地方党部应有短期的流动的训练班，甚至是谈话的方式都可以采取。加入训练班的成分最好是支部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是支部书记与干事等的训练更为必要。省委的训练班应从地方党部选择人才出来，新介绍的同志在第一二周内必须根据各区域编入新党员训练班，每星期有一二次专门会议谈话。中央组织部要尽量供给教育的材料与过去的经验。各地方党部更要使这些教育训练的材料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且训练班只是训练干部的一种方式，所以在支部中对于党的策略路线的讨论及当地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的认识，应该是有互相联系而成为训练干部之最经常的工作。

（九）各级党部接到此通告后应即讨论，根据当地情形定出执行的具体计划，同时切实指导与督促下级党部的工作，和时常检阅自己的工作是否充分执行，并将经过情形详细的迅速

的报告中央以便指导。在十二月底应有一总报告，来检阅全国的进步。

中　央

一九二九，十二，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六十号

——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策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

一、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目前了

自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以暴力抢夺中东路以后，苏联极力以和平政策来避免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民党却着着进攻，着着挑衅。最近几日形势的发展，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危险，而且已经迫在目前了。在帝国主义方面，日本积极备战，且已经进兵北满；英美法意等的海军与陆战队纷集上海，尤其是英美法意等伦敦会议正式提起警告，便是哀的美敦书的第一步。日本不参加共同警告，只是企图在进攻苏联之下争取满洲的独占，他指使张学良单独进行交涉，一方面是表示他要在武装交涉之下来屈服苏联，一方面是利用这一交涉的延宕，以加紧其军事上外交上的进攻布置。在中国军阀方面，蒋阎[1]表面的妥协便是以"共同对俄"为第一条件。现在有人进行蒋汪[2]合作的酝酿，也是以"共同对俄"为基点。张学良的积极招兵，白俄军队的组织，谢米诺夫的特别活动，这些事实都是进攻苏联的大

战就要爆发的朕兆。取消主义者宣传什么“中俄战争爆发，于中俄两国都不利，只要苏联不采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必互相冲突”。这简直是极力替资产阶级效力，模糊群众的认识，松懈群众武装拥护苏联的决心，党应当坚决的在群众中指斥这样的观点。

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发

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决不是历史上的“国与国间的战争”，而是人类历史上所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一方面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统率着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着殖民地的劳苦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周围。所以这战争的胜负，不只是决定于苏联的武装力量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的对比，而决定于双方阶级战斗力量的对比。取消主义者宣传“假如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苏联很难胜利”，这不只是在根本的认识上，不了解这一战争是两个根本阶级力量的对比，而误认是苏联国家力量与帝国主义力量的对比，并极明显的是故意替帝国主义宣传，来降低广大群众武装保护苏联的勇气。只要将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拿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比较一下，便可断定进攻苏联战争的爆发必然要引起全世界的大革命，把帝国主义的统治葬送到坟墓中去。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现在已有占全世界面积六分之一的无产阶级政权的苏联，有强固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武装的组织，而且在全世界

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的劳苦群众中有极大的政治影响。

第二，无产阶级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戕杀——死伤一千八百万人，这样极伟大的政治巨变，更坚决了他们反战争的决心，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极难欺骗他们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没有的，且现在无产阶级的组织的力量也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若干倍以上。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全世界的殖民地都在睡梦沉沉中，所以西方工人阶级的革命得不到殖民地的援助陷于孤立而失败。现在所有殖民地国家都经过了大革命，广大劳苦群众，都有反帝国主义的觉醒，而且有了强大的革命的组织，必然可以随着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同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

第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无产阶级的政党——第二国际完全为机会主义所领导，虽然有列宁，李卜克纳西等左派的组织，但是异常弱小，所以大战爆发，各国社会民主党都投降了资产阶级，而使世界革命不能及时的爆发。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已在各国普遍建立而日渐强固起来，尤其是列宁所创立的共产国际更成为全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坚。现时共产国际中，虽随着大战危机增长而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一年来在任何一国的支部中，都已经受了列宁主义的严重打击，帮助资产阶级破坏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企图，已经失败。我们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因社会民主党的叛变得以继续屠杀了四年之久，便可以了解现在各国共产党能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便是将来领导世界革命，消灭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之最后胜利的有力的保证。

从上面这些优越的条件，可以断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必然要引起全世界革命的大爆发，而且要消灭全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现在全世界革命浪潮正在发展的时期，那

么，进攻苏联战争开始后，革命高潮的爆发，必然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来得更快。或者有人会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相互的战争，而此次大战是资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的战争，是不便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他不知道一方面帝国主义在进攻苏联的当中，同时因瓜分苏联与抢夺殖民地更加深了他们相互的矛盾，而极难步调整齐；另一方面正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相互的战争，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欺骗易于发生作用，而此次大战是帝国主义进攻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战争，那么拥护苏联的口号反易于动员广大群众，这正是更便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

三、中国国民党各派军阀在进攻苏联的旗帜之下依然要加紧内战的发展

国民党军阀，在相互战争中，最主要的口号互以“对俄不力”为讨伐罪名，以“共同对俄”为妥协的第一条。国民党军阀不仅对于进攻苏联是一致的，而且更因为要积极进攻苏联，乃更加紧攫取中央政权以实行武装进攻苏联，这当然是反映帝国主义的矛盾，特别是争取进攻苏联的指挥权。所以国内军阀战争继续爆发，决不因此而减少对于苏联的进攻，反而是加紧进攻苏联的危机。同时，中国军阀战争在一致进攻苏联之下，也决不会减少或停止，反而在进攻苏联的旗帜之下，更要各自增兵，抢夺地盘财政，特别借“反俄不力”以争夺南京反动政权。因此，军阀战争更要扩大的爆发起来，目前军阀战争已处在这种形势之下，反蒋军阀已在全国各地爆发战争（如两广战事及石友三兵变等）。因此，将来反蒋军阀与改组派或取得胜利，进攻苏联危机必更要加紧，同时国内军阀战争亦同样要更

加扩大的发展。

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正在复兴，又处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第一道火线，受着世界革命的推动，无疑的要更快的爆发革命高潮。并且中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集中的地方而且是最尖锐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同时国内军阀战争又在不断的爆发，更加深了中国统治阶级的动摇与削弱，更加紧了他之走向崩溃的过程。只要我们有正确策略的领导，革命怒潮的爆发比其他地方有更快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到群众中去，指出进攻苏联战争与军阀战争发展的前途，指摘取消主义的欺骗，而坚定并提高广大群众武装保护苏联的勇气与决心！

四、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战争与军阀战争的总路线

在中央第四十九号通告中已经指出进攻苏联战争必不可免的爆发，军阀战争更因进攻苏联而加紧，党的任务是要积极宣传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而且要积极准备武装保护苏联的工作。现在的形势，进攻苏联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所以武装保护苏联已经不单是宣传时期，而且要进到动员群众马上就要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期。在总的方面，他与党之争取群众反对军阀战争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已成为不可分离的路线，而且更加重了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各级党部必须立即坚决执行下面指出的要在各方面运用这一路线的策略：

五、在城市和工人运动的策略

现在全国主要城市和中心产业区域，工人斗争都表现着正

在向前发展，罢工运动甚至武装冲突到处爆发。所以党在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开始的策略应该是：第一，立即有计划的，有准备的去组织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的同盟罢工，以领导工人斗争更激烈的向前发展，而走上同一区域的总同盟罢工。组织同盟罢工的主要方法：（一）必须立即提出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的工人共同要求——群众异常迫切的要求，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鼓动，如号召工厂会议、代表会议来通过这些要求。（二）要立即组织同一产业或职业工人的代表会议（这些代表必须经过群众会议的选举），以成为现在群众斗争与同盟罢工的领导机关。（三）必须立即扩大每一工厂中的赤色工会支部的组织，并极力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必须树立了这样的组织，才能发动并领导广大群众。（四）须特别加紧发动工人的日常斗争，要加紧反军阀战争的斗争，并使各个工厂的各部分的斗争互相联系起来，以提高群众团结的力量与斗争的勇气。总之组织同盟罢工主要的策略，是在深入群众中去，推进广大群众起来，而不可走到过去命令罢工的方式。第二，要特别加紧在铁路、海员、兵工厂中的工作，这些工人在反军阀战争，武装保护苏联中有极伟大的作用。各级党部必须把这一工作看做最中心的工作。第三，必须加紧在工人中宣传武装暴动的思想与工人武装的需要，必须加紧组织工人纠察队，在斗争中扩大工人纠察队，加紧秘密的武装训练，并须尽可能的准备武装。第四，黄色工会是统治阶级在工人群众中散布爱国主义的欺骗宣传之最有力的工具，必须坚决的揭破一切改良的欺骗，特别是改组派的欺骗，肃清一切黄色领袖在群众中信用的残余，以至把黄色工会完全推翻，而团结全部群众到赤色工会之下。第五，在群众斗争已经相当的起来，便应组织群众的示威运动，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以提高群众政治斗争的勇气。第六，在城市中必

须从现在起积极准备群众的破坏与骚动的工作，同时要向群众指出改组派反蒋的非群众的军事骚动完全是他们互争反动政权的政变，决不同于我们所主张的群众的反抗整个统治阶级的骚动与暴动。这些工作的发展与汇合，便是走向总同盟罢工与武装暴动的前途。所以这样的策略就是组织总同盟罢工与武装暴动的第一步。

六、在农民运动中的策略

在农民运动中，第一，应当坚决的采用各种的方式发动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发动到地方暴动；第二，应特别加紧城市四郊与沿铁道河流交通路线附近的农民斗争；第三，必须坚决领导各种日常的斗争，深入到土地的斗争；第四，必须发动乡村中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以联系到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的执行；第五，富农领导已经成为各地阻碍斗争之极严重的危险，必须坚决执行反富农的斗争，肃清富农在斗争中的影响，把富农从农民组织中，特别是党的组织中与苏维埃政权内驱逐出去。必须这样才能深入土地革命，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第六，在苏维埃区域应当采用各种方法，鼓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到附近区域特别是所谓白色区域去宣传，发动他们的斗争，特别是需要鼓动农民群众加入红军，打破农民的保守观念向外游击以扩大苏维埃区域。发展方向，应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路线。总之，在农村中必须坚决的有计划的立即发动广大群众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渐次联系起来，以与城市的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相配合。

七、兵士运动的策略

兵士运动，在武装保护苏联的总路线之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过去各地对于这一工作多未充分注意，尤其是没有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去向士兵作宣传鼓动的工作，是严重的缺陷。因此，目前策略：第一，须立即动员全体同志以至赤色工会、农会的群众向所在地的兵士群众来参加这一工作。第二，对兵士宣传鼓动的中心口号应该是："不打自己的工农弟兄"，"不打苏维埃和中国红军"，"与红军联合起来"，"与工农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的政权反对军阀战争"……等。第三，在军队中的支部必须立即有计划的有准备的去组织兵变，尤其在军阀战争已经爆发的地方与进攻苏联红军的前线，更要立即进行这一计划。当然在组织兵变的策略，要利用一切兵士群众的迫切要求，来鼓动广大兵士群众。但是必须特别加紧中心口号的宣传，尤其是反动战争对于士兵群众的残酷牺牲。在实行兵变的时候，必须举起鲜明的旗帜，如反对军阀战争、反对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等。在现在军阀日益崩溃的时期，广大士兵群众在生活上，在政治上都迫切的要求解放，无疑的广大士兵群众要成为将要到来的革命巨潮中的主要潮流之一。只要我们能够坚决的执行上面指出的策略，必然可以领导这一潮流更快的激荡起来。

八、红军的策略

各地红军在武装保护苏联的路线之下，负有极重大的任务，执行这一路线的策略：第一，须极力扩大与集中红军的组

织与战斗力量，尽可能的鼓动广大农民起来加入红军，集中农民的武装群众，编成正式的红军。尤其是在军阀战争的区域，更要加紧这一策略的进行，以影响敌人的军队，以夺取敌人的士兵群众。这一策略的执行，当然不是采用招兵买马的方法，而是要极力到群众中去作广大的鼓动，发动群众的斗争，激起他们武装斗争的热情加入红军。第二，各省委对本省红军必须有集中组织与互相联系发展的计划，每部红军必须在总的计划之下活动。第三，红军发展须实行大规模的游击，过去避免夺取主要城市之策略，也须改变。只要有胜利的可能有群众可发动的，便须向主要的城市进攻，以至占领这些城市，就是占据极短的时期，也是有极伟大的政治影响。红军执行这样的策略，以与全国工农兵的斗争汇合起来，便可促进革命的巨潮。

九、更加强革命的主观力量

在目前这样紧张的客观形势下，主观力量的加强乃更加重要。第一，党的组织要更向着产业工人开门，要有计划的依照中央通告所指示的进行发展工人党员，在农村中要坚决的驱逐富农出党，向着雇农贫农发展，以树立党的强健的无产阶级基础。支部生活要打破关门的狭隘的工作方法，要深入群众中去活动，使每一支部都真能成为群众中的核心，成为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斗争，以至组织同盟罢工，领导政治示威，发展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之群众的枢纽。地方党部的工作要更集中在许多中心城市，沿交通路线的农村，以至红色游击区域，去加紧实现党之武装保护苏联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各省省委在工作的布置上更要集中到目前的主要任务，联系和领导

一切群众斗争的发展向着武装斗争的汇合道路上去。尤其是工人干部的进行，群众领袖人才之培养，党更要特别注意于强健与稳固党与群众的领导力量。第二，党与群众的关系，必须更加紧的运用争取公开活动的路线，以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活动范围。党在群众运动上必须切实了解群众生活，抓住群众斗争的情绪与要求，明白他可能发展的前途，尽其发动与领导的责任，而根本肃清群众斗争中党之尾巴主义的现象。同时党对于各种群众斗争之发动，必须有同一产业，同一职业，一农村一军队之共同斗争纲领的宣传以推动斗争之扩大。如此党的政治口号与政纲才能更与这些联系起来，才能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第三，群众中的赤色组织，更要加速的在各厂各业各农村的群众中进行他的建立与发展。各级党部更要将建立赤色工会的与农会的组织看作是党之目前最严重的任务。工厂作坊委员会、农民委员会的组织也要在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中尽量的扩大运用，以团聚更广大的群众，以树立赤色组织的基础，并练习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只有在这些革命斗争主观力量更加强健之后，群众斗争的发展才能在强健的领导之下更便利更快的走上革命高潮。

十、宣传工作的注意点

在现在进攻苏联战争日益紧迫的时机，国民党、资产阶级极力散布爱国主义的欺骗宣传，这是我们动员广大群众武装保护苏联的最严重的敌人，必须尽一切可能，到群众中去，揭破他们的欺骗。主要的方法是指出他们与帝国主义勾结进攻苏联的阴谋，指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同时就是瓜分中国，指出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是中国工农革命的最好的同盟军，并将苏

联工农群众实际生活状况作广大的宣传。尤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改组派、第三党与取消派，他们用极巧妙的方法来欺骗广大群众，实际上完全是国民党的同盟者，应该毫不放松的，针对着他们的宣传来揭破他们的欺骗。这是宣传上要特别注意的第一点。第二，在进攻苏联的时期，军阀战争仍然不会停止，我们必须利用军阀战争予广大群众的痛苦，鼓动广大群众起来直接反对军阀战争与武装拥护苏联的鼓动联系起来。第三，我们的宣传固然要特别注意工农兵群众中的工作，但是对城市贫民与学生群众也不应该放松，因为争取他们到武装保护苏联口号的周围，才能更加扩大我们斗争的力量，而且他们是极有可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

十一、坚决反对取消派

取消派已经从党内反对派走上了阶级的敌人。他们不只是已经到群众中去散播一切欺骗的宣传，而且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方法来破坏党的组织，来阻挠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如果不肃清取消主义的思想和小组织，必然要使党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工作受着莫大的阻碍。如果发现了固执取消主义的路线和破坏党的行动的同志，必须毫不犹疑的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党。现在调和派的思想也在党内发生，这是与取消主义同样的右倾的路线，同样的妨害党执行正确路线的思想，也应同样的把这样的思想肃清，才能更便利的肃清取消主义的思想。在动员全党同志武装保护苏联的时期，必须更坚决的与取消派调和派的思想斗争。

十二、执行这一通告的注意点

（1）这一通告是与第四十九号通告一贯的路线，不过这次通告是更进一步的策略，各地讨论的时候须参考中央第四十九号通告。（2）各地接到此通告后，必须立即根据通告中的路线与策略，定出立即执行的具体的工作计划与布置，并立刻报告中央。（3）这一通告的总路线必须到每个支部去讨论，只有这样才能把全体同志动员起来。（4）本通告仅指出各方面策略的原则，更具体的策略和运用的方法，中央将继续发出各种专门的通告或公开的信（如组织、工运、农运、军事等），发到各级党部去讨论执行。

中　央

一九二九，一二，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阎锡山。

〔2〕指汪精卫。

PDG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红军第四军前委：

不久以前，中央根据目前全国军阀混战的形势与两广战争的爆发，曾给你们以有条件的向东江发展的指示，即是两广战争相持不下或广东失利的时候，你们可以在韩江上游发展，之后采取逐渐深入东江发动农民群众深入土地革命，造成广大游击区域的策略。目前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加紧进攻苏联和军阀混战已发展到更形混乱的局面，以及两广战争曾已转变到更大的发展，从此证明中央前此之指示是很正确的。同时党在目前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已不仅限于宣传准备的范围内了，而是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当然我们更须特别指出，在执行这一任务时，主要的是发动广大群众斗争以造成执行这一任务的雄厚基础。（最近接到你们给广东省委的信，知道你们不久以前曾在上杭打了一硬仗，得了许多补充，扩大了政治影响，但兵力的损失也大。嗣后又接到东委的来信，述及你们在梅县七次冲锋，损失甚大。此外还接到东委的计划，决定你们攻取梅县后，第一步取得西北七县，直下韩江下游略取潮

汕；第二步分兵两路以下惠城；第三步发动全省的军事运动而取得广州，以造成广东的割据。以上所述除了上杭战争是很有意义外，其余都是不大正确的，因为这样是离开了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向前推进的策略，而形成了无条件的攻坚折锐的军事行动了。这样仍然是没有正确的应用中央目前的指示。）因此，中央认为对于你们扩大与发展的策略和计划，必须依据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再给你们以详细的书面指示：

（一）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

一、现时政治形势上最严重而紧迫的危机，就是国民党各派军阀都一致行动起来，站在国际帝国主义共同进攻苏联的政策下，实现武装进攻苏联，借以争得帝国主义宠爱以便于争夺南京政府的进行。帝国主义者为了生产力的恢复与增加，整个的超过了大战以前的水平线，因之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争夺市场、争夺原料地、争夺投资地的矛盾，已进度到不能要求重新分配世界爆发大战的非常剧烈之危机。同时因为生产合理化，更加紧的剥削工人阶级，更排出了大批工人以致失业，更使工人阶级生活日加恶化，因之广大的工人群众无[1]中那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都热烈的左倾起来而走上革命。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为要相互战争，为要扩大自己的市场，为要榨取殖民地的膏血来调剂自己的国家，因之更野蛮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更残酷的压迫殖民地的工农，使殖民地的革命更加走上广泛而深入的发展。特别是苏联经济更加巩固与发展，使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一万万五千万的人口完全建立在社会主义巩固的经济基础之上，这里不但根本上动摇了国际帝国主义经济基础之发展，使全世界划分出两个对垒的经济集团，威迫得帝国主义

不能不发起抖来，而且使西方的工人阶级与东方的劳苦群众更进一步的来认识自己的祖国，更进一步的来认识世界革命大本营领导作用的伟大，以加重其走向革命的勇气与决心。这就是帝国主义无法解决的剧烈矛盾，这就是国际革命形势的开展，这就是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可是正因为帝国主义的矛盾愈加剧烈，国际形势的危机愈加紧张，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大战愈加迫切，所以帝国主义共同一致进攻苏联的战争就愈快爆发，而成为帝国主义共同一致借以解决市场问题、和缓内部矛盾、消没世界革命独一无二的出路！近来英法帝国主义在中欧如波兰等小国组织了百万以上的军队准备进攻苏联，在立陶宛与波兰的冲突上曾经数次爆发进攻苏联的战争。在阿富汗，一个比较接近苏联的政府，也被帝国主义打下去了。日本在满蒙日肆侵略，无日不在布置军事，自然除了压迫中国外，还在急切准备进攻苏联。最近如英相麦克唐纳尔之赴美，主要的是解决共同一致进攻苏联的问题。德国赔款会议、莱茵撤兵问题以及杨格计划等主要方面，就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要把德国拉到反苏联的战线上来。这些问题中间，当然他们还有不少的矛盾而且同样的加剧，但主要意义还是帝国主义一致进行进攻苏联的阴谋之显著铁证。

中东路的事变，就是国民党站在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之一贯的策略下爆发的。

帝国主义在挣夺中国的矛盾上同样的是加紧的，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无疑的是无法停止的，中国工农革命很显明的是继续发展而正在复兴的，中国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无论在中国革命观点上或世界革命观点上，都认识了苏联不仅是革命的朋友而且是革命的领导。自然帝国主义在中国矛盾之愈加剧烈，国民党军阀混战之愈加混战，工农革命之愈加开展，这些无法解

决的矛盾，就成熟了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爆发中东路事变的根源。

中东路问题到现在还是表现得很严重很危迫。美国已公开号召英法意各帝国主义取共同干涉的行动，英法意各帝国主义者已一致响应起来，他们在非战公约的欺骗口号之下，隐藏着进攻苏联无限的战焰。日本更忙于调遣增兵北满，毫无顾忌的进行其单独对俄压迫，无论在武装交涉上或军事行动上，都企图独占满蒙和进攻苏联的优先利益。当然在进攻苏联的分赃问题上，在瓜分中国的利益上，帝国主义是仍然继续着矛盾之加剧与发展，特别是日美帝国主义在争夺中东路问题上矛盾是加重的（美国主张国际共管，日本主张独占），但在进攻苏联这一点上，就毫无疑的不会因为矛盾之加重而减弱了他们进攻苏联的一致。国民党的军阀们更无疑的要不约而同的都在进攻苏联的策略下，努力的来向帝国主义争功，努力的来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地盘，努力的来筹“讨赤”军费、发“讨赤”债券以实现囊刮民脂的企图，并且即在军阀混战进行中，彼此都会攻击对方军阀以“攻俄不力”，以向帝国主义献媚，以争夺南京政府的反动领导权。

现时张学良政府虽在日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与苏联进行谈判，从这绝不是加强进攻苏联而是想从外交上取得日本在满州独占的利益，以抵制其他帝国主义□□□□□□□□□□态度，不管是立即开火，还是经过一时期的外交甚至恢复□□□□□□□□□□□□□□□□□，各派军阀绝不会放弃与改变其进攻苏联之根本政策的。

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的前途，无疑的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同样的国民党各派军阀一致进攻苏联的前途，无疑的要揭开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序幕。进攻苏联的战争即是世界大战的

爆发，这一战争的对垒，不是简单的苏联国家与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之决战，而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决战，战争的波涛必然把全世界人类划分为两个集团。战争所给人类的痛苦，前方后方的恐慌，更必然使全世界广大无比的被压迫阶级与民族更认识帝国主义的罪恶，共同一致起来替帝国主义掘坟墓。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阶级之左倾，半殖民地殖民地如中国、印度、拉丁美洲、高丽等革命运动之开展，以及比任一帝国主义拥有绝大多数群众的苏联，无疑要成为保障革命胜利前途的主干。自然这一决战的危机，将会成为世界人类非常的进化或惊人的倒退的关头！苏联如果失败了，世界被压迫的人类无疑的要堕入黑暗的深渊，全世界将要倒退几十年，所以苏联的失败无疑的是全世界被压迫的人类失败！反之，苏联的胜利也无疑是全世界被压迫的工农胜利，全世界将可以跳过几十年的进化程途。在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前途上，同样会掀起中国革命的高潮，帝国主义无疑的在进一步的进攻苏联上，就是进一步的在分中国之实现。国民党各派军阀更无疑的越加紧进攻苏联，就越加紧压迫中国革命民众，军饷的剥削将更会无微不至，军事危机将更会普遍全国，无疑的要使统治阶级更动摇削弱起来，要使广大工农群众更快的跑上革命道路上去，要使中间阶层也由整个社会的动摇转入革命漩涡或反革命战线上去，这无疑就要走上中国革命的顶点。

二、国民党军阀混战仍然不会因为进攻苏联的一致而停止的。虽然帝国主义列强与国民党各派军阀也曾企图在一致进攻苏联的口号下，来减弱或和缓对方的反对与冲突，来发展自己方面的力量，可是正因为这样，更愈加深了军阀战争的危机，且因为军阀制度的存在与产生军阀战争根本矛盾之发展，更不会因进攻苏联而可以根本消灭或停止的。军阀战争是帝国主义

争夺中国、阶级内部冲突、军阀制度三大矛盾所构成的（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欲消灭战争，只有毁灭这三大原因。国民党一致进攻苏联不但不会毁灭这三大原因，而且正要加深这三大矛盾。事实上告诉我们，蒋介石及国民党一切军阀在一致进攻苏联之下，必然要向帝国主义面前争功，必然要在进攻苏联口号下要求扩大自己的地盘，必然要各为各自接近的帝国主义争取南京政府的领导权，争取进攻苏联所得的优先利益。蒋介石受美帝国主义的领导，要扩大自己的统治，所以在进攻苏联政策下仍然可以爆发对冯的战争；另一方面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迫，所以在进攻苏联政策下，仍然可让张学良占进攻苏联的优先地位。汪精卫、李宗仁等一样的可以向英帝国主义下做进攻苏联的工作，同时乃得进行其争夺两广地盘以至南京政府的战争。蒋介石也一样的在被进攻苏联的号召下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帮助而调兵遣将去对付两广。其他如张学良可以在日本领导下进攻苏联而又扩大自己的力量，准备卷土重来再入关内的战争；唐生智、石友三以及阎锡山、西北军等一样的可以在日本领导下进攻苏联而又进行其争夺南京政府的内战工作。这自然不是说，他们会因为内战而减弱进攻苏联的一致，正相反的，他们将会因为内战之加紧，更只有从进攻苏联战争上取得帝国主义的帮助，从进攻苏联战争上散布其爱国主义之欺骗宣传来掩蔽自己的罪恶，从进攻苏联战争上来争取反革命的领导，来表示自己进攻苏联的坚决与英勇，来相互指责其他军阀进攻苏联不力的罪状。无疑的以后的军阀混战，不管是蒋的胜利或反蒋军阀胜利，都必然要为争取进攻苏联与压迫革命的领导以献媚帝国主义而进入更混乱的发展。

目前军阀战争的发展，无疑的在上述这一形式下更混乱起来。蒋介石自从迎合帝国主义的意旨抬出进攻苏联的旗帜，企

图领导一切军阀"对俄"而减弱各方军阀对自己的反对以来，事实上这一聪明如意的算盘是未能完全打通的。当然在进攻苏联这一点上，是得到了任何一帝国主义的嘉奖。然而蒋介石在特别表示向美献媚，而从进攻苏联口号下进行其向北方扩大统治之策略，这就根本要与日本势力有矛盾的，所以冯玉祥当时就在日本领导下实行向河南进攻，这一战争虽然因为反蒋各军阀派别本身的矛盾与日英帝国主义因蒋介石一再让步在当时尚未坚决一致倒蒋，使蒋介石仿佛在军事上还得到形式上的胜利，然而实际上胜利是归于日本领导下的其他军阀如阎锡山、唐生智等去了。另一方面在英帝国主义领导的桂系与改组派——汪精卫、李宗仁等更以"蒋介石进攻苏俄不力"的罪名，进行争夺两广以及南京政府的战争，使蒋介石在北方不能不接受阎锡山的武装调停与冯玉祥暂时停战而来抽暇对付两广，同时蒋介石也正因为这不能不更向日本让步，给张学良在日本指导下单独进行与苏联开始其武装交涉而占得进攻苏联的优先利益（这自然帝国主义丝毫没有放松了进攻）；而且正是蒋介石手忙足乱的时期，唐生智、石友三等又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开始向武汉与南京进攻了。这些反蒋的军阀们无一不是首先指责蒋介石进攻苏联不力，而要为帝国主义者来争取南京政府、争取压迫革命和进攻苏联的领导。这自然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统治力量更加动摇削弱起来而走向更大的崩溃，这自然使原来在蒋介石笼罩下的各派杂色军阀更会先后分崩离析起来，这自然使全国更趋向混乱，这自然更证明蒋介石无力来收拾这一日加破烂的残局。另一方面，反蒋的各派军阀们，[2]而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也正不亚于与□蒋的冲突；因此[3]不但任何一派军阀，都没有能力在打倒蒋介石后可以造成像蒋介石从前所制造的欺骗和平的混

合政府，而且他们任何一派都各有各的太上皇——帝国主义者（更要利用这时期来加深掠夺中国），都各有各的军阀系统，都各有各的阶级矛盾之反映。正因如此，所以在各派军阀反蒋混战中，蒋还未被打倒，他们已先自大干起来，[4]之战，阎汪的不能合作，遂都给蒋介石以[5]即使蒋倒了，各派反蒋军阀间的矛盾马上紧张了起来，将来改组派与桂系的战争、阎冯的战争、阎冯张的战争以及唐生智争夺两湖地盘的等等色色的军阀战争，毫无疑的要爆发起来，同时蒋介石在现在还会死抓着南京政府以取得卖国外交来挣扎残局，因之蒋之倒否最后还是决之于帝国主义。假使蒋介石不倒全国混乱的局面依然要继续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全国的混战与割据，无论蒋胜与反蒋军阀胜利，都只有日日加甚。蒋已倒否，并不成为军阀混战与否的中心问题。消灭这一局面，只有革命高潮的到来。

两广的战争形势，在开始时无疑的一切反蒋势力，无论是汪陈改组派的张发奎军、旧桂系李宗仁的吕焕炎军以及新桂系投降过来的杨腾辉、李明瑞军都一致在□□□英帝国主义指导下爆发反蒋的战争，他们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与反蒋的共同点上，是已联盟起来进行夺取两广的企图，他们自然还要想进一步的打算与全国反蒋势力联合而进行其争夺南京政府的战争。同时陈铭枢、陈济棠等也只有更进一步的向英帝国主义让步投降以期挣扎危局，蒋介石要用很大力量来帮助广东。这里我们要特别指明的，就是两广反蒋势力（改组派新旧桂系）之联合，只在反蒋的一点上可能的，但他们在进行反蒋战争中首先解决了□□□□□□□□□□□□□□□他们如果得到了两广，他们就必不可免的要进行自己争夺地盘的战争，他们相互破裂的前途与对蒋进攻的前途是同时并进的，所以两广的混战形势毫

无疑的与全国一样。自然蒋介石、陈铭枢、陈济棠等如果进一步的向英帝国主义让步，使英帝国主义对广东政府取不要必倒和对反蒋势力不加力助的态度，反蒋势力的胜利是不会有的，这样就可使现有的混战形式仍加延长下去。

三、现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无疑的是复兴。第一、工人阶级因帝国主义的压迫与资本的进攻，失业的大批增加，工资更加减少，工作时间更加延长，尤其是中国资产阶级为了与帝国主义商品竞争，只有更加残酷的剥削工人群众。因此，工人斗争如上海成百次的大小罢工，天津唐山的罢工、景德镇近二十万工人的罢工，青岛纱厂工人的苦战，武汉工人斗争的复兴，最近北京人力车夫工人的大骚动演成剧烈的巷战，武汉纱厂工人之包围公安局，无疑的都成为城市斗争复兴有力的根据。第二、全国范围的农村，游击战争的发展，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的扩大，农民由日常斗争转变为武装斗争的普遍，以及土匪、神兵、红枪会等各种农民武装自发的骚动布满了全国，这是农村革命斗争的开展。第三、红军如你们的部队、彭黄[6]部队、贺龙部队，赣西南、赣东北、鄂西湘西、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等部队，真如雨后春笋滋长得非常迅速，特别是在全国的政治上，红军已具有伟大的意义。第四、普遍了全国的兵变，如新一师的四千余人，陈周材的一团，方振武的鲍刚部，从前九江的王均部，最近常德的吴尚部，与浦口、安庆、蚌埠的石友三部，上海浦东的熊式辉部，这些兵变不仅证明了统治阶级剧烈的溃崩，而且证明了兵士群众政治觉悟的加速，虽然这些兵变的领导尚有许多不是革命的。第五、中下层的资产阶级也因全国的混乱而更动摇，城市贫民更一天天走上革命；学生群众更广大群众恢复革命的斗争，城市反帝运动更渐渐得到了正确的领导。以上概括的事实，无一不是证明革命斗争是复兴的

形势。

四、根据上面的分析，一致进攻苏联危机的紧张，军阀战争仍然的继续，革命形势的复兴，我们党目前重大的任务无疑的是汇合而且扩大日常斗争走向罢工示威发展到武装斗争，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的任务，以走向全国范围总的暴动。这一重大任务，无论在保护工人祖国的意义上，无论在世界革命的发展上，无论在中国革命的复兴上，都是非常严重、非常正确而不可丝毫忽视的。谁忽视这一任务或者反对这一任务，他的结果不但取消中国革命，简直是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以进攻苏联，这不仅是罪恶，而且是叛变！

（二）你们目前主要的任务和策略

一、依据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总任务，你们最大的任务就是尽所有的力量以**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暴动**，这是你们不能丝毫迟疑的。你们要实现扩大红军的策略，必须依照以下的路线：第一，要能坚决执行红军的任务，扩大土地革命，以红军的行动纲领来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加入红军。特别是红军的本身与闽、粤、赣三省省委及三省边界的地方党部（中央当另函三省省委），要尽量扩大红军的宣传，使广大的农民群众都愿当红军，都知道扩大红军就是扩大革命群众的力量。第二，要汇合并扩大东江、闽西、赣南的日常斗争发展或广泛的武装斗争实行地方暴动必然会生长红军出来。第三，要集中东江、闽西各处的武装农民群众从斗争过程中编成红军。第四，红军本身要有计划的派人打入到敌人军队中去工作，造成兵变潮流转变红军中来；这一工作特别要闽粤赣地方党部很宽泛的加紧这一工作，有计划的组织广大的兵变运动，使敌人的兵士大批

的变到红军中来。第五，闽粤赣省委以及中央将调集下级军政干部人才，送入红军中以资补充，同时并要你们抽调出一批干部士兵来加强其他各地的红军。同时你们更应该经常的设办红军随营学校或教导队专门训练红军干部人才，不但可以解决你们的干部补充问题，而且可以帮助全国红军。其他各地红军更可以派遣下级干部或兵士前来你处学习，以取得你们的斗争经验，以贡献各地红军（你们应该有计划的来进行这一工作）。第六，加强红军中党的政治领导的工作，现时你们红军中党的领导还是很弱的，此后要特别加强与发展支部中政治讨论，要坚决肃清非政治的观念与□□□□□□□。第七，红军数量扩大与质量增强要同时并进，要召找失业工人及在业农民投入红军，要注意改编与收容过来的队伍中之政治工作及分编这些队伍到红军各部去的办法。第八，要注意取得闽粤赣三省各种军事工作及农民运动的配合（这点中央当另有指示给该三省省委），只有这样才会使红军建立起广大的群众基础。第九，你们要有经常的群众工作，提高群众组织——农会、工会的威信，帮助群众组织扩大起来。因为这样，群众组织才能够帮助红军扩大，这是有互相推动、互相发展的紧密联系。第十，你们要特别注意与富农斗争，无论在红军中或地方群众组织中，你们都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取坚决斗争的态度，尤其要从思想上肃清富农在群众中的影响，要从组织上肃清富农分子出党□□□□□□□□□□□□□□尤其在一切农会、军事指导机关中更不能容许富农分子存在。你们要坚决的注意扩大雇农与贫农在群众组织中的力量，红军中一样的要吸取大批的雇农、贫农充实起来。□□□你们要特别反对军中对于红军的取消观念、失败倾向、分散政策等等，[7]地方观念、小组织观念，更不应容许其存在，以强健党之正确的领导。

二、你们目前发展的路线与策略。在目前的形势下，你们第一，应该向广东韩江上游游击推向东江发展；第二，应该与闽西、赣南的游击队及各种农民武装取密切联络与声援；第三，集中三省边界的武装农民编成红军统一指挥而扩大发展；第四，两广战争紧张到高度时，东江地方暴动已经普遍发展时，韩江下游防军薄弱，自己力量集中而敌情□□□□□，你们可以执行深入东江（兴宁、五华及韩江下游）并向潮汕推进的策略；第五，你们如在闽西攻击得手，而一时难以转向东江，则亦可深入闽西土地革命向着闽南发展，如在条件成熟时（与深入东江条件同）攻下闽南中心城市，于政治影响亦必然扩大。

三、在目前扩大红军、发动地方暴动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的时期，你们与中央及闽粤赣三省省委及游击队之密切联络，是非常必要的。中央认为你们与福建的联系应设总交通于□□□分交通处于漳州、龙岩、上杭、永定、长汀、武平等处。你们与江西省的联络□□□□□总交通处于吉安，分交通处于赣州、云都、信丰、瑞金、寻乌等处。你们与□□□□□系，应设总交通处于潮汕，分交通处于丰顺、梅县、大埔、兴宁等县。这样可与三省都取得密切联系，中央也可以由三省的总交通处与你们发生更紧密的关系。关于这一交通网之设立与设立之技术问题——如进步方法、秘密装置、交通人的职业和职责与经费等，你们应该与闽、粤、赣三省定出更切实周详的计划，并且要迅速的建立起来。

末了，我们还要重复指示你们，中央对于你们行动方向之指示，完全是根据全国政治形势与红军发展的原则指示你们总的趋势，你们更应该依照具体的情况来判断执行的程度。对于你们七次冲锋梅县这种发展的办法是错误的（因而扩大在群众

的影响，其闽□□□□□□□□□□□□□□□□江上游游击与否)，希望你们要坚决的执行发动群众斗争以推向前进的路线，硬战只有在条件成熟之下方可应用的。完了！

顺致

党的敬礼！

中　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此处有漏字。
〔2〕此处有漏字。
〔3〕此处有漏字。
〔4〕此处有漏字。
〔5〕此处有漏字。
〔6〕指彭德怀、黄公略。
〔7〕此处有漏字。

PDG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红军问题给福建省委等的信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福建省委并转军委：

目前因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一致进攻苏联的危机格外加紧，国民党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者指示下更扩大其争夺进攻苏联、压迫革命的领导之混战，以及全国革命斗争形势更显著的开展，所以党对于发动广大群众斗争使之发展到武装斗争，汇合各种武装斗争执行拥护苏联的任务，以走向全国范围的暴动，已成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中央根据这一行动□□□□□□认为目前军事工作之最大的任务，即在于扩大红军发动地方暴动以深入土地革命，当然实现这一主要任务——扩大红军，必然要紧联到一切的军事工作——工农武装、士兵运动等。福建在闽西是有利于扩大红军的，同时福建的农民武装斗争在闽西、闽南已有了普遍的发展，城市如厦门、漳州、福州等工运复兴，工人群众已具有武装自己的迫切要求，敌人军队中的动摇更利于我们兵运的发展，因之中央认为你们对于扩大红军的任务，在客观上是很顺利的。关于你们进行这一工作的具体方针，中央特给你们以下列的指导。

一、根据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与我们党的主要任务（见中央六十号通告），福建目前的军事工作无疑的要以扩大红军、

发动地方暴动为中心。执行这一中心的军事工作，应该依照以下的路线：第一，你们要以扩大朱毛红军的宣传与扩大闽西游击队、赤卫队和一切农民武装的宣传同时并进，特别是要将帮助朱毛红军执行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与扩大并汇合闽西游击队、赤卫队等农民武装，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以生长为红军，两相联系起来，以扩大闽西的暴动区域，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使广大农民群众进一步的认识红军，使每一个健壮英勇的农民都愿意自动踊跃的加入到红军中去。第二，你们要加紧的发动广大群众日常的斗争，使这些斗争很迅速发展到武装斗争，使广大群众都卷入到这些武装斗争中来，并汇合这些武装斗争与现有的红军游击队汇合起来发动广泛的地方暴动，使红军更拥有广大群众的基础。第三，你们要注意在斗争过程中集中闽西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一切武装的农民群众，编为红军，统一指挥，并且要深刻的应用朱毛红军的经验到这些新编的红军中去，使之日趋健壮与发展。第四，你们要注意加强全省的工农运动，特别是要加强□□□区的内外周围的工农运动，使红军的发展得到广大群众运动的配合与掩护，使红军扩大不会限于单独的军事行动，使红军的转变来得更加迅速。反之工农运动之发展，也必然因为红军的扩大得到进一步的开展，更会相互推动起来。第五，你们要扩大中心城市的工人武装的工作，至低限度也要立即扩大厦门、漳州、福州三个中心城市工人武装的宣传，开始在工人斗争中宣传武装工人自己的意义，开始在工人斗争中建立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并且要有计划的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工人纠察队的政治意义以及在日常斗争中的作用。关于发展与训练方面，更须有切实的计划去执行（详细的办法可参照全国劳动□□□□□□□□□□□□）。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城市工人武装的基础，只有这样才更能给与

红军以及游击队等农民武装以阶级意识的领导□□□也正是准备各种武装斗争的总汇合，以走向总的暴动（没有城市的工人武装□□□是要走上错误的）。第六，要注意尽可能来加强福建全省范围的兵士运动，特别是要在包围朱毛红军与闽西红军的敌军中，扩大兵士运动的工作基础，加强中间宣传煽动，以发动日常斗争走向普遍兵变的工作，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发动兵变、领导兵变，使兵变的士兵群众大批的跑到朱毛红军、闽西红军中去。这一工作在宣传鼓动上要能更加深入与扩大，在方法上要能更加切实与精细，更能动员一切党员与团员及我们政治领导下的群众都直接间接来推动这一工作。第七，你们要注意在交通要道沿线上及城市近郊农村中加紧扩大农运以及农民武装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更有利于红军的行动与地方暴动。第八，你们要注意汇合上面各种工作的准备，更有计划的在闽西城市或闽南城市中加紧一切工作，准备地方暴动，以深入土地革命。目前在福建特别是闽西，必然要注意推动一切工作以发动地方暴动，造成广大的暴动区域。第九，加强闽西红军中党的工作与加强对于他们的指导，省委应视为主要工作之一，特别要经常的与他们取联系，经常地给他们以具体的方法，经常地调集大批下级的军事政治工作人员，有计划的分配到红军中去。你们更要与他们建立起独立的交通网，帮助中央与他们发生密切关系。第十，要帮助红军吸收广大的失业工人群众及在业的贫农群众，你们更要有计划的征调大批的工人与农民□□入进去，使红军的质量加强与数量扩大同时并进。第十一，在扩大红军工作中注意与富农倾向斗争，肃清富农在群众中红军中的影响。据各方面游击区□□□□□域，无论在群众组织与党的组织中，都是富农占领导的优势，□□□□富农的政治路线完全反映到红军执行土地革命的行动上来，自然这必

然要影响□□红军的领导上去。你们必然要在农村中建立起党的无产阶级领导基础——雇农工会组织，而且巩固这一基础，在农民组织中要扩大雇农、贫农的成分，使雇农、贫农占据领导，在政治上要坚决与富农倾向作斗争，在组织上要肃清富农分子出党，要在斗争上淘汰富农分子出农会。这些工作，在红军中无疑的要同样的加紧。第十二，党要特别反对红军中之取消观念、失败倾向、分散政策，□□□□□□□□□□组织倾向等，并采取坚决的斗争路线，以强健党之正确的领导。上述十二点，都是你们目前执行扩大红军任务的主要工作，你们要把这些工作原则，逐一加以周详的计划，更具体的与当地环境配合起来。你们扩大红军任务做到什么程度，完全要看这些工作做到什么程度以为断。当然更要重复的指出，你们执行这一任务，不是将扩大红军、发动地方暴动与一切群众工作隔离起来，正于□□扩大一切群众运动、发动一切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汇合起来，才使扩大红军的任务树立雄厚的基础。

二、红军游击队发展的路线与策略问题，这里须要分别指示出来。关于发展的方向，中央认为目前政治形势下，红军必要向着下列地方发展：第一是交通要道，如水路、铁路沿线与城市等，在闽省的红军无疑的要向汀江、龙漳汽车路与闽南中心城市发展。前朱毛红军是应向东江上游游击与闽西红军联络，万一在闽西游击得手，一时难以转向东江□□□□□□□□□□□□□□□□□闽南发展。第二是敌人政治影响大的所谓“白色区域”，这是针对保守在□□□的观念而加以改正的。第三是统治势力动摇或薄弱的地方。第四是群众斗争发展的地方。关于发展的策略，首先要说到：主要原则是要发动群众斗争推向目的地前进，而不是单独军事的窜打。当然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如果条件成熟时，(1) 敌人力量薄或混战不清无力

对我，（2）群众起来，（3）自己力量集中，是必须攻下敌人的要害或中坚的，因为这可以扩大我们的政治意义，动摇敌人的统治基础。其次是集中问题，在目前已无疑的要执行集中力量统一指挥的策略，一切武装农民群众都应集中起来编成红军以一指挥，现在红军当然不能再行分散了。其他一般的策略，中央将另有通告，这里不必详述。

三、红军联系——红军与红军联系，此省与彼省联系，红军与你们及中央联系问题，无论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或减除红军目前许多困难上都是必须得到具体解决的。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对闽、粤、赣及朱毛红军都有单独的指示。在你们方面，中央认为必须与闽西红军、朱毛红军共同建立一独立的交通网。这一交通网，可以解决红军与江西或广东的联系问题，可以解决你们□□□及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设立这一交通网，原则方面，中央有以下的指示：第一，发动各地方党部建立起赤色群众组织，使广大群众都能帮助或掩护这一工作（能利用邮差更好）。第二，找到各地有职业的同志专门担负这一工作，其职业以足以便于这一工作为□□□（如闽西之乐丝烟纸业等小商人）。第三，要在厦门设总交通处，在漳州、龙岩、上杭、□□、武平、长汀、连城以及其他必要地方设分交通处，用秘密的递步哨方法转传信件。第四，要规定各种秘密传递法、装置法、药水写洗法、交通口供等计划。这些仅是供给你们的原则，详细办法你们更须具体的计划与红军和各当地党部全国设立起来，但这一定是独立的工作系统，不能与各地组织混乱。第五，中央将另派一特派联络员专到福建会同你们与朱毛红军、闽西红军取联络。他的职责是传达中央的意见与决议到红军中去，会同红军党部规定出执行的工作计划并收集红军□□材料与对中央指示执行的程度报告中央与你们。他的工

作必然要得到你们的□□□负有经常巡视红军的责任。

末了，希望你们对于这一指导信，加以充分的了解与执行，并要□□□□□之执行的计划立即工作起来。关于执行计划及目前红军发展的情况，更盼望你们很快的报告给中央。

顺致

党的敬礼!

中　央

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军委的信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广东省委军委：

在目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加紧、军阀混战的扩大、统治阶级日益走向崩溃，革命斗争更向上复兴，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准备武装暴动。在这时候党的军事工作，无论在哪一方面，无论在甚么地方都十分的重要。在广东现当军阀混战的场所而又是群众斗争有历史有基础的地方，这一军事工作的任务比任何别省都更加重要。

但是广东省委军委过去仅曾有过一次简单的书面报告，最近半年以来广东省委军委对于广东的军事工作，从没有过一次的单独的书面报告，中央对于广东全省的军事工作详细情形不甚明了，仅从省委转来的各地方报告中与最近毅宇[1]同志的口头报告中，找得一些片断的材料。因此中央对你们的全盘的具体的指导亦感觉困难，现在只能就目前一些紧迫的问题，有下列的指示。

第一，关于士兵运动方面

广东的士兵运动情形，据毅宇同志说在各军中□□□□□，而且有了党的组织。关于士兵运动的重要原则以及一般的方法，中央在通告上已详细说明，同时在广东负军事责任的同志，我们相信你们很能了解。但是对于这一工作，总

没有用很大的力量注意，尽可能的去进行，这确是你们的过去错误，亦是工作上一很大的缺点。现在在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总路线之下，士兵运动更加特别加重其意义，且现在广东又成为军阀混战的场所，为要在军阀混战中实现我们的失败主义策略，这一工作更加十分的严重。现在中央很严重的指出，广东的党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唤起全党的同志起来注意这一部分的工作，必须立即动员全党同志以至赤色工会的群众都起来向所在地的士兵群众作宣传鼓动的工作。特别是在军阀混战的西江、北江中路以及与游击暴动区域接近的东江，尤须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去进行这一工作。在行军时，在驻军时以及在战争时，都须要发动广大的群众，向士兵群众宣传，向士兵群众鼓动，鼓动他们起来为自己生活的痛苦而斗争，鼓动他们起来，组织他们行动，反对反动的长官、杀反动的长官，一直走向兵变。至于宣传鼓动的中心口号，中央在六十号通告上曾经指出过，“不打自己的工农兄弟”、“不打苏维埃和中国红军”、“与红军联合起来”、“与工农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的政权”、“反对军阀战争”等，这些当然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现在两广在此混战时期，无论在哪一方面敌人，他们都必然的要补充士兵，要拉夫，要找向导，要时时与群众接近。党必须利用这些机会去与士兵群众接近，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派遣同志去当兵，去接近他们，去进行发展我们的工作。当应调查各部队的特殊情形，针对着这一特殊情形，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定出具体的宣传和鼓动的大纲及口号，使能深入群众。在群众中建立党的组织起核心作用，发动斗争，一直走到兵变。因为现在是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时期，我们必须有计划的有准备的去组织兵变，尤其是在西北江中路军阀战争已经爆发的区域及在东江进攻红军的区域，更要立即进行这一计

划。关于组织兵变的策略，在中央通告六十号已经指出："要利用一切士兵群众的迫切要求来鼓动广大兵士群众，但必须特别加紧中心口号的宣传，尤其是反动战争对于士兵群众的残酷牺牲。在实行兵变的时候，必须举起鲜明的旗帜，如反对军阀战争、反对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等"。望你们特加紧注意这一工作，并要定出进行计划报告中央。

第二，关于红军游击战争方面

中央通告六十号已经指出"各地红军在武装保护苏联的路线之下它有极重大的任务"，所以我党特别是广东的党对于红军游击战争用大部分的力量去注意这一工作，万不能一点忽视，现中央正积极的计划扩大与集中红军的组织与战斗力量。关于扩大红军一般的路线与策略，已见中央通告六十号及中央最近为扩大红军问题所发出致各级党部公函，望你们注意参阅，兹不重述。现仅指出对于你们有关的朱毛红军及东江红军扩大的策略问题，望你们特别注意。

关于朱毛及东江红军，中央以及广东各级党部都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尽量的扩大。广东对于扩大朱毛红军，应有下列的注意：

一、关于扩大策略。

1. 广东省委要尽量扩大红军的宣传，号召广大农民群众来自愿的参加红军，尤其是要指示东江及朱毛红军要从自己的行动上来发动群众，号召群众参加红军。

2. 要汇合东江各种群众斗争，发展成为广泛的武装斗争，实行地方暴动使之生长红军出来。

3. 集中东江的武装农民群众，编成红军，统一指挥，[2]。

4. 广东省委应加紧反动军队中的士兵工作，发展士兵群众斗争，扩大士兵组织，进行组织士兵群众的兵变，以瓦解敌人部队□□□□□□□□□□来。

5. 省委应有计划的调下级军政干部人才，送入红军中工作（自然这一工作，中央也要注意）。

6. 广东省委应设法加强红军中特别是东江红军中党的工作。

7. 找失业的工人及在业的农民投入红军，特别要吸收广大的贫农与雇农来充实红军的质量，要防止富农在红军中取得领导权，朱毛红军尤应指出他们注意改编及收容过来部队的政治工作，及分编这些部队到红军各部分中去。

8. 省委应注意全省各种军事工作配合的发展，尤应特别注意游击区域内外的群众工作的平衡发展，以推进革命的高潮。

9. 要特别注意红军中的取消观念、失败倾向、分散政策、地方观念、小组织倾向等，并指示其采取坚决的斗争路线，以强健党之正确的领导。

二、关于发展的路线与策略问题。

1. 朱毛红军主要的在韩江上游游击与东江红军取密切联系，以推向东江发展。

2. 集中东江一切的游击队、女卫队编成红军以一指挥，以深入□□□□□□。

3. 有以下的条件，朱毛红军可深入东江（兴宁、五华与韩江下游）□□□东江的红军向着潮汕推进：

A. 两广战争紧张到高度时；B. 东江地方暴动普遍发展时；C. 韩江□□军薄弱；D. 自己力量集中；E. 敌情明确。

4. 东江红军，即在朱毛红军因特殊困难不到东江，亦应尽量的向外发展及扩大。

三、关于联络问题。

1. 广东省委应为这两部分红军设总交通处于潮汕交通处

□□□隔□以联络东江于丰顺、梅县、大浦、兴宁等县以联□□□□□。

2. 中央拟设特派联络员于赣粤闽三省，经过三省的交通网而与三省省委与中央发生密切联系。

3. 交通网的建立法：A. 利用有职业的同志为交通员，以县或乡为段落，用递步方法进行转送；B. 要特别规定各种携带装置及药水写洗的方法；C. 交通人要以妇女及邮差或其他有社会保护色的同志担任为妥；D. 交通处要预备临时可以更换的地址。E. 交通网不能与其他的交通线混合，交通者并不能知道地方党部而要成为单独的系统。

以上是关于扩大红军计划中之广东省委应注意的几点，自然还有许多更具体的更实际的问题，广东省委应有自己更切实的计划去执行。

第三，关于省军委本身的工作问题

在目前这一军事工作环境之下，省军委的工作无疑的是特别的加多，所以健全省军委是特别关系重要。自然所谓健全省军委并不是要增加许多的空心机关，而是要有计划的有条理的工作。过去广东省军委只有些应付的工作，很少建立有计划的工作。现在的军事工作，既然要如此的扩大，则我们万不能如从前那样应付而无计划工作下去。且必然要针对着这一政治的环境，订出工作的计划。这一工作计划最主要的：

1. 加强对各级党部特别是对在各地方负军事工作责任的指导。省军委对于全省的军事工作，要有经常的通告公函以及个别的指导信，或有计划调各地负军事责任的同志来省委训练（谈话，有可能时办军事训练班），解释军运的策略，答复他们□□□纠正他们不正确的观念……等等。

2. 要有扩大红军及游击战争的计划。根据广东的情形，

针对着现在的□□□环境，必须订出一扩大红军游击战争的计划。

3. 要有士兵运动的计划。如怎样去发展士兵工作，怎样去找□□□去送同志当兵，怎样到士兵群众中去宣传鼓动，怎样去组织兵变，均应针对着各种的特殊环境定出切实的计划。

4. 巡视工作的建立。为要更明了各地及各部队的实际情形，为要更能具体的指导并督促各地工作，必须有经常的军事的巡视工作的建立。

5. 经常工作的建立。省军委必须开始建立经常工作，如各种军事问题的讨论会、部务会须经常的开，对军事上的调查统计工作，收集军事材料向中央作报告，向各地党部写指导信，处理一切日常的事务问题等等经常工作，必须建立起来。

第四，关于其他的军事工作

工人纠察队的组织与训练本是目前一很严重的问题，但广东尚未开始去做。现在必须注意在工人群众中作工人武装及武装暴动的宣传，使他们自己在斗争中会感觉须要而易于为我们组织起来。（详细的具体的□□□□□□□□□□□人武装组织的对□□□□），其他如党员军事化，帝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民团、土匪、警察……等等问题，都是目前值得注意的问题，均不可忽视一点。关于一切一切的问题，俟你们有详细的报告后，中央当更作具体的指示。

在你们接到这一指导信之后，你们必须加以讨论，并向中央将一切情形详细报告，至要至要。

中　央

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贺昌。

〔2〕原文如此，应有缺字。

PDG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经过详细的讨论后，完全同意第十次全体会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并且深切感觉全体会的路线与一切决议都极适合于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特别反对党内右倾取消派及调和派的论断是给与中国党战胜取消主义与调和派的最锋利的武器。因为中国取消派与调和派在各方面的表现，正是与国际取消派调和派的思想一条路线、一个系统。因此，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仔细的研究十次全体会议的一切决议，并且根据这些决议配合实际情形坚决的执行。

一、全体会指出一年来事变的发展，“一天一天更加看出第六次大会对于目前时期估量的正确。认为目前是大战后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的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激烈的时期”，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国际形势上，如各个帝国主义因为抢夺市场、争取投放资本的势力范围，以求重新分割殖民地而加紧世界大战的准备；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更加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更积极的向苏联进攻；因为生产合理化，更残酷的榨压工人，而促成工人阶级的日益革命化；

---

* 本文原载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一期。

因为更厉害掠取殖民地劳苦群众的血汗，而促起殖民地工农劳苦群众自谋解放的革命斗争更尖锐的向前发展；因为这些原因而促进了世界革命新的浪潮的兴起，完全证实了这样的估量。就中国现在一般经济政治危机的形势，也完全适合于这样的估量。如英美日帝国主义抢夺中国的矛盾日加尖锐，一方面极力指使中国军阀互相抢夺，战争不已；另一方面极力在中国树立军事的根据，美国占有航空，英国夺取海军，日本在山东、满洲扩大其自由驻兵的范围。这便是各个帝国主义加紧准备直接战争的形势。因此，中国已成为爆发帝国主义大战主要危险区域之一。如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武装夺取中东路，组织白俄军队，攻入苏联边境，让日本积极进兵北满，请求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共同干涉，都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加紧。如帝国主义更厉害的侵掠中国，勾结国民党军阀取得更多的经济政治的特权（如航空，海军，内地杂居，内地租借权，内河航行的扩大等），而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因此促起了工农劳苦群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重新兴起。如中外资本竞行生产合理化，加重工人工作，增加失业，工资减少，童工女工增多，使中国工人阶级为救死求生不得不坚决起来斗争，而就开展了工人运动复兴的形势。这些事实都是"帝国主义的一切根本矛盾同时尖锐化"的有力的证明。所以右倾派及调和派说"帝国主义间的一些协约协定（如杨格计划等）可以相当缓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或者说"资本主义国内矛盾日渐衰弱"，都是些无稽之谈。特别是中国的取消派认为帝国主义可以对中国资产阶级让步，可以放任中国工业的独立发展，更是完全走上了社会民主党讴歌世界资本主义繁荣的观点，无疑的是绝对错误的。

二、全体会指出，现在帝国主义互相冲突的中心是英美争

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在殖民地的‘小’的战争（如中国蒋[1]桂间的战争），其背后都隐藏着英美间为争世界霸权的冲突”，这是不容丝毫怀疑的。最近改组派军阀反蒋战争的兴起，也同样有英帝国主义的积极作用（如汪精卫回国前首先至伦敦与麦克唐纳尔会见，香港成为改组派策动中心，同时香港政府又操纵两广战争等），又是一次有力的证明。所以英日美在中国的三角冲突，固然日美间表现得更加尖锐（如日本积极组织北方军阀反蒋及对满洲问题等），而英帝国主义决不会取消极的态度，尤其不能与美国妥协一致以稳定南京政府。并且就发展的形势看，必然要从三角冲突而走向英日协调与美对抗的形势。如果轻视了英美间的矛盾，那么，一切政治问题的估量都会走到极端错误与右倾的方面去。

三、无论帝国主义营垒怎样的敌对和冲突，但主要的世界矛盾是世界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两个经济政治系统的冲突，特别是一年来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出乎右倾派意料之外的更加巩固起来，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与劳苦群众中的影响更加扩大起来，所以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也就日益紧迫。帝国主义在他互相冲突更加紧张的时候，更要企图首先消灭苏联的。所以全体会指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只有取消主义者陈独秀们，才在极明显的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中东路问题上，把帝国主义战争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危险平列起来；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这样的观点只是替帝国主义在群众中散播和平欺骗的空气，来松懈广大群众武装拥护苏联的决心。

四、全体会议指出，“经济上采用榨压工人的政策，同时政治上的反动也更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西斯蒂化，在社会民主党占有势力的国家，另有一种社会法西斯蒂的形式”，

更残酷的来镇压工人。另一方面也就造成了“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危机”，广大群众日益左倾革命化。于是，左派社会民主党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工人有力的工具，“这个左派传播幻想，使人相信是反对社会民主党中领导一派的政策，以此来缓和社会民主党崩溃的过程，其实这个左派是尽可能拥护社会法西斯蒂政策的”。所以，“共产国际及各国支部，特别严重的提出，加紧坚决斗争，以反对社会民主党及其左派的任务，尤其要反对社会民主党左派，因为他是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是工人群众积极力和战斗力发展的主要障碍”，这更是非常正确的！如果轻视了反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斗争，无疑的要堕入右派调和派的泥坑。同样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的中国，也极力利用民族改良主义来缓和工农革命斗争。国民党特别是改组派、第三党是他们最有力的工具。现在广大群众对这些改良主义的政党的确还有不少的幻想的残余。特别现在形势，军阀战争更加扩大与混乱，工农革命斗争更加向前发展，改组派、第三党更要加紧他的欺骗宣传，实在是党夺取广大群众之最严重的敌人。所以，党必须更严厉的作反改组派与第三党的斗争，不断的揭破他们的欺骗，然后才能领导工农革命斗争更快的向前发展。

五、全体会指出，“国际六次大会以后发现的新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明白表现的左倾，和工人革命运动新的浪潮开始”。过去的洛茨同盟罢工、柏林五一示威的巷战、鲁尔的斗争、印度革命的继续高涨以及最近的澳洲矿工的大罢工、东京电车工人的同盟罢工、美洲海地工人的武装斗争，都充分证明这一估量是完全正确的。在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增加，工人生活更加痛苦，社会民主党公开的法西斯蒂化，更暴露了他的假面具；共产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势力的增加，帝国主义战争特别

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危机的加紧。在这些条件之下，无疑的群众革命斗争要更快的成熟为世界的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右倾派与调和派认现在新的革命浪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好象有一座万里长城隔住，无疑的是极端错误的。同样的，现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的根本矛盾都更加尖锐化，资产阶级因为他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国家财政资本的利益不可分离，和他与封建势力反动联盟之故，决不能实现丝毫改良的企图，而只有更加走入反中国独立的帝国主义的营垒中去，更残酷的剥削工农劳苦群众。这样自然要更加促起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各地罢工潮流的兴起，特别是主要产业工人、农民的土地斗争与武装斗争到处爆发，兵士哗变普遍了全国，都证明中国革命运动的复兴，证明国际第十次全体会与中国党的二中全会对中国革命的估量是完全正确。尤其是最近的形势，军阀战争扩大，统治阶级的危机加深，工人斗争渐次走上反黄色工会与国民党的斗争，每个经济罢工都很快转为严重的政治斗争甚至武装冲突(如青岛纱厂工人、北京人力车夫、武汉纱厂工人等)，农民暴动与游击的范围日益宽广，红军的组织特别是政治影响更加强大起来，这就表现着这一革命复兴的形势，要更迅速的开展这一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取消派陈独秀等以为现在群众斗争“正是革命高潮的反面”，这不过证明他们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抹煞一切事实而幻想资产阶级的稳定罢了！

六、在这样革命浪潮发展的形势之下，党必须提出更坚决的策略与政治口号来领导群众斗争更快的发展，所以全体会指出“政治罢工，成为直接的时代的坚决问题”，是异常正确的。特别在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之下，在城市在工人中组织同盟罢工、示威运动，发展到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组

织地方暴动，尽量的扩大红军，组织兵变，是现在党领导各种革命斗争汇合起来成为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直接斗争的主要策略。取消派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无疑的是替资产阶级服役来阻止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

七、特别是全体会坚决反对右派与调和派的路线，指出“机会主义是传播资产阶级影响于工人阶级，并传播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间谍”，中央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因此，中央更完全同意全体会反对布哈林同志的调和主义，同意决定免除他的主席团委员的职务与在共产国际的工作。

布哈林同志远在指导中国党的六次大会的时候，虽然根本上是依据共产国际的整个路线，但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暴露了他的调和派的观点。如在他的演说中，因对富农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观点不正确而得出将来工农专政时还会有与其他急进的革命政党成立联合政府的形式，“或者会形成一个甚么急进的革命党，它在某一阶段，将与我们共同行动，或者如左派谭平山党……”,尤其论到组织问题，提出“和气一致”的口号等都是极明显的右倾的不正确的观点。必须明白的指出这样观点的错误，而肃清这样思想的残余，否则，在将来还可以成为右倾思想的基点。

八、中国党一方面过去的机会主义的残留还伏着很深的根蒂，另一方面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尚很薄弱，因此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乃更加严重。所以六次大会后中央开始工作即坚决的与机会主义的残留思想斗争（如顺直问题，江苏问题，广东问题）。从三十四号通告起，更明白的指出右倾是党内主要的危险。二中全会便在这样的精神之下确定了党的路线，更加强了党内反右倾的斗争。在中东路问题爆发以后，机会主义——反对派公开的提出他的取消主义的路线来反对共产国际、党的六

次大会、二中全会与中央的整个路线，更加表现出右倾危险的严重。中央在一贯的反右倾的路线之下，动员全党的同志与取消派作坚决的斗争。现在虽然相当的战胜了取消主义的思想，并且在组织上开除了一些公开反党的取消派的领袖陈独秀、彭述之等，可是这一斗争还是在异常严重的时期。因为党的一般的理论水平线很低，同时取消派正在积极作反党的活动，所以要肃清取消主义的思想，更须要全党继续不断的加倍的努力。特别是调和主义的思想还在活跃，还需要在思想上给以严重的打击，所以右倾的危险仍然是党的最严重的问题。必须依据国际第十次全体会的精神与路线，继续坚决执行反右倾的斗争。

九、且目前右倾危险是有他的客观的强大的基础，是由于阶级矛盾的更尖锐化，历史上空前的事变将要到临，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留为这样严重的事变所吓怕，自然要更加动摇而走向右倾与调和的方面去。特别是中国党内无产阶级基础尚不宽广，理论水平都很幼稚，更易于反映右倾的思想，甚至在坚决执行反右倾的路线之下，而在某些策略上亦仍然可以犯到右倾的危险。譬如中央一年来总的路线主要的是反对右倾，可是过去在政治的分析上，过分估量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在农民问题上，对富农的认识不清楚与策略的动摇，在职工运动上主张在黄色工会之下不能建立对立的赤色工会等，都是极明显的犯到右倾错误。虽然这些错误在接到国际的指导后很快的纠正了，但仍然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因此，全党在坚决反对取消派与调和派的斗争时，仍然需要很仔细的检查自己的策略与工作，肃清一切右倾的危险。现在党内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倾向等仍然异常严重，特别是国际决议案上最后所指出的“目前时代最大的危险，就是共产党有追赶不上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可能（尾巴主义）”，在中国党内表现得尤为严重。

最近几月来工人罢工潮流的发展，党很少在事前起领导的作用，大部分都是跟着群众的尾巴跑，尤其在策略的运用上随处表现出尾巴主义的精神。所以中央号召全党的同志，必须坚决的接受国际全体会议的指导："以最坚决的精神，反对这种反映社会民主党遗传的尾巴主义倾向。不战胜这种倾向，是不能尽工人运动先锋队的作用，即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到新的革命战争和新的胜利。"

中　央

一九二九，一二，二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PDG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百色起义后右江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平、礼[1]兄转前委：

若臣[2]同志于十二月十四日到港，报告桂军委工作经过以及成立前委、转变军队为红军情形和今后的工作布置。省委对于右江情形已大体明了。同时，毅宇[3]同志刚从中央归来，对前委工作亦有所指示。若臣同志现已赴中央报告，先将中央及省委的指示通知你们：

前委在若臣同志去后，更能坚决的实行转变，发动游击战争，加紧群众工作，特别是在观念上能打破过去的错误，坚决的执行中央及省委的正确策略，认为非常满意。

现在全国混战继续向前扩大，蒋冯[4]战争将告一段落，而蒋唐[5]战争又起，目前河南尚在混战状态中。最近阎[6]、张（学良）及中小军阀（如刘镇华、陈调元、王金钰、刘春荣、魏益三、马鸿逵、蒋选才、王钧、刘茂恩……）之“和平”通电，更加表现出军阀割据局面之加深与互相争夺，南京反革命政权的矛盾之剧烈。

第三次两广军阀混战暂时算告一段落。张[7]、桂军现尚占据广西，仅梧州一地为粤军占领，但随之而起的又有两陈争夺广西地盘的冲突（陈济棠保举香翰屏为桂主席，陈铭枢委蔡廷

锴为苍梧司令），与蒋方勾结新桂系（俞作柏、李明瑞）对抗旧桂系和张军之矛盾。在广东，蒋系军队之第三师虽已离粤，第八、五十两师尚未他调，因之而引起的两陈冲突将要继两广战争而激烈爆发，广东军阀内部之战必不可避免的要很快到来。

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下，现在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进攻苏联的战争同时亦日益紧张，马上的就要爆发了。奉天军阀已开始进攻苏联的战争，从满洲里事件中完全证实。虽然在满洲里事件失败后，忽然又有伯力的会议，公布了俄奉草约，但这次不能当作进攻苏联战争的缓和，而是战争更加快到来的一种把戏。现在各派军阀以及改组派、第三党都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先锋队，都正争夺进攻苏联的领导权（如奉天与南京政府的冲突）。同时，在帝国主义方面，虽然有日本独霸南北满洲而发生与英、美的矛盾（如英、美、意、法干涉中、俄交涉的宣言），但在进攻苏联的利益上仍有调和一致的可能。因此进攻苏联的战争马上就要到来。

至于全国的群众斗争，在军阀混战中更加向前发展，日益走向革命高潮的局面。革命复兴与革命高潮之间并不是如“万里长城”一样。现时的革命复兴已是向着新的革命高潮发展，尤其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战争爆发后，必然随之而起的是全世界的革命高潮之到来。现在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最溃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性的最主要集合点。新的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以及他的国际性与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同样的意义。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之下，前委的工作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在“武装保卫苏联与反对军阀混战”两大政治任务中，我们的使命更加伟大。因此前委在总的策略上，必须更加坚决的

扩大和发展当地的红军及农民的武装组织，普遍的、广大的动员右江（即田南道）的群众斗争，建立和发展苏维埃区域，并深入土地革命，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现时两广军阀仍处于混战和冲突的状态中，加以右江群众斗争的基础与地势的险恶，对于红军七军的发展是极有利的条件。但在另一方面，右江是云桂的交通孔道和两广的财源地(贩卖鸦片)，游击战争的发展必然将会引起军阀的进攻。你们对这点决勿轻视，不要单依赖地势的险要而自骄，走上失败的道路。前委必须用极大的势力发展右江群众的斗争，而且只有群众斗争发展与苏维埃区域的向外发展，才能保证红军的存在与扩大，并打破敌人将来的进攻。

此次第四大队的改编成为正式红军，并未经过兵士群众的兵变而带有军官和平转变性。因此，在现时的红军内部还不免含有动摇的反动的军官在内，随时都有背叛的可能，特别是在下列的两种条件之下：

1. 新旧桂系的收买利诱，尤其是俞、李阴谋活动。

2. 红军的分散驻扎，更易给敌人的活动的机会。

因此，在红军中必须继续的肃清动摇反动的分子，枪毙反动军官，是保证红军的胜利的基本条件。你们过去对动摇反动军官的处置，有些地方尚未能坚决执行，这是错误的。自然在红军尚缺乏富有军事知识的新干部时，还须利用旧有的干部，但对于反动和动摇的旧军官，仍须彻底的肃清，一时的轻意利用和放纵姑息是不正确的。这点在毅宇同志到中央时，中央再三要省委提醒你们一万二千分的注意!!!

在红军游击区域，最重要的要立刻宣布党的十大政纲、土地政纲，并要根据党的政纲配合右江的实际情形，公布没收土地法令、劳动法令、保护妇女法令……并宣传、组织专门机关

实现这些命令。前委在右江群众中必须“普遍的通俗的宣传苏维埃的理论，宣传苏维埃的政权一切具体形式和具体工作”，运用广州和海陆丰及各地苏维埃的实际政治经验教育群众。除宣传工作外，前委还应注意在红军的游击区域建立或转变农会为苏维埃政权，万勿以为当地“群众落后”，暂时还应以农会为中心，而忽略组织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工作（据若臣同志报告，同志中尚有如此观念），这是错误的。这点也是中央的意见。

对于红军的驻扎，省委认为太分散。第一，交通的不便，七、八天不能集中，应付敌人的进攻困难。第二，在向豪绅地主的武装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之下，分兵是不能适应此策略的（朱毛红军是切忌分兵的）。第三，分散驻扎，因为干部的缺乏，极困难发展对兵士的军事政治训练工作。因此，省委坚决的指示你们，红军在目前必须采取集中的策略（现时中央对全国红军的指示均如此），积极的向豪绅地主的武装进攻，如此才易于以集中的红军个别击破豪绅地主的武装，并向要隘发展，以根本动摇敌人的统治。现时对于驻在凌云的军队，应集中在百色、平马一带，由东兰派赴河池发展的一营，在目前尚不须要。

红军第一步的工作，应集中在百色、平马与东兰一带，发展当地的群众斗争，使这几个中心区域成为右江群众斗争的基本力量。对于城市的夺取在现时亦非常重要，过去避免夺取主要城市的策略必须改变。只要有胜利的可能，有群众可发动的，便须向主要的城市进攻，以至占领这些城市，就是占据极短的时期，也有伟大的政治影响。红军执行这样的策略，以与全国工农兵的斗争汇合起来，便可促进革命的巨潮（见中央第六十号通告）。

至于发展的方向，毫无疑义的是应向着湘粤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与广东的群众革命运动和朱、毛的游击战争相联系，这对于推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极重要的意义。上次中央指示你们要与云南省委取得联系，是恐怕在万不得已时，你们要退云桂边界。现在中央已完全同意省委的意见，指示你们的发展前途应向着湘粤边界。

在现时游击的时候，在战术上须避免打硬仗，以免损失红军实力，特别是子弹、枪械损失后，补充是万分困难。但对于能消灭的敌人特别是豪绅地主的武装，不得避免作战，应坚决的使之肃清。作战时特别要注意群众的发动工作，吸收群众作侦探，破坏以至参加作战，才有胜利的保证。

对于当地红军及农军的扩大和发展工作，前委亦须用于很大的努力。但是对东兰农军的改编工作，省委要提醒你们用十二万分的力量去执行！据若臣同志的报告，东兰农军的领导大部分操于富农甚至一部分失意军官之手，如果属实，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特别在右江斗争愈加深入到土地革命的时候，更加危险。前委要用各种方式排斥富农及失意军官于东兰农军之外，召募一般革命分子，特别是农会中青年雇农和贫农充当农军，并找这些分子做农军的干部。这是保证农军能转变成为正式红军，并彻底担负红军革命任务的唯一条件。

右江土匪很多，且有石山可守，不易扑灭，但如不能肃清土匪的势力，同时也是要妨碍到当地的群众斗争的。在这一特殊情形之下，前委暂时对土匪用“招抚”的方法，省委认为是万不得已时的一种变通办法。但在“招抚”后，要加紧土匪下层群众的工作，对于土匪的首领应当立即歼除。即令这部分首领表示服从我们，亦须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坚决肃清他

们。如果这类的首领侵入到红军或农军中，是异常危险。对于改编的土匪，应分散到红军中去，不宜只采取形式的改变，不应仍旧使之保存旧的组织系统，极为重要。

右江农民群众，原来已有相当的组织，但组织的领导权多半在富农手里，这是特别值得前委注意的问题。据若臣同志报告，你们在计划中已注意到反富农的斗争，省委希望你们要坚决的在斗争中执行反富农的策略。富农是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决不包含于农民战线之内，在斗争中必然的要由动摇而走向反革命的营垒中去。这次东兰提出抗租口号，即有富农反对，这是很明显的例证。前委必须要从斗争中坚决的肃清富农于农会及农军之外，并肃清富农对农民群众的影响，是现农村工作中之重要任务。

对于农会的组织，要积极的扩大，加紧在雇农、贫农中发展农会的会员，对于中农亦应尽量的吸收到农会来。在红军游击及群众斗争较深的区域，应快速的转变农会为苏维埃。但这一转变自然不应机械式的命令转变，而要经过相当的宣传。同时亦不应以为右江群众落后，现时无成立苏维埃的必要，是错的（现在贺龙红军游击的区域，亦犯有这种错误，还在委派县长，不成立苏维埃）。

在右江农村中，应积极的发动群众的各种斗争。前委应用正确的策略，坚决的指示群众的斗争推进而成为游击战争，一直走向地方暴动。右江苏维埃区域的建立与发展，必须经过红军的游击，而各县地方暴动才能胜利。总之，在右江必须发动广大群众的游击战争，以与红军的游击相联系，是工作的中心路线。

现时在红军已占领的城市（如百色、平马），应特别加紧工会及城市贫民的组织工作。并须公布劳动法令，改良工人的

生活条件。对于其他城市的工作，亦须艰苦的去建立，这也是前委的这部分重要工作。

关于党的组织方面，目前中心的任务是要积极的在工人、雇农、贫农中发展党的组织，并健全地方党部和支部生活，是目前的中心任务。但省委对于你们要“形成两种组织”的意见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党的发展应当向着群众中的最勇敢最积极的分子。所谓打开门的尽量发展，并非无条件的吸收，使党与群众组织相混合，而失去党是群众先锋队的作用，在党内又要形成“两种组织”的办法是不通的。至于要加紧党内中坚分子的训练，应采取各种方式（如办训练班，开活动分子会议），但决非在党的组织内又有二种的组织。这点望你们立即纠正！

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昭礼担任。如尚未离开，应仍由小平负责。至于以后对前委的指挥问题，省委毫无意见，由若臣同志到上海与中央解决。不过在工作的关系上，你们仍须与省委发生密切的关系，这是异常重要的。

此致

布礼！

粤 省 委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广西地区》刊印。

注 释

〔1〕指邓小平、陈豪人（陈昭礼）。
〔2〕即龚饮冰。

PDG

〔3〕即贺昌。

〔4〕指蒋介石、冯玉祥。

〔5〕指唐生智。

〔6〕指阎锡山。

〔7〕指张发奎。

PDG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信

——抗议远东局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远东局诸同志：

政治局接到远东局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的决议，经过详细的讨论以后，有下面的意见：

一、远东局决议的第一部分，即关于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的决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指出“现时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崩溃，与帝国主义内外根本矛盾迅速发展，……而且更加尖锐化。”指出“这样更要促起世界大战，这一战争的中心，是英、美争夺世界霸权，而目前主要的危险是帝国主义准备推翻苏联的战争。”指出“资本主义国内矛盾的发展，工人生活恶化，而造成猛烈的阶级斗争的条件。”“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法西斯蒂化，而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强固的国家，社会法西斯蒂化，是法西斯蒂的一种特殊形式。”指出“国际工人阶级显著的左倾与革命工人运动新的浪潮之兴起。”特别是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与调和派的错误，而同意十次全体会反右派反调和派的精神等，中共政治局完全同意。

但是政治局觉得对左派社会民主党的估量与反对左派社会民主党的重要，在决议案内并未着重指出，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这一问题是共产国际与右倾派及调和派斗争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中共政治局认为有补充这一点之必要。

二、远东局决议案的第二部分，即关于中国党的一部分，是远东局表示指导中国党的路线。政治局觉得这一部分的根本观念，是包含了严重的调和主义的精神：

第一，政治局远在国际来信及二中全会以前、远东局同志初到的时候，即指出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而坚决与党内各种右倾思想如对资产阶级的错误估量、和平发展与合法运动等争斗（当时远东局却认为中国党内“左”倾与右倾是同样的危险），因此，中央曾与远东局发生很大的争论，最后远东局同意了中央的意见。二中全会后，更是不断的加紧反右倾的斗争，特别是中东路问题爆发以后，机会主义陈独秀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联合起来，提出他们取消主义的思想，公开的反对共产国际与六次大会、二中全会的路线的时候，中央更坚决的从各方面指斥他们的错误，号召全党同志——从中央以至支部，向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到最近，全党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精神，相当战胜了这样取消主义的路线（当然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还是党内极严重的问题），把一些固执取消主义路线的分子驱逐出党。这一方面证明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路线之正确，对于中国党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也就证明中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坚决，始终一贯的站在反右倾的路线上。远东局决议上对中国党反右倾的斗争、反右倾的路线完全抹杀，反而着重说中国党常常离开了布尔塞维克路线，这就会使一般同志误会到中央对反右倾的斗争完全怠工。

第二，远东局指出，中央以前对于富农认识与策略上有不正确的观念，对于黄色工会中的策略，主张在同一工厂内不能建立赤色工会，都是犯了右倾的危险。这是很正确的，中央完全接受。不过中央自接到国际对农民运动和职工运动的指导信以及远东局的批评后，已经坚决的改正了这样的错误，而且执行了公开的自我批评。至于决议上说“在上次军阀战争，政治局竟有把广西军阀俞作柏看作革命、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的拥护者，因为在紧要的关头，缺乏政治局正确的指导，广西省委竟通电地方党部为张发奎、俞作柏的联合进行群众运动，在通电内并说了这一联合不能成功，党即建立独立的游击战争”等，这完全不合事实，这完全是采取一些无稽的谣言来扩大中央右倾的错误，并且在批评中国党右倾危险的时候，把批评中央右倾成为决议案的主要的部分，而对取消派的批评放在最后的一段，这在批评的分量上，便是轻视了取消主义的危险，而过分估量中央右倾的错误，同时又没有指出中央反取消主义斗争路线的坚决，这无疑的是会帮助党内已极严重的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与现在中国党内调和派的说法：“取消派固然错了，中央也同样犯了错误，应当互相纠正”，几乎完全相合。

第三，对陈独秀的批评，仅指出他对中东路问题反对“拥护苏联”的口号的错误，而把他更严重的公开的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反对六次大会、二中全会的决议以及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极明显的取消主义，竟忽视了他的重要性，这就把陈独秀等的右倾错误缩小起来。

第四，特别是中央在坚决的与陈独秀等取消派坚决的斗争以后，从省委以至支部都经过严重的讨论，得到了全党一致的斗争，反对取消主义的路线。而陈独秀等少数机会主义分子，不仅固执右倾错误的观念，而进一步采取一切卑污的手段来破

坏党的组织，甚至与工贼和叛党分子联合起来，这是极明显的从党内反对派走上了阶级敌人，所以中央坚决的开除他们的党籍。可是远东局的决议案说，“陈独秀与他的附从等，为保持他在党与国际党员地位，一定要痛改他们不正确的倾向……”。这是极明显的对右倾派的幻想和对他们斗争的动摇的态度，而且在客观上，便是否决中央开除他们的决议。在与取消派斗争这样严重时期，不告诉同志要坚决的反对取消派，而领导同志幻想取消派，以至对取消派的斗争采取动摇的态度，我们觉得这是调和主义的精神。

这样，一方面忽略了中央坚决反右倾的斗争，而又把中央某些策略上一部分的右倾错误扩大起来，另一方面把右倾取消派的错误缩小起来，而对肃清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出党采取动摇的态度，这极明显的是对中国党与右倾派的斗争采取调和主义的路线。政治局认为这样调和主义的路线是动摇党反右倾的斗争，而在客观上便可成为右倾派特别是调和派的借口，是极有害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并且是与国际第十次全体会的精神与路线相违反的。因此，政治局坚决要求远东局改正这一决议案后一部分的根本精神。

现在党内右倾发展，是由于全世界阶级矛盾的加深，历史上空前的事变将要到临，因此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分子为这样严重的事变所吓怕而退缩畏怯，甚至走向敌人的营垒中去。特别是中国党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更易犯到这样右倾的危险，甚至坚决反对右倾，反调和派的同志也常可以不自觉的犯到右倾的错误。如果远东局根据这样的精神，在严厉批评取消主义之后，同时警告中央，并批评中央过去也犯了某些右倾的错误，那么，政治局将毫不怀疑的接受并坚决的执行。若照现在这一决议案的调和主义的精神，无疑的是会动摇党反右倾的斗争，

这就是政治局所坚决不同意，而且是坚决抗议的。

最后政治局觉得，远东局同志在过去指导中国党工作也犯了右倾的错误。如认为“中国党内左倾与右倾是同样的危险”（经过中央的力争），主张“停止游击战争”的观念，“轻视英美帝国主义间在中国一切问题上的矛盾”，认“取消派的问题并不严重”等。虽然远东局这些观念大部分都已经放弃了，也应在决议案上略为述及，使中国党的同志对这些问题有一正式明显的认识，因为这些问题虽然没有影响到各级党部，可是政治局的同志是都参加了这样的讨论的。

以上就是政治局对远东局这一决议的全部意见，希望远东局予以答复。

最后，我们觉得现时中国政局，军阀战争益加混乱，群众革命斗争日加发展，正是党的工作万分严重的时候，希望这一问题的讨论很快结束，以免妨害工作，希望远东局接受我们这一提议。

谨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毛　泽　东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所以这个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经毛泽东校阅，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

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关于极端民主化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　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　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

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

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关于个人主义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

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做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党的组织问题

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大会对于这个问题特作详细的分析与决定。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一、党的组织路线

（一）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

（二）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地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的方法。

（三）红军原有的小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地将各种出身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地混合编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

二、党的组织松懈问题

（一）四军党的组织现状：

1. 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

2. 各级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问题，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组联席会，委、组联席会，支部大会，纵队或支队党员大会等，非常开得少。

3. 一般地纪律松懈。特别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代替他的情况，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对一

人如此，对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纪律一般地放松了。

4. 所有官长既都成了党员，结果所有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便很少注意他的社会职业的工作了，都以为社会职业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两者分不开来。如各级军事工作会议、各级政治工作会议几乎完全没有，一切都以为党决定了就完事了，党员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简直不谈起了。

5. 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下级的报告，上级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级会议上级少有派人出席。这固然是因为上级机关组织不健全，但上级机关工作态度不积极，也是对下级机关指导缺乏或指导不详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如一个部队出发游击的工作指导等，一般地缺乏详尽；还有某几个部队，几乎连粗略的指导都没有。

6. 支部大会及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

（二）纠正的路线：

1. 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2. 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

（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

（2）忠实；

（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不吃鸦片、不赌博。

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介绍人首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需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

支委要派人对将入党的人谈话，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

（三）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训练同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地举行起来。

（四）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

（五）分清党员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的性质。每个党员（除开党内负了重要或专门任务的人是为革命职业家外）必须担负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负党给他的工作。

（六）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比较从前更积极起来。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七）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

三、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

（一）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

1. 不明白会议的意义。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它。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见，就是他不了解会议的政治意义，就是他对斗争没有兴趣，凡是对斗争积极的人，他一定是热心到会，热心发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查问题的

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由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红军党员因为不明白这些意义，所以成为不爱到会或到会少兴趣的第一个原因。

2. 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或对上级请求事项很久得不到答复，因此减少讨论的兴趣。

3. 负责人事前没有很好的准备。不准备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及环境不明了，问题应怎样解决也没有准备一点意见。

4. 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发言偶出题外，便马上禁止他，他便挫兴不做声了。如发言有错处，除停止外还讥笑他。

5. 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

（二）纠正的方法：

第一，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

第二，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们提醒，尤其是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

第三，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

第四，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机关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

第五，负责人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

第六，主席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杀风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众，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生趣，问题才

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

第七，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要是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四、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

（一）军队中青年利益与成年利益不能划分，团没有特殊的工作对象。又党的小组以班为单位建设方才有利斗争。因此党的支部里头无设立团的小组的必要。

（二）党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绪，除一般地接受党的训练外，还有特别受一种青年教育之必要。又因争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须有专门组织去担任这种工作。因此，应在支部中划出年在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有特别情形如担任党的重要工作的除外），成立青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除以大队为单位经常有计划地召集开会外，支队及纵队亦各应酌定时间，召集开会。

（三）为计划对青年党员的教育，计划争取青年工农群众的方法，并指导青年工作会议，前委及纵委里头各设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员会，支队委及支委则各设一个青年委员，在各级党部的指导之下从事工作。

五、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关系

大队支队两级党部的书记，以不兼政治委员为原则，但在工作人缺乏的部队，仍可暂时兼充，没有担任党的书记责任的政治委员，上级党部应察看情形，在条件适合的环境之下得委为党的特派员，有指导该级党部的工作的任务。

六、直属队最高党部问题

军及各纵队的直属队，均组织直属队委为最高党部，委员人数五人至七人。

七、士兵会党团问题

大队士兵会不设党团，工作由支委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委指导。

党内教育问题

一、意　　义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大会规定用下列的材料和方法去教育党员，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更详细的讨论，去执行这一任务。

二、材　　料

（一）政治分析；

（二）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
（三）组织常识；
（四）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
（五）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
（六）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
（七）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
（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
（九）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
（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

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

三、方　　法

（一）党报；
（二）政治简报；
（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
（四）训练班；
（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
（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
（七）个别谈话；
（八）批评；
（九）小组会；
（十）支部大会；
（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
（十二）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
（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

（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七）政治讨论会；

（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一、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二、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

（一）宣传内容的缺点：

1. 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从前发布的政纲如四言布告等均不具体）；

2. 忽略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与鼓动；

3. 忽略城市贫民之取得；

4. 忽略对妇女群众的宣传；

5. 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

6. 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

7. 极少破坏地主阶级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等）的宣传；

8. 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

（二）宣传技术的缺点：

1. 宣传队不健全。

（1）宣传员由每大队五个缩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部队连一个都没有了。

（2）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火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

（3）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同时也是因为宣传员成分太差，工作成绩少，引起一般的人对它的不满），"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们的称号。

（4）宣传队没有够用的宣传费。

（5）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同时对他们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传队的工作简直随随便便，做一点不做一点都没有人理它。

2. 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同时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

3. 壁报出得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

4. 革命歌谣简直没有。

5. 画报只出了几张。

6. 化装宣传完全没有。

7. 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

8. 口头宣传又少又糟。

9. 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10. 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

11. 群众大会很少开，又开得不好。

12. 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方法不好。

三、纠正的路线

（一）宣传的内容方面：

1. 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政纲。

2. 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

3. 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送给豪绅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

4. 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

5. 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

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6. 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的游民生活和性质之不同，分别地对他们宣传。

7. 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之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

8. 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汪蒋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二）宣传的技术方面：

1. 宣传队问题

（1）意义

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

（2）组织

甲、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

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

乙、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纵队各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

丙、宣传队的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

丁、改造宣传员成分的方法，除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的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尽可能不调班长）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地作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进宣传员的质量。

2. 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宣传品分布的适当有效，应是宣传队技术问题的重要一项。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该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

3. 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内容是：（1）国际国内政治消息；（2）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3）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简报的编印，应注意下列各项：（1）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点，要清楚点。

4. 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

5. 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

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

6. 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

7. 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

8. 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

9. 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

10. 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

11. 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

12. 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

（1）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

（2）除有计划地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手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地传达给他们。

（3）从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

（4）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

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5）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一、材 料 问 题

下列各项应很艺术地编制课本，作对士兵的训练材料：

（一）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之任务与计划；

（二）土地革命各方面；

（三）武装组织及其战术；

（四）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

（五）早晚点名口号；

（六）识字运动；

（七）怎样做群众工作；

（八）红军标语之逐个解释；

（九）各种偏向之纠正；

（十）苏俄红军；

（十一）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

（十二）红军白军比较；

（十三）共产党国民党比较；
（十四）革命故事；
（十五）社会进化故事；
（十六）卫生；
（十七）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
（十八）革命歌；
（十九）图报。

二、方　　法

（一）上政治课：

1. 分普通、特别、干部三班。普通班分两种形式，一个支队在一起时，以支队为单位上课，教授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除战斗兵须到课外，传令兵、勤务兵、长夫、马夫、火夫须均到课。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兵士得到初步政治常识。

2. 特别班以支队为单位，从各大队士兵中考选稍识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识者五十名编成，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教授，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特别班之目的在造成较普通班高一级的政治常识人才，以备将来升当下级干部之用。

3. 干部班以纵队为单位，军直属队另成一单位，以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各级军佐及其他指定人员编成。目的在提高现任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预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部。由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

4. 以支队为单位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以支队各政治委员并军事长官中能任政治训练者组织之，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

任，其任务为讨论在一个支队内关于执行士兵政治训练的种种问题。

5. 军及各纵队直属部队的政治训练，由军及各纵队政治部宣传科负责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执行之。

6. 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二）早晚点名说话：

1. 说话时间每次最多不得过半小时。

2. 材料：

（1）报告政治消息；

（2）批评日常生活；

（3）解释每周政治口号。

（三）集合讲话：

1. 支队每星期一次，纵队每半月一次，全军不定期。

2. 每次讲话须要有计划地由政治工作机关（支队由政治委员）商同军事工作机关规定讲话内容，指定讲话人，并分配讲话时间。

3. 每次讲话除任勤务的以外不准不到。

4. 每次讲话内容及对于群众的影响，下级政治机关须报告上级政治机关。

（四）个别谈话：

1. 对下列各种人须和他做个别谈话：

（1）有偏向的；

（2）受了处罚的；

（3）伤兵；

（4）病兵；

（5）新兵；

（6）俘虏兵；

（7）对工作不安的；

（8）思想动摇的。

2. 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

3. 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

4. 谈话后须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

（五）游艺：

1. 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艺：

（1）捉迷藏等；

（2）踢足球；

（3）音乐；

（4）武术；

（5）花鼓调；

（6）旧剧。

2. 于每个宣传队下设化装宣传团。

3. 游艺设备费由公家支给（大队由纵队政治部批准）。

（六）改良待遇：

1. 坚决废止肉刑；

2. 废止辱骂；

3. 优待伤病兵；

4. 恢复每月发草鞋钱大洋四角的制度。

（七）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

1. 把红军的生活习惯，如（1）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2）三大纪律及其理由，（3）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4）红军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的来源，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5）经济委员会管理大队伙食和分伙食尾数，（6）废止肉刑辱骂，（7）优待俘虏事项，讲给新兵们俘虏们听。

2. 讲述红军斗争略史。

3. 红军的宗旨：

（1）红军与白军所以不同，此点对俘虏兵要详细讲；

（2）红军与土匪所以不同；

（3）红军三大任务。

4. 讲述红军组织系统。

5. 普通政治常识，如：（1）国民党与共产党；（2）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3）各派军阀受帝国主义指挥到处混战；（4）分田；（5）苏维埃；（6）赤卫队等。

（八）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

1. 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以商务馆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课，龙岩文化社教本等作参考）。

2. 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

员，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

3. 由公家出钱置备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学生。

废止肉刑问题

一、红军中用肉刑的效果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火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火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

PDG

二、肉刑的来源和废止它的理由

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群众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地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至于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诞生，阶级斗争的激进，工农阶级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力和依于这个权力的剥削，便要发动自己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是最进步阶级的政权，它的下面，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因此苏联不但红军中老早就没有肉刑，在一般法律上亦通通严禁肉刑的使用。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的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现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三、纠正的方法

（一）坚决地废止肉刑。

（二）举行废止肉刑运动。这个运动，要从官兵两方面工作，使“废止肉刑，方才利于斗争”的意义普及于官兵群众之中。这样才能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觉得兵带不住了，而且了解废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与训练；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更顽皮了，而且因废止肉刑增加了斗争的情绪，撤去了官兵的隔阂，将要自觉地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的纪律。

（三）肉刑废止之后，因为历史的习惯的原因，发生一些临时不良现象是会有的，这应该加紧我们的责任，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决不能借口有些不良现象，便掩护了他的封建制度打人习惯。凡那些借口临时不良现象，反对废止肉刑或对废止肉刑怠工的，客观上便是妨碍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

（四）四军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

1. 修改红军惩罚条例；

2. 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

3. 通令发布后，一方面由军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议，详细说明废止肉刑的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队中执行起来；一方面由士兵会召集士兵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觉地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的良好的收获。

优待伤病兵问题

一、伤病兵痛苦的现象及影响

（一）全军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药少，担架设备不充分，办事人少与不健全，以致有许多伤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治疗，即大概的初步治疗有时都得不到。

（二）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的注意不充分，如：

1. 对于卫生机关的健全，不但没有尽得最大的努力，而且简直不加注意。各种会议对卫生问题讨论很少。

2. 官长对于伤病兵没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们，如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兵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

3. 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骂，或无情地驱逐他们。

（三）重伤重病兵给养和用费不够，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

（四）蛟洋医院的缺点：

1. 无组织状态；
2. 医官和药太少；
3. 医官卖私药；
4. 不清洁；
5. 御寒衣服被窝不够；

6. 看护兵太少；

7. 饮食恶劣；

8. 房子窄；

9. 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

上列各种对伤病兵待遇不良，便发生下列的影响：

1. 使士兵不满意红军，“红军好是好，就只不要带花，不要病”，这种舆论简直普遍全体士兵以至下级官长之中；

2. 士兵对官长不满意，越发增加官兵间悬隔；

3. 士兵及下级官长都怕带花，因此，减少红军战斗力；

4. 逃兵多；

5. 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

二、解决的办法

（一）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二）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

（三）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

（四）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

1. 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

2. 要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

3. 无论哪一个部队或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尽量设法雇夫抬来；

4. 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要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

（五）发给伤病兵零用钱，要酌量伤病的轻重，重伤重病的要比轻伤轻病的多给一点。调养费一项，对于特别重伤重病的，应该不分官兵夫酌量发给。

（六）伤病兵衣服被窝问题，除公家尽力置备外，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捐，此外还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款，这不仅为了增加伤病兵的零用钱，而且是唤起全军互助济难精神的好方法。

（七）蛟洋后方医院许多缺点，应该有计划去纠正。此外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被、现款、粮食），以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红军。

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一、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二、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一）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

（二）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以及没收、审判、处罚、募捐、筹款、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均属政治部职权。

（三）凡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和红军政治部会衔的方法处理之。

（四）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但均须尽可能地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线，极力避免直接处理。

三、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等，则用公函平行通报。

四、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事政治两个系统相互间均应用阶级[1]服从原则，不得借口系统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挥。

五、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

六、凡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之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的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由政治部支给。

七、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部

主任无须署名。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使，政治委员无须副署。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这里的“阶级”，指军队中官阶的等级。

PDG